

陳映真文集

◎ 杂文卷

台湾／陈映真／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陈映真，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师承鲁迅，被誉为“台湾的鲁迅”。他的小说创作，代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其杂文是“匕首”，是“投枪”，在“统、独论战”中，直刺“台独”分子的心脏；其文学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本文集包括“小说”、“杂文”和“文论”三卷，代表了他40年来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其中《将军族》、《夜行货车》、《知识人的偏执》等，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朽的名篇。

ISBN 7-5057-14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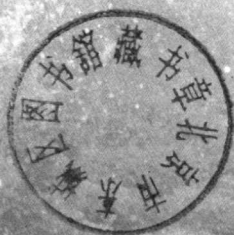
9 787505 714960 >

ISBN 7-5057-1496-1/G · 116 定价：32.00元

陳映真文集

◎杂文卷

台湾/陈映真/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RH 88/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映真文集：杂文卷／陈映真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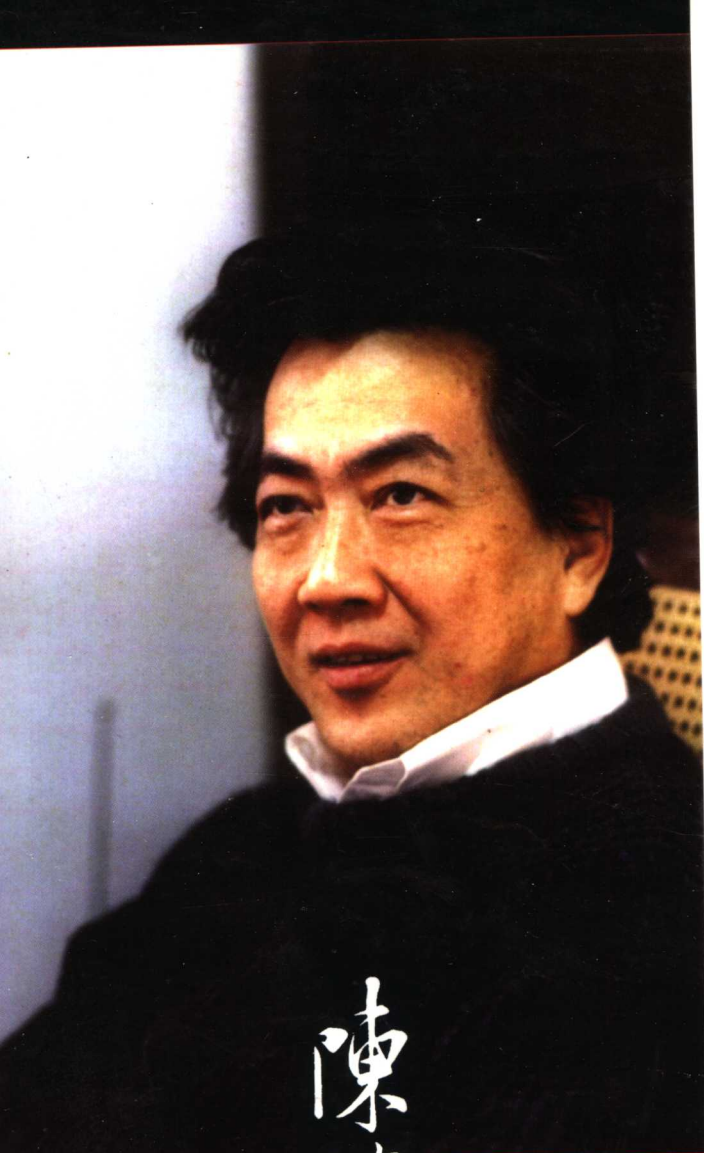
ISBN 7-5057-1496-1

I.陈… II.陈… III.①陈映真－文集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0719号

书名	陈映真文集—杂文卷
作者	台湾 陈映真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75 印张 470000字
版次	1998年11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496-1/G·116
定价	32.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01-98-0315

新华书店
PDG



陳映真

组稿编辑 / 徐天铎
责任编辑 / 吴昌荣
装帧设计 / 宋 澜

目 录

台湾变革的底流·····	(1)
现代主义的再开发·····	(17)
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	(24)
知识人的偏执·····	(30)
关于“十·三事件”·····	(35)
无尽的哀思·····	(42)
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	(47)
绿岛的风声和浪声·····	(66)
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	(71)
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 ·····	····· (78)
“学院理想主义”的忧郁 ·····	(87)
《人间》杂志发刊辞 ·····	(92)
两鬓开始布霜·····	(94)
从台湾都市青少年崇日风尚说起·····	(97)
我们做的，还不够·····	(102)

石飞仁的正义感与台湾之冷漠·····	(105)
人文思想杂志的再生·····	(109)
科技教育的盲点·····	(111)
新种族·····	(114)
日本接触：实相与虚相·····	(118)
鸢山·····	(122)
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之演变·····	(125)
肃穆的敬意·····	(141)
你所爱的美国生病了·····	(145)
作为一个作家·····	(149)
历史性的返乡·····	(168)
悼念的方法·····	(172)
我们爱森林的朋友阿标·····	(174)
鞭子和提灯·····	(177)
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	(183)
最牢固的磐石·····	(189)
自尊心和人道爱·····	(199)
《侵略》和《侵略原史》·····	(204)
台湾第一部“第三世界电影”·····	(207)
电影思想的开放·····	(210)
从一部日片谈起·····	(213)
台湾内部的日本·····	(219)

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	(227)
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	(232)
严守抗议者的伦理操守·····	(237)
追究“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	(241)
“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	(249)
台湾山地少数民族问题和党外·····	(294)
“炎黄子孙”靠哪边站!·····	(298)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300)
抗议日人藤尾正行来台·····	(303)
戒严体制和戒严体质·····	(306)
台湾劳工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	(310)
习以为常的荒谬·····	(313)
一个罪孽深重的帝国·····	(317)
美国统治下的台湾·····	(322)
世界体系下的“台湾自决论”·····	(336)
共同的探索·····	(344)
台湾的殖民地体质·····	(354)
“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	(369)
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372)
何以我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	(380)
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	(385)
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	(405)

建设具有主体性的高雄文化·····	(440)
时代呼唤着新的社会科学·····	(444)
黑松树林的回忆·····	(456)
评“中国不可以说不”论·····	(459)
为和平团结起来! ·····	(465)
十句话·····	(472)
帝国主义者和后殖民地的精英·····	(476)
“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 ·····	(501)
星火·····	(523)
安溪县石盘头·····	(527)
台湾史琐论·····	(543)
一本小书的沧桑·····	(557)
“马先生来了”? ·····	(559)
精神的荒废·····	(565)
汹涌的孤独·····	(582)
附录 ·····	(589)

台湾变革的底流

——戴国辉、松永正义、陈映真对谈

郑庄 译

编者按：

戴国辉，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主讲近代日中关系史。松永正义，日本一桥大学助教授，主讲中国文学。本文原刊日本岩波书店《世界》月刊，未在台湾公开，译出后并由陈映真做了若干修订（特别是〔〕号内所载）。

戴：听说陈先生这次在来日之前，曾经在汉城有一番停留？

陈：大概是今年二月吧，汉城外语大学邀我去谈谈有关中国的抗日文学，于是我向当局申请离台，一直未能获准，就不再寄以期望。没想到四月份突然准了下来。

其后不久，也承香港以及新加坡方面的邀请，要我参加有关文学的活动和会议等。我在结束香港、新加坡的访问之后顺道前往马来西亚到马尼拉。六月十一日到汉城，然后是每天在催泪瓦斯中的日子。我受了很大的冲击。

戴：这表示你亲身经历了激烈变动的现场。你到菲律宾的时候也一样，而韩国则是在最轰轰烈烈的燃烧中的访问，我认为那是最好的时机，也是一种幸运吧。

自前年秋天以来，台湾也显现出惊人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个变化，想必有很多是日本读者所不了解的。主要是在日本，从台湾来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的少。

因此很希望能请既是作家，又是身为《人间》摄影报导杂志的主持人，整天关注着台湾的变化的陈先生，为我们介绍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或文化层面的变化。

质的问题

陈：如果单从“现象”来谈，在政治方面，台湾的确有了戏剧般的变化。有一种不是渐进的变化而是突起的变化感觉。国民党默认了在野党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戒严令也解除了，报禁也将要解除。

从表面上看去，或许有人会以为国民党是受了民众的压力而处于不得不自由化、民主化的状态中。但是我恐怕不这样看。台湾的情况，和菲律宾因迫于“人民的力量”(People's Power)而不得不让出权力状态不一样。在台湾为什么会在几乎像是一夜之间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这不是能简单化地加以理解的问题。在经济方面，当局现在正倡着所谓“三化”，即国际化、自由化，还有制度化。国际化是指解除对岛内资本的保护，如关税的保护政策。自由化主要是指将官营企业开放给民间。制度化，用日本方式说就是经营的合理化。

台湾也许是已到了要想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制胜并生存，必须改造台湾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地步了吧，长年来台湾的资本与当局的关系太过密切，单靠行政命令不可能改造。于是借委诸市场法则，意图使资本主义结构更具资本密集性。我想是属于这样的动向。

戴：那么对文化以及思想方面你的看法如何？台湾的电影、文学等方面，看来很是活跃。

陈：这里头有些问题。在我系狱的一九六八年当时，还有一

些空间和气氛，可以把西方的思想，例如存在主义等（虽然程度不高），介绍到台湾加以讨论或思考，所以当时我常想，一旦出狱，为了补课，非得猛用功不可。但是当我于一九七五年出狱了，过去的那种空间和那份气氛，却几乎已全没有了。

考其原因，一九六八年当时，现代性的大众消费社会尚未形成，尤其是电视还不普遍。当时有些知识分子，生活虽然清苦，但总以“思考”为自己的本分。这种情况，随着台湾战后资本主义急速的膨胀，知识分子大量的被吸收到以跨国企业为和其他资本主义产业中，并被组织了起来。所以文化的样相变了，因此讨论以及思考那些事物的空间和知识分子也都变少的了吧。

戴：我却有些和陈先生不同的感触。近十年来，先且不谈它的内容，台湾着实出版了好多纯文学的诗集和小说。在日本想出版这类书，可不容易。对这件事你怎么解释呢？

陈：在台湾，纯文学的出版物其实没有什么销路。看上去出版的东西很多，其实，不少是作者负担部分或全部费用，印那么一千本或一千五百本，然后把一部分摆在一般书店里流通，其余则分赠给朋友。这种情形最多。

戴：这情形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啊。又不是靠这个吃饭，却想出书，又能出书。我想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吧。

陈：是的。不过，戴先生说：“且先不谈内容”，我却以为不能撇开内容不谈。自一九五〇年以来，由于台湾对文化、思想，以及社会科学等的有形无形的禁压，所以台湾在知识上和学术上都没了蕴蓄。学者，学生很多不做基础性工作的累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不少人只是将美国的学说拿到台湾现买现卖而已。至于这个学说和台湾有着怎样的关系；或符合于台湾的哪些条件，都不加以考虑。就是翻译，也都不做研究上的印证，只是量产。而虽然如此，读者却也只得饥不择食。台湾文化的问题，其一是在

知的积蓄的问题，其二，则在内容，换句话说就是知性和文化的质的问题。我想，这两个问题俱是四十年来台湾文化所存在的重大问题。

自力救济的动态

松永：我了解你着眼于“质”的问题，认为它还早，还不行的说法。不过不管怎么说，台湾社会的变化确实是很抢眼的，而且台湾文学也变得格外的有趣。如在八十年代里，社会运动，反公害运动，还有消费者运动等，都有了很大的成长。这也是台湾从来未尝有过的。这种长期性的变化和陈先生刚才说的突然的变化，有着什么样的关连呢？

陈：当然，就理论而言，因为台湾的社会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所以政治上也被迫要有所变革，是可以这么想的。但是我身处台湾，我的感觉是这回的变化，来得还是太突然。统治者通常是被迫到底线才让步的为多。但是，台湾这一次的动态，却在还看不见有这么大的压力情况下迅速地发生。总觉得情况不很明朗。比较清楚的只是蒋经国想要变革突破的个人的意志。看来，蒋氏似乎是真有诚意要搞改革开放的。不过，就整个统治结构看来，整个官僚体系，缺少热情改革的热劲，都只往上推，都是“一切看上面”的状态。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当然对于民主进步党有所期望。因为它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拥有一定程度民意基础的在野党。在这回的政治变化中，在野党，亦即党外势力所尽的角色力量的确不小。只是台湾最近变化的原因，就不只这一端了。如果误解了这一点，那是危险的。又在野党势力也仍有许多不周全的地方。譬如他们没有能充分汲取见诸于社会运动中的民众的活力。

戴：提起社会运动，最近学生运动好像有了新的动向？在代联会主席的选举中，有非国民党籍的学生候选人出来与国民党推荐的候选人竞选而当选，学生主动的从事地下出版活动等。这是自七十年代初的保钓运动（注一）以来的第一次。

陈：台湾最近的学生运动，也许可分作三个阶段吧。最初的阶段，是六十年代。这也是我自己那个年代。当时，凡是觉醒的学生，只是单纯的参加党外竞选活动，为党外候选人助选。过去，党外政治家，在选举中常有被压迫或逮捕的情形，所以学生同情他们。再说，要政治化的学生，总是个别地政治化。换句话说，是站在单纯的不满与反抗的延长线上的。

第二阶段，是从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也许还稍早一些。初时，也是从对党外候选人的助选运动开始，但是虽然感情上同情党外，但是在知性的水准上却无法得到满足，于是虽只属少数，但是开始在校内成立了具有自主性的团体对抗校方。虽然行动先行于思想，但是校园内的气氛起了变化。〔当然，也不能忘记一九七〇年的著名的保钓运动。虽然规模因受压制而不大，但却是战后第一个学生反帝民族运动……〕

第三阶段是最近也就是从去年开始，进步的政治学、社会科学等原文盗版书在坊间多了起来，学生们开始阅读它。像马库色的书，华伦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等就是。从此，学生们对事象的观点开始有了质的变化，于是在知性上，学生们便益发的无法只满足于党外运动。换句话说，是知性上的和思想上的觉醒。此后在学生的出版物中也开始出现“阶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语词。另外也可以看出学生们急欲将得来的理论应用在现实的动向。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不过，虽说是要读前进性的书籍，却因为战后的台湾知性的或社会运动的蕴蓄都太贫乏了，突然的想读这些书，可谈何容易。

但这个倾向，还是很好的。

在韩国，我看就不同，他们拥有悠久的历史的学生运动的历史。即运动里的胜利的 memory 以及传统的累积，都会发生很大的作用。比起台湾来可真惊人。

戴：关于反公害运动……前次美国杜邦公司要在鹿港建新厂的时候，党外人士和学生以及民众结合起来发动了一个反对运动，结果杜邦收回了计划。我想这也是一个新的趋势。

陈：台湾的反公害运动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开始的时候，居民大多很欢迎各种企业到自己的地方来设厂。因为业者会以增加收入和就业机会做为宣传的手段。可是过那么两三年，居民就会开始抗议。因为设厂后水受污染不能饮用，或患皮肤病等等开始层出不穷。不过，居民一般还是很老实的。公害问题严重化后他们向警察告发，他们向当局陈情等，这些合法抗议总要持续十年以上。可是当局都不采取行动去改善，或有效制止工厂污染。不，其实台湾重大污染源毋宁以当地大企业居多。忍受了十多年的结果，是公害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也曾经去采访过。实在严重啊……忍无可忍，民众采取行动搞“自力救济”，是他们经过一番切肤的感觉，对公权力彻底失望的结果吧。

换句话说，反公害居民运动，其是被迫而自发的行动。目前，党外还没有充分了解公害问题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只因为居民运动有群众，赶到抗议现场可以提高个人的知名度，所以才去露个脸。其实，我听过他们在反公害现场上的讲话，很多党外明星对公害并不理解……

学生就不一样了。他们认为学生在校园里读书，但是也必须要到民众中间去。就是因为有这一份体认，所以到公害运动的现场去。他们住在那里，他们和市民交谈，从而得到很好的教育。虽然这样的学生为数还不多，不过，像台湾大学的一组学生，他们

认为不到民众中去便无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吧，所以就到鹿港。后来他们提出了一份很充实的鹿港居民反杜邦调查报告。所以，反公害运动并不是党外以及学生先行之后民众才行动，完全相反，完全是民众先行型。

戴：最近发生的变化中，有一项是民众自力救济的趋势相当的明显。

近来台湾所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长，其实只是经济膨胀。膨胀中必定存在相对立的矛盾。当这个矛盾，例如公害一旦表面化，而人们被逼到忍耐的极限时，就会起而为街头运动、反公害运动了。

陈：不错，是这样。

松永：我总觉得这种超出政治范畴的，重大的社会变换，很少反映在最近的台湾文学上面。回顾七十年代，因为陈先生以及几位文学家的努力，“写台湾的现实”，成为一种认识，所以有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写实主义文学这么一个共同的理路可寻。

可是到了最近，是不是因为台湾的现实本身不容易把握，所以理路也罢，认识也罢，好像都已失去了。

陈：是的，确实如此。

松永：理由之一，可能是在七十年代以前，因为言论，尤其是政治性言论很受压抑，所以要托借文学来说话，所以文学便非常的有活力。现在政治的问题可以在政治的领域中议论，因此文学固有的问题反而不容易显出来了。

于是，现在因为政治突显了，所以出现很多为了赶上这个情况让主题先行了的小说，可是文学本身似乎是在迷失方向的情况下。对于这个问题，你的看法怎么样？

危险的无力化

陈：你说得很对。不过要回答你的问题，我想必须先回顾战后台湾的文学状况。

战后，到了一九五〇年前后，台湾的文化潮流有了完全的改变。在那以前是有着批判性的写实主义文学的传统的。可是五〇年前后的政治性肃清之后，从血腥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是来自美国的现代主义那些东西。它的影响长达二十年。为什么它能影响那么久呢？那是因为批判性的传统被根绝了的缘故。现代主义以及西方的事物在第三世界早已受批评，所以第三世界的主要文学作品，于六十年代前半期已经全部出齐。

在台湾，却一直到七〇年，文学始终都在摹仿西方的文学的影响中。

六十年代末，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反叛，再就是七十年代初，中（共）美外交的正常化，却给了台湾影响和冲击。于是这才出现批判性的文学。其中最突显的是现代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争（注二）。当时的文学确具有反帝国主义以及把整个中国放入视野的民族主义的理论。一直到当时，台湾文坛还全然没有“分离主义性格的台湾文学”的意识。

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起的变化呢？依我的看法，高雄事件的影响，至少比我所想象的要来得大。美丽岛事件使很多台湾的菁英分子受到国民党的压迫，被捕入狱。

这时候开始有人倡言有别于七十年代的方向的、不同于中国的、属于台湾人的台湾文学。此后，觉得台湾人不能这样一直被欺负的感情，便见增长。

可惜的是由于五十年代以来的知性贫困所致，对事物的把握，

一般上只止于表面性和情绪性。

台湾最根本的问题——如果借用医学用语来说，该说是台湾的基础疾病吧——是在于知性的贫困。所以，最近虽然常有所谓的政治小说，但是多偏重在“台湾人被欺负成这样”的情绪层面，而比较少有深度。依我看，当前台湾文学阐释人、社会、环境等的内容似乎还不见成熟。〔台湾文学在知性上的贫乏，自然影响了焦点，有“焦点丧失”的问题产生。不能说政治上开放些，议题表面化和政治化，文学就相应的无力化。文学对议题（issue）的敏感，往往比政治超前。如果不超前于政治，至少也与政治同时意识到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文学界思想的薄弱化，我以为可能还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吧……〕

松永：这和陈先生的文学主题之一——“消费社会的问题”，也有关系吧？我看近来台湾的社会构造和日本的社会有相当的类似。在日本，文学的语言在大众消费社会状况里已失去做为语言的功能，而流为只是复写品、或商品。我看这种情形在台湾好像也渐渐的在发生了。

陈：是的。在台湾也有这种危机。在日本那样一个曾经有过六〇年、七〇年“安保斗争”（注三）的历史的社会，今天她的文学还难免“无力化”，这是值得忧惧的。在六〇年至七〇年世界文艺界全面激进化的时代，在台湾，却连这种批判的、前进的艺术家、文学家的传统都没有。在这上头加上大众消费社会的到临，于是便具备了促使更无力化以及更加的知性贫困化的条件。

戴：我想回到政治的问题上来谈谈。在这以前，只要参加反国民党的运动而坐牢，这事本身就变成了他的勋章。一个人往往只凭他坐过政治牢，民众就会给予支持。这种情形，依我看，是不会再有了吧。以后，如果只因为一个人坐了牢，民众是不会发给他信用状的。如果不能提示真实的思想或主张，或一些新的事

物，民众便不再跟你走了，不再支持了。是不是这样呢？

陈：我想是的。高雄事件以后，国民党对政治事件的处理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一到选举年，必定会有政治逮捕事件。现在，大概是国民党自觉到高雄事件对权力体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吧，自那以后，几乎就没有过逮捕事件了。

戴：也许体制一方终于了解到“逮捕”这一事就会造就英雄。这么一来，我们得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了。陈先生说最近的变化很是唐突，又说每个人都是集中注意于蒋经国一个人的言行，不过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国民党内部有新生的一个阶层，他们开始有了用原来的方式是行不通的觉醒。

我的看法台湾的经济虽然内含着很多的问题，但是规模已大了起来，比起往昔，生活是丰裕多了。再说，人们离台也方便得很，于是外面的世界和台湾内部开始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国民党本身也许觉醒到政治的压制反而更有引发爆炸性反应的可能。因此尝试以缓和的手段企图减弱反抗的力量。

现今台湾的变化，与其说是来自民众或在野党的压力，我看，好像是权力体制的这一方，主动的把情况引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其结果正是你方才所指陈的现象。

陈：不错。有很多新生代的现代化官僚，以及留学哈佛、耶鲁回来的毕业生等进到国民党官僚机构。他们和老官僚不一样，他们都能够用管理的和经营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估事物。

就以离台许可来说，以前只要一看某一个人来申请，可能就以条件反射性的“这家伙可不能让他离台”的判断就了事。现在，则可能比较会以管理的理念来处理，会根据个别的情况判断，仔细的考量要不要准许，而后做出决定。

不过这只是一个侧面而已。这次的变化最大的原因之一，依我看，也许仍在美国。美国、国民党和党外，他们站在希望有更

安定的台湾，以及维持目前台湾与大陆的分断状态这么一个共同利害的微妙关系上，他们三方面是否正逐渐形成某一种协同关系呢？为此，美国频频招待野外的领导人士，尝试着观念的沟通。事实上已有在野党的领导人多人访问过美国，甚至有一部分人拿自己曾和美国的大人物会过面这事做为政治资产炫耀着。

戴：如果他们之间是原本的思想层次上的关系，倒还好，如果不是，而是做为政客的一种政治“秀”这种关系的形态，在从事学生运动的人们看来，一定会很不满的吧。

刚刚提到美国，现在我却想问一下你对台湾和日本的关系的看法……

使用平假名的台湾学生们

陈：如众所周知，在战后冷战构造当中，在日本战争责任未受到彻底清算的情况下，日本与台湾的紧密关系早已经形成。而台湾依赖美国与日本以维持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的这样一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久的一段时间。这事扭曲了日本和中国近代历史的整合。

所以战后四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教育，是很不彻底的。两三年前，曾经问过一个高中生：“七七”（卢沟桥事变）是什么？他竟回我：是不是一种巧克力糖的商标？情况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咧。

而今，当局也早已不再纪念抗日战争了。党外的态度则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人”的事，与我们“台湾人”无关，表现得极为冷淡。党外对日本也好，对美国也好，完全没有批判性的观点。至于反帝国主义，或与第三世界的团结等想法，就更不用说了。这正说明了，战后的冷战构造是以多么扭曲的情形，影响了台湾。

处在这种状态中，台湾新生代对日本也就全无批判意识。不

懂日语的年轻人看《依依》《安安》等日本杂志，看的是图片或相片。为的是要比别人先知道日本的年轻人穿些什么？发型如何？更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用日语的平假名“の”来代替中文的“的”——例如把“我的铅笔”写成“我的铅笔”！

他们认为抗日是“你们老一辈人的历史恩怨”；他们夸口说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历史。其实他们对日本完全无知，只是毫无批判的盲从于日本商品化文化罢了。

戴：这次来到日本，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陈：我会见了纪念连我们中国人都极少知道的“花岗事件”（注四）的日本朋友们，很受感动。要不是认识这样的日本人，我真不敢想象我心中的“日本人形象”会是什么样子。到台湾来的日本人，大多是如您所了解的那般人。又这次到马尼拉，看日本企业在那里的作为，简直是新版的强掳奴工，是在当地的强掳奴工，日本人把一切全部交给当地的承包人，企业本身对劳动灾害全然不关心，完全不负责任。

还有一些日本人认为，台湾是蒋介石的台湾，是国民党的台湾，自己是进步派人士，所以根本不必也不愿去理会台湾的问题。

我想现在是不是应该改正这样的想法，而开始在民众的这个层面上来建造彼此的联系网路。当我与真正认真研究亚洲，为和平、正义、自由的亚洲和日本而努力的日本人士接触之际，这样的想法便更为迫切，而且也更具信心。

戴：话又说回头，听了有关台湾年轻人的对日意识，我觉得随着经济膨胀而来的台湾现代化，带给台湾的荒芜。公害问题固然是其中之一，其他显现在文化层面的是无国籍化和民族性的丧失。是不是有这样的顾虑呢？

陈：是的。我担心这样下去，无论是经济面或意识上，都会演进成像香港一样的无国籍化。

另一个忧虑是，党外也已受到当局在战后世界冷战构造中的反共体质。党外和当局的意识形态，在对大陆对共产党的这一点上，完全一样是保守、右翼的。而在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全无批判的态度上，也可看到他们间的一致性。果如此，那么两者之争，就不过是政治席位与席次之争罢了。

松永：我很能了解那冷战构造对党外的深厚的影响。不过我想，现在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民主化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目前的民进党的运动是把已经被固定化成为政治制度的台湾内部的冷战构造，打从内部加以动摇。应该是有这样的作用吧。

陈：是的，从理论上来说是不错，不过从我这次在韩国逗留的体验来说，我想，民主化也有质的问题。

戴：你的看法是说在同样民主化为口号的行动中，其领导者在质的层次上有相当的差异吗？你的看法是，在韩国，领导者相当成熟，就在质的方面，在逻辑的层次上都比较高。

陈：目前的台湾，是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要组党也可能了；文学也可以有较自由的表现。但是我深切的感觉到目前所最欠缺的是：要说的是什么？要做的是什么？怎样看过去的历史？怎样分析现况？然后根据这些分析如何去把握未来……这些属于质的问题。

我很想披露我这次的韩国体验。问起韩国的基督教徒、学生等，他们各个人的谈话中都表现出：在外国霸权支配下的韩国国家的分断与民族的分裂，是他们心灵深处最大的痛楚，这样的思想。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统一？怎样把两种体制、两种生活方式合到一起。关于这一点他们议论很多，但是结果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是在“必须赶快停止分裂状态”的这一点上却是一致而鲜明的。统一是他们全民族最凄烈的愿望。这在主张中国之统一的我看来，感铭至深。

重看战后史

陈：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克服由冷战构造培养出来的对事物的看法，然后重新来看台湾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从而比较建设性地运用目前所获得的自由和民主。

譬如好容易有了可以公开讨论可谓台湾战后史的原点的“二·二八事件”（注五），这样的气氛。我们《人间》杂志社，也做了二·二八的专集。〔我们以民众史的方式重新拼合这样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台湾在光复当时，全面的倾向中国。是一份终于回到祖国了的心情。这份心情在“二·二八事件”受到伤害。“真正的祖国是这样子的吗”人们陷入了这样的迷惘中。就在这迷惘中，接触到了当时的地下党，于是再度燃起民族感情，然后被杀。

我在这次为杂志编“二·二八事件”专集的过程中，第一次认识了这种历史的复杂性。然而，今年首度举行纪念“二·二八事件”的集会，却不致力于对历史的再认识，而流于喊喊口号、骂骂国民党的情绪化的活动。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就这样浪费掉了，实在可惜。

有趣的是，在和韩国的文学家对谈中，我发现他们也正在要重看他们的战后史。我想留居日本的金石范先生以济州岛叛乱为题材写成的小说也是其中之一。对统一问题，他们想要从战后史的根源处加以重新探究。

戴：我想把我们的谈话做一番整理。

现在，台湾有民众的力量，于是陈先生希望蕴蓄的是十分成熟的变革思想。他希望揭示在民众跟前的是不同于国民党的变革思想。但是认为在这一点上台湾似乎是落后的。也因为去了韩国所以这种烦恼更深了。但是在松永先生看来，认为不尽然，台湾

做得相当好。民进党等人的活动，已经慢慢的在动摇台湾的历史包袱。让我们来珍惜这一点。

陈：请不要误会。我决不轻视民进党。毋宁说我对他们“望深责切”吧。不过，现在所说民进党党员的招收上并不很踊跃。尤其知识人党员这一层的招收更难。以现状来说，大家对党外知性方面无法满足，所以采旁观的态度。投票的时候当然无可选择，所以投给民进党，遇有他们的集会也会前去听演讲，但是还是觉得犹有不足。〔我就是这样的党外知识群众之一……〕

注一：保钓运动 一九七〇年九月美国决定将冲绳岛归还日本。依美方所公布的范围，它包括钓鱼台群岛在内。这遂引起保护领土所有权的运动。这个反美、反日的运动乃转化为面对问题提不出对策的国民党的批判。继而促成了民族主义的觉醒，以及对政治、社会的批判运动，而成为七十年代反体制运动的导火线与出发点。

注二：现代诗论争・乡土文学论争 前者是对偏离现实社会，一味摹仿西欧的现代诗的批判，以及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为主题的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的论争。这个论争终于形成为七十年代台湾写实主义文学的契机。这样形成的文学潮流，因为是以描写台湾社会为主，所以被称为“乡土文学”。对于这个情势，国民党周边的文学家，乃批判其为共产主义文学，而引发七七、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争。透过这个论争，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乃广为社会认同，同时也显出了拥护乡土文学者之间的文学观的分歧。

注三：安保斗争 针对一九六〇年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改订，以阻止改订为目的之组织及运动，从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五年）起就在日本开始了。一进入一九六〇年，以工会和学生为中心，这个反对运动扩及日本全国。尤其是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由自民党主流派所做的条约的强行采决，引发了“保护议会主义”的口号，国会连日的被示威团体包围。终于发展为战后最大的国民运动。其间又因为种种波折，到了六月中旬以后，市民的参加明显的多了起来。包围国会的示威人数竟达三十万人以上。后来日本七大报社发出了《排除暴力守护议会主义》的共同宣言，大众媒体对这个空前的运动发生了煞

车作用。及至条约的自然成立之后，岸信介首相下台，这个波涛才平静下来。

注四：花岗事件 一九四五年六月，被强制掳往日本秋田县花岗矿山区劳动的约八百名的中国劳动者，在日本蜂起反抗的事件。他们与军警抗争数日，终被镇压，有百名以上的中国奴工遭到杀害。

注五：二·二八事件 蜂起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反国民党事件。这一个反国民党的不正和腐败的暴动立即扩散到台湾全岛。这些控制了全岛的反对者，强烈要求广泛的自治权。对此，国民党以强硬的武力加以镇压。依据当时的军方资料，这事件中的死伤者（含军人、官吏）约八千人。这事对正值战后再出发时期的台湾社会的指导阶层，造成很大的打击。而且也广泛的引发了反对外省人·反中国的意识。影响台湾战后史至巨。

——一九八七年十月日本《世界》月刊

现代主义的再开发

——演出《等待多戈》的随想

我对于文艺上的现代主义，抱着批评的意见，已经数年了。这次“剧场”演出《等待多戈》，跟了几天班，遂有机会对于这长年的意见做了检查。结果一方面纠正了自己的意见里的若干错误，一方面也益觉得现代主义实在已经临到再度予以开拓的时候了。——特别是此地文艺上的现代主义更是如此。

“文艺是一时代的反应。”是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情况，产生一个特定性质和内容的文艺。所以，“现代”的这么一个复杂而且未曾有过的时代和社会，产生“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毋宁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

因此，“现代主义”文艺，在反映现代人在堕落、背德、惧怖、淫乱、倒错、虚无、苍白、荒谬、败北、凶杀、孤绝、无望、愤怒和烦闷的时候，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是无罪的。

然而我一直对于“现代主义”文艺抱着批评态度的理由，至少有下列几点：

第一、文艺家是一个人，而且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有观点的人。做为这样的一个知性的人，当他面对、而且生存于这样一个被庞大的、物质文化所非人化了的人和社会时，他是应该跟一切被病毒了的人们一样，将这非人化的病的感情浓缩了，又放回给无数苦难的心灵？还是该指摘、批评并唤醒人们注意这一切非人

化的倾向，鼓舞着做为人的希望、善意和公正，以智慧和毅力去重建一个更适于人所居住的世界？很明显，台湾现代主义文艺，在性格的根本，便缺乏这样一个健康的伦理能力。

第二、现代主义文艺，比起文艺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是一种意识的创作。无数的现代主义派别发表无数的现代主义宣言。他们用一种做作的姿势和夸大的语言，述说现代人在精神上的矮化、溃疡、错乱和贫困，并以表现和沉醉于这种病的精神状态为公开的目的。现代派的批评家，又千方百计的利用既成的科学知识，为这些表现在现代主义文艺中的精神状态找根据，进一步予以合理化。现代主义文艺在许多方面表现了这种精神上的薄弱和低能，在一种近乎自怜、自虐狂和露出症的情绪中满足各个人的自我。现代主义文艺的贫困性，不能包容十九世纪的，思考的、人道主义的光辉，是很明白的。

第三、一半由于精神和感官倒错的加剧，一半由于消费社会的流行风气，现代主义文艺产生了目不暇接的文艺形式。再加上内容在先天上的贫困，使内容和形式已经失去了浪漫主义以前的长时期的契合与发展。结果，形式主义的空架子在现代主义文艺中到处充斥。形式主义不但欺骗了广大读者，也欺骗了大部分低能的现代主义文艺作者自己。十八世纪以来，一层广大的城市市民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文艺表现形式。文艺也便前所未有的负起了喂养、丰富这些广大市民读者的任务。但是，当今现代主义文艺的诡奇和晦涩的形式，使它远远地离开了读书群，将原有的任务遗落给做为消费品之一的通俗市场文艺。现代主义文艺已经史无前例地从民众中孤立起来，史无前例地舍弃了丰富民众精神生活的文艺任务。

差不多便因为上述的几个观点，我批判了现代主义。这种批判的态度，使我自己的创作生活具备了某种免疫能力，一直没出

过“现代主义”的疹。但是，到这次跟在末后看见《等待多戈》的演出以后，我才感觉到这些观点固然是对的，但持有这观点的我的态度，却一向是很机械性的。

这种感觉的第一步，是在于演出条件不好，演出实质也不见完全的这么一次演出中，我仍然不禁感到一种极其深在的感动的事实。这种感动的经验，是一点也不亚于其他文艺作品所给予的。我于是初次感觉到：现代主义作品竟也有这样满足了艺术需要和知性需要的能力。现代——这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物质样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人类一般的个别情况、为主者的情况、为主者的情况和为奴者的情况等等，在这出剧中，那样有力地做了解剖和展列。现代人的忧悒、的无力感、的惨楚、的孤独、的绝望，被一种诙笑的悲剧语言给传达了出来。没有疑问，《多戈》是一出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内容做了十分优越的逼近的少数作品之一。它和现代人一样，是惨苦的，是行动上的阴萎者，是孤单、恐惧和不快乐的。——至少没有像此间以“现代”当做一种时装去穿的现代派的表兄弟们那么快乐。《等待多戈》以它特殊而生动的艺术方法，反映了现代人类泛在的矛盾的事实，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评价。

其次，是它的内容与形式的契合感。汗牛充栋的台湾现代主义作品，往往只给予一些市场性的、架空的、奇癖的以及病的形式。然而在《多戈》里头，内容和形式差不多已经取得了见于一切伟大艺术中的统一，以致于使我们能把它当作一个有机体去接受它。贝克特（Beckett）使用他的特殊的语言，对我们忧悒地讲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一下子就给迷住了，而且深受感动。我们在一片刻里不能不为我们自己的命运和面貌觉着忧愁、觉着惧怖和某一种愠怒。但我们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贝克特的声音、语法、表情和手势是如何的不同。我们受了感动了。

于是，做为现代主义的眩人的红背心的“形式”，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那一刹那消失了。“现代”的这个标签消失了。问题不在于“现代”或“不现代”，不在于“东方的”或“国际的”，不在“禅”，不在于“观静”、不在于……问题的中心在：“它是否以做为一个人的视角，反应了现实。”文艺是现实的反应；而反应现实的制作人，是人；是一个具备了思考、爱、和批评能力的人。文艺的形式历有变革，但做为思考的人的那种追求人的完全的心灵，却永未间断，而且，——因为我的某种乐观——应该奔向一个更高的层界去的罢。

因此，走进形式主义的空架以及思考的贫困的现代主义之错误，之不足取，固然十分明显，但对于这种错误采取机械性的批评，也是错误的。现代主义文艺，因为要反映“现代”这一个未曾有的特殊现实，而必须要求适当表现这现实的特殊形式。当内容和形式完全统一的时候，被商业化了的、硬变了的、迷信化了的“现代”，便消失了。现代主义文艺，便在这一个观点上，被承认了它一定的存在价值，对它做无分别的、教条式的攻击，是不正确的。

在台湾的现代主义，至少在下列的两点上是应该批评的。

第一，在台湾的现代主义，在性格上是亚流的。促成这种亚流的性格的条件有：（一）客观基础的缺乏。现代主义文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在程度问题；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虚像和实像间的超离，即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性质问题，在在都说明了何以此间的现代主义缺乏了某种具有实感的東西；何以徒然具有“现代”的空架，一片轻飘飘的糊涂景象，就连现代人的某种疼痛和悲怆的感觉都是那么做作。土壤贫瘠，又偏偏要学别人种一些不适于这个土壤的东西，长得当然也就一片焦黄，而且斑斑虫蚀的了；（二）台湾的现代主义，

不但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末流，而且是这末流的第二次元的亚流。从时间上说，台湾的现代主义晚了将近半个世纪；从实质上说，不但缺乏在（二）中所说的自然基础，而且缺乏与它的西方母体之间的脐带联系——即真正反映了现代西方人精神状态的文学的、音乐的、绘画的作品。结果，台湾的现代主义文艺，像所有西方的文化在一切后进地区，一切前殖民地区那样式一般，只看见它那末期的、腐败的，歪扭了的亚流化的恶影响。

第二，思考上和知性上的贫弱症。在台湾的现代主义文艺里，看不见任何思考的、知性的东西。文化人在思考、知性上的阴萎症状之普遍，实在找不到第二块土地可以和台湾比较的罢。这样的结果，我们的现代主义者们，只是在那儿玩弄语言、色彩和音响上的苍白趣味，只是在那儿幼稚地堆着形式的积木，只是在那儿絮絮不休地缠着一些形而上的——连他自己都给唬得昏头转向了的——“理论”和“哲学”。

总之，我们的现代主义文艺，变成了一种和实际生活、实际问题完全脱了线的把戏。更可惜的是这种把戏又都是一些知性贫弱的少数人在耍着。这样一来，我们的现代主义文艺，不是徒然玩弄着欺罔的形式，便是沉溺在一种幼稚的，以“自我”那么一小块方寸为中心里的感伤；不是以现代主义最亚流的东西——堕落了虚无主义、性的倒错、无内容的叛逆感、语言不清的玄学等等——做内容，就是蜷缩在发黄了的象牙塔里，挥动着废颓的白手套。在客观上，台湾的现代主义先天的就是末期消费文明的亚流的恶遗传；在后天上，它因为一定的发生学上的环境，成为一种思考上、知性上的去势者。结果，我们的现代主义便缺少了一种内在的生命力，缺少一种自己生长，自己纠正自己和接受新事物等等的的能力。

本篇短文的作者认为：台湾的现代主义文艺家们，必须真切

地面对这一问题：即此间现代主义文艺的贫困性。只有当他们了解了这一向之间的欺罔的薄弱、的幼稚，才是走向一种复兴，一种自我改革的起始。若说我们的现代主义者一无是处，也是不正确的。好几年来，他们以他们的样式，在语言的开拓上，在某种对于现代的反映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拒绝承认：现在样式的我们的现代主义，足以代表现在的、将来未死的、以及将生的台湾的文艺的方向。我们深切地认为：我们的现代主义，已经到了停止自欺欺人，到了深刻反省，到了诚实地做对自己批评，到了重新予以再开发的时候！

基于我们对此间现代主义的特殊相的认识，即：（一）性格上的亚流倾向；（二）思考和知性的贫困性，我们认为：我们现代主义之再开发，至少应该基于下列两个磐石之上：

一、回归到现实上。我们目前的现代主义之亚流化的现象，表现在它的移植的、输入的、被倾销的诸性格上。这些性格，当然使它失去现实基础。我们看见的，是梵高、马蒂斯、毕加索、马拉美、波特莱尔、萨特……的残缺的、被歪曲了的摹仿。回归到现实的意义，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因为文艺是现实的反映，文艺是先天上离不开现实的。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才产生一定样式的文艺。现代文艺也不能在这一规律之外。定根在现实，从现实中吸取了养分的文艺，才是有生命的文艺。否则，只做为外来文化的亚流，便仿佛氧气罩里的生命，虚弱而且不健康。（二）有人说：离开现实，逃避现实，是现代主义的主要性质之一。但是，必须明白：即使是逃避或离开现实，也必须先有一个实在，这种逃离，才是有根据的，才是可理解的，才是真实的。

二、知性与思考的建立。事实上，现代主义常常表现一种诡异的知性。如庞德，如艾略特，在古典的、学院的知性上，有他们的贵族的姿势。抛开对这种姿势的批评不论，我们的现代主义

者们，似乎对于他们的列祖的某种深的知性方面，太过于无知了些。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飞马行天不知所止的玄学，而且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的思考。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人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以现代派们颂扬最力的费里尼、卡缪、萨特的艺术说，他们不但深刻地反映了、解剖了、哭泣了现代人精神的被虐的情况，也用他们个人的爱情和悲愤，用他们的行动和锐利的思考，生活在现实的最中心——甚至纳粹德国的地下——使自己不断地飞跃、不断地前进。

——一九六七年三月《文学季刊》

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

在今天，对于台湾现代诗坛抱着批评的态度的，大约有这三种人：

第一种，是保守派的残渣。属于这一派的人，早在启蒙的五四时代起，就竭力反对白话文了。他们在思想上，是旧的、落后的、农业的中国的意识形态之最后的代表人。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看见他们发表许多复古的论调，比方说读经，写毛笔字，反对节育等等。然而，毕竟由于他们只是一小撮远远地掉在中国近代化历史的背后的人们，因此尽管他们之中有的还占着高位，他们的意见，一般地已经失去了影响力。这一点，只要看白话文之通行，以及节育之普遍，就很明白了。

第二种，是所谓“三十年代”文学的孤儿。差不多很少人注意到，所谓文艺的现代主义，也发生于欧战后的“三十年代”的这个事实。然而何以它没有在中国的三十年代文学中起主导的作用，而迟至今天的台湾才有了发展，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这个原因，按着我粗浅的想法，至少有这两点：一方面是流行在当时全世界思想生活中的“左翼”热潮支配了中国的文学思想；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当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来的、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浪潮。这两个因素，先天地就和具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性质的“现代派”文艺相对立的。我们实在不能想象：当东三省陷

落的时候，诗人会有兴致去写：“你见你的影，于成熟之水上，终于解脱了年龄/而你让锚制作法律于海底之牧歌中”这样的句子。在那个年代，人们总是在诗章中寻求当代最迫急、最感动人心的诸问题的解答；他们总是在诗章中鼓舞别人，也受别人的鼓舞；他们总是在诗章中传达一个悲壮的信息；他们用血、肉和眼泪去写诗、读诗。

习惯于这种“三十年代作风”的读者，没有法子接受“现代诗”，是很容易了解的吧。因为这个缘故，这批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便遽而完全失去了读诗的生活，至今也有二十年了。他们对于新诗问题，泰半都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他们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三十年代文学遗落的孤儿。这固然也是世代的问题，但是，这两种反现代主义论之间，是并不一样的。前者是共同在新文学肯定论的基础上，做新文学的方向，内容和形式问题上的争论；而后者，是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的、根本性的争论。新文学在五四之后，将成为中国未来文学的主导方向，已经是一个定论；然而，现在的“现代派”，是否就是将来中国文艺的主要形式，一如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新文学取代了以文言为基础的旧文学，却决不是可以遽加断定的罢。

在第一种反对论之薄弱，第二种反对论又默不作声的情况下，加上其他极为特殊的条件，使得现代主义文艺——特别是现代诗——在台湾有了一度蓬勃的发展。据诗人们说：现代主义在台湾的成就，首先是诗，其次是（抽象绘）画，然后是小说。这种欣快感，我记得，以四五年前的一个所谓“新诗论战”后，达到了高潮。但是，现在想来，新诗坛的无政府状态，恶化的形式主义，恐怕也正是那个时候开始的罢。到了今天，虽然在表面上仍然有热闹的朗诵会，和各种诗刊的出版，但在骨子里却日深一日地感到一种危机。据说有的人停笔了；有的人想把这个本质上无

法大众化的现代诗“带到农村、学校、部队、矿山”而不可得，于是，苦闷着；有的人则歇斯底里地拿着棍棒到处打“伪诗”的老鼠；有的人把自己关在玄学的诗论（比如说：主张诗所表现的是什么“当代一种超脱时空的意识感受状态”，即所谓“心象”的。）里自我陶醉，要求读者应当“承认自己的无知”，等等。不论反应有几种不同的样式，都说明了一个迫切的需要；现代诗坛应该做一个诚实的、勇敢的、深刻的反省。这样的反省运动一天不在新诗坛发生，另外一种反对论就不能不存在一天。这第三种反对论者，包括曾经一度写过现代诗，而今天正废笔沉思的少数；包括相当多的、曾经一度狂热于现代诗，随着他们理性的成长和对于文艺更多的要求而开始怀疑，批评现代诗的读者；也包括像我这样毕其生和诗毫无瓜葛的人。

第三种反对论者和第一种、第二种都不一样。他们和保守派之间，连教育上的，启蒙时代的联系都没有。他们这种和传统完全的疏隔，当然，并不是什么可以称道的骄傲，反而竟是一种悲哀也说不定。另外一方面，他们几乎完全和什么“三十年代”的风风雨雨，毫不相干。如果某些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可以把“××主义当做婴儿时代的鞋子”一般地抛弃了，则这些人的“婴儿时代”，是连“鞋子”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当然也没得脱去以“抛弃”之的东西了。至于抗日的，争取民族自由战争的往事，对于这些年轻的、大部分成长在台湾的世代，差不多只是一种古谈罢了。也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疏离，他们才一度把他们那极度空漠的，贫弱的心膺，开向以虚无、背理、丑陋和非人化为重要本质的现代主义文艺。西方的虚无主义，以不同的音程，在台湾发生了共鸣。

按着这样的逻辑，现代主义应该在台湾生根开花，而且也应该像他们（现代派们）自己所期许的：成为真正台湾地区文学的

主力罢；然而却又不然。诗人停笔；真伪诗之争的莫衷一是等等的事实，到处都说明了现代诗正面对着一个严重的存续问题。现代诗可以不要第一种或第二种反对论的读者；而倘若连一度是现代诗最主要的读者的第三种反对论者也可以不要，拼命想把他们的作品译成英文，企图在西方一炮而闻名天下，那么，这个人除了是一个没有药救的夸大妄想症患者外，什么东西也不是的。

然而，何以一度是现代主义的拥护者的文学青年，会发展成为现代主义的对立面呢？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了。

可以用最一般性的意义这样说：现代主义是一种反抗。能够对现代主义稍做发生学的考查的人，就能明白：现代主义如何是对于被欧战揭破了的、欧洲的既有价值的反抗，又如何是对于急速的工业化社会所强施于个人的、划一性的反抗。台湾的现代派，在囫圇吞下现代主义的时候，也吞下了这种反抗的最抽象的意义。我说“抽象的意义”，是因为在反抗之先，必须有一个被反抗的东西。然而，与整个中国的精神、思想的历史整个儿疏离着的台湾的现代派们，实在说：连这种反抗的对象都没有了。

他们的愤怒的反抗，其实只不过是思青春期少年在成长的生理条件下产生的恐怖、不安、愤怒、忧悒和狂喜的一部分，在现代派文艺中取得了他们的表现形式罢了。我的这种说法，当然有点偏激罢。但基本上，是大约不会错罢。我的论证在于：如果现代派的道路，现代派的反抗、能够从青少年时期不断地向成年的成熟期延伸，那么，它便有了一个强固的意义。但事实并不然。众多在青少年时代狂热地拥抱过现代主义的文学青年们，在他们大学毕业以后，逐渐对于一度热爱过的现代诗的一般，发生了怀疑，甚而至于批判的态度。这正说明了他们自己的成长，也说明了在台湾的新文学毕竟具备了自己矫正自己，向前不断发展的，可贵的能力。

第三种反对论者，一般地说，还在摸索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文学观，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主张。但是，我想，这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文学思想自浪漫主义以后，便不曾有过一个独块岩似的党派，如拟古典主义一般。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新的诗运还完全看不到面貌。以一个最机械的了解来看，做为现代诗的反对面而新生的新诗，可以在旧的现代诗，即它的母亲那儿找到：倘若现代派的诗是暧昧的，那么将生的新诗一定是走向清楚的白话；倘若现代派是苍白的个人主义，那么将生的新诗或许要走上比较涉世的道路，去拥抱整个社会和人生吧；倘若现代派的声音是没有出路的苦闷，绝望和不信，则那将生的新诗也许要以他们步入成熟时代的信心，去建造、去追求一个全新的信仰，也说不定；倘若现代派一直苦于精神和思想上的大疏离，那么，将生的新诗或者将要以一个全新的视点，找到他们的定向吧；而倘若现代派堕落到使他们的作品成为形式主义的游戏，则在将生的新诗中 will 只见生动活泼的内容，使形式因溶化在内容中而不见了。

我但愿这不至于成为一个愚蠢的预设。但是，不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越来越明显了：调皮的，台湾的现代派，竟在不知不觉中，怀了一个新的胎儿。这胎儿顽强地胎动着，使她的母亲感到妊娠恶阻所带来的恶心、呕吐、焦虑、恐惧和不安。但一旦新生的婴儿坠地，这一切都要过去，只留下新生的欢乐。目前最切要的事，是应该开始尝试着去写出作品来，虚心地自我检讨，忍受顽固的现代派必然而来的嘲笑，为新诗重新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作品本身是一种最有力的雄辩。新生的诗人可以一面创作，一面检讨，然后逐步把经验归纳起来，再以之运用在创作上，让心怀恐慌的现代派咒骂罢！他们所走的，已经是一条苦闷的死巷。而我们，却有一大片未知的、丰腴的处女地等着我们去开发呢！

后记

我一向不曾在诗的范围工作过。因此，有关诗文学问题的发言权，不但有它的限制性，也不免有一些行外人的错误吧。但是，就文艺范围来说，单只做一个读者，由于长年没有过诗的温饱，便不免不自量力地参加了这个议论。我固然很担心我的这种由于长年的诗饥饿而来的造次不被了解，但，不论怎样，我对于一切认真的诗工作者们的好意，以及基于这好意而提出来的浅见，实在不愿意他们不知道。

另外一方面，特别在最近的作品上，看见某些具有无比潜力的诗人，发表了充分表现出他们在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的、可敬的努力的诗章，使我对他们满怀着敬意。从他们的作品中，我固然发现了他们对于我的外行话之大度的宽容，但我仍然要对他们因为我先前的造次和无知致最深的歉意。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草原杂志》创刊号

知识人的偏执

〔1〕

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所发生的偏执，大约有两种；第一种是由于无知而来的偏执，比如硬说摄影机会把人的灵魂摄去之类；另一种却正好是由于知识而来的偏执，比如一定要主张绘画之不再现自然、不摹写自然的抽象派艺术。知识分子的偏执，便是属于第二种。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虽然往往是消除某种因袭的、约定的偏执最为得力的人，但是他自己又很难于没有另外一种所谓知识分子的偏见。而且，或者简直可以说：知识分子也者，就是有其特定的知识上的偏执的那种人罢。知识人按着他们既有的教养、知识和癖好，去解释世界，去评断一切的事物。而这些教养、知识和癖好，又无不有其强烈的阶级和党派性。这样，在知识的范围内，就划出许多的派别来，各有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语言。而当这些不同的派别相互对立的时候，所谓党派性、所谓知识分子意识，就紧张了起来。而这紧张起来的党派性和知识分子意识，恐怕正就是知识人堕落成为各种样式的教条主义者的最根本的原因罢。

因为这样，只要是各种知识上的偏执和党派性存在着，所谓知识人的偏执和派性就不能不存在着。而且，人类在知识上的进步，恐怕就是在这种派性上互相辩论、互相冲激而来的罢。像哥白尼、像伽利略、像达尔文、像弗洛伊德等等，没有一个不是孤独地面对着全世界知识的法西斯的迫害、攻讦、嘲笑和排斥，为整个人类知识的领域，开辟了又丰富又辽阔的世界的。正就是他们所发现的真理所带来的勇气，使他们能够择善固执，独排众议。

但是，正就在每一个真理在监狱、火刑、放逐、教会法庭和保守主义的巨大逼迫中备受分娩之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另一种知识上的派性和偏执所造成的罪恶。当知识上的偏执和派性，为了有意或无意地保卫一个既有的秩序——一个既有的所有权秩序、社会秩序等等——而膨胀起来的时候，它就必然堕落为各式各样的教条，有时更纠集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强制力量——如舆论、如警宪、如政府、如法律和军队、如法庭和监狱——来加强他们的阵容。我们只要想起有多少真理的先知们，曾怎样因为“危险思想”的罪名，遭受了各式各样的逼迫，就很明白了。对于这种迫害的最古老、最优美的记叙，可以举出记载哲人柏拉图之死的《克利陀》(Crito)来。知识的教条化，不但严重地损害了它接受新事物、往前发展的能力，也成为整个人类往前进步的绊脚石。

〔2〕

因为这样，该如何使自己的知识上的偏执和派性免于教条化，实在是我们的知识生活中十分重大的问题。我个人是个极其不好学的人。不学再加上性格上的多少偏执性，则堕落为一个最肤浅的教条主义者的危险性，就尤其之大了。两年前罢，我曾在《剧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现代主义的再开发》的文章。其中的一

部分，便是说到我如何在《等待多戈》的演出中，发现了我的现代主义反对论中的若干构成部分，显然地犯了机械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发现而且承认了这个错误，对我个人来说，不但使我对于现代主义的批评观点较为活泼，也使我能够怀着一份前所未有的同情和了解的意愿，去看“现代派”们的东西、去批评“现代派”们的作品。

去年十二月下旬，电影导演李行先生租出了他自己的六部片子，让《文学季刊》的同人作家做了一系列的观赏。今年一月，同人作家们和李先生一块儿，就他的一系列作品作了诚挚、坦白和热情的讨论。

这个观摩和讨论，又一次毫不容情地指出了我的另一个错误的偏执。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我向来对于台产影片毫不关心。我一直拒绝着台产影片，到了柯俊雄是什么长相也不晓得的地步。但是，在这个观摩会里，我们不但看见导演李行在这十多年来所付出的动人的努力，也看到台产电影在各种限制——行政上的、人才的、制度的限制——中，在漫长的十余年里所走的步迹。我们实在不能不为某种悲壮的氛围所打动了。在这个为我们所毫不关心的领域里，十多年来，有些人在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限制下，惨淡经营，为台湾电影吃力地献上他们的努力。这些努力所带来的一点成绩，一方面可以是导演李行个人在来日更进一步的创造生活的基础；而这个成绩也同样是将来的整个更高水的、更富于创造性的台湾电影所自发展的共同基础。

台湾电影在编剧、导演和演员水准上比较的落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知识分子对于这个落后的事实，向来不是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就是采取毫无建设意义的、恶评的态度。我们惯于一方面饥饿地耽读着从没有看过的、海外著名电影的报导和翻译脚本，一方面夸大着一些在台湾上映的海外电影在“艺术性”、“现

代”创意上给予我们的深刻“感受”，一方面就对于台湾电影相对地表露着某种自暴自弃的、一竿子打尽的、怀有敌意的批评，嚷着要革台湾电影的命。

然而，终于有一天，我们会成熟到足够去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所采取的、无批判地向西方电影一面倒——而且往往只是倒向他们最其渣滓的《8½》或《幸福》等——；我们对台湾电影的不负责任的、非建设性的批评，都比起我们所瞧不起的、不屑一顾的台湾影片在十余年来所作悲壮的努力，要轻省得多。我们在这同样的十多年来为台湾电影所做的，只是一些安那琪的，夸夸其谈的，不切实际的议论；而他们所做的，却是虽然令人辛酸但是异常实质的，建设性的贡献。

借着这个观摩会，同人的朋友们才有了重新估价自己、重新认识台湾电影的契机。我们深切地相信：当目前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和广泛的其他范围的艺术工作者，能够在一个共同把台湾文艺弄好的基本愿望上团结起来，互相讨论、互相观摩的时候，不只是台湾电影，连带地是诗、绘画、戏剧、音乐和小说等等，就要有一个崭新的发展。而导演李行先生在讨论会上所表现的坦诚、虚心和热情，正是一切负责任的艺术工作者应当学习的。

〔3〕

一个撑竿跳的运动员要跳跃到一定的高成绩，也得有一个所自跳起的地面。凭空地腾云驾雾，是没有的事。要把我们的文艺向更高的地方去发展，也得首先从现有的低水平中做起：同情它、了解它，并给予新的评价。架空地要搞什么高等的艺术，是办不通的。而且，去了解这些现有的我们的文艺，不但不会使我们懊丧，使我们自弃，使我们“庸俗化”；正相反，却使我们更能宝贵

别人步履艰辛地带来的成绩，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无限的鼓舞，增加自己工作的热情。向西方无批判地一边倒，对自己做不负责任的恶评，却只会一步步把我们带到虚无和绝望里。

知识人的偏执，或许是永远不能避免的罢。就以力倡认识的纯粹性的某些学派做例子：他们对于认识问题之追求某种近乎化学上的纯粹的努力，一方面由于认识的非绝对性——人们总是因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的不同的条件，只能不断地向真理逼近——一方面由于把认识当做化学中追求某些纯净的物质那样，不得不把某种“人的”（humane）东西除去了，而堕落成价值中立的，没有人味的工作，终于也不免于自囿为一个反对派性和派性；一个反对偏执的偏执罢。

倘若派性和偏执是知识人的属性，则这派性或偏执有没有在随时自省和自我检查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就更形重要了。在百废待举的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否具有这个能力，是否能在建设的基本愿望上，互相讨论，互相了解，存大同而去小异，实在是比一味放纵艺术家的派性和偏执，是更有其积极的意义罢。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文学季刊》六期

关于“十·三事件”

《美丽岛》编者按：

青年名作家陈映真（永善）历劫两天归来后，以他惯有的笔调写下这篇感人的记述。我们基于某些考虑，从略了文中记述作者思想情况的部分（约二千三百字）。作者说这“为的是向海内外关心我和错爱于我的朋友们，告白我目前的政治见解的大略。也为的是我深深地感到，表达个人最深切、最真挚的思想之自由，是今天台湾人应不惜以生命去换取的权利。”我们知道这使本文减色不少。我们悲切地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不再背负我们这一悲哀！这是我们应该告白于读者并向作者致歉的！

从本文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军法当局在处置本案时的作法较过去是有了改善，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善意革新的开始！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早晨约莫七点四十分，内人才上班不久，我正在客厅读报，一伙年轻的治安人员蓦然闯了进来。

“我们是调查局，想请你去一趟。”

一个年轻人在胸口袋里掏一下证件，又塞进口袋里。我无言地起立，在他们的簇拥中，到楼上的卧室换下睡衣，随便换上一身便服，又复在簇拥之中，下了楼。

“有证件吗？”我无气力地说。

有人让我看文件。警备总部军法处的拘票，说是“涉嫌叛乱，拘捕防逃”！

——为什么？怎么会？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种绝望性的疑惘，在他们蓦然闯进的片刻就攫住了我。一年多来，我沦落商界，为生活奔忙，过着没有时间读书、写字、思想的日子，万万想不到他们连这样的我也不肯放过。

和十一年前一样，我被两个人一左一右地挟持着，坐进一部大轿车。放眼望去，整条巷子若说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大约也不为过。车子就那样停了约莫三四分钟。“在搜索中罢……”我茫漠地想。而车子也终于开动了。

我看见他们收岗收哨，人数之多，令人困惑。一路上，他们还好几次用无线电对讲构联络着。

——全面性的逮捕吧……

我忧愁地想着。晨起空腹抽烟，觉得尤其的辛辣、焦渴。然而他们也让我一根接一根地抽，望着车窗外，车子正驶过秀朗桥、驶向新店。车外是忙碌起来了的早晨的台北。然而一车之隔，已经是两个世界了。

据我抵达新店头城的调查局总局时填写的单子，我是在早晨八时二十分抵达的。当我走进侦讯室，我的脑子里老想着摆在通到这侦讯室的走廊上的一只白色帆布担架，担架上隐约着点点陈旧的血迹。

——我是“二进宫”，这一回怕逃不过一顿好打罢。

我慌茫地想着。“吃过早点么？”他们问。“吃过。”我胡乱地说。“不必客气，我们都为你准备好了，有牛奶、有面包。”我望着窗下长桌上的茶杯和土司，默然不语。

年轻的治安人员热心地为我送来湿毛巾，把牛奶推在我跟前，

我终于喝了泡得又浓又甜的牛奶，烟熏的、苦涩的口感到甜美。

侦讯是从一位年长、官位较高的先生开始的。他说我出狱后还是不老实，说我罪证齐全，要我自己交代。我说我实在不明白我犯了什么事，他于是冷笑，说我自己做的事自己顶明白，事到如今，还是老老实实交代清楚的好。后来他问我的思想，我坦白地，大略地述说了我的思想。他对我的述说，似乎尚无不满，要我好好地 and 别的治安人员合作，就走了。

侦讯在他们坚持由我自动“交代”，而我又茫然不知从何“交代”的情况下陷于长时间的胶着。过午，侦讯室的门开了，十来个人纷纷抬进封好的八九个纸箱。我一望而知是搜索出来的东西。可是我十分奇怪，我哪来那么多东西让他们扣案……

就在这时，一位警总军法处的检察官带着一位书记官来问我一些个人的基本资料，然后说我“涉嫌叛乱”，谕知羁押，并说当面开启扣案物件清点。我于是才知道他们分别在我的私宅、内人娘家、我的小公司和家父的住宅进行了搜查。我一面在扣案物上签字，一面奇怪为什么他们扣下的东西全是无关紧要的名片、记事本、书籍、录音带、文稿和文件。如果其中有什么“要紧”的东西，大约是一本英文托洛茨基的《论文学》影本；一本通俗的政治经济学之类的影本，一本日文的《战后台湾经济》影本，一大堆国际特赦协会和其他人权组织的新闻信、小册子、剪报、两盒叶嘉滢教授有关中共文学的访问录音带，一盒录一只中共歌曲的录音带，一份政治犯家属互助会的章程草稿。其他全是与政治不相干涉的持有物。

这些查扣物件的清点，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有许多东西，不能不以类如“文件二十三件”归一包，在纸包上让我签名的方式，才缩短了清点的时间，我一面签字清点，一面纳闷何以搜查规模竟这么大。我也忖思其中上述少数“问题”物件，能构成我什么

大罪，足以让他们这么大张旗鼓地逮捕。

这第一天，他们要我写下我自己的思想情况。我重新记述在这里，（下略）……

侦讯的第一日深夜，发生了依照过去的经验为奇异的事。有一位年轻的治安人员说：

“陈先生，我看你累了，我们也需要休息，待会儿送你到下面去休息。”

我曾以为这是酷刑拷打的开始。然而他却给我一颗 Roche 药厂的 Volume5，让我服下。“下面”是地下室押房。铁栅、铁门、巨锁的开合声在狭小的走廊中吱呀作响。顿时间，我一下子回到十一年前初入监房的时刻。人变成了号码，无助地囚在一间间囚房中，和一切的亲朋、一切的尘俗，截然地隔绝。在那时，我记得我曾不住地思索，何以古今中外，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出囚牢，做为惩罚的手段……

药片终于使我沉睡。

第二天一整个早晨，我仍因残存的药力，得以在早餐、放封（约十分钟）、午餐的间隙中，沉沉入睡。

约莫下午两点，我又被带上侦讯室。

第一天头一次问话的年纪较长、阶级较高的治安人员来问话。他劈头就说，他读过我写的资料，“果然不出所料，你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他说。他接着说我罪案如山，死有余辜！但他要我为内人想想，要我为年岁已高的父母想想……他说他不相信我是心肠硬到只顾自己当烈士，不顾身后遗族的惨痛的那种人。他问我要自己坦白交代呢？还是如昨日我要求拿事情来问。我说我实在不知所犯何事，请一一问责。他笑着说：“好，我们会问你，有很多事问你，一样样问得清清楚楚……”他要我答话时坦白老实，不可避重就轻……于是他走了，把我留给其他的治安人员。

但是这下午的侦讯，气氛似乎显得较为轻松了。有一位年轻的治安人员，一直诘问我一九七五年出狱后“思想既没改变”，应有所“作为”。我说我已在十一年前想要“做”什么，但失败了，自己知道不是那块材料。他们笑了。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断的问，我所写的东西，和我那不曾改变的思想有什么联系。我知道他们在找“为匪宣传”的口供，但我还是坦然地告诉他们：我的几篇文学评论，自然反映了我特定的世界观。然而，我知道，那些充其量也是文学社会学的最浅显的论文，他们怎能据以入人于罪呢？而况“为匪宣传”者，依据法律，是“以文字……做有利于匪之宣传……”我的文学评论，又如何能“有利”于中共呢？我想着他们的用心，内心且感到无比的悲楚。

一整个下午，侦讯终于初步落实到两个问题上：其一是我和党外人士的关系；其二是我和我同在一九七五年间出狱后的难友间的关系。这两样关系，我全是清清白白的，没有丝毫不可明说之处。此外，他们也问我和海外人权组织的关系，我也坦然相告。

估计在夜晚八时左右，说是有高级长官要见我。走进侦讯室来的是一位穿浅黄青年装的官员。坐定之后，他说他看了我写的资料，觉得我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但据说我把理想的热情用错了方向。社会主义是不能救中国的，只有三民主义能救中国。三十年来，台湾没有流一滴血，土地改革成功了，台湾也没有林彪、“四人帮”……他说我是个孝子……而“一个孝子不会是恶人。”因此当局决心以非常的处置，来争取我的心。他已呈报检察官，决定交保……

我一时不能明白整个变化的意义。但从被捕的一刻到现在，我的心中充满着无边的凄苦和沮丧。在台湾，这种恹恹拘捕知识分子的日子，究竟还有多长啊！

我在四日夜间九时许被送到警总军法处，开过一个谕知交保

候传的庭，就由内人具保，回到家里。我立刻驱车到北投见我年迈的父母。在知道我被捕后一直出奇地安详，被其中一位年轻的治安人员赞誉“真有基督的生命的长者”的父亲，看见了我，才猛然拥我入怀，我泪落的跪俯在他抖战的怀中，不知是悲戚还是再生的喜悦……

一回来，我立刻感受到许多兄弟们、朋友们挚热的关怀。王拓兄、作成兄、艾琳达小姐、廷朝兄、聪敏兄、陈菊小姐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我所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们为我多方奔波、联络。我也听说张俊宏议员为我质询于省议会。有些亲爱的朋友，在那两天中，几乎没有正式吃过一餐饭。

在北投，我接到鼓应兄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后来从在美国的四弟的电话中，才知道鼓应兄在哥大的一场演讲中，临时改变讲题，宣布了我被捕的消息，讲到痛心处，为之失声。当夜回到中和寓所，又接到爱荷华大学聂华苓和安格尔教授的电话，才知道在美国的台湾作家“不分左派、中间派、右派”，一致支援了我。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郑愁予、李欧梵……都签署了抗议信，美国作家组织和在爱大开会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也表示了抗议。安格尔教授并说我的案件受到爱德华·肯尼迪、古柏等参议员的关注，并正拟向卡特总统提出……

对于台湾作家同仁以及其他更多的在美同胞的关怀和支持，我感到最深的、引以为荣的感谢。我引叙了国际人士的支持，丝毫不以其为海外名流而以傲人。但对于他们的热情、关心和善意，我要在这里由衷地表示个人的感谢，我也特别感谢台湾民主政治促进会的朋友们，超乎政治之见解所做的无私的支援，我也必须感谢在日本的拯救台湾政治犯委员会的关怀。最后，我也感谢内人在那两天中不眠不休的奔波里表现的出人意表的坚毅。

归来以后，我的生意受到即刻的影响。有些客户因我的案件

见报，对于是否继续做生意，表示明显的踌躇。我曾在十月八日和十一日两次向调查局写了报告，说明我的困境，要求他们出面向我的客户说明，却石沉大海。警总军法处的鞠检察官，明白地告诉我要有关方面出面解决我的难题，是不可能的。我的生意、我的生计，正面临着危机。

但我心中了无怨怼。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事业毕竟在文学工作上。劫后归来所感受到的温暖，使我感到我在文学工作上是何等亏欠了无数说与不说的兄弟们、朋友们、同胞们的期待。我自知我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驮负着与我的才能不称的关爱，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枝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我从来不以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人物。正相反，我的道德、文章两无可取，我有一般凡人的许多缺点。今后，我也永远不会自以为是一个什么英雄人物，我在劫后的余悸中，所以怀着恐惧写下这些，只是为了向一切关怀我的案件的人一个诚实而且应有的交代，也为了我痛切地感觉到一个人表白自己最深在而真实的信念、思想的自由权利，是每一个台湾人应该挺身而出而争取的权利。

最后，让一切在专制的暗夜中颠蹶前进的台湾人民，怀着爱、宽恕、和对于幸福之永不妥协的追求的意志，勇敢、坚强、紧密地团结起来！

——一九七九年十月《美丽岛》一卷三期

无尽的哀思

——悼念徐复观先生

在今天这样一个聚集了许多徐复观先生的门生、故旧，和许多熟悉徐先生的道德、学问的前辈和青年面前，我应该是最没有资格站立在这儿说话的人。因此，僭越的地方，还要请大家原谅。

刚才，台湾文学早一代杰出的文学家杨逵先生，说起他和徐复观先生之间那种感人至深的友情。对于杨老先生那种淡泊、坚毅、勤劳的生活；对于杨老先生那种对理想的执著和热情，徐复观先生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

实际上，徐复观先生在台中执教的时期，还跟许多早期台湾爱国的知识分子，建立了真挚、温暖的友情。

台中中央书局的庄垂胜先生，就是徐先生的老朋友。在日据时代，台中中央书局，是台湾文化协会的一个中枢机关。当时围绕在林献堂先生周围的台湾抗日知识分子，便是经常在台中中央书局出入。在庄垂胜先生主持下，中央书局对台湾民众文化性抗日启蒙工作，有过十分重要的贡献。

徐复观先生的另外一个朋友，是叶荣钟先生。叶先生是林献堂先生领导台湾文化协会时的秘书。为了爱国、抗日，吃尽苦头。《自立晚报》早年出版的《台湾民族运动史》，就是出于叶先生的手笔。叶先生也是一个活跃的文学家。他在文学评论、随笔和历

史论文上，有不可磨灭的成绩。

早期另一位台湾的小说家张深切，也是徐复观先生的好朋友。张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抗日、爱国的文化人，他曾经因为在台湾从事实际抗日活动而被日政当局逮捕、监禁。

至于杨逵先生，更是一位在日据时代从不知妥协的爱国、抗日的文学家。他是少数几个在日本帝国主义下，永不妥协、坚持斗争的文学工作者之一，并且为此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

徐复观先生的这些亲密的朋友们，都曾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在日据时代，投身于爱国反日的政治运动，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不稍悔惜。他们的工作和精神，已经成为台湾民众爱国主义历史传统的一个部分。

但是，不幸得很，光复以后，由于中国从历史的前近代向历史的近代飞跃的复杂过程，这些早期台湾的爱国知识分子，很受到一些挫折、一些委屈……从此，在漫长的三十年中，他们退隐了，他们沉默了。随着无情的岁月，这些徐先生的老朋友，也终于在徐先生之前寂寞地去世，留下许多等待我们去重新评估的历史性问题。

其实，特别是在这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国族面对的危难；由于都深深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理当有一个和平、合理、光明的前途，因而，他们都毫不顾惜地为了自己的民族，献出了一切。这便是包括了台湾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根源。

然而，在交织着革命与反革命，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的运动中，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受到形式和程度不同的挫伤、委曲和侮辱。徐复观先生的一生，和他的台湾朋友们的一生，和一切近代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的一生，便有相同的历史命运。正就是这相同的命运，使徐复观先生和他在台中流转于山林的朋友，结

成了真切的友情。

徐复观先生与他在台中的老朋友间的友情，也许有出于中国知识分子“斯文相惜”的传统——特别是对于被贬而流落山林的士知识分子的礼敬的传统。徐复观先生和他们之间超出畛域、偏见的友情，也许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在世俗权力之外，追求“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出路，这样一个被徐先生称为“民族的乡愁”的传统。但是，不论如何，徐先生那种中国知识分子宽阔、真挚的“民间士人”的人间性格，尤其在当前的历史时代，有重大的意义。

因历史的转折而饱经挫折、幻灭的先行代台湾爱国知识分子，如果终于产生像吴浊流先生所说的“孤儿”的悲哀和“庶子”的悲欢；如果终于有钟理和先生所描写的民族认同的迷惘，那绝不是奇怪的事。

但是，在怀念着徐复观先生的此时，我们不禁想：庄垂胜、叶荣钟、张深切这些可敬的乡先辈，在和徐复观先生相濡以沫的真切友情中，应该得到一定的安慰吧。

我也常常想：如果吴浊流先生、钟理和先生，在九泉之下，还能知道徐复观先生和胡秋原先生曾在那个人人忧愤，却人人噤若寒蝉的时刻，用坚定、严肃的声音，及时支持了乡土文学，在黄泉之下，他们也应该有一份安慰吧。

徐复观先生，出于他那自然的“民间士人”的人间性格，对于民族内部真诚的团结与和平，在他与他的台中朋友间的友谊中，树立了富于启发意义的典型。长年以来，台湾知识分子曾向着不同的口号、党派和集团狂奔、扭曲，并且使台湾知识分子失去了团结，互相分裂，互相厮杀。但民众所面临的问题却依旧或者更为深重。于是，在既有的权力之外，另求出路；在中国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中，找寻民族认同的主体的这么一个“民族的乡愁”中，

徐复观先生和他的台湾在野知识分子间，产生了手足、同胞的真实情感。刚才，杨逵老先生动人的追忆，比什么都生动地说明了某些人的思考所不能理解的，中国民众间深厚、不可挑拨的民族团结。

徐复观先生的“民间士人”的人间性，还表现在他严肃地遵从心性良知的声音，以他的健笔，干涉实际生活，勇敢评论时政的工作上。徐先生的政论文章，据徐先生自己说，是出于“良心的压迫”，“不能不写”的。他也说过，他的一些“杂文，都是在拿起笔时，忘了自己身家吉凶祸福的情形下写出来的。”

徐先生深刻了解到台湾知识分子在现实权力之前挣扎、曲扭，以便维护知识分子在权力隙缝中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并且时而胜利，时而失败的历史。因此，徐先生便以他自己的实践，努力要重建台湾知识分子在权力之前，坚持良知、真理，为民请命，褒贬时政的传统精神。正是秉持这样一个传统精神，徐复观先生痛烈地批评了时政，对台湾的自由、民主和人权，高举着不可妥协的信念，并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丰收地淘炼出人道主义的宝藏。

徐复观先生走了。

在多难的台湾，还需要像他这样的老人，苦口婆心，以他那“不容自己”的良知，多说些话的时刻，他走了。走得那么忧伤、那么寂寞。但是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凡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有哪一个能在临终的床上，能够不抱着对民族前途深刻的忧伤，能够不因未能及身而见民族的复兴，而抱着永恒的悔恨与寂寞，离开人世？

徐复观先生走了。

虽然总在意料之中，但是他的身后，却出奇的寂寞。事实上，从他简短的遗言中，我们知道徐先生早已经悟到：像他那样不向

权力俯首，却一心想在中国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中找思想的出路，找心灵的故乡的人，身后的寂寞，是必然的。

但是，恰恰是徐先生身后异常的寂寞，突出地显明了徐复观先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超群的、独立的、崇高的风格。

今天，我们可以因着不同的理由，聚集在这儿怀念他。但是，如果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理由，使我们来到这儿相聚，仔细地想想，说不定正好是徐先生身后异常的寂寞，在我们的内心，回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哗！

徐先生走了。

对于台湾知识分子，他所遗留的，与其说是一个学派，不如说是这些精神：严谨地听从心性良知的声音，坚持真理，为亿万百姓的疾苦说话的精神；对台湾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前途，永不丧失信心的精神；在权力和比附于权力的时流之前，坚持真理与良知的自由的精神；以及在世俗的权力之外，直接从中国伟大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中求取出路的精神。看来，台湾的前途，一时还很崎岖，路子还很遥远。像徐先生这样的台湾知识分子，还要受些委曲，吃些苦头。并且，他们的身后，也还要面对那巨大的寒冷与寂寞。

但是，徐复观先生的一生所代表的精神，照徐先生自己的话说，一时还薄弱，甚至一时还是绝望多于希望。但是长远看来，恐怕还是这绝望中惟一的希望！

——一九八二年五月《中华杂志》二二六期

台湾文学和 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首先，我要先感谢我素所敬重的胡秋原先生方才一番透彻而极有见地的题解，和对我个人过誉的介绍。在胡先生主持下做这个演讲，是我个人莫大的荣幸。

今天，我的讲题是“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比较”。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要做一些说明：

首先，去年获准离台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所属“国际写作计划”三个月，有一点体验。今天的讲话，是就这个体验的一部分，向大家做一个报告。

其次，相对于已开发的富裕国家近十几二十年来在文学、艺术、文化和哲学上明显的贫困和无所生产的情况相较，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难深重、社会破产、民穷财尽的处境中，却在文学、电影、思想和宗教上，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尤其在文学和电影上，就我在美国所看到极有限的作品而言，已足惊人。这些文学和电影，不但在主题是强而有力的；是充满着对人的深刻信念的；是充满着对于建造一个合理的人间世界充满着坚定信念的，而且，在艺术表现的技巧上，因为技巧结合了对于人的高度理念，是动人的，杰出的，甚至是堪称为伟大的，很深刻地触动了我们的反省和思考。

再次，我曾多年来主张注意第三世界的文学、文化和思想，引起一些争论。这争论中，有的是故意曲解，却也有人是出于误解，甚至出于缺乏世界文学的知识。对于后者，我想也借着这个讲话的机会，做一些说明。

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

在比较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文学的异同之先，先做两者在社会发展、经济情况的比较，不但有其必要，也很能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

从表面的、现象的层次来看，台湾的社会和经济，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台湾的国民平均所得，依据统计，高达美金二千五百元或以上。相形之下，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国民所得就低得多，有的只在三百美金上下。因此，社会的贫困，在台湾是属于慢性的，不可见的贫困，和其他第三世界社会中普遍、“急性”和可见的深刻贫困，有本质和数量上的差别。

就国际借款来看，台湾的外债债负，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是外债最小，情况最好的少数地区之一。但也不要忘记近年来债务增加速度的快速，和再过去三四年就面临要偿还债务，从而对经济发生一定影响的事实。相形之下，若干外债深重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菲律宾和韩国，外债之大，令人瞠目，几到了国家破产的边缘。

就外来资金的支配上来看，直接在台湾设厂投资的资本，在台湾总的资本中，占着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之间。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的外资在整个资本中，占着高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比率。在台湾，外来资本是透过规定台湾在国际分工中的地

位和角色，使台湾以自己的投资和生产，依国际市场中买来转售者的需要（规格、数量、品质）而生产，成为各先进国自己中低等工业生产部门在台湾的延长。但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外来资本直接投资设厂、开农业庄园、开矿的比率极高，直接的、高额的榨取也深刻得多。

因此，台湾形成了加工出口工业结构，以低工资、高度劳力密集的性格，展开二十年来台湾社会依赖的资本主义经济架构。在出口品上，农产品和矿产品比率很小、初级的，中、下级工业产品占着出口大宗。相形之下，其他第三世界则在国际分工中被分配了矿业和农业生产的角色。出口品以原始的矿物、农产物为大宗，以与先进国进行不等价交换。因此，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大小和向本地回流的程度，台湾远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大得多。

也因此，台湾达成或几近于达成“充分就业”。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因为外来庄园的扩张、传统农村解体，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涌向城市，而由于工业落后，城市无力吸收大量离地流亡的农民，形成庞大而无从解决的失业与贫困。

综上所述，若从劳动者所得、社会分配、贫富差距等几个表象上去看，台湾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差距之大，真不啻若干第三世界社会与先进国家社会的差距。

但是研究经济生活中支配和受配的关系，基本上，应该从资本、技术和市场三个基本方面去看。而如果从这三个方面看，即从世界范围的生产诸关系去看，台湾，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完全处于相同的被支配、榨取和控制的地位。

先说国际金融资本的支配。

自从美金公开地脱离了和黄金间的保证价值关系，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成为美国对各国和地区的借

据，形成了美国只要印钞票，就可以取得国际买卖、投资、借贷而来的利益。美金的贬值，也形成一种榨取。此外，以美金为主的国际投资和贸易，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进行直接和间接的盘剥。一般地在国际上受支配于美金经济关系的，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同样受到国际银行团的支配。

其次，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同样在技术上，居于受支配的地位。

科学技术固然因为需要庞大的资金和长久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所以长久以来受到先进各国的垄断，但穷国只要有决心和信心，在正确的决策下，自力更生，花二十年、三十年功夫，力求发展，是可以建设符合自己需要的科技架构的。但是，长年以来，由于除了最精密科技外，整套技术、设备、知识，都可以向先进国花钱购买，使汲汲于迅速在经济发展上“翻”几“番”，走捷径搞工业的穷国，没有耐心发展自己的科技，花大把钞票，去购买现成的西方科技和设备，不但产生许多不适应和错误，而且基本上影响民族科技的生根与发展。

世界科技中心在先进国。因此，产生了世界性的科技的“向中心”改造。许多穷国的为数不多的科技专家，习惯于用先进国的语言思考，以“科技中心”的科技问题为问题，只关心和研究“中心”有兴趣、“中心”所拨出经费的科技问题，而无视于自己民族所现实需要的科技问题。穷国的科技学校，采用先进国的教科书，用别人的语言，教授别人关心的问题。落后国的学者专家用先进国的语言写研究报告，争在先进国而非本国的期刊上发表；穷国花费了人民巨大的血汗钱，买技术、买工厂、设学校、派遣留学生，但自己的科技却长期建立不起来，长期成为西方“科技中心”的附庸。

派遣留学生，向先进国学习科技，一般地并不能十分改善这

种悲哀的情况。留学的过程，其实是留学生的“向中心”改造的过程。学成后，留学国的优渥待遇，理想的研究环境，使留学生滞留不归，结果自己的人才为先进国所用。有的学成回国，但因为经过了“向中心”改造，对祖国的落后情况不满、不耐，成了一种“回到自己故乡，却发现自己外国人”的特殊人种，终于投入设在各穷国内部的跨国企业，为他人所用。有些留学生在回国后负起本国科研、经贸机构的领导责任，也因为“向中心”改造，而成为外国技术、研究、投资的买办，对自己国家科技的独立发展，不但没有帮助，反有阻害。

第三世界和先进国在科技上的差距，从下面的统计可以窥见。占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先进国，在全世界科技研究发展的总花费中，占着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的比重。换言之，占着全球人口三分之二强的落后国家，几乎没有钱可以搞研究发展，因而无法发展自己的科技研究。科技的支配和被支配的构图，极为明显。随着电脑的发展，而发生先进科技积累和发展上相乘相加的效果，第三世界和先进国的科技差距、以及以这差距为基础的科技垄断与支配，可以说到了变本加厉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台湾所处的，在科技上被支配的地位，与其他第三世界毫无二致。台湾所略胜于其他第三世界者，是“技巧”、“技艺”，而绝不是“技术”。

再次，谈到市场的垄断。

先进国资金、技术的垄断，自然形成对贫穷各国市场的垄断。在世界分工，国际生产诸关系中，后进国被派予和被指定去扮演先进国所规定的角色。有人在世界分工中，扮演着农夫和矿夫的角色；也有人扮演着电子工、纺织工、初级机械制造者，日常中低级消费产品制造者等角色。他们不是独立自主地从事生产，而是按照别人的订单中预先规定好的品质、规格和数量去生产，而发展出有高度依赖性和受命性的工业体系。他们的市场，是进货

的卖者的市场，而不是直接诉诸于他国消费者的买者的市场。因此，有人以目前第三世界的“订单工业”和“加工出口工业”形成的社会，为“分厂社会”，以说明若干第三世界工业无非是别的先进国中下级工业生产部门的“分支”部门，成为别人附庸的性格。这又恰好和十九世纪殖民地的“庄园社会”，形成对称的结构，表现出两个不同阶段的殖民主义和殖民地不同的构造和性格。从这一点来看，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各国和地区，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

最后，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共同点，是在于以跨国性企业全球性活动为基磐的行销活动中，同处于文化解体、生态崩溃、精神荼毒的过程中。国际银行集团的形成，在现代传播科技上不断精进的传播技术之形成，以全球为范围的行销管理知识的快速发展，对于阻碍国际商品销售的各地传统文化、价值系统，进行空前的侵蚀、解体和改造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先进国本土资源和生态保护政策的发展，一些高度资源耗费和生态摧毁的工业、技术和产品，大量涌向辽阔的第三世界，造成巨大的灾害。除此之外，文化传播的垄断，教育、知识和文化的“交流”计划，长期制造了第三世界人民失去民族自信心，依强者的眼光解释世界知识，对自己的社会、历史、政治产生鄙视怨毒等精神上的毒害。最后，为了保护日益扩张的跨国性大企业，抵抗第三世界人民汹涌的民族主义抗议的浪潮，先进国透过国际特工、贿赂、腐化和镇压，为第三世界各国制造长期的颠覆、政变和内战，使一些穷国处于连年的战乱、饥饿、恐怖和混乱之中。在这个情况下，台湾在不同的程度上，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和地位，是完全一样的。

总而言之，若只从国民所得；从贫富差距等方面来看，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间，有十分明显的差距。但如果从世

界分工和国际的生产诸关系去看，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共同处于被先进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上支配的地位。

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共同点

台湾在社会、经济条件上与其他第三世界的共同点，和它们自十六七世纪以来直到战后世界发展的历史中，有共同的命运和经历，是有深切关联的。因此，在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十分令人惊异的共同点：

在台湾的现代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现代文学一样，是做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

在中国，著名的五四运动，是缘于当时在列强压迫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运动。为了唤起民众，提高民众的文化和知识以对抗强权，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以鼓吹新思想为主要课题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了运动的主要方式。在这广泛的新文化、新思想启蒙运动中，提出了文学的改造问题，主张以大众能懂的白话从事文学创作，以相对于只有少数读书人能懂的古文写成的、传统的士大夫文学，从而诞生了中国的现代文学。这个五四运动，给予当时日本殖民支配下的台湾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冲击。白话文运动、新旧语言和文学的论争，在台湾泼辣地展开，并且在创作实践上产生了赖和等人杰出的抗日民族文学作品，在台湾的现代文学，遂宣告了它的诞生。

在菲律宾，十九世纪末叶是菲律宾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伟大的菲律宾爱国者和文学家 Jose Rizal 发表了 *Noli Me Tangere*。这一本写于当时反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启蒙运动（菲史上称为 Propaganda Movement）是描写

西班牙在菲殖民统治的苦难和腐败的，第一本现代意义的小说。在这本小说的鼓舞下，菲律宾人不但觉醒，并奔向民族独立的革命，并且也宣告了现代菲文学的产生。一八九六年，反西班牙的菲律宾民族革命爆发，产生了一大批以菲语（Tagalo）写作的作家，成为第一代以民族语言写作的菲律宾民族文学作家，也成为一九七〇年以后菲律宾文学回归民族与乡土的运动中重要的启蒙。

在长期荷兰殖民下的印尼，要等到二十世纪初叶，一批留学归国的印尼青年知识分子，才开展反帝救国的文化启蒙运动。一九二八年，他们发表了“青年印尼知识分子宣言”，在许多政治、社会和文化内容中，喊出了一个口号：“一个民族，一个语言”，要求在两百多种印尼地方语中，设定一个共同的民族语言，以利建设一个独立而统一的印尼民族和国家。而在这民族语言建设的呼声之中，印尼文学家热烈地起来，抛弃荷兰语的文学，改用自己人民的语言，写出不少佳作。而现代印尼文学，也于焉产生。

综上所述，诞生于反帝爱国的文化启蒙国民运动的第三世界文学和台湾文学，有这些共同特点：（一）解决语言问题：一方面是以大众语言代替传统的贵族语言，另一方面，是以民族的大众语言代替殖民者的、外国语言；（二）在内容上主要以揭发和控诉殖民体制下的黑暗与痛苦、或批判国人自己的落后与无知；（三）在性质上批判并脱离传统的贵族、僧侣和殖民者的文学。

民族的语言和文学

在长期殖民体制中，受到严重压抑

在日据时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的扩张政策的形成，日本人对台湾的汉语和汉语文学采取禁绝、压制的政策。在其他早自十六世纪就开始沦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亚洲各国，民族语言

遭到长时期抑压和破坏，停滞不前，更无法透过文学作品使语言美化和精确化。事实上，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语言的停滞、粗俗化和受破坏的情况，真是到了满目疮痍的境地。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前殖民地在形式上获得独立以后，重建民族语言和文学，成了他们十分艰难、痛苦的工作。

从文学上看，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因为殖民历史长（有的长达二三百年！），在殖民地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中，养成了一批惯于使用殖民者语言去思考和写作的人。他们的作品，与其是诉诸本地同胞，不如是一贯诉诸于西欧、殖民母国的评论家和出版家，而形成与本地风土断绝的殖民地的文学。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这种“向殖民母国”、“文明”的文学看的风尚，不但加强了对自己民族文学的自卑感，间接地压抑了以民族语言写成的民族文学的发展。

二战后向西方“现代”文学模仿的时期

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随着美国势力在第三世界中的扩张，随着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对第三世界各国强大的支配，形成第三世界各国对从美国输入的“现代主义”文学的长期而广泛的模仿时期。西方有詹姆·乔哀司，在台湾、菲律宾、印度就各自产生许多模仿者；在西方有“意识流”，在广泛的第三世界各地就会出现各自的意识流作品。其他在音乐、绘画、诗……的范围中，莫不如此。

在台湾，现代主义的诗、小说、绘画、音乐，统治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文艺界。这是我们至今记忆犹鲜的事。

就这样，在广泛的，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产生了大量的以各地美国新闻处和留美教授学生为中心而输入的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为师的，所谓的“模仿的文学”或艺术。文学和艺术，自此完全脱离了当地人民的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风土，成为一种奇怪的、孤立的东西。这种情况，在许多文学家可以流利、自由地阅读和说英、法语的第三世界中，尤为彻底。

附带一说的，是台湾五十到六十年代的现代派，比较上英文好的不多，因而“现代主义化”的程度比较歪扭、也比较不深入。在其他第三世界各地，因其知识分子可以畅读英、法原书，一方面是西化得比较彻底，另一方面，有一些人也比较深入地理解了西方（现代）文学的真髓，到了七十年代以后，遂能入出自由，以过去西化的体验，丰富了自己民族的文学。格拉西亚·马奎滋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

七十年代的爱国运动激起新的民族回归运动

一九七〇年，留美的战后世代台湾留学生展开了保卫钓鱼岛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历史地看来，这运动和六十年代末全球性学生反乱、美国的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和美国价值批判的运动有深切的前因性关联。保钓爱国运动，基本上是反对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却在台湾青年和学生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广泛的反省运动。政治、社会改革思潮兴起，社会意识苏醒，是当时的一个特点。保钓运动在文学上的反应，便是一九七二年在台湾展开的“现代诗论战”，对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文学恶质西化的典型产物“现代诗”展开批判。在论战中，文学的社会性格、文学关怀民生疾苦、文学的民族风格和形式，语言的平白易懂……这些问题首次在战后台湾文学思想中出现，基本上打倒了过去二十多年来西化的、模仿文学的威信。五年后的一九七七年，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展开。但在思想内容上，其实是一九七二年

“现代诗论战”的一个延长。不理解一九七二年的现代诗论战，就无法理解以“回归乡土”为口号的乡土文学论。

菲律宾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极为有趣的是，也在一九七〇年，从元月到三月，爆发了著名的“第一季暴风”。十九世纪末，西班牙直接和美国交易，出卖了菲律宾人民的独立革命，使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二次战后，美国给予菲律宾形式上的独立，却在军事、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对菲律宾进行广泛的干涉和支配。不满美国新式殖民主义的菲律宾人民，在一九七〇年元月，展开了为期一季（三个月）的抗争。这个抗争的结果，是菲语首次在法律上取得民族语言即国语的地位，取得了以菲语为各级教科书、出版报纸、成为电视和电影中语言的权利。在这项胜利下，菲语文学取得了广泛的主导地位，使过去以英文写的、讨好西方的菲律宾文学、和以菲语写的、主要以广泛菲律宾人民为对象的“乡土文学”，主客易位，形势“逆”转，也使得菲语乡土文学在接续十九世纪反西独立革命时代之后，取得又一次极大的发展。

六十年代，印尼总统苏加诺下台，结束了他企图结合民族主义、传统宗教和社会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到苏加诺政变后广泛的反共肃清，在印尼文学上展开了不干涉生活的、唯美主义的、西化的和保守的风格。七十年代初，由于长年来日本资本在印尼的盘剥，终于在当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印尼时，爆发了反日爱国的国民运动。

西化文学和乡土文学的争论

这个运动，在印尼文学上的结果，是对于“后·苏加诺”时代保守、唯美、西化文风的批判，重新由新一代印尼文学家提倡

现实主义的、革新的、回归乡土的文学运动。不只是在台湾，即在广泛的第三世界文学中，都存在着长期的西化文学派和乡土文学派的争论。在印度、菲律宾、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存在着以西欧为师、以西语为写作语言、以西方读者为对象的西化文学，和以自己母语为写作语言，以自己国内同胞为对象，描写具体的民族生活为怀抱的“乡土文学”。一般而言，第三世界各国和地区内西化派和乡土派，有这些共同差别：

西化派

■以西欧、殖民者语言写作和思考。

■以国外评论家、出版家、教授和大学文学系为诉求对象。

■题材、内容主张文学的“宇宙性”、“国际性”，反对民族风格和内容。

■主张文学只有少数精英可解，力求文学的精致，主张各式各样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力主文学不屑于使用“粗俗”的社会语言。

■作家在风格与思想上，与体制比较亲近，同时也受到体制方面的优待。

■作家以不涉入政治为尚，而常得体制的奖掖与尊荣。

乡土派

■以自己的民族土著母语写作和思考。

■以自己同胞为诉求对象。

■题材和内容上强调文学的民族风土、民族风格与现实内容，反对西化。反对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同质化改造。

■主张文学应为广大民众而写，力求文学的普及性，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基本上主张文学的现实主义和革新性格。

■在风格与思想上，一般地是体制批判的，同时一般地受到体制方面的猜忌和压抑。

■大半投身于政治改革或民族运动，甚者常因而被驱逐、投监……

西化派和乡土派的争议，从韩国一直到整个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进行长期争论。七十年代以后，其他第三世界文学的乡土派以强有力感情内容的思想而在艺术上杰出的形式，以“第三文学”、“第三电影”之名，受到国际文学的注目。当然，在语言问题极端复杂、民族语言有待建设的地方，乡土派文学家也以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写作，但在内容、精神和思想上，则与乡土派毫无二致。相形之下，台湾的“乡土”与“西化”的讨论，显得时间既短，讨论也不够深入。而当时这又另有原因的。

台湾文学和其他 第三世界文学的不同点

正如同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在历史发展和国际生产诸关系中的共同性规定了它们在文学历史发展的共同性一样，其历史发展和在国际生产诸关系中的殊异性，也规定了它们在文学发展和风格上的殊异性。

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第一个殊异点，是台湾文学具有比其他第三世界文学远为完整的文化和语言传统。

相对于经过二三百殖民主义统治，土著文化和语言遭到严重破坏、停滞的其他第三世界，台湾则由于殖民时间比较短，母文化的悠久、丰富和完整，文学传统的深厚和语言文字系统的完

备，日本殖民者败北离去之后，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家，得以有充裕的资源，很快地恢复民族文学的生产。在菲律宾，据我在国际写作计划认识的朋友告诉我，作家必需一面用菲语创作，以重建菲律宾民族文学，却同时要花费同样或更大的努力，去复兴经数世纪新旧殖民主义严重破坏的菲律宾语言。作为文学的重要基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在其他第三世界各地中，因新旧殖民主义的摧残的悲惨状况，没有和第三世界作家谈起，是无法想象的。我因此深切知道中国完整的文化和语言系统，是多么值得珍视和宝贵，而愈益决心重新向自己的文化、文学和语言传统去学习，以善用这可贵的文学资源。

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的第二个不同点，在于台湾文学面临着逐渐失去其社会与人生的指导性格。

和第三世界文学作家相谈，最引我注意的是，他们的文学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的性格。无数的民众围绕在他们的诗歌朗诵会上，涌进乡间戏院看他们的戏。民众总是在他们这些作家的文艺作品中，去寻求许多民众心中极待解决的诸问题的解答。描写和反省“文革”浩劫的创伤的大陆作家，每周收到两三百封来自大陆各地读者的来信。人们透过文艺作品去关怀和探讨社会和民族的前途，去寻找革新的方向，去反省和检讨民族的历史进程。

然而，在台湾式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期的台湾，消费的文化 and 文学的艺术，随着与物质丰裕相对的精神贫困的深化，代替了严肃的文学。文学，越来越成为少数文学青年、大学课堂中的东西，从而完全失去了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指导性格。这种趋势，和美、日“先进”的，完全的大众性消费社会完全一致。在日本和西欧，近二十年间，一直没有产生成为话题的新作家。电视、录像带的和通俗的、平装的、看完就丢的 Romance，完全在消费市民的生活中取代了严肃文学。严肃文学的纤小、肉感化，是富裕

的大众消费社会的另一个结果。

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的第三个殊异点，在于台湾文学一般地显示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贫困。

相形之下，我觉得其他第三世界的文学家，对于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家写什么，为谁和为什么写作，如何去写等诸问题，具有明确的历史的、文化的和哲学的焦点。相形之下，三十年来的台湾文学，一般而论，显出历史、文化和思想上的贫困，从而有普遍的焦点丧失的现象。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举出台湾在历史上、文学上和思想上的断层、人文科学和哲学的长期贫乏，以及近十五年来台湾型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等诸原因。

第三世界文学和台湾文学间第四个殊异点，是台湾文学与政治间，保持着比较疏远的态度。

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台湾文学一般地回避着政治发展的脉搏。在其他第三世界，政治和文学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人们从文学作品理解了祖国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现实，文学运动和政治上的革新运动一直保持着直接而具体的关系，许多文学家也直接地间接地涉入自己祖国的思想、历史、社会或政治运动中，驯至使外人离开了各该国的社会和政治历史，几乎无从完整地理解第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作家和作品。

理解和研究第三世界文学

各位先生，现在我要用几点结论，来结束这个比较粗糙的讲话。

二次战后，台湾的文学教育，一般是向西欧看的。在我是大学外文系学生的时代，我们背诵和熟记许多英美文学的历史、人名和书名，对于中国自己的现代作家和作品，却毫无所知，更遑

论我们对与有着相同历史的亚洲文系、非洲文学与拉丁文学的认识了。我们被这样教育：只有先进的西方，才有文学。整个落后的第三世界，是没有文学的！

说到这里，让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几年前，有一位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对我说，他十分“感谢”乡土文学的作家们。我问为什么，他说，在大学外文系里，老师告诉他，台湾是没有文学的，高等伟大的文学，只有西方有。有一天，他读了黄春明的小说，不知不觉间受到深刻的感动。但在受到感动的同时，他突生惊恐，自己问自己，为什么竟被黄春明打动了呢？老师不是说台湾没有文学吗？难道说自己在文学上的品味力竟是低下的吗？他于是开始遍读台湾的当代作品，才满怀信心地对自己说，台湾是好端端地存在着文学的。

这故事告诉我们：长期以来，在第三世界，存在着两个标准。一个是西方的标准，一个是自己民族的标准。用前一个标准看，第三世界是落后的，没有文明、没有艺术、没有哲学也没有文学的。用后一个标准，可以发现每一个“落后”民族自身，俨然存在着丰富、绚烂而又优美动人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的。

现在已经是我们有计划地去研究，译介第三世界文学的时候了。近十年来，所谓“第三文学”和“第三电影”惊人、强力而优秀的成就，使日本和西方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对第三世界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台湾在七二年开始的西方文学批判，并不曾适时地提出理解、研究和译介第三世界文学的问题。由于长年来，台湾外语教育以英语为主，忽略亚洲、非洲和西班牙语的教学，使我们无法直接译介第三世界文学。但从现在起，我们可以初步从第三世界文学的日译和英译中，开始认真、严肃地认识研究第三世界文学。

在第三世界中的台湾文学及其中国属性

几年来，我主张注意、研究和学习第三世界文学，引起少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喜欢谈台湾文学“独特的特性”，遍读其论文，却没有一个人清楚地说明了这“独特的”“特性”。

当我们谈到某地文学的特性，至少应该提到例如爱尔兰文学之于英国文学，拉丁美洲文学之于西班牙（或葡萄牙）文学那样的水平。爱尔兰文学中独特的方言，非基督教（异教）的因素，神秘主义，宿命的、悲剧的生命观和爱尔兰贫困、艰难而又神秘的高地风土，和英国文学有太鲜明的对比。拉丁美洲文学的浪漫主义、迷信、巫术、民俗主义和揉合荒诞、怪异和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具体现实的所谓“巫术的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一译“魔幻现实主义”），和传统的西班牙文学，有着太明显的差别。台湾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特性”论，是经不起这一层次上的比较的。我因此对于台湾文学独特论者指出，在历史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台湾文学的“特性”，和第三世界文学的诸特性比较之下，就无独特之可言了。在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这些性格上，台湾文学不可辩驳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

台湾文学，到底是不是中国文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到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去寻求解答。日本一位年轻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松永正义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有中肯的见解。

他首先说，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究明在台湾形成的汉人社会，和在北美、新加坡、南洋的闽粤华侨社会之间有什么异同。他发现：台湾和其他华侨社会间最大的差异点，在于台湾和中国近现代史中，探索“中国往何处去”的全民族在运动中，关于中国未来去处的方向性和可能性的探索上，一直活泼而密切地参与和感

应着。清末的维新自强运动对台湾现代化有直接影响；辛亥革命激起在日台湾知识分子寻求台湾从日帝下解放的希望；五四运动直接促成台湾现代文学的登场，其后台湾的一切政治、文化和文学发展，一直到今天台湾与中国关系的争论都直接、间接，这样、那样地和中国全民族在帝国主义下为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胎动，发生十分密切的关联。恰好是这参与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出路的方向性和可能性的历史性格，显示了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鲜明属性。

所谓“台湾人意识的文学”

近一年来，不曾参与一九七二年“现代诗论战”，又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噤默不语的少数一些评论家，提出“台湾乡土文学是台湾人意识的文学”的宏论，主动地为论战当时控诉乡土文学是台独意识的文学的控方，提出不智的佐证。

在一九七七年的论战中，我们坚决反对控方对乡土文学为“普罗文学”和“台独文学”的诬陷，决不是空言辩饰的言词。因为所谓的“工农兵文学”，所谓“普罗文学”，不能指徒写工人和工厂的文学，他还要写出一个有阶级意识，和作为一阶级的工人可以改造明日历史这样的思想内容的文学，才是所谓“普罗文学”。以这标准来衡量，杨青矗、王拓的小说，和拙作《云》，都不能被指为普罗小说。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论理，寻求“台湾人意识的文学”的定义，那么，徒以描绘台湾的人和社会是不足以称为“台湾人意识的文学”的。如果以这标准去看，从日据时代以迄于今日，我们还找不到在文学导业上可以成立的这样的作品。我们是据此而云台湾乡土文学，断然不是分离主义文学的。

台湾分离主义,和战后台湾新兴工商阶层要求参与台湾政治、和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缺点、更和美日两国内一小部分对台湾抱着政治的、经济的野心,企图中国永久分裂的野心家有复杂而细致的关系,而台湾文学的分离运动,其实是这个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应而已。

我们主张,尤其是在文学艺术的范围内,台湾的文学和艺术工作者,一方面力求自己在历史、文化、知识和思想上的充实与进步,一方面存异求同,把更大更多的精力,摆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上,以写出较好、更好的文学作品相勉,并且学习在世界的视野上,在中国和台湾近、现代史的架构上,在南北对抗的今日世界政治经济构图中,思考台湾和中国未来的方向与可能性,从而在大家共同关心、爱读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上,寻求民族团结与和平的坚实基础,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我们可能的贡献。

谢谢大家。

——一九八三年一月《文季》一卷五期。

绿岛的风声和浪声

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逮捕，长期监禁迄今的无期徒刑政治犯公开呼吁假释的权利，是党外政治运动令人尊敬而永志不忘的贡献之一。苏秋镇、黄天福、许荣淑、黄煌雄各位委员的发言，历历在卷。这些发言，在台湾人权历史的档案中，将随着历史而发出越为明亮的光芒。

这些在三十年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政治犯中，李国民、王为清、王如山、谢秋临、李振山、王永富等先后在今年春天获得释放。这个释放行动，尽管来得很迟，终究获得海内外关心人权的人们的赞扬和期待。关于目前尚在狱中的十多名服刑达三十多年的其他政治犯，一般认为明显代表当局人权政策的“中国人权协会”曾有十分乐观的估计，并预计直到明年新任“总统”就职前，将分批、全部释放。但是，在另一方面，“国防部”这个直接主宰着台湾政治犯的机构，却在答复党外立委有关的质询时，一再否定服刑三十多年以上终身政治犯的全数释放计划。代表“国防部”发言的人，或说正“依各案逐件审核中”，或说只要“政治犯”没有表示思想上“改悔”的凭据，应该继续监禁云云。许多熟悉国民党心态和行为的人们，便是据此而对目前还关在绿岛的老政治终身犯的释放，抱着暗然、悲观的看法。

三十年没有“教诲”效果的“教育”

政治教育，是台湾政治监狱的一项重大的例行公事，执行至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一般而言，它的评估，是经由“心得写作”、“考试”、“演讲”、“辩论会”这些形式来做的。据我个人在狱中七年许的经验，“不及格”的人几乎从未有过。八九十分者有之、最低分也罕有低于七十分的。

然而，三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因为这些教育考核绩优而提早假释的例子。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国民党对于政治犯的“教育”从来没有诚意。三十多年来，他们为这项教育花了不少钱，却从来没有相信过他们自己设计的“教育”。一批批政治犯都是不折不扣地服满了他们七年、十年、十二年的长期刑期，甚且有不少人被认为不知悔改，而非法延长刑期，送到诸如“绿岛指挥部”去多坐几年牢才能回家，却从来没有过有人因为“悔改有据”而提早释放。

因此，对于政治犯，国民党的政策是惩罚的性质远远多于教育和改造的。但是，等到有人向他们提出质询时，他们却把责任推到政治犯没有确切的改悔凭据。如果“改悔”与否，确实是关系被长期监禁者的刑期，那么，早就应该有一套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估方式，和真诚、认真的教育方法。事实上，在政治监狱中，但这两者都付缺如。不论如何，教育人家长达三十年，却宣称收不到教育的效果，这个责任，在“施教者”的监方，而不在“受教者”的政治犯。然而，当局却要把不办政治犯假释的责任，推到早在十五年前就有权假释回家的政治犯身上去。

历史阴影下的良心犯

三十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以一九五〇年五月间展开逮捕的“麻豆案”来说，还有林书扬、陈水泉、王金辉、李金木等无期徒刑政治犯尚在服刑中。这些人之中，最年轻的，也接近六十了。想象当年宣判他们的刑罚的人，也应在七十之年吧。

在这三十年中，台湾的社会，从残破的一九五〇年，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大众消费社会。即他们的故乡麻豆，也发生过狱中人所无从想象的变化。

国民党本身也起了很大变化。一九五〇年的国民党、政、军、特的近乎体质性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至于说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多元化……都是三十年前的思考所无从想象的。

因此，以三十年前的国际和中国政治、社会情况所做的检束和判决，到了今日，早就应该重新加以评估了。以三十年前的历史条件，断定一个人必须终老、枯死于狱中，是任何自以为现代化和文明的当政者所不堪为的。三十年的监禁，固然是这些政治犯惨痛的挫伤，三十年的监禁，在这高举着人权的现代国际社会中，是对国民党当局一项沉重的指责。而且，这指责，将随着岁月的增加，随着这些狱中受刑人开始凋落而加重。此无他，而是因为三十年这令人惊喟、愤怒的时间，使问题远远地超过了一时一地的法律和政治背景，而凝聚为一个刺痛人类良心的人道主义问题。在这意义上，三十年前审判这些终身监禁的政治犯的国民党，现在却坐在人类良心和道德的被告席上，为了何以不肯释放这些牢狱中度过三十年人生最宝贵、最富于创造和生产性的人生的良心囚犯而受审。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直到我自己坐了政治牢，我和千万同胞一样，遗忘了长年囚居的人的存在。三十多年来，我们，你和我，把这些在过去的历史时代中，为良识所驱迫，对政治和民族的问题有“不同”主张，并身体力行，而终于被判重刑的人们，完全遗忘了。在他们煎熬的三十年中，我们兀自嫁娶宴乐，却忽略了在牢墙外、红尘中和狱中人一起受苦的父母、妻儿，让他们孤单无援地在无助、羞辱、挫折中度过。

但从今以后，让我们不要再忘记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如果我们的邻近有这样的家属，让我们立刻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同情和援手，扶持和抱拥他们，使他们更有力量去度过坎坷的人生。

对政治犯不骇怕，尊敬政治犯，支持政治犯家属……是美丽岛事件后民众一个良好的觉悟。让我们安静，却坚定地保持这份觉悟。

我们只求权利，不求恩典

由于政治犯的性质特殊，任何人没有权利——哪怕动机如何的善良——代替在狱政治犯向当权的人跪地求饶，恳求恩赦。

但是，正如苏秋镇委员、黄天福委员所指出，服刑超过十五年，终身犯就有接受假释的权利。

因此，我们诚恳地要求当局具体决定为立刻、全部释放这些剩余的无期政治犯做好一切准备。

在被批准离台赴美参加文学会议的这时，仍不能已于坦白写出这久久悒积胸中的，对于当局的愿望，其实是想到好不容易自

己也争取了自由出入的机会,而更加的惦念仍在狱中的老友之故。如果为了保护自己出境的机会,而不敢或回避在心中沸腾的关怀,那么,我就是一个对不起绿岛的风声、浪声所代表的精神的人。

——一九八三年七月《钟鼓铎》一卷七期

打起精神， 英勇地活下去吧！

——怀念系狱逾三十年的
友人林书扬和李金木

从泰源监狱到绿岛，他们幸免于死；等了三十二年，但国民党仍要他们老死囹圄之中。报复主义可以扑灭人权烛火吗？

今年元月二十二日，忽而听说十一名三十年以上的政治终身犯假释出狱。正为着这些我曾在台东泰源监狱和绿岛感训监狱共同生活过的老难友欣庆，却旋即证实麻豆的林书扬和李金木两人，并没有被列入假释的名单里。顿时间，我被一种撕裂似的心疼和深沉的忧悒，推落到近于绝望的、废然的深渊中。

同在五十年代初叶被检束，并且在巨大的肃清中幸免于刑死，以终身监禁勉强存留了性命，开始了不知终期的、漫长的服刑生活的二三十个老政治犯，总是互相搀扶地过了三十多年近于停滞的、岑寂的狱中生活。然而，原以为终于要老死囹圄之中的共同的一生，忽然在这两年中，难友们陆陆续续释放回家，只剩下孤单的两人。林书扬和李金木一定会感受到被残酷的政治报复主义和一贯不显露出温情的历史所抛弃的、深刻的孤独吧。

第一次知道书扬兄，是一九七〇年我被移到台东泰源监狱的时候。然而由于管理上的隔离，一直要到七三年整个泰源政治

监狱移转到绿岛以后，管理上重新编制，我才得以有机会和书扬兄、金木兄一块儿生活。

林书扬

即使写着稿的现在，不用闭上眼睛，就能在心中的幕上清晰地看见书扬兄清癯的脸庞。他的眉毛粗而且黑。一双或者因为消瘦而显得大些的眼中，经常透露着一种认真、诚挚和坚定的亮光。他的个性和平、温蔼而且稳重。在成分极为复杂的押房里，发生争执甚至打架，并不是稀有的事。但是在绿岛那些年，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书扬跟任何人有过任何冲突。然而他又似乎以一种无形的、严苛的原则要求着自己。他关心同侪难友的各种精神上、生活上的困难，关心别人的病痛。在平时，他真可说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因此，日语固无论矣，他是三十多年老终身犯中少数几个能写一手流畅、深刻的中文的人之一。他自修得来的英语，也令我这正式受过长时期英语教育的人叹服。

在这谦和性格下，对于有关知识和是非的问题，书扬兄的态度却是严肃而认真的。一九七五年初吧，我和书扬兄在放风散步的时候，偶尔谈起似乎是关于台湾社会的性质问题，不料一连好几天，放风散步的时间，竟成了我们一次难忘的讨论。现在想来，对于他在讨论中表现的一丝不苟、诚恳和认真的风格，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种认真，不肯在时务下轻易变更原则的书扬兄的个性，还表现在他认真写“自省自勉录”上。所谓“自省自勉录”，是狱方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现实环境的荒谬性格，而稍微曲笔。

“这样，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吧。”

有一次，在他告诉我一则他写的“自省自勉”内容后，我担心地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独语似地说：

“如果对自己最起码的真实的勇气都丧失了，我要到哪里去得到力量，支持我度过这漫长的二十五年，支持我度过前头漫无终点的囚人的岁月？”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几十个在那个秘密的监狱中的放风场上或慢跑、或疾走着兜圈子的犯人，都脱光上身，贪婪地亲炙着五月的离岛上并不猛烈的阳光。天空是一片纯净的碧蓝，而我的心中却哽满了书扬的话所激起的动荡、翻腾的情绪。

去年我作客美国的时候，碰见某一个国际人权组织里的人，告诉我几年前，据说有一个人权单位的人到绿岛感训监狱中参观，遇见了林书扬。书扬竟坦然地带着那人去看、去认识狱方极不愿意外界知道的事。这位友人问我，林书扬会不会因而触怒了狱方，从而表现出他显明的忧虑。

书扬还是那个书扬啊。

记得在入冬的纽约，在沉默中，我兀自这样地想着。和平、沉静、温蔼，却在义不容辞的时候，不稍姑息、隐让的书扬的性格，在友人的谈话中，鲜活地浮到当时的我的脑中。

听说了当局竟能允许国际人权组织的人，亲自走进绿岛监狱访问，对于台湾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中的开明作风，我始则半疑，继而惊异。既然都准许国际人权单位的人走进了监狱，听起来又似乎可以自在地接触犯人，类似书扬的反应，就应该在狱房的估算之中，从而可以推定书扬应该不致于因此而遭到狱方的忌恨吧。记得我是这样地安慰那一位素来不曾与书扬谋面，却是几年来仅仅因为单纯的对人权的信念，关怀着书扬的命运的友人。但

其实恐怕是我自己在不知不觉间，感染了那位友人的忧虑，而说了那些话来安慰自己的吧。

现在，书扬兄果然不幸地被摒除在假释名单之外。我不禁想起那一张满脸是红色的络腮胡子的、猛抽着烟斗的、忧愁的脸——

“林一书一杨一会不会因此触怒了狱方呢？”

书扬的兄长林书桢在一篇访问中说，对于他，书扬在过去犯下什么样的错误，这错误是怎么回事，到现在还令人讳莫如深。同样，是书扬什么样的“错误”，使他被残忍地剥夺了假释出狱的权利，没有人知道。

李金木

认识李金木兄，也在我跟着台东泰源监狱整个移转到绿岛之后。

那时候的李金木兄，是一个壮硕、身材中等的木匠。他的手掌粗厚，一看就知道即使在囹圄中于当时已二十五年以上的生活里，他也不曾离开各种外役劳动。他那双粗厚、结实的手，为难友们挑过水，炒过菜，种过菜蔬，盖过房子，刨过无数的木头。一直到今天，只要想起来，我都能鲜明地记得他那微肿、半闭的双眼，和他朗笑时露出来的一嘴洁白、坚硬的牙齿。

我和金木兄在绿岛共为囚人的生活中，最难于遗忘的一截，是我和他共同在狱中奉命挖了一个庭园小池的经过。

记不清楚狱方决定开一个庭园小池，何以竟选中了我当设计者。总之，我这“设计师”和几个对土木、盖房子有经验的老终身犯，每天被释放出来建造水池。利用绿岛海滩上多的奇诡的礁石，果然让我们开出了一个约略有些“雅”意的小池。为了在池边的奇石上放一座小小的七层宝塔，正是李金木用木板做好每一

层塔檐的小小板模，灌上水泥成形，一层层“盖”了起来的。

即便是那小小的水池，即便是那更为小小的七层宝塔，于今怕也是早已爬满了一遍又一遍岁月的青苔吧。这次回来的难友告诉我，金木仔已不复当年的勇健。他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半闭的双眼，如今就更加经常地紧闭着了。

一个纯朴的，农民出身的工匠，这次竟何以和比较上具有知识分子的原则执着的书扬兄被滞留下来，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

与自由无缘的两人

三十三年！

多么漫长、岑寂而又荒芜的岁月。在这三十三年中，世界和中国，以及台湾，经历了多少变化。韩战结束。随着六十年代美国在中南半岛上的挫折，到了七十年代，基本上改变了东西冷战的结构。而台湾，也因为极为复杂的因素，幸运地在辽阔的第三世界中，奇迹般地获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长。台湾的资本主义化行程，在过去二十年间，有了空前的发展。从这历史变化的背景看，做为历史问题的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案件，早应有相应的，新的评估。

今年元月间释放了十一个终身刑政治犯，除了剩下的林书扬和李金木，五十年代检束的政治犯至此已经全部释放完了。这或者便是国民党用它自己的方式重估这个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特殊问题的一个表现吧。然而，也正因为这是历史问题，而不是个别政治犯“忏悔”与否的问题，滞留林书扬和李金木，不能不说是这重大政策的执行上一个极为令人遗憾的缺点。

而如果林书扬的被滞留，果然是针对着他在狱中会见国际人

权人士时的言行的报复与惩罚，恐怕更应该追及当初允许外籍人士进入狱中访问的决定才对。

事实上，长达三十三年以上的监禁，老早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政治的、历史的性格，而沉积为无法辩驳的、重大的人权问题。林书扬的哥哥林书桢说，就算书扬是个杀人放火的凶犯，判了三个无期徒刑，目前也该出狱了。他又说，如果书扬用他最辉煌的青春岁月，去偿付他因而受惩的行为，由任什么角度来看，他的刑罚也够了。

李金木的女儿，在确定被囚禁了三十三年的父亲仍不能回家时说，虽然父亲在她还很幼小时被抓走了，但她一直都思念着囚中的父亲。当局即使“不可怜一个关了三十多年的老人，也该可怜我们母女三十多年来无夫、无父的生活。”她记忆中的李金木，是个“那样沉默、老实”的人。但这样的人“却与自由无缘”，女儿说，“只希望当局能可怜我们母女，将父亲还给我们……”

历史的拷问

二十多个原以为会一起共老、同死于狱中，三十多年来相依相持地生活过来的难友们，忽而全放走了，只剩下孤单的自己。对于面临着这种巨大的刺激和变动的林书扬和李金木，狱方有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去评估和对应这巨大变动和激荡为这两人带来的紧迫（Stress），我是极为忧虑的。

想起患有严重的低血压、良性皮肤脂肪瘤的书扬和患有严重高血压的金木仔兄，我不能不强忍着悲痛，但愿千里传声，说一声——

书扬、金木：

千言万语，无论如何，请切切保重。

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

被囚禁的您们，在那悠藐的岛上活着一天，历史就对囚禁者的良心拷问一天。

书扬、金木，让我们全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

——一九八四年三月《夏潮论坛》杂志

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 台湾文学的诸问题

台湾文学的定义

首先我想先就“台湾文学”作一个粗糙的界定。我们知道，“台湾文学”并非新词，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我们应注意的是，“台湾文学”这四个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内容。譬如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是殖民地台湾的心声，是精神与灵魂的表达；是挫折、希望、悲哀、喜乐的交融。但在同一时期，从日本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台湾文学是殖民地文学，谈些妈祖、木屐、南国风光、椰子树等等。对他们来说，就如吉普林在印度所写的作品，在英国人眼中富有一种异国风味。

今天我们所说的“台湾文学”，也有很复杂的内容。第一，因为台湾在当前政治、历史上都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在许多名词之前都冠上“台湾”二字；如台湾社会、台湾经济，因此而有“台湾文学”。

最近我在“文讯”上，读到叶石涛先生一篇文章，他说台湾的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我很同意这个说法，这明显的说明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脉。我个人对“台湾文学”并没有特别的看法，只是认为：从日据时代到今天在台湾产生的诗、戏

剧、小说、散文等，皆为台湾文学。并且，她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支流，一个部分。

我要说这题目的另一个原因是：七六年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在台湾文学的这边，逐渐有一种自满的心态，觉得台湾文学是世界最美的文学之一，已达登峰造极之境。任何在台湾从事文学工作的人，都愿意台湾文学是最好的，但我们若把眼光稍微放大一点，不说欧美大国，即使是和邻近的菲律宾、韩国或最近出了几个诺贝尔奖文学家的中南美洲相比，我们台湾文学仍有许多地方需要检讨、反省，并在这个基础上求得更大的成绩，更充实的进步。在这个意识下，我想提出几点对于今日台湾文学的检讨与反省。对一件事的检讨，往往有许多不同的角度，我今天只想从分析台湾近十年以来逐渐形成的所谓大众性消费社会的背景上，去检讨台湾文学面临的一些问题，并希望台湾文学能挑得更重，走得更远，有更恢宏的志气。

大众消费社会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看起来，在几千年的历史，能像今天过得这么丰富的生活，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一个小小的逗点。全世界的资源物质，事实上有它的局限性，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浪费性的丰富——我是指欧美而言——可以不断地、永久持续下去。

在我的幼年，甚至远溯自我的父亲、祖父及曾祖父那一代，过得好的生活的人，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少数被公认的地主、商人、官员才能享受特殊的、丰富的生活，我幼年住在莺歌，大部分的人只有初一、十五或逢年过节拜拜，才有一些豆腐块、炸过的猪肉可吃。衣服破了再补，家具常常是从祖父那一代开始用起的。这种朴实、匮乏的生活，不止是我家，而是普遍性的生活习尚。

但是今天，我们到处有满山满谷的商品，品质比过去好，价钱也比过去便宜，它们在社会进行着密集的、持续不断的、制度化的消费。这种所谓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在西方，约在二次大战后开始。在台湾，则约为近十五年间的。一般而言，以国民所得超过一五〇〇美元为指标。

大众消费社会的四项特点

一、科技的发展：今日的科技发展是空前的，快速而且巨大的，它带动了各种工业的发展，并因而影响到企业，为社会带来体质转换性质的进步与发展。

二、大量生产：由于科学的发展，运用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创造了大量生产的时代，使产品的量、质大为提高，在价格上大幅下降，使多数人享有各种物品为可能。生产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需要，商品成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形成了商品砌筑而成的社会。

三、企业规模的增大：工业、企业的规模增大，生产——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和范围迅速扩大。企业由小而大，从本地而国际。更庞大的人口集中在企业和工业体制之下。

四、行销的发展：为了消耗超过自然需要的商品，以实现企业的利润目标，行销（marketing）知识和技术日益发达。在强大的大众传播体制的助力下，企业的行销活动对于人的精神、文化、价值、行为等产生巨大影响，是大众型消费行为的主要动力。

“消费人”的登场和他的特质

消费人（homo consumen）是大众消费社会中的新的“人种”，

他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观念上的巨大革命：把快乐、享受及对幸福的追求，当作一种公开的正当目的。例如以邻居的高收入及留美人士的所得作为羡慕及追求的目标。相对于过去传统读书人的俭约观念，一个人求仁之心不如求利之心，可视为道德上的堕落。但今日的价值观念已不作如是观了。

二、人的物质化：在大众消费社会中，从初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劳力的商品化，更加扩大到人的心灵、智慧、精神的商品化。例如一个有创意的年轻人到广告公司做事，一定要按市场的需要去设计广告，这种知识无形中就是一种有价钱的商品。由于我们是一个商品的社会，商品需以现金去获得，金钱因此变成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关系。金钱的市场关系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金钱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甚至介入到友情、宗教、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固是古已有之，但于今为烈。为了行销广告的需要，大众消费社会大量鼓励解放传统东西方思想、哲学家一直认为需要抑制的物欲。古来的思想、哲学家不断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可以放纵的世界，必须知所抑制，追求内在的精神。但今天的社会则鼓励你：欲望是好的，快乐是至上的，享乐是第一！动物学上的“人”得到最大的解放，从而有了“动物人”的形成。人的传统形象及信念完全被打破，而“商品化”得以扩大至绝大的限度。

三、制度化的消费：过去是为了需要而消费，现代则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已发展成一种客观的、新的社会制度，生活对于现代人而言，是如何消费、消费什么以及消费多少的问题。从事过行销工作的人都知道所谓“诉求目标”的问题，人不再是人，而被年龄层、月入多少所区分。行销活动操纵、扩大、制造人对商品无穷的嗜欲，来造成企业对利润的无穷需要，人变成只会消

费而不会创造、自主、思考的“单向度人”，以贷款、标会、分期付款等超出自己能力和需要的方式去消费。在我们祖父时代，许多东西是有能力买而舍不得买，现在的人则是买不起还要买。消费透过大众传播等等行销技术而成了一种无形的强制行为。

四、无目标的精神荒原：在我们的祖父时代，有许多东西用了几代仍未更换，但今日的消费观念则是商品的多变；每一种商品都有它的生命周期，被标示了起点、顶点到衰落。对于尚未开发的市场推销卖过的东西；对于开发过的市场则推销所谓新产品。人变成跟随市场变化的人，张皇失措，逐波而流，永远被更高的欲望所牵引。短暂的满足与饥饿的不断循环，是现代消费人的特质。这种循环的结果，有一天会使人落入极凄凉的境地；在一切物质都得到满足后，觉得生活茫然、虚空、无聊、倦怠，失去了对人的亲切、关爱，而只成为商品市场的工具。这是人的“异化”中最悲惨的景况。现代消费人变成一大堆有意见而无信念，有事实而看不到事实的意义，有各种复杂的规则而本身失去了原则的人。日本社会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人的幸福中毒症”。又说人就像走出森林的野兽，被囚养在各种商品所筑的棚笼中，成了一种“家畜”。人，被“家畜化”了。

五、甜美的社会控制：行销活动经由大众传播创造社会共有的思考方式、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它侵蚀、破坏、改变传统的信仰、文化，依着商品的规格化（包装、品质、形象等的规格化），塑造了规格化的文化、价值、道德、信仰等等。人在大众消费社会下，成了甜美的市场行动下的奴隶，失去批判、反抗、异议、独创性思考的能力。

现时台湾文学的问题点

在前述的台湾社会新的消费特点和背景下，我想简单的检讨当前的台湾文学，面临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文学作品中思想文化的贫困：台湾文学和菲律宾、韩国、中南美洲文字相比，这个特点非常显著。有许多作品花费大量文字只为描写一个女人的微笑或一个男人抽烟的姿势，此外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显示了思想、文化上的贫困。所以引致了思想、文化上的贫困的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以为有两种。一种是三十年来，我们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播和书籍有一定的限制，作家缺少历史的、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其次是，如前所说，在大众消费社会中，人的“动物化”和“物化”，使人的思想无能，对于历史、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缺少组织化、体系化的理念，造成很多只有意见没有信念，有很多规则而无原则、很多事实而不知其意义的作家。这是目前台湾文学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语言的荒芜：我所说的荒芜，与一般所说的文字流畅、华丽无关，而是不会用标点符号，不会使用叠声字等等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是我们三十年来汉语的传统教育失败。原因在哪里，我不甚明白，但今日的许多年轻人写不通文字则是事实。第二是因为对台湾的认同有加强的趋势，许多人在作品中加入大量的台语，造成汉文更大的灾害。第三是，因为政治上的理由，对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传统加以阻隔，这些文学虽未必都很好，但从传统的继承来说，当然会造成影响。文学是一种实验的过程，中国新文学的生命很短，必须不断的相互激励与学习，才能发扬光大。而台湾因为有此文学上的断层，现代作家无从汲取

新文学在语言上的资产。第四，在现代工商社会中，资讯、电讯发达、电报、电传等的使用，使语言简化为单纯的符号，字汇、文法都尽量简化，语言、文化也就受到退化的影响。最后则是西化语言尚未被汉语的原则所消化，不成熟的西化语言对台湾文学产生坏的影响。

三、缺少独立的文学批评：三十年来，台湾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的发展不均，可说脱了节。台湾文学创作的作家，有许多人在忙于应付生活之余仍努力的写出好作品，值得我们心怀感激。但评论方面的作家则未跟进。按照大众消费的规则，评论应该越来越专业化，台湾没有的原因，可能是教育训练养成的问题。并且，三十年来对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文化方面的漠视，或直接、间接的扼制都有关系。因为评论除了知识以外，还必须要有尖锐的精神。而没有独立的文学批评，使文学得不到客观批评的指导与激荡，也就无法取得更好的发展。

四、未熟的宗派主义：文学上的宗派，一如其他思想上的宗派，只要它够得上是真正的宗派就是好的，可互相讨论、吵架、论战。对整体的进步与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因思想、文化的贫困，批判精神的缺乏，使得宗派所需的一些基本条件（如知识、哲学、思想、文化）付诸阙如。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标榜的宗派，往往夸张、膨胀宗派意识而忽略文学创作。早熟的宗派主义，就像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一起讨论知识问题一样，对台湾文学的发展没有贡献。何况，文学宗派和文学在艺术上的评价，并没有一定的关系。

五、读者、作者的精英小集团化：在大众消费文化下，文学的创作与欣赏，越来越限于文化、文学的“精英”小集团。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文化或小说的“明星”不如过去重要，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降低。大部分人在其专业上有丰富的知识，但在共通的人文思考上越来越幼稚，越需要消费型的文学。严

肃的文学，失去了对于人生、对于生活的启发和指导的性格。人的异化，造成文学的异化。

六、文学作家面对的问题：第一项是：科学、技术上的知识和学问日益受重视，文学作家的地位日渐下降，尤其非流行的作家，更是如此。第二是：在金钱与市场关系的支配下，消费型文学发达而严肃文学衰落。第三是：在大众消费下，作家急功近利，求名利先于求自我风格的形成；“消费人”的形成，使作家“单向度化”，无从有更丰富的人生，更多样而深刻的对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多作体验与思考。

结 论

在形式上，我们已看到台湾富裕的、消费社会的形成。大众消费社会有两种，一种是实在的，一种是虚构的，台湾即属于后者。因为作为大众消费社会重要支柱的科技，特别是精密的科技，我们还落后一大截。在享受上，我们有各种豪华的汽车、观光饭店、舶来技术与商品，但因为缺乏坚固的科技基石，所有享受的富裕现象都只是一种虚构。我这样说绝非在污蔑台湾的经济成就，而是在陈述一个真实的事实，我们不能再这样无穷无尽的发展下去了。即使是在西方许多大国，不少思想家仍警告的说，世界物质、资源有其极限，目前这种浪费性的、糟蹋性的成长必须遏止。他们提出的警告是：“减少增长”。西方如此，台湾更应是如此。台湾作家在富裕社会中，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另一种作家。他不该再只靠灵感与即兴去写作，而应该积极去理解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过去读了四书五经可以治天下，现在则不然了。由于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因素，使我们面对的人文景观越来越复杂，这种情况，要求每一个作家必须花费辛苦的代价，长期努

力的去对事物的本质和真相进行理解。他必须谦虚的做调查研究、阅读、思考、访问、做笔记、建立档案、用苦心去捕捉真理，从事写作。

最后一点是，前面谈到的人的“异化”。简单的说，人已逐渐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当我们提到所谓人道主义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時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人的形象有一种深刻的信念。当黄春明写那些淡淡哀愁的小人物时，他心中就有一种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的对人的信念。台湾作家目前最重要的是从人的复归出发，克服人的异化，从人文主义的回归去看台湾、中国、第三世界和全世界的人类。在所有的复归途径中，我相信没有一种东西比文学更有效、更直接。文学使那些对爱失去信念的人，恢复爱的力量；让沮丧的人得到温暖；让受逼迫的人得到反抗的力量；让失望的人有勇气重新去爱、去生活、去追求新的希望、去拥抱别人，这应是一切文学的原点。文学也应和其他有良心的知识一样，对社会、国家及全人类的团结和平、进步与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九八三年八月《文季》一卷三期

“学院理想主义”的忧郁

——从台大学代会主席 吴叡人辞职事件谈起

四月二十九日，台湾大学学生代表大会主席，非国民党籍的吴叡人向大会辞职，借以向台大校方当局的“忽视学生公意”，以及向台大“整个训导制度”对台大学生议会“自治、自律和理性”能力的不信和猜忌，表示“严重抗议”。五月四日，吴叡人和几位学生代表，到“教育部”陈述意见，要求对于扼杀“学院理想主义”的当前大学教育体制有所改革。吴叡人和一些同学的行为，据说为台大当局部分人士所不能谅解，目前盛传将对吴叡人和其他几位相关的学生采取惩罚报复措置的传说。

在去年经过台大学生代表的民主选举，以非党员学生身份，第一次当选为台大学生代表大会主席的吴叡人，为什么辞去这为同学们所负托的工作？吴叡人的一份辞职声明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吴叡人代表的学代会，想要透过“合法、理性、秩序和善意”争取学生福利的改革，在台大当局漠视和压迫下，受到挫折。吴叡人说，他当选为主席后的台大学代会努力的目标，是“具体、合法、理性、制度化而有效地”为台大学生争取“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福利，即“除了”“争取校园生活中物质条件的改善之外”，并“要求一个使台大人得以自由而充分地发展自我，培养一颗勇于探寻真理的自由心灵，和高度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的自由校园”，从而为此进行校园内“制度、法规的总检讨”。

但是一年下来，他发现“学生大会的决议，对校方毫无拘束力可言”，“校方”“以其对代表台大一万四千名同学的神圣议坛的不屑”，使台大学生组织如代联会和学代会不能不成为“除了放电影、园游会和一些无关闲旨的琐碎活动，充其量只是一个喜欢玩开会游戏的团体。”

二、校园内警察主义和逸乐主义，使台大学生成为“政治文盲”，大学生应有的理想主义被扼杀殆尽。吴叡人同学说，由于“教育当局不断地将三四十年前在大陆上经济、政治、社会秩序解体的背景下产生的学潮阴影，投射在三四十年之后，在一个现代化、多元化、高度教育普及的富裕社会中的现代学生身上”，所以对学生的“合法、理性的”改革要求，采取猜忌、“不信任”的态度，使一个“教育行政者根本欠缺主动与同学沟通的诚意，而不正确的揣测，曲解学生的善意，由此而决定了对青年学生防堵政策，不让他们关心政治、关心社会问题的症结”，“安全单位介入校园，约谈学生，使学生对公共事务，对台湾的前途，噤若寒蝉”。但是，“在另一方面，则大力提倡享乐的、逸乐取向的青年文化”，“造就了新生一代的‘政治文盲’”，“使学生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或无由关心”，“扼杀校园内的理想主义”，“使学生不敢关心政事，不敢听闻政事”，“用享乐麻痹青年的心灵”。

三、一年来，台大当局对由非党籍学生领导的学生议会，进行连续不断的，风格低下的打击。据吴叡人指出，他当选后的一年间，连续地遭遇了以下一些令“一位单纯而热情的年轻人感到灰心丧志、苦不堪言”的打击，例如当选当天，吴君和一些同学在一个餐厅吃饭，教官却向学生说“党外人士”为他在来来饭店开了三桌席为他“庆功”；去年立委选举期间频频在家中接到骚扰性的“怪电话”，探询他是否有意为党外人士竞选；教官传出谣言，说他接受党外人士金钱补助，出版《台大青年》……吴叡人痛苦

地说道：“我只是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虽然我读的是政治，但我不十分了解复杂的政治。但这一年来一切奇特的遭遇，使我尝遍了‘苦涩的成长’。”

四、最近，台大当局忽然公布：学生代表不得连任。吴骛人代表学生代表大会向校方磋商，要求撤销这个新规定，不为校方所接受。吴骛人说：“在目前这种种受校方管制的现状下，任何真正诚恳期望它发挥功能的人，都应该了解有经验的学代连任将对学代会工作有多大的实质助益”。“学代由班上同学选出，并非指派……校方为何干预，如此则校方有何民主可言？”他从而有这深深的感慨：“一年来，本人的挫折、失败，说明了学院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失败。”“在校园政治的舞台上”，“代表同学公意的‘理’已俯首于校方的‘力’之下。”因此，他再也不能在无力感中在妥协、冲突的循环中工作下去，成为“台大历史的罪人”。

从校外看来，吴骛人辞职事件至少显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三十多年来戒严体制下，台湾的大学园内，严重缺乏学园内部的学术、思想、行政和管理的自由和民主。因此，本来应该成为一个时代中知识、思想和文化的中心和领导力的大学，三十年来，在台湾的大学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成绩。尤其在近十五年来，随着台湾在经济上的发展而形成的台湾式的消费文化的侵蚀下，台湾的大学园正在迅速地逸乐化，大量养成一批对政治冷淡，在知识和思想上幼稚、自私而现实的大学生，长远地看来，是整个台湾的隐忧。

二、教育当局为了求得校园内的安定与温驯，采取一方面用安全、训导、军训势力监视、调查、压制的方法，造成老师和学生一般地回避现实问题的性格，一方面从公，从私的角度，直接和间接鼓励学园内的荒嬉、逸乐的倾向。目前的政策，似乎宁可让学生成天跳舞、烤肉、郊游、骑马、射击、野营、登山，也不

愿意学生读一点深刻一点的书，关心和谈论政事。在校园内，也一般地不准学生过问校内行政、课程，更不许学生对老师的知识、讲课的品质，提出半点质疑。

三、最令人担心的，是校方一部分负责校园安定的职员，不惜以说假话等风格极低的手段，对付学校内求改革的才二十出头的学生。在大学教育的园地中，教育者对受教育的青年用谋略，玩手段，实在是对于教育本身莫大的侮辱和伤害。

台湾高等教育在政策、作风、组织、管理上存在着如何复杂、严重而经长期积累的问题，在台湾最秀异的大学——台湾大学这一次因吴叡人的辞职案中，表露无遗。对于这个事件，“教育部”当局似乎没有积极面对问题的意思，但是也似乎并没有对吴叡人等同学到部陈述意见的举动有深究的意思。在台大方面，虞兆中校长已经公开声明不追究吴叡人等学代干部同学的行为。但是据台大校园内流传的消息指出，台大教官室和法学院当局，却坚持非处分学生不足以保障今后的校园秩序。

我们以为台大当局应该慎重考虑“教育部”、校长室主张不罚学生的智慧，彻底打消对吴叡人等学生的报复计划。吴叡人等一贯主张“合法、理性”，事实证明从他公开辞职到他到部陈述意见的全部过程，都力主“合法、理性”和节制的原则。如果以此而尚受记过、开除学籍的报复，在一些吴叡人所指出的校园内自由、政治、文化等问题没有解决的条件下，只有逼使学生放弃“合法、理性”的途径去表达他们的意见，也未可知。

而最重要的，是教育当局应该借此而对整个当前高等教育的思想、作风和政策做全盘的检讨。安全、军训、党团在校园内是否力量过大，影响整个高等教育的行政、效率、风格和品质？是否直接、间接地闷杀了校园内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发展——而这正是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和功能。以过去大陆上学潮的不快经验为基

础所订定的校园内政策、思想、对学生的态度，拿来用在今日台湾的高等学园是否正确？以校园内的警察主义和逸乐主义的手段，以一校、一时代校园内学术、知识和思想的贫困为代价，以维持校园内的“安全”和稳定，是不是正确？凡此，都是造成台湾高等教育学园内深在的无力感和抑郁感的几个根本性的、等待着回答的问题。

我们希望台湾安定。但大学生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心也是正常的。想想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我们也不赞成大学生参与早熟的或无意义的政治活动。这需要有学问有经验的教师对他们循循善诱，忠告善导，指导他们研究问题，求得可能解决方法，锻炼他们的热忱和智慧，以便将来立身社会时能够担任社会的任务。而防制方法，无论是高压性的威吓，或提倡低级游乐，都只有造成偏激或滑头的青年，这决不是百年树人之道。而且，今日社会风气之暴戾靡乱，亦未尝不由此而来。

——一九八四年六月《中华杂志》二五一期

《人间》杂志发刊辞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希望，我们爱……

二十多年来，由于整个社会的勤勉工作，我们已经在台湾创造出一个前未曾有的、富裕、饱食的社会。这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成就，也使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那就是因为社会高度的分工组织化，造成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一个生产部门与另一个生产部门之间、一个市场与另一个市场之间的陌生与隔阂。

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关的连带感和相互间血肉相连的热情与关怀。此外，在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的时代里，人，仅仅成为琳琅满目的商品的消费工具。于是生活失去了意义，生命丧失了目标。我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庸俗、肤浅；我们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废、枯索。

《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杂志呢？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人间》是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导、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透过我们的报导、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让我们的关心苏醒；让我们的希望重新带领我们的脚步；让爱再度丰润我们的生活。如果您还问：为什么在这荒枯的时代，要办《人间》这样一种杂志？

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抵死不肯相信：有能力创造当前台湾这样一个丰厚物质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们也抵死不肯相信：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心灵已经堆满了永不饱足的物质欲望，甚至使我们的关心、希望和爱，再也没

有立足的余地。不，我们不信！

因此，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

一年多来，在筹办《人间》的过程中，我们得到许许多多台湾文化界、知识界难以忘怀的关心和帮助。黄春明先生提供了许多极有创意指导。尉天骢先生和郭枫先生也给予我们长期的协助与关心。苏俊朗先生是最早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意见的摄影家。我们感谢关晓荣先生慨然将他的“八尺门”连作送来发表。我们谢谢阮义忠和张照堂二位先生，先后将他们的力作送来《人间》，使篇幅增光。吴嘉宝先生也长期给予我们许多指导，至可感铭。我们尤其谢谢王信小姐，因为她严肃、认真、辛劳地为我们挑选和编辑图片，训练我们年轻的工作同仁，使我们获益至深。此外，还有我们无法在此一一指名志谢的朋友，都给予我们热情的帮助。我们深知，没有这些令人难忘的支持与协助，《人间》就完全不可能成形和刊出。

《人间》是属于每一个关心人、关心生活、关心台湾——我们可爱的家乡的人们的杂志。她的园地公开，没有门派的限制。我们欢迎一切关怀的、富有希望与爱心的报导摄影家和报导文学家联手创作，寄来优秀的作品。

我们更需要全社会以订阅和爱读来支持《人间》，因为《人间》是您自己的理想，您自己的杂志。

朋友们，支持《人间》！因为我们心中的关怀、希望和爱，正急切地需要一个再生和滋长的机会。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人间杂志》创刊号

两鬓开始布霜

去年的一年里，有两件事，是我难于忘怀的。

首先，是七月七日《中华杂志》举办了与往年很不相同的，名为“纪念抗战四十周年讲演会”的七七抗日纪念集会。通过旅日学者戴国辉先生的邀请，有五位日本学者来台参加。这几位日本朋友自备旅费，来台湾向中国人民就南京大屠杀、日军当年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弹、正确认识中国以防止日本成为军事大国，以及就日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做了极为深刻的研究、反省和批判。这些日本学者，在当前日本体制派官僚和学者，悍然修改日本教科书里的日本侵华史实，宣传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无罪论，以“南京大屠杀”为“虚幻”、首相参拜供祀日本战犯军人的靖国神社，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中抹杀日本侵华战争犯罪的汹涌的日本军国主义回潮背景下，在日本奋力抗争，苦口婆心地要日本人民不可遗忘日本的战争犯罪历史，以免重蹈日本害人害己的覆辙。这些日本学者告诉我，他们艰苦的工作，已经被日本右翼战争势力戴上“非国民”的罪名，甚至面临被迫离开教职的压力。他们因为理解到日本的和平主义和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再起的运动，必需团结在二次大战中被日本侵略战争所加害的亚洲人民，而来台参加了我们的抗日纪念会。我忝为大会的主席，并且权充一小部分语译工作，切肤地感受到这几位日本学者

的正义与道德，对中日间的真正和平展望，燃起了希望，对这几位日本朋友，我怀抱了很深的敬意。尤其是森正孝先生，带来自力完成的两部纪录片《侵略》和《侵略原史》，以极为强力的印象，重现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罪行。当一位曾经身历抗战的惨酷，被纪录片刺痛了旧创的观众，起而对森正孝怒责日本对中国惨烈的加害时，森正孝哽咽地回答，他今日一切的努力，便是为了代赎上一代的日本人的罪恶，坚决不让日本重蹈过去的错误。在一旁语译的我，不禁走近他的身边，紧紧地拥他入怀。我至今犹难以忘记，那成长于战后的、年轻的森君，在我怀中饮泣的颤动，如何深深地传到激动的内心……

筹备了十九个月，终于在去年十一月公刊的《人间》杂志，受到台湾知识、文化和文艺界超出我意想的高度评价。有二十多位学者、文艺家和社会工作者，不惜以他们长年优异的工作表现向社会热情推荐了《人间》杂志。接着，又有三十多位学术、文化和文艺工作者，自动捐款，集资十多万元，购买报纸版面，以文化广告向社会推荐。许多读者给我们写信、打电话、赞美、鼓励和批评。杂志出刊以后，同人和寄稿者忽然成为大专院校邀请讲演的热门名单。有不少朋友担心我办杂志太过辛劳，损害健康。他们说：“《人间》杂志有别人可以代替你办得一样好。但是你的小说创作却只有你自己才能写啊……”

这些激励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对于朋友、先进和读者们这样热情的爱护，我甚至是惊异而惶恐的。我深知，我的一点工作和创作，其实是还不配受到这么深的关怀与爱护的。我深深感到名实间明显的差距，而觉得羞惭。

高信疆兄是几位担心编务工作将重大影响我的创作的朋友之一。他终于答应负责《人间》杂志总编辑，和其他同人一块儿艰

苦地生活和工作。信疆兄答允主编的那一天，在深庆得人，感念他不减的热情之余，我以在这新的一年内交出十万字小说为约。我公开这原是两人私下的约束，一面表示对信疆兄的谢意，一面亦所以表明我不悔的创作承诺。

《人间》杂志出刊之后，我忽然跳进不可思议的忙碌里，其实与我的不擅理事，个性散漫有极大的关系吧。许许多多来自海内外的朋友、先进的信，都不曾回复，而日日深自咎责。

这过去的一年，因此于我是难忘的一年。在颠蹶、困厄的半生里，这过去的一年，也是我形容开始枯老，两鬓开始布霜的一年。然而，我却有这时代中难有的希望和幸福之感。

——一九八六年二月九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从台湾都市青少年 崇日风尚说起

最近两年来，在以台北市为首的台湾城市中，有一部分青少年，表现出对日本服饰、发式、歌星、歌曲等日本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热烈模仿和学习的风尚。这一风尚，逐渐发展成对日本文化、社会和国家的，极为肤浅的倾向和崇拜，而引起部分文化评论人士的侧目和忧虑。

迟来的日本影响

台湾经历了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之后，台湾许多有识之士，就展开学习中国祖国文化，清除日本文化影响的热烈而主动的文化运动。日本的政治、文化、军事势力，也随日本之战败而退出台湾的生活。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末期，美国对台湾经援停止，日本在战后急速复兴的资本主义，在美国安排下，开始再次将它过剩的资本以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再度介入台湾的经济中。

从理论上说，日本的文化影响，理当随着日本资金、技术和商品重新在战后对台湾再“进出”的六十年代中末期，就已重新在台湾登陆，而发挥绝不亚于美式文化和价值体系……之对战后台湾的影响的日本影响。

但事实却不然。当美式价值、文化、思想、制度自五十年代起在台湾的教育、思想、文学、艺术、经济和农业等各方面展开压倒性影响之同时，六十年代末，当局停止了日本影片的进口。日语文在文化媒体上以行政命令加以禁止，日文书刊杂志和报纸的进口，受到比英文书刊、报纸杂志更为严格的控制，而且严厉限制日本书刊的性质于理工科技方面。

当局的这一措施，一方面来自国民党在抗日期间经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加害而来的，内化了的反日性质，另一方面，也未始不在防止日本文化与台湾民间的再温存，促成台湾民众对当局的异心。

当局的此一政策上的、有意识地防杜日本文化影响在台湾的展开，使得日本资本、技术和商品进出台湾的同时，人为地阻遏了文化在台湾的“进出”。

日本文化影响在台复活的背景

但日本对台湾的影响力，却一直强力地存在着。在中国现代史中，国民党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微妙的长期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国府与日本之间，同时存在着对日本的刻骨仇恨和对日本的千丝万缕，难于分割的特殊关系。在国共内战期间，由于日本军阀以反共、灭共为名，不但出兵中国，卵翼亲日傀儡政府，也还与国府相互进行过政治的和军事上的反共和防共的协力关系。日本战败，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还受到国府礼聘，以军事教练的地位，为国军训练反共、剿共的军事方略，是人尽皆知的例子。

当局迁台之后，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身份，首先是政治上仰赖美国，其次则经济上仰赖日本的援助。因此，台湾的当局“知

日派”和日本保守派当权政治关系，展开极度亲善友好的关系。从吉田茂、芳泽谦吉、佐藤荣作一直到岸信介这一系在战争时期为日本侵华政策力行者，从战败国的战争官僚，一变而为台湾的老大哥，受到台湾当局极度的优礼与拢络。随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日本资本在东亚的扩张，到了六十年代末，佐藤首相已经公然狂妄地向世界宣称：台湾海峡的和平，对日本国防有重要关系云云。一个战败国日本，至此却公然摆出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姿态。在这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特殊结构下，曾经抵抗日本的当局，失却了立场。因此，在战后四十年台湾的历史教育中，严重地忽视了对日本侵华、侵台历史教育，在政策上，对日依赖取代了对日批评，长时期不谈抗日，不举行任何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另外一方面，大学或大学外的日本研究极端粗疏和落后。台北某大学日本研究所中，充斥着旧时亲日台籍学者，对日本不但没有独立、批判的学术立场，更不允许研究生对日本采取独立、公正、客观和批判的研究！

新的日本崇拜

在上述的结构下，战后四十年的今天，终于在台湾发展出一股新的日本崇拜。这新的日本崇拜论，主要表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的快速复兴的崇拜。这一倾向，尤其以 Vogel 的《日本第一》一书在台翻译发行为起点。日本的战后复兴受到欧美白人中心论的经济学者所乐道，把日本的战后资本主义复兴，做为东方国家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成功地完成“现代化”的代表，而加以过大的评价。这一派学者，有意忽略日本的资本积累与日本战前向朝鲜，台湾和中国其他地区进行

军事扩张的密切关连，也有意忽视日本在战后“二体制对立”的世界结构中，在韩战和越战中争取战争财富的事实，也有意忽略日本在美国卵翼下，建设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东方的栋梁这个世界战略中，助长日本战后的经济帝国主义，以日本过剩资本向东亚各地进出的事实，而单纯从日本的文化传统、民族性、管理体制和东方商法、对西方冲击之回应态度等，附丽了日本战后成功地现代化的原因。在近二十年间，在经济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台湾，因而掀起了对“日本式管理”、“日本式商法”的迷信与崇拜。

其次，在台湾反体制党外民主运动中，由于承继了五十年代美苏冷战的心智，产生了一股或明或隐的反华心态。他们从反对国民党，发展成不反对国民党所反对的事物这样一种态度。四十年来，台湾官式反日、抗日言论的僵化和教条化，使我们的党外产生“只有国民党、外省人才反日”这样一种逻辑。因此，台湾反体制党外运动，成为第三世界反体制运动中唯一不批判美、日强权的一支。

第三，由于这股新的日本崇拜，由于台湾在中国现代史教育中刻意忽略抗日历史的教学，有一些青年，宣称“抛弃历史包袱，重新认识和学习日本”，以为反日、对日批评，是“老一代人”与日本的历史恩怨所造成的“包袱”，从而以反日和日本批判为盲目、无理性、不客观。于是我们的青年要“抛弃”这“历史的包袱”，重新去认识日本，向日本学习。而这认识、学习的具体内容，也无非是日本式管理、日本商法等层次低落的东西。相形之下，今天韩国、中国大陆、泰国和菲律宾的学生、青年鲜明的反日和日本批判的认识高度，是我们一些只知日本的赚钱法的青年，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小儿女的日本崇拜，是一种复杂的被害

因此，台北市西门町中青少年小儿女的日本崇拜，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战后亲日、依日结构下的，最为肤浅的反映。这些小儿女，只不过模仿日本青少年的发式、衣饰、鞋袜，崇拜日本的青春歌唱或电影明星，比起四十年来台湾在文化上、价值上、语言上、思想上的长期美国化，时期既短，深度和广度皆不能比拟。我们的文化评论家，不曾反省、批判台湾的长期美国化（尤以近年来大量美国速食工业的登场，和即将在政治压力下对美国商品大开门户后为尤然），却独独对小儿女的肤浅的日本崇拜忧心如焚。事实上，今天西门町小儿女的崇日风潮，只是具体而微地表现出台湾教育的严重缺失，使青少年失去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失去清晰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并且使他们成为战后四十年来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亲日和对日无批评的复杂结构下被害的一代。与其责备那些醉生梦死、懵懂无知的小儿女，严肃反省崇洋媚外的台湾的文化结构和政经结构，恐怕才是当前的要务吧。

——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华杂志》二七二期

我们做的，还不够

四月二十七日，我到台中大里乡，参加了台湾省第一个反公害住民运动组织“台中县公害防治协会”的成立大会，并且借此向可敬的协会领导人黄登堂先生致贺。

《人间杂志》在去年五月间，蒙黄先生全力协助，采访大里乡的公害问题时，我们就深刻了解到，大里乡及邻近乡民为了反对三晃等农药厂肆无忌惮的污染加害，已经走过不可置信的、艰难却坚毅不拔的道路。黄登堂先生把这五年来大里乡公害的实况，以日志的形式发表了《空气有毒的日子》。这是台湾第一篇有关一个地方社区公害最详实的记录，对于台湾公害和公害史的研究，必然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读黄登堂先生的日记，最深刻的感受，是台湾企业界对于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心的惊人沦丧。五年期间，三晃农药厂发生过二十三次以上排放恶臭有害气体，其中有两两次爆炸。最严重的一次爆炸事故所逸出的烟气，甚至造成二百九十余个村民集体中毒、多人当场不支晕厥的事件。可是五年来，虽经乡民不断陈情，甚至愤怒地到三晃工厂严重抗议，三晃却依然未作改善，继续排放有害气体。五年来三晃和其他农化工厂排出的废水，已使大里乡及附近六七丈深的地下水都有强烈的异味，被卫生部门检定为不适灌溉和饮用。

三晃农药厂的不德，可以从两件事情上典型地表现出来。一是暗埋水管、排出有毒废水，却以公开的排水管供抽检单位取样！二是八五年五月十七日，“卫生署”、“环保局”因三晃公害严重，勒令停工，但三晃竟以“尚未接获停工公文”为由，继续生产！

另一个感想，是我们对于台湾整个公害问题，看不出有系统的防治政策与决心。例如公害防治行动的迟缓，法律的不备，责任机构事权的涣散等等。早在一九八三年，“环保局”和省议会都说要“尽速”、“辅导”三晃迁厂，却一直拖延到今天。以这种官僚作风处理每天、每刻都在毒害空气、水和土地的公害，岂止叫人顿足而已？对于居民的陈情，中县卫生局可以用公文做这样的回答：“目前无农药工厂废气排放标准，本局束手无策”！工业安全、水利、工业局、农林单位，对三晃公害的认定不一，甚至完全互相背反。还有“中央”单位勒令三晃停工，显然都没有发生效力。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大里乡及邻近乡民可一点也不气馁。陈情、请愿、举发两百次，忍无可忍，呼告无门时到三晃厂激烈抗议，最后也克服有关方面的疑虑，终于组织了民众自己的、合法的公害防治团体。从今以后，他们可以公开工作，可以向有关部门行文，可以自己调查检验，可以直接和岛内外环保单位、学者、专家联系；这对今天知识分子广泛的无力感、犬儒主义，是多么生动有力的教育和启发。

在为“经济起飞”狂奔的三十年间，不知不觉中，台湾已形同废墟前的、沉痾的大地，河流、海岸、空气、水源、自然生态，都受到最深刻的挫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知识分子为它做过多少努力？“为什么，什么人让它发生？”当我们面对这历史的质问，把责任推给冷血、贪欲的企业和当局公害防治政策的阙如，是否过于犬儒？你和我，都是今日台湾公害构图的共犯者吧？

成立一个公害防治协会，只是个极小的起步。面对广泛的公害的沉痾，面对财势利益的掣肘，黄登堂和他的“台中县公害防治协会”，还有一段艰苦崎岖的路途吧。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黄登堂和他的乡亲们的工作和精神，以我们各自的能力关心、支持、协助这个可敬的协会，用住民自己的决心和对本土的深厚情感，一点一滴的讨回洁净的空气，健康的水流和大地。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石飞仁的正义感 与台湾之冷漠

七月，经过几次国际电话与书信的往返，我终于见到了领导“事实的剧场·不死鸟剧团”的石飞仁。生于一九四二年的石飞仁，看起来比他的年龄还年轻些，戴着眼镜，是一个谦和、亲切的日本人。

在激荡的六十年代“反安保”斗争那时，石飞仁是十九岁的少年。一九六五年开始，东京、巴黎和北美洲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广泛的反叛，反对西方既成的教育制度，争取校园和民众真正的自由，对五十年代以来的冷战体制的思想和文化结构展开批判。在北美洲，学生和教授投入了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校园自由运动和言论自由运动。在那个年代，石飞仁是二十三岁以后的青年。

“哦，六十年代的一代啊。我认识的比较‘有劲儿’的日本朋友，数六十年代的最多……”我说。就这样我和石飞仁开始攀谈起来。“好像是吧。六十年代以后的一代，一般地说，全不行了。六十年代搞过运动的人，垮的人也不少。”石飞仁说，温和地笑了起来。他说有些“左派”文化人变成大商品，以“左”的文化品牌，大赚其钱，但他们的人间品质全变了质，过着欺世盗名的腐败生活。

石飞仁从大学毕业那一年，正是日本学生运动很兴旺的时代。

小剧场运动，是当时日本学运的重要战斗武器。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当时著名的革新济青年剧运团体“青俳”。六十年代末叶，运动退潮，日本在七十年代起跃入急速而巨大成长的时代。由于面临运动退潮局面的思想意见不同，他解散了他自己亲手带大的剧团。为了饷口，他进入一家销行最广的周刊杂志，从戏剧运动家变成报导作家。

依石飞仁的看法，日本军国主义不是死而复活的问题，而是它根本不曾死过的问题。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前几年，四七、四八年吧，国际冷战的乌云已经逐渐凝聚，美国盟军总部迅速改变了对日战后处理政策。防苏反共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精神。”石飞仁说，“在这个冷战结构下，美国开始扶持、恢复而不是打击、清算日本战前的战争势力：财阀和政客、华族。这些战前右翼的战争势力，在战后日本摇身一变，仍然在美国卵翼下掌握日本战后四十多年的政治和经济支配权。特别在面对中国和东亚人民时，日本扩张主义系的人们，从来不认为日本战败过。他们只承认败给美国过。”

问题不在日本军国主义是不是在复活，问题在日本军国主义因为战后国际政治而从来未曾死过。这说法叫人吃惊，可是却有很大的说服力。伪满开发时代的“革新系官僚”岸信介，就曾担任战后日本政权的首相，以镇压日本革新的民主势力，推行在“对美随从”政策下的高成长路线而闻名于日本现代史中。“这些战前的人的系谱，不但在战后支配着日本，也同战时一样，支配他们在中日战争中熟悉的中国和东南亚事务。”石飞仁说。

从揭发“花岗事件”的十几年过程中，石飞仁深刻地了解到，日本的战后，其实是对扩张主义的战前，未经批判，而仅仅是更服易帽的延长。“对战前毫无批判的战后，其实就是战前的延长。”石飞仁说。以“花岗事件”为例，强掳殖民地人民加以虐待这个

政策的最高责任者岸信介等，以及鹿岛组的最高负责人，都没有受到战犯宣判；对被役奴工工资和损害，也毫无赔偿。在战前跟着日本军队到东南亚去“建设”军营、机场、军火厂、仓库、修路的“鹿岛组”，在战后依然在美国和日本的旗帜下，在东南亚以建设水坝、发电厂、修路，赚回日本对东南亚“经援”的现款。“光是花岗事件就足以说明中日战争尚未结束。”石飞仁说，“中日两国许多战后历史问题都被有意地抹杀、掩盖、不加清算和处理。这是日本傲慢的地方。除了对美国，它从来不承认它在二次大战中被打败了。”

这种不承认失败的背后，其实也就是一股不以侵略战争为罪过、为羞耻的可怕的傲慢。“这种傲慢不但对不起中国人和其他过去被日本加害过的东南亚人民，也对不起日本人民。”石飞仁说。因此，“战后世代”的他，在他不断地揭发像“花岗事件”这样罪恶的历史时，深深感到彻底清算日本的“战后”的必要。他说——

“今天，日本享有炫人的、高度成长的社会，追究起来，和日本战前的扩张主义历史、以及和这未经清算的日本扩张主义在战后东南亚的‘进出’，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今天的‘进步’、‘繁荣’，如果离开日本残酷、蛮横的扩张主义历史和传统，是无法理解的。”

不论是美国的福格尔，或是此间的日本崇拜的学者、专家，都有意无意看漏了日本侵略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影响。石飞仁说，没有马关条约的赔款、没有日本对台湾、朝鲜和“满洲”的掠夺，没有残酷役使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奴隶劳动，没有未支付的战败赔偿，没有诸如朝鲜战争和越战的地区战祸……日本今天的繁荣是不可能的。倾听着石飞仁的反省，使我深切地感到，近年来，台湾的经理阶级和青少年盲目的日本崇拜，不免益发显得愚昧、无知而可恼了。

在高成长的日本，在从不承认对中国和东南亚人民战败过的日本；在对亚洲自大傲慢、对西欧自卑的日本，石飞仁和他的剧团在日本的工作是极为艰苦的。“为什么中国人不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为什么亚洲人不出来严厉指责日本的军国主义残余？只要中国人和亚洲人一天不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逼使日本真正地改变体质，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就没有可能。否则，我们日本人孤单地在日本工作，是没有希望的！”石飞仁说。

关于花岗事件，当局一直到今天都保持着奇怪的噤默。石飞仁说：“我总以为中国抗日战争，是人对于鬼加以批判的战争。是为了保证人性尊严的战争。你们有很多抗日英雄，但很少可以和耿谆比的。在日本土地上敢于从事绝望的、自杀的蜂起，这是大英雄啊！有这样的英雄，却任其寂寞一生……”

台湾对惨烈的花岗事件所取的奇怪的沉默、怠忽甚至冷漠，到底在说明着什么？思这凄然，再思之则怆然了。

——一九八六年八月《中华杂志》二七七期

人文思想杂志的再生

六十年代末，自由主义的文化性月刊《文星》禁刊。七十年代初的《大学》杂志，是继《自由中国》月刊之后，从思想、文化杂志过渡到政论杂志的桥梁。嗣后，台湾纯粹的思想、文化杂志萎殆，却由《台湾政论》开始，展开了为期约为十年的新一代党外政论杂志的时代。《中华》杂志则是唯一从六十年代一直发行到今天，却一贯未被充分理解其重要性的思想、文化性杂志。

思想、人文杂志在七十年代中的消失，和报纸副刊的改革有关。向来消闲的、轻浅的副刊，一变而为综合了文学、艺术、思想和知识的丰富园地，又赶上战后台湾第一代留美学人、专家和文人的生产期，报纸副刊，特别是高信疆主编后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遂全面地取代综合性思想和人文杂志，发挥了很大的文化上的作用 and 影响。

随着台湾经济的高度成长，报纸的发行量迅速、大量成长。发行数量的膨胀，使文化的、思想的读者，在不断增加的读者总结结构中，相对地成为少数。为了适应“大多数”读者，形成要求副刊通俗化和消闲化的压力。副刊遂渐渐失去了成为知识分子读者层要求知识、思想和文艺补给的焦点地位。

八十年代中期，坊间人文和文化性杂志陆续再生，杂志从报纸副刊所不能不放弃的所在，拾回人文、知识和思想的可能性。

可是，这再生于八十年代台湾的人文、思想性杂志，面对着这些严苛的考验：资金的单薄；台湾出版气候和环境的全面庸俗化和官能化；制作、印刷和装帧的成本提高；造纸工业独占下，文化用纸过分昂贵；厂商对人文、思想性杂志的广告投资态度犹豫；杂志流通体系的后进性格，等等。

但是，更为严重、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在于四十年来台湾在人文、思想和知识上的贫困，使文化、思想和知识的生产工作者，人数少、品质一般地提不高，工作不够认真、严谨，缺少最起码的文化和知性的积累……驯至于使从事文化、思想和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工作的人，品质难于提高，人数不够多，门类不够丰富广阔。这种情况，基本性地限制了人文和思想文化杂志的品质与发展。

尽管困难重重，从一九八五年底创刊的《人间》杂志开始，台湾的杂志市场上陆续出现了几本广受台湾读书界注目的人文性杂志，为长期笼罩在泼辣的政论和煽情的官能世界的台湾杂志界，注入一股清流。在台湾，能支持这些标示一个社会的文化高度的杂志，使它们不但能繁荣发展，还能在文化和人文品质上不断地提高的，不是当局的文化机构，更不是资本家的基金，而是具有人文与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学生、青年和市民。他们的自觉、团结和参与，用订阅、购买的方式支持各自爱读的人文杂志，是使这些杂志不断进步、提高和普及的最有效的方式。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科技教育的盲点

读十二月十、十一两日人间副刊所载，林俊义博士对此次诺贝尔化学奖“新科”李远哲博士内容丰盛的访谈，理解到杰出科学家的人间性，感人至深。

把科学家描写成只专心致志于真理的探究，怀着一颗纯粹而超出世俗是非利害的心，过着不识时务的笨拙的生活，不仅出现在肤浅的小说和电视剧，在具体生活中，恐怕也存在的。

在现实上，我见过，或者听过只顾及自己的事业，不问世事，并且以科学家将关心扩及专业外的知的、社会的领域为不屑的科学家。

对于专业外的社会与生活的理解不足，使科学家把秩序看成不变的存在，不知不觉地盲从既有的社会秩序与权威而生活着。如果科学的属性，恰恰是对真理或知的权威，不惮于以新的视野座标加以批评和再思考，则这样的科学家，便在不知不觉间违背了科学的精神。把自然界可以成立的假说，单纯地运用到社会现象的解说，例如把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论运用在社会生活，就产生视人间的弱肉强食为合理的，可怕的错误。

涵有人文深度的科学家的、知的、文化的魅力，显著地表现在李、林两位博士的对谈记录中。但如果这样反问：“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素养的人就不能在科研工作上取

得伟大成绩吗？”回答怕就不是很容易了。

当然，援引达尔文如何在剑桥大学研究时代热烈支持了进步的辉格党的政策；对英殖民地的奴隶体制深恶痛绝；主张过人类因文明开化而达成人的解放的思想等等，散见于他的笔记、谈话录，从而推定达尔文的人文主义和他在科学上的进化说之不可分割，也尚言之成理。可是，今天的问题，与其说是“没有人文理念的科学家能否成其大？”不如说，“今日的科学家能否完全剥离人文的关怀，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这是因为今天的科学与技术，在很大的范围内，被组织到两个庞大的既成体制中：在美苏二体制对峙的局面下，科技被导向夸耀各阵营实力和“优越性”的比赛，在许多造福人类的科技问题滞迟不决的背景下，走向所费浩繁，又没有科技创发上重要意义的，“不必要的科技”的开展（例如太空科技），并且在武器的恫吓与反恫吓中，竞走在武器开发的，荒芜的竞技场上。

其次，由于科研规模的扩大与集团化，科研的可能性，越来越局限于世界巨大的私人和国家独占资本的手中。利润、国家威声，难于避免地歪扭、腐败和恶用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的组织和工作本身，造成不可置信的、全世界性的重大灾难和危机。从小焉者看，科研者附庸于研究计划，基金、教席、物质收入条件，尤其在整体科研体制的民主和正义精神薄弱时，科学人和科研工作将造成怎样的苦闷和忧悒，怕有太多经验的事实足以说明了。

李远哲博士对台湾的科学教育有深刻的批评。科学教育中的人文训练的阙如，恐怕也是整个台湾科技教育的盲点吧……

看到台湾出身的李远哲、林俊义两位科学家发人深省的对谈，让我的心中温暖而且喜乐了好久。李、林二位科学家，和我同是一九三七年前后所生。在对谈中，我竟随着悠悠地回到台湾战后那贫瘠、无条理、矛盾却满存乡愁的年代，不知为什么，心中竟

反而涌起一股生的、不可思议的热意。

为此，我深深感谢两位科学家难忘的会谈……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新 种 族

去年年末，高雄和台北两个市政府，在教育指导机关的支持下，分别举行了几千人规模的高中、专科学生舞会。今年初，几十年来对中学生头发发式的严厉格禁，正式解除。

现代台湾青少年的舞，直接从美国输入。在电吉他、鼓、低音电贝斯，鲜明而快速的节奏、嘶喊似的歌唱和高音量音响……所组成的青少年音乐中，我看见过各自顿足、扭腰、摆手的样子。看来舞伴的性别，不，连舞伴自身，已经不重要了。在强烈、直接诉诸官能的、歇斯底里的音乐里，看到青少年群集却孤单地，各自闭目、狂乱地跳跃和扭动，我惊异地感觉到今日青少年一代令人心痛的空虚。

今天的高中生和专科生，大约是六十年代最后两年到七十年代初两年间，台湾的经济发展达到尖峰的时代生下来的。七〇年保钓运动的风潮，紧接着台湾在“外交”上连续失利所带来的冲击，以及以杂志《台湾政论》重新发足的党外民主运动的展开，对于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这一代青少年，自然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台湾社会以全力奔向富裕的历史时代中成长。他们的家庭多半是由离开本家的父母组成的“分子化家庭”，为了挣得足够的现款，满足对于现代大众消费社会中各种商品的需要，夫妻一道出去上班，有计划地为购置房子、家电产品、汽车、把小企业搞起来……

而奋力工作。

父母因为不能常在家中陪伴孩子，对他们的子女有一份负疚。用金钱购买各种子女所要求的东西、满足子女的需要，成了现代父母最方便的赎罪行动。

从小习惯于有求必应，习惯于只关心自己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就造成一代有强烈自我；不能理解别人的需要、立场和利益；不知道生活和自然中实际上存在的各种物质和义理的限制的青少年。

这一代青少年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全是“电视带大的孩子”。

七十年代，台湾的电视早已普及，深入台湾每一个角落的家庭。在父母都上班工作的小家庭里，电视取代了过去大家庭中的祖父母、堂兄弟和父母的职能。他们听电视为他们讲故事；看东洋和西洋的卡通片；看电视学说话、唱歌、认字、画图；看电视学习各种知识；也让电视儿童节目中的食品和玩具广告，从小就刺激着他们对小商品的饥渴，终于也按照电视广告吃零食，玩玩具。

电视上的节目，毕竟大人的节目多。孩子们于是歌舞、连续剧、电视长片……无所不看。于是电视上那些虚构的七情六欲、那些城市的、青春的、健康的、美貌、欢乐的虚构画面，构成了他们对人与生活的理解的全部。他们养成一个人单独地面对荧光幕去找问题的答案，去“学习”的习惯，过去由祖父母、由活生生的人和自然环境所带给幼小者的、最生动而富于启发的知识、情感和智慧，不但同他们断绝了，更不能取得他们的信赖。很多的时候，电视的权威，远远超过了父母和师长。他们成了生活、信息和知识的冷漠的旁观者。他们坐在那儿，自己一个人在荧光幕上寻找和开发他们所要的情感和知识。因此，这一代青少年知道

零细的常识不少，却永远缺乏参与、关心、研究和行动的热情。

现代青少年零细、分散的办法、常识多，却没有一个探索结构性、原则性思考和创作的心智。这除了因为从小受庸俗的电视的恶影响，主要的还因为他们在升学论和文凭论的教育体制中，花去很长的时间、用掉很大的力气，去记诵零碎的单词、公式、年代、人名和地名……入学考试阅卷“电脑化”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恶化了。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不看重创造、分析、调查、综合、批评……这些知识和文化生活最为必要的训练，徒然养成只会考试，不会读书和创造的一代。教材、教学的功利化、零碎化，使这一代青少年对人、对历史、对世界、对自然和对生活，都只有零碎、不相连贯的认识，为常识丰富、思想和知识低落的现代消费人的形成，准备好了条件。

这一代青少年的另一个问题，是过早地学会了用钞票解决问题的生活方式。小时候，他们学会了看电视、学别的小朋友来指定大人买零食和玩具，满足自己的欲望。再长，他们学会直接向父母索取零用钱，到市场上去选择他们需要的商品。现在，这些没有参与社会生产，却具有巨大消费力的人口，已经成为外来速食企业、美国香烟、地下舞厅、服饰、唱片、音乐带和音响设备等产业的主要或重要的诉求对象，每年的总营业额，可以高达数亿新台币。金钱关系过早地侵入青少年的生活，不但容易使青少年过早造成对钞票的饥渴，容易使他们不顾一切去取得现款；容易过早以金钱去度量人与事物，也容易让金钱削弱了他们在创造和学习上的努力。学生用钱买纸鸢、钓具；用钱买别人的笔记影印权；用钱去支使别人为他抄作业……是现代教师绝不陌生的问题。

最后，这一代青少年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本身。不可讳言，目前负责中学到专科各级学校的行政主管，有真正的

教育爱、教育热情、理想与负担的人，少而又少。把教育事业当成政治事业，也当做发财赚钱的事业的，比比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大众消费主义，对教育体制的渗透，造成校长、总务、教员和教育自身的商业化、腐败化。其中敛聚扣克、有不忍细说者。而在学校管理上，基本上还是五十多年前“训政时代”的作风，对学生，甚至对教员，基本上还是搞警察主义的管理态度：不放心、不关心、不尊重、永远怀疑。学校内教育精神、风气和伦理的颓坏，形成今日学生们面对的，最直接、生动的，恶劣的成人“典范世界”，形成学生与学校，良心教师与学校之间相当普遍的、暗在的矛盾与紧张。

从这些背景去看这一代青少年，或者比较能够更深入地体会到他们那种令人棘心的空虚感。年方十七八的生命中，就蛹宿着空虚感的这一代青少年，无论如何，是令人悲伤的。如果成人的世界再这样纸醉金迷，不停下为富裕而狂奔的脚步，好好的反省，这成人的世界，终于不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没有现行教育体制根本的革命，没有在教育领域中，对师生进行课程、思想、学研、制度、和创意上的全面解放与改造，只在学生发禁和舞禁上作文章，其实只是助长这一代孤独、强烈地自我中心，对人和生活不关心，对人类民族彻底冷漠，心灵空虚、言谈举止不逊而怪异，在服饰、性事（sexuality）和政治上号称“中性”化的“新种族”，奔向逸乐化、流行化和官能化的洪流中，浮沉而去，直到没顶。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六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日本接触：实相与虚相

朋友詹宏志最近发表《台北的日本接触》，引起我的兴味。

这篇文章上说，在台湾，日文书刊的销售总值，已经超过了英文书刊者。此外，日文杂志在台湾的销售，已经从个别、零星的流通，变化到定期、定量销行，有“整流”化趋向。

在日语阅读人口远远少于英语阅读人口的台湾，这是引人深思的现象。杭之对于图像文化造成语言、文字的沦亡这个忧虑，我想应该并不单指台北青少年对于日本图像杂志趋之若鹜这个现象说的。自从电视文化登场之后，图像越来越全面地取代了语言和文字，而成为人类思想和表达的主要符号。继之，图像文化的发展，又受到商品化、行销和广告的强烈影响，而趋向于官能化、享乐化和直觉化。人类因而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通过蕴含了在数千年历史和文化中不断丰富、发展的语言和文字去思维、创造和表现的习惯，一方面造成文字和语言蓦然的萎缩，一方面也大量生产着“图像中毒”的“白痴”人口。据说，在日本，如果一个老师没有充足的图像教材，没有讲台上说学逗唱的本领，在图像文化中长大的学生，是没有兴趣听讲的。

在这个意义上，图像杂志的文字是中文，是日文还是英文，已无关杭之的论旨。只是对日文为文盲的台北青少年，对于日语流行图片杂志的惊人消费，更为戏剧性地表现了图像文化“无思想、

无语言”的物质。杭之的忧愁，“良有以也”。

这三年来的日本热风，在政治经济上，存在着某种时代错置（Anachronism）。早在日本资本和技术向台湾浸透，并且在美国扶日反共的全球战略下，迅速形成了台湾对日本进口全面依赖结构的六十年代后期以后，日本风就该像美国风、美国崇拜一样，吹进台湾的生活了。但是，对日本文化和政治影响深具戒心的政策，毕竟人为地压抑了日本影响。八〇年左右，福格尔的《日本第一》以数种中译本在台湾登陆，在美国经济长期停滞下寻求经营改革之出路的台湾商界，遂从这本书开始了一系列学习“日本式管理”、“日本商法”的狂热。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史，与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对日本战前的资本积累，和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复兴，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些影响毫无反省和分析的“日本第一”主义，也被毫无批判地引进台湾的社会。就在这个“缺口”上吧，做为成功商品的日本服饰、日本式管理、日本的生活情调……向台北市泛滥起来。

问题是，要怎样看待这泛滥呢？

早在五十年代开始，美国语言、教科书、资本、技术、商品、流行歌和美式生活情调……已经在台湾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这作用至今不但不衰，甚且实质地在整个台湾经济、文化、政治上，稳定地强化着。在强大政治压力下叩关的“国际化”、“自由化”要求下，今后将更加迅速地把台湾纳入美日“文化圈”中而不能自己吧。美、日国际商品，在规格、品质的划一上，要求市场嗜好、情调、价值观……的划一。透过美、日大众媒体、广告、杂志和流行、美日资本和技术，将对台湾进行快速而有效的台湾“国际化”改造，和市场气候（Market Climate）与文化的均一化改造，以利国际性商品的倾销。

这绵密的“改造”，即透过杂志、流行、广告、电影……改造

了我们的个性、嗜好、价值系统和欲求的型式与口味，为日本或美国的具体商品的销行，创造了条件，也形成了比较抽象的“日本（生活）情调”或者“美国（生活）情调”。所以，恐怕不是“生活情调”主动变化于先，才促成日本商品在台湾登场，而毋宁是国际商品行销对市场地土著消费者品味、嗜好、欲望的操纵和改造，与商品的本身交互作用，造成了对外来“情调”的“选择”与“认同”。而这选择与认同的非自主性，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种“生产机制的专制”，不但决定我们的职业、技巧、生活态度、个人需要和愿望等等，并且成为现代世界中最新、最有效、最甜美的社会控制，向全世界（先进国和后进国）扩散，甚至模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阵营发展的相异性，使一切既存的知的、文化的、传统个性和相异性丧失，技术和管理的合理主义变成对现代人最大的非理性了！（H. Mareuse, 1964）。

因此，说日本（或者美国）“接触”是没有理论，是纯粹、感性、无语言与无思想，恐怕是不能令人放心的。“日本接触”，其实就是对先进日本（或者美国）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接触”。台湾文化界对先进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缺少批判，生动地表现在把一切加以非意识形态化、并且对意识形态自身采取轻慢态度的，这么一种普遍现象上。

美国商业的、市场的、流行的文化，和美国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影响，相应地支配了欧洲，说不定也形成了某一种“美国文化圈”。所不同的是，在欧洲知识界，存在着其自身对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深刻批判力。这种对美式文化的批判和轻蔑，甚至成为欧洲知识人的根本性格呢。即使在东亚，看到反共的东亚亲美（日）社会中，由官僚、菁英中产阶级形成了“日本文化圈”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同地区土著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和农民对日本资本、技术、商品和所谓“日本文化圈”的辛烈的反论和批判吧。

而台湾知识界对日本批判的严重阙如，在全东南亚，甚至在全世界中，成为独一的特例。这个现象，恐怕就很值得我们加以分析和反省了。

在“日本接触”中所接触的日本事物的背后，隐藏着复杂而严重的问题。对部落民和“在日朝鲜人”的歧视，对底层劳动者的加害、日本的“公害列岛”化、市场性官能文化的过分膨胀所造成的“一亿人白痴化”与丑闻画报（Scandal Graphic Magazine）的泛滥、少年暴力、儿童自杀、青年学生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冷漠，社会高度管理化下人的疏离……都是日本为高度成长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对于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所隐含的破坏与非理性因子的忽视、不理解，不论在台湾和大陆，应该是“日本接触”或者“美国接触”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课题吧。

理解和研究日本，对于中国，是关系着我们民族发展的大事。但是，至少在台湾，我们的日本研究一般地肤浅、不严肃认真，甚至有大学的日本研究所成为日据时代亲日知识分子的总本山。这种情况应该迅速改变过来。对日本先进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但是摸索中国自己的日本论之所必需，也或者会成为探索中国发展和建设道路极为有益的参考。

——一九八七年元月二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鸢 山

——哭至友吴耀忠

《雄狮》编者按：

画家吴耀忠，已于元月六日因肝疾谢世，享年四十九岁。

吴耀忠毕业于师大美术系，曾为前辈画家李梅树入室弟子。画风朴质写实，甚为画坛期待之优秀艺术工作者。惜在壮年期间遭遇一段创作空白时期，十年前归里后，除断断续续为吴浊流、钟理和、陈映真、王拓等小说做过封面速写外，作品日稀。长期来的退避社会，自我放逐生涯，诚为画界之重大损失。

我素来是极少夜梦的人。近日却总是在梦见耀忠的夜半，嗒然地醒来。初老以后，夜中醒过，则再也难于入睡。我于是想着竟于这个元月六日寂寞地死去的，我少小以来的朋友，吴耀忠。

就是几天前，我梦见我和他骑坐在故乡的，三莺大桥的栏杆上聊天。那情况，恍惚间，似是鬓发初霜的现在，又仿佛是剃着光头的，在初中上学的时代。大汉溪潺潺地流着。远处的溪埔上，在风中摇曳着一片褐白色的芒草花。而比芒草花一带更远的地方，便是那座青色的，有些飘渺的鸢山。

其实，我们就在这三莺桥畔订交的。四十年代后半，他从三峡，我从莺歌，考上了台北成功中学初中部。火车通学时都在莺

歌站上的车，这样认识的。

初二那年夏天，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到鸢山下的鸢潭边露营。他也来了。就着营边的篝火，谈了一夜，竟成了一生的莫逆。三十五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说过的幼稚的话；还背得我那时写给他的信中的，述说着少年的、青涩的梦的，无谓的句子。

高中，他考到别的学校，我们分开了一阵。等我们再聚，我已是外文系的学生，而他则是蓄着长发的，俊美英发的年轻艺术家，窝在补习班里准备学科，等着考进师大美术系。那个夏天，陪他考大学，在师大艺术先修班的榜上，他占了鳌头，我则陪在榜末。如今的韩湘宁、彭万壑就是他同榜的同学。

他勤奋、认真，而且疯狂地画着素描和速写，然后他开始油画静物和人像。进师大前，他就是乡长老画家李梅树先生的入室弟子。他醇厚、结实的写实底子和素描功夫，很快地吸引了师大美术系师生们的注意。他热情、狂热、浪漫而又反叛，我们开始生吞活剥地读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傲慢却又沸腾人心的中文本子。在那么早的时代，尹利亚·列宾就成了他心灵中重要的现实主义宗师级艺术家偶像之一。

那些年，啊，我和他共读过多少破旧的新书。读斯诺的《漫记》，使我们心中战栗、热泪盈眶；读艾思奇的《哲学》，世界和生活顷刻改变了意义，当我们偷偷地唱着中国大陆的新歌，有时竟而也使他感极而泪，不能终曲……

一九六八年六月，他和我失去了自由。七五年，我自荒远的岛上，他从看守所里，回到故园。等我长了头发，再度相见，看见他依旧俊拔、安静而炽热，却未曾注意到他已略有酗酒的倾向。

约八〇年以后，我和爱他的朋友们逐渐发现到他心中那至深不可自拔的废颓。表面上他日日醉酒，任性而又极度的虚无，但实际上他在对自己的许诺和失望、哀怨和愤怒的循环中不住地挣

扎，终至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完全放弃了自己，任自己在那深不可知的忧伤、绝望和颓废的恶流中，逐波而去。

革命者和颓废者，天神和魔障，圣徒与败德者，原是这样相互酷似的孪生儿啊。几个惊梦难眠的夜半，我发觉到耀忠那至大、无告的颓废，其实也赫然地寓居在我灵魂深处的某个角落里，冷冷地狞笑着。

多少伟大的艺术家，花费毕生的力气，与那生命中至大的废颓、厮打、搏斗以终。只是，那废颓于耀忠竟是那么庞大而不能胜，使他最后的十年间，无法创作，让时代平白失去了一个有前进的思想、结构的技巧和丰裕的人间性的画家。

啊，耀忠，如果你为之挣扎、喘息的，是一时代的虚无与颓废，但愿你把一切爱你的朋友们心中的黑暗与颓废，全都揽了去，让我们以代你走完你极想走完而未走完的路，作为对你的酬赏……

——一九八七年二月《雄狮美术》一九二期

四十年来台湾

文艺思潮之演变

一时代的思潮，就是一时代共同精神在思维上的表现，这思潮在表面上常常是由一个或几个人主倡，由一个或几个杂志、文化或文艺团体提倡，终至蔚为潮流。但究其实，一时代的思潮，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内外政治形势所制约。人和杂志，只不过是—时代社会、经济等条件上建立的上层结构的表现工具而已。此外，思潮有主要的潮流，也有次要的潮流。要全面理解—时代的思潮，就要兼顾主要的方面，也要注意次要的方面。

因此，在方法上，我注意这几个方面：

一、分期：把日本战败、台湾光复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整个日据时代当做一个阶段；一九四五年到朝鲜战争爆发的一九五〇年做一个阶段。这以后以每十年为一个阶段，如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一九七〇年至一九八〇年，一九八〇年迄今。

二、世界大事：注意每一个阶段中的世界形势，特别是与台湾的生活有密切关连的重大经济、政治事件。

三、台湾的大事：注意每个阶段中，在台湾重大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重大事件。

四、一般性的思潮：注意每一个阶段中，当代一般的时代风潮、精神，即一般的政治、文化、艺术各方面主要的主张、运动、

宣言等。

五、文艺期刊和团体：观察每一时期中主要的、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艺、文化甚至政治性期刊、团体。

六、文艺思潮：在前五项背景的烘托下，探讨每一阶段的文学、艺术思潮。

现在，我们先从日据时代谈起。

〔1〕一九四五年以前

世界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世界重大事件是西方工业帝国主义的勃兴，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日本资本主义在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向帝国主义飞跃，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等等。

台湾

在这阶段中，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在社会上展开台湾殖民地化改造。台湾士绅和农民，由武装抵抗发展为文化、政治的抵抗，抗日的文化、政治、文学和社会运动蓬勃展开。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当局收紧对台湾的支配，使台湾抗日的文学、文化、政治运动受到全面、强力的镇压，而日本当局所谓“皇国民”文学、文化和政治、社会运动在官方领导下展开。

一般思潮

这个时期的思潮，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皇民主义、日本帝国扩张主义、大东亚共存共荣主义等这些支配者一方的思潮。

另一方面，是和上述思潮对立的、台湾人民的民族抵抗运动。这包括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台湾传统文化、风习中落后部分的

批评，即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运动、反抗殖民地支配结构的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运动，等等。

最后，是与支配者思潮相互呼应的汉奸主义和投降主义思想。

文艺思潮

这时期的文艺思潮，可以分别为两种。

首先是皇民文学的思想，主张为了天皇体制，献身日本军事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歌颂“皇国”史观和皇民观，全力协赞日本侵略主义。

另外，当然是台湾在日据时代的抵抗文学思潮。在精神上，它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使自己积弱的封建主义，提倡旧社会和人的解放。当然，在“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日本战争支配体制的强化而受到强力的弹压。

〔2〕一九四五到一九五〇年

世界

二次大战中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结束了另一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

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并与十五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形成全球性“二体制对立”的基本结构。

一九五〇年，二体制对立下的第一次地区性战争——韩战爆发，使世界东西方冷战进入高潮。

台湾

一九四五年，台湾在五十年日本统治后重返中国的版图。台湾和大陆恢复自由往来。大批台湾和大陆的商人、知识分子、记

者、民众往返于海峡两岸。

四七年，发生“二·二八”不幸事件。同年，台湾的财政受到大陆影响而崩溃，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战争末期以来衰竭残破的台湾经济，更形恶化。

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当局播迁来台。一九四九年美国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坚定干涉台海事务，对当局转为积极支持和改造的政策，台海两岸的交通往来于焉断绝。

一般思潮

为日据时代的结束和“中国时代”的开始而欢欣鼓舞。主张透过学习和社会运动以革除殖民时代各种残余的奴化文化风习；主张热烈、迅速学习祖国中国的文化、语言、文学，政治参与风气和热情高涨。战争末期在日本当局强力镇压下的反帝、反日、民族解放分子、左翼文化人在光复后重新开始活跃，台湾的抗日激进传统开始复苏。

在次要思潮方面，有日政下汉奸残余分子的亲日思想，对光复后自己利权的丧失，耿耿于怀，并且发展成附日亲日的“独立运动”。

期刊·文学团体·文化活动

中文报纸纷纷出刊，在报纸上重又恢复文学版面和活动，介绍西方文艺思潮。杨逵先生主编《新生报》副刊“桥”，不但刊登一些优秀作品，也展开深刻的文学理论、文学路线和方向性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提出“新写实主义”道路，并且探讨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同一性和相异性。

有《新兴杂志》探索甫自殖民时代解放的台湾之“文化的前途”。

“台湾文化协进会”的组成，致力于排除台湾残存的日本影响，

积极学习中国文化。此外,《台湾文化》、《文化交流》等杂志,均在鼓吹民族团结、促成台湾文化、知识和社会的进步。

大量介绍中国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文学作品、作家和文学思想的文章,此时散见于各报刊杂志。

关于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活动,最近有叶石涛先生的劳作,刊于第十三期《文学界》。

文艺思潮

热烈阅读,学习中国三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是一个方面。在具体创作中,表现出干涉生活的、批评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因此在这个时期中,作品表现出台湾知识分子对“光复”后现实政治与生活的失望与幻灭,表现出对战后台湾社会无条理社会与生活的讽刺、批评。当然有些愤激的作品,表现出对光复和祖国中国的激烈不满与失望。

在创作理论上,提出了激进的“新写实主义”,主张在揭发和批评之余,提出对新历史与社会的希望。此外,在共同肯定台湾文学在日政时代反帝、反封建事业上的巨大成就上,对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做出深入诚恳的讨论。

日政下被抑压一时的台湾文学激进的、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传统,在这五年间,迅速地复活,并且热烈地发展。

〔3〕一九五〇到一九六〇年

世界

在这个十年中,二体制对立的世界冷战结构更形确立。台湾被编组到美国在东亚反共、防共前线,和日本、韩国、菲律宾形成围堵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大陆的前哨站。台湾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围堵社会主义阵营的岗哨。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复行视事，五二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在围堵政策下，美国成为资本主义阵营盟主，以军经援助扶持和恢复欧洲战后资本主义，重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此时美国资本、文化、技术的影响力，随美国防共安全军事基地遍布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世界各个角落。西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获得迅速之恢复、兴旺与发展。

台湾

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使美国对当局改取坚定支持的政策。五三年，台湾施行土地改革政策，推出“耕者有其田”条例，并逐步付诸实现，使台湾传统的地主—佃农结构发生不流血的根本改造，土地资本流入产业资本。同年，美国发表声明，废除“台湾中立化”主张，台湾正式成为西方“自由世界”反共、防共全球战略的一翼。

一九五四年，起草“中美协防条约”，五五年，条约正式生效。自此，台湾正式成为“自由世界”围堵“共产世界”的一个军事基地。美国的政治、军事、文化、文学、艺术，强大地对台湾发生影响。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国土分断、同族相敌、民族分裂态势，因全球二体制对峙而长久化。

六〇年，《奖励外人投资条例》公布，美国资本活泼地进入台湾的经济领域。台湾经济被组织到美日经济圈中从事生产及再生产。

另外，台湾内部展开反共肃清。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左翼文化人，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受到全面残酷镇压。

一般思潮

五〇年开始，台湾思潮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受到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向往与崇拜。冷战时代的精神体系在台湾产生广泛影响。

期刊·文学团体·文化活动

一九五二年，纪弦继《战斗文学》之后，创办《现代诗》，倡导法国象征主义波特莱尔以降的现代主义诗作。

一九五四年，另外一个重要的现代主义诗刊《创世纪》发刊。同年，保守的、避世的浪漫主义诗刊《蓝星》创刊。这诗刊虽不取五十年代美国现代主义，但主要宗法十九世纪英美浪漫主义传统和二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诗风，但逃避现实生活的性质，与“现代？”同。和三〇年、四〇年发展下来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有基本的隔绝。

五五年，在绘画界里，同时成立了两个现代绘画画会：“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鼓吹抽象的、现代派绘画。五七年，“五月”画会开第一次画展。

一九五七年，以钟理和为首的台湾乡土作家刊行油印刊物《文友通讯》。

一九五七年《文星》创刊，逐渐主张全盘西化。

一九五九年，主要师法现代主义的《笔汇》出刊。一九六〇年，以台大外文系学生为骨干的《现代文学》出刊，提倡现代主义文学。

五九年底，美式自由主义政论刊物《自由中国》发刊，对当局政治、社会和文化诸问题提出尖锐批评。

文艺思潮

一九五〇年，一个全球反共的、冷战的时代开始。左翼的、激进的，经中国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发展下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思潮，在这个时代中受到全面压制。代之而起的，是个人主义的、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只描写个人内心葛藤、不涉及人、生活、社会和劳动的现代主义勃兴。于是模仿西方的，输入的文学大量产生，和过去批判的、干涉生活的、改造世界的现实主义文

学，恰成尖锐的对比。

在创作上，晦涩的、暧昧的、不关心人和生活的现代派，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诗、文学、音乐和绘画代兴，蔚成显学。

但在这个时代，有两个支流。一个是官式的反共抗俄战斗文艺。

另一支流，是所谓“素朴的现实主义”，这素朴的现实主义是由台湾农村中的文学家展开，描写农村中身边的人生，但它与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新现实主义”之不同，在于前者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指导。那便是由钟理和等作家默默耕耘出来的一个重要传统，这是不应该受到研究者忽视的。

〔4〕一九六〇到一九七〇年

世界

越南战争在法国奠边府一役战败后继续深化，由美国介入在越南的反共防共战争，终至于美国在越南的败北。

在富裕的西方六〇至七〇年，美国、法国、日本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大规模的反乱，以反越战，反对对黑人种族差别主义，教育改革反帝国主义、促进言论自由运动等问题，展开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

日本和西德在美国扶持下，重建了各自的战后资本主义，因而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产生微妙的矛盾。在共产圈中社会主义各国以苏联为中心的“独块岩似的团结”开始龟裂，各弱小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摸索适应各民族具体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苏在理论上的争执，欧共理论的发轫、资本主义社会内左翼政党的向右回旋，新左派理论的展开……都说明“社会主义世界体制”之变化。

另外，在这十年间，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各国和地区取得了形

式上的政治“独立”。但是，由于前西方殖民主义在各新兴“独立”国中的巨大残留与支配，使第三世界各国为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所做的斗争，更趋激烈。战后觉醒的民族主义，在韩国造成反日本—李承晚体制的风潮。日本也掀起反“安保条约”的斗争。在菲律宾、印尼，一个本土化文学、文化、政治运动，在一九七〇年展开。

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中国和世界以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上，一九六〇年和一九七〇年间，西方资本主义享受了另一个十年的繁荣和发展时期。

台湾

土地改革基本上成功。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使台湾的经济在对美日依赖和基地社会这两大特质上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一九六三年“经合会”成立，积极展开外资的诱致。六五年，美援创造“具有购买力的台湾社会”的这个政策基本上形成，停止美援，改以民间投资形式，使美国资本向台湾输出。同年，加工出口区条例通过实施。台湾正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加工出口码头，与香港、韩国、新加坡一样，为美国扶持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再兴，做出了贡献，同时“发展”了自己。又同年，日本对台贷款谈判展开，日本资本向台湾输出，并形成台湾在进口上对日本的深远依赖关系。

一般思潮

一般而论，一九六〇到一九七〇年间，台湾的主导思潮，依然是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的延长。即个人主义，再加上现代主义。对美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表示崇拜。在政治上，推崇美式民主自由的《自由中国》杂志，展开战后五十年代以来第一波民

主化运动。《文星》杂志也代表台湾第一波中产阶级西化论和“现代化”论。于是“中西文化论战”展开。

但在一九六五年左右，台湾产生了一个文化和艺术上的反省运动。这反省运动的规模并不大，但有不能忽视的意义。

首先是民歌采集。由史惟亮和一向搞“现代音乐”的许常惠进行了两次调查和采集。可惜成果一直未见公布。在电影方面，《文季》同人和李行导演，搞过一个回顾和检讨会，但效果并不显著。这反省运动，来自台湾经济空前发展后，台湾中产阶级之兴起，对自己产生了一定的自信后，开始停止机械的向西方模仿，开始检视走过的道路，并开始向前瞻望。

期刊·文学团体·文化活动

一九六〇年《自由中国》被禁。发行人雷震投狱，同年，台大外文系精英创办《现代文学》，从事西方现代文学的介绍和自己的创作实践。

一九六一年，崇美/反共/自由主义的“西化论”知识分子，向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系统的知识分子挑战的中西文化论战展开。一九六五年，《文星》禁刊。

一九六四年，集结了台湾“素朴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们创刊了《台湾文艺》。同年《笠》诗刊公刊。

一九六五年，现代派戏剧杂志《剧场》公刊。另外，鼓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杂志《前卫》、《这一代》也在这一年公刊。

一九六六年，《文学季刊》创刊。同年，标志了台湾现代派文艺活动最高潮的“现代艺术季”展开。

一九六七年，创世纪的《七十年代诗选》出版，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九六八年《文学季刊》休刊。

一九六九年《创世纪》诗刊暂时休刊。

一九七〇年，唐文标写成《现代诗的没落》一文，可惜无处发表。

文艺思潮

在这个时期，台湾现代派文学发展到它的烂熟期和顶峰，同时暴露出它的许多严重缺点。现代派文学至此成为少数人的文字游戏，和广大社会与民众完全脱节，也与近、现代汉语文学的坚实传统剥离。六〇年末，许多重要的现代诗人停笔。各方面的迹象，都说明一个较为全面的反省运动等待着开展。

《文季》同人开始回顾与反省的探索。民族音乐的提起，因台湾民歌的采集而展开。

这一时期，“素朴现实主义”继续发展着。

〔5〕一九七〇到一九八〇年

世界

经过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两个十年的全球性景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空前的发展，产生大众消费社会的时代。但污染、生态破坏、人性疏离问题也空前严重。环保运动、反核和平运动及消费者保卫运动等，在世界各地展开。

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出现。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发挥了资源民族主义的威力。世界资本主义的资源浪费问题被彻底揭发。

一九七〇年以后，在世界二体制对立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长期化的停滞膨胀，过去二十年间所见快速巨大的成长时代终止。

七十年代，是战后世界冷战体制的重组期。联合国内第三世界国家成员快速增加。杯葛以美国为首的先进国议案。

在中国大陆，毛、周相继去世后，向邓小平时代过渡。七十年上半年，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相继承认中共，台湾海峡和平构造初步呈现。

越战结束，美国进入疗伤的时代，从而开始了长期的自我保护和保守主义时期。

台湾

一九七〇年，因为钓鱼岛事件，美洲和台北的知识分子展开保卫钓鱼岛运动。战后一代香港、台湾留美学生、大学生、知识分子，第一次因反对美日帝国主义对我国主权领土私相授受的政策，掀起反帝民族爱国运动。

一九七一年，保钓运动变化为“统运”，并且在阵营内部发生左右分裂。在台湾，以《大学杂志》为集结点的知识分子，参与改革运动，不久也发生分裂，并因遭受压抑而溃散。

一九七四年，台湾经济发展达到巅峰。同时，因为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七五年，台湾第一次出现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台湾经济自此进入停滞性膨胀，成长相对性缓化。

一九七一年，在全世界冷战体制重组下，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七二年，日本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共。同年，尼克松、基辛格访北京、美国与中共的交往开始解冻。此后，世界上亲美国系统国家纷纷转变外交承认，台湾的外交、政治、社会各方面，受到强大的冲击。

一九七四年，美国片面废止“台海决议案”。

一九七五年，党外新生势力继上一代而起。以《台湾政论》为集结点的中生代党外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开始发展。一九七六年，宜兰发生拥护郭雨新群众抗议选举不公事件。一九七七年，中坜事件发生。一九七八年，美国承认中共。“中·美协防条约”自动废弃。一九七九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决议案”。

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〇年，对于台湾，是战后第一个考验期。在短短的十年间，台湾面对国际性政治、经济局势变化的冲击，但基本上以过去二十年经济的实力，安全通过考验。

一般思潮

长年来信赖美国、信赖西方的思潮开始动摇，右翼进步情绪和台湾分离运动中“革新保台”以抗共防共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保钓爱国运动鼓起民族主义情感，也激起改革图存的知识分子运动。但这运动又因体制派改革论，分离派改革论与民族统一论间的龟裂而相互抵销。

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经济成长趋缓、台湾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开始大举向美国脱产移民。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的不安全感，至此尤为明显，种下八十年以后大企业恶性倒产脱逃的伏因。

一九七九年，高雄美丽岛事件发生，台湾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因急躁化而一举溃灭。

期刊·文学团体·文化活动

一九七〇年唐文标写成《现代诗的没落》，要等到一九七四年才发表。

一九七一年，具有改革意识的《文艺双月刊》创刊。同年，唐文标写《僵毙的现代诗》，但未发表。

一九七二年，香港的关杰明以英文发表了两篇批评台港现代诗的论文，经中译后在台发表，激起“现代诗论战”。在论战中，批判了现代诗的个人主义、形式主义，也批判了现代诗的晦涩，无民族风格，积极的提出文学的社会性和群众性，提倡以平白可理解的汉语写作，并主张文学的民族风格。在这一场论战中，现代派理论受到彻底的批判，从此进入它的衰退时代。

政论杂志有《台湾政论》、《这一代》、《美丽岛》，鼓吹民主化、自由化运动。一九七六年，《夏潮》创刊，鼓吹对美日帝国主义批

判，初步展开台湾自己的革新的文化批判运动。

“乡土文学”论战展开。官方文学集中对尉天骢、陈映真及王拓、杨青矗展开点名批判。但论战于一年后急速停止。这次论战，基本上是四年前“现代诗论战”之延长。但因政治的介入，使这论战较广为人知。

文艺思潮

七〇年，台湾文学界的思潮，继五〇年的重大丕变后，至此又有一个基本的变化。五〇年台湾文学从生活干涉的现实主义转变为不涉生活与社会的现代主义。到了七十年，由于外部危机，文学思潮急速地向社会关怀、平白易懂，民族风格的现实主义转变。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至此开始迅速衰退。

在创作实践上，新的现实主义诗风开始发展。

〔6〕一九八〇年以后

世界

在八〇年以后，世界一仍延续七十年代的情势发展。国际资本主义仍然在长期停滞膨胀中，成长缓慢。到一九八五年，世界景气继续恶化，各先进国成长率下降。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美苏二次冷战展开，世界再陷紧张。

中共自一九七八年后采取向世界资本主义开放的政策，使二体制对立的形态模糊化。以一九九七年为期限，香港将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正式纳入中共行政范围。

一九八八年，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推动美苏和解，第二次冷战暂趋缓和。

台湾

在世界性景气停滞下，台湾经济成长趋缓。到了一九八五年，

景气急速恶化。大企业恶性倒闭，资金以脱产、经济犯罪方式流出台湾。

公害问题严重化。社会、政治及经济伦理开始动摇。党外运动有表面的发展，一九八六年新党成立，但立刻落入分裂、无力感和不动员症候。一九八七年国民党解除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并允许大陆探亲，战后台湾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工党”成立，一九八八年元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后，蒋经国时代结束……

一般思潮

在大众消费社会的逸乐风气下，隐藏着不安与苦闷。对整个局势的方向性不明的情况下，有普遍的无力感和苦闷感。因冷战结构之再编，民族分离主义言论和运动做历史最后的冲刺，台湾自决独立论在岛内达到战后的高点。同时民族再统一运动亦审慎集结……

期刊·文学团体·文化活动

党外杂志大量出现，但迅速商品化，失去社会指导性格。《文学季刊》于一九八三年复刊。联合报系的《联合文学》在一九八四年创刊。《台湾文艺》于一九八三年改组，有政治化趋势。一九八四年初《夏潮论坛》革新版出刊，但于年底被勒令停刊，统独争论以小规模展开。一九八四下半年开始，党外杂志企图冲破国民党的言论禁区，大量报导“政治内幕”，一时蔚为风尚，各种政论“周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民党随即收紧言论尺度，大量查禁、停刊党外政论杂志，至一九八五年底，言论市场已呈萧条之状。一九八七年，戒严令解除，言论呈战后相对自由化之高点，革新派社会学在少数学生中浸透。环保运动、工人运动，拟似怠工、罢工、其他各种性质的居民运动蓬勃发展。大陆开放后大陆文学、艺术、学术，在四十年禁断后首次在台湾文化中出现……

文艺思潮

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美国与中共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台湾地位问题日趋敏感。统一、独立的问题，虽然无法完全公开讨论，但在暗中形成一种日重的焦虑，也等比例地反应在台湾文学思想界。

在文学上，一向处于暗流的素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八十年代涌现为表流，并与党外运动产生比过去更显著的结合。“台湾文学自主论”，——即强调台湾文学“独特”的历史与个性及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分离性的“台湾文学论”，自此以比较公开的方式提出。

另外，主张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台湾文学应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第三世界文学的连带而发展的理论，和台湾文学自主论形成对立。

此外，与台湾大众消费社会的发展相应，一种新的通俗文学也逐渐发展，使通俗文学与纯文学间的界限，显得模糊化了。

最后，由于长时期以来台湾在文化与思想上的贫困，使台湾文学的发展因为这内容的贫乏化而受到严酷的阻碍。处于重大转变前期的台湾，也因为思想的贫困，使党外运动也一如文学一样，无法提供结构性的、前瞻性的指导作用。无力感、焦虑、不安、不动员症，成为当前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点。

此讲稿于促迫间形成，许多资料上和分析上的错误或不足，有待继续订正与补充，并请专家批评指教。作者，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华杂志》二八七期

一九八八年作者再校订增补

肃穆的敬意

六月十一日，我因为应一个韩国的文学研究团体之邀约，飞到了汉城。而于今举世闻名的韩国“六·十”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却在六月十日开始。

汉城成了终日弥漫着催泪瓦斯的城市。做为一个局外人，看别人的民主运动，总觉得是别人的内政。但韩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却在我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是六月十几号的傍晚，我已记不真切。我参加了汉城著名的明洞天主教堂特别为韩国的民主举行的大弥撒。参加聚会的信徒和市民人数，据新闻管制严格的次日韩国一份英文早报报导，就有一万五千人。弥撒结束，这一万五千个信众和市民，都点燃预先发给的蜡烛，重重复复地唱着一条温柔动听的歌，流向戒备森严的汉城市，各自归去。我问身边的韩国人：“这首好听的歌不像赞美歌……”

“不。这不是赞美歌。”韩国人说，“这是我们韩国人人人爱唱的一首歌。”

“歌里唱着些什么呀？”

“这首歌不断出现的歌词是：‘我们心中最深的愿望，是祖国的统一’。”

听着那万人齐唱温柔地祈祷着似的歌，我的眼眶热了……

一八六六年，美国的海盗洋舰“夏曼将军”号，自海溯韩国大同江而上，侵入韩国。平壤监使派出使者找美国人交涉，要美国人从速离境。美国人把来使杀了，炮轰大同江沿岸。

愤怒的韩国人用装满了火药、硫磺的小舟，自杀性地朝夏曼号撞去。洋舰起火，美国的海贼纷纷跳河求生，竖起了白旗，韩国人把纷纷投降的美国人一个不剩地砍了头。

不久，英勇的韩国人民也击退了另外两艘侵犯祖国的美国船。一八七一年，美国太平洋舰舰队罗哲斯率领六艘火舰，炮轰韩国江华岛。抢滩登陆的美国陆战队被夜间猛袭的韩国农民击退。在韩国历史上，称为“辛未洋扰”。

一八六六年，法国东洋舰队也攻打过这江华岛，韩国人召集打虎的猎户组成部队，打退了法国陆战队。

这是我的友人朴君告诉我的，韩国的一段历史。

在整个当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全面对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残暴、贪婪的武力屈膝；当着当时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帝国在一八四二年签下耻辱的南京条约，韩国人民却独立胜利地打退了来犯的，坚船和利炮的帝国主义。

如果一九一〇年，韩国人民当着日帝的锋镝为民族的独立蜂起的“三·一”运动，是韩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端，“辛未洋扰”前后韩国农民智勇击退来犯之夷的历史，也是韩国现代民族运动史上极为光荣的前史吧。

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韩国分成南北两半。

在台湾，国土分断，几十年来，当局、人民、知识分子不但习以为常，而且朝野双方的政治势力，都或直接、或间接；或无心、或有意，承认甚至促使台湾和中国的分断的永久化。但我在韩国短短的数日，却具体感受到韩国人民对国土分断，民族分隔所抱持的、尖锐的伤痛的心情，感触至深。

“韩国人民是一个单一的民族。目前，我们的国家被分成两半，是外国势力强加于我们的。国家的分断，对韩国人民而言，是一项重大的国耻！”一个年轻的学生，在到处飘着催泪瓦斯气味的、凉爽的汉城市里，这样对我说：“我们必须很快统一。否则，长此以往，韩国将永久分裂成两个国家……我们不许可这样的事发生。”

体制有异，生活水平不同，具体上，怎样统一呢？我发觉我问了一个我在台湾最耻于发问的问题。

那戴着白色口罩的、年轻的学生，困难地思索着。他不是很确定地谈起别的韩国学者说过的“联邦制”、“一个国家、两种体制”这一类的话。“具体上，我还不知道。目前，我们不能公开讨论国家统一的方案。”他说，“但，不论如何，韩国一定要统一起来。”

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坚毅而略为焦虑的，年轻的眼神。

“我们韩国一定要统一起来。”这样的全民族的愿望，俨然有它知性上的构成。韩国知识分子的统一论，大抵上都认为：

（一）韩国的分裂，是东西对峙的全球战略要求强加于韩国民族的状态，非韩人所意愿。

（二）在此“分断构造”下，南北双方，都为了屈从于各自所属“阵营”的逻辑，从而民族自相敌视、自相残杀，使民族的创意和生机无从健全发展，歪曲了自己民族的社会、文化、知识……的正常发展。

（三）国家分断，只有利于韩国民众的敌人。只有一些“外国势力”和国内有力势力，在祖国的分裂构造中得以独占庞大的利益。对全韩民族，却造成重大不利。

（四）韩国人民应该尽一切智力和创意，克服东西对峙的结构，在真实的、有韩国民众做基础的民主主义下，为了韩

国民族自己的利益，使南北双方重新自主统一起来……

这些是韩国学生、神父和文化人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向我叙说的话。

有一回，在汉城市中心的街角上，在鼎沸的示威声中，我和几个延世大学的同学聊了起来。我说起，在台湾，有些人不但不愿意民族统一，甚至主张台湾和中国永久分裂。有一个同学安静地说：“这样的想法，很可耻吧……”

从过了六月十五日还很凉爽的汉城，回看故乡台湾，感觉到一九五〇年之后成为美国全球大战略中的政治和军事之一环的台湾，在韩国人所说的“分断的构造”下，产生了台湾历史所不多见的，否认和弃绝中国历史和中国认同的中国人的存在的荒谬。这恐怕是国家长期分裂下所产生的政治、文化、社会 and 思想上的歪扭中的歪扭吧。

相形于早在七十年代就开始摸索着克服“国家分断”下民族、文化和社会的歪扭的根源，并寻求超克一切的困难，以实现祖国的民主化统一的韩国，台湾的“统一派”就不免太用功不足，太懒惰了……

怀着受到深刻启发和教育的感激，我离开了汉城，心中激荡着对这个勇敢而光荣的民族的肃穆的敬意……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华杂志》二〇八期

你所爱的美国生病了……

两年来，美国从对台湾强销烟酒开始，对我们展开了对美输出产品限额；强迫台币对美元巨幅升值；施用压力使台湾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和取消台湾的贸易最优惠资格。

美国忽然从一个富有而慷慨的老大哥，变成锱铢必计的酸表叔。事实上，这一连串的找碴、计较，说明了美国自身无法抑制的、庞大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不断高筑的外债；一直无法改善的失业；劳动意愿的滞退；生产效率的低下；治安的恶化和社会道德体系的动摇……这些问题的严重化。

罹患先进国症候群

美国的这些社会经济的症候，是暂时的不适，还是从此沉痾化，目前还很难诊断。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症状都已显明地告诉我们：美国生病了，病名是“先进国症候群”。

通货膨胀、经济成长的迟钝化、政治指导能力的疲乏、社会犯罪率的增加……这些症状，也出现在西德（一九八〇年后）、意大利（一九七〇年后）、法国（一九六八年）和荷兰、瑞典诸国。

紧急措施无力挽回

正如同样的疾病会因病人不同的体质而有同中之异的症状，“先进国症候群”也因各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有“美国病”、“英国病”、“法国病”、“意大利病”……的差异。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革命”，使法国工资以高过法国工业生产力的比率增涨，从而丧失了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七十年代，法郎受到投机操作的压力，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失去了它坚挺的魅力。其他荷兰因暴增的油钱而使荷币币值高扬，对于荷兰经济基干的输出产业带来了十分沉重的打击。举世闻名的瑞典社会福利支出，使瑞典的生产劳动纪律大为松弛；伦理结构的崩塌；人生目标的丧失；酗酒的普遍化和人的异化的深刻化，成为“瑞典病”的重要症候。

当然，也有人把政治上高度独裁，外债高筑，经济停滞这些共同症状，称为“落后国病”。我们也不能忘记，使全世界至今深受其苦的霸权主义，军备竞赛、核能、核武器的独占、扩张与威胁，新殖民主义……这些世界性的疾病。

但世界上最先罹患严重的“先进国症候群”的国家，便是大英帝国。

英国分别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七年三次发生英镑的重大危机。英国政府，在每次发生英镑危机时，即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但是终于也无法解决英镑危机背后的这些原因：国际收支的巨大赤字、英国经济的通货膨胀体质，以及整个英国工商产业的衰疲不振。

崇拜情结根深蒂固

有些搞英国研究的人认为，英国的疾病，源于它对国民“从襁褓到坟墓”期间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重大支出；高度社会福利体制下个人劳动意欲的低落；强大的工会为了在通货膨胀中强力要求提高工资，不断进行同盟罢工等等。事实上，第二次大战之后，英国在全球辽阔的殖民地和属国纷纷独立，国力在二次大战中的重大挫伤，使它在战后东西二体制对立的全球性对抗中，无力压抑她的各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遂拱手把反共、压制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警察任务交给战后年轻的新贵美国；以及在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二十年巨大景气中，因资金贫乏，在急速的生产技术变革和管理技术的变革中，严重落后，没有赶上全面振兴英国战后资本主义的列车……更是使这一度太阳不落的帝国，走上了没落的道路。

如果说今日美国已经走向全面的没落，也许为时尚早。一九五〇年韩战，我正好是小学六年级。回想当时以迄六十年代末叶，美国在台湾的形象，不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极为高大而闪亮。这高大闪亮的形象，其实在意识形态上一直深深地渗透到台湾知识和文化结构的深层部分，至今朝野双方，都还浸淫在某种“美国—父亲崇拜”的错综情结之中。四十年来，台湾对美国霸权的文化、思想、知识和政治的批判之惊人的阙如，就是个很好的说明。

挥去阴影自求发展

台湾朝野的“美国—父亲崇拜”，和美国在“先进国症候群”

中喘息，以及台湾近二十五年间取得的“依赖性——专制性成长”所带来的富裕化，其间造成了某种尴尬。以不伦的比喻来说，这就仿佛一个到城市赚了钱的儿子，对于在乡下荡尽田产的严苛的父亲之间的矛盾。

台湾需要发展出一个比较正确，比较有民众主体性的美国论。不从文化和历史的各个方面，清算在战后冷战结构中化石化了的“美国—父亲崇拜”情节，中国的民族团结、民族和平和民族的自主的发展，就无法大踏步地展开。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自立晚报》“文化论坛”

作为一个作家……

……大家可以一起高兴、一起悲伤的社会，已经逐渐没有了。人失去了爱的力量、失去了关心的力量和愤怒的力量，甚至于失去了反叛的力量。人的向度越来越小，越来越不自知地成为单纯的“消费的机器”……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块儿聊聊的题目是：“作为一个作家……”

青年人心目中的作家形象

今天在座的青年，大概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后期出生的朋友。你们这一代的整个生活内容和成长的过程，跟我这一代比较，有极大的不同。因此，恐怕你们对于“作为一个作家”的形象，也停留在与我们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上。

在我们的电视剧里，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是潇洒、漂亮，头发长长的，性情浪漫，身材瘦瘦，有点苍白。男作家有很多女朋友，女作家有很多恋爱故事。他们经常带着宽边眼镜，在书房里一边抽烟或烟斗，一边看着窗外的月亮，低下头写两句，再看看远方的星星，低头再写两句。电视剧里的作家，大概是这种形象。总之，作家在你们这一代的理解中，是非常个人的、令人羡慕的、受到社交圈欢迎的、受到异性倾慕、生活多彩多姿的人。一

般人对作家总觉得有一点神秘，而且带着一点羡慕，或许因为这样，才会有那么多人报名参加这个文艺营。

大概作家有时也个别地会有这种形象；可是我们民族所需要、所要求的作家，恐怕离这有一定的、极大的差距。现在，我们先来谈谈，当我们的社会相当富裕化以后，文学所面临的问题，然后再进一步讨论，我们所需要、所要求的，是什么样的作家。

消费文明堆砌的台湾社会

目前，台湾的社会，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极大的变化。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地方，以“省”的范围，在短短的时间内，生活变得这么富裕，经济变得这么发达。我们的社会和人，因此也经历了我国社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变化。简单地举几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有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因此我们可以生产远超过台湾省人民自然的需要的产品。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非常富足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

圣经中所记载的财主，每天去开他的仓库，数数仓库里的财货，然后心满意足地说：“感谢主，我有这么多东西，实在很好”，然后关上仓库，以丰富的屯积为快乐。今天的资本家们不会这样了。当他生产了这么多商品或产品时，他一定要想尽办法卖出去，才能换成现金，然后利用这些金钱从事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于是，商品在某些地区便逐渐远远多出我们人类自然的需要，资本家也势必用很多方法来销售这些东西——这就是所谓的“行销”的工作。

行销管理（Marketing Management）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在创造超乎人类自然的，对于商品的欲望。肚子饿了想吃，身体冷了想穿，这是人类自然的需要和欲望；可是光是这自然的欲

望,已经不够来消化今天的生产方式所生产的这么多过剩的商品。因此资本家设计出很多方式,来创造或复制人的欲望,使欲望尽量扩大,超出自然的需要。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文化里整个看到的现象。各种形式的广告或商业广告影片,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对中国人来说,吃口香糖这回事,根本没什么传统,也没具体的利益。可是,我们的资本家,就知道怎么把口香糖推销出去。他们找到一群广告人、行销人一块儿开会,一起工作,研究出怎么样制造吃口香糖的需要。也许他们先做界定,吃口香糖的人口应该是十六岁到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就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像我这种年岁,很少会没事嚼口香糖的),以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为对象,按照你们的需要、情调、行为习惯……来制作广告片。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广告片:一大群年轻人在迪斯科舞厅跳舞,以快速的旋转的镜头来表现现代的、年轻的节奏感,配上大家熟悉的迪斯科音乐,然后以特写镜头,以几乎占满画面的方式来表现嚼着某一牌子口香糖的嘴唇。这片子播了一两个月以后,你们便会觉得某品牌口香糖代表着年轻、快乐、自由、奔放,觉得跳迪斯科一定要一边跳一边嚼口香糖才够正点,下一次到跳舞的时候,一定会在门口买一包那种牌子的口香糖。就这样,几万条、几十万条的口香糖就销出去了。

同样的道理,在杂志、传播媒体、连续剧,甚至电影里,不断地堆砌着一种文明,那就是大众消费的文明。在大众消费的文明里,人们以一个人拥有的商品的数量与品质来判断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你的房子好不好,你有没有车子、家中有没有各式各样的家电用品,或者你有没有很多现钞来拥有这些如山如海的商品。凡此种种,变成了一般人用来评定一个人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地位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总之,在大众消费社会里面,有些前所未有的情况便发生了。

第一个变化便是：人类欲望的空前解放。在过去，欲望是一种令人羞耻的东西，一件尴尬的事。如果一个人整天只谈吃的穿的，人家便觉得这人没什么长处。如果读书人谈什么东西好吃，什么地方的什么东西好玩，知识分子便会觉得不齿。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今天，欲望非但不是一种可耻的事，反倒是正面的、有成就的表现。现在很多人，一碰面便先摸摸对方的衣料，看看他的鞋子是什么牌子，而且这已成为自然而普遍的现象。这样的社会，人逐渐以“消费”做为一生最大的目标。人生最大的职责、生命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消费。每个人拼命上大学，上大学之后拼命找好工作，找到好工作之后，在公司拼命寻升迁之道，然后逐级上升或跳槽，接着准备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分期缴一幢大房子。买车、买各种家电产品，各种带来舒适的产品。在不知不觉当中，人的一生中最有创意的时光就流逝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儿女也长大了，然后他说：“好吧，我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而下一代又走着相同的路……

我想，在长久的人类历史当中，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的我们这样，只把一生的目标定在短短的几十年，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拼命地去追求物质、名望、地位，这样过掉一生。人的向度（dimension）变得越来越小。记得我小时候，邻家偶尔接到一封寄自三重埔的信——原来那个曾经浪荡的孩子写信回来，告诉他母亲，他已经学乖了，在一家工厂做事，跑外务，也有了女朋友，准备过些时候带她回家给阿母看。这样的一封信，可以惊动左邻右舍，大家争着来看信，跟这家人一起欢喜，说：“你们家的阿财总算浪子回头了。”不识字的老阿婆也一边听着人家读这封信，一边高兴地流泪。像这种大家可以一起高兴、一起悲伤的社会，已经逐渐没有了。人失去了爱的力量、失去了关心的力量、愤怒的力量，甚至于失去了反叛的力量。人的向度越来越小，越来越

越不自知地成为单纯的“消费的机器”——一种制度化消费的工具。人每天看杂志、电视、各类节目、广告，不自觉地追逐于各式各样的财货与物质当中，胡里胡涂就过掉一生。

我看到许多大学刚毕业的年轻朋友，他们才一毕业，就不知不觉地对这个社会的消费行为发挥惊人的作用，影响社会的知识、选择、价值和风尚。他们才毕业不久，到各种期刊杂志社去工作。比如说一些女性类的刊物吧，这些年轻的“编辑”们，便在杂志上东抄西凑写文章，告诉读者：人应该怎么过活、先生生日时做太太的该怎么去挑选领带做为礼物、夫妻的关系应该如何、父子的关系应该怎样，应该怎么布置客厅和卧室，目前流行的衣饰是什么，应该听什么唱片，应该怎么化妆，怎么跟人家沟通交往……其实，这些年轻的记者对这些问题大部分是一知半解的，甚至于我们成长的身体，生理与心理的问题，也由这些半生不熟的年轻人东抄西抄地凑成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他们也影响了多数人对衣服的趣味、居住环境的趣味、商品的选择、对人生的价值判断等等，也“创造”了一大堆像“单身贵族”这类的名堂。当我发现这些事情时，非常惊奇。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或人生的历练都还不够成熟，可是他们变成了影响整个社会该听什么歌、该看哪一种电影、该买什么东西送给你丈夫或男女朋友的一群人。他们甚至告诉你，当你的婚姻关系有问题时该如何解决，父子关系应怎么调整，人生应该如何才对等等。这些重要的事情，竟然由二十几岁的女性或男性在操纵，实在是非常奇特的现象。

文学丧失了梦、意义和理念

这种情形，表现在我们的文学里面，就成了人的意义的丧失：当一个消费社会形成，人变成了消费的机器或手段，人生的意义

和理想就逐渐丧失了。因此，在我们的文学里，也整个丧失了梦；丧失了意义和理念。我记得《人间杂志》曾对于台北市西门町那些“新种族”做过一次粗糙的问卷调查。结果连我这自以为对年轻一代有一点点理解的人，都大吃一惊。我们以一百多份的问卷，问这些年轻人人生最重要的理想是什么。我们小时候，总是说我将来要做将军、医生、工程师、文学家、音乐家、舞蹈家……现在，一百零几份问卷里，只有一个女生，说她想要当法官（这还不排除一种可能的理由：或许她叔叔当法官、以至于家里很有钱，所以她立志要当法官）。但所有其他的人生最终极、最高的目标，就是：多财、快乐、幸福、享受。没有一个人说他将来要当工程师，或文学家。在他们看来，人生最大的成就，就像电视节目那种企业管理阶级，会议一开，一决定就是几百万钞票，出门就有车子，住的是客厅有一般家庭五倍大，当中还有一道楼梯的那种房子。在电视的影响下长大的孩子，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从很小便丧失了自己的梦想。我们这一代年轻时还比较不一样，还想过要当律师、当画家，慢慢到了四十多岁才逐步放弃因为现实生活上的限制而无法达成的梦；可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却从小便开始放弃梦想。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大的危机。因为文学一旦失去了梦、一旦失去了 vision（憧憬、希望），文学就要从它的根部枯萎了。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西方世界的文学或电影，题材上无非表现人在生活里的极端的无聊（bore some）。个中人物在奋斗一生之后，忽然不知自己要干什么。他们感到空茫、空虚，跟邻人的关系、夫妻间的关系，一切都是空的，有一大堆时间，不晓得如何打发。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人生中蛮凄惨的处境。

我曾经读过这样一本小说：主角奋斗了半生，到了五十几岁，什么都有了，却忽然觉得他跟妻子、儿女、部属、邻人，完全没

有了关系。他的儿子当嬉皮，假装进步地骂他是“一头资产阶级的猪”；太太原来十几年来也另外有个男朋友。他发现表面上忠心耿耿的部属，原来就是在背后搞他，终于取代他位子的人。到最后，他感到一切极端孤单，连自杀都提不起劲。很多现代西方的小说、文学、电影，都表现了同样的题材：爱的不在、意义的不在，甚至连性的描写都非常枯燥无味。社会因工业化人口集中，人越来越多，上街都摩肩接踵，可是每一个人最深最深的内里，却非常的孤独。人在旋转不断的消费社会中，变得完全失落、空虚、无意义。这也是所谓先进国的进步社会中，文学与电影极普遍的题材。每年国际电影节中，法、德、美、日的电影，最常见的正是这样的题材。那种痛彻心肺的孤单，那种像 T. S. 艾略特 (Eliot) 诗中那种“荒地”的感觉，变成了今天物质进步的社会共同的疾病。

“文化”彻底被商业利用

再者，人类也从未曾像今天，让资本主义利润动机渗入人类几千年来不曾让商业主义、物质崇拜触及的领域。在过去，朋友之谊、父子之义、夫妻之情，或者宗教的信仰、艺术、文学、哲学等领域当中，钱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可是今天，商业却非常彻底地影响了精神领域。一方面，商业的渗透力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文化和知识、技术，非常彻底地被商业所利用。

以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式的广告，就算是不错的广告了；今天的广告却十分细致，甚至连我都不得不欣赏。以洗发精广告为例：台湾的洗发精广告，变来变去无非是：一个头发漂亮的女孩子甩头发，然后用慢动作表现秀发飘逸的样子，然后再以近摄镜头，告诉观众，这种洗发精含有“蛋黄质”什么的，对发

质有特殊的保护作用等等。最近的洗发精广告，干脆不告诉你某种品牌的洗发精对头发到底有什么好处。它不卖成分的好坏，它卖的是一种 mood，一种气氛，一种感情、一种认同、一种调调儿，一种感觉……比方有一种洗发精，以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少女为诉求对象，它的广告影片便出现以下的画面：一个大约十八岁的女孩在课堂发呆，老师走到她面前，她才猛然惊醒/她接到男朋友寄来的情书，高兴得不得了/在电话里和男朋友吵架，一气之下，电话也不挂，任由话筒悬在半空摆荡/另有一个傻里傻气的男生想追她，她心烦，便一个耳光甩过去/最后出现一瓶样子很奇怪的洗发精。

这个广告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洗发精，是你我这个谈恋爱、上课不听老师讲话、写情书、跟男朋友吵架的年纪的“我们”所专用的洗发精。你也不管它是不是洗得干净、有没有“蛋黄质”，反正就直觉地认为这种洗发精好棒。下次就告诉妈妈：“妈，我要买××牌洗发精”，结果你家就有了妈妈用的洗发精，和你专用的洗发精。

现代资本主义也非常精细地涉入非常高级的文化和精神领域。有时候，一个企业会刊出一个广告，或组织一个基金会，向社会表示他们对环境、对残障儿童的关怀，或者资助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提高企业形象，间接有利于产品的销售。资本主义为了扩大生产与消费市场，调动了最精致的专门学科的技术与知识，另一方面，商业本身也以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活力渗透到其向来不为物质、金钱左右的领域，甚至连宗教、艺术、学术也受到金钱关系的影响。

金钱关系使很多情况改变。比如父子关系吧，有些情况也会介入金钱的关系，这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儿子不拿钱给爸爸，做爸爸的就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父子关系颠倒了。以前老爸爸一

生耕田，现在儿子在城里当经理；以前孩子没有发言的机会，儿子只有听老爸的，现在因为老爸要伸手向孩子要钱，不能不对儿子低声下气，关系变得十分尴尬。甚至于有些做父母的为了钱，竟把亲身的女儿卖到娼家……这一些因为金钱而发生的改变，可说前所鲜有。

艺术、文学或精神领域，也同样受到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影响。现在的绘画或流行音乐（pop music）是个明显的例子。以绘画来讲，在纽约、巴黎，绘画已经变成画商和“艺评家”所操纵的商品。他们眼看横线条的绘画已成昨日黄花，便想办法推出大块面的黄黑对比画风，然后由“艺评家”在媒体上大力鼓吹，胡诌些“后现代主义”、“半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名词，鼓动有钱人去收藏。

流行音乐和电影的“企划”，更是极尽“行销企划”技巧之能事。比如要推出一个青年偶像型歌星之前，企画者会先调查年轻人的行为和感情。调查之后，也许发现青年具有叛逆倾向，青年一般地觉得不被成人世界所理解，感情丰富却很孤单。于是唱片公司当局便掌握“孤单”这个感觉，定出年轻人的消费品味与感情的焦点，找来一位歌星，把头发留长，把领子翻起来，皱着眉头点烟，一副孤单、叛逆、可怜而惹人爱惜的亲子，使年轻人在歌星身上发现自己的投影。歌词则充满寂寞、对爱与关心的饥渴，然后请音乐家作曲，配上很重的贝斯（bass），接着在各种青年人的电视、电台节目上打歌，在青年人的杂志上报导。就这样，把几十万张唱片卖出去了。

电影也一样，越来越多的电影制作，纯以市场为取向。最近的电影市场里最需要什么，他们便拍些什么。甚至据说如今可以电脑化到把一切卖过好座的电影程式化的程度。比如：开映后五分钟要安排笑料，接着两分钟的故事，接着又插入两分钟床戏，再

来要一场打斗，再接着一场诙谐的对话……就这样把公式安排好了，再丢给创作小组去完成。电影剧本作家成为按照菜谱做菜的人，完全丧失了主体的创作功能，电影公司丢给你一个公式，告诉你：“我要的剧本里，要有百分之二十的笑料、百分之三十的恋爱、百分之十的床戏、百分之五的悲伤、百分之十二的对老师跟家长的反叛……”你写吧，你要这份薪水，你就写吧！

资本主义因素也侵入文学领域。美国有一种流行文学，每个出版社每月推出十几本。封面上的画十分漂亮、浪漫、动人，最常见的就是画着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士痴情凝望着一个美丽迷人的女子。这是专门供应无聊、不知如何打发生活、生活内容平庸单调的中产阶级的妇女或男士来消费的书。内容通常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找了工作，突然发现上司能力很强，于是她在无法自制的情况下爱上了上司，然后展开一段恋情，以及美国郊区中产阶级社区中邻人之间的偷情之类。

资本主义规律已经史无前例地整个渗透到人类文化、精神、知识、思想的领域。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若干精神、文化、知识、哲学、宗教的领域里，多少还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独立于庸俗的金钱或物质的关系，为人类文明留下相当大的遗产；如今，这样的社会已不可复得。有人称这种现象是“后现代主义”的特色，也就是说，广泛、细致的商品化，已成为“后现代”时期暨资本主义烂熟时代里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

资本主义因素细致地渗透到人类最细致的精神产物的领域，使金钱关系史无前例地扩散到最细密的精神生活中，为资本主义利润动机做直接和间接的服务，这是今天我们面对的一个深刻的问题。文学艺术的创造性、相对独立性，反叛和批判、断裂的属性的恢复，就必须以颠覆资本主义的诸关系的思想和实践，也许才有办法吧。

如何复活传统的文学气质？

怎么复活传统的原来的文学的气质？怎么重新把文学从整个物质化、商业化的社会“机器”里解放出来？这是今天文学所面临的最严肃而且重大的课题。换言之，怎么透过文学创作，重新点燃人类对于爱的可能性、对于愤怒的可能性、对于关心的可能性；怎么透过文学的创作、思考、叙述，重新恢复人类爱的能力、关怀、愤怒，甚至反叛的能力，是今天文学工作者极重大的责任。特别是像台湾这样一个地方，在可见的将来一段时期，还有一段很艰苦的道路要走，文学应该负起解放的任务——将人从思想的、物质的束缚里，重新释放出他们原该有的爱的能力，关怀与创造的能力，去变革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化（或被商业规律所束缚）的世界。

这样看来，理想中的文学，乍听之下，好像已经不存在了。其实不然。因为辽阔的第三世界的文学，正表现它们丰沛的生命力。第三世界文学或电影，能严肃逼视人的解放，即人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枷锁中解放，描写着革命与反革命、侵略与反侵略的、激荡不已的历史中，人的战斗与发展——这便是为什么它们能引起在行动上或语言上懦弱无能的西方文艺界深刻关怀和注目的一个重大原因。

最近，我曾经在东南亚做过短暂的旅行。香港、新加坡和汉城等这些所谓“新兴工业化”的地方，表面上看来都跟台湾差不多，物质都很丰富。可是一到马尼拉，你可以从皮肤感觉到整个古老亚洲的贫困，感觉到以前只在书本上看到的，一个受到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民族与社会的那种绝望的状态。在泰国的清迈，你可以看到最豪华的饭店，以及离饭店没多远就存在

的非常明显的贫困，人的价值，从金钱的翻译上是那么便宜，便宜到令你吃惊。可是在这些贫困的亚洲大地上，却到处充斥着西洋的商品：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各式各样的日本机车，以及各种品牌的机械。在整个旅行途中，你可以非常具体地感觉到辽阔、古老的第三世界贫困的深重问题，也可以从中看到大约四十年前或更早的中国，处于各种传统及外来力量交相煎迫的困境。

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作家，和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他们对于什么是文学；文学到底为谁；为什么，怎么写等等问题，就与我们有非常大的差距。记得一九八三年，我有机会到美国爱荷华，见到几位贫苦地方的作家。对这些作家而言，怎么写一首诗，态度和思想上跟我们的诗人是极不一样的。他们的同胞中将近百分之八十是文盲，他们不会去考虑一个句子用什么文字写比较“过瘾”，也不考虑“语言的张力”或“跳跃性”等等；他们也许要用声音去思考，以便能以朗诵的形式在文盲群众当中发表。有一位来自南非的女诗人，她既没钱出版自己的诗集，又因为站在整个有色人种的立场来抵抗白色政权，更没有一个南非出版商敢出版她的诗集。所以，她创作时思考的方式和对象，就跟我们的作家不同。她在“为什么写诗”的这个基本问题上，完全是因为受到生活里每天深重的压迫和不义所逼，而不能不写诗的。接着她想到她诗的对象是那些一辈子未接受过教育、生活在贫困和绝望中的那些黑人同胞，她必须用语言的听觉去思考和创作，以便他们可以接受，可以体会，可以共鸣。

我自以为，我还算是一个社会派的作家吧。可是跟他们讨论之后，我发现自己对于文学的哲学中最基本的课题，都得重新思考。第三世界贫困的国家，不像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机。电视机“教”我们很多东西，从小到大，从我们听得懂话，听得懂歌曲，看得懂画面的时候，我们便开始受到电视的宰制。可是实际

上，台湾的电视节目却糟糕到极点，这对我们的一生及整个社会，无形中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社会，文学就变得十分没有力量。然而在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文学却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每当有一本诗集或小说集出版，他们的作家每个月都会接到无数读者的来信。这些读者写来与作家讨论写作及其他问题的信，大概有一布袋那么多。这种情形在台湾大概没有，很少有人写信来跟你讨论，到底你写的东西对不对，或怎么启发了我对人生的看法。在窘迫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文学跟诗歌对民众来讲，却是广大的知识分子（不只是文学青年）跟群众追索个人或整个民族亟待解答的各种问题答案的来源。他们会去讨论一个作家及作家的作品，从中去探讨他个人的前途以及国家民族的未来。文学的这样的性格，只有在辽阔、贫困、还在为自己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独立挣扎中的民族，才可能见到，从这个观点看来，做为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绝非轻松，也不简单，而是一生一世的艰苦的事业，是他自己跟他的民族、国家，整个连接起来的一个非常沉重而艰难的功课。

四九年后台湾文学的一些问题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国家分断民族分离的四十年来，台湾文学的一些基本上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国家内战以及两阵营对立的全球局势的影响，中国的大陆本部与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社会上、经济上，都变成两个完全不相往来的分断的状态。于是台湾文学产生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断层”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在台湾发生了断层。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

的文学，不需要从自己的文学传统里去学习、发展文学的香火的。但实际上，我这一代的文学却在与中国新文学四十年来的文学完全切断的情况下，从外国（美国）去寻找文学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不过，这个断层在四十年后的最近，已很有希望再弥补过来。

第二个问题是，台湾四十年来在国家分离及附从于西方经济圈的发展，使整个文学陷入了逃避主义、依赖主义、模仿主义的状态。尤其在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的时期，在台湾安全及对美依从的基本结构上，文学起了很大的改变，而在一九五〇年以前的台湾文学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这段时期的台湾文学，从西方支借了各种文学表现的内容及形式，脱离了台湾和中国的具体生活和感情，成为买办的、模仿的、进口品的文学。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焦点的丧失。对你们这一代而言，中国大陆已经仿佛是个外国，那边是“匪区”，那里的人脸是绿的，头上还长了角，大概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虽然长辈常说，我们家在山东、河南；但这些地方对你们而言，一点感情也没有。对大陆在物质和感情的断裂，很多作家也曾公开表示，毫不隐讳。我想，这不能怪他们“数典忘祖”或“没有民族国家观念”；这是台湾在外来势力干涉下分离四十年的具体现实下的结果。台湾跟大陆文化、经济、生活的完全断绝，使台湾文学失去了对中国的焦点，失去了中国的形象。这种中国焦点及形象的丧失，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五十年的台湾历史中，也很少见。最近，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在有选择、有监督的情况下可望开放。这或者将有助于这个情况的改善。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开始了一些奇怪的讨论，诸如：台湾文学是什么？台湾是什么？台湾人又是什么？这类讨论特别在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以后，突然增加，这正是客观的四十年来祖国分断的具体现实所造成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由于长年以来的戒严，长期的思想禁锢和

思想检查，使我们的文化界、文学界和艺术界，基本上缺少批判的思想，以致于整个文学艺术缺少了文化和思想。这种情形在第三世界文学里几乎是看不到的，我们成了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或对美国、日本完全缺少批判思考的唯一的第三世界地区。我常喜欢用“思想的贫困”来说明这种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学都要谈思想才算文学，但台湾文学艺术特别过分地缺少思考性和批判性，却会深入地影响台湾文学和艺术的品质。

以上所说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随着亚洲、太平洋冷战结构的重新编组，以及当局自去年比较明显的民主化改革与戒严令的解除，我想，应该可以慢慢得到解决。可是也因此，台湾文学界便面临了比过去任何时代更为强大的挑战。以前不准你讲话，现在为你鼓掌，请你上台，给你麦克风，把问题抛在你身上，所有聚光灯照在你脸上了。如果真的忽然整个民主化了，思想的框框解除了，四十年来我们没有作好的文学课题，就必须在一夜之间写好。捉襟见肘，手忙脚乱、怨天尤人……的情况就会出现吧。

在这种情势下，面对你们这群年轻、天真、可爱的文艺青年，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我要不惮于强调，你们千万别以为文学就是潇洒的、玫瑰色的、受万人瞩目的、一进会场就受到万人喝彩、受到公卿王侯欢迎的，或者是广结异性善缘的一种工作。正好相反，极可能，做为一个文学家，所要遭受的压力或挑战，远比其他行业还大。比如第三世界国家，作家常常在半夜有人来查他的书房，带走他的稿子，或者甚至被戴上手铐带走。一九八三年我到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会议开幕了一两个礼拜，几位受邀者的寝室的门还一直锁着。他们是几个威权专制主义国家的作者，有的是被当地政府限制出境，有的则早已被监禁起来了。所以都不能来赴会。看到那么多 I. W. P. 的公事和通知堆在寝室门口，我才具体感觉到，作为一个作家，对于巨大的权力是那么毫

无自我防卫的能力；那么容易受到伤害。我想，全世界为了说出真话的作家、新闻工作者、教授或知识分子，常是这种境遇吧。但我不是在吓唬你们，而是要让你们知道，应该要用严肃的心情，重新去检讨和思考一个作家的职责、命运和功能……

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条件

最后，我要讲的是，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一些比较基本的条件。

第一，文学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的艺术，一个中国作家，先就应该搞好汉语文的表现。我自己办了《人间杂志》以后才理解到，台湾整个世代的汉语表现，几已受到严重的破坏。常常有人写了一大篇东西，不知焦点何在，到底要告诉读者什么。其次则是潦草、不认真，错别字不说，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常常在一段文字中，只会把逗点点到底，最后才是一个句点。至于遣词用字、文法、逻辑的错，则比比皆是。对于中国人，汉语文的表达力，不单单是作一个作家之所必需，也是当一个知识分子之所必需。因为知识分子应该锻炼自己使用母语优秀、准确地来表达或表现自己的想法。这必须从当代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或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数千年辉煌的汉语文学作品中去汲取泉源，并且要非常用功才行。

第二个条件是，一定要跟生活的现场有生动活泼的接触。我办了两年的《人间杂志》，这一点感触特别深。我们杂志社的年轻工作同仁，固然很勤勉；但真正教育他们的，是他们在采访工作的现场中认识了生活、认识了人、认识了世界、认识了采访的现场以及其中的人。记得《人间杂志》曾探讨山地雏妓的问题，基于工作的考虑，我们觉得派女记者去采访比较合适。我们的记者

去采访了十几天，回到杂志社的那个下午，我正坐在我面对着墙壁的办公桌前忙着办理公事。我请她坐在我背后的椅子，我说：“你尽管说，虽然我手中在工作，但我会听着你说。”她就开始叙述采访的过程，讲了大约十五分钟，忽然中止了。我就把手上的一封信写完，回过头去看她。她那时正转身对着墙壁，掏出手绢擦泪。我知道她正在哭，就静静坐在座位上等她哭完，当时我想，哭，对她和我们这生活在无情化的环境中的人来讲是很好的！哭过后，擦干眼泪，她说：“我非常感谢那些女孩子”。这话乍听之下，有点令人不解，因为一般人通常会说，他很为那群可怜的女孩儿感到“同情”或“难过”，她怎么会说“感谢”那些雏妓呢？我问她原因，她说：“我跟那些女孩儿工作了十几天，每一次与她们谈话，我总以为她们应该把桌上的茶泼到我脸上，捶着桌子骂我……”我问：“为什么？”她告诉我：“她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我破口大骂：我们年龄相差无几，你凭什么比我幸福，而且居然坐在我面前问我这么痛苦的故事。我越采访越觉得那些可怜的女孩儿有权利对我发脾气……”可是，那些女孩儿终究没有生气，她们一起哭，一起分享着人间最大的不幸，一起体会内心梦魇般的痛楚。经过了这次的采访工作，她说：“如果没接触到这些人，我从来就不晓得生活是那么不容易，也不会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女孩儿竟然过着与我全然不一样的可怕的生活。这以前，从来没有经验可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在台湾目前的社会，女孩子是这么容易受到伤害，而且一旦受骗，到了那种场所，就得遭受那样令人难以想象的万劫不复的痛苦。”

很多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离开自己的阶级、离开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范围，进入辽阔的生活现场，接触更多的人生，才可能理解到生命的尊严、生活的尊严，或者是人类在黑暗当中所散发出来的潜能与不可置信的韧性。你们一定要到现场去，晒

晒太阳、流流汗，和别人一起愤怒，一起流泪，用你们的皮肤、眼睛、耳朵具体地体会，用思想去理解真正的人民的生活，以及生活的本质。生活和人是文学创作最丰富，也可能甚至是唯一的泉源，所以你们一定要透过生活现场的接触，去丰富生活，再转化为创作与思想的养分。只有在那里，你们才可能真正地成为一位有血有肉的作家。

做为一个作家的第三个基本条件，我认为就是应该具有批判的视野。我再以《人间杂志》为例，来说明这个观念。目前有很多市场上的市民消费的杂志，都只是由一个角度出发——那就是由社会上幸福的、年轻的、漂亮的、健康的、口袋有钱消费的这些人的立场去看生活和世界，去制作每一期的内容。在这些杂志里，我们看到的是：嘴里衔着雪茄，一决策就是几百万或上千万的董事长，再不就是月入五六万以上的风度翩翩的上班族丈夫、生活优闲的漂亮的家庭主妇，脸上可摘得下苹果的可爱的女儿，比一般家庭还大了四五倍的装潢豪华的客厅……完全虚构的生活、流行、服饰、玫瑰花、爱等等。

可是《人间杂志》却试图从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去看人、看世界、看大自然、看生活。我想，全世界，古今中外吧！从来就没有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家通常都在为民请命，为不正义抱不平，发出良知的怒吼。如果他对黑暗关心，恰恰表现他对光明有一分比别人更强的信仰；如果他对弱者有一份非常坚强的同情，恰恰是因为他对每一个人成为强者，有一分很深的寄望。因此，一个作家，必须要有批判的知识和眼光，善于替社会的底层，从最不被重视的大多数人的立场去看世界、看生命、看生活。

要具备批判的眼光和知识，并非易事。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这么复杂的世界里，更需要用功。立志当一位作家，绝对不能是只因为理工科的功课不好，作文课算不错，才做这种决定。作家跟

其他分类的专家学者一样,必须辛勤而用功地去求索各种知识,对广泛的人文知识应该有非常直接或间接的理解,涉猎或研究的结果,以便了解现代世界与社会生活的本质与核心。现在已经不是读一部《四书五经》就可以写书、写小说的时代了;复杂的世界、复杂的生活,重重虚构的帷幕与现象,要求作家用犀利的知识去分析、去批判,才能找到生活真正具体的本质,然后才发为文学。

作家的道路

作家的路,是非常严肃、艰苦的,我并不希望因此而泼你们冷水,可我也非常不希望你们带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去跨出文学生涯的第一步。今天,大体是由我个人的一些体验,去谈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种种文学现象及问题。据说,我也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所以我想,应该把一些实话或故事的另一面告诉你们。

最后我要再次地强调:作为一个作家,绝对不是轻松的工作,反而是十分艰苦、严肃,而且恐怕偶尔也是拼命的工作。我衷心地希望,在座当中将来能出现真正属于新时代的、非常优秀的、中国的作家。谢谢。(第三届全省巡回文艺营,南区成功大学专题演讲。天洛记录,作者本人亲自修订。)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联合文学》四卷二期

历史性的返乡

——送何文德与他的老兵返乡探亲团

虽然从台湾到大陆探亲、旅游、做生意，在民间已行之有年，但是，不论如何，当局去年正式开放到大陆返乡探亲，是一九五〇年因内战和美国第七舰队封断海峡四十年后；两岸间重新初步恢复了往来。这是我们现代史和民族史上的大事。

从台湾到大陆去的人不断增加的结果，我们已经能观察到一些值得深切关心和注意的问题：

几年以前，人们就听说，物质缺乏的大陆亲人，经常向台湾的亲人要一些耐久消费品，如电视、冰箱之类。回去探访的人，在绘声绘影的传说中，有的自愿、有的迫于人情，把身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留给了亲友。有人甚至说，手头拮据的返乡客，使大陆亲友大为失望，甚至遭了白眼。

这些传言，有些容或夸大其辞，但大约也不至于完全没有事实。在我小的时候，记得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尽量压抑自己的需要，一方面再困窘也怯于接受别人的礼赠，另一方面无论如何拮据也要搜尽家当，总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来访的亲友吃用。大陆上的人，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不忌惮于需索，令人诧异。我也听说过：发财得意的人回去，大宴宗族，席开数十桌；每个亲族皆有一个礼数；接受穷亲戚的奉承……

四十年后，这样的亲友会见，无论如何，对双方，总是不妥

当的。物质的需索，会打击一颗长期思慕乡园的亲心；四十年前的豪门，四十年后回去，依旧是散财傲人的大爷。这些，看在比较有自尊心的大陆人的眼中，在自责之余，会不会引起对浪潮似的返乡“台胞”，产生反感呢？我认识几个孑然一身，或四十年来一直不得意的大陆人，喜冲冲地问他什么时候回去看看，不料他们竟寂寞地说，“不回了。两个口袋空着，怎么回去见人？”

我知道有不少人为了充面子，不惜返乡前借贷招会，回大陆在亲族面前充阔，回到台湾拼命加班赚钱还债。必得衣锦而后返乡，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想法。但大陆亲友需索的传闻，怕也是令困乏的人怯步或装阔的原因之一。如果大陆上的人民能明白地对游子说：“回来吧，我们要的是离散四十年的人，不是那些礼物……”我想，这历史的聚合，将增添多少温暖与庄严。

我们也听说，大陆上为了“热烈欢迎台胞返乡探亲”，对返乡台胞，有许多优待。例如买各种车票、食宿、旅游安排、探亲安排，一应优待、优先，可以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这在交通、食宿等设施一般还不敷激增的需要的状态下，为了使返乡人在一定短期内回到辽阔中国的故乡……这些安排，应有其必要。但也要有个原则，有个风格。我很担心，在服务供应上一般地吃紧的大陆，突然杀到大批返乡客，使大陆上一般人的服务上的供应因而变得短绌，眼看穿着华美，喧嚣哗笑的返乡“台胞”，可以买他们买不到的票，享受他们难于享受到的服务，久而久之，会不会由烦恼而生不平，而生怨悻？

这种不平与怨悻，我担心也会因这情况而加深：四十年来，我们宣传大陆的贫困，强调我们的富裕。因此，我们的一些返乡人，不免因“敌情”未泯，有意与无意间，向大陆的亲友夸台湾之富，物质之丰，也在不知不觉、或有意自夸的情形下，嫌大陆在饮食、居所、交通、公共卫生各方面的落差。蜂涌而至，享尽特权，斗

富炫财，而又嫌故乡的贫穷落后……将心比心，如果易地而处，换成我们在大陆目睹这些现象，心中将作何感想？

我曾在电视荧光幕上，看见一位妇女述说她返乡探亲，在某地游览名胜时，被一个大陆青年抢劫的经过。没有多久，我看到一则消息，那个抢劫犯被捕，遭到枪决！

被“改革开放”提高了对商品财货的饥饿，而又意志脆弱、失去自尊心的个别大陆青年，眼看着“幸福富有”的台湾探亲客，出手抢劫，是单纯的贪欲，还是对特权和“幸福人”的忌恨，还是两者皆有，不得而知。我不知道大陆法律对抢劫犯的处罚条律，但是，如果大陆，只为了急于“遮羞”，急于弥补对“台胞”统战工作的破绽，格外枉法加重量刑，使一个法律上尚不致死罪的青年，为了讨好台湾返乡人而丧失宝贵的生命，我们在台湾的同胞固难以心安，在大陆上会思考的知识分子又会有什么感想呢？

最后，眼看在台湾大陆人能自由回到大陆去探亲，有子孙、亲友在一九四五年后到大陆去活动、求学、服役、商货、旅游，因历史的巨变，滞留大陆四十年的台湾省人民与家族，却不得渡海回到台湾故乡来团圆。这对本省人有亲人在大陆者，有很大的不平。固然，这些本省人可以去大陆探亲访友，但滞居大陆四十年不得回到故里的台湾人，将对自诩“自由、民主、富裕、乐利”的台湾人，做何感想？

这些问题，急迫地等待海峡两岸共同解决，否则，长此以往，思虑不周的善意，无心有心的伤害，积累起来，不知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

我希望台湾去的人，能虽富而知礼。向穷亲戚炫富骄财，对比较落后的故乡表露鄙夷自慢的辞色，其实是对自己风格最大的贬抑和羞辱。也希望大陆，能以一份平常之心，面接从台湾来的亲戚同胞，以真挚的亲情，庄重自爱的尊严，迎接分散了四十年

的游子。故园之令人心系，不在繁荣萧条，而在于风土乡井之依旧；在旅人亲友深切温暖的亲情。游子归来的喜悦，也不在他的落魄富裕，成功失败，而在于他之终于落叶归根，倦鸟知返；在于他在四十年离散后，终又投入故乡亲人的胸怀。

民族的分断，家庭的离散是中国现代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国际强权对东亚、对中国事务干预的结果。随着台海和平构造的初现，美苏第二次冷战因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销毁部分核武器协议宣告终结，两岸的中国人民，应该以更大的自觉，在有真诚情感，有风格，有尊严的情况下，迎接海峡的历史性的再开放，迎接两岸人民历史性的再来往。

元月十四日我的朋友何文德兄将率团返乡。他告诉我，这个团一不带“三大件”返乡，为的是表示乡心比物质更贵重，也为的是使一些阮囊羞涩的老兵团员不致自惭；二不接受特权特惠式的招待，主张吃住水平以一般大陆同胞日常水平为准。这是第一次有自觉、有原则、有风格的返乡行动，令人高兴，也令人尊敬。我由衷希望随团的祖珺和王拓，以及全团的团员，都能很好地表现何文德兄的上述几个有意义的原则，为两岸人民的来往，树立优秀的模范。让我们都祝福这个即将启程的返乡团一路平安，探访成功。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悼念的方法

蒋经国先生谢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觉放下了手边的工作。蒋经国先生的三种影像，在寂静的我的书房中缭绕。

一个开朗、甚至是蹦蹦跳跳的少年，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幸福；为了革命；为了祖国的独立，只身在冰封雪锁的异国学习。打那时起，他一直喜欢这样穿戴自己：一顶工人帽，一件夹克……这是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少年的蒋经国先生。

在新店安坑的一个政治监狱中，每逢旧年，蒋经国先生，总是一个人安静地在栏栅式的监房外巡走。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每年的岁暮来，也不知道他一个人默默巡走监房时，想着些什么。回忆他流放冰雪异国时艰困的岁月？还是沉思着他应也参与过的，五十年代初期肃清的风雷？这是我在做囚人的时候，几个老难友告诉我的，上任“国防部长”前的蒋经国先生。

两年前，从解除戒严开始，当局展开了一系列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开放和民主化改革的政策。两年来，我对台湾政治和社会空前的变化，目不暇给。但我总是感觉到，或者在幻像中，仿佛看到一个孤单、意志坚强，和自己的病身、和历史、和日益绌短的时间奋力挣扎着，去实现民主改革，再造中华的，他少年时代的理想和志业的老人。在或者抱残守缺、或者因富裕生活而失落

了历史的环境中，蒋经国先生的孤独，是怎样的一种孤独啊！

蒋经国先生在台湾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解除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解除戒严，为台湾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提供了具体的、基本的条件，为台湾的民主主义党政的展开，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

蒋经国先生第二个巨大贡献，是他毅然超克内战和国际冷战的构造，开放台海两岸中国人民的来往，为四十年国家分裂、民族分断的历史，再续了民族团结与和平的、坚实的历史与政治的基础。

解严以后，台湾激越地、亢奋地，在无数试行错误中学习民主生活。蒋经国先生的党、当局、甚至他个人和家族，受到民主政治中应为平常的攻讦。但细心的人们，都会感觉到，在四十年绝对主义和权威主义政治传统和气候之下，蒋经国先生，以他令人诧异的宏大，豁然处之。在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中，现代资本主义和市民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发展，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的恢豁，民主运动，怕还要遭受更其苛烈的挫折，才能诞生和成长吧。

去年十月，我适在北美旅次，一度传来蒋经国辞世的消息，使我震惊。这次不幸的消息，也使我错愕。我曾对于自己这错愕与震惊，感到诧异。如今细细思量，因于上述种种，错愕和震惊，自然是原因的。

蒋经国先生的谢世，标示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也标示着一个新历史时期的展开。坚持蒋经国先生和台湾社会、台湾民众共同发展起来的，台湾的自由和民主改革，以及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和平这条英智的道路，并且贯彻下去，是我们深切悼念蒋经国先生最有意义的方法了。

我们爱森林的 朋友阿标

两年前茅秋之交的一个下午，有一位精壮的汉子，抱着一大堆他拍的台湾山岳、峡谷、雪景和深山溪流的照片，访问当时还在台北市和平东路的《人间》杂志办公室。我倾听着他用他那不免有些琐碎的语言，向我解说他的来意。他说他“观察”了《人间》杂志有数月之久，觉得《人间》杂志是很有理想和关怀的杂志。“只是一般人看了，不免因内容忧苦，心情沉重。”他说，“我这些照片，一方面可以帮助《人间》杂志增添一些色彩，另一方面，我的大自然照片也不是为了纯艺术拍的。我要为保护我们台湾的大自然呼吁……”

我对台湾山岳一无所知。而眼前的这汉子，依旧那样热心、认真、顽强地诉说着台湾的山岳之美；之必须加以紧急保育和爱护。我从来不曾见过这一个人，对台湾的土地、山岳、溪流和自然，抱着那么具体、情痴的感情。他喁喁地在我面前谈着山名、峡谷名、林区和林班名，不同地质和岩石的知识，我却讳莫如深。但有一件事我却听得仔细，那就是他对台湾山林最痴、最真的爱。我为之动容了。

那时候的《人间》杂志，财政还拮据，因此无法请他做在额的记者，而委屈了他当九个月《人间》的特约记者。对于工作条件和待遇，他没有任何异议和索求，他参加了《人间》的工作。后

来，我才知道，他拿笔远远不如他捧相机利落而快速。然而，他却一丝不苟地投入待遇菲薄、工作吃重的采访报告工作。

他就是最近一系列深入山坳，揭发台湾林业惊人弊端的《人间》杂志记者赖春标。

每次他向我提出采访企划案，他会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去叙述一个山区林班的破坏情况。一个多月前，省林务局还接受他访问、要资料。等到他硬是真的到伐木迹地现场上测量、调查、拍照，林务局和所有林政单位才慌了手脚，对他关了门，上了锁。但他下笔时，仍然念念不忘要如实地写；坚持要把握几分事实和证据写几分。几个月来，他上了不知几趟林田山区和木瓜林区的各处重要林班，回到台北打电话，找资料，一杯杯喝两百西西的浓茶，抽香烟，把稿子写了又写，誊了又誊。他上一趟山花去的日子，有时候和他写稿花去的时间不相上下。

“别灰心！你写吧，你看你还是进步了。”我鼓励他，“拍照的人，终得自己能拿笔写才好。何况深山里的事，只有你有现场体验，别人怎么也帮不上忙。”

“太差，太差……”

他一面用手扣打自己的额头，一面烦恼地苦笑着，这样说。

然而，我自己和整个编辑部，连带地“绿色和平小组”的每个人、杨宪宏、明立国，全都被他的对于台湾原始森林的情痴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在他痛苦的叙述和控述中，逐渐明白了今日台湾林政的惊人荒颓与黑暗，而为之痛心、愤怒。我们也逐渐体会到，为什么赖春标谈起那些被疯狂砍伐的树木森林，就好像一个父亲谈起被疯狂屠杀的儿女。我们透过他，才知道法规上规定，标高二千五百公尺以上，坡度在三十五度以上，水源涵养区山林绝对禁止砍伐，而林务局却伪造标高坡度的记录，滥行砍伐；我们才知道光复后造林现场和林务局造林账面上相比对，有很大一截差距；我们也才知

道，一直到今天，好多珍贵的台湾红桧与扁柏，那些天地自然化育了百千年的台湾红桧和扁柏，还在被猖狂地超限砍伐！

但是，我们也和“阿标”分享了某种悒愤和无力感。即使现今报纸增了张，每天打开来看，就没有一条是由他揭发出来的消息，去追踪报导的森林大破坏的消息！“他们报纸在干什么吃呢？”他常常苦恼地搔着头皮这样自问。

他朴实、诚实、正直、谦抑、却绝不是没有幽默感的人。来《人间》不久，大伙儿一下就喜欢上他这个人。他对待人和对待树一样，有很深的感情与道德责任心，只是他说话啰嗦些。但没多久，人们就接受了他那特别“啰嗦”的表达方式，没人捉狭、嘲笑他。反正他一开口说话，你就只得静下心来，坐着慢慢听吧，试着在他那驳杂的谈话中，理出一个头绪来……

他做过旧车和旧家电用器的捐客，当过百分之百的劳动者：铁工和轮胎厂工人。由于他酷爱爬山，慑于台湾山岳之美（“台湾的山岳之美，是你们不爬山的人绝难想象的。”有一回，他这样对我说，“我听说，最近有人到美国和北欧去看山、看雪，这简直是笑话。咱们台湾的山，绝不比别人逊色！”），他做工积钱买相机。他用他的胳膊干活挣钱，添加照相器材。“会拍照的，不会登山；会登山的，不见得会拍；会登山也会拍照的人，又没有我走得深，走得险……”他不无得意地笑着说。

这就是我们《人间》杂志的赖春标。他绝没有什么显赫的学历，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其实是对千万为权力和资本服务、不以罗掘俱穷、以邻为壑的“开发”与“发展”为犯罪，为可耻的知识分子；对于徒然以奔逐市场性“新闻”为能事的今日大众传播，该都是一个辛辣而严厉的批评吧……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自立晚报》副刊

鞭子和提灯

——《知识人的偏执》自序

初学写作的几年，用了许多的笔名，差不多是一篇文章一个笔名罢。也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才开始固定用陈映真做小说的笔名，以许南村做论说、随想的笔名。

我有过一个形貌、心灵都酷似的双生的哥哥。我们曾在共同编织的幻想中驰骋；曾在上学的途中，蹲在一块儿，讨论田埂上一朵清晨的、方开的小野花；或者一块追逐在稻田里飞跃的、翠绿色的蚱蜢，而往往都得迟至早晨的第二节课，才到达那所古老的莺歌小学。我们也曾在墙上、地上画满了图画，互相评判；曾把捡到的，死了的昆虫和鸟雀，埋在门口的菜圃边，用竹枝、树叶和碎石，搭盖小小的墓园，并且日日去供些采来的野花……

由于形貌的酷似，幼时另一个深刻的记忆，是不断地有亲戚和长辈，打断我们正热中着的游戏，睁着好奇的、兴味的眼睛问：

“告诉我，你们哪个是阿真、哪个是阿善？”

我们于是只得停下游戏、耐心、或者竟不胜其烦地做一番解释和说明。幼时这种对于自己的认同不断的、意识的说明、解识和确认，似乎使我对于名字和其所指谓的实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兴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使用一个又一个笔名；为什么每次要为故事中的人物取名的时候，总是感到盎然的兴味的缘故罢。

我的小哥，在九岁上，病死了。

两岁许的时候，我过继给我的三伯父——父亲的三兄。光复前的一年吧，生家和养家都疏散到莺歌。我们这一对双生兄弟，便一块儿玩、一块儿上学，在那小镇上和小学中，成为诧奇的、有趣的话题。

有一个清晨，我正要到生家去邀小哥上学，却在路上看见比我早到，想要到养家来约我上课的小哥，青苍着脸，蹲在人家的廊下。

“肚子疼。”

他细弱地说。路上的行人还少。远远地有叫卖油条的恹弱而抖战的声音，在小镇清晨凉冽的空气中传来。我大约陪他回生家，便径自上学去了。

其后的几天，我一个人上学、下学，一个人默默地玩耍。我还记得几次到生家去探望小哥，看见他沉睡在塌塌米上。有一回，塌塌米上没有了他，说是送了他到台北住院去。

记不得又过了多久，当我眺望着养家门口通向车站的大街，远远地看见父亲捧着白色的骨灰盒子，逐渐走近，又沉默地走远。有些人伫足，有些人嚅嚅地耳语，有些人小心地叹息。

小哥死了。

我始而流泪，继而出声哭泣。那时，还记得谁在说：

“唉唉，难为他也知道悲伤呢！”

那是我一生中初尝死别之苦的。这以后，我一步一步地成长。但数十年来，依稀总是觉得他的死，遽而使失落了一个对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时却又仿佛觉得，因着形貌、心灵的酷肖，那失落的一切，早在小哥病死的一刻，与我重叠为一。这或者是无稽的幻想罢。我曾一半出于怀思、一半出于青年的恶戏，使用过好几个族中已经亡故的人们的名字作笔名。直到有一回，我用了小

哥的名字，竟也蓦焉感到满足和安定的情绪，就此沿用了下来。

“为什么要用真儿的名字作笔名呢？”父亲曾问过。

“不知道啊，”我说，“我只是想，这样，我们就一起活着。”

父亲笑了笑，便不复说什么。

我真不知道，如果小哥尚在，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前不久，家人闲谈，说起我前此的一次久客远行，父亲沉思地说：

“要是真儿也在，怕不也跟着你去走那一遭……”

我沉默不能语。

如果小哥是个与我全然相同的人，那么，我又是怎样的人呢？

为了躲避盟军的轰炸，养家和生家都疏散到小镇莺歌。村镇的童年生活，即使是战时，也是充满着欢乐的。忽而有一天，我看见了前所未见的景象：喧天的锣鼓，令人目眩的舞狮队，张灯结彩、焚香祭祖。大人们轰传：“日本仔打输，台湾光复了！”

两个驻在附近的日本老兵，和邻人闲谈着。其中有一个抚摸着隔壁小孩的脑勺子。

“想家啊，”他说，“出门的时候，我的娃儿也这般大。”

“你们就要回去了，高兴罢？”有人问。

两个日本兵沉默着。然后，那另一个日本兵，像是说给自己听似地啾啾着说：

“日本已经残破了，回去也难于生活罢。”他于是哼哼地笑了：“军部，家伙！早说过没有好下场的！”

问他以前干什么，他说：

“我是佃农，他是木匠。”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愿意留在台湾种田、做工。对罢？”想家、想儿子的那个日本兵说。

另一个日本兵没说什么，两人默默地走了。

动 乱

小哥死后几年，屋后迁来一家姓陆的外省人。陆家小姑，于今想来，是二十上下的年纪罢。直而短的女学生头，总是一袭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丰腴得很的脸庞上，配着一对清澈的、老是漾着一抹笑意的眼睛。她不懂台语，养家的大姊不识汉语，但是借着手势和有限的笔谈，她们竟成了闺中腻友。

她陪我为一小畦我所种植的绿豆浇水；几乎每日，她看着我做功课；她教给我大陆上的儿歌……曾几何时，她成了我生活的中心。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找到屋后去看陆家大姐，唠唠叨叨地述说一日间的种种。

一个索漠的、冷冽的早晨。我大约因为发了高热早退。回到家，高烧已使我昏昏沉沉的了。但扔下书包，几乎习惯地往屋后跑。

陆太太怀抱着那方甫出生的婴儿，哀哀愁愁地哭着。陆家大姐在一边絮絮地、温婉地劝慰着些什么。然后，她跟着两个陌生的、高大而沉默的男人走出房门。就在她跨出门槛的时候，她看见了我。她的丰腴得很的脸，看来有些苍白。然而她还是那么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劲地按了一下我的头，走过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

这以后的几日，我再也不曾看见陆家大姐。接着，陆太太也搬走了。

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一个人默默地蹲在绿豆畦边，看着它们一寸一寸地在竹架上攀援。小哥死后，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无从理解的寂寞。

大约是快升上六年级的那一年罢，记不清从哪里弄来了一本

小说集。其中有一个故事，说着一个可笑的乡下老头的可笑的冒险经历。当他被人家揪着辫子，在冷硬的墙上捣打，待人走远了之后，他就对自己说那凌暴的人是他的儿子，然后认真地为一个儿子忤逆的时代，摇头叹息，于是他的屈辱便得到了安慰。

那时候，对于书中的其他故事，似懂非懂。惟独对于这一篇，却特别的喜爱。当然，于今想来，当时也并不曾懂得那滑稽的背后所流露的、饱含泪水的爱和苦味的悲愤。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曾有一个时候，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贫穷的，忧愁的，愤怒的，经常和罪人、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仑医院的史怀哲医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这以后的几年，我耽读的书，相与的朋友，像一个又一个紧密相叩结的环节，构成了现时的我，也打成一条命运的链条，使我拴锁其中。

我时常怀着深切的、谦卑的感谢，回忆这些曾经这样、那样地点燃了我内里的，并不辉煌的火光的人、书本、事物和经历。陈

映真的一些小说，许南村的一些议论，便是这样卑微的我的形成过程中，所留落的足踪。

初出远门作客的那一年，父亲头一次来看我。在那次约莫十来分钟的晤谈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

记得我是饱含着热泪听受了这些话的。即使将“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不是容易的。然而，惟其不容易，这些话才成为我一生的勉励。

回到故里，深刻地感到故旧、新知，以及许多遥远的，不曾谋面的朋友们所加予我的温暖的友情、关怀和激励，使我感激，使我羞愧，使我惶恐。让我对这些错爱于我的人们，表示无言的、最诚挚的感谢。但是我着实不愿意他们不知道：我是个平凡的、充满了许多矛盾和缺点的人。但愿他们的关切和他们对我的，超乎我所能驮负的预期，都成为严厉的鞭子和脚前的提灯，使我用功些、谦卑些、诚实些、勇敢些……

一九七六年九月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知识人的偏执》

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

——评《日本最长的一日》

〔1〕

一九四五年七月以后，盟国提出波茨坦宣言，并且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人类第一颗原子杀伤武器。就这样，包括日本在内的，侵略的轴心国阵营，已经面临了无可挽救的、全面性的败北。八月十四日，日本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并且在十五日由日本天皇向日本全国，向日本各线的军事力量，向全世界播告停战诏书。把这个漫长的“御前会议”和“玉音放送”的整个历史事件里，重臣、皇室和军部对于面临这次“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败北”时的挣扎收入银幕的，就是东宝的《日本最长的一日》。东宝的宣传词句是这样说的：

激震中的日本！

一些我们所不知的事件

在某一些我们所不知的地方

曾以无限的勇敢发生了！

所谓“无限的勇敢”，指的是哪些具体的事件呢？

是天皇的圣德慈怀，是天皇的不忍全日本国民遭到生灵涂炭

的劫运；是重臣中虽然有降乎？战乎？的争执，但其“为了日本”、为了“国体”、为了“对得住”在战争中死命的三百万日本军民的“爱国心”则一；是少壮军人宁为玉碎的悲愿；是“特攻队”自杀飞行员的悲壮情怀；是拥进三〇二航空队基地，招摇着“日章旗”，激昂地高唱空军军歌的日本人民；是这种支持日本全面走向侵略性的、军国主义的、对于天皇国体、对于“大日本帝国”的、狂热的爱国主义。

然而，自从人类有了政治，有了历史，有了战争，便有两种内含和本质全然不一样的爱国主义。一种是侵略的、掠夺的、在伦理上是罪恶的爱国主义，像日本和德国在二次大战中的爱国主义；一种是反对和抵抗这侵略和掠夺的、在伦理上完全是公义的爱国主义，像中国在八年抗战中，以及世界其他民族反对侵略的抵抗运动。这样的区别，对于企图在知识中追求“绝对客观”和“纯粹”的逻辑经验论者，对于想把历史尽量地洗涤它的“历史色彩”的、主张历史的“纯粹性”和“科学性”的历史主义者，是一个可笑的、充满了情绪上的误谬的论证。然而，对于遭受到侵略军队百般蹂躏的、在侵略战争中蒙受不可估计的损失的民族，却是个极端明白、简单而悲痛的真理。

在战败后二十年，由日本人自己制作的这部《日本最长的一日》里，对于作为日本过去的战争罪恶之最重要精神因素之一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没有作一丝一毫的检讨、批判和反省。尤有甚者，在战后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日本在封建军部统治下若干良心的各阶层日本人对于当时日本侵略战争采取勇敢的反对态度的事实，在片中完全被漠视了。这样的一部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摄成的电影，在去年八月十五日的“终战纪念日”，向全日本人民公映，它为广大的日本观众关于败战、战争责任、日本再建的问题，到底会提供什么样的解释，实在是令人迫

切关心的一件事。

〔2〕

所谓“无限勇敢”的另一个具体事实，是日本当时的“大和魂”，所谓“日本精神”。

“大和魂”和“日本精神”的核心，是被半神化了的天皇体制以及对于天皇的半宗教的信仰。在《日本最长的一日》里，即便是在今天早已走向民主体制的日本，对于名存实亡的天皇，在历史的再现中，仍然保存着深厚的对于日本神权皇室的乡愁和崇拜（Micado Worship）。

这岂不是作为“历史的再现”的历史影片所必要的吗？不是的。我们只要看天皇的镜头如何地被恭敬地一如回避耶稣的圣容那样；只要看扮演天皇的舞台名优松本幸四郎在拍片中，一直斋戒沐浴，深恐冒渎圣姿。就知道这部影片极端的反动性质了。他说：“如果有失礼的仪态或怠慢行为，那就对不起天皇。”因此摄影师也把他当天皇一样每次摄影时都是恭恭敬敬对待他，而且他又每日坐计程车到摄影场去上班，以免冒渎圣姿。这一切都足以洞察贯穿在这部片子里的天皇崇拜的幽灵了。

围绕着这个天皇崇拜的幽灵，日本军部的大和魂被生动地复活了起来：日本军人的封建的武士道的语言，以令人惊悸的呼啸，从头到尾贯穿着整个影片；宁死不败的日本军人精神，在军部的死硬分子中，在好战的“学徒兵”中，在宁为玉碎的信念中，狰狞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而阿南陆相的战争责任，也在他忠于国体，忠于战后的两百万的日本军人，更在他“无限勇敢地”切腹割首而自杀的惨烈中，涂上一层悲剧英雄的色彩。

就是这样，《日本最长的一日》对于日本军阀在广大的亚洲大

陆、在炎热的中南半岛、和南洋太平洋群岛所造成的滔天大罪，所杀戮、破坏的生命财产，没有一个字、一个镜头提起；对于疯狂的所谓“大和魂”、所谓“日本精神”，没有一个字或一个镜头的批判、检讨和反省；它所传达的，是对于“日本精神”的败北——所谓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败北——的无限感伤悲愤。不错，宫内的侍从官曾经对于劫取天皇投降诏书的“玉盘”的军人说：“你以为这就是日本精神吗？”或者类似的话。然而，这充其量只是对于圣德慈怀的天皇做了另外一个注脚和饰辩罢了。尤其从全片的意念去看时，更是这样。

日本曾经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一步步走向错误的道路，终至于闯下了将要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黑暗、最可怕的梦魇般的滔天罪行。但是，在日本军阀所驱策下战死的三百万日本军民的后代刚刚进入二十岁的弱冠之年；在被日本军部所残杀的中国、缅甸、南洋诸岛的民族还灼然地记忆着悲伤的哀思的二十年后；在被日本军阀摧残而至今仍然收获着那悲惨的后果的各个国家还没能从伤残中立起的今天，日本人不但早已忘却了他们的战争责任，还在以大规模的财力、意欲，从无底的阴冥中，唤起那侵略的爱国主义、皇室崇拜和大和魂的亡灵来。这实在令人颤栗，也令人哀伤。

〔3〕

这个日本军阀的招魂者，还披了一件和平的外衣。天皇和铃木内阁总理大臣都说：

“——从此日本将再建设为一个和平之国。”

“——日本国民应当各守其分，同心协力地再建一个和平的日本。”

“——日本的再建，是绝对可能的。愿日本人民永志这次惨痛的失败，不忘这次和平的重大代价，慎勿重蹈覆辙。”

这些“玉音”，如果没有一份对于日本过去的错误怀有深沉的批评，没有首先检讨爱国主义、天皇崇拜与大和精神，那么，这些声音，不但是虚伪的，而且还能煽动健忘的日本人的某种卷土重来的敌忾之心！

是的，正是这样。在《日本最长的一日》里，天皇、内阁重臣、军部主要将领——如阿南陆相、米内海相——看起来并不必负起战争的罪责。他们看起来，不是令人觉得他们本来就爱好和平、不赞成战争，就是只因保卫日本国体、尽忠日本而至于死的。于是，整个的战争责任，都落在名不见经传的军部里少壮的中下级将校，尚且还为这些中下级将校塑成个个忠于皇室，人人为日本的命运，宁为玉碎，至死不辱的忠烈军人典型。就像这样，冈本喜八瞒天过海地取消了日本军阀对全世界人道的良心所亏负的精神债务，只手遮天地掩盖了鼓动整个罪恶战争的军部、内阁重臣的责任，这该是一个多么大的欺罔手笔，是个多么放胆的谎言！

也正是从这种招魂的阴暗用心出发，《日本最长的一日》对于若干凭着正义和良心，英勇地在地下、在监狱里抵抗日本侵略主义的日本人的典型，完全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

显而易见，战后二十年来的一部分日本人，对于他们过去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完全失落了应有的羞恶和认罪的意识。他们不但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还明目张胆地向全世界宣言他们的诡辩，公开地招引日本帝国主义的封建军阀的亡灵。没有某种犯罪意识，没有反省和批评精神的和平建国论里，该包藏着多少危险，多少威胁和恫吓！

〔4〕

从《日本最长的一日》的戏院走出，心情是非常沉痛的。我们不禁回想：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怎样第一个成功地适应了变动中的现代世界，她怎么样在老大而停滞的亚洲地带头一个站立起来了。然而，她非但没有好好地联系和扶持她的亚洲的穷困的兄弟国家，发了财，显了名的少年日本，逐渐走向英国，走向西方，终于也学会了一身一手的势力眼，学会了帝国主义。至此，她不可避免地鼓动了贪欲的罪恶战争，让她的军队在中国的北方，夺取他国的利益。然后，在第一次欧战里初试锋芒，在战争中取得利益的日本，又一度离开亚洲的弟兄，同德意一道，敲起了入侵中国的战鼓。然后，她也初次尝到了所谓日本史上的第一遭败北。

在战争中茁长，又在战争中失败的日本，又在韩战和越战中“再建”起来。上天惠于日本的，是何其优渥啊。她竟连“国民各尽其分”的努力都不要，而在另外的战争中恢复起来。而恢复之快，竟使她全然忘却了过去的罪恶，而且偷偷地使棒弄刀，大有卷土重来的意思。

作为一个亚洲人，作为一个帝国主义的被害人，我们并不一定去清算日本过去的罪债。然而，作为新生一代的中国人，我们必须严重地关切——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新世代的亚洲人一块——《日本最长的一日》所散播的危险意识，深刻地、全面地检举、批判这召唤日本军阀阴灵、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企图在“日本的第一次败北”的敌忾气氛中再度煽起战争的火种，阴谋把日本带向再武装，再侵略的道路的《日本最长的一日》。

最牢固的磐石

丰富中贫乏意识

鲍勃·狄伦 (Bob Dylan)、琼安·贝滋 (Joan Baez) 和彼得·西格尔 (Pete Seeger) 的民歌唱片，虽然一直不曾引起此间读书界比较广泛的注意，但是，据我所知，一小撮爱好音乐的青年，断断续续地倾听着他们的歌声，也有四五年了。以我自己来说，因为粗陋寡闻的缘故，在今年八月以前，是一直不曾注意到它的。九月间，为了满足关于这个极有意义的歌谣运动的知识之渴望，请了白中道、戴文博二先生做了一次十分精彩的对谈。这对谈的记录，已经在本期的《文学季刊》上发表了。

就以这个对谈做根据，倘若将三十年代的第一次民歌复兴运动和民歌六十年代的第二次复兴运动做一个比较，至少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地方：每当美国人民开始对于既存的信念和价值发生疑惑的时候，他们就去倾听那些俚野中的歌声。但是，在这一个共同点里，因着不一样的历史背景，自有一些微妙的差异：三十年代的美国的怀疑运动，具有全球性的背景。欧战后的大不景气，使西方的知识界对于因工业主义、殖民主义而膨胀起来的整个西方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全面性的疑惑，也便引起了极为尖刻的自

我批评。在这样的条件底下，被聪明的罗斯福总统雇用的知识分子，便以一定的意识形态，去发掘和整理那些流荡在荒废的山间、疲败的农场和瘫痪的城市里的民歌；并且也以这一定的思想，从事民歌的再生产。

但是第二次民歌复兴运动开始的时候，正是美国的社会最富足的时期。特别是对于那些成为第二次民歌复兴运动最主要的听众的大学生，更是如此。他们出身于富裕的中产以上的家庭，在学费昂贵、校誉优良的学府中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在这富足之中，也开始了一种批评意识。中产阶级生活中的恶俗、虚伪、罪恶和人与物的倒错，仿佛在那些俚野的、辛酸的、愤怒的歌声中，显得更无法忍受了。攻击虚饰而堕落的中产阶级生活，是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特色之一；以富裕的出身为耻，为罪恶，并且把穷人和穷乏本身理想化，又是旧俄时代民粹运动的主要精神，也曾影响了有岛武郎的文学和当代的日本的思想界。

这种中产阶级的自我厌恶和犯罪意识的·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色彩，是第二世代的民谣复兴运动的物质之一。在我们的读书界，似乎很流行着一种于“群众社会”的无限恐惧和憎恶的思想。对于把群众偶像化的观念，怕是要轻蔑地说：“太理想主义了！”对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简直就是幼稚、愚蠢和感情冲动的意思。不错，群众有他们的愚昧，甚至于罪恶罢。但是，倘若不晓得从环境和发生上去了解这些愚昧和罪恶，而一味自封为一个何等高级的知识分子，那么，他便永远也不能享受群众的社会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惊人的智慧和美德。这，单单看这些民谣唱片中的歌词，就很明白了。

为了逃避中产阶级的现实，各种“精神溶涣剂”在中产阶级中被前所未有的广泛度中被使用着，引起了美国立法和卫生当局的重视。据这种“另文化”的地下小群的理论家们说：服用这种

麻醉药剂，非但不是消极的避世主义，反而有积极的意义。这些药剂所带来的幻想世界，使人们了解到：在日常的现实的背后，还有一个更炫美、更其广阔、更其丰富的世界。他们于是开始怀疑真实世界的真实性，也怀疑日常自我的真实性。他们感到自己一向被这种日常的现实和自我所欺骗了。真正的现实，便是药剂作用以后的那些迷幻的宇宙！这个药剂所给予他们的教训居然是：现实问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怎样去开拓内在的“自我”，怎样去释放囚锢在自我里的“神”。

像这样，怀疑经验世界的真实性，追求所谓“真实背后的真实”，以致于用理念或精神去解释宇宙的哲学的事，在人类的思想历史中，也不是一个新奇的事。从另一方面去看，正如“理想主义”和“观念论”都写同一个字——idealism——一样，以麻醉剂为基础的观念论，恐怕正就是它所自来的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的必然的发展，也说不定罢。

然而，这样的观念论，在美国，也并不是没有它的反论的。以我亲耳听见的，除了如戴文博、白中道那样极力拥护使用“精神溶化剂”的，也有一个美籍犹太青年说：“我和我的妻子使用过marijuana，但我已经和它诀别了。我不再用它，重要的是我必须做点什么。”另外一个可爱的美国女孩儿也说：“我用过marijuana，但我并不着迷。我觉得人类所被赋予的条件，足够叫我们去对付这个世界而有余，而不必借着药物去刺激它。”这个可爱的女孩儿，却正好是戴文博现在的女友哩。

似乎从来没有过一个民族，像今天的美国一样需要用药剂来帮助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非现实的世界里。这，自然有它的许多社会的和经济的因素罢。这个大的麻醉药运动，暴露了美国电影在发展中国家里被艳称的“美国生活”的实质上的贫困，当然，也暴露了做为对于这种膏粱的中产阶级的精神贫困之反动的·理想

主义的贫困性。

然而，无原则地忽视或嘲笑这样一个贫困的理想主义、也是错误的。在成千万的“疏外者”所建立的“嬉皮世界”中，他们以可悯的姿态去实践了他们对于爱，和平主义，宽容，正义的理念和各种乌托邦式的公社生活。就以一个人来说，在他的一定的年纪里，他会反抗、热烈地追求他自己的理想主义。这种反抗和理想主义，或者也不免于幼稚罢。但，重要的是，他是否能把这反抗和理想主义成熟化了，带到一个更成长的年代里去。跟这个一样：今天美国的迷惑、的理想主义之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她能不能克服它的贫困性，而发展一种全新的、具有建设意义的理想主义。

而倘若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此间的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我们是即便这么贫困的理想主义也没有的。理想主义在此间极端的贫困，又为一种特殊的条件所不断地再生产着，致于连这种贫乏意识也没有了。则要他们对于自己有所憎恶，有一种犯罪和贫困的意识，就不知道是要几千年以后的事呢？

老掉大牙的人道主义？

在这种普遍的理想主义的贫乏症里头，黑泽明的《红胡子》，在此间知识界中冷漠的反响，也许是意料中的事罢。他们对于《红胡子》的失望，据我所知，不外乎两点：第一、在内容上，它“只不过”表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而人道主义这个东西，实在是一个老掉大牙的思想，丝毫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甚至想起来都有点儿肉麻兮兮的；第二、就形式上来说，黑泽把它拍得太过于简单了：简单的故事，简单的手法，太过分明白的对话等等。一切不用去猜想、去苦思，不能叫他们拍案叫绝。他们想去猜谜、

去感受、去“发掘”俗人所不能理解的奥义的一切预备，差不多全落了空，因此不但失望，甚至有点恼怒也说不定的。

要说一种思想已经过时了，老了，至少要有两个条件。首先，就是产生这个思想的实际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有了新的性质；要不就是这问题已经根本不存在了。比方说，“寡妇再嫁是不贞的”这个思想，在今天，确乎是一个过时的，旧的思想。因为新建立的市民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改造了农业社会时代的两性的伦理。倘然今天有谁还站在过去的道德观点，描写寡妇再嫁的问题，便是一件可笑的事。其次，就是更新的、更进步的学问或思想，修正了或否定了旧有的思想，则原来的思想，便可以说是过了时的、不切实际的思想。比方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认为是天体在运动而地是永远静止的思想，早已被更为科学的天文学说否定了。倘若今天还有人公开宣传着天动地静之说，这人便值得嘲笑。

然而黑泽所表现的问题性和思想性，不管从哪一个观点去看，都没有什么“过时”之处。正相反，贫困、饥饿、愚昧、不正和压迫，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直都是、而且愈来愈是一个急迫而深在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我们不能想象之多的人口在营养不良、恶性的饥饿、永续的贫困、无知、医药缺乏和道德堕落中挣扎着。我们也无法想象多少惊人的掠夺和压迫，正在甚至以国际性的范围进行着。除非是谁能证明这些早已不复存在，或者说认为提出或批评这种泛在的罪恶已经是过时的思想，那么，黑泽提出的问题性，便不但不曾“老掉大牙”，而且具有无限生动的现实性。

诚然，在这个现代人的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的现实，比方人的物质化、疏隔的悲哀、虚无和颓废的必要性，个人的、安那琪的悲愤，对于定命的死亡的惧怖等等。这些，或者是我们的比较高尚的，教养良好的，神经纤细的知识分子所关切的罢。然而，

倘若不能够把这些同整个现存的根本辄铄联起来想，他便不算是一个真正懂得这一切的不安的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把悲愁放在嘴唇边玩弄着的，造作的 Stylist 罢了。

问题还不仅是这样。当世界瞩目的黑泽，花费巨大的努力去制作这一个“前·乔伊斯”风的（Pre. Joycian）作品的时候，正是日本文艺思想最热中于颓废的、夸张肉欲的、绝望的现代主义的时候。日本的知识界，在一九六〇年的大挫折以后，便又掉落到极为巨大的徬徨里。黑泽的这个努力，尤其在这样的背景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我来说，从阅读剧本所了解的安东尼奥尼，和以《8½》为代表的费里尼，比起黑泽的这个制作，实在是为之黯然失色了。从《日瓦戈医生》和《红胡子》看来，“前·乔伊斯”的艺术路线，实在是还潜藏着丰富的可能性的。

倘若连黑泽的理想主义也要嘲笑，那么，就嘲笑罢。他们还是要轻蔑地说：“黑泽这个家伙，太理想主义了！”是的。连被知性的贫困和金钱贪欲堕落得不像样了的台湾的医生们也会说：“黑泽这个家伙，太理想主义了！”那些在还没有考进医学院就满脑子“颜如玉、黄金屋”的医学学生也轻蔑地说：“黑泽这个家伙，太理想主义了！”那么，我们的读书社会对于黑泽的这一制作的冷漠，岂不是很自然的吗？

在旧约圣经上，曾经记载着所多玛和蛾摩拉两个荒淫、败坏的城市，因为天谴而遭毁灭。在《嬉皮世界》中追求爱和真理的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当谋杀和败德的阴影开始笼罩了他们的理想之国时，悲怆地说：“你永远没法在所多玛和蛾摩拉城寻见神和爱。”

我们还不曾有类似美国那样的物质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但，倘若我们的心灵世界都像这两个败坏而麻木不堪的城市，这该是多么叫人寒冷而又寒冷的事呵！

真理的伦理条件

理想主义受到犬儒式的拒否的理由之一，便是说理想主义具有极大的欺罔性。一个美丽、崇高的理想常常带来丑恶而寂寞的幻灭；一个美丽而动听的理想，又往往成为压迫者或劫夺者借以施行压迫和劫夺的糖衣。朱力·达辛的《勇者之死》里的牧羊人，因为受到扮耶稣而来的理想主义所崇，在证实郊外的难民同胞染有霍乱之说只是毁谤的时候，欢欣鼓舞地来到主教那里。结果，他的满腔爱心换来的，只是屈辱的掌掴、悔改和痛苦地承认一个明白的谎言。同样一本圣经，却被这小镇的权力和财富的所有者做为他们自己存在的神圣的凭据。

理想主义否定论者还可以在历史上、社会上举出成千上万的类似的、而又真实的例子来。但是，倘若因为这样阴惨的事实而拒绝了理想主义，其结果比因为现在的医师、律师之不道德和堕落而整个否定了医学和律师制度，还要可怕。因为，倘若这世界上的恶者连理想主义这么一个敌人也没有了，则他们的恶德，便不知道要以多么凶狠的姿态去吞噬这个无告的世界。

事实上，这些悲愤的，极端的理想主义否定论者，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首先，他们不晓得理想主义是没有绝对的，永恒的性质。理想主义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换句话说，各个不同的历史的、社会的背景，有其不同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相应于这个不同的需要，便产生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理想主义。比方说，在农业社会的古中国，在从比这个社会更落后、更原始的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规模的时候，便有了适应于这个特殊历史阶段之需要的理想主义。

· 比方说：孔子的一切教训所建立的理想主义——一个君、臣、父、

子、兄、弟、朋友、男、女之间上下秩序整然的社会，以及维系这样一个社会所必要的孝、悌、忠、信、慈、仁、和等等的道德体系。这种理想主义，对于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一套完美、智慧的发明，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是，正如我们所熟知，这些在古代完美的理想主义，有一大部分已经不适合现代化了的中国的需要。而我们今天还用得着的一部分，也须要予以新的解释。倘若现在有人以为孔子的理想主义欺骗了他，这个责任，当然不在孔子。《良相佐国》里的汤麦斯·慕尔爵士，便是不明白经过海外商业殖民而大大地发展了的商人中产者的英国之与旧的天主教会决裂的必然性，徒然地做了悲壮的反抗。他的悲剧不在乎他的诚实与谦冲的优美性格，也不在于野心勃勃的君王与现实而有些败德的新权贵，以及“见风转舵”的英伦教会，而是在于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

这样，理想主义自有它的历史的，阶段的性格。一种理想主义在一定的历史的阶段中，具有推动、发展当时的整个社会与文化的使命。

其次，倘然明白了理想主义的非绝对性与非永恒性，便能明白理想主义的双重性质。所谓理想主义的欺罔，便在这个关口上。在一个时候，理想主义是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无可打败的力量；但是在另外的时候，同一个理想主义，却成为阻止、压制人类社会与文化向前发展的力量。这种所谓理想主义的欺罔，大约有两个十分贴近的原因罢；

第一、某种理想主义既然有它一定的历史性，则历史改变了，由过去的、旧的历史条件所创造的理想主义，便失去了它成为“理想主义”的条件。而倘然有人要用一切政治的、权力的巨大力量，强行将“旧的思想主义”套在新的、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便有了所谓理想主义的欺罔。在我们的父亲一代，多少“孝行”、

“贞节”的名目被用来压制年轻的、富有创造性的世代，便是极为浅显的例子。

第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总有一小群随着那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而掌握了地位、权势与财富的人。这些人，为了不愿意失去他们这一切既得的利益，便一方面不愿意一切足以使他们这些既得利益失去的一切变化发生；另一方面，他们要千方百计地为他们既得利益，与保持这利益所必要的秩序，找最有力量的凭据。小镇上的神父与财主制造了谎言，诬称他们那些流浪的同胞患有可怖的霍乱，免得这些人破坏了既有秩序。神父不在圣经中寻找“爱人如己”和施舍的这么一个简单福音，却强调财富的祝福是神所分配与应允的教训。“爱”、“正义”、“怜恤”是世界一切宗教至极浅显和直接的，共同的理想主义。然而，一直到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着因为肤色而拒绝一个人进入教会团体的事。

但是，理想主义否定论者，在这一切事实俱在的黯面里，没有进一步去看见；正在这一切黯面的背后，存在着理想主义的得胜的凯歌。

正因为拥有既得利益者，由于至死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既得的这个贪欲，他们已经注定了不能正确地接受不断发展中的新事物。他们因而不愿意或不可能明白压迫与劫夺是不对的，他们不愿意或不可能明白历史向前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抵抗的。举个例子说：清朝的当权者不愿意或不可能了解民主主义的潮流是不可抵挡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愿意或不可能了解殖民主义的罪行是必然要成为一种永远不再存在的恶梦。小镇上的神父与财主不愿意或不可能明白压迫、掠夺与欺骗是行不通的。也因为这样，专制思想、“大东亚共荣圈”与“财富是神所分配”的口实，一定会被揭穿的。

这样，在所谓理想主义的欺罔中，便有了一个立场的问题。只有同财主的父亲作了坚决的诀别的儿子，才能明白整个的真理。至

此，真理便有了伦理的条件；真理只对于那些站在正确立场——正义立场的人说话，就如真理只面对起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却背向日本军国主义劫夺者一样。

真理本身或者并没有伦理的因素罢。但了解与掌握真理，却有了明白的伦理条件。是的，真理的伦理条件，这便是理想主义得胜的最牢固的磐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知识人的偏执》

自尊心和人道爱

——电影《甘地传》观后的一些随想

命运的旅程

在殖民者母国大英帝国接受了完整而高等的法律教育的甘地，其实是完成了一种依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后的甘地。他西装革履，留着西式的头发，接受西方高等知识分子的全盘价值。他真实地相信过，完成了自己的英国化改造后，他和大英女王下一切英国高等知识分子之间，在生活上、社会上、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他于是一身英国绅士的打扮，来到英国的另一个殖民地南非，理所当然地打了一张头等火车票，在舒适的车厢中，毫不自觉地瞭望着另一个遭受英国殖民主义所蹂躏的荒芜的非洲大地。

然而，尖锐的种族歧视，使他在这首度的南非之旅中，遭到了最深刻的侮辱。在不屑与他共乘头等车厢的白人的举发下，他被半途撵下火车。就在那个不知名的、荒凉的非洲小车站，甘地苏醒了过来。

对于广泛的第三世界，这种情形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极为真实的：不论是在新的或者老的殖民地，殖民地知识分子从殖民者那儿接近了现代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一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知

识起了仇视、轻蔑、怨毒的心。他们于是听信了殖民者，极力按着殖民者的形象去改造自己，极力要和自己民族的传统断绝关系。这固然造就了许多许多像来到非洲前的甘地，终其一生西装革履，吃西餐、讲英文的印度绅士，在衣不蔽体、三餐不继的亿万印度同胞中走来走去，但也造就了在殖民者所给予的知识中张开了眼睛，或者像甘地那样一直到用自己的体肤感受到殖民者深刻的压迫和侮辱之后才苏醒过来的殖民地知识分子，去团结自己的同胞，同殖民者展开长久而艰难的抗争。

在南非，他遇见了把反抗深深地沉埋在心中，却在印度苦力同胞与英国殖民者的夹层中隐忍偷生，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印度商人和知识分子。甘地，凭着他从英国学来的法律正义这种单纯的信念，展开了他的抵抗。他带领着在南非印度人民的口号，是“我们同为女王的臣民，应该享有一切女王臣民所共有的权利。”

在历史和生活还没有教育甘地更深刻地认识到英殖民主义的本质以前，甘地要求取得女王之前的平等的单纯性，预告了甘地日后行动和力量的最丰富的泉源：对于真理和人的尊严的单纯的、毫不假借的信仰。

回到印度以后，为了更深地理解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在破败、拥挤的三等车厢中，他横越了赤贫的祖国。西装头不见了，西装革履变成一身素朴的民族衣裳，头等车厢改成三等车厢。一路上，他看见在贫困、无知、疾病、压迫、文化解体 and 信心丧失中煎熬和喘息的祖国和印度人民。命运的旅程啊！在南非，殖民者的恣意的侮辱教育了他，使他张开了眼睛，在广袤的、荒芜的、贫困的祖国，残破的山河和水火中的人民教育了他，首先是印度人民的，然后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甘地，就在这命运的旅途中一寸一寸地形成，终而成为摇动了整个大英帝国，震撼了一切种族压迫体制的巨人。

单纯的信念

对于单纯的真理的单纯的信仰——和毫不妥协的实践，这就是印度圣雄甘地伟大力量的泉源。他单纯地相信：人，包括压迫者在内，有不容任何差别的尊严。他单纯地相信：压迫、掠夺，不只是施加于奴隶和被压迫人民的罪恶，也使压迫者堕落，成为罪人。他单纯地相信：压迫，不但对于被压迫民族造成道德、精神的沦丧，物质和社会的灭破，压迫的毒汁，也同时深深地攻入压迫者的内心，败坏他们的文明、精神与道德。他单纯地相信：手段与目的是合一的。为了达成自求解放的道德目标，他严格地、不容妥协地要求抵抗和斗争手段的道德性格。他单纯地相信：暴力、流血、互相残杀，徒然使一个道德的抵抗者矮小化，与压迫者同样沦落为罪人。他也单纯地相信，同英国殖民体制做斗争，不单只是为了求得印度人民的解放，也为了拯救英国人民，不让英国人民被自己施于别人的殖民主义的毒瘤散播出来的毒素所毒害。他单纯地相信爱。为了爱残破的祖国和水火中的人民，也为了爱在压迫的罪恶中堕落的统治者，他坚定地走上不抵抗的抵抗之路。

甘地的信念，或者有印度传统哲学的神髓，却丝毫没有它的繁琐。甘地的信念，受到职业革命家的嘲笑和蔑视。然而，恰好是甘地对人应有的形象的单纯至极的信念，恰好是甘地那排除了一切权谋、得失和利害而信守着万古常新、简单而又深刻的信念——爱和真理，使一个半身袒裸，裹着自织的土布，瘦小甚至佝偻的印度老人，摇动而终至于崩坏了巍峨的、坚固的、庞大无比的英帝国主义的大厦；使相互对立、仇视、纷争的民族重新团结；使处在文化解体、信心沦丧的人民重新找回自信和自尊……

解放后的血腥

甘地之死，也极富于历史的象征意义。甘地没有死在殖民者的牢房里，也没有死在殖民者的刑场上。正如一个亲吻使拿撒勒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另一个亲吻之后，甘地死在自己同胞的枪弹中。

经过长远、艰苦的斗争，二次大战后的殖民地世界，初步取得了解放和独立。然而，解放后的殖民地，却一仍充满了所谓“解放后的血腥”：连绵不断的杀戮、监禁、纷争和猜忌。固然，新式殖民主义是这一切大规模自相杀戮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独立”后殖民地人民失落了一种如甘地那样对人的真诚的信念，失落了对真理和无差别的众生之爱——而这些，在整个第三世界的传统文化中，一直都以不同的样式丰盛地存在着——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罢。

今天，阶级差别，贫困、疾病、无知、文盲、和政治上、宗教上、种族上的纷争、猜疑、残杀、压迫、文化解体、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像一场广泛的慢性疾病，荼毒着包括甘地的印度在内的辽阔的第三世界。正是在这个基督上，过去的西方压迫者和榨取者，一仍以它的资本、商品、技术和管理，君临着古老的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大地上，吸取它的血汁，破坏它的文明，崩坏它的精神，而形成了深在的危机。那么，甘地能够给今天的殖民地奴隶的后裔们什么样的启发呢？答案也许是：从自己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中寻找像甘地那样单纯而又万古常新、简易而又深刻的信念，重新为自己建造对人、对生活和对世界的信念，并且像甘地自纺自衣一样，批判地拒绝西方以强大的组织加于我们的消费商品和消费文明，坚定地相信众生之爱，坚定地拒绝相互杀戮和

猜忌，为民族团结，世界和平和正义，顽冥不懈地奋斗……

羞愧的眼泪

在观赏“甘地”的戏院中，步入中年期的自己，竟数度簌簌地流下眼泪。那是自己羞愧的泪，是自己责备的泪，是尊敬和感铭的泪。把爱和真理习惯地挂在嘴上，却经不起甘地一生行踪的深刻的批判和责备的我，是何等的不堪。但我也眼见有不少的青年，竟不耐三个小时的片长，中途纷纷离开戏院的情况，而感受到另一种深沉的悲哀。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华杂志》二三八期

《侵略》和《侵略原史》

——介绍森正孝先生批判日本 侵略历史的两部杰出记录影片

自一九七二年以来，胡秋原先生的《中华杂志》每年举行七·七抗战纪念演讲会。

今年比往年有一个重大的特点，那就是，透过台湾旅日立教大学戴国辉教授的邀请，请到了在日本长年从事呼吁日本民众反省日本过去的战争犯罪，从而揭发当前日本再扩张危机的森正孝先生（日本高松中学教谕）、石岛纪之先生（日本茨城大学助教授）、姬田光义先生（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和粟屋宪太郎先生（日本立教大学教授）来台参与七·七抗战纪念演讲会。森正孝先生并且带来了《侵略原史》和《侵略》两部发人深省的记录片，将在会中首次向台湾观众公映。

森正孝先生的《侵略原史》，主要地在说明日本近百年的历史，是日本向亚洲不断侵略的历史。日本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历史，实际上是明治维新后对朝鲜和江华岛的侵犯，继而并吞台湾和朝鲜，又继而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不断扩张和侵略的历史。日本的“发展”和繁荣，便是这样以全东亚各民族和民众的痛苦做为代价的。森正孝先生进一步指出，在这日本侵略史的结构中，有关当年日本对台湾的作为，不但受到日本历史教科书有意隐讳，即一般日本民众和文化界也加以忽视。日本对台侵略的重要性，在于日本对台殖民支配的具体经验，对日本帝国主义有“范本”的作

用，用来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嗣后侵略朝鲜，侵略中国大陆的指导经验。因此，台湾成了日本对外扩张实行殖民统治的实验基地，并成为日本侵略政策最原始的历史。

在《侵略原史》中，森正孝先生描写了日本侵台的三大时期。第一期包括《马关条约》下日本以武力攻略台湾，台湾民众激烈的抵抗运动（一九一五年的西来奄事件）；第二期包括以儿玉总督和后藤新平民政长官为中心的对台经济掠夺的阴险的怀柔同化政策，以及雾社抗日事件。第三期包括自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十五年中日战争中在台湾进行的“皇国臣民化”政策（通称“皇民化”运动，即强制台民改日本姓名、神社参拜和征兵令）和台湾军事基地化政策（物资、劳力和兵员的动员，做为日本向南洋侵略基地）。片中并且有一位台湾出身的原日本兵生动的控诉：“日本人能理解我们这种悲苦的心情吗？他们不但不再追溯往日的战争责任，如今却重又在东亚极力建设为经济、军事大国，长此以往，我们可以不加闻问吗？”

另外一部记录片《侵略》，记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爆发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陆全面侵略的过程，以及侵华战争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和残酷的“三光政策”（烧光、抢光和杀光）。

森正孝先生认为，二次大战以后，在日本所谈及的战争体验，一般地集中在日美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被害与悲惨。然而，对于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战争，却殆不语及。这种错误，绝不单是日本人急于依史实直言，甚至否定史实而已，而且成为深植在战后日本人意识过程内质，从而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着日本的机会主义和对亚洲人差别主义、歧视和排斥主义的根本契机。今天，日本已经在形成“防卫日本经济成就”、“抗拒国外压力以保国”的舆论，逐渐使日本走向再武装、再扩张的道路。森正孝苦口婆心地要告诉日本民众者，正是要唤醒日本公民的犯

罪意识，不使日本重蹈侵略的覆辙。森正孝先生和这次来台演讲的日本文化人，值得一切爱好和平的中国公民的尊敬。中日两国真正的和平与团结的事业，应该从中日两国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民众，在坚决批判侵略和共犯结构的基础上坚定地团结开始。

——一九八五年七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台湾第一部 “第三世界电影”

电影《沙哟娜拉·再见!》的随想

黄春明早在六十年代写成了他著名的小说《沙哟娜拉·再见!》深刻地反省了以日本“买春观光”为焦点的日本战后资本主义对亚洲的冲击与加害，明显地标明小说家黄春明在批判思想上的高度敏锐和前进的性格。

日本人对于亚洲妇女肉体的嗜欲，象征着日本经济帝国主义对利润的嗜欲。因此，黄春明以日本“买春旅行”为主题的小说《沙哟娜拉·再见!》准确而高度形象化地批判了战后日本在亚洲人心目中的日本像，也把握了战后日本经济帝国主义在亚洲“进出”的问题焦点。黄春明的问题意识，其实在小说中日本买春团体以“千人斩俱乐部”为名时，便直指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军人在南京和其他地方的暴行，生动说明了日本战时和战后帝国主义的同质性。

为了电影的影像思考的需要，黄春明使电影剧本更为丰富了起来。在中正机场上随台湾赴日观光客涌入的日本货品，在夜的台北市闪烁的日本商品广告，列队流入台北的日本买春队伍，都使得几乎习以为常的日货充斥的生活现象，变成极具批判力的影

像。日政下教育中的语言歧视，台湾媚日文化的残留，台湾年轻一代对日本的盲目赞扬和对日批判意识的缺乏，都以极为生动的影像，直逼我们的良心。在原小说中没有的黄君的父亲，以对日本怀抱无知的倾慕的人物登场，对台湾当下残存的少数人亲日感情做了深刻的反省与批评，也因而使本片的日本批判加深了它的真诚与深度。

在车厢中的一场论辩，是全片的高潮。在日本演员极为认真的演出中，日本与台湾、日本与整个亚洲的战后关系的症结，在影像中有极为生动而撼人心智的冲突和迸发，留下引人深思的震撼。

几年来，有许多我的文学同事的优秀小说在台湾电影化了。一般而言，这些电影化的作品，可能有三方面的缺点。第一，为了市场需要，不必要地增加了庸俗和色情，降低了原作原有的风格；第二，对日本人的描写显得幼稚和过度丑化，日语对白的处理，没有语言上的严肃态度；第三，缺少第三世界电影应有的思想批判性。

由于黄春明亲自改编，电影《沙哟娜拉·再见！》避免了上述缺失。以日人买春为题材的本片，声色场景的描写是必要的，但却没有必要夸张，而不曾损害本片严肃的抗议性格。日本人的事物描写和日语对话方面，由于合作日方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对本片中心意念有深入的认识，表现极为优异，令人激赏。最后，由于原剧本思想上表现出鲜明的对日批判，《沙哟娜拉·再见！》是台湾第一部堪称“第三世界电影”的作品，足以与第三世界其他电影并列而无愧色。

导演叶金胜以素人执导，在尚未看到影片时，不免令人忧心。但看完全片，他的工作，有出人意表的成绩。叶金胜相当程度地忠于原剧本和原作的思想精神。在全片的形成中，有出乎意外的

自然，从而表现出了原剧本的磅礴之气。当然，在细微末节上，不是找不到这样那样的缺失。但在主题和思想的盖地弥天而来的气势下，一些微小的疵误，自然地显得不重要了。这正如读台湾先行代小说巨匠杨逵的小说时，以现代欧美小说美学，或者可以找出一些技巧上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丝毫无损于杨逵小说的成就与意义一样。

《沙哟娜拉·再见！》是数年来台湾新电影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值得一切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青年和市民的注意。它在台湾的卖座程度，直接表现出台湾人对近代史中，中日关系的态度。注目于《沙哟娜拉·再见！》在台湾卖座的人，绝不只是她的制作者印象公司。日本的体制批判系知识界，庞大的日本的右翼文化界，东亚和东南亚反日、日本批判的学界和文化界，都在注视着台湾对电影《沙哟娜拉·再见！》的反应。

对于中国，对于亚洲，日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如何正确地认识日本，关系着中国和亚洲对日相处之道的探索。基于自己民族利益和历史经验的对日本的认识，就不能没有一个批判的态度。台湾的日本研究还停留在极幼稚的阶段。在对日批判异常弱质的台湾背景下，电影《沙哟娜拉·再见！》的登场，就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电影思想的开放

第一次看中国大陆的电影，是在一九八三年访美的时候。那时，爱荷华大学的电影周，有一部《西安事变》，便抱着极大的好奇心去看了。我看的这平生第一部大陆电影，其艺术水准令人有些失望。

后来，我看到了改编林海音原作的《城南旧事》，却叫我震惊不已。到加州，我又看到《骆驼祥子》，也俨然是具备世界水平的作品。我也在加州大学电影图书馆一口气看了一些中国四十年代的老片子的影片和录影带，我这才知道，中国的电影，自有鲜明而卓异的传统，有自己民族的风格、语言、传统和精神。而我于是也才知道，台湾电影和文学一样，有一个因为历史和政治所引起的断层。五十年代以后，台湾新文学和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传统断绝了。而在这断绝的空档上，饥饿地在美国和西方的文学中找寻养分，造成二十年西化、模仿的文学。

而在台湾的中国电影，也因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传统的中绝，一直使模仿好莱坞、香港和东京的电影，长期支配了台湾的电影内容和形式。五十年以来，东西冷战，二体制对立的国际政治结构，如何影响了台湾的文化，回顾之余，有令人震撼的感受。

七十年代以后，通过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台湾文学逐渐呈现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形式与内容。在电影方面，随着战后

第三代导演、剧本作家的涌现，在八十年代初期，初步出现了摸索自己的风格、语言和思想的动向。这一动向，从目前看来，基本上还不很稳定，仍然受到商业主义的威胁，仍然面临着电检、市场庸俗主义、制作上的投机、不严谨等作风的有害影响。它的未来和前途，因此也处在一种极不稳定的状况中，整个台湾新电影的发展，还只是一小群有热情、有理想，却在人力、物力上十分孤立、微弱、无援的处境中。

中国大陆电影在“文革”的摧残和政治的强大主导力之下，当前的情况如何，笔者不得而知。但是由于大陆有中国电影史本身所遗留的、卓越而独特的民族电影艺术传统，再加上经过苦难和生活的锻炼，大陆电影“有话要说”——即在思考和内容上的强力和丰富性，引起我们的注目。我的这种认识，是从有限理解七九年以后的大陆文学而来的。台湾在七九年前后，也出现过一些看来深具发展前途的年轻作家，但却一般地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有深度、更成熟的作品。大陆在七九年的“解冻”后，在历次收、放的转折中，新旧作家，显现出令人瞩目的发展和收获。这是很值得关心台湾文学的人深思和反省的课题。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台湾的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凝视大陆七九年以来的电影、去检视自三〇年至五〇年这一段中国电影的发展，是一个极为困难，却又极为重要的事。当然，台湾可能而且应该发展出和大陆电影不同形式，甚至异质的电影，来最终丰富中国的电影。但是，这发展，尤其在港、日、好莱坞电影长期支配下摸索着走出以台湾的生活为主轴的电影时，中国电影传统的认识、分析和吸收，却是不可缺少的。

环顾这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当西方电影越来越成为个人“艺术”的表现，越来越成为富裕、饱食的白人忧悒、疏离、犬儒世界观的发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电影，似乎应该开始注目于第

三世界的电影。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和出路，关心自己民族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从而探索人间解放和世界新的和平秩序，是目前第三世界思想、文化、文艺和电影的中心主题。

中国新锐的电影人，似乎有必要做更深刻的思考，在目前平实、回顾贫困的五十至六十年代，朴素的人道关怀、真实朴素的作风完成之后，早日迈开步伐，走向更开阔的道路。目前剪接中的《莎哟娜拉·再见！》之所以特别值得关心，是因为它是台湾第一部开展了国际政治经济视野的作品。思想的解放，是电影创作事业之解放不可缺少的基础啊！

——一九八六年二月《400 击》杂志

从一部日片谈起

——论《联合舰队》

在春节前后盛大上映的日片《联合舰队》，有明显、严重的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我们的电影政策单位，大众传播影剧部门、电影批评界和一般文化界，不但没有给予必要的批评，反而给予直接和间接的帮助和鼓舞。

《联合舰队》讨论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但这讨论并不是在反省和批评使日本走上军事帝国主义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从而责究日本侵略战争对各被害民族与人民所造成严重而深刻的损害责任。《联合舰队》讨论的，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日本吃了败仗？”讨论的结果，是当时日本缺少像山本五十六那样通谳西方政治、社会和经济力的军人；是当时日本军部尚不了解军事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是海军部南云元帅的不谙敌情；是愚昧的栗田元帅错误的判断。

在整部影片中，我们只看到地图上战事的推演，却从来没有看见菲律宾、夏威夷、中途岛和广泛南太平洋和东亚地区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攻略下，生命、财产、生活、文化和社会所遭受的至为深刻的被害。从《联合舰队》看来，整个“太平洋战争”，只是大国美国与日本的较量，太平洋地区民族和人民的生命、尊严、愿望和权利，在《联合舰队》的思想中，恐怕比草芥都不如了。

《联合舰队》有日本帝国海军在美国强大海空武力下，受到悲惨的打击，而至于殒灭的大量镜头。有人问：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反省吗？

问题是，战后日本当局在有关二次大战中日本战争历史的教育，一贯只偏重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受到西方重创的历史。而对于日本前此长期劫掠朝鲜、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历史，不是提得少，就是加以大肆篡改。现代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战后长年来掩饰日本在东亚的战争罪行，夸大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挨打、日本军民矢死效命，为国迎战”的一面。这就非但没有丝毫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反省与纠弹，而且把日本塑造成二次大战“被欺负”的角色。日本的战败，主要是因为日美国力、战力的悬殊；日本战败的道德因素——日本扩张主义对广泛亚洲、南太平洋地区民族和人民所造成的，至今犹未平复的严重损害，则非所顾念。像这样危险而傲慢的意识形态，不但是电影《联合舰队》的重要主题，也是日本政府和右翼文化人如藤尾正行战后四十年来锱铢不绝的论题。

因此，《联合舰队》充满了这些“动人”的情节：为帝国日本捐躯效死的光荣；“为了日本国家的存续与发展，必需有为之死命之人，和为之存活之人”；太平洋战争，是为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的生存而战；是为了“不使日本本土成为战场”而战。所有这些推进了罪恶战争的日本将领、校尉军官、军人、士官，在《联合舰队》中全部被写成充满了忠爱日本的国家，充满着纯洁、高尚人间性的人物，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为亚洲人民和日本人民所造成难复的浩劫，没有任何的反省、检讨和批评。

一个以长达八年的时间从事对日本抗战，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付出了重大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的民族和人民，在这受过日本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土地上，竟有电影政策单位，在基本上

限制日片进口的条件下，选择了《联合舰队》这样的日本帝国主义电影上映；我们的大众传播上，除了刊映《联合舰队》的电影广告，还有推介和大力谀扬《联合舰队》的“影评”。到目前为止，我们比较独立的电影评论和文化、知识界的一般，除了王墨林的一篇，也尚未出现对于《联合舰队》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严肃批判。

《联合舰队》在台湾所形成的上述问题点，具体而微地表现了元月末由四五十个自由文化人签署的《电影宣言》（人间副刊，元月二十四日）所提，关于台湾电影环境的三项“忧患”。

如果电影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恐怕就是一种最为昂贵的艺术了。要求新台币千万元或数千万元的投资，电影不但是一种工商业，也是大的工商业。以三个月或半年，投资一千多万元，在上市一两个星期内就见输赢，其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豪赌。为了减少不可捉摸的投机性，为了较好地保证资金回收与利润，走行销主义路线搞企划、市场调查、观众定位、并据以进行剧本写作与影片制作，配合一贯性设计的广告宣传……成了片商的不二选择。因此，电影就像一切消费性商品一样，在操纵新的欲望（需求）和随从并扩大已有的欲望（需求）中求广泛、大量的销售。电影于是不能不诉诸比较卑下、庸俗的趣味：笑料、暴力、色情、偷窥、恐怖、嬉闹和眼泪……充斥了台湾电影的内容。

电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性格，自然也培植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意识形态的电影人：一切以“经营管理”出发，以利润、效率、生产性和票房来衡量一切价值的制作人、剧本作家、导演、影评人……他们以新时代的文化人自居、崇拜和身体力行着资本主义企管上的金科玉律，言必称企划案、市场情境分析、问题与机会分析、目标设定、诉求对象设定、策略设定、行动计划、预算编制与控制、销售计划、广告宣传策略……而于是乎志得意满、信

心十足，对于谈电影思想文化、艺术和理想的人，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轻蔑。对“市场性”和“销售业绩”的崇拜，到了在不知不觉间以之衡量创意、文化、知识和思想艺术之高低和存亡权利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电影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以不同的规模和相同性质，存在于文学、戏剧、舞蹈和音乐上。唯一不同的，是电影的生产成本太高，从而造成了资本和政治对它的干预和独占。以写小说为例，一个小说家只要一两刀稿纸，三枝原子笔，就可以搞他的创作。在作品发表上，他至少有便宜的同人杂志刊登。这样一种形式的艺术，独占就几乎不可能了。出版社尽管可以挑通俗小说大量印行以求利，但严肃作家则另外有纯文学甚至政治反对派的杂志会刊印他们的小说。电影就不同了。大量的资本投资要求着高额的利润保证。于是与“弘扬中华文化、阐扬政策、发挥社教功能……”不但无关，而且完全悖反的《联合舰队》，可以安全过关上市；大众传播因着独占、媒体利益和文化异化的性格，对《联合舰队》不但不加批判与讨论，还为它刊映广告，刊推介的评论，而一些“影评人”也为《联合舰队》极尽辩饰扬喻之能事了。

这样的问题，从某个角度看，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则举世无不皆然。但《电影宣言》却指出了台湾电影文化比较特殊的一点，尽管在资本主义工业的规律下，电影的商品性、庸俗性，举世皆然，但很多国家的政府与私人，毕竟在以一笔相当大的钱，在一些真正具有电影文化训练与眼界的人管理之下，有宗旨、在计划地在强烈商业主义规律下抢救和培植“另一种电影”；尽管在西方，有许多报纸、杂志、电视台……为比较消费性的、庸俗的电影文化服务，但他们的一些具有文化权威的报纸、电视台总是在鼓舞、发现和评论优秀的“另一种电影”上，不遗余力，而且绝不会用它的版面和时间去为庸俗甚至有害的电影吹捧、

鼓舞；别的先进国家自然也有不少写“速食”式的庸俗电影“消费指南”的“影评人”，但他们自有他们的天地和范围，绝不会也不可能取代在文化和知识上有权威的影评人和电影文化人，甚至要求别人“反省”为什么好电影“曲高和寡”！在西方，电影生产上的行销主义，有千万倍于我，但他们却很知道两种不同的“利润”：票房现金利润、和高度文化、艺术评价所代表的另一种抽象，却无从以金钱翻译的“利润”。《电影宣言》发表以来、政策单位和若干导演、制作、剧本作家和“影评人”、大众媒体影剧主编的初步反应（人间副刊，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恰好进一步说明“宣言”的三点“忧虑”，有严肃的现实基础。

《电影宣言》的对象，其实是一种电影生产与再生产体制所延伸出来的文化的问题。老实说，认识和语言上恐怕都不免略嫌单薄的这一纸“宣言”，要改变傲岸巨大的台湾电影产业结构，是近于绝望的。如果赢得四五十个文化人签名，在传统电影结构的冷眼和冷笑中不了了之，则莫若积极地想出可行的后续方案：例如成立求“新电影”工作者的知识与文化上的组织；尝试用ENG或八厘米等低成本手段拍短片；筹办定期短片发布会；组织接受团体约订机动巡回放映作品的结构；设立艺术电影院；强化各大专青年电影欣赏、研究与讲解活动；发展记录电影的知识、理念、技术和实践等等。

光复以后，有四十个以上的文化人出面为一件具体的文化问题签名的事，恐怕在“宣言”外，少有别的例子。依我看，许多电影文化圈外的朋友签了名，应该理解成不单是关心目前台湾电影，而是在全面商业化、庸俗化、消费化环境下发展“另一种文学”、“另一种音乐”、“另一种舞蹈”、“另一种传播”、“另一种戏剧”……怀抱着深刻的关切。台湾电影文化的提升，基本上关连着台湾各领域文化在知识、思想和专业上的飞跃。没有这全面的

飞跃，单独电影一门的提高，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电影宣言》所揭示意义，就不仅仅是对现行文化体制的“怀疑”，而是全面的反省、再思考和批判：为了重新思想和逐步建设目前阶段的，具有当代中国民族独立风格与面貌的、批判长期依赖西方的，新的知识、文化、思想和艺术。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台湾内部的日本

——再论日本战争电影《联合舰队》

关于日片《联合舰队》的拙论，引起了两位读者来信，对拙论有所批评。现在针对其中既无署名、又无通讯地址的一封所提起的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对于让我们理解一九五〇年中期以后，日本战争电影结构性的“右倾化”历史和意义的理解，应有一些助益。

这位匿名的读者对拙论的反论，可以概括为这几点：

一、“联”片“确实是有很重的军国主义色彩”。“但若不如此，实不足以纵论太平洋战争始末”。

二、“联”片的主题，“只是讨论日本对战争所持的态度，及联合舰队覆亡始末而已”，目的原不在讨论“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所以不必“和受侵略人民的苦痛扯上关系”，“联”片何尝有视人命如草芥的思想？

三、“联”片并不是日本当局制作以麻醉人民的宣导片，“它只是把日、美国力之悬殊，联合舰队逐渐陷入深渊的惨况，活生生的描绘出来而已”，绝没有说“日本不该为战争负责”。

四、“不要忘了日本当时已是骑虎难下之局，为了阻止日本本土成为战场、为了避免日本被占领、被瓜分”，日本只有战争之一途，“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

五、“为了挽救国家，日本只有奋战到底”……“为了日本国

魂不致断丧，也为了日本存续发展”，“自然‘有人必须为之死命，有人必须为之存活’。”

六、日本海军不能与日本军阀一概而论。“日本海军受制于军阀内阁”，“否则又怎愿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

这样“坦率”的反论，老实说，即连实际上思想亲日的人，都会觉得不安吧。对于这样彻底的亲日论，恐怕只能引用日本人自己对日本战争电影的“右倾化”批判代为答复，或者他才能入耳吧。手边新从友人处借得日本著名的影评人山田和夫（Yamata, Kazuo，一九二八）所著《描写战争的眼光：虚伪的影像》（新日本出版社，一九八四），恰好深刻地回答了这位匿名读者的问题。

为侵略罪责翻案

山田和夫指出，在美国占领军比较自由主义的官僚们“指导”下，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电影，有迅速的发展。许多深刻而痛烈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罪行的优秀电影不断推出（如木下惠介：《大曾根家的早晨》，黑泽明：《无愧于我们的青春》，等等）。深受侵略战祸洗礼的战后日本人民，知识分子和电影人，自然形成了坚实的民主·自由·和平与反战的文化力量。

一九五〇年，美国改变了“和平·民主·非战”的日本占领政策。一九五三年，美日双方共同声明，日本要透过“教育”和“传播”来增进“日本国民”对于“防卫责任”和“爱国心”之自动的精神，并由美方指令日本设立“警察预备队”。山田和夫接着说道：这一新形势最大的阻力，“是怀着痛切的战争体验的战后日本人民根深蒂固的反战和平志向”。

但是，一九五〇年以后的形势，使得败战只不过五年，在战

后未受到批判的日本右翼和战争势力，紧紧抓住了西方的世界新战略形势而复活，开始逐步进行为日本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翻案、恢复名誉的工作。山田和夫说：

“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电影开始陆续登场。在这些电影中，过去的军神复活了（《山本元帅与联合舰队》，一九五六），日本天皇以明星演出而登场（《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一九五七；《天皇、皇后与日清战争》，一九五八）……在这些作品里，太平洋战争和日俄战争变成日本不得已拿起武器的‘自卫’战争，为日本侵略战争和其责任者翻案免罪。山本元帅也成了自始反对对美宣战，无可奈何地战死于前线的‘悲剧英雄’；A级战犯，被看成日本的‘爱国者’……”

进入六十年代，日本开始了电视和音响文化的时代。据山田和夫说，日本对战争的反省和控诉，至六十年代而呈全面性风化。这一时期的日本战争片，受到美国好莱坞电影西部片，大噱头（spectacle）主义的影响（例如冈本喜八：《独立愚连队》中，日军屠杀中国兵的场景，简直就是美国西部片中的白人骑兵屠杀印第安人一样的“过瘾”）。一九六七年，从《日本最长的一日》（导演冈本喜八，同年来台演出，笔者曾以《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一文，加以批判）开始，日本战争电影开始以大资本、“多元性、复合性”的戏剧构成演出，从而达到“使日本战争责任烟消云散，有效地把战争和战争关系人描写成爱国者，忠诚殉国，把从天皇以下的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者加以美化、英雄化、‘人间化’，而达成翻案、脱罪的目的……”山田和夫进一步指出，以《日本最长的一日》为滥觞的，以“大资本·多元·复合性戏剧构成”来美化日本过去的侵略罪案，并为之翻案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电影，到了八十年代的《二〇三高地》、《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和《燃烧的零式战斗机》，达到它的顶峰。

我们这位匿名的读者，一再怒责我“戴上有色眼镜”，“以道德观取代（电影所）传达的主题，而后肆行加以抨击”。山田和夫已经从日本战后电影史的铺排，深刻地告诉了我们日本电影资本和日本右翼战争协力者，在五〇年冷战构造中，长期以来蓄意美化日本战争罪责，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开脱的结构性事实，则我们中国人怎能把“联”片的主题单纯地看成“日本海军如何而战，如何而败，如此而已”呢？

隐藏战争犯罪本质的伎俩原型

山田和夫犀利地指出：一九七〇年后半到一九八〇年，日本军国主义电影掩藏其罪恶目的的几个共同的伎俩，至少有五种：

一、用“爱与死的戏剧”来掩饰侵略战争的本质。以《联合舰队》为例，它的海报上这样写：

“当巨舰‘大和’号开航时，男儿们舍弃了爱情。蔚蓝的大海哟！请为我诉说这苛烈的青春！”画面上是巨舰“大和”号，背景是一个英俊的日本海军士官正和娇美的恋人悻然诀别。小字：“请和您所最爱的人来观赏！”

在《二〇三高地》、《大日本帝国》都也是用这同样的技法。

二、像美国好莱坞式的战争片一样，把日本侵略战争拍得有趣，有看头；拍成一场精彩的运动比赛，使观众有冒险、英雄崇拜的兴奋感，从而转移了观众对侵略战争本质的批评，暗中鼓舞了对过去战争的肯定与崇拜。《二〇三高地》和《大日本帝国》和《联合舰队》正是个中的杰作。

三、“余岂好战哉？余不得已也！”的通辞，也是近代日本战争电影所最喜欢用的技法。《联》片中的山本元帥，被写成自始反对对美开战，但为了服从阁议，知其不可而为之，终至壮烈战死。

我们匿名的读者不也说日本海军部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没有选择”、不得已的吗？不也说因为势成骑虎，“为阻止日本成为战场，被瓜分”而不能不战吗？山田和夫指出，山本不肯轻易对美开战，是因为他深知美国国力之强，不愿打没有胜算的仗罢了。在中日战争中，山本就是日本海军作战司令部负责的校官。当时日本海军航空队对绝对有胜算的中国上海，施行野蛮的、不分军民的轰炸，杀人无数，山本又何曾反对过？何曾表现过一点点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性格？至于怕日本成为焦土，被人瓜分，这位匿名读者可曾追究过：如果日本不先以他人的国土为战场，去瓜分、占领别人的国土，人又何以焦土之、瓜分之呢？

这种“战争宿命论”的伎俩，也表现在《二〇三高地》上。片子开头，画面上图解说明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向亚洲攫取殖民地。帝俄的魔手，先伸出中国东北，而后伸向朝鲜。旁白：“诞生不久的明治维新政府，为了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风暴中找到保卫日本的据点，开始计划取得日本对朝鲜的支配权。”换言之，日俄之战争，不是日本侵略之战，是被逼、不得已的自卫战争。在整个《二〇三高地》中，上自天皇以下，没有一个不是厌于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山田和夫接着说道：“把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说成日本‘自卫战争’，完全是历史的伪造……那只是把日本的战犯责任暧昧化罢了。日俄战争……是一种侵略战争。证据：日本战胜后，取得‘南满铁路’路权和辽东半岛，为嗣后日本侵华取得了最初的立足之地，并在一九一〇年得以因‘日韩合并’而并朝鲜为日本殖民地。日俄战争最大的被害者明白地是朝鲜和中国人民，日本已是加害者。而《二〇三高地》完全无视于此，任意在电影中展开它的‘防卫战争’论……”

我们这位匿名的读者也说《联合舰队》是日本海军自己讨论太平洋战争的家务事，为什么“一定要……对侵犯太平洋地区人

民的生命、尊严表达歉疚？”山田和夫这样回答：“……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强行侵略，受到世界民主势力的非难，引起中国人民激烈的抗战而陷入泥沼的长期战。日本天皇和高级支配阶层为了打开这窘境，而向东南亚侵略，和美国发生冲突。至少，只要把日本行动回溯到一九三一年的‘满洲事变’，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侵华战争延长线上的侵略战争，殆无疑义”。把侵略战争看成日本海军自己内部、与人无涉的战争，这是何等傲慢而无反省的态度！

四、“见树而不见林”，以树忘林，是另一种障眼法。以战争的局部来喻说整个战争的意义，以障蔽战争之罪责，例如《联合舰队》以中途岛之战日本海军一些判断失误和战备、战略的错误，来解释整个太平洋战争，从而暧昧日本根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是，即使日本高层军部官僚英明，没有失误，打赢了“太平洋战争”，日本的侵略就会成功？战争责任就可改写？我们这匿名的读者，很明显就中了这个圈套。

五、再一种障眼法，据山田和夫说，就是“好人被坏人拖累”说，和“人性”说。在《联合舰队》中，海军部是好人，陆军和“军阀内阁”是坏人……山本元帥是开明、和平的好人，那些阁僚是愚蠢的坏人……其实，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的海陆空军，皆在天皇统帅权下，计划和遂行整个侵略行动。日本三军间的差异，惟战略上细微的不同而已。山本五十六任海军次官时代，侵华战争正炽，山本指挥下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对上海军民进行无差别的轰炸，引起国际舆论的指责，则山本何“善人”之有？

所谓“人性说”，是将天皇、山本元帥、东条英机、将校、士官、军人家属，个个描绘成富有人间性，情操感人；个个都是良夫、孝子、兄友、弟恭。山田和夫在引用了有名的社会科学家所说的“人是社会诸关系的总合”之后，这样说道：“离开社会的、

历史的观点而强调的‘人性’描写，就会不断强调人的私的侧面，而掩盖了人在公共生活中的问题点，造成对战争责任的美化、人性化、英雄化、而达到为日本战责开脱的目的。”《联合舰队》中上自山本元帅，下至每一个士官、军属，没有一个不是被写成离开社会和历史意义的，私有、个别的“善人”与“完人”。则善人与完人所遂行的战争，怎么会是罪恶的战争呢？

日本当局和日本战争电影

我们的匿名读者说，《联合舰队》不是“日本当局制作以麻醉人民的宣导片”。但山田和夫却和他有不同的意见。为日本侵略战争脱罪和翻案，决不只是个别电影公司和导演的事，而是具有整个日本战后史、战后世界总体战略和日本战后历史与社会、政治的结构性的背景。

早在一九四七年，描写日本战争罪行带给日本人民之悲剧的记录片《日本之悲剧》，被“日本当局”强行没收。一九五〇年，日本电影界进行整肃与再编，清除一批民主主义、和平、非战的导演与电影人。一九六〇年，日本防卫厅干涉《预科练的故事》，认为该片不利日本建立自卫队，而剪除非战镜头，并大量制作鼓舞日本建军的公关影片。日本东芝电器资本，因影片《独子》有非战思想，悍然中止合作拍片。日本政府因记录片《东京奥运会》没有强调天皇莅会与自卫队仪队威仪而改编重新剪接。六七年，大型军国主义战争片《日本最长的一日》荣获文部省“青少年电影奖”！在山田和夫看来，从五十年代中期一直发展过来的日本战争影片，是由日本政府、防卫厅、独占资本各方面联手，经过巧黠的行销研究和企划，在战后世界冷战总体制和总战略下，直接、间接地、有目标、有方法地为日本新军国主义准备思想和感

情的条件。

台湾内部的日本

我们的匿名读者对于拙文的反论，恰好非常生动活泼地证明，上述五种伎俩，是如何有效地（甚至在台湾）也达成了它美化日本侵略战争，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开脱的洗脑效果。一个在日本侵略战争中被害民族的人，看过这精心设计的日本战争电影，一面口头上承认它有“军国主义”色彩，一面又忙不迭地为它辩护和开脱。这种不知以被害为被害的被害，令人感到背脊森冷的悲怆。

事实上，为《联合舰队》说话、扬喻的人还很不少。你在《联合舰队》的电影院中，整场听着一些听懂日语的中老年观众兴奋地窃窃私语；我们的影评人公然说它是“反战片”，说它对我们有教化和启发作用（我们这匿名读者也这样想）。

近年来，台湾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日本崇拜”，崇拜其服饰、其管理、其商法、其“民族法”！青年以抗日为老一代人的“历史包袱”和“历史恩怨”，声言要“独立地看日本”，“抛弃历史偏见”。有少数一些人以对日批评是执政党和外省人之事，使抗日成为“顽固”、“保守”、“非台湾”的代辞！事实上，在台湾内部，已经俨然存在着超年龄和省籍的日本！这种奇谭怪事，是这个地球上，寻遍每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的诧异。

山田和夫对日本电影史的批判的回顾，却也为我们台湾亲日文化找到了解说。对于台湾的战后；对于五〇年建构起来的冷战文化，前进的历史，正要求着我们做出批判性的再思考！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见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

几年前，偶然在电视上听见这首歌，漫不经心地看着字幕打出来的歌词，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深深的吸引。听完整首歌，胸中喉里，竟梗着一股酸热。“啊！有这样的歌么？”我不禁在心中呼叫起来。

没有多久，这支歌就唱遍了台湾的大街小巷。民众、青年、学生对这首歌热烈的反应，即连对于它的作者侯德健，怕也是一桩意外之意外的事。

长江、黄河、中国人

长江、黄河；长江之水，黄河的澎湃汹涌的浪涛；中国；龙；“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百年前列强在中国的隆隆炮声……这些词句和形象，深深地引动了沉睡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感。尽管做为歌曲，这首歌绝不是毫无瑕疵的；尽管从歌词的文字标准来看，这首歌词还有明显的音韵、修辞上的问题，但它终于唱遍了台湾，唱遍了全世界凡有中国人的地方。

这首歌确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灵魂的深处，因为它唱到黄河、长江这两条绝不仅仅是具有地理学意义的河流；唱到绝不单单是人种学意义上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龙的传人”；它所唱的“百年前”“隆隆的炮声”，也绝不只是一件单纯的历史纪事。这首歌整体地唱出了深远、复杂的文化和历史上一切有关中国的概念和情感。这种概念和情感，是经过五千年的发展，成为一整个民族全体的记忆和情结，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从而远远地超越了在悠远的历史中只不过一朝一代的任何过去的和现在的政治权力。

当我们在一个来访的外国交响乐演出中，听见乐团礼貌地奏出一首朴素的中国乐曲，我们立刻便感觉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最喜悦的共鸣；当我们在林怀民的舞台上看见的大鹏在碎鼓声中奔走翻跃，或听见陈达苍茫的《思想起》从音响设备中盈场而来，我们甚至热泪盈眶，含着涌自内心的微笑，死命地鼓掌。为什么？因为它们牵动了深深地瑟缩在我们心中的记忆和情感。而这种激动的体验，只要我们愿意公平、诚实地说，是绝无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别的。而且，只要肯公平、诚实地思考，这一份情感，是绝无须乎依存于任何一个世俗的，于历史中为暂时的权力的。

空想汉族主义

有少数一些人，会认为对中国的情感，因省籍条件而有不同。如果说“龙的传人”这首歌只有“外省仔”（甚至“中国人”）才会喜欢，怎么也无从说明这首歌持久（已有一二年吧）而广泛的流行性。“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想汉族主义’罢了！”他们说。他们主张：“台湾在与中国本土相隔绝的地理、社会环境下，经过了四百年独自の移民、开拓、及近代化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而形成在社会上、心理上与‘中国·中国人’不同的‘台湾人’”，从而，他们在检讨台湾人民于日据时代悲壮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历史时，对于当时台湾大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民族派”台湾知识分子所秉持以抗日的“祖国中国”、“中国的台湾”的观念，恨恨然加以指斥，指为“空想汉族主义”。

就说几百年来，福建和广东的汉人向外迁徙，一部分到了台湾，一部分到了南洋、北美洲。几乎同样的“开拓”、“移民”，并且有些经过了更彻底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如在北美洲的汉人），却说唯独台湾的汉人会发展出相对于“中国·中国人”的“台湾·台湾人”意识。侯德健和许多不分省籍的青年，共同经历了台湾近三十年来历史上空前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发展”，却还单纯地怀着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地理的挚热的感铭。还在尚未进入农业时代的犹太人不单亡了国，而且四处漂泊，经历了不止“四百年”的“移民”、“开拓”、流徙，并且不但在各寓居国“经历”了远比台湾还彻底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还成为整个西方“近代化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中心——美国的华尔街中举足轻重的大资本家集团，却似乎还不曾发展出相对于“犹太·犹太人”的“纽约·纽约人”意识和主义，反而在亡国数千年后，

建设了一个新的军事帝国主义的以色列国家。以上这些疑问，都充分说明了：当为一个主观的政治偏见服务时，被恶用的历史唯物论，是多么幼稚、可笑。至若说台湾社会的矛盾，是“中国人”民族对“台湾人”民族的殖民压迫和剥削，则只要看看组织在资本主义台湾社会的所谓“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所谓“中国人=支配民族=支配阶级”对“台湾人=被支配民族=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关系，一如过去日本人之于台湾、朝鲜人或英国人之对于印度人，就十分明白了。

尽管是这样，我们仍不能说那是一种“空想的台湾人主义”。不，至少只对于那些人而言，“台湾·台湾人”意识，断不是“空想”的。它有现实的，物质的，甚至岛内和国际文化和政治的条件。近两年来，笔者看见它在一小撮轻狂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中蔓延，并且自始带着一种令人伤痛的、落后的反华意识，发展到对于参与和坚定支持党外民主运动的外省人，也毫不顾及起码的礼貌，可以当面对人任意讥刺和刺激的地步。这其实已不只是思想上的幼稚，也是政治上的严重小儿病了。

国共双方的错误

然而也就在这一份幼稚上，它就益为可同情的。“台湾·台湾人”主义的错误，不应该仅仅由那些少数人去负责。全体中国人都有一份责任。……（略——编者）而在这个错误上，存在着右的和左的台湾分离主义之发生学的基础。一切对分离主义的批判，不能不在这个投影于全民族的良知上的历史错误之前，心存哀矜的伤痛。

而如果把这一份哀矜与伤痛，向着更宽阔的历史视野扩大，历代政治权力自然在巨视中变得微小，从而，一个经数千年的年代，

经过亿万中国人民所建造的、文化的、历史的中国向我们显现。民族主义，是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是争取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之向上、进步、发展、团结与和平；是努力使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对世界与他民族的和平、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这种意识。而这一切，必须先要有一个自由、民主的、民族团结的环境。以无数惨痛的代价，越来越多的两岸中国人民体悟到这迫切的需要，并愿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民族团结而奋斗。

无关乎国民党的“失败”

侯德健背着他的吉他悄然走进了大陆。但这绝无关乎中共的“胜利”，更无关国民党的“失败”。他只不过是去看一看长久奔流在他的血液中的，在梦中神游并且倾听其澎湃和汹涌，经数千年历史和文化所形成的父祖之国罢了。任何统战腔调，任何指责其叛变之指控，都是对于自然的民族主义情感的羞辱。然而，单独的、个人的神州畅游，毕竟不若长留在两岸，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民族团结做一点一滴的、长时期的、认真、忍耐和严肃的努力，来得对苦难的民族有意义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前进周刊》

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

正杰、祖珺：

谢谢你们把蔡义敏先生的大文《“父祖之国”如何奔流于新生的血液之中？》影本送来。

从朋友的电话中听说你们把拙文《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登出来，我真是大吃一惊。那天深夜文章写好，我就觉得这篇文章无论如何不应该发表。我把那种心情写在附在稿子上的短笺中给了你们。我交了文章，只表示我没有爽约。在短笺中，我曾叮咛你们千万不要发表。但如今既然发表了，一切责任仍应由我完全负起，而且，我十分乐意负起这个责任。

所谓“台湾民族主义论”

你们说，这篇文章很可能引起一场广泛的论战。这原是一件好事。被少数一些人诠释成为“中国人”民族与“台湾人”民族的矛盾的台湾地区内部的省籍矛盾，实在应该有一个自由的环境，进行公开而深入的讨论。所谓“台湾民族主义论”，牵涉到广泛的历史哲学、台湾史、台湾社会史和对于台湾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评估。由左翼台湾分离主义、非国民党民族主义和国民党等三个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学问的辩论，是解决所谓省籍问题的最

好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不准别人还嘴的，“台湾人和大陆人都是中国人，只差先来后到”论，“国民党和大陆人民八年抗战，解救了台湾同胞于日帝倒悬，台湾同胞应感谢德政”论和“台湾没有政治上的歧视。重要权利握于大陆人手中，是因为大陆人比本省人更有行政经验”论，这些官式的宣传，早已经破产。如果国民党硬是不肯实事求是去面对这个由历史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一味使用高压禁止公开讨论，则这个原本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公开、自由、认真的讨论）解决的相对性矛盾，就会逐步在高压、苦闷、欠缺沟通的情况下，演变成对民族团结造成重大裂痕的、无法调和的绝对性的矛盾。

但是，在目前，正如我在给你们的短笺中所说，完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在目前情况下，任何主张台湾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的言论，都是为国民党所不容，甚至可以据而入罪，逮捕和判罪的言论。从而，批评“台湾民族论”的言论，不论多么独立于国民党官式意识形态，在客观上都不免有为国民党作伥的嫌疑。因此，我只有婉谢参加“论战”了。而且，这个题目既然自我“无心”间“挑”起来，则静静地挨人几个拳头，我是甘之如饴的（其实，对于某些人特别在近一年来在这里、那里，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说别人是“汉族沙文主义”、“爱国沙文主义”、“中国民族主义”，我们一直是隐忍的）。

因此，凡是因为拙文而非打我几拳不足以泄忿的人们，我只要说两点：第一，要很当心自己的拳头，免得为他人所乘。第二，尽量写出好文章。因为批评不必只出于论敌的我。每一个认真、严肃，有一定文化和知识素养的读者，都是他们沉默而清明的批评者。

人权有保障，社会有正义

然则，我还是止不住要说一些题外的话。

希望台湾的政治有真实的民主和自由，社会有正义，是绝大多数在台湾的本省人、大陆人共同一致的愿望。党外诸君子，不论经由民选而已藉身于公职的，或者生气蓬勃的党外杂志中的俊秀，为了他们艰苦和勇敢的工作，长年来深得这些渴望台湾更为进步、更有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的尊敬和感谢。

但是，为什么凡是要台湾更自由、更民主、更有社会正义的人，就非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不可呢？为什么支持和敬爱党外民主运动的外省人，到头来只落得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进步的中国人”的“名义”，和那些自称为“台湾民族”的人隔着一道永不可团结的鸿沟呢？为什么“国民党的教育”教给我们以中国人为荣，以中国的山川为美，以中国的瓜分为悲忿，一定是可耻、可笑呢？难道当“国民党的教育”教我们的一些科学知识也应一概加以否定吗？为什么大陆人就一定没有资格去爱台湾呢？那些对台湾的每一种草木都能直呼其名，大声、流泪抗议台湾生态的破坏的人们之中，不是也有许多大陆人吗？在政治监狱中，在无情的社会的最底层，不是同时有本省人和大陆人呻吟之声吗？大批大批冷血地辞退工人，仗着政治力量欺负工人的，不也有许许多多本省人吗？（当然，他们会简单地说，那是“买办台湾人”！）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的青年中，要硬生生地分成“中国人”和“台湾人”？为什么在长期婚姻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岳父母、媳妇女婿、姊夫妹夫、嫂嫂弟媳、侄儿侄女、阿公阿嬷、外公外婆……这些亲属情感中，非要用“中国人”、“台湾人”加以分割呢？为什么凡是自然地以自己为中国人，并以此为荣的人，党

外民主运动都不能容纳？

让我们平静地想一想。想了之后，如果认为一切在台湾的正直的、追求民主、自由和社会公平的人之间，不应该、不能够分成对立的“中国人”和“台湾人”，那么让我们在内心深处坚定地说“不！”，并且让我们在国民党和“台湾民族派”者之外，坚定地、自动地借着坦诚的沟通、讨论，借着同胞手足之情，发展有意识的民族团结与和平的运动。

坚决反对破坏人民团结

让一切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的本省人和大陆人有更大的爱心、更大的智慧，互相拥抱，坚决反对来自国民党和左的、右的台湾分离论者破坏人民的民族团结。尤其是和上一代的仇怨无涉的、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更要独立地思想和相互探讨，然后同时学好同样优美和丰富的普通话和台湾话，广泛地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看一看这一块美好的土地、去接触这么善良的人民，坚定、和平地发展出一个人民的、独立于国民党和“台湾民族”派的民族团结运动。

让我们怀着同情和一份忧伤，严肃、认真地去研究和讨论一切“台湾民族”论，让我们平静地、科学地找出真相和事物的真理，让我们绝不对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同胞，随便指责他们“数典忘祖”、“没有国家民族观念”。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于历史中仅为一时的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所生下来的异胎。让一切自己承认是中国人的人们，怀着深刻的悔疚，用最深的爱和忍耐，为增强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和平，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永远不知疲倦的努力。

这种忧虑和认识，其实应该很广泛地存在于深切关心党外民

主运动的本省人和大陆人的心中。那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认真地、光明磊落地把这个关切表现出来。因为客观的政治环境不容许公开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开始在私下展开讨论。一切酷爱进步、自由、民主的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应该超越现有的政治禁忌，在每一个人的私下生活范围内，自己展开民族内部的沟通与对话，并且经由这个沟通与对话，展开中国人民自己的民族和平与民族团结的、长期性的运动。祝你们进步！并且预祝批评拙文的文章中有真正的好文章，开我闭塞。

映真

六月十八日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日《前进周刊》

严守抗议者的伦理操守

——从海内外若干非国民党刊物 联手对《夏潮》进行政治诬陷说起

三月份《夏潮》革新版出刊以后，在台湾和海外关心台湾政治和全中国出路的民众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引起十分热烈的回响，使《夏潮》编辑部在铭感之余，同时感受到责任的严肃和重大，深深感觉到自己在思想和文化上修养之不足，难堪重任，为之惶恐无已。

但是，也在同时，来自海外和省内非国民党系刊物，也迫不及待地对《夏潮》进行用心十分恶毒的政治诬陷，直欲置《夏潮》于必死之地。有一位北美的读者，为我们寄来一八一期（三月二十四日刊）北美某刊物的影印消息，标题是“岛内外统派余孽猬集《夏潮论坛》/戴国辉陈映真热情拥抱在一起”。消息中说《夏潮》革新版“明示他们甘为中共统战的马前卒”，说陈映真“于不久前来美国‘充电’，广泛地与统派余孽及中共外交人员会晤，回台以后，立即将他所收集海外台独运动的资料提供给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周应龙，以建立他在国民党官方中的威信。”又说，“中共奥援于外，国民党默许于内，陈映真等人方如此大胆猛烈地攻击岛内台湾意识论者”。

这个在北美鼓吹台湾“独立建国”的刊物，在紧要的关头，竟这样毫不保留地暴露出它法西斯的、造谣诬陷的本来面目，无可辩白地显露了他们在政治伦理水平的低下，令人惊叹！

另外一篇同性质的文章，是刊载在三月二十七日出刊的某党外杂志，题为《“统一左派”对上“台湾左派”》。那篇文章的作者，以一本被日本的台湾史研究界讥为“浆糊与剪刀”剪贴拼凑而成的“四百年史”的蓝本，用歪曲和变装史料的一贯手法，炮制了一段“台湾社会主义”派的发展史，并且，不惮其烦地大谈“国民党、中共都同意过台湾独立”，“谢雪红是台湾左派的英雄”这些论调，从而毫不顾及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真诚，居然编造出台湾有“统一左派”和“台湾左派”的奇谭怪论来。

这“统一左派”和“台湾左派”的发展论，有两个明显的目的。一个目的是借机确立“台湾左派”（又自称“台湾社会主义”，通称左派台独）在台湾的存在，可以不去理会。另一个目的，是借此罗织《夏潮》是“以大陆为中心，受其影响和指挥，志在统一解放”，“夺回台湾、合并在中共政权之下，实行社会主义”。并且明白地指出“统一左派的成员包括：陈（映真）、戴（国辉）、王晓波、苏庆黎、胡秋原、黄顺兴和尉天骢等，拥有的刊物有《中外文学》（!？）、《夏潮》、《文季》、《中华》等杂志。”

北美杂志的消息，和台湾某自命为自由主义的党外杂志所刊《“统一左派”对上“台湾左派”》，是急于想着写给谁看，是想向着谁通风报信，是想向着谁去以论敌的生命与鲜血为代价，领取告密检举奖金，只要看过文章的人，即使对三尺童子，也是昭然若揭的。

不幸的是，这些在政治道德上堕落得不堪闻问的小伎俩，是注定要彻底失败的。《夏潮》的立场，尤其是她对于中共体制的批判，事实俱在。胡秋原、王晓波、陈映真诸位位于历年来对中共严厉的批判，文献俱在，不容诬陷。至于陈映真旅美期间，有没有“广泛地与统一派余孽及中共外交人员会晤”，“回台以后”，有没有“立即将他所收集的海外台独运动的资料提供给国民党文工会

主任周应龙”，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在美的情治体制一清二楚，似乎不必劳动海内外这些一贯高举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刊物，急于写密告诬陷的文章，一下子用自己的手把以往正义、人权、民主、自由的招牌砸个粉碎，虽然愚昧，虽然叫人齿冷，但毕竟不能不让一些素来不断努力对党外抱着一次又一次的期待和敬意的人们，感到深刻的失望和惋惜。

手无寸铁的抵抗体制的知识分子，惟一的武器，是他的伦理风格 and 知识深度。党外运动能在过去二十多年来赢得人们的钦佩和支持，不为别的，正是为了他们在重大的束缚中，勇敢地主张正义、民主、自由、尊严这些凛然的、深具伦理重要性的理念。如今，少数一些自命为党外的人，对于《夏潮》提出不同意见，不从知识、伦理、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相互讨论和争辩，反而使用诬陷，罗织这些他们自己曾深受其苦，并誓言誓死反对并要加以打倒的手段，不能不使广泛长年关怀和支持党外的人民、知识分子和青年深感苦痛。而这苦痛，正来自这样一个严肃的疑问：在将近一世纪歪扭的历史下发展的台湾政治运动，在体质上，是如何潜在着深刻的悲剧性的弱质！一切真诚的，在台湾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对此感到噬心的悲痛之余，应该激起我们更认真、更为严肃的反省意识，对二十多年来台湾中产阶级党外运动，做好检讨和反省的工作。看了这些无原则的诬陷文章，人们应该清醒地看清这事实：对于党外队伍，群众再不促其反省和检讨，肯定是绝无前途的！

……（略—编者）

对于中国。我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民抱着极深的认同和感情。因而对于两个政权和党派，我们保有独立的、批评的态度。这是可以从《夏潮》历年来的文章和编辑态度予以证明的。

最后，我们从社会科学的真理，承认到台湾社会，和一切其

他完整、生动的社会一样，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分化，从而有不同的利益和愿望。因此我们呼吁以民众利益代言者为言的党外运动，正确地兼顾到大多数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人们之利益和愿望，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又与不惜为了“台湾民族”的“整体性”这个主观唯心论去否认和抑压台湾社会内层的自然的利益分化，对美日帝国主义明里视若无睹，暗里百般温存的海外台独“左”派，更有截然的不同，对于这样的海外台独“左”派，从意识形态学的观点去衡量，我们以为是右到极右的，有如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一类之东西！

至于说《夏潮》是什么左派，恐怕是太过高估了我们。《夏潮》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比较求进步的台湾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刊物。他们同其他党外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尚知自己在文化、知识上不足，尚肯要求反省和批判，愿意力求进步，愿意跳出唯台湾论的岛气，学习从全中国、全亚洲和世界的构图中去凝视中国（连带地是台湾）的出路。如果一定要送给《夏潮》一个标签，勉勉强强可以称之为进步的自由主义杂志吧。

看见了别人迫不及待地向我们抛来恐怖的血滴子，《夏潮》应该更坚定地持守一个抗议者最基本的伦理风格，坚持优秀、理智和道德上干净的讨论态度，为濒临破产的党外运动，绝不灰心地奋力保存一点正气和应有之格调，并且团结广泛的党外民众、知识分子和青年，为提高党外知识和道德高度，坚忍不拔地学习和工作。我们主张大家老老实实在地努力，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奋斗。

——一九八四年四月《夏潮论坛》杂志

追究“台湾 一千八百万人”论

为什么党外叫“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共同愿望？国民党也叫“一千八百万人”的自由与幸福？美国也说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和平与幸福云云？为什么……

一般地说来，一个人的看法，和他对生活和世界的观点，常常因为他在一个社会中所居的地位而有不同。比如说，有钱的人，收入不错的人，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觉得明天会比今天好，对于未来有信心，对于现存的大部分法律、制度和其他现状满意的，总是居大多数。处于收入不好也不差的人，往往觉得目前生活还差强人意，但也有不满之处，一方面希望将来过得比今天好些，一方面也对于生活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特别是和自己的发展有关的缺点，很觉得不满。另外有更多的人，收入永远只是差可温饱，终日劳动，却似乎永远没有改善的一天。对于这些人，生活和世界总是暗淡的，没有希望，也没有保障。他们觉得一切繁荣、奢华和幸福，都与他们无关。他们辛劳、疲倦，生活永远是那么拮据。生活上一碰到较大的变化，例如生病、结婚或丧葬，立刻就得负债。对于他们，最大的关怀是希望老板生意好，工厂多加班，多发些加班费，希望工作有保障，不要说裁员就裁员，希望物价稳定。但即使这些起码的愿望都无法获得。因此他们的心中永远

蕴藏着一股不安、焦虑、自卑、自暴自弃和对于茫茫的前途的挫折感。

中等以上阶层的政治要求

在政治要求上，这三种人也各不一样。富裕、幸福的第一种人，基本上希望维持现状。他们希望社会安定、有秩序，学生和工人都不会闹事，以便他们可以放心开工厂、做外销，外国公司肯来台湾投资、买东西。当然，他们也希望改革，希望政治“民主”些、“自由”些，以便自己也能参与政治，从而开工厂、搞外销、做生意都更为方便些，可以自己创造法律，改革政府组织，以便对外对内的生意发展有更合理的环境，或者至少可以通过参与政治，获得企业经营上的特殊方便。他们当中有人支持党外，但只愿暗地里送钱，绝不肯公开，因为他们怕万一国民党知道他们支持党外，会在生意上找他们麻烦，整个企业就垮了，财富就泡汤了。有些人从纯生意眼出发，拈一拈党外，觉得不成气候，干脆参加国民党，以金钱力和自己企业的组织力，出来竞选，果然光荣当选，一手做官，一手得国民党当局的欢心，一手以特权做生意，超额利润滚滚而来。当然还有一种人表面上不问政治，骨子里大把大把送钱支持国民党，买倒各种上下大小机关，俨然企业大君，顶着大企业家的名，大肆盘剥。

小市民阶层的政治愿望

不富不穷，对生活和社会现实又贪好又埋怨的人，比起第一种人牢骚多。拼命做生意，资金老是不足，在银行借不到钱，却眼看着大户连骗带诳借得大把钱。他们在商场上不是大户和外国

厂商的对手。经大户转包了一点工作，利头低，辛苦备尝。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在企业、学校、文化和政治上都很想出头，却无奈一个老大架构压在每个人头上，出路和空缺有限，使每个人都觉得怀才不遇，觉得说话、思想、做生意、搞事业都不自由。他们确想改变现状，希望有一个做生意、搞文化、搞个人事业都比现在更为自由自在的环境。他们之中支持党外者，占很大比例，有少数一些人很勇敢，事业、职业砸了，也要搞党外，支持党外。另外更多的人心中支持，行动上则又兴奋又害怕。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支持国民党。他们对当前社会和生活的现实，虽常常怀抱着困惑与不满，却更惧怕“党外”、“台独”、“共产党”惹出更大的乱子，危及自己的财产和安定的生活。到头来，连目前仅能掌握的一点点都会保不住。

社会下层和工人的政治愿望

社会上的下层，最想改变现状。因为任何改变，他们都没什么东西可丢，最坏顶多是“改变”后他们过得跟今天差不多，除此而外，改变或许可能带给他新的机会、新的希望。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收入能多一点，不要每到月底就捉襟见肘，希望有钱使儿女受到较好的待遇，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的工会，保障职业上的安定和安全。在政治上，他们往往是台湾中产阶级党外最忠心、勇敢的支持者。他们对党外的希望和忠心，比台湾中产阶级本身更没有保留。他们寄望这些说话、办杂志都会讲出听起来很“爽”的话的党外英雄贤士，能改革社会，改善政治，改变他们的生活。因此，选举一来，在党外竞选办公室中跑腿最勤、最不怕警察特务威胁的，都是他们。但是，有时，被党外候选人激起一股改革的怒情，激昂起来，毫不踌躇地肯为党外候选人在选举中遭受到不

公平待遇（例如做票）而跃起，决心去砸党部，打选委会时，却又往往看到那位候选人早已自己溜得无影无踪了。

“一千八百万”论的三个市场

由此可见，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想法、看法和愿望、利益并不一致。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所居的地位不一样，利害当然也不同，价值观念也跟着不一致。

可是却偏偏时常有人会喊出一些口号，好像说全社会大家都拥护这个口号。例如最近两三年有一个最流行的口号，是说：台湾“一千八百万”居民如何如何。“台湾“一千八百万”居民的幸福，台湾“一千八百万”居民的福祉，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愿望等等，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例子。

最好玩的一件事是：不但党外叫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共同愿望，国民党也叫“一千八百万人”的自由与幸福。尤其有趣的是美国也说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和平与幸福云云。人们比较容易区分国民党、党外和美国之间在价值、角色、力量上的不同点，却一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这间的共同点。因此，这国民党、党外和美国间异口同声的“一千八百万人”论，应该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关切。

其实只有六百八十万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个“一千八百万人”论的具体意义。一千八百万这个数，当然是从台湾的总人口数而来。依据一九八一年的统计，台湾的总人口计为一千七百九十七万零二百八十人。

当然这个数目包括一岁到七十岁以上的人口。但在政治上有

意义的人口，就是说政治上有意见、感情、立场和重要性的人口，当然应该是“经济上活动”的人口。那么扣除十五岁以下，以及满六十岁以上的人口，据一九八一年统计，大约只有六百八十万一千人上下。这么一来“一千八百万人”的“愿望”、“意志”、“幸福”或“福祉”论，在政治口号上就是个明显的夸大了。

从人口学上再分析

其次，在这六百八十万一千人中，其经济活动的范畴、类别与性质也很不一样。就按照人口学上的分类，起码就可以再分为“雇主”类、“自营作业”类、“无偿家庭劳动”类，和受雇（有偿劳动）类等四个不同的范畴。

所谓雇主，指公司行号的老板、股东而言。这些人一共是只有二十九万一千人，占前述经济活动人口六百八十万一千人中的百分之四点二。自营作业者，指的是自由职业、小生产者，共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无偿家庭工作者指一般家庭管理，有七万七千人，占百分之零点五；有偿受雇者，指受雇于私人企业和公家机关，企业的体力劳动生产者和脑力劳动生产者而言，人口最多，计有四百三十六万人，占台湾经济活动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一。

这百分之六十四点一中，当然包含中等程度的受薪阶级。但和人数占绝对大多数的工资劳动者相较，当然是为数甚少。因此可以说，在六百多万经济活动人口中，中等以下的工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占着绝对的多数了。

又“革新”又“保守”的中上阶级

一般而言，雇主和部分自由职业、小生产者和中上等薪水阶级是前文所说的一、二类，属于社会上的物质上或精神上的上层阶级。他们最主张维持现状、固定现状。他们主张“自由”和“民主”，基本上是为了这“自由”足以促进和发展私人工商企业。大部分的自由职业者、小生产者和一部分中上等薪水阶级对现状基本上满意，但他们要求不被目前在经济、社会上占尽优势的大企业阶级和外国企业垄断一切利益，并且有平等经营和竞争的机会，因此他们要求改革，主要是把他们自己的处境改得和第一类人一样如意和称心。

这第一类和第二类的“革新”派，就是三十年来台湾中产阶级党外运动的基本力量。因而，他们在性格上是既“革新”又“保守”的。

由于他们要向国民党争更多的和他们在经济地位相应的权利，他们批评国民党，要求民主，提倡自由，以便更多更广地参加政权，这种要求造成他们“革新”的一面。

但为了保持现状，他们绝不主张比较广泛的社会、法律、经济等制度的变革，以使分配更平均，使工人得到更合理的经济权、议价权、组织权。立法院讨论有关基本上改善和保障工人的工作权、组织权和经济权时，党外和国民党一样不积极，一样或明或暗地杯葛、打击。党外许多杂志中，登了许多文章，在全比例中，不到百分之一。更极端的一些人反共反到带着法西斯味道，反中国反到使用帝国主义的语言。凡此种种，充分表现出他们和国民党、美国的高华德与里根一样的“保守”倾向。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国民党、美国和台湾中产阶级党外常有相叠合的共同利益，从

而有共同的语言。

“一千八百万人”论是谁搞出来的幌子？

中产阶级的党外，对台湾没信心，但又亟思维持台湾现状。他们深知自己没力量、勇气和决心“保卫”台湾，因此主要地向美国人以“一千八百万人”的意愿为借口，提出“自决”以“救台湾”的口号。但大多数工人和社会里中等以下人民，“自决”与否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比较上远得很。他们比较关心的是自己当前生活的改善和保障。至于自由与民主，工人和社会中等以下阶层的人们最关心，最不吝于支持，但希望党外真正关心他们的需要、问题和愿望。不希望党外英雄们忙着打破头颅争“主流”、说空话、出风头。他们也希望党外在议会中，在党外杂志上多谈谈，多反映他们的问题和他们受忽视、践踏的权利和愿望。

因此，您瞧，占着我们“经济活动”人口中约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人们（中等以上阶层）的思想和主张，却以“一千八百万人”的名义，强加在于“经济活动人口”中约占百分之六十（中等以下阶层）左右的人的头上。而且国民党也以这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做幌子主张这、主张那，党外也以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做幌子说这、说那，美国国务院和少数一些参议员也以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做借口干涉这、干涉那，但我们人人以为常，从来没有人认真问问这“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一千八百万人”，只是一个空洞而无意义的数字。人口学上的数据，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含义。特别是涉及政治上的主张时，更应该将人口数字摆在台湾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里去评估和思想，才有确实的意义。这么一来，我们才清楚知道了：在台湾，是什么样的人占大多数，哪些人的利益和愿望最应该受到重

视。否则，不论国民党、党外和美国所提的台湾“一千八百万人”云云，就是一个假话，至少也是一个空话。

要求党外扩大社会基础！

在去年大选败北后，台湾中产阶级党外运动，应该是睁开眼睛，看清自己一贯扮演过来的角色的时候了。人民终于要向台湾中产阶级党外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正如党外一向对国民党提出的一样：党外的先生们，请你们好好看清楚台湾的社会和人民，正确地扩大你们运动的社会基础吧！

——一九八四年三月《夏潮论坛》杂志

“鬼影子知识分子” 和“转向症候群”

——评渔父的发展理论

无的而放矢

由于曾经读过几次有些作家费力、忿怒而又无状地为自己的作品做解释、说明的文章，深深以为不堪、不可，就时常告诫着自己，千万不要强做自己作品的解人。近来拜读渔父的大作《愤怒的云》，敬服之余，自然也犹不至于打破向来对自己的诫命。只是和许多明眼之人一样，觉得渔父的大文，谈文学其实是假的，其实只是个幌子；谈有关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才是真的，才是他“用心急切”的本意。对于社会科学，我真是一个只在“业余”之时，偶而一年只读一两本书的人。阔迹商场，面目可憎，原是“既无能力也无资格”就有关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发出议论的人。然则渔父的大文，却无端地引起了我的兴味，因此在绝不触及渔父对我文学作品的批评这个原则下，单就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提出几个和渔父颇不相同的意见。如果因而引起台湾年轻的、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评论，未始非为美事。

渔父的大作中，贯穿着一份出奇的焦虑。这溢乎言表的焦虑之情，使他迫不及待地把小说集《云》中的几篇小说，判定是“显而易见”地为所谓“依赖理论”张目的小说。其实，倘若渔父不那么“用心急切”，他应断乎不至于留下这于他为绝无必要的破

绽的。

《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和《云》，主要地只写出在现代企业结构下，受薪的企业人的形成以及与此形成过程相应的人的异化的过程。因此，这三篇小说中企业体的老板，即使换成中国人，依然是可以成立的。《夜行货车》末尾一场宴会中，如果是一群买办的中国企业家的辱华性的谬论气走了詹奕宏，故事的精神依然不会有什么改变。这三个故事的背景是不是跨国性企业，其实和小说的题旨可说是并无关联的。则它们和渔父所急于打倒的“依赖理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惟独在《万商帝君》中，我比较用心地写了一个跨国性企业，以它全球性的行销管理（marketing management）活动，如何对地主国的价值和思想进行深刻的改造运动。在现代传播技术和国际范围的管理技术下，即使土著企业的行销活动，对人的行为、思想和价值的强大影响，是生动活泼的台湾生活里每天中的真实。我只是因着自己曾经在台湾的跨国企业中负责过中级管理者的工作，参加过几次亚洲级的管理训练会议之体验，更加深刻地注意到，以整个地球为企业管理的基盘的国际性企业，其行销管理对于全球土著文化之令人震惊的改造力量罢了。

然而，严格地说来，即使这《万商帝君》的主题意识，和理论结构上的“依赖理论”，以及和下文将要逐一分析的，显然为渔父所理解错误的“依赖理论”，毫无必然的关系。理由是简单而明白的：批评跨国企业的行销活动，对落后国家文化的解体和改造，只是“依赖理论”中对跨国企业活动之批判的一小部分，更何况由于跨国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引起世界经济学家和政治学、社会学者的注意，各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研究跨国企业者越来越多。有人搞跨国企业与全球性生态、污染的关系；有人搞跨国企业中个人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有人搞跨国企业行为与各民族国

家的国家利益间的关系，等等。然而，据我所知，“依赖理论”中对跨国企业的批判，似乎更着重在跨国企业倚仗其本身雄大无伦的资本力和超强母国的政治力，对落后地主国购买和施加政治力和军事力，从而以落后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足”为代价，稳固和扩大企业的超额利润。TTT 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据此以观，即使是拙作《万商帝君》，又和渔父所急于扑灭的“依赖理论”之间，殊无形式内容上的关联了。因此，不能不说，渔父在一开场，就犯了议论所忌的“无的放矢”之过吧。

从史的展开去理解依赖的形成

虽然极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作品，但是在与本文绝对相关的范围内，把截至目前为止，拙作与依赖理论之间的“显而易见”的完全无关性，做了概略说明如上。

接着，我想检讨一下渔父对于依赖理论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理解所做的反论。

首先，渔父似乎错误地把依赖理论中的“依赖”这个概念，看成是静止的和外加的东西。渔父开宗明义地说道：

“依赖理论”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秩序、来操纵、剥削和控制落后国家，由此形成一种“中心”和“卫星”的经济关系。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有“中心”和“卫星”关系，环环相扣，最后连成一条上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下贯落后国家边陲乡村“卫星”的环索。在体系之内，资金和资源的吐纳，所依靠的运作工具就是跨国公司。

渔父和一些现代世界体系的辩护士们，总是先把“依赖”理解成一个既有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秩序”课予落后各国的锁链，从而加以批评。事实上，依赖理论的主要精神，在于它历史的、开展的性格，认为“依赖”是早在十五、十六世纪就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展开，和近、现代世界史中帝国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历史的展开，在落后国家所造成的一种情境（D. L. Johnson）。正好是在这种制约性的情境中，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行程，和广泛的后进国“发展不足”的历史行程，互为补倚，使广大的后进国经济，受到少数先进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所制约（T. Santos）。依赖，是这四百多年来的新旧殖民主义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历史的情境，决不是渔父所说富者原富、贫者自贫的贫富天定、天成论。

例如以非洲各族人民今日的悲惨情况的形成来说，就可以追溯到当年的奴隶贸易和殖民帝国主义。欧洲人在一七八三年到一九七三年间不但从非洲掠夺了无数的象牙、钻石、香料、黄金、白银和兽皮，并且抢掠了数百万人以上的非洲奴隶。没有人能否认，在两百年内，黑色非洲以她富饶无比的宝藏和数百万奴隶的强迫、无偿劳动，为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展开。同样，有谁能否认，今日雄峙寰宇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过程，正是以北美印第安和黑奴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奴役和压迫做为代价？

如果中国曾幸而在十七、八世纪中免于西方殖民者的占领和奴役，则对于十九世纪列强帝国主义的侵侮，我们应有太鲜明的悲伤的记忆。几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在羞辱性的“赔款”项下，流出了中国。几个重要的港口都邑，被强迫开放，成为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资本和商品肆无忌惮地闯过中国毫无准备的关口据点。势力范围的割切，租界的割让，并吞台湾，控制税收和海

关，干涉司法和主权的独立性……难道说，中国这一切悲惨的命运，不正是中国受制于西方列强“发展”和“扩张”的历史过程中，一个相应的崩溃、解体和沦落的、生动的说明吗？

二次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美一些只取得形式上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情况非但没有根本的改善，而且有些地方、有些情况，远远比过去还糟。总督、警宪和殖民地官僚走了，却换来傀儡政权和一批里通外国主子的买办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一仍透过复杂的国际政经关系，控制和掌握着今日各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原始原料出口和工业品不等价交换；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落后地区内部资产阶级的勾结下，进行对后进国劳力和原料的榨取和先进国商品大量倾销，更不必提国际产业—政治—军事复合体为了保持和增加跨国企业的利益对落后国家明里、暗里进行的各种干涉、威胁、颠覆和暗杀的罪行了。渔父和同他一般为十六世纪以来不断扩大的“世界体系”辩饰的人们，例如发展论者和现代化论者，在喋喋不休之余，尽管他们有些相互不同的说辞，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绝口不提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与今日世界“先进”与“落后”的结构之关系；总是要去强调别的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其他因素”，例如“决策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例如“企业精神”、“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成就动机”，等等（Cheddo, McClelland）。

问题不在于关系，而在关系的性质

其次，渔父显然对于依赖理论中“发展不足”的形成论，有错误的理解。试看渔父是怎么说的。

依赖理论有几个主要命题：落后国的发展不足（underdevel-

opment),正是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落后国家的贫困,是因为它被纳入了“体系”之中。如果它们能摆脱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成长一定会加快。

渔父在这短短的叙述中,犯了这几个“显而易见”的认识上的错误:

首先,由于渔父把依赖看成是一种自存、既存的情境,而不是将“依赖”理解成一种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情境,因此认为别人主张的是“落后国的发展不足,正是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结果”。据我有限的知识,几乎没有一个依赖论者有过这样的简单化的机械的主张。从十六世纪开始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去看问题的依赖理论,是从新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四百多年的历史行程中,去看依赖和支配的互动关系。落后国家的发展不足,非仅是“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结果”,也同时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原因。同样,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不但是“落后国”“发展不足”的原因,也是其结果(D. L. Johnson; D. A. Offiong)。

渔父对依赖理论的另一个错误理解,是说“落后国家的贫困,是因为它被纳入了‘体系’之中。如果它们能摆脱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成长一定会加快”。

实际上,依赖理论说的是,落后国家的发展,往往严重地受到世界经济体系或国际市场中支配性经济的制约与限制。依赖理论者绝对承认落后国家,在被“纳入体系”中以后个别的、特殊地、局部地“成长”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这有限的“成长”和“发展”,是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更为巨大的发展和扩张的一个反映而存在的。依赖理论清楚地理解到,国家不论贫富,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自主地发展”;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制定和选择繁杂的发展政策时,能够完全“独立自主”,不受

任何因素的拘束。然而，不同的在于，贫困国家的“发展”和“成长”，是“先进资本主义”支配国扩张的一个反射（reflex）时才发生，而且这“发展”和“成长”，是更多地按照支配性的外国经济而不是本国经济的需要所促成的（I. Katznelson, etal）。在一个依赖性的社会里，类如资本和技术等外国的生产因素，一直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因为在这“世界体系”中世界市场上的若干重大决策的决定权都操纵在大国的手中，除了屈从之外别无选择的贫困国家的发展，就不得不受到大国的支配和限制了。

以现实的历史实例来说，帝国主义的资本、技术和商品，有扼杀中国和印度的自发性，土著的萌芽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当然也有介绍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化公共设施、交通、电讯、教育制度、卫生机构和银行体制等的一面。但这一切相对性的“成长”、“进步”和“发展”，是做为英、法、美、俄帝国主义支配经济在中国和印度的扩张与发展的一个组织部分而发生。如果我们不曾忘记当时税收、海关、法律、价格、市场和原料等等全操在列强之手，依赖理论的历史解释，特别是从一个落后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去理解，就会有极为清晰的认识了。

国际规模上的“贫富天成”论

自古以来，关于贫富不均的社会事实，一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贫富天成论，认为有钱的人原来就有钱，或因祖宗积德，或因命中富贵，或因本人贵重，总之，富贵者天生就是富贵。同样，贫者、贱者，原就贫贱，或者因原命轻贱，或者因其好逸恶劳，总之，贫困者自始就是贫困。当然，另一种看法，就包括在一句极为普通的话：“为富不仁”。意即富者之所以致富，总

是以不同程度的“不仁”，完成了财富的蓄积与集中的。

在国际范围内，渔父和一些其他类似的理论家，是深信着富国自富，与贫国之因窘无关；贫国自贫，与他国的富强无干。很有一些西方种族中心论的学者（例如 D. McClelland），认为落后国原就在文化和经济社会上落后，而把西方的“先进”和“发展”看成原就“先进”和“发展”，从而把社会发展阶段分成“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把落后国——例如非洲各国之所以落后，归咎到落后国自己因为本身这样、那样的因素而跳不出“传统社会”阶段，对于西欧对非洲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地凶残掠夺、榨取和摧残，只字不提。而渔父正好也是这样一个理论家。他说：

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未必是由于“殖民经济”。北欧国家、瑞士、加拿大、澳洲，从未向未开发地区抽取任何资源，甚至毫无经济接触。它们之所以富裕是因为自身的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特别是人力资源的丰富。那些与落后地区接触的先进国家，在最初接触时，已经十分富裕。它们的富裕，和落后国家的落后，其实没有因果关系。

这不是典型的、国际规模的“贫富天成论”又是什么呢？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举出凡殖民地知识分子无不熟悉的这些历史：横越大西洋的奴隶买卖、殖民主义、割地、开埠、通商、赔款和干涉，是怎样重大地构成先进国血腥的原始积蓄，构成从商业资本向着工业资本飞跃的物质诱因，直接触发了西欧工业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工业革命。四百年来的新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开展的“世界体系”形成的历史，说明了早期英法的发展和今之美国的发展，恰好是同样一些国家发展不足相辅相应地展开，岂能说“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未必是由于‘殖民主义’”呢？

殖民主义就是殖民主义，是历史的、经验上的真实，我们是绝不在引用时加上括号的。依赖理论所剖析的，如前所言，是十六世纪以来的英法美这些殖民帝国的发展，自然不论“北欧国家”和“瑞士”等。发展的取样上，不成一个典型，在国际经济学上，几乎没有讨论价值之国。关于“北欧国家”如“瑞士”的原始积累如何形成，我惭愧毫无知识，不敢妄论。但今日它们皆以最尖端、精密之工业产品与世界其他地区——应该也包括贫困国家吧——进行不等价交换，也是周知之事。

说到加拿大和澳洲，渔父似乎竟忘记了这两个地方，不折不扣地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建立的白人的殖民地。渔父难道真不知道，这两块白人的大殖民地的发展，明明白白地是由于英国、法国对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殖民统治所搜刮之剩余（surplus）去建设的吗（A. K. Bagchi）？再者，加拿大和澳洲的“富裕”，难道不是以这两个地方的原住民族、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和大洋洲上才离开新石器时代不远的土著民等的种族绝灭这个残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血腥的“富裕”吗？渔父似乎刻意漏列了美国。今日美国的形成，和英国从亚洲、非洲搜刮所得去投资经营，和起初是印第安人的灭绝和对于黑种人奴隶的强迫性无偿劳动之掠夺，嗣后是无远弗届的“五角大厦—国际企业—CIA”复合体向全世界的扩张，当然有密切的关联。

然后，渔父不惮乎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富国的双手是绝对神圣而洁净的。渔父说道：“它们之所以富裕，是因为自身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特别是人力资源丰富。”

而倘若说到“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和“人力资源丰富”，今天散列在辽阔的世界南方的落后而又贫困的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早在今天“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尚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不是都创立过辉煌无比的中国、印度、印尼和衣索比

亚、埃及的精神和物质的文明吗？从十六世纪开始，正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货物、织锦、黄金、白银、工艺、兽皮、香料、宝石……吸引了贪欲的西欧航海探险的殖民主义者。对此，谁也不能说第三世界资源不丰富、生产力不发达、人力资源贫乏。渔父们这些欧美系社会学者规避从十六世纪展开的欧洲新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世界体系，想来大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笨拙地为“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全球性的支配做掩饰和辩饰，因为如前文所不断地指出，“那些与落后地区接触的国家”，如果没有奴隶贸易，没有对于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掠夺，就没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不能或缺的原始资本积累和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也就没有今日“十分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了”。说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和落后国家的落后，完全没有“因果的关系”的欧美系社会科学家们，总是认为贫穷国家的贫困与落后，是自生、自有的；是源于这些落后国家自身的“落后”和“传统”性格，与世界体系的发展，“没有因果的关系”，从而认为只要扬弃后进国社会自有的“落后”性与“传统”性，吸收“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社会自有的“进步”性与“现代”性，就是后进国家开始文明开化，开始发展和成长之日（W. Moore）。站在西欧“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立场，做这样的议论，至少还是比较上可以理解的。但不知也跟着欧美社会科学者学舌的渔父，究竟是什么样的立场而云然呢？

“没有发展的成长”

渔父的论点，开展至此，终于迫不及待地显露了他热烈拥护和支持当前世界体制的亲体制性格了，他说：

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如果拒绝纳入“体系”而独立自主地发展，是否经济成长就会加快？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统计资料显示，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长期来说，经济成长率要比不参与的国家高。以东非共同体的国家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为例。在独立之前，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资源也比较丰富。但独立后，坦桑尼亚实行独立自主的乌伽马主义发展路线，乌干达采行一种改装的部落主义经济，肯尼亚则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但如今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乌干达的经济也一塌糊涂。对照之下，肯尼亚的经济倒是走在前头。

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依赖理论认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国家，个别地取得一定程度内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这“发展”的性质。依赖理论认为，在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国家，是做为先进国发展和扩张的一个反射而有局部、个别的成长，是在先进国家发展和扩张的全盘计划中，做为这计划的一个附庸而发展，而不是以后进国本身为主，以自己需要为导向的发展。而落后国家这极为有限的“成长”与“发展”，又回过头来成为先进国更大发展与扩张的工具和条件，使落后国对于世界体系之依赖的结构，更形加深与巩固，从而是抑制而不是促进了使一个国家经济获得真正发展所必要的结构性的改造(S. Amin)。像这样，仅仅是在“统计资料显示”的“成长”，而没有伴随着往更大、更长远、更实质性的自然发展所必须的社会经济构造的变革，也没有以自己民族现实需要为中心、由自己参与、指导和计划的活力的“成长”称之为“没有发展的成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一译“矮化的成长”)。

在若干第三世界国家纳入“体系”后所取得的“没有发展的

成长”中，往往一方面是一大堆“统计资料”和一般性经济数据上所“显示”的“成长”，而另一方面却同时并存着较有活力的经济部门和更广泛的停滞、解体的经济部门，和逐渐深化的贫困；在在缺少生产上的结构改革；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缺少熟练技术和缺少本国人对高层经济和生产部门参与；缺少一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立自主的信念、展望和决心。事实上，一些“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为这“没有发展的成长”所付出的代价，便是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的高度依赖。象牙海岸就是其中典型的成例之一。

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以共同投资形式，“彻底参与”于法国和欧洲共同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的非力·胡费·白格尼总统的象牙海岸，经济成长率在百分之六以上，国民平均年收入也高于平均的非洲一般其他国家者。投资保持稳定地增长，政府有钱从事发展和建设，政府在行政上的花费，较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低得多。但在另一方面，整个象牙海岸的经济结构和它在殖民时代者几乎完全相同，国内富裕的少数精英与广泛的、贫困的农民间的巨大差距，依然没有改善。确实，在农业生产上，象牙海岸有显著提高，但在基本结构上，依然是外国地主投资的大庄园经济。除非根本上废除形成一种倒退性的社会结构的、由外国地主付薪的农业劳动体制，在整个农业生产部门中进行结构性改造，象牙海岸的农业就无法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S. Amin）。

在资本和财务上，象牙海岸采取了与法国、欧洲共同市场合作的政策。但这种合作投资的政策，是以损害自主性地设计自己的发展计划的权利和以损害主权的独立为代价的。在象牙海岸，外国资本对于全国经济取得绝对性支配的地位。外国资本在象牙海岸所获取的高度报酬，恰好说明象牙海岸经济成长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统计资料显示”：象牙海岸的雇主资本家，在数量上

大有增加。但其中真正的土著的民族资本家却微乎其微。即使有人可以说，今天，资本主义在象牙海岸确实有长足的发展，但人们却不能据以说明，象牙海岸自己的资本主义有所成长。虽然象牙海岸不受法国和欧洲共同市场的统治，但在经济上，今日象牙海岸与它在殖民地时代者殊无二致：如果一切劳动者是象牙海岸的黑种人，那么绝大部分的、真正的象牙海岸资产阶级，是远远居住在欧洲，只是提供技术、资本和管理的欧洲人“不在资本家”（R. W. Clower et al）。

再举赖比瑞亚的例子。

比较上是“民族主义者”的托伯特总统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以后，继任的塔布曼总统采取了一种“门户开放政策”。为了“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赖比瑞亚开门允许外国资本和土著资本无限制地发展。根据“统计资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外国资本涌入赖比瑞亚平均每年达七千五百万美元。赖比瑞亚的国家总预算，从一九四三年的七十五万美元升高到一九六三年的五千万美元。但这一切改变，为赖比瑞亚带来什么样的发展呢？美国国际开发总署（AID）的专家指出：整体看来，赖比瑞亚人从事政府工作，经营橡胶园、运输业、建筑业和法律服务业。有少数一些赖比瑞亚人从事医疗工作和工商企业。外国人则绝大多数从事铁矿、橡胶工厂和木材厂的经营。在重要企业和工业中，有一小部分赖比瑞亚人因法律的规定，受雇于外商机构，但他们大多只从事企业中公共关系、法律事务和广告业务，不能参与真正的高层管理工作（C. W. Clower et al）。正是由于缺少一种结构性的改革，“彻底参与”了“资本主义体系”后的赖比瑞亚，即使美国开发总署专家们，也观察到这些缺点：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放弃了许多发展的机会，外交花费过高，教育预算偏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经济残留太重，政府部门官僚、家族关系，影响效率。这

些情况一直到托伯特总统时代依然没有基本上的改变。赖比瑞亚少数一些买办的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合作,经由外国资本和技术,对于本国进行盘剥和掠夺。在“统计资料”上,今天的赖比瑞亚比起托伯特总统的时代,固然有若干可以看见的“发展”,但是对于广大的、贫困的赖比瑞亚人民,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即便是在渔父所赞美的肯尼亚,欧洲殖民者所残留的数百英亩土地,在“独立”后由欧洲银行贷款给富有的肯尼亚农民去购得这些土地,或由特权关系的肯尼亚农民取得,形成富裕的肯尼亚地主和贫困的佃农所构成的社会结构。“独立”后肯尼亚土地所有关系在根本结构上的改革之阙如,和肯尼亚农业对于世界“先进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使肯尼亚持续存留着类如殖民地时代暴露在强大榨取下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农民(subsistence farmers)。

该死的民族主义者

渔父以非洲一些不愿意“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如坦桑尼亚、乌干达在经济上的失败,做为受到“资本主义体系”惩罚的例子,来说明如果穷国不依赖富国,不但无从图发展,简直是在这世界体系中,无地容身的命运。

在某种意义上,渔父所举的例子虽然令人沮丧,却是真实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弱小国家“追求‘经济独立’的困难(注意渔父以括号来表现‘经济独立’这个理念时所传达的深度揶揄意味),”也许可以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来说明。

由于深深地体会到要从几世纪来的殖民经济上自求解放,阿尔及利亚先要真正掌握自己的经济,以期在经济上而不只是政治上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军人政府进行了经济上的国有化和本色化(indigenisation)两个政策。所谓国有化,是由阿尔及利亚政府

将若干重要的外资企业和工业收归国有，由政府接管。而所谓本色化，是政府经由法律的强制，迫使外资厂商接受阿尔及利亚人参与其管理和营管过程。阿尔及利亚政府分阶段、有步骤、有规划地进行了国有化和本色化的工作，并举行各种训练，期以提高阿尔及利亚人在管理、技术、生产和经验上的能力，为培养和发展民族的资本而努力。但阿尔及利亚为了追求“经济独立”的努力，却遭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复杂而巨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来自内部。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经济结构中，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资本无从发展。一切重要的企业、贸易和工业，长期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自己的民族资本积累无从形成，没有自己的管理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在科学技术上，更是被掌握在外国厂商的手中。阿尔及利亚“经济独立”的努力，最先就碰到这些源于数世纪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历史所带来的现实困难。而这些从数世纪殖民历史所沉积下来的困难，即使是国有化、本色化，用国家力量强迫增进阿尔及利亚人接管既有外国企业，并由国家融资中小企业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手段，也一时难以解决。

第二方面的困难，则来自外国企业的百般阻挠，企图破坏阿尔及利亚的国有化和本色化的努力。收买阿尔及利亚人出面顶替，利用阿尔及利亚人出面购买一些政府规定不能由外国人经营的企业，以利实际上由外国人控制那个企业，收买阿尔及利亚特权人士，请他们当公司虚有其位的董事，却把管理实务性位置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迟延或抗拒政府的国有化和本色化改造……这些外国商社的阻挠和破坏，生动地反映在阿尔及利亚政府颁布的许多禁令之中（D. A. Offiong）。

但是，相形之下，阿尔及利亚在力图“经济独立”所遇见的困难和挫折，比起其他同样为自求解放而努力的国家所遭遇的命运，还是十分幸运的。新殖民主义，正是透过对于第三世界国家

进行蛮横的干预，发挥它维持并强化旧殖民地时代的超额利润的功能。因此，对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国际新殖民主义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持住原殖民地社会的法律系统、政治结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以利其遂行新殖民主义的榨取和掠夺的机转。任何这些旧结构和系统的革新和改造的企图，往往带来来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蛮横干涉；收买当地政治和军事势力，反对“民族主义者”的改革、政治暗杀、经济封锁、军事政变、支持最苛刻的独裁统治……不一而足。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间，这些无情干涉和镇压贫困国家自求解放和力图“经济独立”的事例，几乎无年无之。而且在六十年代，渔父所任职的联合国，就曾经参与过几件颠覆和暗杀非洲几个企图挣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府及其领袖的罪恶案件。恩克鲁玛、卢蒙巴，只是这些该死的“民族主义者”中较为倒楣而著名的两个人罢了。

渔父还举了印度的例子，企图破灭一切想要挣脱国际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控制的民族主义者争取自力更生的希望。渔父说道：

有些国家在发展之初，为了追求“经济独立”而大力推展基础工业，结果适得其反。印度在五十年代不惜代价，不顾产品需求情况，大规模投资重工业。这个政策使它从六十年代开始，不得不长期“依赖”大量的外援食物和资金援助。

渔父想说的是这样的结论：“追求‘经济独立’而大力推展基础工业”是使印度“从六十年代开始”“不得不长期‘依赖’大量的外援食物和资金援助”的原因。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印度的问题之复杂，到了不必是搞世界经济的人都能想象的地步。但是把印度今天悲惨的境遇，简单地归罪到印度妄自“追求‘经济独立’”的渔父的宏论，恐怕绝无仅有吧。

“独立”后的印度，在制造业、农业庄园、金融和批发生意上，早已分配在以英国为主的外国人手中，即使在“独立”后大量涌现的印度企业如炼油、制药、人造纤维、各种耐用消费品等技术密集的工业，外国人私人资本和技术仍占有支配性地位。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更受到美国援助计划的支持（PL 四八〇贷款基金）。早在六十年代初，印度建立了两个“基础工业”的炼钢厂，但都在资本上和技术上依赖于英国和西德的炼钢资本。许多其他印度“基础工业”，一开始就倚重西欧和苏联的资本和技术。但为了这种依赖，印度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每一个“合作”计划，都有数不清的各种强加在印度身上的限制，例如限制产品输出的地区，限制把某种技术转给第三国；规定不经参与投资的外商允许，印度方面不准从事研究发展工作（A. K. Bagchi）。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推动的“社区发展计划”，在印度渴望发展粮食生产的背景下，使美国农业资本和技术深入地渗透到印度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教育各部门。但喧闹一时的“绿色革命”，根本上失败了，并没有为印度解决严重的粮食问题（Punjab, et al），从而使印度市场更加狭小化和毫无生气，连带地引起了公共企业生产的颓落。一九六七年以后印度经济危机，在资本需求下跌的同时，产品输出的必要，引动了极廉价产品的输出。而出口工业的赋活，又深化了对于西欧和苏俄市场和资本的依存。一九七五年间印度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上的危机，使国内市场疲弱，外销竞争乏力的印度经济，成为重大压力，迫使印度政府一步步放弃“经济独立”的方针和政策，更深地组织到对于世界“先进资本主义体系”，愈陷愈深地落在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各国支配中（A. K. Bagchi）。

印度在五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大略已如上述。印度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在政治上取得形式上的“独立”的

各国，在经济上是如何地难于从旧殖民地残留的枷锁和新殖民地缜密的网罟中解放出来，从而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恩克鲁玛所说的：“第三世界除非彻底地打倒、摆脱新殖民主义，永远无法取得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真实的独立”的话。渔父，正像一切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代办人一样，把落后国家落后的原因归咎给这样、那样的理由——例如说什么“追求经济独立”，“大力推展基础工业”，“不惜代价、不顾产品需求情况大规模投资重工业”，却独独只字不提新旧殖民主义破坏性的影响因素。

是谁做主的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

时常有一些出生于贫困的第三世界，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受了教育，看见“先进资本主义国”目迷五色的繁荣和富裕，便对于自己祖国的贫困、落后起了深刻的轻蔑和仇恨，尤其如果看到长年以来祖国力图“经济独立”，挣扎着摆脱“先进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却不但一事无成，似乎越搞越穷时，这些知识分子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唯成长论”，竟可以达到不惜以重做那“世界体系”的奴隶，但求一口饭吃的彻底的买办主义的程度。

然而，像渔父和类如渔父的一些欧美社会科学家，似乎永远无从理解，第三世界的人民再穷、再饥，也还有人的尊严。他们绝对不只是几亿让渔父们看了心烦的，因了饥饿而徬徨、挣扎着的牲口。依赖理论所不悖于陈辞的，是四个世纪以来世界体系发展，正是新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世界结构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在完全没有准备、没有预备好条件的情况下，硬生生地被推进“世界体系”之中，身不由己地随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贪婪的发展、扩张的节奏和需要而运动，形成对于“世界体系”无奈的、苦痛的依赖。在这依赖的结构中，第三

世界国家许多重要的经济发展的计划和决策，因为殖民地历史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因为高度发展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大众传播技术所形成的跨国性巨大企业，都是在欧美、日本的办公室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经济机构所自动自发制订，从而一切第三世界一切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方针，无不是为了“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扩张与成长的利益，而不是自己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了达到此目的，“先进资本主义”各国，有时不惜以贿赂、威胁和收买贫困国家内部的特权官僚，支持和增进大国的掠夺。不少的时候，大国可以直接透过公开的政治或武装干涉、暗地里的选举操纵、政变和暗杀，甚至利用貌似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六十年代的联合国，进行暗杀、颠覆和武装干涉来支持“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利益。此外，外来的“先进资本主义”在贫困国家内所培养的新兴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国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这“世界体系”的运动过程中形成自然而且牢固的同盟，在贫困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上，发挥对于外来支配势力的呼应和认同的作用。在意识形态上，贫困国家的一些买办知识分子，也会自然而然地挺身出来，以“资本主义体系”无害有益论和“追求经济独立”该死之论教训国人，更是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依赖理论从来不曾主张“摆脱”和世界的经济和市场间的关系。依赖理论所批评的，是这关系的不平等的、受制于人的性质，从而要求改变这个不合理、不公平的关系。依赖理论不是只知“不惜代价、不顾产品需求状况大规模投资重工业”的呆子。恰好相反，他们心忧虑烦地希望祖国的发展，是真正为了自己民族万世千秋的利益所做的发展，是自己真正当家做主，自己按着自己现实需要和具体利益制订发展计划和政策，而不是永远做别人的利益、别人的发展和扩张的工具，追求剧毒性的“没有发展的成长。”退一千一万步说，即使“追求经济独立”，在现

代“世界体系”中是难到近乎不可能，第三世界人民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无论如何，是第三世界人民神圣不可侵夺的权利，不容轻侮。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具体条件，按照自己的理想、良知和道德，选择和决定自己民族发展的道路，并且有权反对和抵抗任何压制和阻碍自己决定的发展道路的恶势力，做坚毅不拔的斗争。

当渔父以殷惠敏的笔名，在香港一家杂志元月号发表“台湾与依赖理论”时，以状似不经意间提醒人们，依赖理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发展出来时，无非是渔父用心深刻地想告诉人们，依赖理论的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性格。除了对于渔父在落笔片刻中表现出来的灵魂的堕落，感到伤痛，我想引用美国一位保守的社会科学者——他的“穷国之穷未必肇因于富国之富”论，以及“即使没有掠夺穷国，富国照富不误”论，和渔父的壮论完全雷同——彼得·柏格的话，供渔父和一切第三世界买办的知识分子们做个参与。彼得·柏格说道：

……资本主义在今日第三世界的渗透所造成的实际效果，大部分是有事实为证的。此种资本主义所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绝不是单靠武断的信念，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富国与贫国之间的两极化；贫国之内大多数贫民与少数显贵之间的两极化；悲惨状况的增加；第三世界外债的不断增长，贸易与收支平衡的不断恶化——这一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杜撰出来的，而是有其客观事实为根据的。(Peter Berger 蔡启明译文)

保守的、亲体制思想的代辩人，不论其古今中外，都会死抱着一个不智的立场，那就是把只要一般的良心和道德就可以清晰

地理解的道理，也气咻咻地归咎于这样和那样的“危险思想”的煽动。更何况，依赖论者，在深入检视第三世界悲惨的现状之后，也知道除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还有来自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垄断的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帝国主义”，并且不惮于对他们发出深刻而尖锐的批判。渔父企图向着台湾的同情依赖理论的人们飞来的“列宁主义”的帽子，不论在主观的理论本身，和客观上台湾言论政策的合理化迹象中，恐怕注定是一场徒劳的心机吧。

好一个无辜的跨国企业

渔父当然不免于要为被称为国际巨无霸（International Giant）的跨国性大企业说尽好话的。他说道：

……人们往往忽略了跨国企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投资与贸易量所占的重大比例。它们并非一定要靠第三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

依照“统计资料”，一九七四年美国在海外投资约一千亿美元中，有三分之二是在拥有高度科技的国家中投资。在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只占美国海外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五年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但是，任谁也无法否认，跨国企业对于落后国家的投资，利润率最高、最肥厚，远远地超过了资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投资报酬率。理由是明白的：第三世界劳动力的价格低，在台湾十个月的工资，只能抵得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一个月的薪水。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智利、巴西的工价还远比台湾便宜得多。此外，第三世界国家在税

额、投资优惠、财政优待上的利益和特权，尤为可观。因此，一九七四年，以美国为基地的美国跨国企业从埃及吸回美国的利益，等于同一年埃及国民生产毛额的四倍之高。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间，美国从第三世界汇回美国的利益是两百三十三亿美元。在过去三、四十年代中，美国跨国企业 De Beers 从坦桑尼亚汇回美国的利益，是当年它在坦桑尼亚投资的金额的三十倍 (E. Onwumere)。

这些价值，恐怕还没包括跨国公司以不正当手段千方百计地把赚自贫困国家的钱“盗”回本国的数目。这些不正之手段，包括高报投资用的机器、设备和高等原料，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间各种不按国际市场价格，而以所谓“移转价格”的买卖；包括出口给相关公司时低报价格逃税，包括国际管理人员差旅费、薪资的浮报等等。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海关、税务、会计的不发达和容易收买贿赂，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几乎是各跨国公司高层财务会计人员所熟悉的看家本领 (D. A. Offiong)。

尽管渔父和其他欧美系社会科学家老是装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以各种不同的语言说，跨国企业“并非一定要靠第三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但从几十年来，驻在第三世界各国的跨国企业，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惜以超强大国的政治力、外交力、经济力、军事力和特务力，公然破坏国际法律和人权、道德与良心的制约，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以观，对于第三世界的榨取和掠夺，依然无可否认地是西方跨国企业甚至政府的重大利益。当然，对于这一点，渔父还是要做困难而技穷的狡辩的。他说：

跨国企业进入第三世界，未必会造成后者的贫困化。但跨国企业的主顾时常是一国的政府。为了追求利润，维护垄断的经济利益，跨国公司往往发觉它和专制政权是利害与共

的。可是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可以保障眼前的利益，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个必须在未来付出重大代价的政治陷阱（伊朗就是一个例子）。一般而言，随着所在国政治的多元化及各种不同的社会压力集团的出现，跨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认定它们必然地与专制势力“狼狈为奸”，本身就是一个专断的看法。

“跨国企业进入第三世界”，会不会“造成后者的贫困化”的问题，是应该摆在整个“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新殖民主义结构中去思考，而不是单独、孤立地问“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即使前文举过的保守派社会学家彼得·伯格也不能不扪着未死的良心这样说：

……在新殖民主义形态下，外商通常将新产业的利润转回母国，而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支付逆差不断增加。而推动耗资而不经济的工业化所负的债务更会使支付逆差的压力显得格外沉重。发展所谓的“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e）工业的策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曾被广泛推介为发展的标准处方。但它应用下来的结果，几乎在任何地方皆招致失败。由此可见，新殖民主义正是意味着愈来愈穷，以及对外国势力愈来愈依赖。（peter Berger）

彼得·伯格并从而印证，以跨国企业为主要的作机转的现代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所造成的，是一种使第三世界不断地奔向愈陷愈深的“发展不足”的形成过程（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也就是贫困化、解体化、附庸化的过程。

其次，既然渔父自己谈起了，让我们也约略地看一看跨国企业和“专制政权”的关系。为了免于理论的冗繁，我们就以美国参院自己的调查报告为依据，谈一谈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简称 I. T. T.）、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怎样以周密的计划，推翻了智利阿连德政权。

为了阻挠、破坏主张把美系铜矿企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智利总统候选人阿连德当选，早在一九七〇年，I. T. T. 的总裁（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约翰·麦康就曾出资数百万美元，找智利人进行阻挠阿连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同年八月，国务院正式训令美国驻智利大使柯尔利，要他采取由美国出兵干涉以外的“任何方式”，挫败阿连德在普选中成功的机会，并拨出美金三十五万元贿赂智利国会议员，促使他们推翻总统选举后阿连德当选的结果。后来，另外一位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长达三十五年，当时任职 I. T. T. 高阶管理工作的尼尔，向国务院呈递了一份包括了十八个行动要点的政变计划，用以推翻智利新政权。美国政府完全接受了这项周密的计划，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部署，由当时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康纳利主持其事，并派遣国务卿和几个美国大跨国公司 I. T. T.、福特、Anaconda、Purina、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的最高决策人举行秘密简报，一再保证“尼克松政府是企业界的政府”，它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在于“保卫美国企业的利益”。这以后，美国政府联合跨国性企业、国际性银行团对智利进行周密、无情的打击、孤立和掣肘的行动，企图造成智利的经济混乱、瘫痪其贸易、并收买智利报纸、工会和国会议员，造成强大的反阿连德舆论和政治反对力量，终至于以军事政变，一举击溃了阿连德政府（R. Barnet and R. Muller）。

不错，阿连德是个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跨国企业和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合力以长达将近十年的时间，花费高达一亿

三千多万美元，处心积虑所打倒的阿连德，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单纯的意识形态动机去解释这件举世著名的政变，从而去掩盖这次大手笔政变背后隐藏的经济动机。“尼克松政府是（美国）企业界的政府”这句话，正好道尽了倒阿政变的根本性格。如果渔父们依然不服，那么我们随随便便地便能举出另外的好几打这种国际企业、超强政府、超国界特务甚至国际机构——如六十年代初的联合国——共同合作，颠覆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胆敢“追求经济独立”、胆敢搞经济国有化和本色化的政府之实例。多米尼加、刚果、索马里、玻利维亚、希腊、巴西只是这些倒楣的政权的一部分罢了。至于卢蒙巴和卓姆贝，那只是几个倒楣的、被暗杀的领袖中的两人而已。也许渔父们终于还要说，这些人不少是“左派”、是“共产党”。那么，我们仍旧以坚定相信着资本主义优越性，对于曼坎（H. L. Mencken）的名言——“若果相信苏联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的话，那无异于像是相信圣灵降临派教友们的确是摆脱了一切的罪恶一样的荒谬”深为共感的彼得·伯格的话，来回答他们：

在第三世界里，资本主义在对付满足人类的需要上，几乎完全失败……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可能会面临愈来愈令人灰心的情境，而社会主义便在表面上看来是唯一剩下来的可靠的途径。即使资本主义最后仍然行得通，但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有些短期的社会紧张与压力，已经愈来愈难令人忍受了。……但在此种情况下，革命可能是一触即发的。通常，这种革命都会揭起社会主义的旗帜，特别是资本主义渗透得十分强烈的国家里，譬如拉丁美洲。正如一位著名的（天主教）主教阿西欧（S. M. Arcéo）本来是反对基督徒参与任何政治主张里面，但自从参加一项在智利召开的“基督徒

与社会主义”会议后，对社会主义却表示完全支持。他说：“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别无其他解决之道。”此种结论将来极可能广布到所有第三世界国家。(Peter Berger, 蔡启明译)

任何读过彼得·伯格《牺牲的金字塔——政治伦理和社会变革》(台湾译:《发展理论的反省——第三世界发展的困境》),都清楚知道上引彼得·伯格的一段话,绝不是在为“社会主义”张目。恰好相反,伯格试着告诉我们,在新殖民主义支配下的第三世界一片灰暗,令人绝望、沮丧的情况下,任何忧时爱国之士,即便是一个有神论者,终于是难于不被因“资本主义”“十分强烈”的“渗透”而“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的情况所激怒,而奔向“社会主义”的。伯格的话,是要求那些动辄“一味归咎于左派的批评”的,对于市场功能的理性和社会发展或成长怀抱着高度执迷,并不惜以生命的意义去交换的人们一个反省的角度,从而去探索伯格自己的政治伦理。至于他国是否有权以国际范围的力量去干涉别国自己选定的经济发展路线和制度,就不必我在这里饶舌了。

渔父善心地谈到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安静地等候一些具体条件——例如“政治的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社会压力集团的出现”——的形成,更加安静地等待“跨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关于这,我们只举出两点:在上举的,动人心魄的超强国、国际企业、国际特工、国际组织联合起来的封锁、打击、暗杀、政变和颠覆,世上又有几个国家能不为之粉身碎骨?更何况,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见一个现实具体的实例,告诉我们跨国公司怎样变换了“所扮演的角色”。跨国企业,绝不是像渔父所称那么无辜地忽然“发现”了它与结构性压制和反改革势力“相互依存”。不,容我们说,早在“东印度公司”时代,跨国企业便

在发生当初带有无可辩饰的掠夺和压抑的性格！

在台湾，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中，曾经遇见过不少素质优秀、练达、勤勉、正直的跨国企业干部，赢得我真诚的友情和敬意。跨国企业的一切缺点，源于它内生的体制机转。依赖理论在批判这些显著的经验上存在的事实之余，没有人反对过与跨国企业合作。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要求跨国企业应该本于企业伦理，和地主国合作，遵守地主国的法律、理解和尊重地主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与理想，严格整肃自己的纪律，绝不从事和参与破坏、干涉和颠覆他国以增大企业利润之事。跨国企业总有面临这样的选择之一日：真正“改变”它所“扮演的角色”做一个殷实的国际商人，或者是在广大正义的世界人民之前轰然倒塌。

“忍辱负重”——问题在于要忍到几时？

欧美系为世界体系百般辩护的社会学家，不时地告诉人们，第三世界应该乖乖地在世界体系之内，采取欢迎外来投资，鼓舞自己的资本主义。虽然在整个过程的初阶段，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大量产生……但这是奔向发展的必要的阵痛。要在这段痛苦的时期，赶紧形成资本积累，准备“经济起飞”时代的降临。等到资金积累到某一个程度，自然能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欧美资本主义，便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如今不但社会富有，而且分配也一般平均了。这些学者因而要人等待，要人忍耐。用渔父的话来说，就是“不惜暂时地忍辱负重”，要从“具体的生产因素着眼，在资金、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加工形式的出口导向成长”，等等。“不惜暂时忍辱负重”，时间一到，经济发展的利益终于能均沾到每一个国民之说，便是类如渔父所说的所谓“布泽效果”或“扩散效果”（trickle down effect；spread

effect)。但问题在于，当前第三世界的具体经济经验中，根本没有任何最轻微的迹象显示这种“布泽”或“扩散”的效果。贫富两极化、饥饿、疾病与失业状况，在过去十年间不但没有改善，甚且反而呈现恶化的现象。没有人能确切地告诉人们，大约再过多久，在什么具体条件下，情况会必然地好转。忍辱负重，对于苦惯、穷惯了的人民，那是毫无问题的。问题是忍辱负重到什么时候？瞭望那辽阔的贫困、绝望的第三世界，没有一个渔父那种经济学家可以举出一个——只要一个——实例，做为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起飞，奔向富裕的国家的例子。相反地，我们却看见巴西、看见墨西哥……这些在贫困、失业、破产中逐年下陷的国家；看见跨国企业越来越相互合作，进行着垂直的和水平的兼并，进行着管理上的长程计划、最大限企业风险安全和有效保持有利于跨国体制的氛围等这些全球管理技术的发展。

“出口导向的成长”——另一剂灵药？

在六十年代向广泛的第三世界推销过以“进口替代工业”促进发展与成长的“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学者们，当“进口替代工业”在整个第三世界范围内全部覆灭以后，到了七十年代，又大力鼓吹“出口导向的成长”(export-led growth)的法螺来。因此，渔父说道：

在资金、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加工出口形式的出口导向成长，无疑是海岛经济形态下的一条合理的出路。面对着人民生活真实的改善，指责这样的发展模式为饮鸩止渴，并不公平。

从台湾的经验看来，渔父的话似乎有一部分道理。但依赖理论所谈的，是一个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下对于整个第三世界当今处境的分析。因此，从整个第三世界的背景去评估，所谓“出口导向的成长”，至少存在着这些问题：

首先，是在世界市场上，第三世界出口原始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加工品的国家，由于完全缺乏国际性政治组织和复杂的供需规律等因素，所以完全缺乏议价的能力，先进国新的化学合成物质，不断地取代了第三世界所出产的原料（如色素、染料、橡胶、樟脑、合成纤维等），使价格暴跌。咖啡、茶叶的市场早已饱和（Helleiner）。面对着垄断性的国际采购公司，第三世界的出口商人往往被杀价杀得片甲不留。近十年来台湾的出口商最知道个中的滋味。

其次，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对第三世界出口品的严格设限（Massel）。有些先进国对于自己国内生产的农产品如肉类、粮食都以法律加以保护。其他工业产品如纺织品、电视机、皮革制品等，常常受到所谓“配额”的限制，或者动辄宣告某项工业品违反了他们的“倾销法”。但在另一方面，却以政治压力强迫向第三世界倾售他们过剩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好几年来台日间为香蕉输日数量和价钱的争议，日本拒绝增加台货输日的争议，只不过是全第三世界在近十年来越来越常见的景象的一小部分罢了。

再次，近十年来，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国际性企业，在广泛的墨西哥、巴西、菲律宾、印尼、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甚至南斯拉夫（最近的中国大陆）等低工资地区，或投资设厂，或转包给当地工厂，按照他们规定的数量、规格和品质，生产若干中下级产品，输往本国或其他先进国家，形成一个辽阔的国际性转包结构（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而被像渔父这样的经济学家夸为第三世界飞向发展之道的一列快车。然而，研究已经指

出，这国际转包的规模，是极为有限的。如果从墨西哥、台湾、韩国这些重要转包经济国看来，国际转包出口毛值，是各该国出口额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再细分而论，这种国际转包又分两种，一种是转包给第三世界当地制造商，另一种则由各贫穷国内的跨国企业分公司自己承包。如果把后者扣除，国际转包在第三世界的生产总值比率就相当低了。至于类似而可以相互取代的产品，贫国自己设计生产外销的产品，比起在国外设计，转包到第三世界当地厂商或跨国公司子厂商的转包业务量，就更加地少了(Sharpston)。

台湾是出口导向经济的一个典型。台湾的一切进口，主要是为了再加工后出口。出口品又多属手工、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也多属上述从欧、美、日转包过来的业务。但是，越是附加价值高的产品，越是受到跨国企业的觊觎，受到跨国资本支配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台湾本地设计、生产出口的商品，多属劳力高度密集、业务量小、资本积累困难的产品。近来，经济部要求台湾工业“升级”，使资本技术都更上层楼。这个政策，是好的、正确的。但这个政策也碰到这考验，跨国公司肯不肯把生产高技术产品的机会礼让给台湾本地厂商？十几二十年来，台湾的摩托车、汽车、电视以及近来录放像机、电脑周边设计等工业发展上所遇到的困难、掣肘，生动地为像渔父那样执迷“出口导向的成长”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另一面的答案。在依赖体制下，第三世界贫困国，几乎永远也无法在资金、技术上获致独立的(Y. C. Chen)。

有人说，为了要发展出口工业所引进的先进技术，可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在技术上飞跃。但是事实上，这些技术全是低等、简单的技术，而且率多皆需佐以大量人工，再不然就是一些迅速报废过时的技术。至于出口导向的成长政策，往往招来别人所不要的高度污染工业和技术，更是一项负面的结果。

“先进资本主义国”的工业资本阶级，尤其在连年全球性不景气下，积极向着辽阔的第三世界劳力低廉地带寻求转包设厂，将是一个有增无已的趋向。但这只有使第三世界更进一步经由外国资本、技术和市场的机转，更加深刻地组织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从而加深对于世界体系的依赖罢了。看来第三世界永远在扮演着搭错班车的人的角色。从殖民地获致形式上的解放后不久，第三世界马上模仿西欧的技术和生产，大搞“进口替代工业”，而全盘失败。现在，第三世界又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大搞“出口导向的成长”。它会不会像当年大搞的“进口替代工业”一样，走向原始目标的反面去呢？目前的经验正在一点一滴地告诉我们真实的答案。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内面的根本改革，以利源自内在的真正经济成长，从而使自己可能从世界体系中一步步获得自由，随着外国的经济学家，无反省地奔向“出口导向的成长”，则终究不免要再次遭到挫败的命运，也未可知。

台湾经验的特殊性

反对依赖理论的人，最喜欢拿“亚洲四小龙”，做为第三世界应该组织在“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才能获致经济发展的证明。渔父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渔父以台湾为例，是有着不可言喻的十分细密的用心的。渔父说道：

至于所谓外资的比重同经济成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平等成反比的命题，已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它并非普遍的真理。以台湾为例，台湾不仅持续保持很高的经济成长率（平均为百分之九），而且同一时期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数，从零点五七

下降到零点二九。在这方面，决策者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台湾奇迹似的发展，不但举世闻名，对于跨越了窘困和丰富两个时代的我，感受尤其的深刻。离开台湾的社会生活只七年许，一九七五年，当我回到家园，觉得台湾真是由沧海变为桑田，有些街市到了无法确认的地步。物质生活内容变化之大，实在不可以道里计。任何数据，都没有住在台湾的人鲜活的感受更具说服的力量。问题在于，台湾成功的例子，是可以放诸全第三世界而皆准，可以复制，可以仿效，可以做为样板呢？还是它是由好几个条件凑合起来的特例，为一般标准的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适用？答案，依照一般研究第三世界经济的学者的意见，属于后者。那么，台湾有哪些特殊的条件呢？

首先，在五十年代，由于东西冷战的高峰朝鲜战争，美国政府大量、持续地对南韩和台湾投以援助。这种为了配合美国全球战略巩固台湾的政策性援助，和美国在其他地区名为援助，实为增进美国企业利益，倾销剩余农产品的外援，在数量和性质上，颇有部分不同之处，而这是其他第三世界所不曾获得的。六十年代的美援，对于当时战后残破期台湾经济、金融的稳定，有巨大贡献。其次，台湾成功的土地改革，造成台湾广泛农村财富的再分配，形成一时稳定、有生产意欲和购买力的农村，对日后台湾工业发展，有重大帮助。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严重的、封建的、殖民地的土地关系问题，也都有各式标签的土改，但很少或根本无法和台湾比较彻底的地制上的改造相比拟。原因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当地和外国地主阶级，阻力很大，和官僚勾结，千方百计破坏土改（R. Barnet and R. Muller）。最后，台湾面积小，人口绝对数少，和印度、巴西等巨大第三世界国家比起来，只不过是他们境内的一个小区域。巴基斯坦人口七千一百三十万人，印

尼一亿三千多万人，而印度有六亿二千多万人。台湾只有一千八百万人，把香港、新加坡、韩国其他亚洲“小龙”加起来，才五千九百多万人（A. K. Bagchi）。亚洲“四小龙”何况还有其他为其余第三世界国家不能有的特殊国际政治、地理和地缘等诸因素。但是，不论如何，从基本性格、从世界体系的国际生产关系上说，台湾在市场和技术上，不可否认地对美国、日本和欧洲有典型的依赖关系。而台湾在财政上、资本上的依赖，比较上要较其他第三世界为低（A. K. Bagchi），但也要注意外国金融资本在近年加强了对台湾的渗透这个事实。在大观园这个“体系”下，在大规园外租佃大观园的土地而劳动的贫困农民刘姥姥，和在大观园里老夫人跟前穿细喝辣的丫头，尽管生活水平有很大不同，但其同为奴仆则一。台湾经验，明显地不可引用在其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其理甚明。至于台湾的“决策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类的颂声，在台湾的文献中，可说汗牛充栋，相形之下，渔父一句“发挥了重要作用”，只不过是一名无足轻重的空话罢了。随便举个例，台湾的“决策者”从历史经验中积累了宝贵政治技术，使美国三十年来各种直接、间接对台湾的渗透、支配和颠覆，难以得逞，避免了社会政治的不安，对于台湾的发展，贡献就很大。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万一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决策者”的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和大国意识形态相悖，和大国的跨国企业利益相左，从而违反了大国的全球战略，则以许许多多冤死在暗杀、政变、阴谋的非洲、亚洲、拉美的“民族主义”的“决策者”为殷鉴来看，怕是再贤明，也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吧。

关于“利用外资外援”、 “价值观念的交流”及其他

主张依赖理论的人，并不曾像渔父所说，绝对地拒绝“外资外援”。依赖理论所指责的，是这“外资外援”，不论来自西欧和美国，或是来自苏联，大多带有令人无法忍受的、对于受援国的支配、控制和榨取的性格。跨国企业资本对各投资设厂当地的发展，并不是绝对不能发生正面促进的作用，而是它不正当的营运，对于它自己巨大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恶用，破坏了它所能发挥的正面功能(O. Akinmolandum)。在一项联合国调查报告中，这样说：

由于能够发挥巨大的经济力，跨国企业也能发挥政治力量，不时干涉公司住的主权国家之内政。这种行为，是对于住在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拒否，从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自己的自然资源和自己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若干跨国企业在其支持若干落后国家中的殖民主义的、种族歧视的、种族差别主义的政策上所扮演的重大角色，构成对于世界和平、安全与缓和之威胁。……跨国企业损害了（落后地区）工会的充分发展。

——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报告，一九七六

如果渔父们肯花一点工夫，就近到联合国档案中翻一翻资料，他们一定能在同一报告中找到更多关于跨国企业如何干涉和破坏各地主国金融、法规、投资政策、外汇政策和劳工政策等；如何对各地主国法律和司法拒不服从，对各国内政进行直接与间接的干涉，并要求其母国为了跨国企业的利益，对有关的各地主国进

行政治和军事干预和威胁；跨国企业如何成为其母国“外交政策之工具”，从事于为害各地主国的情报、颠覆和阴谋活动；跨国企业如何做有利于各地主国中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差别主义和外国占领的活动……这些事实。但即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基地的美国，它的国会为了警觉到这些“国际巨无霸”对美国某些长程利益的危害，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如果渔父对这件事不去故意遗忘的话，他就应当想到，如果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如果美国自己的国会都对跨国企业深怀戒慎恐惧之心，渔父又凭什么要别人相信“只要”“顶得住”“外在的经济逆势而维持下去”，就可以“利用”“外资外援”？

其次，我们也来谈谈“外援”。第三世界各国不但不拒绝“外援”，还曾主动向富国和大国要求外援。依赖理论不批评“外援”的本身，却不惮于诘问这“外援”的性质。第二次大战以后，一切穷困受援的具体历史经验，几乎没有例外地告诉人们这外援的支配、干涉性格。三十年来，受援国人民对加援国产生越来越深刻的仇恨情绪，恰好是一个生动的佐证。

关于“外援”，我们还是先看看联合国的资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联合国在西欧经济学家和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家的指导下，搞过几个促进落后国家进步与发展的组织和工作。说过许多漂亮的话，做过无数慷慨的允诺之后，美国和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各国，不但不肯承认以自己国民所得的百分之一，来援助落后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先前的承诺，还大打折扣，把百分之一降到零点三五左右。对于缓和落后国债务压力，开放部分市场给贫困国，增加贫困国船运在世界船运市场中的比率，对贫困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援助……这些承诺，不但不遵守，而且实际上大搞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垄断，并把大量的金钱投到花费惊人的武器竞赛中。因此，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沉痛地指陈：

把当前世界武器费用挪用其百分之五，联合国原先计划中的援助（落后国家发展的）目标。只要对军费费用做实质的限制，会造成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移转。一九六九年，落后国家所需要的固定投资总额估计为六百五十亿美元。只要把世界军事开支的百分之十移作投资，就能提供更充分的资源。（C. Waterlow 所引）

其次，“外援”总是带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上的苛刻条件的。有些“外援”往往不是因应受援国人民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是按照援助国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国际体面而给予、执行和监督的。二次大战后，所有这些对贫困国家的外援，只留下一个共同的结果：失败。农耕地废置在荒芜的大地上生锈，许多与民生无补的“面子”工业和建设比比皆是，浪费、技术知识不足、政治上的腐败、贪污，充斥着受援国的社会（C. Waterlow）。大部分的“外援”往往和受援国真实、基本的发展脱节，只让少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获益，而广大的民众却一仍无法获得“外援”的利益。尤有甚者，这些“外援”往往支持和强化一些军事专制政权，以维护加援国在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军事上的利益。而且即使是来自形式上比较非政治性的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也被一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成为大国达成其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工具（C. Waterlow）。美国对伊索比亚专制政府长年援助、支援葡萄牙政府在非洲的殖民主义战争，在安哥拉、刚果、南非的各项“外援”，只是这种模式的“外援”典型之一。此外，苏联和东欧集团对第三世界的“外援”，也同样带着帝国主义性格。苏联的援助，目的也在把受援国的经济和它自己的经济圈连带起来。接受苏联援助的代价，是把当地农产品和其他产品以低于世界市场价偿还——例如埃及和苏丹共和国的棉花。苏联以贱价获

取，却以高价在国际市场出售，使受援国失去获取外汇的机会。因此，问题不在于“接不接受外资外援”，而在于接受什么性质的“外资外援”。正如一位非洲国家的领袖说的：

……倘若我们要建设国家，我们非但需要技术资源，更需要资本资源。如果我们能够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所需最小的外援，我们就会接受它。如果有现成的公共资金要帮助我们，我们就要。但是，我们要问接受这些外来投资的条件，问这投资的计划上的条件。除非我们在经济计划、在法律上真正是自己的主人时，我们对任何公共和私人资本所做的让步，才是我们在自由、独立的条件下所做的让步。（Madeira Keita）

这些话真是道尽了大多数第三世界人民心中对“外资外援”的看法，也道尽了二次大战以来一切“外资外援”所具有的帝国主义的、自私的性格。

渔父在为新旧殖民主义的物质支配辩护之余，当然不忘为它的精神支配说话。他说：

国际经济是相互依赖的。除非采取一个封闭的发展模式，否则就不能避免经由商品贸易所引起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即使没有跨国公司的存在，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国家，由于大量生产外国订购的商品，也自然而然会受到这些商品所反映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影响……。

当渔父说“国际经济是相互依赖的”，他似乎企图说明这“依赖”的“相互”平等的性质。这当然是欧美经济学家的谎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贫国的经济和社会，是做为富国经济和资

本的发展与扩张的反射而运动的，已如上述。至于说到“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渔父也想用“交流”一词，来表现交流的相互的、平等的性格，这当然又是欧美经济学家的谎言了。

跨国公司为了在全世界推销产品，它的行销计划，也是以多国为范围的。在整个行销过程中，跨国企业以雄大的财力和人力，对第三世界市场国文化进行依乎行销目标所必要的利用、改造、解体的工作。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国际性行销管理如虎添翼，透过各种行销传播，达成塑造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利商品的倾销。结果，许许多多欲望解放主义、享受主义、消费主义破坏和取代了许多古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例如与天、与自然相和谐、欲望的适当节制、知足知限的哲学与伦理——以利创造和操纵人类超乎自然的需要和欲望，达到商品的国际范围中的推销目的。

透过成本很高的各种大众传播形式，例如电影、电视节目、广告影片、报纸和杂志，大国的“文化价值”在广泛的第三世界中所向披靡。种族偏见（例如美国西部片中的印第安人，外国电影中的中国人）、殖民主义、白人种族中心主义、从美国、西欧的观点和偏见去报导和解释时事新闻……都透过西方强大的大众传播打人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灵中。

大国设备完善的教育机构和研究发展单位，每年吸引了大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前往各大国受教育、研究和训练。其结果是最大规模高效率的洗脑工作，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行向着文化、科技“中心”改造的运动。人才外流、在第三世界内部培养了一大批和大国的国际资产阶级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的买办知识分子，或如法兰滋·范农所称的“鬼影子知识分子”（phantom intellectuals），不但向他们的国人大肆转贩新殖民主义的“文化价值观

念”——例如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反抗论——还协同外国支配者对自己祖国进行剥削，为巩固本国军事独裁政治拿主意、出点子。

这是什么样的“相互依赖”、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啊！

至于说把可口可乐工业、麦当劳工业，同散在外国的中国餐馆相提并论，则是渔父的另一个笑话。可口可乐、麦当劳，是不折不扣的世界性企业，有全球的管理观点，都没有自然或政治的边界，都利用它的跨国性规模、财力和力量，透过国际银行财团、现代通讯、传播技术、现代企业组织和管理，有效地获取企业在全球范围中的利润。渔父怎么能把这“世界巨无霸”级的企业，和一些苦哈哈的中国人在西方开的中国餐馆相提而并论呢？

麦当劳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在口味精巧的台北中国社会中造成轰动、造成一日百数万台币的生意，决不是它的东西好吃，而是由于它品牌的“威名”，由于美国大众传播长年来在台湾所造成的广告效果，崇洋媚外的气息。在赤贫的中南美洲，农民甚至可以积存小钱，为了去买一瓶从美国进口的糖水——可口可乐。如果可口可乐在拉美贫困的大地上，经由广告和行销，创造绝非必要的消费，造成大量外汇的丧失，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者”（注意渔父用引号表现的，对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的轻蔑和仇恨的情绪）当然有权反对他的人民继续喝别人的可口可乐，特别当他们也有自己的“黑松汽水”的时候。

“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

如上所述，所谓“发展不足”，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发展，在发展性质和层次的比较上，“发展不足”始有了意义。一个落后国家

被组织到“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落后部门愈久，这些“发展不足症候群”就越为明显；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差距和不平等增加，城市中贫民窟蔓延；文盲人数增加；农业生产停滞；国民营养不良情况每下愈况；疾病普遍，生育率居高不下。在某些地带中，甚至死亡率也在增高。国债日增，财政赤字增加，军事开支有增无已，而警察的压制不断强化。外国企业榨走大量的原料和利润。总之，落后国家的发展，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忽略了绝大多数最急切的社会需要，却满足了境内一小撮富裕的消费阶级和外国公司的利益（C. H. Anderson）。除了新、老殖民主义、外来的文化、军事和经济干预，第三世界“发展不足”的动力性原因，在于“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对于成长的狂嗜所造成的对于经由控制原料、廉价劳动、出口市场、关税优惠和特权、价格操纵和财务利润的系统性的贪欲（C. H. Anderson）。而正是在这“发展不足”的形成过程中，在广泛的第三世界内部，产生了与外国的国际布尔乔亚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正是这一层人，在前殖民地获致形式上的独立之后，取代了殖民者官吏和商人，在国内和国外的国际资本加强了彼此的连带，往往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着违反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行为。为新殖民主义辩饰，打击和密告“民族主义者”、宣传“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光荣繁华、之不可抵抗论，以为国际资本在地主国内预备良好的意识形态气候（ideological climate），只是依赖理论中所说的这些“买办阶级”/“买办知识分子”/“精英布尔乔亚”以及法兰兹·范农所谓的“鬼影子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属性和日常工作罢了。在充满着革命与反革命、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复杂斗争的近代、现代第三世界历史运动中，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间发生着相应的、复杂的分化。有一部分人投入祖国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有一部分人成为

外来势力的傀儡，而另有一部分人从反抗者转向，成为买办和鬼影子知识分子。渔父所引的韩国抗议诗人金芝河，正是韩国革新的、抵抗的诗人。然而，深入地理解金芝河思想，人们不能不发现，金芝河那“充满着人间爱”的“眼里”所看到的“一幅交织着血与泪的构图”，正是直接向着支配着韩国的日本新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与这势力相勾结的军事独裁体制所发出的强烈控诉。离开了韩国的“发展不足”，就不能真正理解金芝河。金芝河，是反对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日韩会谈”的学生干将，并且因而在六四年和六五年投狱。在他手写的“民青学联宣言”中，对于韩国的繁荣与发展，金芝河是这样理解的：

以饥饿输出立国，以GNP（译注：即国民生产毛额）信仰为教理，以促成民族资本的压杀和买办化，把数十亿美金的外债转嫁给国民以榨取血税，把绝对性权利奉呈到独裁者的手中，把包括基干产业在内的经济部门化为阀族私有的韩国买办阀族，是造成今日韩国无从缓解的悲惨的元凶。极少数的特权军阀，把国民经济引导向全面的破绽状态，却把责任归咎到国际性原料的大暴涨，而企图掩盖真相。

对于当时韩国经济的认识，金芝河是清楚地具有结构性的理解力和分析力的。金芝河紧接着就说道：

而这一国民经济的全面性破产，正是将资源和劳动力廉价出卖，把外国独占资本当做宗主并使之在本地生根的买办特权体制，和由于不正腐败的余波所扩大再生产的娼妇经济构造（译注：指韩国以色情观光赚取外汇）的总的产物，至为明显……

……在民众悲惨的状态中，反而提倡豪游和放荡，难道不知道无数的民众正流着血汗！在饥饿工资残酷役使下的勤劳大众和在封建榨取下呻吟的农民，使韩国内部一个被隔离的世界中，扩大着贫民窟——这就是十三年来我们祖国“现代化”的业绩！

金芝河对于自己生活的社会的分析，恰好生动地为依赖理论有关“发展不足”的论点，提供了支持的证据。也许渔父会说：金芝河据以理解韩国的“理论”（据上引文章以观，金芝河是有着广义的理论训练的）是“有缺陷、有破绽”的。金芝河的价值和好处，在于他没有“横眉怒目地跳出来”写出“说教的味道”“浓”、“文学的成分”“稀薄”的作品。那么，就让我们引金芝河的另一首震惊了世界良心的长诗“人民的声音”的几句：

揭开来看看五·一六政治

流氓的卖国行谊：

想当年

帝国主义日本鬼压制民族

独立

他就加入日本军队

不打杀民族独立

到如今

美国佬往哪走，他就往哪靠拢

在绳索上来回晃荡

哪儿有机会他就往哪儿晃啊

……

高举“革命公约”，说是

为了解除民众的疾苦
宣传着搞“民生复归”，
却只把军装换成了西服
这就是现代化、就是建设啊
为了给对外依赖找个托辞
搞什么韩日建交
违背民族利益才是真实！
引进外国资本
使民族经济破产，奄奄欲死。

这首长达两百七十五行的长诗《人民的声音》，对于政治独裁、买办祸国、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危机、沉重的国债、豪游冶荡的社会风气、农村的破产、对工会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抑压、苛捐杂税、买办知识分子的曲学阿世等，有痛烈的抨击。对于当局不正地优容“外资外援”，金芝河似乎也“横眉怒目”地“跳出来”唱道：

外资企业暴利，怎能视若无睹
整备外资投资环境
发扬那买办的根性
把免税特惠大把钞票
孝敬祖宗似地送到出口免税区
外资企业的利润，每年两亿美金还不止
国内企业的利润总额，连那零头儿都比不上
加工出口区，使国内地域格差更扩大
在资本集中的逻辑下
大户享尽特惠特权

中小企业啊，连片地倒……

对于渔父，金芝河的《人民的声音》，恐怕不但“用心太过急切”，也是“野心太大”、“所要探讨的问题太多”。充满着理论文章式的“长篇大论的铺述”之“败笔”吧，但对于为了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革新的韩国人民，是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韩国“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争议中起了感召、控诉和鼓舞、感铭的作用，成为第三世界抗议的、良心的、人道主义文学的重要典型。

如果在认识上和情感上不同意大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对小国的支配，不承认国际资本和国内一小撮“买办阀族”的结托对国内独裁专制政治的支持作用这些经验的历史的事实，就不能认同金芝河作品中所表现的，韩国在“发展不足”的形成过程中，韩国人民的“苦痛和挣扎”的“血与泪的构图”。如果一个人认为服从于“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对的；认为落后国“发展不足”与富国的扩张无关；认为落后国家纳入世界体系经济才有发展，反之则会搞得经济“一塌糊涂”；认为跨国企业不是“必然地与”地主国的“专制势力‘狼狈为奸’”……他会对金芝河的作品和思想产生共鸣，断然是欺罔的。那么，在经济理论上明显昭著地是保守的渔父，何以竟表示尊崇金芝河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的文学呢？这就要从所谓“转向症候群”（conversionist syndrome）加以分析了。

在宗教心理学上，对于信仰转向（一称“改宗”或“叛教”）的心理，做了分析。一个转向者总是从一个激烈的价值，改变为与前一个价值完全相反的一组价值，并且保持原来的激狂，或者比原来更为激狂。这是为了为自己的改宗转向以真实或欺罔的道德与良心的正当性之所必须。因此，改宗转向后显示对前一组教

义的真实或虚构的仇恨与畏惧，并发而为激烈、残酷的攻击行为（例如宣判他此前所信的教义为“异端”而加以迫害）。而这又是对于自己改宗转向的潜在的羞耻心和负罪心的攻击性掩饰。这种掩饰和伪装，还表现在对于公认的道德、人道的关心。在另一方面，有些激烈的转向者，往往成为原信仰的热心的逼迫者，成为原信仰最热情的警探和行刑人。

……（略—编者）

彼得·伯格在论及所谓“革命的神话”（指第三世界反帝、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之所信）和“成长的神话”（指欧美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者之所信）之间的差别时，饶有兴趣地指出了它们之间互相关联和互相结合的特质。则一度狂信过“革命神话”的渔父，在理论贫困的原点上，迅速地向着“成长的神话”狂热地转向，也就丝毫不难于理解了。

渔父引用的西隆尼的话，确实是大幻灭、大反省、大探索的时代中，发人深省而又鼓舞着人们向前跋涉的话语。不错，还在发展、修正和充实的依赖理论，也许不免于还是有它的“缺点”和“破绽”，而有相对的、“一时”的性格。但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弱小民族追求经济、政治真实的独立、反对强国和大国欺凌和支配弱国和小国，要求打破目前世界体系支配下的国际经济结构，重新探索一个平等、自由、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却是永恒的”。而在“这一组价值上”，世界上凡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们，可以努力去“建设”一个新的、大小国家和民族一律平等的“文明”，一个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新方式”。

——一九八四年四月八日～十三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台湾山地少数民族 问题和党外

六月二十四日，我参加了由党外编联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办的“为山地而歌”这个群众性歌谣集会，在炎阳下，聆听了台湾高山少数民族优美朗亮的歌声。集会不算顶成功，但这不顶成功的本身，恰好说明了台湾山地少数民族运动各种条件的不成熟和落后，从而引起人们格外的关切。

今天台湾山地少数民族问题十分严重。这严重的现实和运动的不成熟，两相对照，一方面让人觉得编联会少数民族委员会眼光的准确，一方面也更加认识到委员会的责任艰巨。

山地经济解体

在台湾平地资本主义体制的迅速发展下，山地部落共同体经济快速崩溃。有些山地部落因资本主义工程、矿业开发，被迫迁村。于是近年来大量的山地少数民族离开山林土地，流落于平地。没有技能、教育不足的山地人民，男性沦为低贱重劳动工人，成为随车捆工，建筑土木零工，远洋渔船奴工和其他如矿工和拾荒业等沉重或污秽的劳动者。除了矿工，以煤车件数计酬，与汉人劳动同酬外，绝大部分山地劳动受尽汉人雇主残酷剥削。他们往往劳动时间比别人长，劳动项目比别人多，但酬劳却远比汉人劳

动者低。有些人还必须放弃星期假日，为厂方做整理、清洁等无偿的工作。

解体后的山地社会，投入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和消费制度中，需要现款孔急，因此男女山地儿童成为平地汉人资本和卖淫集团狩猎的对象。每年暑期山地各级学校毕业典礼过后，平地汉人和山地社会中不肖分子勾结，进行斗胆的人口贩卖活动，把一车车童工押卖给工厂，把未成年女童押卖到卖淫窟，用荷尔蒙注射以强使山地女童“成熟”接客。

在解体中的山地社会，滋生着高利贷资本和各种欺诈集团，用大量米酒和谎言诈取山胞口袋仅剩的每一分钱，使整个山地人民陷入愈来愈深的贫困之中。在贫困无告的环境下，山地人民的劳力越是任人剥削，山地女性之身体任人污辱，山地民族的幼苗投入血汗店任人盘剥和摧残，山地人的土地一片片落入高利贷和矿业资本的手中。

山地民族岂是低劣？

有人说山地人民嗜酒如命，天性愚昧，好吃懒做。酿酒原是每一个民族最初的文明之一。在祭礼中尽情饮酒，和他们尽情歌舞一样，是民族重要的文化生活。但认为山地人民自来嗜酒如命，是一种有心无心的污蔑。今天山地人民的嗜酒，不能不看成面对山地社会解体后社会冲击的一个结果，和一个绝望、丧失信心，对一切险恶的生活无知、惶恐、适应不良的人一样，整个山地民族不能不在酒精中麻醉，逃避他们所无从应付的悲运。至于说懒惰，农业共同体的劳动，是未经异化的劳动。面对成为商品的劳动，山地人民无法适应，而沉入无底的悲惨之中。说山地人民在种族上低劣，更是汉族中心种族差别主义的罪恶偏见。

台湾山地人民的贫困化、流民化、娼妓化和奴工化，使山地民族无讳言地成为在台湾的被压迫民族。在种族上和社会阶级上同属于被压迫和剥削地位的山地少数民族人民，不折不扣地是受到在台湾汉族统治的民族。

面对民族灭绝危机，面对民族文化、语言、精神的毁灭，山地知识青年的心境之惨苦，是可以想象的。在台大研究所读书的阿美族青年尤干，去年编印了三十年来第一本山地政论杂志《高山青》，写出极有深度的文章。今年六月，他在高雄举办的山地文化座谈会上散发小册子，呼吁山地民族通过斗争自求解放，发言悲怆而激动。他回到服役中的部队后不久即遭军法单位拘留侦讯。最近的消息虽透露了当局不株连、不扩大，甚至可能不办的方针，我们仍不能不寄予无限的关心。我们呼吁军法当局迅速结束对尤干君的侦讯，恢复其自由，以为改善当前山地政策，团结山地少数民族的一个具体的开始。任何人设身处地为尤干着想，都应该能体谅尤干在绝望与愤激心情下的一切言动。

党外要支援山地民族运动

我们觉得，向来的汉族中心的民族同化政策应该予以彻底批评和检讨。我们认为，给予台湾山地少数民族以一定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自治，是一条根本解决当前山地民族问题的道路。尊重、发展和保卫山地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仪礼、文学和艺术，重建山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依山地人民现实需要和新的山地政策，全面改革山地教育，都是目前当务之急。此外，制定法律，确实保护流落平地的山地人民，不使受到平地资本的残酷剥削，不使受到人口贩卖集团和卖淫集团的压迫和凌辱，已刻不容缓。

在长期压迫和欺凌下，山地人民、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政治觉悟普遍不高。在现实条件下，党外支援山地民族运动，应该注意不鼓动运动的激烈化。鼓励山地知青从整理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着手，教育山地人民。我们也期待出现一个表现杰出的山地歌手、艺术家和诗人、小说家和政论家，透过他们的文艺和学术工作，让广大的汉族深入理解台湾山地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理解山地少数民族人民当前面临的悲苦命运，理解到平地汉人劳动者运动和山地民族运动的密切连带关系，认识到汉人的民主化、自由化运动为什么应该真实地包括山地民族运动。

在台湾朝野上下以近十五年来台湾经济成长自夸自满的时刻，污染、山地问题、劳资争议、道德解体……这些巨额“社会成本”，正顽强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问题的出现，终于要逼使我们不能只是把问题简单化，一味归咎于国民党。党外运动能不能、有没有从知识、感情和思想上感受和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具体本质，并有真正的“切肤之痛”，从而探索解决之道，正是党外反体制运动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九八四年六月《蓬莱岛论坛》杂志四期

“炎黄子孙”靠哪边站！

根据报导，南非政府即将废除“最后一个华人社区”，而“今后炎黄子孙所受待遇将与白人一致”。在这“炎黄子孙所受待遇将与白人一致”说法中，不免有一分欣喜，甚至骄傲之感。

事实上，南非这个国家，是由极少数的白人，对非洲黑种人土著和其他有色人种施行极为野蛮、残暴、黑暗专制统治，恶名昭彰的国家。在二十世纪的今日，地球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地方，像南非那样施行着公然的白人中心的种族差别、歧视和隔离政策。在南非，只有纯粹欧美系白人人才是统治的民族和阶级。在白人以下，是所谓“有色人”，包括白人和土著的混血种，以及一切非黑人的有色人种。最下层，是非洲当地的黑种人。

在这以前，中国人被视为有色人种，被划在中国人地区居住。中国人和其他有色人一样，只准在被划定的地区中生活，他们的工作、活动范围、政治权利、公民权利、文化权利……都与白人不同。而黑人的权利，又远不如有色人。他们被强迫迁到荒脊偏远的地区居住，一迁再迁，而且一切黑人和有色人皆不许到白人区活动、营生、置居。黑人和有色人走在街上，白人可以任意殴辱，财产几乎可以由白人任意侵夺。黑种人和有色人在政治上受尽歧视，他们的人权、财产的权利毫无保障。

对于受压迫的有色人和黑人的反抗，南非政府采取极为野蛮、残酷，毫无法律原则的镇压、逮捕，并加以酷刑拷打。

南非人民反抗白人种族主义法西斯政权的斗争，已经愈演愈烈。南非人民的反抗运动，愈来愈壮大，在许多英勇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以及一些南非人民的企业家、文学家的领导和支持之下，白人种族主义法西斯政权越来越不得全世界的人心。在目前，和南非政府正式有外交关系的，只有三个世界上最保守的国家或地区：美国、以色列和台湾。其他的国家，都因不耻，反对南非野蛮的种族差别主义而纷纷与南非断交。

受到这样的政权授予“在白人区居住的权利”，是一项光荣呢？还是一项耻辱？近来，不少台湾的资本家到南非去做生意、开工厂，利用“政治上”一些特权，对土著劳工进行剥削。南非人民仇恨白人种族主义法西斯政权，连带地也仇恨与南非政府狼狈为奸的外国人。南非内部政情极端不稳，或迟或早，南非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白人殖民政权。到时候，今天“所受待遇与白人一致”的“炎黄子孙”，在南非人民忿怒的火焰中，会遭到什么样的处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中国人应该在今日与南非人民一道受苦，在明日享受南非人民真诚的尊敬与友谊呢？还是在今日贪图名实不符的“与白人一致”的“待遇”，而走上后日南非人民正义之审判的末路？国府当局和在南非“进出”的中国商人、资本家，也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了。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台湾人民有一个伟大的抗日传统。这个传统，今天在台湾的民主运动，千万不可以放弃，也不可遗忘。

在“马关条约”签约之后，台湾人民、我们的父祖，在还来不及弄清楚整个历史事件的真相之前，就毅然而起，对登陆占领的日本帝国陆军，开展了绝望的抵抗。由于这出乎日本意外的抵抗，日本占领军不得不大幅度改变整个登陆占领计划，终于破了当时台湾人民抗日据点的台南府城。嗣后长达六个月的期间，日本投在台湾的兵力，为陆军两个半师团，计约五万名，军夫二万六千名，马匹九千四百余头，约占当时全日本帝国陆军三分之一强的兵力。海军方面，则投入当时战舰松岛以下联合舰队的大半，才大体上压制了台湾人民正面的反抗。嗣后七年间，台湾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转战山野之间，从正面抵抗化为游击抵抗，而被日本占领当局称为“土匪”，直至儿玉时代，才告一个段落。

武力抵抗虽然结束，台湾人民文化的、思想的、政治的抵抗，于日据时代，未曾间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文化协会”、“民众党”、“农民组合”等等，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例子。参与这抵抗的，在社会阶级上有市民知识分子、爱国地主、学生、青年、农民和工人；在民族上有在台湾的汉民族，也有在台湾的、英勇的山地少数民族。漫长的五十年间，整个台湾的灵魂都在惨烈的抵

抗中煅烧着。

日本领台五十年的历史，是充满着苦痛、挫折和屈辱的历史。尽管许多抗日的英烈，不论存殁，有一时的寂寞；尽管有些曾经事敌求荣的人，还厚颜显达于今日，但台湾人民抗日的历史，自有不可夺的尊严。后世子孙的我们，决不可轻易忘怀。

目前散处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民，正和全东亚人民深入、持久地批判日本篡改其侵略战争历史之际，台湾独立运动人士却表现得很冷淡。对台湾政治的一般表现出锐利批判意识的台湾党外阵营，一般地也表现得很冷淡。我以为这是极令人惋惜的。

国民党对于教科书修改事件，始则观望、暧昧，甚至“其情可悯”的奇谭怪论。到最近，眼看抗议运动在国际特别是北美洲的华人中热烈展开，才在党团掌握下，有抗议的表示。因此，在台湾的抗议，乍见之下，有极右翼的色彩。其中若干团体和个人，且是反对党外运动最力而最烈的。党外或者从而对抗议运动采取轻蔑和冷淡的态度吧。

如果不问问题的本质，只问这问题由谁——敌人或朋友——发动，以决定自己对该问题的态度，扮演着当前时代批判和抗议者的角色的党外，就不免太过于幼稚，太没有思想和文化的领导性格了。

如果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史实，是被压迫人民的抗议运动，台湾党外轻易放弃这个 issue，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到咋舌的程度。

人民应该不但欢迎、鼓励国民党对日本的抗议，而且还要督促这抗议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像黄余秀鸾委员一样，进一步指出国民党这次抗议不够彻底之处。人民应该争取在这次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运动中的主体性，把抗议运动发展成全国运动，并与东亚人民的抗议运动联结起来。

这次党外不论老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篡改侵略历史这一事件的冷淡，又一次把党外政治运动的思想和文化品质问题，提到批判思想的焦点上来。这是十分值得关心和支持党外的人们注意的。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篡改其侵略历史，是因为篡改的内容表露出日本当局对东亚各民族赤裸的蔑视和侮辱。一切日军在中国和韩国的暴行，被写成日军为了维持当地“治安”的正当行为。对于台湾，日本只表示因战败而被迫放弃对台湾的支配。这应该是任何有民族尊严的政治反对派所不能容忍的。

全东亚人民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粗暴篡改其侵略史实的斗争，将要越来越壮盛，越来越向纵深处发展。在全亚洲正义人民日益拔高的抗议声中，台湾党外和亚洲各国保守的执政当局比较性的沉默，将无可逃遁地彰显出它们在政治性格上的微妙的同一性。

即使没有党外主流的行动，一切有历史认识与民族尊严的台湾人民，是一定要把这次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运动坚定地推展下去的。这需要比较深刻的历史的、思想的、文化的条件。让人民起来帮助党外进步吧！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华杂志》

抗议日人藤尾正行来台

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原富吉男阁下：贵国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在接受日本《文艺春秋》杂志访问时，不顾人类基本良知，肆无忌惮地为日本对中国、朝鲜的侵略行为狡辩，引起中国和朝鲜人民的震怒。这些乖谬的言论包括：

一、比起世界史中的侵略战争，例如鸦片战争、英国侵略印度战争、美西战争、欧洲侵略非洲战争，以及苏联侵略阿富汗战争，日本发动的战争在道德上、战争规模，并不特别恶质。

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未定。有关日军杀人数目估计，自三十万人至数千人不等。且国际法中，战争杀人并非杀人，强调“南京大屠杀”日军杀人数，无逻辑妥当性。

三、“东京审判”缺乏妥当性。日军进攻南京，遭遇敌人的抵抗，日方尽力排除抵抗，且杀戮命令当为现场指挥官所下令，并非最高指挥官之命令。相形之下，盟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为美国总统之指令，且杀人规模远大于南京事件，何以竟无人指责？东京审判的法官之一印度的巴尔法官就认为，一旦经国际法认定的战争，就不应将国家间的行为归于个人去代表。日本是被迫接受和平条款，被迫接受占领政策，从而被迫接受了东京审判。东京审判是黑暗的审判！

四、如果说日本侵略了别人，则被侵略的一方也有许多问题，

以“日韩合邦”而言，在日本兼并朝鲜时，朝鲜为清国之属地。日清战后，清国战败，对日本在朝鲜进出，有西方三国（俄、德、法）之干涉，尤以俄国对韩覬覦为甚。如果日本不出面，朝鲜当早已沦为俄国所有。而且，“日韩合邦”是伊藤博文和李朝高宗间经过谈判同意。因此，日本领韩，韩国方面也有责任。

五、日本人到靖国神社参拜，并不曾想到神社所祀是不是“战犯”！只知所祀的是为国捐躯的英灵，祈拜他们庇佑日本的和平。日本人对亡者的看法，与中国人不同。日本人对亡者生前的罪恶，一概不予追究。

六、而且所谓日本的“战争责任”，意思并不清楚。若是打败仗的责任，应该由日本人自己加以审判，对外国，赔款割地，皆无不可。国家发动的战争，为什么要找那七个人扣上 A 级战犯之名，在绞架上绞死。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藤尾类此荒谬言论，通篇皆是，因此在藤尾狂妄放言之后，东亚各国舆论哗然，连贵国战争派首相中曾根康弘亦不能不以为失言，而亲向韩国政府及中共当局道歉，并采取免除藤尾职务的具体措施，向世界谢罪。

就是这样一个藤尾，要大摇大摆地到台湾来。

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最为惨酷；而台湾省尤其在日据台五十年中，所遭受物质与精神上的加害，既深且巨。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容忍这样一个狂妄、不知以暴力为耻、不知反省、傲慢狂暴的日本帝国主义代言人，公然来台访问。

我们严正要求藤尾正行，为他羞辱中国和朝鲜人民，羞辱一切二次大战中受害于日本帝国主义各族人民的暴言狂论公开道歉。

我们还要正告藤尾们：

一个不知悔罪、不知记取历史教训的民族，对于自己和他人，

都是极端危险的。我们绝不相信，日本人民会欢迎日本新军国主义再度将日本带向另一次战争的大祸。

我们热情欢迎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日本友人，共同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与友好而奋斗。

但是我们绝不欢迎鼓吹侵略杀人的强盗辩护士！

以下签名的中国公民，对于藤尾的日本侵略无罪论，表示最深切的愤怒，最严厉的抗议！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华杂志》二八一期

戒严体制和戒严体质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前后登场的全球性冷战到达它的高峰。美国当局从挟军经援助迫使国府进行民主改革以建立“统一、自主”的中国这样一个政策，一变而为放弃国府，对中共观望，终于大转变为积极支援退守台湾的国府以对抗苏联及中共的政策。

美国全球性抗共战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表现，是美国扶持日本，促使日本再武装，建设日本战后资本主义；是韩国之一分为二，是台湾海峡之武装封锁，是亚洲太平洋地区与东南亚的美国势力范围的建立以反制中共……

一九四九年，国府颁布全国性戒严。这戒严令一直在台湾岛上执行了三十八年，直到今年七月十五日始正式宣布解除。这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和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升高的冷战对立，和一九五〇年后台湾与中国大陆国土分裂，当然有历史的、政治的密切关联。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是战后世界冷战、中国国土分裂这样一个全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九五一年，美国片面支持日本和各资本主义系同盟国订立和约，结束日本在战后无主权——战败国地位，以利美军驻日的条约化，便利促成日本再武装，促成日本编入美国在远东的抗苏战略。在美国的唆使下，战败国与国府订定的金山和约中，悍然

主张“两个中国”论，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为造成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分离阴谋“法理基础”。一九五〇年中期后，美国大量军经援助从欧洲投入台湾和中南半岛，在英、法帝国主义残存势力不得不撤离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中南半岛时，美国升高在这一地区的干预行动，结成东南亚公约组织，从阿留申群岛、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和泰国、越南，结成太平洋防卫线，包围中国大陆和亚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体系。

在这样的世界冷战背景下，中国在内战和外力干预下，被迫造成国土和民族的分裂。反共、防共的“安全”体系，在国际上有各种协防和安全保障条约，在岛内，则是以戒严令为主轴的国家安全体制。

在戒严令下，入出境有严格管制，海岸有军方管制，山地有各种禁制，非军人得受军法审判，人身自由受到大量限制，集会结社自由、言论、思想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工人的团结权、争议权被取消。

然而，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却恰好在这“世界反共军事基地”的政、经条件中，因大量美国军经援助，奠定了六十年代加工出口经济的“冷战—国家分裂—戒严体制—对世界体系依附”下的快速发展。

这“戒严下的发展”，至少付出了这些代价：

- 资本的附庸化，使独立的民族资本无从发展。台湾资本的非官僚化或买办化无以壮大。
- 民族资本之脆弱，使民族主义，特别在“冷战—国家分裂”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难以发展，而发生主张国家永久分裂的非民族主义或反民族主义的思维。
- “冷战—国家分裂”下发展的台湾资产阶级，因为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受到美国开发总署、国府财经官僚的哺育而长大，没

有革新、独立的个性。

- 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文化（由国际行销管理、商品性大众文化促成）的破坏。人的破坏……
- 国家、民族的长久分离，使同民族间视同异族，互相猜忌、敌视和蔑视，使全民族的智慧、创意、和平与团结长期遭到破坏。
- 为了服从“自由阵营”，即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逻辑，台湾的社会发展、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发展、学术和文化，受到制度性的歪曲。

这些戒严体制下所滋生的戒严体质，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主体性的、盲目的反共，并且从这非主体性的反共热情，延长为反中国，甚至对中国民族和文化的严重歧视；是对美日帝国主义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圈构造非但没有批判，反而亟欲成为这构造的一员；是对国际霸权干涉中国内政，欲使台湾与中国永久分裂的阴谋非但不加挞伐，反而公开呼吁国际霸权侵犯中国，使台湾与中国长期分离；是公开反对中国民族主义，在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提倡具有国际背景的“台湾化”和“台湾主义”……

研究战后冷战历史的学者，把一九四五年到朝鲜战争结束的一九五三年定为“第一次冷战”。一九五三年到六十年代后半，规定为时而冷战、时而谈判的过渡性的、两极间“不确定的对立”时代。六十年代后半到七十年代中期，是两大阵营和解、谈判的“低荡”期。七十年代末，以美国里根总统当选为象征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意识形态的右翼回潮后，被定性为“第二次冷战”。

但是，在这一切世界强权、地缘政治的重组过程中，尤其一九七一年日本与中共建交后废除日本与国府间的和平条约；一九七八年美国与中共建交，自然废除“中美协防条约”后，至少在理论上，台湾已经被世界体系的全球反共冷战大战略所抛弃。但

是，“国府”却依然以第一次冷战的“反共—国土、民族分裂—冷战”安全体系，继续以戒严令支配台湾。“国府”这“时代错置”的冷战的心智与政治的延长，是把冷战体制所衍生的冷战体质固定化。而解严之后，继续以“国安法”维持台湾的一切冷战结构与冷战体质，从而维持反共、国土分裂的基本架构。

在长达三十八年的台湾戒严体制下，观察执政的国民党与新近成立的在野党间之体质，可以发现两者间有惊人的雷同。这客观呈现的“戒严体制”的雷同，说明了两者间之阶级代表性及在同一个“冷战—国家—民族分裂”结构下，社会阶级基础的同一性。

这样的分析，或者可以初步解释某些人和宗派近年来的“自决论”和“独立论”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认真、细致、诚恳、严肃地研究“冷战—国家分裂”结构下战后的台湾历史、文化史、文学史、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及民族史，应该是今后清谈无根地谈论着欧美进口的进步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们要逐渐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吧！

——一九八七年八月《海峡》杂志

台湾劳工必须 组织自己的政党

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这几个特点：

一、美帝国主义为了防卫做为亚太反共军事基地的台湾，稳定台湾的农村、社会 and 政局，一方面以军事协助、军事援助巩固台湾的防卫武力，一方面以巨额援助，完成土地改革和各种经济、财政、公共设施的改革，为台湾的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准备条件，并扶助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在五十年代美援和“国府”财经官僚的指导和协助下，也在六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巨大景气条件下，台湾被编入美、日经济圈，达成附庸发展。

三、土地改革，使台湾三百多年来传统的农业地主阶级，做为一个社会阶级，完全消灭。

四、部分地主阶级，在美国—国府的指导和辅助下，转化为现代产业资本家阶级。

五、肥料换谷、田赋体制和低米价政策，不但使国府成为由无数独立零细小农的台湾农村社会直接的剥夺者，借以维持庞大的军、公粮食供应和支付巨大的党军政开支，并且实际上从低米价长期维持低工资，使台湾战后资本主义迅速达成农业的资本积累，扩大其生产与再生产。

六、农村土地零细化和台湾农业的快速资本主义化之间的矛盾，加上工业和国家机器对农业的剥夺，使无数的农业人口流向城市，和台湾资本主义工业化相应地形成庞大的产业工资劳动者

阶级。

七、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战后国家分裂、世界冷战结构、反共国家安全体制分不开。正是在这“冷战—安全”体制下，美国和国府合作强力压抑工人阶级的团结权、争议权及交涉权，使工会虚构化和弱体化，从而使台湾内部国营企业、民间企业和外资企业得以对台湾工人阶级遂行肆无忌惮的榨取和压迫，扩大其超额剩余利润。

八、因此，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经济奇迹”，是“（国府）国家机器—外来资本—民间企业”三方面的同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吞吐系统下，经由对台湾的自然、生态、劳动者进行肆无忌惮、最不知限制的剥削完成的。

三十多年来，台湾的产业结构，以一九六九年前后为转折点，从农业部门为主导转成工业部门为主导，台湾就业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三为低层劳动者。台湾工人阶级，为台湾的经济繁荣，付出了这些重大代价：

一、长期仅仅足以维持工人自身和其家族最低生活所需要的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

二、普遍的“无成就”、“无前途”、“贫困”、“自卑”、“社会地位卑微”意识，和急速经济成长社会中“成功”、“立业”、“幸福”、“富裕”、“舒适”标准，形成强烈的对比。

三、长期生活在人格不被尊重、人权没有保障、劳动者缺少社会和生活保障、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缺乏工人福利观念和支出的结构下。

四、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知识和文化上无法进步，并任消费社会最低俗文化如色情、赌博、酗酒……长期摧残。

近来，王义雄立法委员积极筹组工党，正是要为在台湾“国家分裂—安全—依赖”体制下的资本主义发展中，人数最多，牺

性最大的台湾工人阶级争取参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

在当前台湾的具体条件下，这个将生的工党，应该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而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中心理念，认真地遵循并发展台湾的议会民主政治。我们希望工党能发挥如下的作用：（一）争取台湾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团结、争议和交涉权；（二）要求长期被剥夺和压抑的权益之最低限度、最合理的部分之复权；（三）要求切实实现当前对工人阶级而言还不完备的“劳基法”所规定的一切工人合法的权益；（四）要求实现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广泛社会底层人民的民主权利；（五）要求停止长期以来在“安全”借口下对工人劳动时间、工资、安全和福利的无理压抑。工党甚至应该欢迎国民党和民进党认真实践它们对工人阶级所做的各项承诺，并愿意为实践它们的承诺而和它们真诚合作。

台湾的工人阶级，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沉默地、超额地为一个“依赖—专制—富裕”的社会做出最大的牺牲。

今天，台湾的工人阶级不能再继续做这种不合理、不被赏识和感谢的牺牲。台湾的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坚强有力地要求他在台湾社会中远比应得的还要少一些的权利和利益。

我们期待台湾一切先进分子参与或支持工党。长期以来，主张维护台湾少数民族的权益、为反对环境破坏、为妇女真正的解放、为核能安全和为世界的非核安全与和平的一切优秀的、先进的人民、知识分子、学生、文化和学术工作者，都应该对新生、将生的台湾劳动者政党的发展与壮大，做出热情的回应。我们这样热切而诚挚的期待。

习以为常的荒谬

从长远的历史看来，朝代政权的更迭，只是中国长久历史中的一个部分。推动和创造历史的，毕竟是民众和民众所构成的社会。而身为民众社会的特殊的思维器官的两岸中国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该从中国长远的历史传承中去思考和创作。

一九七一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大陆。一九七八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与中共建交；同年，美国与“中华民国”间的军事安全协防条约自动失效；稍后，美国国会废除了“台湾海峡决议案”。

世界冷战构造巨变

这一系列的变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军队渡过鸭绿江参加了朝鲜战争。接着，第七舰队封锁台海，并且从阿留申群岛、日本列岛、韩国、中华民国到菲律宾拉开了一条东亚到南亚的围堵中共和苏联的反共防卫战线。台湾成为这条战线上的堡垒。同时，也正是在这个美国在东亚—亚洲太平洋反共、防共军事安全条约网所形成的战后冷战构造中，台湾和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分裂国家的两个部分。

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冷战”结束。世界冷战构造经历复杂的

变化。一九七〇年，美国在越战中失利，撤出了越南，东西关系进入了著名的“低荡”时代。正是在这个战后冷战构造重大的再编组时代，“中华民国”面临了从退出联合国以后重大的外交挫折。一九七九年以后，东西双方再度展开武器、战争和宣传上的对立和恫吓，冷战史家称之为“第二次冷战”时代。但尽管如此，在台湾海峡，因为美国和中共外交关系的展开，至少在理论上，台湾海峡降临了战后初次的和平构造。

从去年开始的台湾大幅度的民主化改革，不论如何，与从七十年代初发展下来的海峡的和平构造不可分。即将由政府公布的探亲上的开放，大陆书刊和文化出版品有条件的解禁，以及可以预见的台湾对大陆商贸投资上的发展，离开海峡的和平，也是无从思议的。

海峡两岸对比悬殊

但是长达三十七年的冷战构造，使冷战政治和文化长期固定化。从六十年代展开的台湾“依赖性”巨大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在“美国—日本”经济圈中从事产业的生产与再生产。今后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圈的关系，使充满活力的台湾经济面临向大陆市场发展的各种再调整的问题。

如果资本主义强大的利润动机使海峡和平时代的台湾经济有足够的自我调整和再发展的动力，在文化和政治上，相形之下，就显得僵硬和落后了。

三十七年来，一切的传播和教育，塑造了“大陆即敌国或异国”的印象。大陆上的人，曾几何时，成了异国之人。有些年轻人甚至作家，公开宣称他们对大陆中国没有感情。在政府的文件、谈话之中，经常可以看到“我国一千八百万人民”的提法，没有

人引以为怪。

缺乏中国整体意念

在文化上，三十七年来，文化工作者早已丧失了全中国的焦点。文学家和艺术家，很少或者没有人从长远的中国未来的历史，即统一之后的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全景，去思考自己作品的意义。没有人这样想过：当中国在未来的历史上统一，在一切当前的政治是非成为过去的一日，自己的作品，是否无愧于整个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传统。几年前，作家东年和评论家詹宏志提过这个问题，却招来严重的误解和攻讦。

在学术上，尤其是社会科学，没有或者很少人从国家分裂的台湾和中国现代史和冷战构造的战后史的视野，去反省和发展台湾的社会发展知识；对于国家分断下台湾社会和政治的现实与社会思想、知识和学术研究间的断裂，长期没有加以弥补；对于民众理解社会和历史的真实，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

统一论调沦于虚构

在政治上，政府的国土统一论，由于缺乏具体的方针政策，不免沦于虚构。而反体制民主运动的一方，近来则不去隐讳大陆和台湾分断状态的固定化逻辑中，一贯缺少国土和民族统一的思维。一般而言，台湾知识界和文化界，比较起来，就缺少大陆当代知识分子、文学家和思想家，为全中国、全民族追索解答和出路的反省、抱负和胸襟。这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

分断只是历史现象

从长远的历史看来，朝代政权的更迭，只是中国长久历史中的一个部分。推动和创造历史的，毕竟是民众和民众所构成的社会吧。而身为民众社会的特殊的思维器官的两岸中国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该从中国长远的历史传承中去思考和创作的。这样去看的时候，我总不免对于台湾文化和知识界对于把只是四十年不到的国家和民族的分断视为永久，视为当然的情况，不能不感到文学意义上的荒谬（absurdity）。

不断变化和前进的历史，对于台湾的知识人、文学家、艺术家、各个领域的学研工作者和政治家，对这我们习以为常的荒谬提出我们无从回避的质问。

——一九八七年九月九日《自立晚报》

一个罪孽深重的帝国

这一个月来，美国现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下届总统候选人瓦尔特·蒙代尔在电视上进行两次电视辩论。这两次辩论的全部录影，曾在台湾电视台上播放过，各电视台并请来一些“专家”加以热心地讲评。报纸上也是成篇累牍地刊登辩论要旨和关于辩论的评论。

美国总统即台湾的总统

三十年来，在台湾的传播工具中，一直是美国传播资讯的天下。对于战后历届美国总统，由于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上，台湾的老百姓简直耳熟能详，如果说美国历届总统，差不多也是台湾的总统，并不为过。尤其是自从肯尼迪和尼克松辩论美国要不要防守金门、马祖之后，台湾的传播媒体，更加明白地在台湾为亲台湾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搞竞选。尼克松当选了，台湾的新闻报导简直像是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那么高兴，却不料尼克松竟然成为推动美国与中共建交的美国总统。在卡特取代尼克松之后，台湾舆论郁郁寡欢。及至里根上台，台湾舆论简直是雀跃三丈，喜不自禁了。因此，在里、蒙辩论时，舆论和一些“专家学者”，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强说里根虽然失常，但不至影响选举

胜利云云。到第二次辩论之后，台湾的评论简直为里根之“略胜”，而大为高兴。

在美国，可也有另一批打从台湾去的人，捧着另一个主儿蒙代尔，往他身上下注。为的是据说“自由派”的蒙代尔特别“关心台湾的一千八百万人民”。于是乎，那些人以美国公民的资格热心地捐出几千几万美金，做蒙代尔的“送财童子”，希望选出蒙代尔，让国民党好看……

然而，用向往、羡慕的心情守在电视机旁看里、蒙争辩的小老百姓，却在那辩论中发现不少叫人瞠目结舌的事：

美国竟也有穷人

第一，据蒙代尔说，美国的富人愈富，穷人更穷。而且，穷人、失业人口都在增加之中。这些穷人，是所谓下等的白人、黑人、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吧。这种说法，和三十年来在台湾听说美国人莫不富甲天下，贫富平均，社会福利如何了得……大相违悖，这于是才理解到贫苦之人，在普天之下，其实是无往而不贫，而且也无往而不遭遇着“贫者愈贫”的铁一般的命运。而“贫者愈贫”，又似乎相应于“富者愈富”的过程而愈陷愈深。

黑手党国家

第二，蒙代尔揭发里根政府的中央情报局（CIA）在内战正殷的萨尔瓦多依照一本由中情局印发的指导小册，深深地介入别人的内战。据蒙代尔说，那小册中记载：美国特工人员不但指使别人暗杀萨尔瓦多的“党外”领袖，也指使别人去暗杀亲美的萨尔瓦多政府要人，然后把谋杀罪案嫁祸给萨尔瓦多“党外”（据称是

“共产党”),制造舆论和口实,再以铁鞋一举扑灭萨尔瓦多的党外。里根总统不否认“小册子”的存在,只说他“不知情”,并且要惩罚与制作“小册子”有关的中情局人员。

如果“小册子”不是蒙代尔为了赢取选举捏造出来的东西,那么,美国政府和黑手党有什么差别?举世界超强之力,从事颠覆、谋杀和干涉外国内政,这样邪恶、恐怖的国家,为什么一直在人们的脑中是一个“民主、自由、开放、友善、没有领土野心、慷慨、基督教”的国家呢?此无他,这些天使般的形象,是由好莱坞、美国电视节目、美新处、留美归国教授和滞美不归又常常在国内写文章的“海外学人”刻意和不经意所塑造出来的。举例说吧,评论第二次里、蒙辩论的、我们电视银幕上的“专家学者”,就没有一个对那恐怖地狱的“小册子”发表过半句评论,硬是听而不闻,硬是胡扯里根“在谈笑间淡化了对年龄问题的质问”,而赞佩不已。

人权自由? 爱说笑!

第三,蒙代尔抨击里根无视人权标准,到处支持独裁政府,并问里根是不是一定要继续支持菲律宾的面临民众忿怒声讨的马科斯政府?

里根总统的回答是,在菲律宾,美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亲美的买办附庸政治家来取代马科斯。总不能让菲律宾的党外(里根说是“共产党”)建立一个反美政权来取代马科斯,使太平洋地区多出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至于惨死马科斯杀手枪下的菲律宾“党外”头头阿基诺,里根没有一句惋惜、哀悼和抗议的话。

里根总统的说法,有两个要点:首先,做美国的“盟邦”最重要的条件,是亲美反共。亲美,为的使美国资本、经济政治、文

化可以自由支配该国。反共，为的是要附庸当局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在“二体制对抗”的世界中的一个佣兵和仆从。除此以外，“民主”、“自由”、“人权”云云，全是骗人的幌子。美国以“维护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做幌子，在美国势力所到之处，不惜以血腥手段残酷镇压各附庸地内人民的民族·民主主义的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支持独裁军事政权。一个买办政权，不论怎样不符合美国式的“民主、人权、自由”，只要有效地统治，哪怕是用多么残酷的独裁维持统治，美国就坚定支持，甚至到全民起而抗议（如今之菲律宾），也要支持“老朋友”到底。这其实是战后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的、罪恶政策，由白宫、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美国的跨国企业……合伙执行，岂独里根政府为然乎？

里、蒙辩论的教育意义

对于里、蒙电视辩论，此间官方舆论是一片颂扬之声，一些吃了半辈子美国牛油面包的“专家”、“学人”、“自由主义者”，也跟着拍掌叫好，即连某些党外言论，也表示赞扬，自然在赞扬之余，总不忘借题骂几声国民党。在朝、在学院中受重用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协同体制的亲美言论，虽令人不齿，倒也可以理解。如果在野的党外知识分子也弹同一个美国调子，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者就要抚掌而笑了。

里、蒙辩论比赛所揭露的帝国美国在国际政治外交政策中邪恶、犯罪本质，只是战后三十年来美国在这个地球上所干的滔天罪行中的极小一部分。里、蒙的辩论在相当程度上，生动而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在以支配和掠夺为基本性质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摆脱“东西二霸”对立架构，走中国人自己独立自主的道路，才

是一条寻求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大路。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夏潮论坛》杂志

美国统治下的台湾

——天下没有白喝的美国奶

美利坚：超级的帝国

作为一个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二次大战中和二次大战后，有急速的扩张和发展。她远远地压倒了欧洲，成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雄长。美国一国的总消费量，等于全世界其他各国总消费量的总和。美国一国所使用的铜、铁、重要稀有金属、石油和能源，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或十数个民族和国家所使用的总和，她的陆海空军基地遍布全世界，和四十多个国家订立军事同盟条约，只有另一个霸权苏联可以匹敌。她的投资遍布全世界，不论在西欧，在第三世界，星条旗总会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上的基地和企业大楼上，迎见不没的太阳。她的大学吸引来自全球的知识分子，世界上不论富国贫国，都有受过美国大学、研究所、研究机构训练的知识分子，位居政、经、学、商和军界要津。美国制的武器、弹药、制服、军事编制，做为美国对各该国的军事控制和影响力的明显象征，遍布全球。美国的政治贷款、经济压力、国际特工，控制着好几个民族和国家。

以美国为母国的国际性企业，垄断和支配着全世界的资源、市场、政治和外交、军事。美国的“工业、军事”复合体对于世界上反对美国经济、外交利益的国家，施行残酷的镇压。美国的国

务院、五角大楼、跨国企业、新闻处、中央情报局、军事顾问团和学术基金会，所执行的环球策略，基本上与旧式殖民主义政策性格相同，但范围极大、内容极精巧，即所谓的新式殖民主义。美国的新闻社、电影、电视、全球性企业公告和遍布各国的美国新闻处，对全世界进行思想和文化的美国化工作，制造对美国 and 世界体系的优美形象，相对地消灭、破坏其他民族悠久、优美、深厚的传统文化。代替了过去的“白人的负担”论、“文明的使命”论等，今日美国以“大国的责任”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向全世界进行不知餍足的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之扩张。以无数原料国的贫穷、文盲、疾病、政治不安和内战为价，美国支配全球各地的资源，以维持美国的“富强”；美国也以颠覆、暗杀、镇压为手段，支持许多第三世界的军事独裁政权，以维护美国的外交、经济的利益。美国不惜支持它的傀儡政权，对各国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之血腥的镇压，来保障美国在各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深远、广泛地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人民、民族和国家。在有些国家中，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政策，简直和自己的近现代史分不开。而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战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军方为了接运来台接收的国军和遣反在台日本侨民和军队，美国海军舰队进驻高雄港。当时，由于台湾当局对美国海军的骄横作风有所不满，不予合作，美国竟派遣数千名陆战队非法登陆台湾沿岸要地，完成遣送日本侨民的任务。

为了让台湾做为美国空军不可或缺的中继站，最后，美国迅速

修复了台北、新竹、台南等地的军用机场，并在林口和松山建立航管雷达站，进驻美国第十三航空队。早在国共战争在大陆结束之前，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了。

美军在战后的对台任务，是在台湾建设美国在台湾的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当时驻台“陆军顾问团”在台湾当局的排拒下解散，另行组成美陆军“驻台办公室”。美国的台北领事馆成立后，这些军人转隶这领事馆的武官处，继续活动。在同一时期，美国驻台军事和情报单位，并完成对台湾地理、水文、人文、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调查。

在国民党于大陆节节失利的情况下，美国原先支持“国府”剿灭中共的政策开始转变。一九四九年，“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正式宣告放弃国民政府，并且企图以遗弃国府为代价，向中共示好，以利继续维持美国在“革命”后中国的利益。一九五〇年，杜鲁门总统宣布承认中国对台湾的宗主权；美国不图占有台湾或在台湾建立基地，享有特权；美国不图在台另建亲美独立政权，并不再为国府提供军援，最后宣称美国不介入中国内战。至此，美国全面、彻底地遗弃了国府，暗地里准备向中共伸出“友谊”之手。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把东西冷战带向一个高峰。美国以缩小朝鲜战争的战争面为言，宣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政策，一方面制止国府反攻大陆，一方面以美国海空军力进驻台湾，吓阻中共对台进攻。十月，中共挥军渡鸭绿江与美军对阵，美国开始改变对国府的遗弃政策，恢复了有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援助，以增强国府三军和培植亲美政权，使台湾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组成部分。

从此以后，大量的美国军队进驻台澎和金马地区，美国的军事、经济、文化、政治和情报势力（如“西方公司”和民航公司

“CAT”)，随着“中美协防条约”、美国军援和经援在台湾的介入，大量、广泛地渗入台湾的生活。在越战之前，国府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在八二三炮战时达到了高潮。而这期间美国军事、情报单位直接介入国共双方在外岛上的几次炮战和海战，已是公开的事实。越战则造成美国与国府军事合作的另一个高潮。这时清泉冈大型军机场的建设和启用，使台湾成为美国越战的后勤基地。驻台美军激增，而对台军援也由赠与性的改为贷款和军品、军火厂销售的性质。

七十年代开始，美国为了它新的全球战略，开始转变对中国的政策。随着美国与中共关系的调整，停止对国府外交承认，美国撤废了协防条约和台海决议案，并撤走了驻军和军援单位，但以“与台湾关系法”维持美国与台湾间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利益。

国府的美国经验：求全与委屈

一九五〇年，在大陆战争全面溃败，美国宣布对“国府”遗弃政策下，国府面临着旦夕间破灭的危机，却在朝鲜战争中，全面扭转了危机。美国因中共的悍然参与韩战，对“国府”政策也从遗弃主义逐步转变为支持和美国化改造的政策。

于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今天，亲美、扬美、依美成为台湾三十年来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因此，台湾三十年间，政治上、意识上反美和对美国的批评，基本上是一个禁忌，极容易和“破坏中美友谊”、“共匪阴谋”扯上关系。三十年来，美国在台湾被塑造成自由、民主的最高榜样；美国是“自由世界”伟大的领袖，是对抗邪恶的共产主义的世界盟主；美国是富裕、有正义感、慷慨、友好的国家；美国是一切进步学术、艺术、文学

的来源；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科学的总本山（这一点是有部分真实性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富裕、民主、自由甚至公平社会的最高榜样……

在政治上，对美国全球目标的依存，成为台湾政治的主要方针。跟随、配合美国的全球外交政策，成为台湾政治的主要性格。在军事上，台湾明显地是美国全球战略布署中的一个基地。一九五〇年以后，在美国大量军援下，“国府”军队得以存在、改造。美式军事装备、制度、管理，深深地改变了“国府”军队的面貌和品质，并且配合美国军方，执行美国在朝鲜战争、越战和其他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政策，尽了一定的任务。在经济上，美国的经援稳定了五十年代台湾濒于破产的经济，完成了土地改革。美国的援助和投资，深深地影响了台湾的经济，使美国商品、资本和技术，深入地在台湾各处扩散，造成台湾在市场、资本、技术上对美国愈来愈深的依赖。

在文化上，美国在战后根本改造了台湾教育结构，透过教科书、派遣研究人员、到美留学，完成了台湾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美国化改造。美国新闻处、好莱坞电影、美国电视节目、美国新闻社的消息，基本上左右着台湾文化，并且持续、强力地塑造着崇拜美国的意识。在六十年代，美国自由主义被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奉为经典，美国的流行音乐、美国的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支配台湾的文艺界达十数十年之久。大量的留学生从六十年代起涌向美国，并滞留不归。甚至在台湾的英语教育，也是纯粹的美国腔调，台湾的宣传机构，甚至在一九七〇年后美国展开新的“遗弃”主义时，也一再悲忿地宣称台湾战略地位的美国利益的重要，宣称自己是美国再也难于找到的最忠实的盟友。

但是，在这一切前台的“中美传统友谊”的背后，却隐藏着

“国府”和美国之间暗潮起伏的斗争。从一九四九年前美国军方顾问在台的专横的情报、军事行为与当时台湾当局的矛盾开始，一九五〇年重新开始的美国对“国府”军援，夹带着“国府”军队的美国化及美国支配的目的，而和国府当局展开顽固的斗争，传说中的美国支持下的反政府军事政变，经“国府”逮捕孙立人将军而失败；在“国府”对日本和约中，压迫国府接受“台湾地位未定”的条款；以“中美协防条约”制止“国府”反攻大陆，却同时从一九五四年起以美国 CIA 情报结构展开对中国大陆的间谍和军事行动。除此以外，从战后美国在东京的麦帅总部对当时台湾分离主义运动者廖文毅的支持开始，美政府当局一直和台湾分离运动保持着秘密和公开的联系。此外，美国政府、情报当局对台湾三十年来各阶段反“国府”的政治运动及其中的活动人士有各种联系，其实早已是一项公开的秘密了。三十年来，“国府”就是这样地和美国过着明里握手拥抱，暗里做着艰苦的攻击斗争的生活。回想起来，台湾终究没有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沦为美国更为彻底的新殖民地，“国府”独到的政治手腕，有它的“政绩”。

然而，不论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国府”图存的政治方略间，在暗地，在幕后，如何在三十年来的台湾进行着长久的阴谋与反阴谋的斗争，“国府”长期、公开的亲美、从美政策，在台湾的朝野间，形成了一股深远的、复杂的崇美、媚美、扬美的氛围，并且在民族的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对美国、西方的崇拜、和对自己的自卑所构成的复杂情“结”。而不论国府当局和批评“国府”体制的党外，尽管互相批评和攻讦，却同时对美国表现出同质的对美争宠、谄媚和依存的态度。这无宁是一件复杂而富于讽刺的现象。

近代史中的美国对台湾政策

台湾的制式历史教育中，美国被描写成对中国没有领土、政治和经济野心的国家。在十九世纪凶恶的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据说美国是唯一主张中国的“门户开放”，制止列强在中国划地独占的国家。在台湾的反“国府”体制的民主活动中，也把美国看成真心同情和有力支持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大国，在想象和实际上，引为奥援。

“国府”和党外对于美国对台湾接触史的本质有意、无意的无知和歪曲，其实是两者在思想、感情上形成深重的“美国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对台湾抱着领土、资源、政治、军事的野心、与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殊无二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在美国水师提督倍里叩关日本的同时，即曾奉命调查台湾资源，主张美国占领台湾，并且主张台湾在当时国际贸易与交通上，对美国有实质上的利益。同时，当时美国驻远东外交人员哈利斯，极力收集有关台湾资料，向美国外交当局力陈美国占领台湾之利。美国商人黎基敦力陈台湾对美国之利益，主张美国派兵占据台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年末，美国曾一度以应惩杀害美国水手商人之台湾山胞为理由，派兵登陆鹅銮鼻。这些与当时西、法、英各国在东亚的帝国主义行径殊无不同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因为美国对中国事务介入嫌晚，加以美国国内黑奴问题而形成分裂，引发内战而未有具体的结果，但美国对岛屿台湾的帝国主义政策，早在十九世纪业已形成，事实俱在。

一八七五年，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外交接触。当时列强早已纷纷在中国划地独占，美国成了一个迟到的侵夺者。为了阻止列

强在华继续瓜分，以便为美国找到插手中国事务的空隙，美国倡言中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其实只是为了能使美国在中国与列强争分一杯羹罢了。

美国和台湾分离主义运动

接着，从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以来，美国和中国，从而和台湾发生了空前密切的接触。但作为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连带地对台湾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延长，使得先是在中国后是在台湾建立和培养一个亲美，听命于美国的政权，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要核心部分。

一九五〇年，美国对“国府”“恢复”军经援助的同时，主动、连带地执行着台湾政权的亲美化改造政策。以军援、美援为手段，美国企图支配“国府”三军系统、企图培植亲美将领颠覆国民党政府。在此同时，美国一方面以军经支援巩固“国府”在台湾的统治，一方面早在五十年代初，即由驻东京盟军总部卵翼廖文毅在日本的分离运动。一方面对“国府”恢复军援，促成“国府”与日本和约的签字；订立“中美协防条约”，通过台湾海峡决议案，一方面又公开提倡“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但为了为美国军事力量进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制造法的根据，一方面也是用来制造各个阶段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而正是在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阴影下，滋长了三十年来各派别的台湾分离主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三十年来各种主要的台湾分离主义理论，主要都先由美国或日本政客和“学者”率先提倡。一九五五年，有名的赖旭和倡言协助一个“民主台湾”之发展；同年，美国曾要求李宗仁出面推翻国府，建立独立的台湾；一九六〇年，美国副国务卿倡言——“独立的中台国”之利益；六十年代，美国人柯

尔抛出了“台湾人在人种上并非中国人”之论。另外，以赖旭和为首的美国“现代化”派学者，在肯定日本战后“现代化”成功之余，连带肯定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从而谓台湾已因五十年殖民而受日本“同化”，而主张台湾与中国的分离之论；蒙代尔有推翻“国府”而使台湾独立，可使中共攻台失去理由，从而可维持台湾海峡之和平论；有国共和谈将危害美国在台湾之利益，而力主台湾独立之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最近两三年间流行于北美的“台湾民族论”，实也无非以上诸论的一个延长。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大改变，在转移对“国府”之外交承认于北京前后，私底下美国抛出了更多支持台湾成为一“独立政治单元”以永久分离于中国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论。虽然一直到两年前，美国才公开地抛弃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台湾为中国之一部分，并且公开放弃了对台湾独立的支持政策，但在实际上支持台湾自中国永久分离以确保美国之台湾利益的政客、议员、商人和学者，仍大有人在。而海外，尤其是北美的台湾分离运动，其右派如“台湾独立联盟”、“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者，固然公然采取对美附庸的立场，以促成如“台湾前途决议”案之帝国主义法案以骄人，即连自称马克思派的“左”翼分离主义，对美国的对台湾之帝国主义历史和政策，也睁眼、闭眼，装聋做哑。

台湾民主运动和美国

如果“国府”是一个亲美的政权，那么，何以作为“国府”的对立侧面的台湾中产者民主运动，也抱着着绝不亚于“国府”的亲美、媚美、美国庸属的立场？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举出两个因素：

第一，在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两手主义”。美国一方面为了压制各地反美民族主义，不惜以维护政治上不稳定的政权，以交换美国在各该国之政治、外交、军事及经济利益。但在同时，美国也深知这种政府不能长期稳定，为了避免被当地反美势力颠覆，美国总是同时和当地亲美的反体制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络。美国一方面以军经援助支持菲律宾马科斯政权压制其反马科斯民主运动。但一旦看见马科斯政权已无法强予维持，美国就会转而支持像阿基诺那种基本上亲美的反马科斯势力，就是一个实例。因此，是台湾中产者民主运动过去的原来地主——中产阶级的属性，及今日台湾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规定其亲美性格，促成美国对他们的支持；而这美国支持的自身，又对其亲美、美国附庸性格，促成扩大再生产。

第二，是三十年来台湾在文化、宣传和思想上掩盖美国对台帝国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矛盾，却同时大力提倡亲美、崇美的思想、情感和教育，使台湾知识界、文化界失去对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帝国主义因素的批判力。对国府体制的不满情绪，竟而不但没有造成连带地对国府表面所亲倚的美国之批判，反而成为国府争夺美国支持的竞赛。

在五十年代的台湾民主运动中，殷海光不论在民主理论、反对风格上，皆有今人尚不能超越的成就。但即使嫉恶如殷海光，尚且不能没有依据力（美国）以达成台湾的民主运动目标之想。美国对当时著名的民主反对派领袖高玉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早非秘密。六十年代末，美国中央情报局公然私运当时分离主义民主运动学者彭明敏出台湾，在美国进行分离主义运动。同时期，美国使馆介入一个地下分离主义运动案件。

七十年代，从“台湾政论”系开始的台湾中产阶级民主运动，基本上并没有改变对美国依恃的、亲美、崇美的性格。美国对康

宁祥的支持与重视，表现在美国与国府断交时将消息同时通知国府当局和康氏一事，表露无遗。康系三议员于一九八一年访美言行，及返台后发表的声明，表现出台湾中产阶级民主运动在“美国支持台湾合于美国利益”等言论上，和其所反对的国府有共同的理论和语言。在近年党外内部“批康”运动中，自称在运动中更为纯粹和彻底的反康一系，在批康的内容中，也丝毫不曾触及康系的亲美方针与立场。一九八二年，以“美丽岛”系家属为中心的党外立委访美，在美遍谘支持台湾的美国“自由派”参议员如罗伯特·肯尼迪、索拉兹等，回台以后，在各自的政论杂志上，大篇幅刊登自己和美国政要、学人的合照，甚至以此合照在一九八二年底的大选中作为竞选的号召。同年，美国参议员索拉兹访台，为了争取参加他的演讲餐会，党外内部竟产生了争执和矛盾。几年来，党外和“国府”一样，为美国是否坚定支持台湾而心烦意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流泪。他们同为美国与中共间各种公报、文件中的措辞，各搞各的拆字游戏，各自寻找“美国人爱我不爱你”的证据，凄凄惶惶，不可终日。

“美国结”——台湾结的根本大结

同在一个美国依附的社会基础上，“国府”和党外同时培养并且发展了亲美、崇美，对美国基本上没有批判意识的相同体质，并且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美国结”。而这美国结的具体情感，不论在“国府”或它的反对体台湾党外，都表现为下述六种心态：

一、各自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忠实的伙伴。都认为自己最忠实地信仰和服膺美国反共、民主、自由的原则；都认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完全符合美国当前战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

二、都对美国怀抱着哀怨却热烈的情感。都关心上海公报上“认知”和“承认”的差别；都希望美国为台湾“一千八百万居民”的“幸福”与“自由”介入台湾事务；在美国与中共眉来眼去之时，都表现出哀怨的沉默、一厢情愿地抱着美国“不会遗弃我”的热情，而不敢发出怒声。

三、都私下坚信“美国最爱我”。有人凭着在台湾实际有效的统治和三十年来各种具体合作的历史得意；有人凭着三十年来美国“暗”中伸出来的手，各自相信美国“对我最好”，死心塌地，再大的考验，都忠贞不渝。

四、都对美国的富裕、“民主”和“自由”、强大的国力、高大漂亮的形象，有发自内心最真实的崇拜。美国国会、舆论对自己的一褒一贬，都足以使自己陶醉或悲伤。与美国相接，尊崇、敬服之心油然而生；与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相接，则欣然有骄美之色，不知不觉间，在美国人面前自动地流露出谄笑之色而不自觉。

五、都对贫穷的中国大陆有鄙夷之情。有人对“匪区”的贫穷落后、专制暴政，长期做鄙夷的宣传；有人对“中国民族”传统中落后、“残暴”、“黑暗”，怀有深刻的蔑视和敌意，甚至发展成一种反华的情感。这种对中国大陆人民、历史和文化的鄙视，和五十年代冷战时代由美国推动的反共论调，有极为密切的关联，而不知不觉间，在这种宣传下，中国大陆竟成了他国；大陆人民竟成了他族。

六、对美国文化、政治、国力的崇拜，造成了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崇拜，并且同时在对立面，都发展出对东亚邻近穷国、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的轻蔑意识。因此，不论国府或党外，对第三世界都不约而同地忽视、鄙视。在他们的眼中，能说欧美语、日语的人种才是高等的民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以色列和南非，在亚

洲，除了日本，他们只看得起会搞独裁、也会搞钱的新加坡……总之，崇拜欧美、轻视第三世界，成为同时并存的二重结构。

在这样的“美国结”的世界中，人们在偌大一个地球上只看见一个巨大、光辉的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在这共和国旁边的台湾。除此而外，对整个欧洲、东亚、中东、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甚至中国大陆皆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此，虽然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这个思想体系中，很早地表现出挣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远见，今日的国府，甚至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对广受第三世界诟病的美国、以色列和南非的“亲善”态度。而党外的视野，在这个问题上，也决不比国府当局高明。把落后国家的疆界胡乱重划，任意促成许多不必要的“独立”国家，以利对它的控制和掠夺，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杰作。非洲大陆上无数“独立”的国家，彼此互相杀伐，正是非洲大地上从前的殖民母国一手炮制的。不认识在这“世界体系”下台湾近代史的展开，一味提倡“台湾民族”以使台湾“独立建国”的海外台湾分离运动，其实便是在“美国结”的狭小而荒谬的世界中所产生的错误认识。

事实上，认识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朴正熙、全斗焕专制体制下，勇敢地为韩国民主和自由崛起的韩国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从战后以来，一直把美国看成韩国民主、自由和人权运动的有力后盾。特别是在卡特总统的“人权外交”时代，韩国的“党外”和青年学生，对美国有坚定的信赖。一直到美国里根政府无情地允许全斗焕以美援武器、弹药和情报器材对光洲的学生蜂起进行毫不掩饰的血腥镇压，韩国的反对派和学生，才学会了一课沉痛的功课。

在一个绵密的、由新旧殖民主义所交织成功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东亚和整个第三世界的近现代史，至少应该使这一事实无从隐蔽，即为了争取自己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政治的民主

和自由，只有一个可靠的依靠，那就是自己的同胞。任何想援引外国——特别是强国来达成自己追求独立、解放、民主和自由的目标的企望，几乎毫无例外地会遭受到悲惨的失败的命运。时至今日，在整个辽阔的第三世界中，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一样，不论在朝在野，那样地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缺少批判的认识，而对于美国的一切，还怀抱着迹近幼稚的幻想。而这一切，从台湾的反体制运动的角度来检讨，只是愈益显现出这样的事实：台湾的中产阶级党外运动，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在历史、思想和文化上是如何的贫困和幼稚。如何在中国、东亚和第三世界的近现代史的结构再思考台湾前去的道路。努力从“美国结”和亲崇美国、轻视第三世界这个二重结构中挣脱出来，在中国历史的现代中，在中国自己的民主、自由、独立的运动中，争取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台湾中产阶级党外运动今后阶段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吧。

——一九八四年六月《夏潮论坛》

世界体系下的 “台湾自决论”

——冷战体制下衍生的台湾党外性格

从香港即将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说起

前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和英国当局签署了香港前途协议，正式宣布将结束英帝国主义对香港的殖民地统治，香港重归中国的版图。中国人民，不论在国共对峙的局面下，各别政治立场如何，都不能不承认英国在港殖民体制的结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台湾舆论中，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反应，却不能不说是离奇的。

国民党对香港问题反应的退缩、笨拙、形式主义和官样文章，港台两地，都有人批评。而且揆诸国府近十五年来在外交政策上的僵化和缺乏创意的一贯作风，国府对港声明之不切实际，早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

但是，平时一贯批评国府政策的党外言论，在香港问题上，却表现出和国民党一样恐共的保守主义本质，大肆抨击中共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阴狠”的“统战”伎俩。对于美国，有人认为老美出卖台湾是旦夕间事；有人则又搬出“与台湾关系法”和几位据说很关切台湾前途和台湾人民的美国自由派参议员，力言美国朋友绝对不会出卖台湾，中共的“统战”阴谋必不能得逞。然

而，言论方式虽有些微的不同，最后总不外是希望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决定，要求及早实现“台湾自决”。

还有部分党外杂志斥责和教训香港人在过去八十年间，不曾“努力学习管理自己”，奠定“港人治港”的基础，只贪图享受殖民地时代的“自由”，不愿意负起“民主的重担”，以致坐失了国共内战时期香港独立的良机。言下之意，香港沦共在即，真是咎由自取！

部分党外杂志，在评论“协约”时，清晰、激动地用时空倒错的战后冷战时代的修辞，表现了绝不亚于国民党的仇共心态。头脑清醒的人，在读了这评论之后，不禁会想：到底这些评论家和他们所反对的国民党之间，究竟差别在哪里？或者，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存在着真正具有意义的差别？

这需要从战后的亚洲说起。

二体制对立的世界结构

从日本、韩国一直到菲律宾、泰国……都存在着紧跟美国外交政策的当地执政党，和这些执政党的反对派，即各国的“党外”。这个形势的形成，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局势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来，最大的形势特点，是一场战争打出了从未曾有过的“社会主义阵营”来。从十六世纪开始发展的世界资本体制，头一次和一个对立体制的阵营相对峙。在大战中，国力发展到高峰的美国，这时便义不容辞地出来，一方面以它雄厚无比的资金和技术去复兴在战后濒于崩溃的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外，拉紧了战线和防线。韩战的爆发，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围堵战线，便迅速地建立起来了。

美国的“围堵”线，是以在世界上星罗棋布的美军基地，以各国在美国指导下对所谓“赤色”活动分子的逮捕、监禁、枪杀，以对学生、工人运动的残暴镇压，以星条旗的遍插，以趾高气扬的美国军人、顾问、商人、专家在各“自由阵营”的“进出”，以若干美国忠实“盟邦”的独裁政治为代价去“划”出来的。这一切布署的结果，便是（以亚洲为例）日本的保守政府、韩国、越南、菲律宾、泰国，以至全世界美国基地所在国的亲美、买办政权的屹立。

然而，战后美国新帝国主义政策，美国在“援助”计划的美名下对各依赖国家剥削、渗透和支配，在“自由盟邦”的美名下所掩盖的各国政治独裁、人权蹂躏，以及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对各国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国民运动的镇压，对各国学运和工运的迫害，普遍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

第三世界各地“党外”的民族与民主运动

这些反抗，又分为温和与激烈两种。温和的一派，主张以比较“真实”的民主和自由、比较“真实”的民族尊严为条件，继续保持和美国的关系。另外，激进一派的反对者，主张推翻亲美买办政权，从根本上断绝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制间的任何关联。

因此，不论温和或者激进，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阵营”中的半独立或新殖民地国家，都有反对各当地亲美政府的“党外”。而这“党外”，又莫不以不同的程度要求从美国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反对各该国政府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蹂躏民主，扼杀人权。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了这些“美国忠实的盟友”国家中不同“党外”的共同纲领。这便是为什么日本的左翼各党批评日本执政党对美从

属政策，反对美日安保条约；韩国的学生和“党外”坚决反对韩国和日本恢复邦交，批评日美资本的支配和阻碍韩国民族的统一；泰国的学生和“党外”反对田中访泰，批判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支配的全部原因。至于菲律宾，七十年代的反美国民运动是菲律宾人民摸索民族解放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到了今天，菲律宾人民的民主、民族运动，有了巨大发展，对美国支配下的马科斯体制，形成坚定的威胁。

韩国的分裂，便是二次大战后“二体制对立”下最典型的样板。打过一场由外国势力直接介入的、剧烈的内战，韩国成为一个美国“忠实的”、“护卫自由”的“盟邦”。从李承晚到朴正熙，从朴正熙到全斗焕，韩国政府一直是美日两国所宣称与其安全休戚与共的国家。为了扶助日本成为世界（资本）经济体系在东方的重镇，美国使韩国成为日本工业的一个加工船坞，使日本吸取韩国超廉工资而肥大，并逐步安排日本独占资本对韩国的支配。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当局在美国默许和日本支持下，以反共、国家安全为口实，演出一幕又一幕镇压学生、工运、教会、及一切韩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的残酷场面。而韩国的“经济繁荣”，便在这个反共，对美日依赖，军事独裁；对学生、工人、市民的民族与民主运动惨烈镇压的代价上，建立了韩国以新生资产阶级为中心的“依赖性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为欧美中心的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

然而曾几何时，以跨国企业赚取了全世界的美国，现在为缓和国内问题而采取保护政策，包括韩国在内的“四小龙”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庞大的国债，为韩国带来沉重的压力，而韩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党外与学生，正伺机崛起！

但是，在韩国以美日资本主义为靠山的独裁体制下锻炼出来的韩国“党外”，他们要求什么？抗争什么？想着什么呢？

以民族分裂为代价的冷战体制 与“自主的和平统一”

韩国“党外”的重要一翼“全国学生联盟”，在一篇题为“没有统一，何来繁荣”的声明中这样说：

冷战体制最大的牺牲——我们民族的分裂和阻断，实在是全民族无数悲剧的根源，也是我们民族一切压迫、贫困和对外依赖的症结。

由于军事对峙所造成的紧张而形成的南北隔绝，使我们民族的物质资源用来为同胞相残做准备，使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用来助长同族间相互的不信任和仇恨，甚至互相抵销、歪扭。没有祖国的统一，我们要怎么思考民族真正的繁荣与发展？

（随着美国与中共的和解、两极冷战体制的解冻）代美国而再登场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主与和平统一的最大威胁。

在列强对峙的东北亚情势中，同族相争是我们民族自灭的道路，因此缓和南北（韩）间的紧张，是我们民族一致的愿望。

（最近政府同意透过南北红十字会进行会谈，只不过是虚伪的姿态）政府全力封锁舆论对此一重大问题的参与，继续固执错误的、不合时的“反共法”和“国家保安法”，对统一言论横加干涉。因为南北朝鲜紧张一旦缓和，政府就失去镇压在国内激发的民主及民权运动的借口。在焦躁之余，政府正尽量利用一切机会，不断鼓吹忧患、危机意识……从南北紧张的缓和到自主、和平统一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确保自主性，亦即要摒除因外来势力的介入，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被推入同族相残的深坑之危险中。

在此，不能已于言者，是今日韩国对日依赖的深刻化问题。如所周知，日本经济的对外扩张性，已经在促成日本新军国主义化

的过程，使东北亚的情势更为紧张。目前，日本早已经完成了对韩经济侵略的整个作业，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日本正在对韩国咄咄进逼。

今天，韩国经济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再生产结构中的一个组织部分。韩国政治受到绝不希望朝鲜半岛统一的日本国家利益的左右。当以出兵韩国为前提而训练的“自卫队”，竟以“保卫韩国”为它的职志时，我们民族统一的道路，又会在哪里呢？

韩国对日本依赖的进展，促进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再生，以这样的日本为奥援而引其登堂入室，足以刺激对日本怀抱着传统恐惧感的北韓和中共，使南北朝鲜再次陷入紧张激化、军事对峙和同族相残的命运中。

为了完成我们民族当前的任务，我们应尽最大力量组织和形成一个民族主体势力。应该集合学者、专家、“党外”政治家形成一个形式上的结党机构。这应该是除了一小撮在外国荫底下独占、腐败、特权的反民族势力之外的一切国民自动自发的参与，才能成功。

我们要将这民族主体势力加以组织化，集中全民族自由表露的意志，以更积极的态度，为民族统一而努力。我们更断然粉碎一切为了一党一派的私利，援引外国势力，助长我们民族内部分裂的一切阴谋。（原题：“高举民主、民族、统一的大旗；一九七一年后半期学生运动的诸课题”。一九七一年九月发表。）

韩国进步的学生认识到韩国民族的分裂，是二次大战后“二体制对立”、超强对峙下冷战结构的产物。当权的韩国当局，为了一党一派之私，以“国家安全”和“反共”为借口，压制要求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的国民运动，援引绝不愿见韩国统一的外国势力，阻碍国家统一。因此，韩国的学生呼吁：建立韩国的民族自主力量，为韩国的和平与统一而奋斗。像这样的见识，在台湾的

党外和学生中，绝无仅有。

在美国政策的长期宣传与影响下，台湾朝野有关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论调，是支持、要求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是要求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自决”，以便如美国所愿的使台湾成为“二体制对立”中世界经济体系版图的边境前哨。并援引资本主义体系各国对台湾的“地位未定论”来支持台湾与大陆分裂的合法性；且千方百计、苦口婆心要国民党放弃其自称代表全中国的立场。

台湾党外性格的根源

一九四九年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从世界体系的观点看，是对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重大打击与挫败。在惊惶之余，美国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借口，使美国第七舰队对中国的干涉合理化。台湾和大陆的距离，成了所谓“自由与奴役”、“自由与共产”之间的鸿沟。三十多年后，台湾党外认真地从国民党、从世界体系承接了这个冷战时代的思考方法，却丢掉了国民党不能不当做看板而保留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主张。相形之下韩国“党外”，对“冷战体制”与“祖国分裂”以及与“同族相敌”之间的关系，对买办政权援引外国势力而阻碍民族统一，对韩国被组织到日本新殖民主义经济圈的依赖地位，皆有台湾党外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深刻认识。

台湾党外对政治、经济与国际事务的思考方式，准确反映了台湾近二十多年来加工出口经济的精神面貌。作为美日帝国主义资本一个加工出口部门的台湾经济，是世界先进中心国依照自己的形象，在各落后的边陲国中塑造的。在世界经济体系下，落后国的资本主义，是因外来新殖民主义独占各地市场、原料与劳力的需要，以贸易、投资设厂、援助、贷款……等方式，外加而非

自然自发地形成的，这些不因民族自己的需要和目标而歪扭地发生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与民族需要和目标脱节，却充分因应外国资本需要和目标的中产阶级。因此之故，台湾党外运动的性格，亦充分反映资本主义为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利益，阻碍和反对国家统一、民族解放的基本要求。

反省与再生

台湾党外的“自决论”和“海外台湾人”的分离论，表面上看来，都是以“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独立自主为奋斗的目标。事实上，从二次战后的“二体制对立”的总形势看来，“自决”、“独立”后的台湾人民，依然会是“冷战体制”下美日新殖民主义体系下的奴隶。放眼世界，在受到美日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发展中国家，莫不存在着反民族主义，援引外势压迫国内民族、民主主义运动的买办当局，和与这个当局相对抗的，反美日帝国主义，高举着民族、民主主义旗帜，团结了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党外”力量所组成的结构。

台湾党外和国民党之间的体质雷同、性格重叠，在富有民族解放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台湾，显然是一个歪曲的历史下的产物，在性格上无法完全肩负起革新与进步的任务。反帝、反资、民族和平与民族团结的革新潮流，将有待新一代充分代表台湾劳动大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新党外运动的诞生与成长来推动。

今后，台湾的党外在思维上如何自求进步，在思想上突破由资本主义、世界体制所设下的框架与符咒，以及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批判与反省，怕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课题了。

共同的探索

——为台湾前途诸问题敬复永台先生

在回答永台先生的来信之前，我想有必要将上一期登在贵刊中拙文的主要论旨概括一下。这是因为永台先生显然不曾十分理解拙文的原意，比较急着提出他自己的有关“台湾人民有权决定台湾的命运”这样一个想法的缘故。

原文要点的提挈

拙文《世界体系下的“台湾自决论”》的论旨，概括地说来，是这样的：

（一）第二次大战之后，世界根本地形成一个由“自由阵营”（以美国为首的，从十五世纪发展过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共产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群）相互对峙的所谓“二体制对立”结构。

（二）为了防杜“贫穷、奴役、扩张、独裁”的共产阵营，美国对苏联与中国大陆展开围堵的全球性战略。随着围堵线的建立，许多国家的国土分裂了（南北朝鲜、台湾与大陆、南北越、东西德），许多国家以大举镇压各国工运、学运、社会主义者和民族解放分子的代价，建立了亲美、受美国支配的独裁、卖办政府。

（三）这些在“自由战线”上的美国扈从国家内部，为了反抗

压制，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自然地形成了反对专制体制的民主运动和反对新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对于这民主、民族运动，美国帝国主义和它的扈从政权，当然采取镇压的政策。而反独裁专制，反对帝国主义，便在广泛的“自由阵营”中，成为“落后”国家的反体制“党外”运动的共同纲领。

（四）以韩国党外为例，韩国的反体制“党外”学生、青年和民众，反对由外力干涉造成民的民族分裂与国土分割，而力主民族和解与国土统一，对于造成民族分裂、国土分割的当权体制和日美帝国主义，提出痛烈的批判。

（五）相形之下，台湾党外部分人士却极力主张使大陆和台湾的分裂凝固化，极力主张美国应干涉中国事务，要求美国售卖武器给国民党政府，确保国土分裂和同族相敌，对帝国主义干涉毫无批判的态度。

（六）台湾部分党外的此一性格，与台湾资本主义的附庸、非自主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七）要求党外在思想上自求进步，突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框架，在批判和反省中求运动之新生与前进。

奴隶的解放，应该从制度的解放着手

永台先生提出第一个质问是：“党外是因为反对做任何人的奴隶，才主张台湾人民应该有自主权，以决定台湾的命运。他们怎么又会想当美国人或日本人的奴隶呢？陈先生的说法，显然不合逻辑，且过于情绪化。”

永台先生的质问，是从拙文的结论部分而来。那结论说：“……从二次大战后的‘二体制对立’的总形势看来，‘自决’、‘独立’后的台湾人民，依然是‘冷战体制’下美日新殖民主义体系下的

奴隶。”

即使是古代的奴隶，也是奴隶制度下的现实。个别奴隶的存在，和一个奴隶的制度有关。在“二体制对立”的结构（体制）下，韩国、台湾、南越、泰国、菲律宾，以及更多中南美洲之亲美政权，几乎没有例外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和思想上受到美国或日本或其他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配、掠夺、压迫和榨取，李承晚的南韩是这样，代之而起的朴正熙也是这样，今天以政变取代朴正熙的全斗焕也是这样。但正在争斗中的金泳三、金大中如果取代全斗焕会不会不同呢？不同的机会相当大，理由是，今天韩国的党外，对日美帝国主义有批判的传统。而我们担心，一旦台湾经“自决”而独立成为“台湾民主共和国”之后，届时当权之今日党外，由于一贯不但没有对日美新殖民主义的批判认识，而且一贯以有美日关系和奥援骄人，能不成为美日新殖民主义的“奴隶”的可能性，恐怕就太小了。

国民党在台四十年中，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高度依赖美日，但国民党的高度政治警觉性，毕竟没有接受美国支配力量深入军中、政府（例如由美方支发军队粮饷，由美方担任高层军政官僚等等），换成党外，有没有这警觉，是值得担心的。

永台先生，我们对党外“不愿做任何人之奴隶”的信念之诚，从不怀疑。我们想说，如果无法突破“美国友人”、“民主、自由阵营的盟主美国”、“自由阵营”、“共产极权阵营”这一类五十年代反共冷战的词语去思考，如果对“二体制对立”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没有基础的理解；如果对穷国对强国之经济、政治上的依赖结构不曾理解，如果战后世界新殖民体制不打破，台湾的党外就不能免于当现代新殖民主义的奴隶。全斗焕如此，马科斯如此。战后新殖民主义的体制不打倒，大国对小国的奴隶遭遇，就无从避免。

民族自决乃针对殖民统治而提出

永台先生说，民主和民族自决，是“时代的潮流”。像台湾前途这样的重大问题，应经由“公民投票”来决定。

其实“民族自决”虽是三十年代战后的口号，如果把它解释为民族不论大小，皆有其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之权，那么，这主张在存在着民族压迫的新殖民主义时代，就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永台先生一定知道，“民族自决”，是针对于殖民统治而言。目前台湾的“自决”，却对国民党统治而提出。则国民党理应是殖民统治者了。既为殖民统治者，那么国民党这个“殖民集团”的“母国”又在哪里呢？中共政权下的中国大陆吗？这恐怕有点“不合逻辑”也说不定。永台先生如果认为台湾人是“台湾人”，国民党或中共全是“中国人”。“中国人”在台湾统治“台湾人”，不论国共如何争吵，都是异民族对台湾民族的“殖民统治”。那么，这就大有商榷的余地了！

所谓“殖民主义”，所谓“殖民统治”，是一个社会科学上的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上的界定。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中共对台湾主权的主张，是不是社会科学上的殖民主义，是学术上的问题，此处就不必赘言了。而且以目前既有的社会科学标准来衡量，永台先生的中国对台湾施行殖民统治论，一定站不住脚。

殖民统治至少有一个简单的界定标准，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在民族上，是相异的民族，同时，在阶级关系上，又绝对性地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日据时代，一切统治者皆在民族上为日本人，而在社会阶级上，凡统治阶级皆日本人，被统治阶级皆台湾人。以这尺度来衡量，很多在台湾的社会阶级上沦为工人、妓

女、贫民……的人中，有不少是外省人（永台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有很多官僚、大资本家、大买办阶级、工厂主、企业管理人是本省人（或永台先生所称的“台湾人”）。但在菲律宾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的关系，日据时代日本人和“台湾人”的关系，古代罗马人和犹太人的关系，却绝不是这样的。

“公民投票”的种种

其实，永台先生应该对美国提出台湾的民族自决才对。因为，真正支配着台湾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是美国。当然，永台先生是绝不认为美国在台湾有殖民统治的。不，永台先生毋宁希望美国协助“台湾人民”赶走“中国人”吧！

说到“公民投票”，先不说台湾事实上是分裂国家，而不是殖民统治，根本谈不上“公民投票”，即使是“公民投票”也存在着相当复杂的问题：

第一，“台湾人民”有一千八百万，总要有阶级构成之分析吧！不同阶级的“台湾人民”，有绝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自决”建国后的台湾，黑手的台湾人民依旧是黑手，王永庆级的“台湾人民”依旧或者更加是政治、经济上之支配者。在永台先生举行公民投票之前，有谁能保证让广大的台湾劳动人民清楚知道投票后的命运呢？

第二，以目前情况来看，“台湾人民”在选举中大搞派系，大搞金牛银弹，大搞贿选买票，这当然与国民党“中国人”有意败坏选风有关，但如果台湾人民的民族自决意识够高，台湾人民对“中国异族”的统治真有刻骨之仇，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以这情况来办“公民投票”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永台先生或者可以想一想，恐怕也未必如永台先生所想的那个结果。

第三，说起来也许有点像笑话，如果“公民投票”的结果，是“台湾人民”连台湾民族也不想当，大多数票决使台湾脱离中国，而要求成为日本的一个郡，或美国的另一个新州，永台先生会对这投票结果采什么态度呢？

第四，在目前美国支配下，美国会听从这公民投票的决定，让一个独立的台湾破坏了美国扩张主义的全球战略吗？

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分际

接着，永台先生耐心地为我们重述了一种在海外常听到的另一种台湾史观。永台先生说台湾人的祖先是不愿受满清异族的统治，渡海来台。其实，汉人反满，是种族主义，远远不是永台先生所想的，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它因现代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兴起）。臣僚在皇帝面前即使不以奴才自称，其实也是一种奴才的存在吧。“台湾人的祖先”之来台湾，与其说是“不愿做满清的奴隶”，不如说是为艰苦的生活所迫，他们和到南洋去讨生活的华侨一样，逃离穷困的原乡，出外谋生，恐怕才是真正的动机。

至于说“反抗满清的统治”，永台先生该知道，中国农民在生计无着弃地逃亡、啸聚山林、反叛地主士大夫官僚阶级的封建政权，其实是史不绝书的，在台湾的中国农民，自然也不例外。至于这些台湾早期移民，有没有永台先生想象中的“台湾人意识”，恐怕要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才比较可靠吧。

阶级与民族问题的连带关系

永台先生说清廷割台，“台湾人民起而反对，并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永台先生似乎应该知道，这个由士绅官僚组成的“台湾

民主国”，其实是独立其表，遥奉大清其实的，不但没有任何今日的分离主义内容，借用一句分离主义者惯常使用的话，简直就是“大汉沙文主义”！永台先生说到日军登陆台湾后，从武装抗日到政治、文化抗日的英雄历史，我们完全同意。问题在于：在武装抗日中，台湾的民众，是以汉人的意识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抗呢，还是以“台湾人”——尤其是意识地和汉族切断纽带的“台湾人”而与日本人对抗？这也要采实事求是的研究吧。

在日政时代，“台湾人”是与“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相对而称；“本岛人”也是与殖民者日本的“内地人”而不是汉人相对而称。台湾毕竟是割让，和全国沦亡、失去祖国的许多殖民地不同。永台先生不应忘却，对许多“台湾人的祖先”，祖国中国不曾灭亡，在民族的认同上，“台湾人的祖先”有比其他亡国的殖民地人民更强的精神支柱。

如果搞一点实事求是，“台湾人”这个特定的分离主义概念，一定要为它找历史的话，勉强地说只有三十年。这个概念的事实绝不在过去的“台湾四百年”的历史中，也不在现在。这概念与事实上可能的机会，是在以后的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

至于说日本时代的台湾地主、资产阶级“和日本政府密切合作，他们的后代，现在则和国民政府沆瀣一气……”在最概括的意义上，也许是对的。但永台先生大概也知道日本时代第一号走狗辜显荣，是农村流亡无产阶级出身，但他的自身和后代，却颇符合永台先生所作的定性和总结。辜显荣的“后代”，不但有“国府”的高官显要，也不必讳言出过一位主张“台湾民族”、在东京轰轰烈烈地搞过独立运动的辜宽敏。七十年代，美国更易了对华政策，这辜宽敏“委员长”毅然投降“国府”，“背弃”了“台湾人民”而和“中国人”沆瀣一气，保有荣华富贵。另一个大地主林献堂，不但终生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他的子孙，也并没有同

国民党“沆瀣一气”。

党外与国民党体质的雷同之处

至于我批评某些党外和国民党体质雷同，与上述的论旨无关。说部分党外和国民党体质雷同，原因在：

（一）意识形态上，同为反共、资本主义、“议会政治”。

（二）在阶级代表性上，它们都代表台湾的乡镇到城市的中产阶级、买办阶级。

（三）在对待美日帝国主义上，两者都是无批判的、依附的、互相争宠的。

（四）对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虽有程度的差异，两者基本上是淡漠的。

永台先生说党外为台湾民主化而努力奋斗，这是对的。毫无疑问，三十年来，领导台湾的民主主义斗争贡献最大、牺牲最巨的是台湾中产阶级党外运动，这是任谁都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但也要注意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有无数的人为台湾的民主化而被杀、被囚，把聚光灯集中在美丽岛前后的党外，当然就有失实之处。

党外为促进民主，反对腐化，为台湾大多数人民的福祉而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包括极右的法西斯专制和极左的共产党独裁”的主观真诚性，我们绝无丝毫怀疑。问题在于对于巨大的帝国主义支配毫无认识、批判和防范力量的目前党外，一旦掌权之后，如何不会变成另一亲美的买办独裁政权，压制将来的台湾民族、民主运动，就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实在没有很大把握。

……（略——编者）

开放与自主的两难

要不要接受和利用外来资本的是与非，在于一个国家在接受外来资本的整个政策的自主性。为了达成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定目的，决定接纳外资，自愿忍受某种程度的剥削与痛苦，不能一概说是“新殖民主义的奴隶”。但是，许许多多的“经援”、“投资”、“经济合作”，往往是为他国而不是自己的需要，并且附带着十分苛酷的利息、政治、军事的条件。永台先生想一想，一旦台湾在独立建国，对美日资本假“经援”、“经济合作”而来的压力，究竟有多少讨价还价、抵抗胁迫、抓紧自主性的可能呢？届时，这个“台湾人政府”的成绩是不是就一定比现在的国民党好呢？

到底是谁侵略了谁

永台先生最大一个认识上的错误，莫过于把弱小国家的农产品、原料和轻工业产品向先进国输出，和先进资本主义大国以昂贵工业品向弱小国的输出，或先进国以其剩余农产品挟政治威胁而向落后国强迫倾销，等量齐观，这错误的根源在于：

第一，工业产品的价格昂贵，而且往往具有垄断性，买入的弱小国家没有议价的能力。我们以超昂贵价格买下了核能电厂之后，却要以多少的“轻工业产品、纺织品”去交换呢？

第二，美国对台湾有实质上的主从关系。万一索拉兹参议员要向永台先生推销台湾不必要、甚至足以打击台湾工农业的美国产品，永台先生届时大概很难说个“不”字。

第三，美国对台湾，在实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上，有实际的支配力量，永台先生绝对不会以为有一天，台湾也

会对美国产生同样的支配力量。

“在经济上是美国在侵略台湾，还是台湾在侵略美国？”（永台先生语），问题是问得勇壮，但恐怕没人会说台湾侵略了美国。当然，永台先生的意思，是说强国弱国的经济关系是平等的，无所谓谁侵略了谁，这其实又是一个极为粗浅的国际经济学问题，与其在这儿絮絮不休的谈论，不如请永台先生想一想，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今天，韩国、泰国、菲律宾、中南美洲和非洲的民众、学生、青年和他们的党外，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斗争，无日无之、从不间断的这个具体事实来作个判断。

共同在知识上求进步

永台先生来信中的一套想法，其实和一般主张台湾“自决”、“自救”的理论差不多，在我们看来，一直脱不出以下这些限制：

（1）对中国的憎恶、轻蔑这些五十年代冷战时西方的蔑华、反华情绪。

（2）对美日帝国主义不但不批判，而且是温存、依附的感情。

（3）在意识形态上，是保守的、反共的、中产阶级的“自由经济”和“议会民主”主义。

即使为了“台湾民族论”的发展，为了独立建国运动在理论上的需要，永台先生也应该要更用心地阅读，更深入地思考，不能老是用些过分简单的认识，去对应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让我们彼此在不同的方向上共同探索台湾未来的可能吧！

台湾的殖民地体质

——也谈台湾的过去与未来

永台先生主张“‘台湾人’和‘山东人’、‘四川人’、‘广东人’一样，只是指某一省的人，大可不必和‘中国人’对立起来使用”，并且认为我在这一点上“似乎和许多外省人一样，太敏感了些”。这很出乎我的意外。不论还存在着多少疑点，我们以为应该相信永台先生的这个立场：“台湾人和四川人、山东人、广东人一样，全是中国人。”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我和永台先生是完全一致的。顺便说一下，我和永台先生一样，也是一个道地的台湾省人。如果我对永台先生上一封信的内容有“敏感”的反应，其实是因为我在不少党外朋友中，时常听到类似“他们中国人如何如何……”、“不要讲北京话（很细心刻意地不称北京话为‘国语’），咱来讲咱台湾话……”的说法的一个结果。

以下，便是站在“本省、外省人，全是中国人”的这样一个立场来讨论永台先生的第二篇文章。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

在早期台湾移民中，当然有“反清复明”的郑成功部队。这种汉人对女真族的抵抗，在满清入关以后，在中国大陆，也进行得很激烈，例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反满汉人的被屠杀。

但是，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结合的统一的国家的今日，如何看待满一汉关系，就应该超越辛亥革命的史观去理解了。把满族看成异民族而在历史上长期凝固化的国民党史观，对中华民族重要成员的满族人民，是十分不公平的。平心而论，有清一代，出过不少有魄力、有文治、有武功的帝王和贤臣、名将、大儒。中国今日之广大的版图，也大部分是有清一代开辟下来的。清末的衰亡，是一个前近代的中国和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接触下悲惨的结局。从帝国主义扩张的世界史来看，这悲惨的结局，几乎是宿命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全世界人民反抗新、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生动地说明了这个斗争一直尚未结束的这个事实。不能只因为孙中山的反满革命，把满族永久地视为罪恶与羞耻，正如我们绝不应以台汉人的“吴凤”、“平番”史观，永久地把台湾山地少数民族看成野蛮、落后的民族一样。

中国农民在封建土地关系上，几千年来不断重复着破产农民啸聚山林，反抗地主士大夫政权的农民革命，是历史学和社会学上的现实。因此，今天我们似乎不必和分离论者一样，一再从“反清复明”的历史，去证明早期台湾移民的“独特”性质。其实，分离论者往往忽略了“反清复明”、“辛亥革命”史观中，隐含着浓厚的他们口头上反对的“汉族沙文主义”意识。至于汉满对抗，其实是一种前近代的种族对抗。近代意义的“民族战争”，对于亚洲人民而言，应该在东西方帝国主义的侵袭下的反帝的、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才登场。在社会学上，这反帝的民族主义斗争，又有一定的阶级意义。这方面的议论很多，在“外省本省全是中国人”的共同认识下，也就不必在此费辞了。

台湾的殖民地性格

台、澎的确是明清时代大陆王朝的“国内殖民地”。但这国内殖民地的形成，与西方商业资本主义、重商主义时代对海外原料、奇货的掠夺的殖民主义，有性质上的不同。前者，基本上是在母国原乡生活劳顿无以营生，老百姓自然地向外拓殖求生而形成，后者则是贵族、豪商在强有力的王朝的支援下，做为国策而向外扩张，目的在掠夺殖民地的原料、黄金、兽皮、白银、钻石、甚至是土著的奴隶劳动。因此，清朝可以把在南洋被洋人、土著集体屠杀的华人视为“化外之民”、“自外于天朝”，被人屠杀，几乎“咎由自取”。但同一类事件，日本人或英国人、西班牙人就成了兴兵攻略和侵占别人领土的好借口了。

至于不“就地取材”设官吏，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有它严整的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在整个古老的大陆王朝历史中，所有官吏莫不是经过考试和其他途径从士大夫阶级中吸取和建立官僚结构，然后由中央派赴各地任官，何独对台湾为然？历史上有名的官吏，在籍地原乡做官的极少，何况对台湾的统治？这种情况，和重商主义时代西方殖民主义发展起来的，自然的殖民地文官体制看虽形似，却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分离者最喜欢引用的美国革命，其实是新大陆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与母国英国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对当时在北美洲已有数十万人的印第安人土著民族，却是一个悲惨的民族灭绝的开始呢。从白人中心的史观看美洲的开发，恐怕不应是我们中国人、亚洲人应有的态度。

其实，“国内殖民地”的新的概念，远远不止于明清对台湾的拓殖。对境内少数民族的抑压和掠夺，例如北美洲的黑人区，历

来就是白人美国的“境内殖民地”，在阶级关系上，黑人先是南方棉花田的奴隶农民，后是美洲低贱重劳动的产业工人。美国境内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贫困华人（不包括脱产逃亡的现代“台侨”），以及向美国移民流动的贫困欧洲人，在政治经济学上，都是帝国美国境内的殖民地，用以取代美国向非洲、亚洲、中南美洲和欧洲进行军事扩张，设官任吏的殖民。在我们台湾，山地少数民族便是我们不折不扣的“境内殖民地”呢！

我们的问题点是：台湾的政治，是不是一些分离派的人所说中国人（外省人）对台湾人的“殖民统治”。国民党集团对台湾的统治，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内战后，被一次革命否定了的旧阶级、集团，以武力的强制，在台湾凝固了统治地位。但也不要忽略四十年的社会发展，已使国民党集团在社会学的规律下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使国民党取得了台湾社会中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围绕在台湾的国家资本主义周围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性。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无论如何，是和日本统治台湾当时的结构，难以相提并论的。

日人治台的真相

怎样看待日本治台期间的各种“治绩”，我和永台先生之间，怕是存在着一个根本的歧异。

我们台湾人，特别是长辈，有少数一些人喜欢说日本人廉洁、公正、“不贪污腐化”、“行政效率高”。这种说法，最近也有年轻一代的台湾人在提，视“日本精神”为正直、廉明、勇敢的代名词。

这种说法，当然，基本上是和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接收集团来台后令人震惊的贪污、腐化……而来。事实上，这又和社会发展

阶段有关。在资本主义成熟，完全发展的社会，资本主义经营“合理化”的原则产生了各种经营论，也产生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管理官僚制度，而在政治上，也出现了现代化的文官官僚制度，以合理的待遇，优良的规章制度，吸取社会奇异分子，构成庞大而有效的文官制度，而成为社会“现代”化与否的标志。法律的完备、文官制度的形成，其实都需要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扩张主义的强大经济。日人治台，其实是以“近代化”的、殖民地文官制的日本，君临了前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台湾，使它纳入近代的，资本主义—完全殖民地的秩序。而“国府”的台湾收复，却使经过现代殖民、资本主义改造后的台湾，直接面对前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使这中国的后进性，赤裸裸地成为台湾人的巨大的“休克”。

殖民地官僚的性格

至于说“日本官吏清廉，没有贪污腐化现象，行政效率高，社会治安良好，很少发生盗窃或抢劫案件”，也是片面的理解。日本有现代化文官体制，在殖民地的官僚有加级俸给，生活上优裕，和落后国家尚未建立文官制度的社会比较起来，比较“清廉”，是不争的事实。但也绝非一概，一向如此，例如经济统制时代日本官吏、警察对台湾人的掠夺无度，是经过日治时代的人所共知之事，在日据时代台湾文学中，表现得历历如绘。即使战后，也有“洛克希德污职事件”，倒了一个田中内阁。此外，日本财团对自民党的“政治献金”背后的丑闻，是日本政界的重大“贪污腐败”结构。像日本、美国这种超级强国，统治集团不但收国内企业利益团体的金钱，甚至也收它的附庸国的贿赂。这次马科斯倒台，揭露出马科斯对里根及美国政府官吏、参众议员的贿赂，就是一例。

日本的自民党政团有没有接受台湾的游说献金或政治献金？谁也不知道。说明“治安良好”“很少盗窃抢劫案件”，这是殖民者镇压殖民地所必要之铁腕，以利在台湾的经济掠夺。但日本之黑社会有个奇特的传统，今天“山口组”在日本、亚洲贩卖人口、杀人、贩毒、进口娼妓，是一种国际化了的犯罪企业，而且与日本政要，也有十分深密的关系，为日本人民所无可奈何。永台先生和一些人那么赞扬“日本精神”的“正直”、“清廉”、“公正”……恐怕是一个可悲的误解。

殖民统治的一般规律

落后的亚洲、非洲、中南美洲所存在的贫困、文盲、疾病、贪污、腐败、饥饿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但也要理解到帝国主义，尤其是新殖民主义对这些“后进”现状的促成和加重甚至凝固化的因素。这是近来“依赖理论”中“矮化的发展”和其他殖民地研究中的主要论题。在另一个方面，说殖民者尚未来以前，我们原是如何落后、如何野蛮，恐怕就含有大量的白人中心或殖民者中心的史观，应该搞一点自己的研究，对殖民地的原史和历史，应该做一点实事求是的研究才好。

不久以前，有一位台湾青年大力赞美过后藤新平“长官”的治台功绩。永台先生也以相当的篇幅对日本治台期间的教育、公共设施的建设、工业建设，甚至日本军队的“纪律严明”给予极高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至今认为日本对台统治，对台湾日后的经济、工业和社会的发展，有奠基之功。

由于这些论点，戴国辉博士有一篇论文《晚清期台湾的社会经济——并试论如何科学地认识日人治台史》（收入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台湾史研究》一书，戴国辉著，一九八五年出版）是截

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篇文章，永台先生若有兴趣，可以购读。戴先生的研究，颇不受分离派人士的欢迎，但见恶言攻讦者多，却迄今没有在知识上的反论。以下，我概括戴博士的意见，提供永台先生参考。

日本人在台的“治绩”

每一个殖民者，都会在殖民地铺设铁路、开公路、改善治安、建设医学和公共卫生体系、设立学校。对于这些事实，殖民地台湾的人民，应该怎么看待呢？感恩戴德，热烈歌颂呢，还是应该做一点研究和分析？

铺设铁路、开公路，是为了殖民者能深入殖民地“开发”，掠夺殖民地资源，并且把母国的商品无远弗届地扩散到殖民地各角落；开发交通，有重大的支配、统治、抑压叛乱等军事价值。改善治安，是镇压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副产品。日本人在台湾发展的医学，和英国人在印度、非洲一样，是从“热带医学”展开的。热带医学，主要是为了研究热带殖民地的疾病，便于保护从温寒带来的殖民官吏、军队、商人、传教士的健康。殖民统治，主要的是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劳力。改善殖民地公共卫生，促进医学，是为了必先有健康的劳动力，才有剥夺劳动力的可能。说教育吧，劳力的知识品质提高，才能增进劳力的生产性。

从整个殖民制度来看，这制度对人的肉体 and 精神的压迫、凌辱；对物质的掠夺，对社会的摧残，才是主要的。殖民地人民在心灵和肉体所受的惊人的残害、歪扭、凌虐、杀戮，把丰富的土地、森林、矿产、农作物贪婪地掠夺，使传统文化崩溃，传统的信仰遭到否定，使原有社会分崩解体，社会原有的伦理纽带断绝！社会发展停滞，在依赖结构中国债日重，买办、大地主、豪商、将

校和新殖民者互相依存勾结，鱼肉、盘剥整个民族的生命……今天美国新殖民地菲律宾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因此，殖民制度，对于一个有民族自尊心、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是一种绝对的恶。殖民者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例如日本的矢内原忠雄）尚且以殖民制度为不可宽贷之恶，身为殖民地的儿子，我们岂能和殖民者、强者、白人中心主义的学者一样，主张殖民制度对殖民地的发展有贡献。

其次，永台先生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为台湾今天的工业发展“培养工业人材，建立台湾的工业基础”，日本的体制经济学家也这样说。但事实是怎样呢？台湾如果没有经过日本统治，自己会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呢？这就要做一点殖民地“前史”的研究了。

日据前的台湾实况

据戴国辉教授的研究，郑成功领台的期间，就在台湾兴学设校，并导入大陆的制盐、制糖、水利工程和稻米的栽培技术，使台湾出现空前的繁荣。郑氏为了巩固政权的财政基础，用国家力量，利用兵船，突破清朝的封锁线，与日本、南洋，并透过南洋与西欧展开活跃的通商贸易，另一方面则在台湾拓展农地水田的面积。

清朝治台的二百年间，台湾的耕地面积与人口有巨大而快速的成长。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的发展，更展开了糖、茶、樟脑等出口产品的生产，开始有商业资本的形成，“行”、“郊”（guild）开始成立与繁荣。

鸦片战争后，台湾被迫开港，一方面使台湾农业受到“洋米”的冲击而萎败，一方面使台湾茶、糖、樟脑开发了世界市场，到了日人割台前，台湾农产品输出已呈“出超”的局面。蔗糖也

向大陆、日本输出。一八五〇年，台湾的茶叶向大陆大量输出。台湾北部一时成了经济作物茶和樟脑的产地，而台湾尤为全世界最大的产地，台湾北部，来自日本、大陆、西欧的商人云集，经济活动十分鼎盛。

因此，不必等待清廷因帝国主义的威胁，开始想巩固中国的南疆，开始以洋务运动建设台湾之前，台湾在农业、商业上，已卓然有成，形成一个完全的农业社会，并完成了一定的商业资本的积累。

在儒将刘铭传、丁日昌等人的主持下，并以台湾既有的经济、社会的物资条件为基础，清王朝在台湾展开了“洋务”建设。引进西方机器采煤矿，通讯电缆的建设，石油的开采，引进西方生产方式以改善和增进制糖工业，行政组织的整饬，整顿税制，施行人口调查，丈量土地，修建基隆至新竹的铁路，购买轮船航行于香港、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地，建设邮政事业，建设樟脑专卖体制，修筑道路，扩充电信设施，改革币制，设立西式学堂，聘西医设立“官医局”，架设电灯，奖励种茶、养蚕，引进棉花及烟草，修设水利，甚至设招商局，向民间筹募股金，不胜枚举。

事实上，日本人治台后，还必须吸收、笼络台湾的商业资本家，才能开展他的拓殖事业。日本来台以前，台湾已经有前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明显地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重整的农业社会（地主—佃农关系）的存在商业资本的发展，经济作物的展开，作坊工业的繁荣，洋务运动所留下的公共设施和“工业基础”，才有日本领台后的“成就”。这只要对照一下日人统治朝鲜前的朝鲜社会与日人治朝后的“成绩”，远不若其治台者，便很清楚了。

日据初期的军经镇压

日本治台之后，台湾土著资本受到政治、社会经济上的压抑。日本在台湾殖民经济的发展，是以台湾独立的、自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压抑和消灭为代价而发展的。永台先生和许多人都认为没有日本统治“奠下”的“工业基础”，就没有今日的台湾工业，这是因为不明白我们祖先的伟大成就所致。为什么不明白？第一，他们受到殖民者中心论的学者所欺骗，人云亦云；第二，我们太没有自信心；第三，我们的历史教育太败坏；第四，国民党对美、日帝国主义的温存政策，压制了对美、日的批判性的思考。

至于说日本军队“纪律严明”，永台先生不应该不知道，别说日人征台时期对台胞的杀戮，即使在号称“治世”的“儿玉一后藤体制”中，日本人在台湾杀了三千四百七十三个“土匪”（抗日台湾农民）；“林少猫事件”（一九〇二年）中，日本人处死五百三十九人，诱杀四千零三十四人；在“雾社事件”中，日本人对高山少数民族进行全族灭绝的屠杀，甚至对山胞投掷违反文明的毒气弹，而引起世界舆论的挞伐。在全亚洲，认为“日本军队纪律严明”，“普受民众尊敬”的人，恐怕少之又少吧。从这个史实看，和“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在台湾的杀戮，不但没有“天壤之别”，恐怕只有远远过之，而无不及了。

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变的悲剧，最不能忍受的，是同族的相残。以历史眼光去看，二·二八事件其实是“国府”统治大陆失败最具体而微的说明。正因为有兴起二·二八事变的体质的国民党，它才

会在一九四九年受到全中国人民的否定。在前近代的中国，类似二·二八规模的镇压，不但普见于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甚至也在文革时代的大陆武斗场中，看见中国落后部分的血腥气味。在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买办的、封建的政权对人民的杀戮，至今不绝。韩国光州事件中对韩国爱国学生、民众的迫害；菲律宾在马科斯时代中持续不断的人权蹂躏，终在阿基诺体制建立后暴露出来。这要靠人民的崛起，在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刷新封建、买办和新帝国主义的结构，推展以人民为主导力量的民主主义，才能根绝。我们谴责二·二八事件的残暴，也谴责它为台湾内部中国民族团结所带来的破坏，但不能说日本的统治远比国府为好。因为两个问题在性质上有根本性的不同。

国民党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政治上，对本省人有歧视，这是个事实。例如限制台语在电视、电影上的使用，例如各级政府中财政、兵役主管位置不予本省人，例如党、政等重大职位禁用本省人……

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呢？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失败，退据台湾，并且在美国全球性反制共产圈的战略中，以武力巩固它在台湾的统治。这样的统治，是以人为的、武力的强制成立，而不是由社会发展自然形成，以台湾居民而言没有代表性。因此，国府是被大陆中国人否定的旧的政权，靠着武力，强加移植到台湾。如果没有战后全球反共战略，国府早在一九四九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样一种政权，不但在大陆时对大陆人民有独占性（如“四大家族”对中国财富、权力的独占），来到它没有社会根基的台湾，当然要更加强化这独占。

是谁真正统治着台湾

问题在于，这独占是否以全称的“本省”、“外省”人做为界域？我同意今日台湾政治核心权力皆操在外省人手中，却不能说“一切外省人都是统治者统治阶级”吧。越来越多的外省工人、小生产者、中小公务员、甚至妓女、贫民、流氓……沦落在社会的底层，和本省人中下层人民一样过着艰苦、受辱、荒芜的日子。说到歧视，在教育上、人格上、经济上，没有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差别待遇，只有强有力的阶级和弱小阶级的差别待遇。永台先生对日据时代似颇熟悉，应该会同意我的话吧。

其次，永台先生说到外省人口中国民党多，证明外省人在统治台湾人。国民党透过党组织统治台湾，绝对是事实。但是不能说一切党员全是统治阶级。永台先生一定看过无数窘困、卑微、不满的党员，也看过更多沾不到权力核心，对政治冷漠、马虎的党员。统治着台湾的，极少数的党、政、军、特核心集团（绝大多数是外省人）和与上述集团紧密勾结的台湾垄断资产阶级（包括本省、外省），以及更为背后的美日帝国主义资本及其买办阶级（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永台先生的分析，恐怕是太简单化了。事实上，帝国主义资本，买办的和官僚的大资产阶级才是台湾社会的统治核心。党政军特，是为这统治核心服务的行政单位而已。以菲律宾为例，马科斯倒了，菲律宾人民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支配力还在；菲律宾的封建的大地主、庄园主、垄断性商业和工业资本、官僚资本仍然盘踞在菲律宾人民的头上，至于各级官僚、议员、警察、党员、特务、将校，只不过是统治集团的“办手的”（台语）罢了，走了一个马科斯，如果社会结构不变，菲律宾人民依然有艰苦的日子要

过的。

阶级关系与省籍问题

说本省人是“较为吃亏的弱者”，勤劳憨直，有点像水牛，“温顺而带有奴隶性”；大陆人“大多善于用心机，自私虚伪，投机取巧，擅长宣传”，有欺善怕恶的“阿Q性格”，正如我们有些人认为山地人“懒惰、不卫生、酗酒、愚笨，没有贞操观念”一样不公平。永台先生给本省人和外省人所做的“定性”描写，绝对可以在无数个个别例子中互相使用，本省人绝大多数有鹰扬虎啸的强者风格，有机智精明、强悍而富有高昂自尊心的人，大陆人也有无数正直木讷，不自私，敢于对强者以生命挑战的人吧。外省人也有好多因为正直、耿介，备受当前政权和社会“冷落、打击”的人。

我们的看法是，问题不在本省人、外省人，问题在于台湾的社会阶级结构。在统治和利益集团阶级内部，本省人和外省人可好得很；在被压迫阶级内面，本省人和外省人也好得很。因此，问题的根本在于社会学上的阶级关系，而不是什么“本省、外省”。这就是为什么四十年来省籍矛盾日见模糊，而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日见明显，这是康宁祥先生都认识到的事实（一九八六年三月《夏潮》：“统治关系与省籍问题”），而不是因“接受党化愚民教育”，“第二代本省人与外省人子弟之间的差异，似乎已逐渐减少”。打破“国民党外省人”在台湾政治上的独占，让台湾资产阶级参与政权之外，还得要有经济上的平等权，下层本省人和外省人才有解放的一日。至于籍贯，也是人权的一种，个人应有选择籍贯甚至国籍之权，再说压迫和榨取的社会制度不改，光改籍贯，对人的真正平等与自由毫无助益。黑人、波多黎各人不也是美国

公民吗？但他们依然受到美国白人中心结构的歧视与压迫。台湾山地少数民族不也是“台湾人”吗？但仍然不改受到在台湾人经济、文化、政治歧视的命运。

所谓“民族性论”

关于永台先生在“民主政治的展望”一节所论，我们大抵上都同意。但说因中国人有不好的“民族性”（例如自私偏狭、虚伪狡诈……）和历史上落后的事实（权威统治、贿赂、军阀），宿命地使中国在政治上不民主，人权上不自由，则又是太过简单化的提法。我们反对“民族性”论，因为它发展出“优秀民族”（如日尔曼民族、犹太民族、大和民族）压迫“劣等民族”（如少数民族、黑人、亚洲人、“支那人”）有理之论。我们认为任何民族都是“优秀”、有尊严的民族。民族性格的部分歪扭，和客观的社会制度、国际干涉有关。例如中国历史上崇洋媚外，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落后、腐败，和中国受到不良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的茶毒有密切关系。这就是我们反对后藤新平说台湾人“怕死、爱钱、好名”的理由。后藤所看到的少数的台湾人的性格，其实是我们封建的社会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一个歪扭的、被害的结果。

对统一问题的四点坚持

最后，永台先生为中国统一提出了一些方案。关于这个问题，因为十分艰难而复杂，我自愧没有成熟的看法。不过我很同意于永台先生者有四点：

一、海峡两岸中国民族的相敌与国家分裂，应该结束。

二、中国统一应以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两党的私利为

基础。

三、统一应该在中国人民完全参与的民主主义的条件上统一。

四、由于独特的历史问题，在统一事业上，应该细致、认真、严肃地考虑到台湾人民过去的历史伤痕，以最谨慎、最民主、最实事求是的过程，在台湾人民充分参与过程中完成。

对于这些共同关切的原则上，我向永台先生深切关心台湾前途，关心国家统一的情况，以及永台先生坦诚、优雅的讨论态度，表示我个人极深的敬意。

我们理解到永台先生的许多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意义。在本省人内部，借《夏潮》杂志初步进行了这个“敏感问题”的讨论，有这重要意义：当统治者为了短视和私利的理由压制这种讨论时，在历史转折期日益逼近的今天，人民应该起来争取讨论台湾内部矛盾的权利。因为，台湾内部的矛盾，如果不通过公开、客观、民主的讨论，矛盾就会更形恶化，终致于重大地伤害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谐的事业。

——一九八六年四月《夏潮论坛》杂志

“台湾”分离主义

“知识分子的盲点”

一心一意要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

在台湾近五十年的历史，有两个历史时期，在台湾的一小部分中国人，以做中国人为耻。头一个时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人在台湾疯狂地推行战争协力的“皇民化”运动，有一小撮台湾人，深恨自己不是日本人，以体内所流动的中国血液为污浊、为卑下，一心要使自己成为皇国日本的国民。在文学上，以小说《道》为它的典型。当时有一批台湾人以改姓名、说日语、穿日本衣饰、吃日本式菜饭为高尚，一心想摆脱“本岛人”的羞耻印记。

在漫长的旧殖民地时代，在广泛的西方殖民地，都产生过这样的人种。他们都以自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母文化、语言和种族为羞耻，一心一意要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

日本统治下台湾“皇民化”运动中的部分台湾人，以中国的文化、语言、血液为落后、羞耻，一心向往日本殖民者的文明与开化。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煽惑下，一小部分台湾人反对“支那”、“清国奴”，鄙视和蔑视中国的人、文化和事物。

二十年后的五十年代，先是在日本，后是在六十年代末的北美，继之则在八十年代的台湾，产生了另外一批反共、反中国的

台湾人。他们也一样以中国的文化、语言和血液为丑恶、为落后、为耻辱。

在殖民地台湾，少数台湾人的“皇民”思想，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向中国扩张，遇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致使战争陷于泥沼，乃急欲以速战打开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出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五十年代以降的台湾分离运动，也是战后二体制对峙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新殖民主义全球战略下的一个产物。两个历史时代中少数台湾人的反华、蔑华思想，一样都倾慕日本或美国，及美、日两国的“文明”、“进步”与“开化”，对自己的民族，却以日本人或美国白人中心的观点，加以仇视和鄙视。在台湾五十年历史上，少数台湾人的反华和蔑华运动，有这共同的特点：（一）是新旧殖民地结构下的意识形态；（二）反共；（三）反华；（四）鄙视一切中国的事物。

几十年来，这样的思潮，在台湾岛内外，形成了林林总总的暴论和奇谭怪说。最近，台湾一切支持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所寄予厚望的民进党，在机关报上刊载了一位长住美国的画评家写的有关“二·二八”的文章，正是这种暴论和奇谭怪说的一例。

这篇文章说，如果日本人继续占领台湾，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就不会发生；如果来光复台湾的祖国是个好祖国，也不会有“二·二八”。结论是：一切都是光复惹的祸，台湾其实如果没有一个祖国，如果到现在还在日本统治下，要比现在强多了。

日本人继续占领台湾，意味着日本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意味着日德意轴心法西斯对全世界的支配。这当然是一切法西斯、反共、纳粹们的梦想。该文作者不惜以寄望世界的纳粹、法西斯化来实践对中国和“亚洲大陆”的仇恨与轻蔑，这样的台湾分离主义者在知识和文化上的贫困，已经不是一般的知识可以理解了。

这篇文章，反反复复批评台湾历史上对中国不能忍的文化、感

情和政治上的归向与“依赖”。该文批评林献堂摆脱不掉中国情结，批评台湾最初割让后台湾士绅地主阶级的“台湾民主国”“遥奉圣清”，割不掉中国尾巴，所以失败，却没有说明光复之初完全割掉中国尾巴，“遥奉大日本帝国”的辜振甫们的“台湾独立运动”何以也失败？文章痛诋光复之初台湾知识分子热情提倡祖国文化；甚至于台湾《笠》诗刊某位“跨越（日、中）语言”的前辈，也遭到粗暴的攻讦，说他们由日文改习中文写作，“无异从近代社会又跨回到封建的旧社会去”，说“跨越语文的愚行”是“第一号罪首”，背叛了光复当初的广大读者，造成“文学良知的破产和文学人格的牺牲”。该文把张文环、龙瑛宗、杨逵和巫永福全列为“皇民文学家”，并且称赞这些“皇民文学”“作品的思想与技巧都是纯熟的”，改以汉文写作，则“终其生”无甚成就！

像这样的暴论，完全没有政治经济学、台湾史、台湾文学史的最粗浅的语言和知识，根本没有办法做知识上的讨论。这类的暴论超乎一切知识的贫困与混乱之上，唯有以下的观点和执意是异常明显的：“依赖”美、日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而不与之“对立”、不加以批判，对中国抱持着五十年代世界冷战心智造成的仇恨、鄙视和反对。

在战后冷战结构中二体制对立的世界现代史总的矛盾上，重新对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的“战后”与“光复”，做出全面的结算，从而对新近在美国、国府和民进党组成的三边构造的展开，去分析和批判不同形式的台湾分离运动，应是今后台湾前进的知识分子富于挑战的新的课题了。

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写在《二·二八事件：
台中风雷》特集卷首

一九八六年以来，台湾开始了一连串惊人的变化。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成立；四十年戒严体制和报禁的解除，进入了具体的日程表；今年二月，民进党打破了台湾向来最大的禁忌，开了“二·二八和平日”，来纪念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连体制派的大报，也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三四十年来最大禁忌之一的“二·二八”历史问题。

对于这个“新现象”，国民党没有用抓人和镇压来反应，相对于它过去的行为法则，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容忍与成熟。许多学者和党外人士，都先后以不同的形式表示，重要的是我们决心今天去面对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从而找出一条民族和平与团结的途径，而不仅是去清算国民党要不要为这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负责”。有人把公开探讨“二·二八”事件的可能性看得极为可贵，从而主张当时在南京的国府不必为这不幸的事件负责，或者主张不应因讨论“犯罪责任”而错失了公开究明“二·二八”事件历史真相的机会与可能性。

事变的中国现代史·世界史的背景

可是显然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陈

仪政府”，就是主张“蒋介石政府不必负责”，而加以强烈的批评。

我们以为，做为中央政府，无论如何，国民政府对“二·二八”不幸事件的发生，负有无可推卸的政治和道义的责任。在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之外，国府和下属的陈仪政府所负的具体责任，也许还有一个依什么比率去看的问题。

就纵的历史层和横的社会面两方面看“二·二八”事变虽起因于单纯的缉查私烟事件，但是这个事件所处的环境，却植基于一个更深刻、广大的人文与物质结构之上。

从社会和经济上来说，战后台湾社会经济的凋蔽；因复员的“台湾军属”而益形恶化的失业；台湾编入中国大陆经济圈而受到大陆财政崩溃的拖累，和一个在大陆濒临瓦解的政权对台湾政风的影响，都是事变的结构性的原因。但这些原因的背后，其实还有世界和中国现代史的原因，那就是十九世纪以来东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袭；是日清战争和第二次中日战争；是“大东亚共荣圈”、二次大战和中国的内战等等。在这些现代史的背景下，百年来，中国在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被侵略与抵抗侵略……这些复杂的葛藤中，在民族的遽亡或新生的边缘挣扎不已。因此，做为中央政府，不论名实如何，国府固然要为“二·二八”和其它动乱“负责”，但在现实上，只说清廷或国府该不该对近代中国内外交迫的苦难负责，恐怕不足以全局性地讨论问题了。

全民族的损害与创伤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万方无罪，罪在帝国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的葛藤”，从而“进一步为国民党推卸责任”，但我们也绝不同意“万方无罪，罪在国民党”论。我们以为，国府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当然对“二·二八”不幸事件负有最高的政治和

道义上的责任。但是，我们深以为在“二·二八”事变中，不只善良、无辜的台湾人遭受了“损害与创伤”，也有不少善良、无辜的外省人受到“损害与创伤”。四十年来，由于一直没有出现今天这样可以公开讨论这段历史公案的机会，加上五十年代的战后冷战构造中，台湾分离主义运动在新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发展，使台湾内部的民族团结受到破坏，使得多数在台正直善良的外省人和台湾人，四十年来同样生活在“二·二八”事变所残留未决的历史问题的阴影中。因此，“二·二八”事件是整个民族的“损害与创伤”；“二·二八”事件所流的血泪，其实是中华全民族的血泪！在讨论当前台湾公害、雏妓、农业和劳工问题时，尚且已经不能用“万方无罪，罪在国民党”论来探究问题的根源；尚且必须从造成公害、雏妓……的台湾内外因素所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去看问题，像“二·二八”事件这样一个具有深刻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史性质的问题，惟“国民党有罪论”当然尤不足用以讨论了。

从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

事隔四十年，在这奇迹也似地开放了公开讨论“二·二八”事变的机会的现在，国民党政府如果依然偏颇固执的硬要把“二·二八”事变的起因，归纳为“台民亲日奴化思想，中共煽动”的“官方说辞”；或者还是归纳为“唯国民党、外省人有罪论”、“中国民族和台湾民族对决论”这个分离论的史观，落后、肤浅尚是余事，无法深入讨论、分析，从而获取历史的智慧，根本解决此一历史问题，进一步疗伤止痛，建设民族内部的和平、团结与发展，才是严重的遗憾了。

因此，我们不但要从陈仪接收体制的专权、跋扈、贪渎、腐败、骄悍、劫掠和独占去看“二·二八”事变的起因，来讨论国

府的责任；不但要研究二十一师登陆后的血腥镇压、杀戮、暗杀的历史，并加以批判，但也不要看不见濒临一九四九年全面崩溃的整个中国内战下社会、政治的急速解体与新生所造成的痛苦与混乱，从而善于看见这内战、社会各阶级间的剧烈轧铄所带来的“全面屠杀”、“征服者心态”、“官逼民反”……为全体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

也许中国只有在这个全局的观点下，仔细研究分析以下诸事项：（一）“国府”来台接收结构中的CC派、政学系、三青团之间的矛盾和倾轧；（二）台湾民众蜂起队伍中的士绅、日本台湾兵复员分子、自日据时代发展下来的左翼反帝民族解放势力，和一般失业的市民与城市流氓无产者各势力间的对比与关系；（三）二十一师与台湾民众武力间的对峙；（四）美国领事馆与“二·二八”事变之关联；（五）丘念台、林献堂、白崇禧、陈仪、柯远芬和谢雪红……这些人物争斗之间的内在与外在的逻辑关系，才能显出更完整的意义。

帝国主义者的眼光

有人一向喜欢这样说：“二·二八”事变的原因是“岛屿文化与大陆文化”的“接触过程”所必生的矛盾。他们说，经过五十年代日本现代殖民地资本主义改造，使台湾社会的文明开化，远高于大陆本部。因而，落后、野蛮的“大陆文化”强行对文明开化的台湾“岛屿文化”进行支配的结果，“二·二八”事变，就不可避免了。台湾分离主义的学者王育德就赞扬日本对台湾的同化政策“相当成功”；日本的对台殖民政治，使台民“不管愿意与否，享受了近代的恩惠”（王育德：《台湾：苦闷的历史》）。日据时代日帝体制派台湾人辜显荣也有这样的赞歌：“……观察（日本）帝

国占领台湾以后而至今三十年间之治绩，我台湾岛民，应为地球上各国人民中最幸福之人民之一。试观对岸之支那（编按：日人对中国之蔑称）则明其故”。因为辛亥革命之后，“支那动乱相继……实则……各自为政，……互争权势，横征暴敛”。相形之下，在日本治台后，“全岛土匪一举廓清迄今二十余年……岛内和气洋洋，一片升平气象。……如此幸福之人民，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可以寻得？”（王育德：《台湾：苦闷的历史》）

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识分子，怎样看待祖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可以区分出殖民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买办知识分子。买办知识分子以殖民者的眼光鄙视和仇视自己的社会、文化，仇恨祖国的落后，必欲切断自己的祖国的脐带，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而后舒畅、自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前近代的、半封建的、为民族的出路而新旧轧轹的中国“大陆文化”，与经过日本殖民地资本主义文化的台湾“岛屿文化”“接触”过程所产生的矛盾，从整个当时中国内战的“历史中抽离出来”，然后将一切责任推给所谓“中国人”或“大陆文化”的“野蛮”，从而力言台湾和台湾人之必须与中国、中国人分离；另一种看法是从世界史、中国现代史全局的观点，以台湾人的中国的自主性，为反对帝国主义，促进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和平与民主而奋斗。

有些人也喜欢这样说：“二·二八”事变终于使台湾人从中国祖国之梦苏醒过来。台湾和台湾人向中国与中国人诀别。

但事实似乎不是这样的。

一九四七年以后，中国大陆内战的局势有迅速的变化。一九四九年，国府全面退守台湾。相应于中国局势的变化，经过了“二·二八”洗礼的台湾革新、进步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青年、学生和人民，似乎不但没有因“二·二八”事变而奔向分离主义。恰恰相反，一九四七年以后的数年间，以中国的民族解放为志向

的台湾左翼思想和组织，有急速的发展。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国府展开了断然的、彻底的政治肃清（Red Purge），秘密逮捕、拷问、处决、监禁，在台湾土地上不只进行十四天，而是四年、八年……；被害的人，是一整代在本省、外省的革新、民主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和工人与农民，而其中曾经参与“二·二八”蜂起者更不在少数。这当中的惨烈与恐怖，岂是“二·二八”事变可以比拟？但是，这批人当中少数脱逃离开台湾者，不少奔向中国大陆，另外少数刑余幸存下来的人，一直到现在，绝大多数都是秉持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台湾人！这次《人间》“二·二八的民众史”特集，用证言采集的方式披露了“二·二八”事变在台中地区的风雷，生动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两个不同体制间的对立结构。在这两个不同体制的对立线上，有四个国家的国土分裂，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整个冷战的全球战略，早在一九四九年开始，美国就有使台湾托管和独立之意。前揭《被出卖的台湾》一书的作者柯尔，则早在“二·二八”事变之前，就向白宫当局力言美国控制和支配台湾之必要，而主张以国际共管与阴促独立的形式支配台湾。在国际法上，美国炮制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至今犹为台湾分离主义者所乐道。和柯尔、麦克阿瑟盟军总部有复杂关系之廖文毅所领导的台湾分离主义运动，不管它后来是如何发展与演变的，基本上是战后世界冷战构造下的产物。因此，台湾分离主义者，对于中国都有程度不同的轻蔑、厌恶与仇恨，而对于美国和日本，则有百般温柔和千万种温存。

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二·二八”事变，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伤痕。事变发生当时，

在兵荒马乱的中国大陆，有很多记者、诗人、木刻家对这发生在台湾的不幸事件表示指责、抗议和愤怒。四十年来，特别是在台湾，它成为虽然逐渐痊愈、却一直具体存在的民族内部的伤痛。

今年二月，台湾以民进党为主的人士展开了“二·二八和平纪念会”，提出了正确的“和平、宽容、团结、平反和赔偿”这些口号。这是继解除党禁和军事戒严后，台湾战后史的大事。

而国府当局，在仍然拥有绝对强大的强制力的体制下，对于民进党提出的这项高度敏感的议题，表现出不能不令人颌首的自我节制和基本上理性的反应。有论者认为，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和一九五〇年后数年间的政治肃清，国府用武力在台湾确立了绝对、独占性的政治和经济支配，使一个在台湾本地社会没有阶级代表性和物质基础的政权，在美国对台协防、远东反共、防共大战略的冷战构造中，世间难以一见地、反社会科学地、有板有眼地存在了四十年，并且竟然由上而下地也完成了它自己阶段和物质基础的建设，取得了“依赖性、出口导向经济”型的发展。而一九四七年“前、近代的”地主、大资产者、买办资本家的党，到了一九八七年，逐渐蜕化成台湾独占资本家、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和广大的地方体制派中产阶级的政党。这相应于台湾高成长经济而现代化了的国民党，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又由上而下地展开了一场惊人的台湾社会力再编成。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最近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由化、开明化的现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冻“二·二八”历史问题禁忌，要求我们以更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这历史遗留的问题。在千头万绪中，分别批判“二·二八”事件的“台湾人受日人奴化教育影响、中共煽动”论，和“落后的‘大陆文化’与先进的‘岛屿文化’接触时势所必致的悲剧”、“中国人杀台湾人”论，是最基本的工作。为“二·二八”不幸事件重新补缀历史的真相，似乎应该先从史实的

采集着手，然后在来日期待能从新的史实中，找出新的意义。只有透过公开、严肃、认真的“二·二八”历史研究，重新认识历史，才能解决“二·二八”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我们强烈要求国府能率先公布“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真相，鼓励民间对“二·二八”史实的再研究，从而有决心、有计划地对“二·二八”事件之冤案、错案、假案进行严肃、诚恳的平反与名誉恢复，公开向受害者道歉，并做一定的物质补偿。从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出发，厘清历史的公案。我们期待政府和民间对待“二·二八”研究，都有这样的态度。

本期《人间》初步整理了“二·二八”事变在台中地区的风雷，对当时士绅派和民众派的葛藤、“二十一部队”、乌牛兰溪畔的战斗和大甲左翼运动者蔡铁城的资料。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旅日立教大学戴国辉教授特为《人间》访问了丘念台先生的秘书林宪先生，对“二·二八”事变前后的台湾形势，和这形势中丘念台先生的思想、工作和感情，有详细的探索，尤为“二·二八”历史的重要材料。本刊得以独家刊出，至为荣幸，特笔在此向戴国辉教授和林宪先生致最大的谢意。

——一九八七年四月《人间杂志》

何以我不同意 台湾分离主义？

我所以不能苟同于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理由不少，可是主要的有这几点：

首先，台湾分离主义和战后新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受到岛内外、新旧时代的台湾分离主义运动者加以清算。

二次大战以后，历来在东亚和东南亚有重要的帝国主义利益的国家如英国、法国，主张战后亚洲地区的台湾和朝鲜“地位未定”，以便利在“联合国共管”的基础上，分赃日本交出来之殖民地，并扩张自己的势力。在二次大战期间，初步比往时更积极介入亚洲事务，企图以与国府之密切关系而独占在华利益的美国，则反对英法之议。不数年，中国内战形势急转直下，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未几，中共派兵入朝鲜战场。在这前后，美国也开始主张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论、国际共管台湾，和台湾中立化的主张。在旧金山和约中，美国支持日本右翼政府，悍然违逆日本舆论，与当局订立和约。在和约中，台湾被迫接受“日本放弃台澎”而不明言交还中国之条款。一九五〇年以后一直到七十年代，“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些把戏不断上演。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搞“‘自决’并不等同于‘独立’”之说，变个方式搞“台独”的两手，隔着太平洋，互相唱和。

我一直诧异，为什么台湾分离主义者看不清，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一九五〇年全球性两极对立构造下，美国为了派兵“协防”台湾，理论上就必须使台湾脱离中国，因为美国在“理论”和道德上没有权力派兵去“防卫”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此外，美国釜底抽薪之计，在于建立一个亲美的、反共的、脱离中国的台湾，以利充分掌握台湾这个美国全球性反共、防共战略部署上的基地。帝国主义与台湾分离主义的历史和关系，南方朔的《帝国主义与台湾独立运动》（一九八〇，四季出版社）一书之中有透彻的分析，读者可以参考。

这是最明显不过的，对于中国内部事务之干涉，也是严重而大胆的帝国主义政策。我无法赞成这样一个战后基本上是“官僚—工业—军事—学阀—情报”复合体的美国资本帝国主义所操纵和炮制的台湾分离主义。

一九五〇年在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对立”世界成立，全球各民族、各国，莫不被组织到这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中。在两霸相持之“阵营”对立下，许多个别民族的自主性、个性和利益，被强加歪曲，甚至横遭压抑，产生复杂的变化。在国际反共、防共、反奴役这些大义名分下，如同在“国际社会主义兄弟党和国家磐石似的团结”的口号下一样，许多民族和国家被迫放弃独立追求各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问题上，沦为霸权的附庸。

台湾分离主义运动，在依附美日新帝国主义，甘为新帝国主义鹰犬，甘为逐渐破产的“两极对立”冷战构造服务，盲目“反共”、“恐共”和反华，可以推想，万一“台湾民主共和国”成立，它也不过是一个极端法西斯的、美日附庸的“国家”。我也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极度的荒废。

任何一个自觉的、前进的亚洲知识人，都不会愿意涉入这样

一种运动吧。

在“阵营”中，为大国的利益，牺牲和歪扭自己的个性，莫过于把民族分裂长期化、合理化。国民党四十年来虽以光复大陆、反共统一为言，实际上却在实质上搞台湾的独立化。言必“我国一千八百万人”、台湾估计在一九若干年“进入开发国家”之林、以私运大陆商品来台为国际间的“走私”论处、对海峡两岸人民间的探访、通信、通商……横加禁断，这些都在实质上创造一个企图永久“独立”于中国的台湾。但在这一点上，台湾分离主义在恐共、反共、“确保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点上要求台湾独立，其实与国府是十分一致的。事实上，台湾分离运动，在一九七五年前后越南沦陷，美国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冲击下，曾经有多人惴惴上书于国府，要求由国府领导台湾反共“独立”。

最近以来，在民进党机关报《民进报》和其他反对派杂志上，迭有公开主张台湾独立的文字。这些文章中，都表现出为了反共防共，必须使台湾永远与中国分离，才能在“国际法”下受到洋人的充分保护。在文化上和民族上，有些文章一点都不想掩饰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极为荒诞的误解、仇恨与卑视。如果说，这种仇恨与卑视已经到了至极反动的种族歧视和差别主义，也不为过。

台湾分离运动，由于在历史上与现实上和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有关，所以从理论到实践，它总是以中国为它的对立面。它反对和批评中国之政治、民族和文化。但是面对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它立刻丧失了它对中国事物时所流利使用的尖酸、狠毒的辞语。在历史上，很少出现过这样一个时代，中国人（尽管他们不以为自己是中国人）这样挟洋以卑视、仇恨中国，必欲断绝与中国一切的连带而后已。

我以为这是“国府”四十年来，在“阵营”中苟安，为了一党的私利先自放弃了中国的恶果。四十年来的恐共、反共教育和

传播，发展成国府始料不及的反中国心态，以恐共、反共来巩固自己的安全的国民政府，意外地在台湾失去了中国的立足点，而受到国际卵翼下的台湾分离运动对它合法性的挑战。

当台湾分离主义言论在台湾取得全面或非全面的言论自由时，我们一方面支持这自由，一方面也应取得分析和批评台湾分离运动的言论权。

最后，台湾分离主义和“国府”一样，对台湾四十年来“依赖性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批评，反而是持肯定论的。他们只热心争论，台湾的“经济奇迹”是国民党英明领导的产物，还是“台湾民族”勤勉、优秀的“海洋性格”使然。对于豪奢冶荡的“娼妇经济”，对于经济发展背后对工人、渔民、农民等弱小者之压抑，全岛色情化、全岛少女在金钱和官能崇拜下失去人的保障，环境与自然的深刻破坏……基本上不加以批评。分离运动只能造成国际资本在台湾对自然、人、文化更加肆无忌惮地蹂躏，并以腐败的发展换取对中国的永久的断绝。缺少对世界体制、国家和文化怀抱批判知性的台湾分离运动，是当前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下台湾被“矮化”的文化的结果。

相形之下，韩国民主运动的品质与风格，值得认真思考中国/台湾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充分注意。发表于一九七六年的韩国《民主救国宣言》，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战后三十年来，国土分裂，给予南北（韩）双方以施行独裁政治的借口；使促进国家繁荣、民族幸福、创造发展之所必须动员的全韩精神和物质资源萎缩下去，没有外国的军事援助，维持朝鲜半岛南北共计百万左右常备军和现代武器，毕竟是单靠朝鲜半岛的经济力所不胜负荷。更不可忍受的是，民族的分裂，使我韩国民族文化创造上所必须动员的、同胞的英知与创意，遭到破坏性的浪掷。

民族统一，是当前我同胞所负至高的命令。我们必须以全韩五千万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打破南北分裂的障壁！任何个人或集团，如果敢把韩国民族统一的最高目标，利用为他们自私的战略目的服务，妨害民族统一，将不能免于受到历史最严苛之审判。

民族统一的机会，依南北双方的政治家的姿态而可近可远。如果他们肯真诚地为韩国全人民设想，就应有善于透视国际情势，一旦时机成熟，则决然面对统一问题，果敢处置的智慧与勇气。这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主体性外交。

在这时机中，我们有一条必守的最后的防线。那就是规定南北统一后，一切对我民族为最善之制度与政策，应悉由国民中产生的，这样一个民主主义的大宪章。在预测民族统一的机运在逐渐逼近之时机的同时，我们是在培养还是枯萎民主力量呢？胜共之道、民族统一的近路，便是培养和发展韩国人民的民主力量。

这就是我五千万全民族面向新历史的创造时，应该积极面对的课题。

这是要我们再度把在“三·一”“四·一九”运动中在亚洲点燃的烽烟，再度高高举起！

这才是一个在“民主”与“共产”对立中受难的民族所产生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足以夸耀于世界万邦。这样才能使韩国做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使我们做为一个实现了正义、保障了和平的国家的国民，在国际社会中，与万国并肩，堂堂存绩并发展于天下。

民主主义万岁！”

韩国民主运动这种能在冷战构造的“阵营”框架中脱出，争取韩国民族的自主性，超越南北政权的对立，立足在全韩民族的解放、统一和独立的“英知”，应该教会我们极为丰富的功课。

国家分裂结构 下的民族主义

——“台湾结”的战后史之分析

(一) 前 言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台湾从五十年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得到解放。当时的台湾人民和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感到莫大的“光荣与喜悦”。一九八四年顷，台湾的舆论中开始公开出现主张台湾与中国大陆在政治、社会、文化上永久分裂的言论。一九八七年，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为耻，诅咒台湾在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后向中国复归，直接主张“台湾独立”的言论，在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刊物中，大量出现。

主张台湾从中国独立的政治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中期廖文毅在东京的“临时政府”。但是在相对性民主化的一九八六年以来，开始以空前的密集度，台湾分离论在台湾的言论界出现，并且起着虽然微弱，却不能忽视的社会影响。

长期以来，台湾分离论一直在台湾政治上处于被镇压的状态，而没有言论上的自由。但近两年来，台湾分离论，已经在党外民主化群众运动中，无可讳言地取得了半合法的地位。这一方面使独立地、而不是以政府的立场去分析、研究和批判台湾分离论的人，取得了相对的言论权，另一方面，也取得了相对的道德正当性。

这篇论文的目的，是想从亚洲的战后史，和战后台湾政治、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去寻找在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滞萎、和“反（中国）民族”或“非（中国）民族”倾向的根源，并指出一九四五年以后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冷战体系下，分裂国家的“冷战—国家分裂”结构，对台湾在民族史和文化史上造成的重大歪扭。最后，这篇论文也企图从世界冷战体系的转化，和台湾内外部政治—经济上的转变，提出当前国家分断架构下，在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诸课题，而从摸索对国家分裂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的克服之道。

（二）台湾光复与亚洲的冷战架构

冷战和冷战心智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成功，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与已经发展了四百多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完全背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引起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疑惧和愤怒，对新俄加以百般的干涉。因此，事实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与紧张，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开始了。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结束，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对抗，开始在全球的基础上展开。一九五七年以后在土耳其、希腊、韩国、中国大陆、东南亚和欧洲各地，美苏两个世界性的霸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广泛的战线上相互对立斗争。苏联在从东欧、柏林、北京以迄河内的广泛地区中，成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盟主。而美国则成为上述社会主义阵营外的世界其他辽阔“自由世界”的领袖，以战后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贸易关税同盟（GATT），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取代大英帝国而取得全面的、强力的西方霸主地位。人类的历史上，头一次在全球范围内，产

生以美苏两大超强带头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进行持续不断的武器、军备的竞赛。一般称这种“东西间的摩擦”为“冷战”。十四世纪西班牙的一位帝王术的学者唐·璜·马纽埃(Don Juan Manuel),对“冷战”与“热战”,做了这样的比较:

“剧烈、炽热的战争,恒以双方的死伤与和平休战终了。但冷战的结果,则无具体的和平,对于挑起战争的一方,亦无荣耀可言。”

Fred Halliday 认为,六个世纪前的这个界定,仍然能生动地说明二次战后核武时代的世界。对于美苏双方,冷战都不曾带来和平与荣耀。一直到今天,两大阵营之间,谁也不曾把对方完全压服。将近四十年来,美苏两个阵营之间在时而剑拔弩张,又时而相对集议的过程中,在两极对立的双方(除了没有真正地两军对仗),关系一般地是冷漠而瘫痪的;一般地充满了相互威胁、杯葛、猜忌、封锁和宣传攻击。美苏双方,对各自阵营中的国家施予军事援助,甚至在第三世界挑起局部性的代理人战争(侵略与反侵略、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相互实施经济制裁、心理战争、间谍活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战争。

有关冷战形成的理论,最能表现这事实:在冷战中,两阵营中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尖锐而广泛的对立。对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而言,社会主义,具有类似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人权压迫、恐怖和对外扩张的性质。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使企业的自由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成为不可能。社会主义使人民生活在恒久的物资缺乏、贫穷、特权官僚主义之中。而今日世界最大的危机,在于苏俄共产帝国主义,无时无刻不在阴谋颠覆“自由世界”,向外扩张它那邪恶的赤色版图。

对于苏联集团而言,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根本性质,在于

它那与军火特需工业分不开的资本主义。因此，尤其是美国，掀起战争，制造虚构的“苏联威胁论”，发展军事工业，是保持“军事—工业综合体”资本主义发展的不二法门。因此，美国到处干涉他国内政，镇压全球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亲美独裁傀儡政权，掠夺资源，成为战后世界一切不安与危机的根源。

对两个阵营的内部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却有无可怀疑的“优越性”。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富足、民主、自由、慷慨和友好，只有在资本主义自由社会中才有可能。苏联意识形态，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经济与阶级的平等，抵抗美帝国主义，使正义、公平与真正的自由与和平得以实现。

这样的宣传战争，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冷战心智”（Cold War Mentality），对于两个霸权支配下的各民族和各国家的教育、文化、经济、社会，尤其是政治，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两个阵营内部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符合“阵营”的冷战意识形态，严重歪曲了自己的经济、政治体制和自己独立的文化、思想和价值传统，丧失了民族的文化、政治与经济的主体性。

亚洲的冷战架构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李承晚迅速镇压了在一九四五年以后韩国“建国准备委员会”，在各地迅速发展的“人民委员会”，并以联合国军队的名义出兵韩国，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南下，造成战后冷战的高潮，在整个亚太地区造成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方面，朝鲜战争使美国踌躇于放弃“国府”、与中共修好的观望状态中，一变而为积极支持当时已经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一九五一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拉起了一条北自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台湾以迄菲律宾的反共“围堵阵线”，对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共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封锁。

另一方面，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后，比往昔更加深刻地涉入印支和其他东南亚事务，扩大美国对亚太地区任何左翼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与干涉，并且积极地在亚太地区建设一个可以取代已经日薄西山的法国和英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反共安全架构。一九五四年，法国殖民主义在越南奠边府一役遭到致命的败北之后，美国开始代法国而介入越南内战。另一方面，美国分别与新西兰、澳洲、菲律宾、台湾签订军事安全协防条约，并且组织东南亚公约组织（SEATO），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布置军事基地和反共同盟网。在这些反共、安全、军事架构中，当时驻在台湾与菲律宾的美军，共受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由太平洋舰队负责西南太平洋和整个东南亚的安全。至此，台湾已经在战后亚太冷战构造中，编入了美国亚太反共战略体制中的“台湾—印支”安全体系。

尽管中国内战的形势不断变化，“国府”吃紧，企图避免剿辱中共的民族主义从而使之完全倒向苏俄的美国，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犹曾不断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无意使台湾脱离中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急速地加强它在亚洲的反共、防共、安全部署。在日本，美国转而支持战前的财阀和战争系官僚，对当时的日本工会，进行政治肃清，并且在抽调美军开赴韩国战场之际，命令日本组成最初的七万五千名日本自卫部队。

为了派兵“防卫”一个美国自己在一九五〇年迭次声明为“中国领土”的台湾，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发表“台湾中立化”声明，以“台湾的地位未定”为由，作为美国派兵“防守”台湾的借口。一九五一年，美国大力推动西方各国与日本结束战争状态，搞起“旧金山和约体系”（San Francisco Treaty System），使日本避开苏联和中共，与各交战国家签订和约。

在美国的影响下，吉田首相承诺日本单独与台湾的国民政府

缔结和约。在这项和约中，美国和日本悍然要胁国府承认国府的“主权”仅只限于台湾和澎湖，并且明白记明，和约的效力只限于台澎地区。换言之，战败国日本，对当年交战而战胜国政府的国民政府，否认国府对中国大陆的主权。此外，在这项和约中，为了符合美国协防台湾以封锁中国大陆的世界战略，日本只宣布放弃从前的属地台澎，却拒绝言明将台澎归还给中国。

在美国一手导演下签订的日本与“中华民国”间的和约，成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国际法的基础”，成为截至一九七八年之前，国际间“两个中国”论、“一中一台”论和“台湾独立”论的合理化依据。于是，台湾与中国本部，先是因为国共内战而对峙、分裂，继则在编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反共——安全体系之后，外来的势力，不惮于用种种手段，企图使这分裂永久化、固定化，甚至使台湾和中国永远脱离。

台湾的光复

正是在这样的战后亚太地区的现代历史中，台湾在一九四五年光复。一九四九年国府退守台湾，中国成为二次战后与韩国、德国、越南同为被全球冷战结构分裂的国家之一。

一八九五年，在中日战争中战败的清朝，把台湾和澎湖割让给了日本。和世界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台湾的割让，并不意味着全民族的沦亡于异族。陷入日本帝国主义掌握的台湾人民，当时还有一个辽阔的祖国。在日据五十年的台湾，不论是在前期的传统主义的、农民的、带有民间信仰色彩的抗日武装蜂起，还是后期的、市民的、右翼的民族自决运动和左翼的民族解放运动，都高举着中国民族主义旗帜，反抗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地统治。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台湾从日本殖民主义下获得了解放。本来，这原应是台湾复归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圈，使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高高燃起的中国反帝民族主义得以获得复权，和

中国人民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以来历经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农民反帝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事件、北伐、抗日战争……后蓬勃展开的中国反帝民族主义合流，共同建设民主、自主和统一的中国，但不幸却因国共双方的对峙，和台湾被编入战后冷战两极对立的亚太地区反共—安全架构，而形成战后四十年台湾和中国大陆本部间国土和民族的分裂，对在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造成极大的打击和挫折。

一九四七年，因陈仪恶政，和前近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近代化台湾社会的冲击，爆发了不幸的“二·二八事变”。以军事镇压和恐怖屠杀收场的这个民众不满事件，对于在日本帝国主义下长期脱离中国历史和社会经验的部分台湾人民，造成第一次对中国民族认同的苦闷和迷惑。这苦闷和迷惑，先是受到“台湾中立论”、“台湾托管论”所弃，继而在一九五八年美日推动“两个中国”论和“一中一台”论的国际背景下，被台湾分离主义运动所用。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后，在日据时代的台湾长期从事抗日斗争的中国民族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家，不但没有受到褒奖与政治上的支持，反而因为抗日运动中不同性质的、真实或虚构的左翼色彩，在国共内战和国际反共——冷战——安全架构的历史中遭到被杀、被监禁或流亡的命运。另一方面，日据时代与日本帝国主义协力的汉奸分子，光复后却没有受到道德与法律的惩治。反而因为反共的共同政治立场和肃共的实际经验，而得以在光复后的体制享有权力和名位。这种忠奸的颠倒，在五十年代初希腊和土耳其的战后史中屡见不鲜。法西斯统治下艰苦抵抗的爱国分子，在法西斯败北、祖国解放后，被战后亲美亲英的政府当做赤色分子加以残酷肃清，而在战时协赞法西斯的奸伪分子，却享尽权力和荣耀。但是，这样的颠倒，对于没有国家分裂的历史经验的人民

而言，容易理解到国内政治和阶级党派斗争的实体。但对于具有特殊的殖民地历史体验的台湾人民，这忠奸的放胆的颠倒，对于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一项重大而不易理解的打击和摧残。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第七舰队开始巡弋台湾海峡。这时台湾开始了对于共党分子、民族解放分子、左翼爱国学生、教师、新闻记者和文化人进行组织性的政治肃清。五十年代初叶的反共肃清，是世界“二极对立”构造中“自由—民主”阵营形成的副产物。那是一个从日本、韩国一直到马来西亚、菲律宾以迄中近东和中南美洲，在全球范围内肃清“赤色第五纵队”的广泛的运动。但是在台湾，因为是弹丸小岛，肃清在美国默许下，极为彻底地进行，导至使台湾激进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传统为之灭绝。这一彻底的肃清运动，固然有利于“巩固”美国“太平洋防线”中基地台湾反共纯洁性，但对台湾而言，则是日据时代中长期培育出来的反帝、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传统的惨重摧折。战后四十年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和思想上长期没有对美、日霸权的批判观点和民族主义的弱体化，一九五〇年初的政治肃清，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市民蜂起，战后民族忠奸之辨的颠倒，一九五〇年后广泛的民族、爱国主义者的肃清，加上配合世界冷战意识形态框架的长期反共宣传和教育，光复后一度高涨、旺盛的在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感情，遭到严重的摧损、打击和歪扭。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到现在吧，在台湾，主张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的人，不是被看成落伍、顽固分子，就是被看成赤色、左派分子。台湾人民的“祖国——中国”形象，也于是开始丧失了焦点，终而至于模糊和变形了。光复当初原本可以迅速地在台湾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一九五〇年世界和亚太地区冷战体系的确立过程中，首度遭到严重的否

定和打击。

而一九五〇年以后，在“冷战—国家分裂—反共—安全”结构下发展起来的台湾战后资本主义，更从下部构造使得做为上部构造的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进一步弱体化。

（三）“冷战—国家分裂”架构下的台湾战后资本主义

从战前继承下来的殖民地性格

一八九五年，台湾割日，台湾遂透过编入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圈而整编到十九世纪末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然十九世纪美、英、法、荷帝国主义侵扰台湾以前，台湾已经发展了相当的前期商业资本主义。

整编到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圈的台湾经济，不待说成了日本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再生产构造中的一环。五十年的殖民地统治，台湾殖民地经济有这两个特点：

一、日本殖民体制一方面利用了台湾传统的、前期商业资本主义的基础，发展以米和糖为基本的工农业殖民地经济支配构造，却同时以严厉的压制手段限制台湾土著商业——土地资本的发展，终日据五十年，台湾当地资本家阶级，一般地弱小乏力。

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史的舞台上，显示了它“早熟”与“落后”的特质，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体制，以总督府中央集权主义殖民地官僚为中心，深刻地对台湾经济施行全面的统制与支配，从而促成殖民地台湾对日本经济完成糖原料供给、米谷供应和南进工业化三项任务。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至少在理论上，在日据时代无从成长壮大的台湾人资产阶级，当可期待日本在台殖民主义产业，经由国府完成接收手续后，分发给台湾的抗日资产阶级，从而发展台

湾当地的民族工业，更从而强化台湾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然而，光复后的台湾资产阶级失望了。“国府”把百分之九十的日人遗留下来的殖民地重化工业，连同专卖体制、米糖产业、地方政治和安全体系全部接受，成为国府在台湾巨大的国家独占资本主义的基础。一方面，一九四五年以前原已经在日本支配体制下弱化的台湾当地商业——土地资产阶级，使“国府”在台湾的支配没有任何地方势力的抵制，也使国府在战后得以轻易地全盘接受日本公营企业，也使得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分成三个阶段完成的土地改革得以顺利、和平地完成。此外，日据时代日本人巨大产业与台湾人零细小企业在台湾的“双重、跛脚”殖民地经济组成，也在某种形式上，以“国营巨大独占资本与民间零细轻工业、中小企业”的双重构造，移行到战后的台湾经济。此外，从直接承接日本殖民主义“米—糖”产业，并在战后迅速因世界冷战体系而向美日资本主义经济圈形成深度依赖的战后台湾经济。凡此，在在都说明，台湾经济从光复前到光复后台湾社会经济的移转过程中，承转了一定的殖民地性质。这种“战后清算”在政治、社会、经济诸范围中的不彻底，又是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缺少中国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情感、力量与气概的原因之一吧。

美援和战后台湾的资本蓄积

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一年，美国经由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形式，对战后台湾投下了十五亿美元，从事能源、人力资源、教育、住宅、交通、保健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和农业改革以及为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的投资。美国透过“国际开发总署（AID）驻台湾的代表，以援助为激励和控制、要胁的手段，认真、严谨地促成战后台湾的资本主义化改造：一九五〇年以后，各种投资奖励法规的颁布、汇率合理化改革、促进贸易的自由化和市场的开放、控制

通货膨胀、创造有利于岛内外私人企业在台湾自由发展的各项有利条件，等等。台湾成功的农地改革，也得力于美国大量的援助资金，以及周详的计划与执行和追踪。根据 Jacoby 的估算，在“国际开发总署”的指导、计划和监督之下，台湾农业剩余得以扩大。他并且估算美援使台湾当时的 GNP 增长率增加了两倍以上，而每人 GNP 则增加了三至四倍，也使一九六四年台湾当时的生活水平达成时间提早了三十年！美援的另一个贡献，是使台湾克服了贫困国家往往无计可施的外汇不足问题，使台湾得以有余裕在发展的初阶段有能力向国外购入资本财，从事经济开发。

战后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如此地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冷战战略发生密切的关联，因此对战后台湾国家机器和阶级的形成，有独特而显明的影响。

国家与阶级

一九五〇年，美国采取了正面支持在一九四九年从中国大陆流亡来台的、由丧失土地的地主、大资产阶级、经理人才和专家、党政官吏所组成的政府。美国拨发巨额的美援，支持了这个由单纯的武力在台湾建立的政权，由美国 and 国府共同支用这笔美援，逐步分润、培养了流亡来台和台湾当地的资产阶级集团的企业，为华府由上而下地养成了自己的阶级和社会基础，形成难得一见的“阶级和国家的颠倒生成”。

大额美援和由美国亚太反共安全体制吸纳的大战略体制，使“国府”在台湾确立了全面的支配权力。美国对台湾的深刻介入，至少在五十年代初，并没有经济野心，而毋宁是出于巩固台湾做为“太平洋防线”的一环，为了根本铲除台湾从内部赤化的可能性，而以大量的援助进行土地、行政和经济的改革，从而巩固了“国府”的统治基础。战后“中华民国”的形成，便是这样地与“冷战—国土分裂—反共—安全”的亚太结构，有着极为深刻的关

系。

美援资金、农复会周详的计划、战后台湾地主阶级的衰弱、土地改革对象土地不属于政府官僚所有……使台湾的土地改革得以成功地完成。几百年来做为台湾社会重要成员的地主阶级基本上消失，形成由大量小资产阶级独立自耕农构成的台湾农村社会。

国家机器这时在美援的支持下，一方面从地主手中将土地重新分配给零细佃农，辅导土地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一面把土地改革后大量的农业剩余转给工业，并且透过肥料换谷和田赋体制，平抑粮价，使台湾的工业在低米价政策下得以长期用低工资扩大资本主义的剩余利润，完成资本蓄积。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阶级，也是由上而下地，由国家和美援在“国家分裂—冷战”结构中喂养长大，而有这些特性：

第一，战后台湾的公有巨大独占资本的复活；台湾土地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土地改革和农业剩余对工业的支援；台湾民间中小企业的怀孕和诞生、成长；台湾资本主义产业发展所急需的公共设施的建设；美国援助、借款、军事支出之以商品资本的形式在台湾的流通对台湾战后资本积累的重大效用……在在都和一九五〇年后，美国把台湾列入“日本—台湾—越南”反共安全体系的冷战战略有不可分割的关联。

第二，为了维持国家分裂状态、巩固和安定反共基地台湾而发展起来的台湾资本主义工业，由于整个世界冷战态势，自始就与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完全断绝了关联。在一八九五年中断的台湾与大陆经济关系，在一九四五年，理论上应该可以使台湾重新编入中国国民经济圈的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在国际战略的干扰下，自始被否决了与中国经济的连结。另一方面，在六十年代急速发展的出口导向工业，因为六十至七十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尚有容受的余裕，台湾的工业产品获允在世界分工

体系中占取一席之地,从而编入日本—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圈中,成为它们的加工出口码头和资本财补给来源,而完成了台湾“国家分裂—冷战—依赖”性经济的飞跃发展。

第三,在美国援助计划的辅助下,一方面是加工出口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低米价政策下农村耕地的不断的零细化和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而逐渐形成人口庞大的城市工人无产阶级。“国家分裂—冷战—依赖”型发展,无论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工人无产阶级的产生,都与世界两极对立下的安全体制有密切的关联。苛刻的反共—安全体制,使台湾工人阶级丧失团结、争议、交涉之权,在低工资、长劳动时间、高度劳动紧张度下,为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创造了丰裕的剩余,完成资本积累。

第四,如涂照彦所指出,一九四五年以后,“国府”照单全收了日本在台殖民地大工业和企业,成为战后“国府”政权重要基础的国家独占企业,对台湾重要产业,实施中央集权的支配。在这一切的背后,美国的援助,无疑是使国府接收和复活日人遗留的巨大产业的重要因素。“国府”国家机器从而得以强化,并从而享有国家对民间资本的高度“相对自主”权。

这些特点,说明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没有独立性;对于美—日霸权的新殖民主义对中国和亚太事务的干涉与支配,没有批判的感情与认识;对于国土分裂和民族分断,基本上承认,并且不反对其固定化和永久化。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至少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它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场和热情模糊化和冷却了。而这一切现象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源无他,端在一九五〇年达到高峰的冷战—国家分裂结构下台湾经济、政治与思想的歪扭了。

(四) 国土、民族分裂下的台湾文化

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美苏两个霸权基本上继续对立的基础上,彼此尝试寻求一个和平共处、协商谈判的架构。六十年代末,中苏共之间关系的龟裂,美国在越战中遭到败北的挫伤,使美国重新评估和调整它对中共的关系。一九七一年,美国参院通过支持中共进入联合国以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建议台湾问题留待海峡两岸人民寻求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另一项决议案甚至建议美国政府支持台湾与大陆的最终统一的目标。一九七二年,中共与美国签订《上海公报》,初次在国际文件上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九七三年,福特副总统甚至表示“美国与台湾的军事上的牵连,就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一九八七年三月,国务卿舒尔兹进一步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表示美国应积极“培养”海峡双方继续接触的“环境”。

这些辞语和语言上的重大变化,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美国当局在“台湾地位未定”论下,公开宣称“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中国内政问题”的修辞与逻辑相较,不啻天壤。

但是,虽然美国在理论上已经撤除了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封锁与对抗,并且进一步以完全推翻五十年代冷战反中共安全体系的逻辑,与中共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恢复两者间频繁的关系,实际上,“围堵”防线并未曾完全拆除。在琉球、韩国和菲律宾,美国仍然保留着相当强大的军事基地和军事力量。美国在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冷战——反共安全战略,基本上没有改变。但四十年来,国际政治中的“台湾问题”,确实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九五〇年“第一次冷战”的历史,毕竟要成为过眼的云烟。

然而,在台湾内部,执政的国府固无论矣,即连在野的反体

制政党，也在美国和中共关系解冻，美方重新把台湾问题定性为中国内政问题的时代，仍然紧紧地抱着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反共一反华的辞语，拼命主张台湾问题的“国际性”，呼吁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保护”下，建立永远和中国本部分离的、台湾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有许多反体制的分离主义文化人、文艺家和政客（Politician），不断地宣说他们对中国事务、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甚至中国民族的难于理解的轻蔑和仇视。这种从反共狂热延伸出来的反华、蔑华情绪，只有在一九五〇年初期西方帝国主义者杜勒斯和乔治·柯尔的口中笔下才能找到。

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学术工作者，四十年来，从来不以国土的分断与民族的离散为他们感情、道德和知识上的忧伤、羞辱和不安。四十年来，很多人从西方打折转贩各种知识和思想，夸夸乎议论于讲座庙堂之上，却从来没有人从国家分断的架构上，去思考台湾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民族和文化。四十年来，多少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浪得名利，却没有人想过，作为一个中国文艺创作者，站在中国千古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去向中，自己的作品，在民族统一之日，或民族统一之后百千年，是否尚能无愧地面对我民族优秀丰厚的传统。我们有很多评论家、传播工作者。四十年来，他们想过很多问题，报导过无数的现实，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开动他的想象力，想一想四十年国土和民族分裂，为我民族生活的各方面所造成的影响。

祖国的分裂、民族的离散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不以为怪，当然更不以为伤痛。每一个人似乎承认了国土和民族分裂的永久化与固定化的合理性。

在国家分裂和冷战构造下成长的，战后台湾社会和经济，回过头来加深了、固着了台湾与中国的分裂，从而在另一方面愈益

加深台湾对美日资本主义经济圈的深层依赖。这依赖又复回头加深了这“国家分裂—冷战—安全”的荒谬的结构。这种恶质的循环，恐怕是战后台湾“非民族化”、“反民族化”倾向在一定范围中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的原因亦未可知。

当然，在台湾特殊的战后构造中，持续生产与再生产的非民族、反民族倾向，应该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海峡两岸，严重缺少最有效地促成民族内部团结的、真正的民主主义。……（略—编者）海峡两岸，都必须摸索一个真正符合中国民族和人民真切需要的、广泛民众参与的民主主义架构，才能反省、批判和克服四十年来因世界两极对立—冷战—安全构造，所加于海峡两岸生活、思想、政治、社会和历史诸侧面的重大歪曲，进而能以明显的中国主体性，重新建设中国的民主化统一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五）反民族·非民族构造的反论

冷战史的学者，看出一九七九年后西方世界政治的右倾化，和美苏关系在全球范围中的紧张化，而有“第二次冷战”之论。有学者指出美苏双方在一九七九年之后显著强调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并且双方都强调为了对应敌方的攻击，必须加强自己的军备。一九七九年以来，美苏双方也显著增加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宣传。最后，美苏双方在各自的社会和阵营中对异议者的压迫，近八年来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对于这些“第二次冷战”论，有人持这样的反论：美苏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耗竭而破产。较诸第一次冷战，今日两大霸权之争，仅为对第三世界支配权的争夺。其次，美苏对立固然有升高的趋势，但是一九七九年前“低荡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双方紧急磋商、沟通和危机处理的架构仍然有

效。最后，美苏双方对内部异议分子的镇压程度，已远远不及第一次冷战时代。

但不论如何，四十年代展开的世界冷战构造，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时光，已经发生了许多质量上的变化。这变化，尤其在台湾海峡更为显著。美国第七舰队撤出海峡，“台湾决议案”的撤销，“中美协防条约”的随美国与中国建交而自然失效，“国府”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问题的“中国内政问题化”……都要求我们及早超克被四十年冷战政治和历史所内化的冷战心智，去面对中华民族长远而根本的课题，结束四十年来在外来势力所强加于我的冷战价值体制中，同民族间的敌视、疏隔、猜忌和仇恨，结束全民族优秀的英智和创意因国土和民族分断而受到扼杀与压抑；结束台湾与大陆的经济的分断，使两岸经济超越外力的干涉，重组中国自己的国民经济圈；结束同族之人成为异族，同国之人成为异国的，冷战史所强加于分裂国家的荒谬。

前文曾以不少的篇幅论及在战后“国家分裂—冷战—安全”体制下台湾“非民族化”、“反民族化”的构造，目的自然不在说明这“非民族化”、“反民族化”上部构造和物质基础间的合理性关系。恰好相反，当我们从事战后世界冷战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它的反论（antithesis）。因为，如果“国家分裂—冷战—安全”体制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那么，冷战构造在质量上的变化，将根本地有助于把被颠倒过的，再次颠倒过来。

对于台湾的劳动阶级，“国家分裂—冷战”结构，是四十年来劳工的团结、交涉和争议权始终不能实现的原因，也是台湾“专制下的成长”，即对劳动者的专政，压低工资，增加台湾战后资本的剩余和积累的根本构造。克服“分裂—冷战—安全”体制的运动中，台湾劳动人民无疑是主要的力量。

对于当前台湾民主化运动中巨大的底边构成，即城市（相对

性)贫民而言,“国家分裂—冷战—安全”体制和四十年来台湾的戒严、权威政治,当然有密切关系。“国家分裂—冷战—安全”体制的克服,将使任何执政者失去以国家安全做为限制和压制言论、思想、信仰,维持特权特惠阶级,独占权益的自由的口实,实现真正有民众基础的民主主义,从而达成真实的经济与社会民主,改善民众的生活。

对于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言,提出超克长期“国家分裂—冷战—安全”体制,是当前台湾知识分子、文化人和学生面对历史所不能躲避的责任。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思想、反省、批判、前瞻之所寄。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全局、全景去看问题、去思索、创作和批评,超越一时一地,一党一派之私,为民族在知识上、创造上寻求生动的出路,是知识人的严肃的、民族的、社会的责任。现在,全面在“国家分裂”的问题意识下,对分裂下的政治、文学、社会、历史、生活和感情,做出全面的思索、反省、批判,为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统一,摸索新而又活的道路,必将大大地开启我们在研究、思考和创作上极为生动活泼的创意和卓识。

对于在过去四十年间,依存于“国家分裂—冷战—安全”体制,在低工资、驯良的劳工、美国支持下与国府形成同盟关系台湾资产阶级,则有如下的问题:(一)世界冷战结构的质量上的变化;(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近年中的衰退,开始对包括台湾在内的“新兴东亚工业国”在体系中的分工位置有所排斥,并以政治干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律则,强迫削减和掠夺台湾的资本剩余(对台湾外汇和关税的干涉);随着岛内外企业环境的激烈变化,国府对民间资本“相对的自主”性,将因企业需要更灵活自由的经营空间而减少。另一方面,随着近年台湾相对性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台湾工人阶级将不会像过去四十年一样驯服地在戒严体制下受到另外四十年没有限制的剥削。这一切,都要求台湾的加

工出口贸易的资本家阶级，超越四十年来的冷战一国安体制，重新思考台湾资本主义对大陆国民经济的参与，探索台湾资本在台湾—大陆这一新的中国国民经济圈从事生产与再生产的可能性。

对于国民党而言，在最近备受赞扬的解严、民主化和改革的运动中，不妨也进一步思考超越“坚守”世界冷战构造中的“民主阵营”的可能性。在二十年代一度代表受到西欧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袭下的中国进步的诸势力的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结构中，逐渐丧失了它的进步性。在四十年“国家分裂—冷战”结构中，国民党体验过多少仰美日强权之鼻息的苦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和约”；在保卫钓鱼岛运动中，不能不与爱国学生的利益对立起来。四十年的冷战戒严体制，固然有助于巩固政权的安定，并在这安定中，完成了经济成长，却不能不付出把孙中山先生所揭橥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全盘虚构成化的代价。更为严重的，是四十年来，内容和形式都嫌粗疏的反共、恐共意识形态的教育，却造就了一个整个时代对中国传统、认同、历史和民族夸耀的冷漠，甚至在这全面“反民族”、“非民族”的倾向之上，滋长着肆无忌惮的反华和蔑华的运动。这无论如何应是国民党始料不及的嘲讽了。

（六）结 论

议论至此，所谓“台湾结”，其实是从四十年代后半期由美国霸权展开的亚太地区两极对立下“中国国家分裂—冷战—反共安全”体制的意识形态。它与一九五〇年以后，美国反对、封锁中国大陆的“韩国—台湾—菲律宾”这样一个对中国大陆围堵圈，有不可切割的关系。在这个围堵战略思想中，便包含着“台湾不属于中国”，“中国专制、黑暗、贫困、独裁”，“台湾繁荣、进步、自

由”，“保卫台湾即保卫自由”这些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基本概念。而在现实上，战后帝国主义与战后台湾分离运动的系谱上的关系，以及美国在五十年代展开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论与台湾分离运动的关系，不言自明。“台湾结”便是这样一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冷战意识形态在台湾的一个荒悚的回声和神经质的影子。

作为“台湾结”的反论的“中国结”，自然要求对右翼“民族主义”中的汉沙文主义、国家主义、国粹主义和传统主义做彻底的清算。作为上述“台湾结”之反论的“中国结”，首先要求从战后世界史的视野，凝视中国作为新生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来把握，从而对战后两极对立构造中“冷战—国家分断”这个外铄的架构和它的历史加以分析、追查和批判，从而建立中国民众自己的主体性，又从而在中国民众的民主主义这个基础上，摸索国土和民族统一的道路。因此，在“国家/民族分裂”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课题，应是民主主义的确立与民族的统一两个问题，并且应该善于把民主主义与民族统一同时并举起来思索。没有民众真正当家做主的民主主义做前提，任何统一的理论和方略，无非虚论妄议吧。而在当前“国家/民族分裂”的历史时期中，离开了民族统一来议论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民族长远的历史看来，也无非是空虚的论说了。

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

本文是陈映真先生在一九八七年五月访港期间，应“香港大学学生会中国事务小组”、《中大学生报》、“树仁学院学生会国是学会”及“当代中国学会”之邀，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香港大学丽松讲堂演讲及问答记录。

各位在香港的朋友、同胞，虽然已不是第一次，但面对着你们，我的心情还是难免激动，因为我半辈子生活在台湾，很少有机会见到台湾以外中国另外一些土地上的同胞。这几天我在香港走了一下，觉得特别就这里的人，或者年轻的学生来说，只要不开口，跟我们台湾的都很相像，可一开口我就听不懂，所以我觉得很亲。今天我十分荣幸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再次跟大家见面，与你们交换意见。

根据报纸上说，我是要来谈“民生生活和社会参与”的，但因为彼此的联系不够，在讲题的联系上没有做好。虽然这样导致今天的题目可能有些改变，不过我的基本主题相信还是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主办单位要我说的话。如果容许黑板上的题目有一个副题的话，它应该是“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

为什么谈传播呢？我自己的专业并不是传播，只不过这两年

来我在台湾办了一本《人间》杂志，深刻或者用“皮肤”去感觉传播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想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会就下面几个部分讲一讲。第一是作为大企业的大众传播；第二是媒介的商品性和它引伸出来的问题；第三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媒体；第四是媒体和意识形态的强制；第五是思考所谓“民众的传播”，就是让我们来想一想可不可能有一种民众的传播；然后从我这一两年来搞《人间》杂志的体验报告一些心得；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来谈谈新生代的香港人该做什么。

作为大企业的大众传播

我所知道的大众传播，不管是台湾内部的大报纸，像《中国时报》、《联合报》，还是国际通讯社、跨国资讯工业，它们的“巨大”，我们都很能够理解。不过我一直等到我自己办《人间》杂志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大的程度有多惊人。那大的程度，就是《人间》杂志所有的预算乘以一亿或两亿。

现代的大众传播必须要有非常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如电讯、卫星设备、发射台、巨型印刷机等，此外，整个制作过程所牵涉各式各样的人才、人员、编辑、记者，以至如果是大通讯社的话，它全世界员工的住宅及其他经费，都很庞大。

我曾经遇见过美国非常有名的画刊杂志——《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的人。他为了要做一个题目到台湾来，一搞就是半年，前两个月根本不用工作，只找朋友聊天，喝啤酒。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搞，他说要先进入情况，先在心里创造和台湾合拍的心情，于是两个月里住在饭店，吃、住、随便请朋友喝酒，全由公司付款。

我估计，他做一个题目的费用便可以让我们起码做三至四期。

这里，若撇除非必要的浪费与低效率情况，在一般西方资本主义好的管理之下，大众传播的“品质”可以“翻译”成金钱——就是钱愈多，品质愈好。《人间》杂志所活动的范围只是台湾，由于经费的限制，我们还不敢跑得太远，总在台北附近溜，就算了，便是到附近，待的时间也不能太多，因为人派出去要食要住，要工作要底片，这些都是钱。有了《人间》的经验，我们更能了解大众传播在金钱上的意义。如果我们的记者能够为一个题目住在一个地方几个月，那拍出来的照片保证不一样。而有些题材，你一定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出好东西。

大众传播由于代表着金钱资本技术的巨大性，它先天地占有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个人对它们不服气也无法对抗，比如你觉得西方通讯社以白人中心，你不服气，难道你能自己弄一个来跟它拼吗？这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钱，才能掌握这样一种意见上、价值思想上的重要武器。

另一个问题，大众传播是单向的，大众传播的“产品”就像多数资本主义商品一样，由大公司研究企划部门精密设计，再由分工细致的生产部门生产，经过包装、宣传、营销零散地卖给个别消费者。资讯要怎样传达出去？怎样“剪接”？通过怎样的制作过程？它的目标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效果？产品本身有什么缺点？对人有什么坏处？传媒的企划部门都非常清楚，但我们作为受众，对此只有接受的份儿，完全没有批评的能力。

我觉得，当大众传播作为一个企业而巨大的程度如此惊人，又是那么单向时，问题已经不在反不反对资本主义或者反不反对大企业，而是要保卫我们对资讯、常识、知识和这个世界理解的权利。这是我办《人间》杂志的一种深刻体会。

媒介的商品性和它引伸出来的问题

另一点我体会到的便是，大众传播并非一大群热心传播的人开几个频道或办几个杂志、报纸让你们看那么简单，实质上，它背后有一个很坚强、巨大的商业动机。而大众传播的“商品性”又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媒体本身的商品性，一本杂志卖得愈多，它的单位成本便愈低，而商品价钱愈高；二是大众传播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功能，就是里面可以做广告，发行量愈大的媒体，它每个单位的广告价钱愈高。传媒具有这两方面的商品性，它所引伸出来的各种限制，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每个媒体都希望发行量大，因为这样可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可是当所有媒体都追求高的阅读率时，就会对产品的品质造成一定影响。

这个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台湾有一个非常杰出、优秀的编辑人高信疆，他对台湾的副刊文化有很大的贡献。他把报屁股的、可有可无、消遣的副刊变成一个思想、文化、艺术、文学或者是学术的刊物，吸引了当时岛内外优秀的年轻作家、文化工作者、学院工作者投稿，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读者。可以说，高信疆的《人间》副刊促进了《中国时报》的成长。这些读者再把副刊介绍出去，报纸的销量更加大大地增加。

可是，当这个增长程度超过某个限度时，发行量本身又会回过头来制约、限制这个副刊品质的成长。

但是，只有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兴趣比较高，他们以外的更大部分人口对此不太感兴趣，而老板永远希望网罗更广大的读者群，这时广告部便要向编辑施压了。这样一搞，编辑不得不让步，而报纸的副刊便发生一种犹豫的现象，文不文、武不武、高尚不高

尚、通俗又不通俗的，两面不讨好。所以，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媒体追求大的发行量，一定会带来产品品质的下降。

这在逻辑上有一个矛盾。你可以问，为什么认为群众就没有文化。我不是说因为群众没有文化，所以发行量增加时产品品质就非下降不可。但客观上，这个社会的确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精致的文化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大部分人长期做着简单地重复、不能使人进步的工作；而管理、设计的人，只占少数。后者会“进步”，会看到“全面”，会懂得分析；但前者一大部分人就是拿薪水、回家，这样过一辈子。他们没有办法享受更精致的文化或者更深刻的文化趣味。这种情况，是一个很复杂的循环做出来的。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杂志或媒体向下走，为了追求量，它非降低品质不可。

大众传播希望增加受众，还有广告的考虑。一份销量一百万份的报纸，可使广告公司的人乖乖排队，身携现款还要说拜托你，为的只是要买你一个版面；但一份只能卖出三四万份的刊物，你开个低价，别人还要你打个两折，有时理都不理，他们重视前者，因为产品在那里登广告，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的对象，这是商品化的必然过程。本来这样也无所谓，人家做生意嘛。但最重要的，是这对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有什么影响呢？第一点，就算在言论再自由的国家，美国吧、日本吧，对企业的批判十分困难。你可以骂政府，可以骂中曾根康弘，你甚至可以骂“亲爱的”里根总统，可是当你骂到一个企业的时候，编辑部会发抖。为什么？因为大的企业在大众传播广告中占一个很大很大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媒体的最大收入是广告，他们是不愿意得罪广告商的。所以，企业其实对言论、对编辑方针有很大的干涉。

第二点是企业对媒体内容的要求。这点是我比较有亲身体会

的。像我有这种背景的人能在台湾自己办一本这样的杂志，我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办到现在，真正自觉的压力，还不算是来自警备总部、政府、或者是我们贵党——国民党，而是来自商业。

我们有四个客户主任在跑广告，很多公司的有关部门人员都喜欢《人间》这本杂志，想尽办法向老板说，这杂志声望很好呀，销量有三四万份呀。若遇上懒惰的老板，他可能说好吧，给他一两次吧。但若是认真的老板，他把杂志一翻，便会皱眉头，说：“怎么黑嘛嘛的！一个房子卖两三百万，把广告插在里面，不适合吧。”这算是客气的了，下面的职员便不敢说话了。万一题材用大陆的说法是比较尖锐，我们台湾的说法是比较敏感的话，那就很麻烦。

我们有一个现成的经验，就是最近一期刊登了有关五十年代“二·二八”事件的“民众史”，里面提到在政治肃清中被杀死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有些人说“二·二八”是中国人杀害台湾人，我们觉得好像不是这样，便查访了一些当时的人。这东西出来以后，我自己心里就蛮嘀咕的，想这一期一定禁，非禁不可！可就是没禁。警备总部还只间接地挂电话给台北市政府的新闻科，叫他们打电话给我，新闻科打来，说警备总部要我下回最好不要登这样的文章。是最好不要登，不是绝对不能登（他说最好，我当然是觉得不好意思再登了）。

但这样的情况，广告客户反而直接表示：“你们怎能登这个，太尖锐了！”然后就要再多看两期，意思就是要留“校”察看，待我们有了改正才肯登。所以，实际上企业的自动制约也很严重。一本杂志若太尖锐，企业本身就算没有受警备总部命令，自己也会觉得不好，它们怕在这种杂志登广告会被理解为表示支持，那可不得了。引起这样的误会，毫无必要。至于更直接而浅显的例子

便是，假如我们的杂志批评污染，那些拼命在污染的工厂，又怎么会在这杂志上登广告呢？

以上所说的，第一是企业批判远比政治和社会批判还要困难，第二是企业对媒体内容的要求，这些都反映企业对媒体的干涉，也就是媒体商品化所带来的一些具体问题。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媒体

以下让我们来谈：作为社会控制的媒体。

媒体不是一种看完后丢了就算，对这个社会无甚影响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直接、间接的、非常精致的社会控制。这个问题，最近也引起传播学界的关怀。

我们这个商业社会最大的特点，是生产方式和科技的改变。今天人类的生产方式，已经使大量生产成为可能。由于我们已经能够在量上生产远远超乎人类自然需要的产品，所以今天开工厂的人不会像《旧约》或《新约》内描写的那些财主一样，看到满仓库的财宝便很快乐，很感谢主。他们必须把货销售出去，才能赚钱，然后再投资再生产赚更多钱。这样大量的生产，必须配合以大量的销售。

但大量销售怎样能够办到呢？生产者为了促进大众消费，必须透过各种行销（marketing）、管理（management）、以至广告促销等方式，来制造、操纵或强制地加给我们一种新的需要。这种需要是超乎人类自然生理所需的，番话叫做“forced want”或者是“manunpulated”。

这带来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就是欲望的解放。在人类很长久的时期里，在各个不同的民族里，欲望是某种必须节制的东西，是一种羞耻。这不只是中国的儒家，各个宗教各个民族的传统相

应于它们的生产力就有这样的道德，他们总觉得欲望是个很危险、很可怕的东西，甚至有时候控制不好，它会使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颠覆，或者说得严重些，在宗教上会落下地狱，永远不能超生。可是面临着我们这样的时代，这种道德和价值观念便崩解了。换句话说，人在地球上有物质和义理限制这种基本的道德、信念或思想，在大众消费的时代里崩溃了。人类从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认为欲望是光荣的、正当的、是有能力的代号；享受也是光荣的、有办法、有能力的代号。

我这样说好像是老夫子在说教，叫大家不要享受，其实不是这样。我只比较来说，认为人类从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广泛、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崇拜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就是“需要”，就是在欲望的满足和饥饿之间循环过掉一生。人类过去总还有一个时期会想想问题，还想想这事情该不该做，这个钱该不该拿，或者人跟天的问题，动不动就说这没有天理。但现在已经没有了。人变化了，出现社会学所讲的“消费人”的登场。那是一种新的人种，他们的生命目标为的是消费，他们的向度（dimensions）愈来愈少，失去爱、恨、抗议、愤怒也失去了流眼泪、同情别人或革命的能力。

为什么要提及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所有这些都与现代媒体有巨大的关系。

我们的电影、电视，与广告业都在形构一种虚幻的人生。他们从有钱人、有消费能力的人，以及健康、漂亮、英俊、幸福的人的立场，去描绘这个世界。例如台湾的电视剧，明明角色是个公司小职员，但他的客厅总有我的三倍大，后面还有一个木做的楼梯，像“飘”那个电影一样，好过瘾啊。然后先生一定是英俊得不得了，太太一定是娇滴滴的，小孩则可以在院子里摘下无数的苹果。那人电话拿起来一开口就是两三百万，好像两三百万就

是现实一样。

广告片呢，现在愈做愈好，抽开背后的意义，我还蛮欣赏的。例如洗发精，我们过去看的广告总是一个女孩把头发一甩，慢动作，然后告诉你那洗发精有多好等等，渐渐便老套了。可是最近看到的一个就不一样，它的包装不同，卖的是一种情调。那广告的对象是少女，所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少女在发呆，然后老师走到她面前，她觉得老师来了，就留心，这是每个人都很熟悉的。然后她就打电话，不晓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不把电话挂上去，由它吊在那里就跑掉了。她跟一个男孩讲话讲得很生气，啪的一声便一个耳光摔过去。一会又偷偷的在看情书，甜甜蜜蜜地笑。最后才一个产品大特写，告诉你这一种洗发精是“我们的”，是“我们这个年纪的”，跟妈妈用的不一样。于是这种产品好卖到不得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就这样产生。

电视不断重复宣传，改造的力量就非常大。生活变成每天看电视，我们的小孩，更是这样，因为爸爸妈妈都忙着赚钱去了，而且把门锁起来，没事做唯有每天与电视见面。他们冷冷的对着屏幕，变得非常被动，有新奇的他眼睛亮一下，到第二次出现时又失去兴趣了。在这样被动的人生里，小孩从小就看见各式各样小朋友的广告，他们太早了解这个世界有很多商品是可以拥有的，太早了解有一种叫做“钱”的东西可以换到他所欲望的。他们从小就被塑造成一大批消费人的预备军。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琼瑶的那类小说盛行不衰？为什么那么多人关心股票消息？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跑马的消息有兴趣？为什么明星恋爱、结婚、离婚、再婚、同居的故事，永远引起人们不会疲倦的关注？为什么？如果只是这样还好，可是办《人间》的经验告诉我，别的消息就不能受到同样的对待。例如污染，若香港第一次发生污染，报纸也可能只给你半版或四分之一版来刊登

消息，第二次再发生他要先去看看，看完说：“跟上次一样嘛，不报导。”到下次告诉他们又有污染了，很严重，还有人受伤呢，它们给你报导，再下次可能就要有人死才肯报导，然后又要死亡人数多才肯报导。所有这种社会底层的问题，他们都没有什么兴趣，最多只有一次被发表的机会。媒体有兴趣的，是苦难的商品价值，若遇上意外中有人快断气，那就得赶快拍下来，这样报社一定会登，标题还要强调这是断气前四秒钟的照片，报社会给你奖金。因为只重视资讯的商品价值，他们已经对这种事情失去同情。我认为这问题是挺严重的。

美国三十年代有很多进步的报导摄影工作者，他们大多为逃避希特勒的控制，像许多科学家一样，由欧洲逃到美国，产生了像《生活》杂志（Life）那样的集团，聪明的罗斯福总统还利用他们去采访民间疾苦，例如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农村问题，好向政府汇报，于是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报导摄影者。日本也是一样，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这个进步的年代里，在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这旗帜下集结起来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跑去搞报导摄影，像我的朋友三留理男、高桥章三和樋口健二等，全属“安保时代”。那个时期，有志于摄影的日本青年十个有八个想投入报导摄影的行列，但一九七〇年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这个比率颠倒过来，搞摄影的十个只有两个愿意继续参与报导摄影，其他八个都希望投入商界。报导摄影在日本及西方正在步向死亡。

所以，《人间》杂志出现后，引起了一些外国人特别深的感触。有些日本人甚至说要反输入，因为日本向台输出很多东西，但像《人间》这样的杂志，他们现在却反而没有。他们很热心地一有机会便到处介绍《人间》，向国人说：“你们看看，台湾竟有这样的杂志，你们能相信吗？我们日本人丢脸死了。”真的，这不是广告。

问题是，我们常常以为，在某些国家，媒体是自由的，言论

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它有其客观的运作规律。例如在美国和日本，现在已经没有人看报导摄影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经没有问题？恰恰相反，他们的问题不断增加，不断复杂化，但因为没有人看，已经引不起媒体的关心。很多富裕了的社会的人，已经不愿意看那些问题。他们想，空气污染有什么问题，把门一关开动空调不就好了吗。只要问题不在他们的后院，什么事情都好办。他们对富裕发展底层人的被害、自然的被害不关心，致使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及《产经新闻》等这样“先进”的媒体都对那些问题失去兴趣。这样就产生了很大、很值得深刻反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媒体或者报纸看成是公器的话，它们是否适当地扮演这种角色，是很值得检讨的。在没有戒严法，没有出版法的条件下传媒还表现如此，这问题才是严重的。因为传媒和读者再无处可投诉和埋怨，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登，不愿意看某些消息的。

在过往以出版大部头书出名、以读书风气扬名的日本，如今比较严肃的杂志如《世界》、《中央公论》、《改造》已经没有人看，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揭露丑闻的偷窥的杂志，如《Focus》、《Friday》等，另外大行其道的是漫画。大学生从前走在校园还会在腋下夹两本马克思、托洛茨基的书，以示进步，这个还蛮不错嘛。可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他们看的是告诉你可到什么地方打网球、怎样可把皮肤晒成棕色，好跟同学谈，有什么地方可与男、女朋友去怎么样一下子而又不被人发觉的杂志。

这就是媒体的社会控制，是媒体对于物质富裕化后社会精神贫困化所起的巨大作用。这点是很值得我们再思考的。

媒体不断在告诉我们，巴黎现在流行什么东西，什么地方又发明了什么东西，有什么新车出产了，新屋要出售了。它在创造一个“强迫”性、制度化的消费体制上帮了大忙。它虽然没有用

枪指着我们，但在精神意识上，这无疑也是一种强迫消费。在媒体推广的各种商品的包围中，我们很难不受引诱。所以，我常常说，媒体作为一种甜美的社会控制，比十个警备总部还有效，而且不会引起任何埋怨。

媒体和意识形态的强制

第四个部分让我们来谈：媒体对意识形态的强制。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谈，首先是报纸集团或者是杂志集团的意识形态。例如我们说那个报纸是比较进步的，那个是比较保守的，那个是国民党的，那个是某方面的等等，这是报纸集团在价值、政治和文化上采取的立场，每个报系都会透过其有力量、有效率的方式来推销、传播它的思想、意识形态，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强大的影响，这个我不必细说。另外一个方面对我们亚洲人，或者其他弱小国家有切身关系的，则是强国或者是强势的民族媒体对弱势国家、弱势民族的影响。

我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常常想起一个小时候的经验，觉得很难过，或者可笑，那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看西部电影。我们那时候的西部电影可好看，现在的电影还斯斯文文的演一段时间才开拳打架，我们的不是，我们的银幕一出来就是火车一直在走，人在火车箱顶上互相追逐，精彩得不得了，然后就开打，然后字幕完后，那个英雄就跑到一个小小的镇上来，镇上人知道他要来复仇，所以鸦雀无声，只剩西部的风在狂啸，笼子和纸张到处飞，那个瘦瘦的、很帅的西部武打明星在落日的小街上走，走着走着，只有脚步声，突然他目不转瞬地，把枪一拔，往上一摔，一个人就掉下来，你看过不过瘾！就是有人暗算他，他眼睛一霎就知道，枪又快，“啪”，就下来了，然后走几步，“啪”，又下来了。

总是有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很好心的骑兵，很虔诚的相信基督，然后在一次任务中捡到一个红番的小孩子，这个人是那样的正直、蛮有爱心和敬畏上帝，以至于把这个红番小孩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养大。可是凑巧引起很大的误会，原来这是个数代单传某个族的酋长的儿子，这个民族找了很久很久后，在这个白人家中找到这小孩，于是全族来把这白人围起来，危机就在旦夕，那个善良、美丽的白人就跪下来祷告，希望上帝给他一个奇迹。我们小朋友都很紧张，认为这好人受到误会，可能快要被乱箭射死了。就在这时候天边一声清脆的号角，一看，哗，满山满谷的白人骑兵队来了，我们的小朋友干吗？全场掌声雷动，觉得好人来了，不得了，坏人可倒霉了。然后接着就不用说了，那轮盘式的机关枪一扫，所有红番们一一栽下来，血流成河。我们的小朋友又一次鼓掌。

这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一个小的事情，可是在东方黄色脸孔的小孩，很小便因为这个电影认为白人是了不起的，是好的，是敬畏上帝的，是美的、漂亮的，那红番就是丑恶的、凶恶的、野蛮的、食小孩子的、杀好人的——建立了这样的观念。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提醒我们去想想：当我们的资讯系统完全掌握在一些强国或者是强势民族手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担心？我们把理解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解释权交给少数的强势国家和民族。在台湾来说，我们总是搞不清楚那些各个地方的内战，什么反叛军，一时又反抗军，搞了半天都没搞清楚，于是相信那个跟美国亲近的就是好人，那个跟美国作对的就不是好人，像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我们可能对我们的社区，台湾小小的地区，例如鹿港发生什么事情，不甚了然；杜邦事件也不怎么了解，可是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亲爱的里根总统”歪着脖子跟我们讲一大堆道理，解释他为什么不跟苏联达成限武的协议，然后我们又很了解

在维吉尼亚州某个乡村里的老太太很喜欢收养小猫，现在已经有五十九只，最近又收养了三只。这些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很少看见蒋经国“总统”，里根一出来，小朋友却都知道，就好像里根是我们的总统一样。像这样的情形是挺严重的，我相信这种情形不只台湾如此，全世界很多弱势民族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从小就从各种频道接受了这种以白人中心，以强势国家或者民族为中心传播出来的各种价值观念，渐渐便有人提出不要做中国人，要做国际人的问题来了。

总而言之，强势民族将他们强者的形象及世界观、生活方式、伦理观、审美标准传播开去，令弱者也迫得要去适应。这不只是理论问题，我个人在采访的时候就深深的感觉到我们台湾的少数民族也面临这个问题。你不晓得他们原来的歌声有多么嘹亮，多么美啊，可是现在他们以唱那种歌为羞耻。他们唱什么？他们唱我们平地人编写的，烂得不得了的歌，什么“浪花的手啊，破碎的脸啊”，文学都不通的歌，他拼命一定要唱那个给你听，自己原来那种嘹亮、开阔、美的歌曲他们不要了，以至于价值都混乱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受到强者支配的情况，恰恰可以在台湾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汉人跟少数民族的关系中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也看我们的杂志，读我们的书，知道兴安岭在哪里，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几个民族，不知道自己的语言，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此外，世界两极对立下的传播，也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为了宣传两个体制的优越性，双方会在传播的内容上有所歪曲，例如从说谎的方式夸大各自的优越性、积极性，其他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侵略和反侵略的问题，两个体制也因为各自的立场不一样而有不同的报导，这就让夹在中间的我们这些小国家无所适从，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事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都不了然。两极体制对科技工作、对经济、分配、生产，

以至教育、文化、思想的问题都起着很广泛的作用，其中传播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民众传播可能性的思考

跟着，让我来讲讲我对“民众传播”可能性的思考。第一，我想我认为民众要介入作为大企业的大众传播是不可能的。前不久我们台湾搞过“另一种电影”，主要是觉得电影界拍出很多烂片。很多有才气的、有创意的人却没有机会拍片，所以提出这个概念。电影是一种工业，不像我们穷小说家，买两刀稿纸、四枝原子笔到底没多少钱，我写了你不发表拉倒，我放抽屉里。拍电影是台币八百万、一千多万的事情，哪个有钱的人会走过来对你说：“你非常有才气，我拿一千两百万给你玩玩吧。”当他给你一千几百万玩玩的时候，他看见剧本一定皱眉头，要求你加个钟楚红什么的，因为他就算不赚钱，最少不希望亏本，就是亏也不能亏得太多。所以只有离开这个原来的资本主义电影逻辑，才有生路。因此我们就主张，是不是在录摄机愈来愈便宜，机器愈来愈好，效能越来越好的时候，有理想的人可以以此来搞一些记录的东西，或者以电影机来拍短片和发展动画，这些都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有才气的人可以走的路。如果你巴巴的请邵氏给你一个机会，大概没有什么希望了。

前面我已提过很多大众媒体的问题，里面存在着蛮强大的矛盾，那都是我们难以解决的。商业社会里的媒体，恰恰好是我这种小百姓一份一份给它买，买成一个大媒体的，可是这个媒体却反过来背叛了我们，不站在我们的利益立场上，不为我们的好处说话，不为我们着想。这个问题就挺严重了。这个矛盾就像世界上一切的矛盾一样，理论上说一个政权是人民的公意所托付的，

可是它成长起来后就跟你蛮不讲理，你拿它没有一点办法。大众媒体也是一样，你毫无办法。

第二个我想提出的是民众的机会在哪里？我认为，我们的机会在于创作好的、重要的东西。我不晓得怎样说这一点，主要是当所有大媒体对我们很傲慢，置之不理的时候，若要引起它的关心和注意，我们就要认真的想，认真的提问题，谈问题。如果是创作，要创作最好的小说、戏剧或者舞蹈，使他们无法忽视你。因为从市场价值来说，只要你形成有分量、够重要的组合，记者一定会来找你。《人间》杂志就有这种经验，有些题目他们没有找到，便态度也很傲慢地要求转载，但转载时又不提《人间》杂志，或只说某杂志，这个很伤脑筋。让你报导也没关系，但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希望搭你的便车，让更多人知道有一本《人间》杂志，对这个故事有所交代。它不，理由还很冠冕堂皇：为免图利他人，助他人广告之嫌，可它根本是剽窃别人的成果嘛。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是全没机会的。民众是分散的，关键就是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就一个小的题目，在短暂的过程中团结起来，做好事情。大媒体因为大就傲慢、懒惰，我们应该不一样。我们要做出好的，有创意的事情，使他们无法忽略。

第三，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媒体，那当然是小型的。虽然刚刚讲的是在巨大媒体下的绝望性，可是小媒体还是可以在媒体结构上所谓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tructure）里找机会，形成一个专业的，好的，品质令人信赖的小型媒体。那么这就比没有要好很多。当这个初步的团结形成以后，它本身还会发展，所以这是个机会。但条件是我们要把小的媒体，例如杂志办好，别人为分广告而办，可我们不是，我们是有话要说，这样，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主动、领导的性格，清楚自己要怎样带领一些人往某边走，另一方面也必须像现代商人一样，对现代的市场有所了解，对流通

一定要有了解。杂志一定要办得好，而且里面常常要有最优秀的、关心的读书人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写得那么好，写得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它的图片是那么生动，然后慢慢有计划的在四五期、五六期里面，一期一期把声望打上去。我们一般办小杂志是凑着凑着，这期不错，有四篇文章，上吧，下一期缺一篇，怎么办？抄一段吧，或者到大陆偏僻的地方拿一篇充数，但这样的话，品质就会下降。你要像一个船长一样，你知道你要去的方向，知道你的航行日记，几月几日要到什么地方。

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小众传播或者小的居民运动团体应该工作到让它的重要性引起国际注意。我这样说不是挟洋自重，而是许多问题，例如生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童工等问题，也许我们这个社会真是这样的迟钝，或者还没有先进到了解这些问题，你与其他国家关心同样问题的团体取得联系，经过他们肯定，从国际传播回来，在某些洋奴买办的社会，这样还挺有效的，也是个途径。至于在一个比较上轨道的国家，应该用好的工作争取一些国家或社会提供的条件，但不要乱用这些条件。

第四，对传播的批判也很重要，应该有些知识分子来谈一谈最近的电视节目，最近报导的方式，教育人民传播有什么问题。香港我不知道，在台湾，对传播的反省和批判很少。在日本和美国，有一群人专门在注意媒体传播的讯息，分析传播对社会、对人的影响。

最后一个是比较安慰的话，但也是事实：不要忽略小。世界上流传的东西往往是小的东西，例如《新青年》杂志吧，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那样大，可是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留下来了。往往就是很多小的运动，小的杂志，在我们的历史、艺术史里面留下来的。所以，不要因为它大，自己小，就觉得自己没办法，就冷嘲热讽地

去大报去上班，然后回来喝啤酒又消遣两句，这个是比较不积极。

《人间》的经验

接着我来介绍一下《人间》杂志。首先，它是一个用文字和图片从事报道、记录、发现和批判的、反省的杂志；第二，它的宗旨是从弱小者的立场看台湾的人、生命、生活、自然和世界；第三，它是希望对台湾二十多年来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化或者是富裕化提出反省的思考和批评，想想我们究竟为这现代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有好多人对我说：你好像很关心社会底层的人，但你们的杂志那么豪华，不是很矛盾吗？这是革命青年最喜欢问的问题。我在台湾每次听到这个问题都很高兴，因为这种批评虽然是骂我的，但在台湾挺难得听到。在这里我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不晓得这是个怎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总觉得应该有先进的、进步的中产阶级，其他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当我们的学生还是只重享受、玩乐，国家事管他娘的时候，其他的问题就动不起来。所以必须要有开明的、先进的、自由化的中产阶级，社会改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有希望。

另一个我感受到的，是编辑自主性和商业社会规律结合的问题。在台湾，唯管理论十分流行，像我初搞《人间》杂志，很多人就说：“这个家伙无可救药了，人是不错，但一定失败。现在给钱支持他是没有用的，等他垮了才帮助他吧。”他们连我的后事都办好了，因为他们觉得有理想的人总是不懂得管理。在这个商业社会里，人们动辄就讲行销、管理，他们把管理看成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哪有这种事？管理甚至不是一种知识嘛，也不是一种科学，只是生财有道、量人为出那么一回事而已。文化生产和再生

产的工作者，一方面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一个商品的出版物流通的整个过程与机制，可是也一定要保存一个文化生产者的自主性，他到底要对这个时代说什么，做什么。许多人却将这两样东西对立起来，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只要是讲理想的就是混蛋、傻瓜，注定要卖房子，到时候要捐钱助他的那种人；另一方面又有些人认为只有傻瓜、混蛋、过时的人才会做没有市场价值的事情，现在搞文化也是搞行销、管理而已，这两个偏向一定要纠正过来。其实是我们自己将两样东西对立起来的，事实上它是可以很好地结合。根据《人间》杂志的经验，至少直到目前为止我还能比较谦虚地说这想法是对的，以后就不知道。

此外，《人间》杂志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现场给我们工作者和编辑的教育。有很多人误认为陈某人是很有爱心、特别关心社会、动不动就流眼泪的一个人，他在大家都没有爱心的时候把爱心当饼干一样到处发，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和我的同事受我们所采访的题材和对象的教育很大。是他们教育我们怎样爱，怎样关心，怎样去面对人的生命的尊严。而不是我们像耶稣在山上把饼跟鱼一样到处分，不是。是他们分给我们，而且分得富足有余。我不能记述我们采访工作的经验给了我们多么多么大的、多么多么丰富的教育和启示。我想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这真是一生难忘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职员薪金非常少，可是他们不愿意走。有很多现在在台湾是金字招牌的某某杂志，他们的记者两三个月就不想做，想要过来《人间》。这可以看到，这个年头找寻意义重于金钱报酬的年轻人还是有的，这使我们很快乐。

我们在采访中受到教育的例子很多，我举一个有关雏妓的吧。台湾的雏妓，很多在思想和身体上都未曾成熟，却已要过着那么暗无天日的生活，这样的悲剧引起我们的关心。为了采访的方便，

我们杂志派了一个女同事去。她回来以后，照例告诉我她采访的收获，与我商量商量要怎么样写。当时我已经很忙，就一边工作，叫她一边告诉我。她开始讲了，我没有看她，只耳朵在听，但突然间，她停了，我觉得奇怪，抬头望望，啊，她在哭！我就假装不知道，没有说话，我知道这哭对她非常重要。再过一会儿她还很激动，但却继续说：“到现在还不能忘记那些女孩子，我感谢她们。”我问为什么感谢她们，她说：“我听着她们的故事，总觉得那些女孩子随时可以跟我拍桌子，把茶泼到我脸上，问：同样是女孩子，凭什么我比她们幸福，而且坐在这里让她们的把故事讲给我听。可是她们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还那么亲切、那么信赖我，把她们心灵最大的痛苦告诉我。”她说她采访时与女孩子们一起哭，她说经过今次的采访，觉得自己是真正的长大了。

另一个是汤英伸的例子。我们一直很关心这位山地青年被判死刑的事，可是等到最后高院判下来的是死刑的时候，我们负责采访这件事的年轻记者已经不只是同情，而是有点悲愤，他甚至怀疑我们把事情报导出来，使他们判这样的严刑。后来我们尽最后力量再展开营救，在短短几天里起起落落的，一会儿觉得有希望，一会儿又觉得没有希望，然后又有，最后还是收到叫赶去领尸首的电话，于是我们陪汤老先生奔走汤英伸的身后事。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记者变化很大，对这件事又悲伤、又愤怒不平。

然后我们又与死者家属陪着已成骨灰的汤英伸上山，参加了他们整个曹族为死者办的一个仪式。经过这事，我们的记者再有了变化。他回来后跟我联络，问我要怎样写。我问他自己觉得呢，他说，他本来是要写什么什么什么，他找谁签名时他不答应，然后这是一个司法上的什么问题，本来要找很多资料去“打仗”、去“攻击”的，使他最后在那个曹族的部落内看到他们的葬礼后，觉得已经可以超越所有的恨和不平，因为他看到整个民族那样庄

严地面对这悲伤。他说写这个已经够了。

于是我说：“好，你能够这样想我就放心，不是因为怕警备总部来找麻烦，而是我本来就这样想。如果我叫你这样做，你可能就很不愿意，你会觉得，这个老板怎么样搞的，这个事情明明这样，你坐在办公室不了解却这么吩咐，不是妥协的修正主义了嘛。可是既然你自己这样想，那很好。时间紧迫，你用日记体写吧。”像这种事情，得益最大的是他自己。

所以，我要在这里说的是，事实上，并非我们在付出、奉献啊那么伟大，而是社会给我们的多。什么时候给我们多呢？是在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在办公室、在教室、在漂亮的讲堂内大概没有什么收获。因此，我对于青年的朋友们有一个感想就是：不要把教室只当作是建筑物内的东西，听台湾来的这么一个人在台上胡说八道，是没有什么用的。香港是这样小，我建议大家寒暑假去地下铁走一走，去什么地方住一段时间，跟某些人接触，带着问题去，晚上一起讨论，或者带着问题回来问老师，自己找资料，这样的教育，恐怕会生动活泼得多。而且老师也不限于坐在这里的人，往往在台上的人十个有九个半是混蛋，包括我在内，所以应该去找那些小师傅啊，或者是贫民窟里面的老百姓，他们往往会给你很深很深的启发，这是我们《人间》杂志工作的一点经验，贡献给大家。你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跟社会有接触，对这个社会比较有认识后，也许才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什么专业，读什么对香港社会较有帮助，而不像过去那样，想着医生赚钱比较多，工程师也不错啊，建筑师也不错，就依此作决定。

给香港新一代的建议

最后，对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把认识香港作为知识的开端。在面临着一九九七的问题时，我建议从香港的殖民地历史搞起，当时这个历史是怎么回事，然后香港社会的变化，社会史的研究。例如香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香港文学史的研究，以至不同阶段的香港人民，香港社会的阶级分化等，都可以搞搞嘛。因为香港有其殖民地历史，你们或者会把眼光放在更远的地方——要到美国、英国去学习，但我想，从认识香港起头，可为你们的知识生活和文化生活取得更扎实的土地。

第二点，在这个整理的总结里面，我们应该做一点反省和批评：香港的知识分子过去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足？多少年来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什么？在此面临一九九七之际，与其坐在那里埋怨、惶恐、巴结、奔走而没有更积极的作为，不如在这样的研究里取得自主性和自己定位的认同，如此工作起来，恐怕才比较有力气。

最后一个建议是要注意创造和发展。香港知识分子对台湾有很高的评价，我觉得很光荣。可是我觉得台湾有些问题，是与经济相关连的。台湾的经济是拼凑的工作比较多，例如机器进口后由我们做个铁皮便变成汽车。在知识生活上，我们也有相似的地方。外国有存在主义，我们也把它拿来过过场，然后外国有个什么玩意，我们又把它拿来过过场，哗啦哗啦的，热闹得不得了，但它根本没有坐台。我们没有把这个东西与台湾的具体现实联系起来思考，写出来的论文、文章也是读几本书拼拼凑凑的，还冠冕堂皇。我就干过这种事，例如《剧场》，过去的《笔汇》，甚至还没有读懂的论文都翻译得很过瘾，译完后还觉得自己好像有所进步。这种事情应该停止。这里我不是为谁作宣传，但我最近看到大陆一些比较着重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管水平怎么样，压力有多大，“自制率”是蛮高的。《人间》杂志勉强说也是“自

制率”比较高的，例如照片都是我们自己拍的，很多文章都是我们自己去采访得来的，而不是抄书本、抄理论。在香港，个别的优秀的文化人也很多，可是我想是不是应该开始在小题目上搞团结了，年轻一代也要开始作准备，因为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十年以后你们就是人才。

今天还是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讲话，而且看见很多前辈来捧场，我觉得非常惭愧、不安，感谢、谢谢大家。

答 问

■问

□答

■：第一点，陈先生讲到传媒把假的说成真的一样，但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纸包不住火”，你怎么看？第二点，你对香港社会，有没有注意到一种由高度自治变成自主的倾向，当然，高度自治是我们香港已经公认的，而且是在中英联合声明写出来的，但你有没有想到，怎样才能收回主权，保持繁荣以后还有高度自治？这个高度自治，是应该创造出来的呢？还是应该坐享其成？

□：第一个问题我很有同感，那位朋友提出了一点我刚才忘记补充的，就是说大众传播也有限制，有它道德上的限制，一旦破产之后没有用。我愿意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也是我为台湾觉得很高兴、很光荣的事。那就是上次的机场事件，因为那一次台湾所有大报都没有讲真话，只有一个《自立晚报》说了真相。一份销量只有两三万份的报纸，却打倒了各自认为销量有百万份的报纸，使整个舆论转变，整个选举形势转变。

另外一个情形是小众媒体的产生，例如我们台湾的所谓民主

运动也掌握了电子录影机，在各自选举单位里面有荧幕在播放拍出来的真相，这也在反抗大众传播的垄断上起很大作用。所以大报并不是万灵药，特别在它过分违背真相的时候，它会垮的。也幸好它有这个个性，要不然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了，是不是？

第二个问题你容许我不发表意见，因为我对这个问题不挺了解，而且这对于我这个还想回台湾去的人，是挺尖锐的问题，所以谢谢你容许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陈先生，首先我想请问你办《人间》杂志有没有受到你年轻时候的宗教思想影响？第二，你认为台湾的民进党能不能解决台湾面对的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应不应该在这个场合问你，几年前，我在台湾听过你一次演讲，你当时对搞改革和社会参与似乎很灰心，你说只要搞生活就好了，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第一个问题有很多人问过我。我必须说的是，我小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宗教生活，我的父亲一直到今天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恰恰好是因着我的父亲，使我至今一直不敢看轻宗教，因为我看见我父亲的生活里有活的信仰。他每天祷告真的是向一个人说话一样，早晨谢饭时就说：“感谢你又给我新的一天，请你帮助我在这天怎样怎样……”我在旁边听着也觉得挺感动的，感到一种宗教的力量。我个人在漫长的少年时期也于教会待过，后来因为自己思想的变化，以及觉得台湾教会的特别软弱，所以我离开了教会。最近有些教会找我，他们说我是“出走的教徒”。

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影响还是有的。最近有一位澳洲的学者，他把我所有作品里面的基督教成分写成了论文，我很讶异我居然写了那些的确是我说过话。所以，我料想大概童年那段宗教生活对我是有巨大影响的。台湾有些朋友说，你怎么搞的，老改不了，什么信、望、爱那一套。我想是的，大概是有影响的。

第二个问题是民进党能不能解决今天我们台湾所面临的问题，我的第一个答案是我非常虔诚的希望它能够，相信很多台湾和岛外的知识分子都跟我一样，因为它是历史上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第一个反对党，这是非常令人庆贺，而且寄以厚望的一个党。

可是，我必须说出我一点忧虑，就是似乎这个党还挺不注意文化的问题。在我父亲抗日的时期，不只有政治的反抗、也有文化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等，这个党却不太注重这些，它不注重不是它差劲，而是台湾社会四十年来对哲学、社会科学或者教育等问题，是比较抑制，所以我们暂时还未有条件。我们的民进党跟国民党一样只注重选举等政治方面，对这些都不太留意。另外因为民进党阶级代表性的限制，它对公害、工人、对少数民族基本上是不很关心的。它跟国民党一样，在政纲中是有把保护少数民族、保护工人等条款列进去，但事实上他们并不真心的从心里关心这些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从社会科学来讲，他们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代表，他们互相争得很厉害，但争的恐怕是政治上的席位和地位，而不是意识形态。例如工业跟保守党会有基本的不同，但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好像并没有这种基本的不同，他们同样是反共、拥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这套……大概是这样吧，我想这个说多了就变成我在海外攻击民进党，就不太好，但我真的没有攻击的意思。

至于第三个问题，我可能讲过那样的话，我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台湾工作有时候很疲倦，有时我会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用，我就什么都不想做了，只想好好睡一天的觉，谢谢你提醒我。那恰恰是我最软弱的时候，我这样的时间蛮多的，所以不要误会我是个“大力水手”。谢谢你。

■：你认为台湾是不是一个民主社会？

□：一个社会是不是民主，恐怕这在学术上是要具备某些条

件的。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其讨论它客观上是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如说我具体地感到了这个社会巨大的变化：有很多过去说了、写了非被抓起来不可的话，现在说了、写了就不抓；很多事，例如“五一九”事件，以前相信决不会只这样把他们围起来就算了，现在却是这样便算了；一边说不能组织反对党，但它组织起来了，也没有抓；或者说，现在已经开出一个具体的行事历，说要开放报禁，要解开党禁，我们就这样等待着。我想，毫无疑问地，台湾在最近一年多来的民主化步骤，虽然是由上而下，但是非常巨大的，巨大到有时候我们还不能理解它的意义。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若按照国民党过去的一般逻辑来说，它绝对还没有到了非让出这自由不可的地步，它还没有到了马科斯面对菲律宾“人民力量”那样的地步，就是说：“成千上万的人上街，然后坦克开来，他们在坦克面前唱歌、丢花朵；或者是农村破产，大量人口集中在马尼拉；知识分子没有出路、痛苦、烦闷等。我可以断言，如果民进党宣布组党那一天，政府啪一下就抓去两百人，台湾该娶媳妇的还是照娶，该嫁女儿的照嫁，吃饭的照吃，该跑三点半的还是会照跑。我这样讲不是说国民党恩重如山的意思，但客观来说，国民党只要不允许，是有条件再阻止一次的，但它没有这样做。我想，这是显示出它的力量，它的成熟。

我不希望我说这些话是为国民党张目，但我应该说些公平的话。例如像我有这样的政治记录的人还可以自由办杂志，有问题还转弯抹角地叫我下次不要再做，这对我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过去只是读点书就被关了七年，这个差距对我来说是很亲切、很现实的。

■：第一，请问你对“中英联合声明”有什么看法？第二，我们香港这里大部分的民主人士都希望维持资本主义的现状，你对此有何感觉？

□：第一个，我很惭愧很惭愧的说，我没有读过《中英联合声明》。我不晓得这是什么时候发表的，最近吗？台湾没有……

■：声明的主要内容，是香港可以维持资本主义现状五十年不变。

□：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你们怎样看，才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在台湾，而且我应该不是那么傲慢地要来表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过，我还是不晓得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试着说：与其讨论这个声明有没有意义，不如尽早动员香港人民自己的主动性、自主性，自己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跟身份的认同，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恐怕比问一个来自台湾的人怎么看得重要，是不是？我这样不是逃避问题，我是真的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最悲观的看法是我们的努力到时还是没有用，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不作此努力，工作反省和自我批评，或者不重新去面对历史和自己的话，那是肯定没有前途，只能埋怨，或者到时候到英国去，但如果我们做了，可能一样没有用，但这种没有用对我们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心里有个底子，将来我们还有机会说话。而且，若真正能够代表香港的人民发言，有很多意见，这极可能会有用。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有点文不对题，可是一定要请你原谅，因为我对这不了解。

■：第二个问题呢？

□：我想这跟第一个问题一样，是不是？

■：你说，首先有一个自由自主的中产阶级力量，社会改革才有希望，那你看看台湾有没有这个力量？如果没有的话，该怎样去建立或培养这个力量？

□：这个问题台湾跟别的社会不一样。台湾社会有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一九五〇年以后，它被编入全世界二体制对立下的最前线，它又是个“孤岛”，所以冷战的结构性价值观念，统治了

台湾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冷战结构下的所谓自由世界思想体制，就是反共；就是美国作为老爷的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繁荣发展那套。这些观念有没有问题是另一个问题，但离开了一九五〇年这么久的现代中国人民，应该有智慧重新按照我们具体需要的立场，去面对整个冷战的观念，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世界”的体系，我们就毫无疑问地接受它。因为这个结构的影响，我们的中产阶级一般是比较弱的，相信香港也有同样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一九五〇年后，我们的文学、文化跟香港颇有交流，很长期都是加工出口的知识活动比较多，自制率低，也没有联系到台湾或香港具体情况来思想问题或者搞创作，可以说，我们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比较弱的。

可是，我想，上面讲的话是有点冒险的，冒的不是政治的险，而是判断的险，就是，忽然之间我们觉得好像有点意义。这意义不只是我们感觉到，海外也一样感觉到。

首先，为什么《人间》杂志会产生，而且受到那么大的注意？为什么？在一个富裕化或者物质化那么厉害的地方，为什么《人间》杂志产生，而且能够存在、被接受，并获得一定的评价？第二，《当代》或《文星》那样的杂志在一九五〇年末期以后经过二三十年的空白，为什么现在又会产生？虽然它们的读者不是很多，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一定的读者，包括你们香港的读者，等待它们每期出版？为什么？有人在问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我想这个时候做答案恐怕是很冒险，但这个现象值得我们问。第三，是台湾的大学生在战后四十年的今天开始在动。怎么动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可能是美国的学界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参考书设计了一些比较所谓前进的学术著作，例如他们也开始读一些像马尔库塞等人的东西，虽然基础不好，半懂不懂，但总是产生了一些词语上的变化、语言上的变化、思考方法的变化，和具体地在各大学之间有一点微弱的变

化。例如学生开始搞地下刊物,开始要求自治等。而更重要的,是当局对这些没有采取断然的抓人、审判等事情。这一切都很值得我们去想,可能它是一个开始。这是我的回答。

■: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看过例如以台湾为主的《人间》杂志及一些小说,都对这个问题有所反省,但在香港,我就觉得反省没有来得那么深刻。我希望陈先生就在台湾看过的香港小说、香港电影、以至来到这里短短几天对香港的印象,谈谈你对香港现代化所付出代价的体会,好作为对我们的一些提醒。

第二个问题是我在浸会学院听陈先生的讲座时,你提到我们要对殖民地化过程带来的社会文化转变作出反省,于是我想到我们今天看报纸上大谈政制改革的时候,常常会说香港已进入一个过渡期,我记得七十年代末期有人提出非殖民地化,但似乎这几年我们都不再提及这个名词,现在陈先生重又提出这个问题,我希望你能比较详细地解释一下我们可以在对殖民地化过程的反省中做点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我看了一份报章对陈先生的访问,你在那里提到政治运动跟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化、思想和文学运动并进的关系。我知道你是从台湾的经验出发,但我仍希望你解释一下这个关系,使我们在今日讨论政制改革,但可能忽略文化思想方面启蒙的情况下得到启示。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请不要把我看成好像一个专家似的,以为我能给你们解答很多问题,那是绝不可能的。其实我走在台北街上还没有人理我呢,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对于这个问题,我目前有的唯一印象是香港的资本主义文明远比我想象的还要高、还要精致。在中国人建立的资本主义地区中,从我表面见到像香港这样一个“建筑”跟一个“建筑”之间的关系,它的效率,以及彼此的

关连；这么一个大的机器运转时候，人民也遵守这几个机器运转，从这个情形来看，香港的资本主义是远远超过台湾。台湾有点乱，软体硬体间有点矛盾。可是我也想过，香港这样的社会里面恐怕问题也不不少，所以我第一个感受是有可能的话，香港也应该办本《人间》杂志，应该发展摄影报导。在大众传播媒介以外，应该去看大楼高厦阴影底下的现实，否则香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比台湾用番话说是更加 Spectacular，太过目迷五色，真是不得了。

几乎可以说，所有现代化过程都会带来一些被害的问题，不论日本或是各个地方。我想，既然香港的中国人民有能力建造这样一个物质文化的话，我相信他们应有更足够的力量暂停下来，回过头，反省，找问题。这绝对不是难的事情，不必要我来提示。只要大家带着这样的反省态度到各角落去看，不要看表面的、比较虚构的，而是到舞台背后去看，一定会有收获。到后台去看并不是要揭发黑暗面，绝对不是。当我们关心黑暗面的时候，恰恰好是我们对光明有很深刻很深刻的信念，不愿意放弃对光明的信念，所以我们才关心跟光明对照的黑暗，对不对？如果我们专门去找一些问题，或者不公平的事情，恰恰好是因为我们对于公平的“饥饿”还没有“死掉”。所以应该去看。我相信以你们香港人民能够建设这么了不起的文明，一定更有智慧去看香港繁荣已经付出了的人的代价、自然的代价、文化的代价。我相信你们能，一定能，不要说，一个台湾来的老头子能给你们什么指示，绝对没有这回事。

第二个问题我就很抱歉，因为我对香港的情形不了解，如果我作为一个台湾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九九七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对不对？那么，香港过去的一段历史就要结束，不管说那是殖民地也好、新殖民地也好、半边陞地也好，名词并不很重要。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回顾这段时间，香港与中国的关系是怎么样？英国人怎样介入？香港有什么发展阶段？我

只是觉得,面对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时期,反省和回顾是必要的。而且这个反省和回顾,是需要有一点品质的,要从社会学的观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从历史的观点、从文学的观点、从生活的观点、从各方面去看,就好像我一直觉得大陆的“文革”应该也有这样的反省一样。该从各个角度,从心理学的观点、从人类学的观点、从文化的观点、从社会学的观点、从中国共产党本质的结构等各方面去看这个所谓浩劫的十年。

我想这样的回顾是对任何人都有意义的,这样才能够积累。香港人对历史作出反省和回顾,至少可以有两个目的。第一可以知道自己的定位,知道香港的中国人民在整个中国发展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第二是香港的中国人民身份认同的问题,到底我是中国人?香港人?还是在香港的中国人?还是什么都不是?我应否独立?这样厘清以后,对前去的道路会有帮助也说不定。不过,千万记着这只是一个外来人很肤浅的建议,可能会有很大的错误,只不过因为我用我的诚恳报答你们对我的热情,所以我把我心里觉得应该说的话说出来,只能作为参考之用。

第三个倒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向来的抵抗运动都不是片面的。例如甘地吧,甘地绝对并不只是饿了肚子跟英国人作战,他的饿肚子、自己纺纱的本身,就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文化和思想的意义在里面,如怎样促进印度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团结,怎么用爱而不是用恨去报答压迫者的拳头和枪刀,这些背后都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及宗教背景。政治只是一种行动,它是整个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所以所有抵抗殖民地的运动都不会只是打游击战、或者是在政治上的反对;它也会发展成文学运动、戏剧运动、思想抵抗运动,台湾的抗日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不只是有一些人在搞党外,或者对日本人丢石头,它有台湾民众党,但也有台湾文化学会,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在各个不同的角落和范围用作品、用戏剧、用艺

术、文学、思想抵抗运动，作为整个被压迫人民的对抗。只有有文化背景的抵抗运动才有生命。如果面对有武力、有强制力的支配者，你赤手空拳跟他搞大概不行，我想被压迫者所依恃最大的力量，恐怕一个是知识，一个是道德。因为知识比较高，道德比较高，所以那个瘦小的名为甘地的老头子，只要饿几天，便使大英帝国的统治动摇起来，他凭什么？不是因为他登高一呼，有几千万红军出现，不是的，而是因为他那道德的力量，爱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使他的挨饿引起全世界注目，不得了。这就是知识、文化、道德或者宗教的力量。

■：陈先生，你是一个文学家，而可以这样说，文学是反映社会的问题和现实。现在中国共产党想跟台湾国民党再来一次合作，出现了台湾的前途问题，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文学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快乐，因为忽然间我发觉我在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不过，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挺公开的。恰恰好承蒙你抬举说我是个文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文学家，首先，他所关怀的中国恐怕是比较抽象的，例如我认为中国这样一个概念，是联系着它长远、复杂的文化、历史或者文物的；想起中国时，我们会想到一大堆中国的事物，她的出土文物、她的诗词歌赋、她的历史、她的人民怎样创造出来的文明。因此我们不能说，当我们讲到中国的时候，唐朝才是中国，元朝不是中国，我不要；清朝更不是，那是满洲的，汉朝就过瘾，好，这是我们的中国。我们对中国的概念，是超越比较短暂的政权理念，所以在这基础上，我基本上明显主张中国是一定要统一的。除了上述的理由外，我觉得中国的分裂，跟我刚才说到两极对立的世界战略有很大关系。我们中国没有道理按照别人的战略来分开，要分开我们可以重新想想，到真觉得要分离再分离也不迟嘛。这个问题不解决，为什么要分开？

至于说两党之间怎么弄,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足够的知识发言,也不便发言,不过我要深切地提出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样统一,一定要把中国人民放在他们心中。没有中国人民同意、欣然接受,或者是热情欢迎的统一,我想对两方面都没有好处。这是我的看法。

……(略—编者)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陈先生你提到关于自主性的问题,为什么《人间》杂志的目标不是希望每一个阶级都关心自己的问题,而是将希望放在中产阶级身上?这会不会是个矛盾?另一个问题是,我想在座的大多数属于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但他们的很多问题时候都反映出他们并不太有自主,他们总将很多的香港问题拿来问你这个台湾人,你会不会觉得这现象跟你刚才强调中产阶级应该自主这点有所矛盾?

□:第一个是挺好的问题,也是常常令我为难的问题。我想,我们也看到,甚至亦有一种理论提出,真正的力量来自人民,不只是中产阶级,甚至不是中产阶级,而广大的劳动人民,才有改变社会、创造历史的力量。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想分开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是我刚刚忘记讲的,《人间》杂志有一个态度,就是关心民众的历史。我们为这个时代去采访、去看、去记录、去批评的,恰恰是这个时代民众的历史。我们报导的,不是那些中产阶级,那些每天在俱乐部进出,或者挥霍千金的那些人。我们所报导的,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民众历史,以及民众眼睛所看到的台湾。

可是它为什么不诉诸于民众?我并没有禁止收入每个月八千块以下的不能购买《人间》。可是实际上它的售价,以及它的设计的问题,阻止了这些比较低层的劳动人民的参与。这是有道理的,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分工上已规定了这种不平等。我不是赞成这种不平等,但我们分工愈细密,我们广大的劳动者可能一辈子要重复做最简单的工作。像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样,每天都在搞

相同的工作，他不是“傻子”也会变成“傻子”。他没有办法接受文化，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办法去想，这是制度造成的。可是却有一批人被分配成为看比较全面的，例如他若是监工，那就好一点，他知道整个流程是怎么样，一个经理又不一样，一个总经理就更不一样。所以这个社会原来就是这么不公平，被分配到一定水平的阶级上的人就掌握了比较好的认识这个社会的地位，可是恰恰好这些人是为了维持这个秩序而存在的，因为他们没有反省的力量。但当他们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首先是要表示他要背叛他自己的阶级。这些事情很多嘛，例如在王公贵族以他的背景和出身为羞耻的，像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拥有那么多财产是一种羞耻，拼命要把它们分给农奴，他老婆不答应，于是两夫妻常常吵架。所以，是要由这个阶级的觉醒，然后由这个阶级到民间去，去帮助崩坏的这个体制，才有希望。

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强词夺理，但这是我的理解。在辽阔的第三世界有很多大学，都是激动的东西，例如马尼拉大学，以前的东京大学、现在的汉城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很多很多都是改革者、革命者的温床。这些人的出身难道是农民吗？我想不是。他们一定是律师、地主……中国过去的历史也是这样，很多例子都是地主的爸爸弄不清楚儿子为什么搞这个东西。这些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首先有机会觉醒，然后他才到民众里面去，最简单的如共产党吧，像俄国的民粹运动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

我这样讲不是说农民和工人都是傻瓜蛋，不能负起改革的任务，而恰恰相反，是要当所有中产阶级的心跟你所说的农民等同一时，这个社会可能才有希望。这就像沙特为一本书写序时所说的一样，白人最大的问题是必须面对黑人的愤怒，必须让心变成黑了，在一个黑人对立的暴力看到白人所作的罪恶的时候，白人才得到解救。就是一方面黑人需要革命，二方面是白人自己的

变革，才能使革命成为可能。你的问题蛮严厉的，我希望我没有说错话。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所谓对中产阶级的寄望，这样说吧，恰好是我们台湾中产阶级反省不够，所以这个杂志出来以后引起他们的惊异。当然我们不是像传教那么顺得，风起云涌，人手一册的。问题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我们看到大家的惊异，他们的认同，与我们一起流泪、一起愤怒、一起感谢，当然也有些人是骂我们的。正好是因为我们大家不关心，所以需要来提倡关心；另一方面，我们不关心是有很多客观的理由，对不对？因为香港战后整理思想、文化价值的结构，因为它为自由港、殖民地、半边陲地区等的条件，都规定了我们不太关心这些问题。

我们《人间》杂志也是逆流而上嘛，因为所有媒体都不这样做，我们这样做。逆流本身就是说明有一个顺流。

我一点都不享受你们这样把所有问题要我来解决，不过我也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觉得你们很差，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是来自一个同样徬徨、大部分人不关心问题的社会，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是很特别。我刚才所说的自主性问题，是从现在开始，我只是建议，我们在面对九七问题时，是不是与其无奈地面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结束，不如我们能自动地、积极地去回顾、总结香港的历史。这种总结可能会有帮助，可能为我们找到一个历史位置，另外找到一个可以认同的“身份”，两样合起来，也许可以做点事情也说不定。请不要认为这是个指示或什么的，绝对不是的。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八方文艺丛刊》七辑

建设具有主体性 的高雄文化

一直有人说“高雄没文化”。如果高雄没有文化，台中、台南、台北就有吗？其实，文化是有的，问题是文化的品质。

文化丧失主体性

文化和知性的贫困，一直是战后台湾文化的特点。一九五〇年，“冷战—安全—国家分裂”的结构形成，特别使台湾的哲学、社会科学长期停滞。台湾在战后编入“美—日经济圈”，美日尤其是美国式的价值、思想、知识，经过歪扭打折，与外来资本、技术、商品以及政治、军事方面强大的支配力，使台湾文化舶来化、模仿化，而丧失了主体性。一九六〇年后，台湾经济在“依赖—专制”中巨幅成长，另一方面却普遍对台湾前途产生惯性的焦虑与苦闷，使资金停滞在私人储蓄中而无法畅旺地投资。肥厚的税收，在全岛各地聚生了中饱国税的特权食利阶级，于是色情和庸俗文化成了包揽工程和采购商货的润滑剂，也聚生了分润色情工业超额利润的地方势力、公安力和黑势力，官能文化成了社会肌理的一部分。

此外，作为消费讯息中心，外来商品文化的买办中心，台湾和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神经中心，和有闲有钱，有力消费高

等文化的精英阶级聚集的中心地的台北市，独占和集中了台湾的文化福祉和文化生活。台北以外的地方，文化生活遂相对地贫弱化。

这样看来，则何止高雄一地“没有文化”呢？

但高雄，做为我省第一大工业城市，聚集了市民中占多数的、来自外乡的劳动者的城市，高雄“文化低落”，自有特殊的原因。

接订单、加工出口、劳力密集工业的集中地高雄，工人的劳动时间长，劳动紧张度高。平时工人固然无从进修学习以提高文化；下班后，疲惫已极，更无体力和心力进修或参与文化活动。于是在生产行程中受尽体力和心智剥削的工人，为了松弛和更新恢复疲惫的肌肉和心灵，投入官能工业资本所设计的喝酒、色情与赌博，接受第二次剥削，而以松弛过的、更新的劳力，投入第二天的生产行程，层层相因，死而后已。

工人权益被忽视

由于工人权益长期不受重视，工厂内部，缺乏文化设施，使工人的文化无法得以向上。工厂附近的文化公共设施，如学校、教会、图书馆……没有为下工后的工人开放，供其使用，影响工人市民在文化上的成长。

在分工细密化的工厂管理中，工人被迫在工厂分工中，长期从事单调、无意义的劳动，使工人减低创造力、分析力、组织力、判断力，从而压抑了工人在思考与文化上的发展。

目前的教育和传播系统中，工人人格受到歧视，形象受到歪曲，伤害了工人的自尊心和职业的尊严，使工人自暴自弃，对文化与知识产生敬远之心，造成严重的文化伤害。

通过工会争权利

因此，总体的看来，高雄的官能文化——色情和餐饮十分发达，此外，看得出在消费、商品文化上对台北的模仿。在比较“精致”的文化上，例如知识、文学、艺术上，边陲高雄对中心台北有高度依赖，从而也造成高雄文化力、创造力向台北的流出与流失。

如果一定要说高雄“没有文化”，也绝不是高雄人民品质粗劣，而是因为高雄有她独特的社会，也就是以经济构造性为基础的缘故。

为今之计，该怎么建设高雄自己的主体的文化呢？

工人市民，应该通过工会，通过自己的团结，争取诸权力，争取合理缩短工时，减少劳动强度，以便下班后有体力和心力从事创作和学习；要求工厂内部建设必要的文化设施；要求工厂附近社会既有的文化设施开放给工人使用，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利提高工人的文化；要求劳动现场的适度必要的民主，使工人在集体、民主的方式下，按才能、需要更换工作，而且能在生产中学习企划、组织、负责等能力（当然，只要有良好的劳动条件，“工厂民主”才有意义）。

工人应该参与和发展工会或住民运动，在运动中锻炼学习企划、决策、检讨、分析的能力，并带着具体问题的挑战，去学习文化。

赋与文化自由性

高雄当地的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作家、艺术家和学生应

该和占市民大多数的工人相团结、彼此关心、彼此学习、一块儿研究、讨论和创作，发展和重建富有高雄民众性、高雄地区特性的文化、并以这具有主体性的高雄自己的文化，批判和消除受到台北和外国影响的消费文化、色情文化、官能文化……

今天台湾的工人阶级，教育程度好，和台湾农村和地域文化，因出身背景，有密切关连。因此，赋予创造台湾地域性、自主性文化，批判和抵制台湾文化向中心城市与精英集中化，在文化上觉醒和进步的台湾工人阶级，有能力担负起这个重大任务。因此，工人的进一步自觉，祛除文化上自卑自弃的心理，以及高雄地区进步的教师、学生、记者、文化人、作家、艺术家、作曲家和戏剧家的反省及自我批评，对于高雄工人和文化界相互理解与团结，对于建设高雄文化，有很大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立晚报》

时代呼唤着 新的社会科学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演讲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今天，站在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本部的讲坛上，我既感到极大的惶恐，也感到极大的光荣。

感到极大的惶恐，是因为我主要地只从事一点文学创作，在社会科学领域，从来不曾接受过严格、专业的训练，更不曾从事过具体的研究工作。今天我站在这里，有资格的问题，有条件的问题，我深深感到不配，因此觉得特别惶恐。

我感到极大的光荣，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悠久，集合了海内外中国数千最优秀，学术研究上贡献卓著，不少人是闻名国际的社会科学大学者，在国家尚未统一的历史时期，我能从台湾来北京获颁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荣誉称号，觉得特别激动，特别光荣和珍贵。

历史地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有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传统，那就是科学的、怀有高度主体意识的、不断提高了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本质的认识，善于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为中国的救亡、改造、建设和发展，做出大量重要的贡献。

三十年代初，接受新的社会科学只不过十来年的中国年轻的

社会科学家、思想家、革命者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北伐革命失败的余痛中，展开了范围广阔，卓有理论深度和知识开创性的“中国社会史论争”。

这个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学术论争，讨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讨论了相应的变革运动的本质、运动的力量分析和改造中国的前途等等，影响十分深远。一直到八十年代，韩国社会科学界和社会运动界展开“韩国社会构成体论争”时，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史论争”所留下的业绩，仍为韩国社会科学界所征引。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探索 and 开发，结晶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论这样一个结论。从这个结论出发，一九三九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规定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而提出了相应的中国改造论：即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一个重要结论。以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为基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指导了一场推翻百年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消灭数千年残酷的封建统治的伟大革命，并取得了胜利。这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巨大成就与贡献。

新民主主义的改造论，包含着革命后中国经济发展论的重要纲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长期摧残和破坏的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首先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新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造”，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支配，要求坚决地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历史彻底断绝，从而在选择以社会主义做为发展道路时，提出了“两阶段”建设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在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上，认识到“资本主义过少而不是过多”，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留着影响，主张一种“新民主主义

的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共存，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排除“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论联合政府》，一九三九）。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很早就有这样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在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主导力的条件下，主张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多种经济并存互补，发展商品和市场经济，提高生产力，进行工业化，达成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促进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条件。

正是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下，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实行土地改革，稳定政权，由国家掌握重要工矿企业、铁路、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统一财政经济，稳定市场，强化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管理等各方面，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中国充满了一股欣欣向荣的朝气。

从工业化的世界史看来，在战后东亚几个工业化经济中，中国的历程，显出其独特性。台湾和韩国的工业化，基本上不曾清算过去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的残留，甚至为了冷战和民族内战的逻辑，韩、台当局甚至吸纳殖民地时代亲日派“精英”；并且在东西冷战结构下，扈从美国的冷战战略利益，不惜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上形成新殖民主义的对美扈从，从而选择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允许的方针、性质的工业化，即所谓依附的、边缘资本主义工业化。

相形之下，中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使新社会和旧社会断裂，深信舍此构造性的变革，走社会主义之路，自力更生，就无法救中国于危亡而达富强的境地。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论，自然有鲜明的过渡论性质。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

下的极度落后性，中国的社会科学清醒地在战术上采取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适度包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多种经济同时并存，以提高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准备好条件，但又从来不会忘怀要最终排除商品、市场和货币，以计划经济、供给经济和旧社会、旧体制断绝，走自己的路，快速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理想。因此，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上，呈现了这样的矛盾和反复，那就是要求稳定；要求处理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的矛盾统一的联系；要求较快、有效地把生产力提高；要求清醒地处理好个体经济和公有经济的矛盾；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要求不搞“冒进”等等的思潮，和另外三种思潮，即批评并警惕保守右倾、批评“反冒进”、主张保持革命的理想性和纯粹性，主张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于革命后的社会；要求比较大胆地、比较快速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等的思潮之间的矛盾和反复。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论提出，一直发展到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莫不表现出一个长期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荼毒而濒于危亡的民族，要坚决和旧社会、旧的压迫机制断绝，强烈要求自力更生，要求快速工业化和发展，以热火朝天的意气，早些建设好社会主义，从根本处改变祖国贫国困落后面貌的这么一个悲壮、凄绝的思想和实践。

历史地观察，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直到一九七八年的一段彻底(radical)革命论的曲折，是难于避免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内部，至少自《共产党宣言》以降，存在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力量，破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从而建设共产主义的强烈的呼唤。这种呼唤深远地影响了苏共，也影响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影响中国的

社会科学。此外，五十年代波匈两国的骚动，以美国霸权主义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华围堵下，存在着帝国主义再次向中国发动战争的阴影。这些都增加了纯化阶级队伍，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完成工业化的深刻焦虑。

国外进步学界中，对“文革”时代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中国“文革”时期独特的医疗和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对于运动中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生产中实行的民众的民主主义；对于党和国家可能滋生的腐化、变质、官僚主义的自觉的批评和斗争，仍保留肯定的评价。但“文革”所犯的错误，所带来的巨大的人的和物的损害，也至极明显。

一九七九年未开始，中国宣布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一九八七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直接揭破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变革背后社会基础条件的薄弱性问题。从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遗骸上，飞越市场经济阶段，而冲向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从五十年代生产手段私有制之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一直到自今百余年后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被规定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完成别的社会在资本制生产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补足资本主义的功课。

就这样，更早于苏联，中国开始了从严格的统制计划经济朝向自由的市场经济转换的世纪性大实验。八十年代末以迄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的崩解，和中国经济快速、旺盛，却至今尚不能完全知其所以然的增长，形成了强烈对比，而引起世界工业化历史学者的注目。

一九八八年，韩国籍的社会科学家金永镐写了一本书，叫《东亚工业化和世界资本主义》，提出了在二十世纪中后开始的“第四代工业化”的世界经济动向的概念，涉及的国家（地区）包括：“非欧洲后发展地区、台湾、韩国和中国大陆等”。

他从工业化的世界史,看到迄今为止四个世代的工业化浪潮。每一个“世代”的工业化,都带来世界性需求市场新的扩大、供给能力的新扩张,带动了新一波动态性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而一旦新世代的工业化运动停止了,就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大停滞和大后退,导致大范围的不景气或战争。

“工业化的世代”论,是依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历史、国际和内部社会诸条件的变化,看出不同工业化机制和模式的理论,从而整理出多几个基准,以甄别不同世代的工业化的性质。

首先是从工业化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化三者间的关联和结合去分析。第一代工业化,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工业化的英国,在先进行资产阶级市民革命,并且在新兴市民的秩序中完成工业化改造。而作为工业化的结果,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这么一种古典的模式。第二代工业化涉及受到英国工业化波及影响的德、法和美国,时在十九世纪中叶。它们在不同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同时并举,帝国主义成为工业化重要的推动机器。第三代工业化,指的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意大利、旧俄、日本的工业化。它们是先进行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同时,伴随帝国主义扩张,在工业化进行过程中,发生并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历史地看来,经由这三代工业化运动达成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都帝国主义化,而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三代工业化过程中未能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便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而所谓第四代工业化国家(地区),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中取得独立,致力于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包括台湾、韩国、东盟各国,拉美的墨西哥、巴西,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南斯拉夫等。除了社会主义型国家,其他国家或地区,基本上是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工业化,在依附型经济

发展中，进行不彻底、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

其次，从各世代各国各地区工业化过程中担负工业化任务的主导力量来分析。第一代工业化的英国，是由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以新兴、先进的民间资本主义企业（中小企业为主）承担工业化的主体角色。在第二代工业化中，正如我们在法国、德国历史所见，在民间资本主义企业还没有条件登场的前提下，先出现了银行，并且在这长期使用银行的支援下，使私人企业登上工业化主导的地位。第三代工业化各国如日本在资产阶级不够成熟、力量较小的条件下，基本上由国家政权扮演了主导、促成工业化的角色。至于第四代工业化各国各地区，因为受尽殖民主义的摧残，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基本完成条件下，资产阶级薄弱之极，工业化的任务乃由国家和帝国主义外来资本和若干民间中小企业来承担。

“工业化的世代论”还有“在世界体系中的定位”、“国际分工型态”和“长波局面”等三个分析基准，因为时间关系，略而不论。

金永镐的“工业化的古代论”，有很大的挑战性。

第一，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基本上完成，当“第三代”工业化使日本做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化国家登场，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后一直到七十年代出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前，就不曾出现过任何新的、取得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因此，不少激进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在已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支配和被支配的结构性关系下，存在着永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发达国家向工业化转化是绝望的——除非首先进行革命的断绝，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结构，求民族和政治的解放，自力更生，选择不同形式的工业化策略，才有可能达成。

当然，不论是依附理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都在七十

年代后做了一些修正,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有“依附下的发展”的可能性;“中心”、“半边陞”和“边陞”三个领域间,在一定条件下,也有上升和下沉运动的可能性。但是,以一些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二十世纪后半的工业化,带动世界资本主义“第四代”经济开展为特点的“第四代工业化论”,根本上肯定了在帝国主义体系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可能性,既引起争论,又点燃希望。

第二,“第四代工业化论”把台湾、南朝鲜和中国列为推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第四代”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虽然金永镐以台、韩工业化的分析和比较为立论的主要内容,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历程着墨极少,却反而留下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型工业化的广阔理论空间,对中国社会科学有所启发,也有所挑战。

例如,在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化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韩国一样,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下,在遭受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破坏后的工业化。但台湾地区和南朝鲜,是在依附美国霸权下进行边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并且在工业化中呈现“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则进行了近三十年的,由中国工农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十年代展开了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一九八〇年以后,中国转换政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换轨,呈现持续性高成长的势头。虽然同属“第四代”的工业化,“四小龙”的依附的、边陞的工业化,和中国的模式成为对比。

其次,从工业化的承担者来分析,台湾地区和南朝鲜是国家或政权、外来资本和民间企业。在中国,是国家、乡镇企业、外资和民间企业。不过,进一步分析,台湾的政权和韩国的国家,是经受殖民地摧残,在战后冷战结构下由美国帝国主义人工扶植的,

对内表现高度相对自主性的反共波拿巴政权和国家,而在中国,则是中国工农、小资产阶级经历漫长的革命斗争夺取并组织的、政治上高度独立的国家。在外资问题上,五十年代的美援、六十年代的借款和外来投资对台、韩工业化起到很大的作用。而由于中国国家在政治、外交上高度的独立性,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的外来投资和外债一方面有相对性增加,一方面离操纵中国政治经济的程度还十分遥远。民间资本主义企业在推动韩台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韩国相对来说是大型独占企业起作用,台湾则由大量中小企业推动加工出口的发展。而中国,在所有制上是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在推动出口、提高生产力、增进国民生产上,做出了显著贡献,是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很值得加以研究。此外,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引起广泛注目,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小的。总的看来,国家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强大的存在,并主要地以这国家去推动工业现代化,应该是中国工业化的特点了。

这两年来,在东京的大书店、在香港机场的书报摊,时常会看到把中国说成“下一个世界超强”的书。这些书中,自然不乏煽动新的黄祸论、对中国的强国化表示怀疑、嘲讽的反面作品,当然也不少认真看待中国工业化趋势的作品。然而,总的来说,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分析的作品,在我贫乏的读书范围内,还不曾见过。

然而在现实上,中国的经济呈现着一种不完全知其所以的迅猛的发展。众所周知,能在朝夕动荡不定、变化万端、竞争激烈而残酷的国内和世界市场中全身走过,达成工业化,是一条十分险峻的道路。多少国家失败了,国债高筑,经济凋敝,贫困和不发展更加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蹲点实验和实用主义的方

法，由下而上、由点而面地争取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胜利，并以此大有别于苏联、东欧的由上而下、全面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导致中国的成功与东欧失败之间的强烈对比。但从长远看，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进行着从严格、大规模计划经济向自由的市场商品经济转轨这样堪称史无前例、高度艰险、复杂的工程，如果社会科学没有很快地赶上来，构建理论和知识体系，指引大的方向，照顾每一个环节，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台湾和韩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那些满怀发展意识的官僚、学者、专家，固然做了贡献，但私人资本主义大小企业中的资本家、管理者为了自己的利润所做的计划与决策、外资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介入，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国，相对来说，强大的国家在推动改革、推动工业化过程中，担负着比较独当一面的责任。具体地说，中共广泛、庞大的各级领导和干部体系，其中自然包括一个很大的学者、专家队伍，在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当代工业化的艰巨任务。

曾几何时，中国已经踏上了“百年不遇”的工业化道路。这突如其来的命运，正在为中国呼唤着新的社会科学，既能深入掌握东亚经济发展大潮的外部的、历史的特质，又善于总结中国工业化历史的若干经验与特点，以便武装身系改革成败的广泛的干部体系，以丰富、先进的知识、技术规划中国前进的方向。

其次，如果世界工业化历史果真已经开启了一个“第四代工业化”的新时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固然和香港、台湾两个“小龙”的发展互相呼应，但又在工业化的性质和历程上与这两个“小龙”不同。十二亿人民的中国果真达成了工业化，何止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头等大事，势必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是，东亚大国中国的工业化，是否只能是过去第一代、第

二代、第三代工业化的重复，把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推下贫困、饥饿、疾病、文盲的深渊；以环境生态系统的崩溃、内战、文化、精神传统的破坏、人和物的商品化为代价的工业化，还是珍惜这样一个机会，使东亚大国中国的工业化，走一条新的、不同道路，吸收和涵受东亚丰厚的文明，反省和承继中国和亚洲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运动遗产，也就是批判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代化的、亚洲民众独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遗产，从而发展人与自然共生的、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前面说过，在东亚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自始就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条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决绝，为民族和人的解放，选择了社会的构造变革和自力更生的道路。而中国社会科学，正是为这一条道路服务而诞生和发展的。探索一条新的、人民的工业化道路，因此就成了时代向中国社会科学严肃的召唤。六十年代以来，批判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有长足的进步。其中，拉美、印度、韩国和日本的学者，有不少做出了重要贡献，打破了西欧、白人独擅的局面。曾经在东亚工业化论的领域取得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胜利的中国社会科学，在东亚跨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不该长期停留在实验论和实用论的地步，恐怕应该一方面回溯中国革命的原点和原理，一方面批判地反省四十多年来思想和实践的经验，参照世界工业化历史的框架，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向着现代工业化移行的理论建构，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为了良好的，从基本解决发展与人的关系和发展与正义的关系，时代也在召唤着新的社会科学。

受拉美学者研究业绩的影响，金永镐指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工业化，是由国家、跨国资本、私人大企业主导的工业化，因而形成国家、跨国资本和国内大资产阶级间的同盟，即统治的“三边同盟”，这个阶级同盟利用国际冷战和反共“国家安全”体制，进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排除广泛的直接生产者阶级，达成资

本快速的积累，成为所谓“独裁下经济发展”的内容。“四小龙”工业化的过程，于是产生了工人、农民、都市“非正式部门”即城市穷人的“被统治的三边”，而呈现构造上的矛盾。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宣称代表中国工农阶级的国家，不能想象也产生排除民众的、新的“统治的三边阶级同盟”。

但是相对来说，中国的劳动雇佣化正在迅速发展。农民的阶级分化也在显著发展。人、物、技术和知识的商品化，也在急速增长。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对上层建筑，正在产生巨大的冲击。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政治纪律崩溃，在精神、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正在产生明显的、资本的野蛮化作用。忧心的人们指出，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甚至发生比过去倒退的现象。

人的真实的解放，人的充分的发展，人的终极性自由，一向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在它诞生和发展过程中所怀抱的“终极的关怀”。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不能对世界性核武战争的威胁、生态环境体系的崩坏闭上眼睛；不能坐视民族对立、社会不公、南北的两极分化带来人类最终的破灭；不能不理睬社会的弱小者在工业化的大义名分下被当做废品、不合格品横遭弃置和欺凌，就理当把长期以来革命论和建设论、计划论和市场论、断裂论和连续论的矛盾反复统一起来，建设我们新的、回应了时代召唤的社会科学。

黑松树林的回忆

我迁入莺歌国民学校，是光复前的一九四四年。那时候，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末期了。为了躲避盟军的空袭，我家就疏散到莺歌来往。对我的双亲而言，回到莺歌，就等于回到故乡。因为父亲的本居之地，是介于莺歌和大溪的中庄。

由于父亲的三兄——我的三伯父没有男孩，兄弟情笃的父亲，把他的双生儿中的一个，过继给他的三兄。因而自小离开了生家的我，在二次大战结束的前夕，由于生家和养家都疏散到莺歌，便和双生的哥哥同时迁入莺歌国小上二年级就读。从此，形貌酷似的这一对双生兄弟，竟日形影不离，整日有絮絮叨叨说不完的话。即使在上学的途中，也经常沉浸在两个人自己的世界，以致到达莺歌国小时，往往已经是第二节课了。

然而，这么严重的迟到，似乎从来不曾受到过严厉的惩罚。在记忆里，有一个穿着“国民服”、带着圆框眼镜、鼻下留着一撮浓黑胡髭的日本教导，站在校门内，看到迟到的我们兄弟俩，会用手招我们走到他跟前去。他然后默默地看我们一会儿，用手上夹公文的厚纸板在我们的头上不轻不重地各敲一下，而后又用手势挥我们进课堂去。

那时候，莺歌国小里到处是漂亮的黑松树。在校篱笆外靠近铁道的那一头，还有一小片成林的黑松。战争末期，一直到战争

结束、光复不久，学校里驻扎着一些日本兵和几匹军马。现在想起来，才知道战争末期，日本的兵源枯竭，故而记忆中的日本兵，年纪都大了。他们从贫困的日本农村被征调到中国大陆战场，辗转到了台湾。他们特别喜欢小孩，对双胞胎的我们弟兄俩又似乎有特别的兴趣。战争结束后，听说了他们怯于回到劫后的日本，打听有没有台湾农家愿意收留他们当长工种地。

军马也老了。由于粮秣不济，看来又疲又瘦。有一匹老马的臀部还烂了一个暗红色的洞。但不论如何，军马还是引起包括我们双生兄弟在内的小朋友们强烈的兴趣，一下课就去看马，乐此不疲。

光复的第二年，我的小哥忽然得了腹膜炎，送到台北住院，没几天就死了。时还不满九岁的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死别的悲伤和寂寞。事实上，小哥死前，生家就已经有迁居到桃园的计划，为了这生离，小兄弟俩会常有突然而来的离愁。有一回，为了安慰我，小哥说，“不要愁。等我搬走了，什么时候想人，我们只要去照镜子，我可以看见你，你也可以看见我。”

小哥死后，无以索解的哀愁，使我在镜子前或发傻，或流泪。一直到今天，面镜盥洗，偶而也会漠然地想，他要是在，也这么老大了。

到了大约是我的四、五年级的时候，学样的黑松林忽而遭到虫害猛烈的袭击。每棵松树下经常是黑压压的虫屎。无数的毛毛虫从树枝上拉着虫丝吊在风里摆动。教室的窗子、课桌上到处是毛毛虫。黑松树于是逐渐秃了，而终于一棵棵枯死而后已。

小哥死后，变成一小木盒白布包裹的骨灰，从台北回到了莺歌，摆在生家的客厅里。有一位级任的女老师和另一位已经忘了担任什么课的女老师，经常会来家里，坐在客厅里陪着父母默默

地流泪。如今想来，多半由于对双生儿的特别的注意，即便在小哥死后，一直到毕业，莺歌国小的老师们都对我爱护、关怀有加，至今难忘。实际上，莺歌国小不仅仅是我启蒙教育的母校，也是我生家和养家的父亲们的母校。自小，我就时常听说，家道贫寒的父亲兄弟俩，带着生米和腌萝卜从中庄迢迢徒步上学，把大米交给校外人家煮成饭或粥，就着腌菜吃午饭。

后来，我决定以小哥的名字“映真”作为自己的笔名，固然也是为了纪念我双生的哥哥，其实怕也是为了纪念父子两辈启蒙的母校时代，或者也为了至今犹时常萦绕梦魂中的，那一片美丽的黑松树林吧。

哦哦，九十周年了吗？怀念的母校！容许我为您献上诚挚、良好的祝愿！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日

评“中国不可以说不”论

——代出版说明

《中国可以说不》在大陆和海外华人世界出版热销之后，在台湾的一些精英先生们，就迫不及待地皱着眉头发出议论。说《中国可以说不》表现了大陆知识分子的“无知与孤傲”（九月十六日某报“时论广场”版）就很能代表这类议论的一斑。

精英先生说，“中国是否可以义正辞严地对西方说不，并不取决于民族自尊，而须视中国有多少说不的筹码。”

照这个道理说下去，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要把中国豆剖瓜分时，因为当时中国显然没有对帝国主义“说不的筹码”，就应该乖乖地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了。当《马关条约》要割台澎，大陆上就不应该有拒和、迁都、抗战、公车上书的言论和行动；台湾也不该组织抗日临时政权——“台湾民主国”；在日本近卫师团登陆，在台官僚、将军、豪绅纷纷内渡之后，吴汤兴也不该在平镇、龙潭、大湖、十八尖山一带带领农民进行武装游击抵抗……从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士林农民击杀六个来台湾施行日语教化的日本教师“六先生”开始，一直到一九一五年噶吧哖事件，前赴后继，用传统枪矛抵挡最现代化铁枪火炮的台湾农民游击抗日斗争，难道只能得到这么一句评断：“狭隘且无知的民族主义？”

如果一个民族真有“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别人就不敢找碴、挑衅，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对别人的欺侮说“不”。在森林里，

兔子和麋鹿永远不会对狮豹说“不”。它们只配逃命或者被吞吃。只有人，才会在忍无可忍时，越过生物学的限制，敢于在刀锯鼎镬之前，在拷问室中，在权力的威暴前，在异族压迫与掠夺前说“不！”而不辞破身亡家，终至使暴力蒙羞、瘫痪和唾骂。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文化史中发散着激动人心的光辉的，永远不是残暴的君主、武夫、刽子手和侵略者，不是富豪权臣，而是摩顶放踵的思想家、面目苍黄的宗教家……人的尊严，“民族自尊”，只有在人的世界才有，而且起重大作用。

而一旦从台湾历史中抽去反割台斗争、反日农民游击抵抗、非武装抗日运动、雾社蜂起……的历史，试问台湾还剩下什么历史？教会和士绅开城门投降的历史吗？还是辜、陈、许……这些和异族统治者合作，累致巨富，迭次受勋，当上日本贵族院议员的“精英”豪族的历史？

至于说日本的晶片有多么神乎，我不是科学家，不得而知。但石原慎太郎正是依仗“强大经济力与科技力”对弱小者的抵抗“说不”的人。拿这样一个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强征中国民夫到日本从事死亡劳动、否认“从军慰安妇”等战争责任的人来做说理的榜样，却又说石原的“右翼军国主义思想”“不足取”，就是立论的矛盾了。因为石原正是以其“强大”的“筹码”，“义正辞严”地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控诉说了傲慢、鄙夷的“不！”而这样一个日本，二战后向来只是国际政治上的侏儒，扈从美国凡四十余年，一般地从来不曾对美国说“不”。

对于强权国家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榜样不是石原之流，而是类如井上清那样，膺大义而论证钓鱼岛不是日本领土，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是军国主义的再发动这样的学者；也不是以“文化对抗论”包装“围堵中国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亨廷顿，而是深刻、科学地批判美国在文化、外交、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

上的帝国主义的卓姆司基(N. Chomsky)——这些敢于对自己拥有“强大经济与科技实力”的祖国之威暴于人说“不”的大思想家。

“现代义和团”是我们的现代精英很喜欢用来当脏话骂人的词。他们喜欢当脏话来骂人的话，还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义和团”在精英的脑中，有这僵直的概念：“杀人放火的土匪”，“无知愚昧，野蛮落后”。

义和团是去了人家八国联军的八个西方国家去杀人放火了呢？还是人家先侵略了中国，烧杀予夺，强人开港通商，勒索巨额赔款，抢窃中国文物？在朝廷、官僚、士绅无不屈膝时，义和团杀几个横行“条约港市”的外国商人、军人、教士和他们的中国扈从，烧几家洋行教堂，就一定要说我们野蛮，人家文明？说我们无知落后，人家文明开化？在我们看来，义和团的抵抗内容和形式，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在封建官僚士绅无力反抗的社会条件下，广大贫困农民起而抗击帝国主义的共同形式和内容。而当以枪矛对抗现代化火炮铁枪成为农民和帝国主义对决的基本形势之时，农民只能诉诸封建迷信——“枪炮不入”的符咒。而义和团竟也依“民族自尊”打击了八国联军，保卫了津沽，血战北京……瞧吧哏起义中，就宣传“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宣传可以“隐身”、可以“避子弹”、“避刀枪”的符法。只有思想感情上站在拥有“强大经济与科技实力”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人，才能对此加以无情的嘲笑。

至于“民族主义”，还要分侵袭者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凌辱者民族的“民族主义”之间的根本性差别。美国以“美国利益”为名，到处伸手，是民族主义。过去鬼子的“大东亚共荣”是民族主义。今天石原骂美国固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之间，原就有必然矛盾），但石原骂中国人“虚构”了南京大屠杀，骂《中国

可以说《不》这本书，也是民族主义。我们就纳闷儿：为什么人家的民族主义就不“狭隘”，就不“义和团”，就那么香？为什么受了欺侮、掠夺的人要站起来对横暴者说一声“不！”就是“逆流”，就是“抽鸦片”，就是“肤浅”、“孤傲？”

此外，历史地看来，“经济与科技实力”的“筹码”小的力量、民族和国家，战胜“经济与科技实力的‘筹码’远远大于自己的势力、民族或国家，使后者遭到可耻的失败者，绝不罕见。在中法战争的台湾战场上，台湾人民就战胜过法国人。郑成功的海军就战胜过十七世纪的世界霸权荷兰。“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就推倒了美国人帮它“从脚底下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政权。在韩国战场上，刚刚打完艰难漫长的内战，社会、经济亟待生息发展的中共，把二战后世界最大的侵略战争机器美国打回三八线。越南人民先在奠边府打跑了法国人，后来又使美帝国主义签下投降求和之约，这又仗的什么“筹码”呢？

这些全是“筹码”奇少，却能“义正辞严”地说“不”的史例。这是只知迷信人家的“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不知道“民族自尊”和人民的正义、道德、政治所能发挥的力量的精英们所不能认识的。

我素来并不那么赞成“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之类的“未来寓言”。但也不能对今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初有不可侮的国防，不必以向外侵占来进行血腥罪恶的原始积累条件下，创造了使十二亿人初步温饱的经济增长一笔抹杀。认识并正确评价这个绝不容忽视的成就（在广阔意义上，台湾的“发展”也为此做了一定贡献），怎么就是“新义和团”呢？

同样在台湾看，我们并不觉得中国大陆那么“不与西方国家合作”。大陆说尽了要合作、不搞对抗、不找麻烦的话，可美国就是在“人权”、“自由”、贸易、配额、智慧财产权、WTO、“彩虹

号”等各种问题上找尽大陆的麻烦，这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我们的精英就一定要人家跟他自己一样，从来不会、不曾、也不敢对美国和日本说一声即使是稍微卑微的“不！”才顺心？精英先生似乎很开心地看到“中共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轻易向美国说不”。但他似乎忘了大陆为“银河号”真相大白后在联合国批评了美国，在美国声称对大陆经济制裁时毫不假借地顶住了（而没有像台湾那样敢怒而不敢言，最后总是以属从收场），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大陆起码是守住了“重大原则”，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附录上，就有喻权域对美国以人权问题批评中国的反驳，说理深刻，义正辞严。

今天，说美国不是一个霸权国家，恐怕连右翼的美国人都不会以为是一种善意的辩饰了。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成为美国单极独霸的世界。在台湾，一九五〇年以降，美国透过援助、人员交流组训、留学政策、奖学金、基金会、在文教领域长期采用美国原文教科书……到了今日，从总统府以降，不论朝野、各行各业中，美国出身的硕士、博士精英占取了几乎一切领导高地。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学术，在台湾成为统治性论述。“无知与孤傲”就具体而微地表现了这个论述系统。但是如果我们的精英能安居于这样的美国体系，倒也是他的自由，却为什么一定要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必提防“和平演变”，非得都要人家“变成奴隶”，而且“变成以后，还很欢喜”才舒服？

在文章的最后，精英先引用托夫勒的话，严肃批评“中共不图趁势提升”大陆的“知识、教育、科技与文化水平”，却去提倡爱国主义之不智。说大陆今日在“知识、教育、科技与文化水平”上离开最先进的水平还远，有待再“提升”，我是诚心赞成的。但仅仅看大陆的出版品，中国大陆自己编的百科全书，重要的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经典作品的成套翻译出版，世界文学作品不分

“东西南北”相当齐全的翻译和出版，只怕不是台湾可以望其项背。至于自然科学、高科技的独力发展与成就，更不是台湾有资格置一词的。再至于教育，大陆的确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但是从上述人文社会科学和高科技的一点积累看来，我们的精英是不是也要想一想受教育公民的数量，并不好直接、完全地翻译成教育的品质。

“无知与孤傲”刊出之时，台湾还没有繁体字普及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台湾的精英总喜欢对一般小民看不到的书，发一番议论——例如面对禁止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社会，畅论马克思之“偏狭”、“错误”、“无知”。现在，《中国可以说不》已经在台出版，人们总算可以从自己的阅读中去判断这本书是否真是大陆“肤浅青年的无知和孤傲”表现？

现在，合写了《中国可以说不》的原作者们，又合作写了这本《中国还是能说不》，在大陆又造成初版印销四十万本的热卖。新书对“遏制中国”论和西方、日本对中国的歧视、误解和藐视提出有力的批判，对上一本书的各方反论，提出畅快的辩驳。人间出版社有幸取得版权，在台湾发行繁体字本，特以发表过的书评稍加增润，聊为出版赘言。

——一九九六年九月发表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修订

为和平团结起来！

——杨逵《和平宣言》笺注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杨逵发表了终于为他招来十二年牢狱之灾的《和平宣言》。对这件往事，他有这回忆：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就发生了‘二·二八’事变。对台湾社会造成了极大损害。

“这不幸的事件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当年四月，我和我的牵手叶陶，被捕入狱，同年八月才放了出来。出来以后，我看到本省籍的人和外省籍的人之间，时常发生摩擦。许多外省籍的文化界的人（教授、记者、文化人），大家谈到这件事时，大家非常担心，建议组织文化界联谊会，要我写一篇‘和平宣言’。

“我认为文化界人士对国家的前途都很关心，也会守信，诚恳。况本省籍和外省籍文化界人士的合作，很可能打消人们的积怨……所以我马上起草，油印寄出去……”（杨逵，《我的三十年》，1980）

这极关重要，却因长年被湮埋而显得神秘的《和平宣言》，在近几年前从它原先发表的《文汇报》（上海）上被人找出来了。《和平宣言》的原文是这样的：

“陈诚主席在就任当日的记者招待会宣布，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这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但是人民的意志是什么呢？需要从人心坎找出的，不能凭主观决定。据吾人所悉，

现在国内战乱已经临到和平的重要关头,台湾虽然比较任何省份安定,没有战,也没有乱,但谁都在关心着这局面的发展。究其原因,就是深恐战乱蔓延到这块干净土,使其不被卷入战乱,好好的保持元气,从事复兴。我们相信台湾可能成为一个和平建设的示范区,可是和平建设不是轻易可以获致的,须要大家协力推进。

第一、请社会各方面一致协力消灭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避免类似‘二·二八’事件的重演。

第二、请政府从速准备还政于民,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

第三、请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性的捕人,保证各党派随政党政治的常规公开活动,共谋和平建设,不要逼他们走上梁山。

第四、增生生产,合理分配,打破经济上不平的畸形现象。

第五、遵照国父遗教,由下而上实施地方自治。为使人民意志不被包办,各地公正人士须要从速组织地方自治促进会,人权保证委员会等,动员广大人民,监视不法行为与整肃不法分子。

我们相信以台湾文化界的理性结合,人民的爱国热情就可以泯灭省内省外无谓的隔阂。我们更相信,省内省外文化界的开诚合作,才得保持这片干净土,使台湾建设上轨,成个乐园。因此我们希望,不要再用武装来刺激台湾民心,造成威惧局面,把此比较安定的干净土以战乱而毁灭。我们的口号是:

清白的文化工作者一致团结起来。

呼吁社会各方为人民的利益共同奋斗。

防止任何战乱波及本省。

监督政府还政于民,和平建国。

上海《文汇报》,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国府”在大陆国共内战中全面失利，撤守台湾。推定是在一九四八年底、一九四九年元月初写成这《和平宣言》时，大陆局势已经明显逆转了。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到十一月的“辽沈战役”和同年十一月六日到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都打下了决定性的败仗，内部又有蒋和李（宗仁）白（崇禧）之间激烈的矛盾。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国共和谈的“五原则”。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以中国社会全结构的彻底变革，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上，与国府进行和平谈判，重建和平。一月二十一日，杨逵《和平宣言》发表的元月二十四日的三天前，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

《和平宣言》上所说“现在国内战乱已经临到和平的重要关头”，指的就是在内战的末期，国共双方都提出“和平”条件，要求终止内战这样一个背景而言。当时台湾人民“谁都在关心着这局面的发展”，热切希望和局快快实现，使台湾得以避免一场内战的浩劫。历史地看来，在当时整个形势下，中共《关于时局的声明》自然起着主导和平的、压倒性作用。杨逵和他的“教授、记者、文化人”确实在当时是深深“相信台湾可能成为一个和平建设的示范区”的。因为和平已经在望，内战终结在即，剩下的是台湾内部的民族团结，协同建设的问题了。

杨逵要大家“协力推进”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竟然是“一致协力消灭所谓独立及托管的一切企图”。对于现代的读者，一些历史背景的补充，对于理解杨逵先生的民族和平思想，应该有所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西斯轴心国家德、意、日战败了。但在美、苏、英、中反法西斯轴心的同盟国家中，美苏所分别代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营垒之间的对峙

关系日益高涨。美国以二战过程中壮大的国力，代替在二战中衰疲的旧殖民主义国家，广泛干涉世界各地的反帝、民族、民主运动，自然也就深刻地涉入在战后于大陆迅速扩大的国共内战。

随着战后国共内战的展开和国际冷战对峙的加温，美国在大陆、香港和台北的使领馆，美国陆、海军情报部和白宫，一直忙着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个中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预见到国府在内战中的失败命运，为了不使具有高度远东反共战略价值的台湾沦入共党之手，应当及早想方设法，让台湾先纳入联合国“托管”体制，然后进行“公民投票”，在台湾成立一个“对美国极端友好”、“反共”、“与中国分离的台湾”。

为了达成这样一个美国对台政策目标，美国军系情报系统，在南京、香港和台北的美国使领馆，美国国家会议和白宫、国务院，从一九四六年起，就不断地忙碌工作。

一九四八年，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通过新加坡《南侨日报》、以炮制的“台湾民主联盟”名义向联合国通电，要求在台成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自治政府，直接接受联合国组织监督的权利”。这件事经美国新闻机关扩大渲染为“台湾人向联合国要求联合国托管”。

一九四七年二月惨变后，美国魏德迈将军访华。当时任职台北领事馆的柯乔治在大陆把廖文毅引荐给魏德迈，面呈“处理台湾意见书”。其中就有一条要求美国促成联合国“托管”台湾两年后，在台湾进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

一九四八年，廖文毅又以“台湾再解放同盟”领导人的名义主张国际干涉，先让台湾脱离中国，再经“公民投票”决定其地位。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九日，杨逵《和平宣言》发表前四日，美国代理国务卿R·罗威特有一件致当时杜鲁门总统的一份备忘

录，提到如果“中共犯台，美国应以联合国之名，以局势已对和平造成威胁、或以台湾实质地位未定的问题，通过菲律宾、澳洲，向联合国要求加以干涉，再徐图在台湾进行公开投票，脱离中国”。

从这些今日已经解密的美国外交机密文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杨逵《和平宣言》第一条所指涉政治情况的具体历史文脉。杨逵为了保持台湾的和平，不但要防止国共内战的火焰延烧到台湾，他也要极力防止由国际力量干涉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所引起的“类似二·二八事件的重演”。

人们要问，一九四九年元月的国民党，在国内战争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命运，早已不是一九四七年二月当时，又以意恣心骄地镇压一个要求民主自治的蜂起的国府了，为什么说“所谓独立以及（联合国）托管的一切企图”会招来“类似‘二·二八’事件的重演”？

这个答案，也应该在这个时期美国有关对台政策的外交密件中去寻找。举一件例子。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致当时副国务卿鲁斯克的一份备忘录上，指出从当时的形势看，台湾陷共，只是时间问题。为抵抗此一形势的政策选择之一，是美国直接武装干涉，占领台湾，“在很大程度上担负政府管理和经济浩劫的责任”。但“不言而喻，（这）……将被大陆中国人民”和遍亚洲与世界“看作是美国的一项侵略行为”。换言之，美国一方面需要为它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反共战略占领台湾，但以其强大的国力，犹深忌因而“激起中国人一致的仇外情绪，使这仇恨落到我们（美国）自己身上”（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谈话记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因此，杨逵在《和平宣言》所说的“类似‘二·二八’事变”，当然就不是指国民党对“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镇压，而是指当时全中国人民反对以国府为代

表的封建权力和它背后的美国势力的革命中，“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势必被包括台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看作是美国的一项侵略行为”，从而“激起中国人一致的仇外情绪”，造成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反民族运动间的矛盾与斗争所引起同族相残的悲剧。

在充满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本殖民地时代的台湾，杨逵毫不含糊地以实践和斗争回答了历史交给一个殖民地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课题。然而，这样一个杨逵，却同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他在不幸的二·二八事变后，痛感到民族内部应当展开“彼此的理解，沟通与友谊”，来促进和“展开民族团结”。他说道：

“民国三十八年，我同一些外省籍文化人常常讨论；二·二八事变所造成的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鸿沟，应该填平起来。我于是写了一篇《和平宣言》，主张先从台湾文化界做起，把当时台湾的文化界，不论省籍，用‘台湾文化联谊会’的组织，开始彼此的理解，沟通与交谊，先由文化界展开民族团结，一步步弥补二·二八事变所造成的民族创伤。

“不料，我却因此被政府逮捕，判了十二年徒刑，被送到火烧岛去。其实，我只是延续我青年时代所信守的和平主义罢了。

“在火烧岛，囚舍背后的山腹，写着‘信义和平’四个大字。每天，我看见‘和平’两个斗大的字，我就想：我竟是为了中国人中间的和平与团结来这儿的！我曾经为了使台湾从日帝支配下解放，奔波半生，虽然并不是了不起的事，但总也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人的相爱，相互间的和平，却有艰难的遭遇，这成为我心中无从解开的疑结。”

一九八二年·悼念老友徐复观先生

但“疑结”只是“疑结”，杨逵却是一个对于和平和人的善良怀抱着近乎不可救药的信心的人。他坚决相信人有本然之善，即使他是敌人，只要我精诚所至，金石必开。他确实也亲自体验过他的至诚至善感化了日本特务，甚至使特务为他工作，为他自杀的事。他发表《和平宣言》前，竟然先去“向台中军管区的参谋长”商议，据说也得了“参谋长”的“赞成”。如果杨逵一直不疑这参谋长和三个月后他和他的“牵手叶陶和一个五岁的女儿”“一块被捕”有关，我们也不必惊讶。因为杨逵一方面对于不义最执拗的反抗者，但另一方面，他却对包括敌人在内的人的善良，怀抱着近于宗教的信念。这使杨逵和另外一些被迫在暴力中不得以阴谋、冷酷和暴力回答制度的阴谋、冷酷与暴力的职业革命家区别开来，发出熠人的人间性。

在台湾光复统一就充满深刻巨大矛盾的历史中，杨逵不惮于为“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1948），为努力填平二·二八事变所造成的民族裂痕和“鸿沟”，为了增进民族内部“彼此的理解、沟通与交谊……展开民族团结”，想到做到，立刻起草这千古著名的《和平宣言》，却为他换来十二年囹圄岁月。思昔而抚今，今天的“教授、记者、文化人”，在对待我们当面民族分断的历史上所表现的言行，和四十年前这一位毕生不惮于为民族与阶级的解放，哪怕是在最不利的时机都不放过斗争的机会，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团结的力量，永不断念于坚信即使是敌人的人性中本原之善的台湾进步作家杨逵先生相比较，感慨就极为深长而复杂了……

十句话

在皇民化运动下的“满洲”和台湾，一些中国人曾经诅咒自己的文化，憎恶自己的血液，为了要把自己的种姓彻底改变为日本人，而噤声呻吟。今天，日本军歌在台湾的地下电波中四处扩散，八瓣菊花旗仿佛日本皇室的九瓣菊花旗，在台湾的天空飘扬，日本作家宣扬我们的领袖“在二十二岁前是完全的日本人……”

这是日帝皇民化运动以来台湾的奇耻和奇变。

亲爱的兄弟，制止这狂乱和愚昧吧！

* *

受到霸强唆使，听信外人的逻辑，同一个母亲生养的兄弟彼此怨毒，互相诋骂；彼此疑猜，相互交接怒目，而不知以此为世中的至痛，不以此为人伦的大耻。

亲爱的兄弟，我们难道不该为此捶胸，泪流满面……

* *

政客们说，台湾是不是中国的领土，要借公民投票来决定。文学家说，台湾文学不是中国的文学，“台湾话”不是中国话。可敬的学者歌颂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原因是日本统治使台湾脱离了中国……而对于这沸沸扬扬，没有一个学人秉良识和真理发出驳论。曲学阿世的学风，浪卷袞袞一世博士们。

* *

亲爱的兄弟，说到见识，我们这卑微的人，怎么就同那些贤明的人有这么大的差距！

* *

许多曾经以反日爱国、宣扬政令为题材写过成篇累牍的小说的大作家们，今天却成了台独文学界的大佬和导师；许多在严酷的专制时期噤声不语，甚至做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共犯人的学人；许多在黑暗的历史时光中写过社论为独裁者粉饰，扭曲过事实的大媒体，如今一概不做交代，不表反省，就把自己装扮成自来民主，自来自由，自来敢言的斗士和英雄。

哦，亲爱的兄弟，这出丑戏，什么时候才收场哟！

* *

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诅咒四十年住这块土地、吃这块土地、却不认同这块土地的中国人！”、“中国猪，滚回去！”的呼嚣响彻校园，响彻社会，响彻游行示威队伍时，你懦弱地缄默，以脸上卑怯的笑容掩饰心灵深处的恐惧；你跟着附和句句鞭笞你出生尊严的狂言，甚至到电台辱骂你自己的祖乡和宗姓……啊，你不敢挺身而出而为自己的出生保卫起码的尊严，勇敢地同反民族的势力斗争！

亲爱的兄弟，很多的时候，抵抗是为了不使对方沦为禽兽，而斗争正是为了寻求真诚的团结。

汉族往台湾移民的历史中，有阴惨的暗部。蛇头苛酷榨取，在大海中谋财害命，在台湾岛的近海中弃溺移民，名曰：“种芋”。幸而登岸的“罗议脚”，立刻陷入先来移民残暴的主佃关系中，受尽盘剥。几百年后，这幕大肆鱼肉兄弟骨肉的惨剧，在“文明开化”的台湾变本加厉地上演。“大陆客”、“大陆妹”、“偷渡客”、“外劳”这些称呼，使骨肉兄弟变成了奴隶。非我族类、人可得而压迫之。非我族类，死了，也不过死了一条野狗。

亲爱的兄弟，移民同胞构成的社会，相煎一何太酷！

* *

我们嘲笑我们兄弟的菜篮。我们讥弄我们兄弟饭桌上的菜肴。我们仗着金钱奸淫我们的亲姊妹。我们以优势的汇率，轻贱自己兄弟家中的物质，连带轻贱了自己的兄弟。而我们的兄弟也难忍对露白之财的饥饿与嫉怒，对我们施讹诈，放火烧船，犯下骇人的谋杀。

啊，亲爱的兄弟，让我们一道去照看镜中的自己，凝视丑恶中的丑恶，而后放声恸哭吧！

* *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入了长期的羞耻、内战和外患；陷入了无边的贫困、愚昧、疾病和破灭。但祖国两岸的儿女，偏偏投向那无涯的黑暗，为了救亡，破碎自己，义无反顾。今天，当祖国两岸开始有自己不可侵侮的国防，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海关，开始被世界看成冉冉上升的明日大国，却反而同族相慢、相仇、相恶，在别人的宴席上，对别人谄笑，对自己怒目。

亲爱的兄弟，你倒是评说评说，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 *

民族主义成了骂人的肮脏话。人们组织“第五十一俱乐部”，公然要争取台湾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分离运动一位大领袖，一下飞机就说：“要统一，怎么去找一个贫穷又没卫生的中国？要统一，也要找个像美国那样的大国去统一。”一位“研习历史学二十二年”的学者说，要高举台湾人在日本殖民政府下当了五十年日本人的历史事实，证明台湾早已“日本化”，不是中国人。

亲爱的兄弟，没多久以前，“膺惩暴支”，“八紘一宇”、“大东亚共荣”的呐喊，曾经震撼日本支配下的满蒙、台湾和太平洋；纳粹的“亚利安人是上天选民”，“犹太恶魔应当灭绝”，向“希特勒

致敬”！的呼啸，使欧洲颤抖，然则，而今安在？

* *

啊，中国，永恒的母亲！

但愿你的儿女不以为奴骄人。但愿长期分离的兄弟彼此流泪拥抱，泯除一切恩仇，交杯共饮骨肉的血酒。但愿文士不曲学以阿世，政客不向内外的权力谄笑。但愿你的稚儿不以出生相歧视，不因出生受威暴……

是的，中国，永恒的母亲！

但愿你的儿女在前进的途中，像受苦的孩子那样，永远不忘记高擎着正直、公义、和平与团结的火炬，抵挡恶人，扶持弱小……

帝国主义者和 后殖民地的精英

评李登辉和司马辽太郎的对谈

四月三十日起一连三天,《自立晚报》刊出了幸芳所译日本《周刊朝日》上一篇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与李登辉的对谈。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者与后殖民地精英间的对谈,读来苦涩不堪,感触殊深。

帝国主义者司马辽太郎

司马和李登辉两位知识分子,大概都是出生于二十年代的人。一个生在二十年代的日本。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同时进行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扩张,在日俄战争和日清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并有了日本北方、台湾以及后来朝鲜等“新附”之领土和殖民地。二十年代中后,日本陆续残酷镇压日本本地、台湾和朝鲜的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三十年代,日本的铁蹄纵横中华大地,造成深重的苦难。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太平洋扩大,在辽阔之东南亚、南洋地区,留下了不能追赦的战争罪行,而终于在一九四五年招来侵略的破局和败北。

司马和李登辉,正是在这侵略与反侵略、加害与被害、支配与反抗的历史中,完成了小学——公学校、高等学校和大学教育。但一个是殖民者日本人秀才,一个是殖民地的台湾人精英。一个

成了日本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一个在后殖民地台湾向美日独占资本形成新殖民地依附过程中的台湾内部合作机制(internal collaborating machanism)“国际开发总署”——“农复会”的精英官僚，嗣后又被吸收到国民党地方而中央的官僚系统，而成为后蒋时期台湾本土新的官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State)的“总统”。

帝国主义和“无主之地”

在殖民主义母国扩张运动中成长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帝国主义者。但司马辽太郎在这次与李登辉对谈中的言论，说明他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

他说台湾本是“无主之地”。对于一个侵略者民族——而且这侵略罪行才不过是四十年前的事——的知识人而言，这是不知以暴行和掠夺为耻的暴言。这样的人，对于中华民族在台湾绵长的开拓史实，完全可以视若无睹，而到处看到“无主”的土地。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就不断兴奋地到处“发现”“无主”的陆洲而据为己有。一直到今天，主张“台湾地位未定”，主张台湾海峡“中立”，其实就是台湾原为“无主之地”的帝国主义论调现代版。正是在这新的“无主之地论”上，美日联手炮制了“日台和约”，炮制台湾“地位未定”的论据，分裂中国，武装占据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

司马是一个文学家。他当然知道他所写的文章中每一个关键词真实的指谓。从台湾原为“无主之地”论开始，他说一八九五年以后的五十年间，“台湾曾是日本的领土”。他甚至不愿意说“台湾曾是日本的殖民地”。司马一句“台湾曾是日本的领土”，便无形中掩饰了一八九六年以至一九一五年前后台湾人民前仆后继、牺牲数十万人的反割让武装斗争，掩饰二十年代台湾波澜壮

阔的文化、政治、社会抵抗运动，掩盖一九三〇年台湾少数民族雾社抗日武装斗争、掩盖了日帝当局温存半封建主佃关系，经由糖业资本主义压抑广泛台湾农民，并以警察权力镇压台湾人民的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和以皇民运动驱策台湾人民充当日帝军事扩张主义的炮灰，以慰安妇制度羞辱台湾妇女，强迫消除汉族语言、强令更改祖宗名姓……这些罄竹难书的暴力、掠夺和压迫。

司马引用梅棹的话，把兼并了韩民族的朝鲜和汉族的台湾所形成的帝国日本，无限怀思地说成“多民族国家”，却又硬生生要从中国分离出一个“台湾人的台湾国家”；要对历史长期凝聚而成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国说三道四，说中国应该只有四川省那么大是最好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做为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惩处，日本不能不归还台澎予中国。但司马却把这赃物的偿还，说成台澎从日本“分离”！司马还责难日本人“（从一八九五年）直到一九四五年分离为止，在此（台湾）出生、且受过教育的台湾人们，曾当过十足的日本人一事，我们（日本人）已经逐渐淡忘”！

“十足的日本人”论的侮辱

这是对于台湾人民的极大的羞辱与枉曲。

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样，台湾在日统下出过大大小小的亲日派和汉奸。殖民当局通过这个和殖民主子合作的精英（elite collaborators）渗透到殖民地各阶层，加强了控制，并且对殖民地人民起到“事敌者荣显获利”的典范作用。这些人上焉者是地主豪绅富商，如辜、林、陈、颜。下焉者是“三脚”教师、壮丁团长、保甲长、中下层警察。但这样的“十足的日本人”，毕竟是极少数。事实上，连日本统治当局对于台湾人民抗日蜂起不断寻找

原因，而有这样的结论：

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源于他们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经常都在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固然是属于这汉民族的系统，改隶虽然已经过了四十余年，但是现在还保持着以往的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盖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且交通来往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素视为父祖坟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摆脱，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

日本人自己对五十年日本统治下的同化政策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一九〇五年，滨田正经在《台湾观察报告》中说，台民在墓碑上刻清朝年号和清廷颁赐的勋爵，而谓日本“同化（论）者乍一闻之，必愤慨一番”。一九二八年，滨田恒之助在他的《台湾》中，看到岛民恪奉中国传统祭典，铺张盛大，对台湾日本神社的大祭，却乏人参拜，从而警惕到此一悬殊，“不是好现象”。一九四四年，中川正在《关于日台生活的交流》中指出，在食、住等具体生活中，台人不理会皇民化运动，仍然保持中国的生活方式，大为抱怨。

说台湾曾有五十年是“日本的领土”；说台湾人在这五十年间当过“十足的日本人”，司马辽太郎和日本庞大的右翼一样，一笔抹杀了日本殖民主义以暴力、杀戮、劫人财富、毁人文化、辱人格所造成的，交错了耻辱的屈从和壮烈亡身破家的抵抗、扩及全东亚和南洋的残暴加害的历史。这其实就是日本当局长期篡改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与战争责任部分的史实，每隔一年两年，就搞一次阁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表“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和“大东亚战争”是把亚洲从白人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好的战争”论的根源所在。

日本是战后台韩独裁政权的受益人和共犯人

司马着意强调了“台湾与日本分离后，中华民国就踏上了台湾”。他说和日本“分离”，被“中华民国”“踏上”后的台湾人，却受到“中华民国”统治者的“差别”（歧视）和“压制”。“曾经是日本领土”的台湾，因日本战败被迫“分离”出去，被中华民国占领，使“台湾人”受到“中国人”长期歧视和压制——这样的司马的帝国主义逻辑，跃然纸上。但我们以轻蔑的横眉对之，不屑一辩，倒是想谈一谈战后台湾人民在“国家危害”中死难受害的历史与日本的密切关系。

一九四九年底，代表旧中国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失败，退守到以《波茨坦宣言》归还中国的台湾。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冷战形势达于尖峰，美国武装强力干预中国内政，以军事、经济、外交、政治支持在台湾没有社会和阶级代表性的蒋氏政权。在镇压一九四七年二月间台湾人民要求民主政治的蜂起后，从一九四九年底开始，蒋氏政府又展开了长达四五年的残酷肃清——司马所谓的“国家危害”，夜不能安睡，宪警秘密逮捕……的“苦难”——建立了波拿巴式（Bonapartist）高度个人独裁国家。

战败后的日本巧妙的利用了国际冷战局势，逃避了战争罪责的清偿，以完全扈从美国在远东的反共、帝国主义政策，换取了天皇体制和战争财阀、官僚与军阀的延命。一九五三年，在美帝

国主义一手导演之下，日本悍然拒绝和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付出最惨重牺牲的中国（大陆）人民媾和，而单独与扈从美日的台湾订立和约，留下“台湾地位未定”帝国主义把柄，并长期具体地在政治、经济、外交上支持了台湾压迫性政权。

这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日本紧随美国，采取封锁中国大陆，以新中国与人民为敌，支持蒋氏政权，强化两岸对峙分裂的帝国主义政策。韩战以后，美国采取重建日本资本主义以反共的政策，以美国自己的市场为日本工业品的销售基地，并迫使朝鲜和台湾为日本资金、机器、半成品的倾销市场，恢复朝鲜与台湾对日输出农产品、输入工业产品的旧殖民地经济分工。日本无视台湾和南韩独裁政权对人民的“国家危害”，长期支持两个压迫性政权，利用台、韩“独裁下的成长”，促成日本独占资本对两地的渗透，造成深刻的对日技术依附，无法自拔。今天，台湾早已成为专为日本潜水获鱼鹈鹕，大量贸易剩余，奉送给日本。

在五十年对台直接威暴性的殖民支配后，日本不但不知反省，又进一步扈随美帝巩固独裁政权，造成对台湾人民的“国家危害”，在台湾掠取新殖民主义的利益，对台湾的人民犯下了罪恶的二次加害。在这丑恶的历史之前，司马辽太郎有什么资格对战后台湾独裁体制对台湾人民的加害评头论足？事实已经明若白昼：司马辽太郎之流的日本和日本人正是那台湾黑暗时代的“国家危害”，让四千人刑死、八千人投狱巨大犯罪的共犯人！

“单一民族国家”日本的虚构

司马兴奋地呼喊，“那个（国家危害的）时代结束了。蒋家的时代已落幕。难以置信的是本岛人李登辉成为总统了。”

在帝国主义日本，日本本部叫做“内地”，朝鲜、台湾这些殖

民地则叫做“外地”。从人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叫“内地人”，殖民地人叫“外地人”。在台湾这个岛屿殖民地，台湾人又叫“本岛人”(Hontoh Zhin)，与殖民者日本“内地人”(Zaichi Zhin)相对，有明确的政治、人格、阶级、民族的歧视意义。司马不用“台湾人李登辉”而刻意用“本岛人李登辉”是用心深刻，心怀倨傲，对台湾、台湾人和李登辉个人深度鄙视的帝国主义侮辱心态的总暴露，殊可憎恶。

中心国家的扩张运动中，帝国主义者看到传统的、边陲社会和地域，总觉得人家是“无主之地”，不掠而得之，其心不悦。等到这些地区或国家抵抗外侮，取得了独立，帝国主义者就说别人的主观概念有问题，别人的领土构成有问题，但是对于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侵略的、霸权主义的主权意识和领土形成过程中的强盗历史，则装聋做哑。司马的逻辑，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不仅在黄河流域，而在中华大地上许多文化发源中心自然形成了中华独自的文化，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交替支配、相互融合中，自然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世界有两千多个民族，一百来个国家，多民族国家的自然形成，是合理的结果。

但夸言“万世一系”、“单一民族”的日本，其实是武力威压冲绳和北海道少数民族而形成，一直到今天，只有本州、四国、九州才是日本本部。冲绳人称这本部的日本为“本土”；北海道人则称日本本部为“内地”，成为日本境内的殖民地。

实则，日本的扩张，始于早在现代以前并有北海道、冲绳和千岛之时，北海道的殖民地化过程中，日本人侵夺爱奴人的土地，剥夺其生活权，榨取其劳动，锐减其人民……对别人的主权和领土问题喋喋不休的司马，可曾为日本对冲绳人民、九州人民的……的“差别”和压制说过一句话？而由这样的司马，说出台湾人

“原本是汉民族，却由于五十年的历史，与其他的汉民族不同，而成为被歧视的民族”。这种“台湾民族论”与“台独”的“民族论”何其相似乃尔！五十年异族支配，丝毫不曾改变台湾人做为中国人的习性、文化和生活，已如前论，不值再驳。只是读司马暴论，才知“台独”的民族论原也不是什么独创，而是从帝国主义者那儿捧过来的东西。“台独”“台湾人的悲哀”，何过于此！”

荒唐的文明论

司马辽太郎有一个荒唐的“文明论”。他以三个标准评价“台湾是文明国”：

第一、“早晨五点时会有牛奶放在牛奶箱内，不必养牛挤奶”。养鸡取蛋，养牛挤奶，是农业尚未资本主义化一段长时期人类共同的文明。农业资本主义化（农产品高度商品化，高度资本主义市场取向）是经济全体资本主义化的一部分。司马的台湾文明论，简单地理解为台湾的资本主义化。这里无暇细论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化的苦涩，要之，台湾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内包着民族分断，强迫性的对美日依附化，沦为其独占资本的补充经济逻辑，冷血支持台湾独裁体制进行其积累……这些过程中的骇人的野蛮。这些野蛮还包括殖民地/新殖民地屈从和卑屈谄媚的延长，对殖民地/新殖民地伤痕的积累与发酵，等等。不要说到资本主义“文明作用”的另一面——野蛮和非人化作用之类的一般论，具体说到，美国新殖民主义在台湾的桥头堡“农复会”主导过的自美进口牛肉牛奶，如何打击了台湾畜牧农民，就是一本复杂、辛辣的账本——野蛮的账本。

第二、“不必担心送牛奶的人会在途中被游击手打死”。这是说，台湾在美日长期支持台湾反共独裁政府，助其资本主义化以

后，台湾已不存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为民族和阶级解放而斗争的“游击手”。司马不知不觉地歌颂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骇人听闻，使青年李登辉“晚上不能好好睡一觉”的反共肃清行动。镇压反帝分子，肃清劳农阶级民主运动家，拷问为劳农解放的活动家，对司马这样的帝国主义者，如同对日据下总督、警察、宪兵一样，当然是“文明化”的标志。

不过，这样的“游击队”对于打死一个送牛奶的工人，不会有兴趣，倒是很可能打死一个喝牛奶的，特别是为帝国主义拼命辩护的司马这样的人。如果司马举的这个例子，是说明台湾治安之良好，台北街头上任何人都可以反驳司马这一幼稚的“台湾文明论”吧。

第三、“早晨可以安全收到报纸，阅读到世界大事”。在殖民地人民反抗怒潮中生活的殖民者，不免疑神疑鬼，司马竟而疑心台湾有抵抗的 Partisans 会去打死一个苦命报童。这且不提，说一说报纸上的“世界大事”。台湾今天自卫星跨空而来的 NHK，CNN，ABC 所诠释的“世界大事”，带来了多少大国中心的意识形态和偏见，而构成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支配的野蛮，这肯定不是司马之流的人所能理解的。

殖民地深刻的伤痕

在李登辉愤愤不平地怪罪被屈服的清朝将台湾割让日本，而对割掠者日本帝国主义无一字之责怒时，司马得意地说日本当局在割让前夕，让台民自由选择了国籍，十分得意。

以暴力威屈一个国家，割掠其土地，强制殖民地人以虚假的“自由选择”形式，放弃自己民族的国籍，这本身就是可耻的犯罪。

依《马关条约》相关条文，台湾割让日本后，台湾居民不欲

留在被割让的台湾者，“得自由售其所有不动产退出（台湾）”，并在为期两年的“犹豫期”后犹未离开台湾者，“得依日本国之决定，视为日本国臣民”。

这其实是台湾被日本割掠后，以强权规定台湾人民在放弃继续居住台湾家园，或继续留在殖民地当亡国奴两者做出选择。经过三百年的开发，墓园生计，盘根交错，又如何能“不喜欢”为奴事敌就“可以离开”？在台湾易主、世局动乱的时代，如何“售其所有不动产”？当时两百六十万岛民中，有力量和条件“退出”台湾回到原籍者不过四千五百人。司马和李登辉如果据此而谓绝大多数台湾人在自由选择下留下来，当“十足的日本人”，那就真是皮相之见了。（戴国辉，一九九四）

其次，由于这强权下的国籍更易条件下，日本人为籍在台湾而居留日本和大陆闽南等地的台湾人以歧视性的日本籍——“台湾籍民”。尤其有一些不良不肖台湾人，便仗着这“日本臣民”——台湾籍民的背景，在大陆厦门、福州等地为非作歹，引起大陆人民深刻的反感与民怨，造成殖民体制和帝国主义下同族相仇相残的悲剧，成为台湾强权下的国籍改隶，纵容少数台湾籍民（“台湾呆狗”）为日帝鹰犬。这是不知以暴力为耻的帝国主义伎俩，造成了深刻的伤害。

帝国主义者司马辽太郎对日本五十年对台支配，在与李登辉的对话中，始终没有一句表示羞惭与谢罪之意，而且始终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津津乐道，傲慢自得，溢于言表。从文学者的立场看，这样的历史小说家而在日本享有盛名，和我认识的多位日本良知知识分子相形之下，不唯对司马感到鄙弃与不齿，对养成司马无知、狂妄的日本文化界和读书界，深为失望。

而对从头到尾唯唯附和、引伸司马暴论（见《自由时报》中李登辉的文明论），知识上破绽连连（例如将上述犹豫期两年误为

一年，等等）的李登辉，我们的感受，已不是失望，而是深沉无从排遣的悲伤了。

后殖民地合作精英李登辉

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宰制的机制，是直接以武力介入殖民地社会，设置政治、经济、军事的直接宰制，以改造殖民地社经结构，使之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并形成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依附。

二战后，旧殖民体制瓦解。新帝国主义对后殖民地的宰制，改而透过后殖民地社会的内部合作来介入新的改造过程——向着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依附所进行的改造过程。

这种“内部合作”的机制，需要有“合作精英”（colaborating elite）的养成，参与和帮办。李登辉战后扶摇晋升的生涯和历程，说明他是具有台湾特色的后殖民地合作精英（post-colonial col-laborating elite）。

依附性的国家政权

台湾后殖民地合作精英的出场，有一个复杂的历程。其复杂性又与国民党国家政权（State）在中国革命、世界冷战等支派中复杂的嬗变相应。理解李登辉的“后殖民地合作精英”性格，不能不从国民党国家政权的嬗变始。

历史上，台湾自来不是一个国家。台湾的殖民地化，是做为中国国土之部分而被“割让”出去。因此，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之时，台湾当然没有一个等待复权的政权。在国际承认下，代表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以陈仪的“长官公署”的形式，接收并统治台湾。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

国民党国家政权，虽然逐渐崩溃，却一直有它的阶级和下层建筑的基础。

一九四九年，共和国在一场大革命后宣告成立。国民党国家政权遭到全面的颠覆。体现旧中国国家政权的阶级和下层建筑彻底瓦解，但做为国民党国家的法政上部结构，随败军流亡来台，在一个没有阶级和社会联系的台湾，设立中央政府。流亡来台的旧统治阶级丧失了财产、土地、生产工具。至此，国民党国家政权一无物质基磐，二不代表台湾社会的阶级关系，从而成为一个“虚幻的国家政权”。

一九五〇年六月，韩战爆发，美国军经援助涌至，美第七舰队封断海峡，美国以强大外交和政治支持，使这“虚幻的国家政权”对外得以在国际社会立足，对内在一场残酷肃清的暴力下树立了高度个人独裁的波拿巴式国家政权（Bonapartist state）。

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样，殖民地历史严重破坏了台湾的国民经济。光复以后，台湾只有规模数量皆不为大的地主，几乎没有现代产业资本家。而佃农、贫农的社会政治势力早在三十年代战争体制中被摧残殆尽。

然而，正是在没有社会下层建筑条件下，由于以美国国益为中心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需要，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在台湾强行树立了独裁的国家政权。这就是雷依（P. P. Rey）所说，先树立国家政权这个上层建筑，再以这个家政权的权力，去打造社会经济的下层建筑这样一个模式。这可以说是“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建筑”的特殊的国家政权形成范式。

然而，现实上又不能有一个没有社会经济下层建筑的国家政权。那么在没有直接的社会经济下层建筑和资产阶级诸派系（bourgeoise fractions）情况下，出生国家政权的母体又是什么？弗里曼（J. R. Freeman）说过：“从依附的脉络以观，这国家政权

的社会构造的基础十分脆弱。一个依附性国家政权，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被造之物，并依附这体系而得以存在……”

韩国学者金咏镐说，韩国和台湾的国家政权正是“世界体系的被造之物”。“而这世界体系者无他，正是美国霸权秩序（Pax Americana）”。

因此，做为美帝国主义所手造的台湾国家政权，便有了正负双面性的“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一方面，对于台湾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以蒋介石个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国家政权，拥有波拿巴式高度独裁权力，即拥有近乎绝对的“相对自主性”。蒋国家政权以世界冷战和国共内战结构所炮制的、严峻的反共国家安全体系，秉承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意志，保持安全稳定，防止工农阶级的反对，以国家干涉与跨国资本发展反共“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创造跨国资本优良的投资环境。这样，一个一度虚幻化的国家政权，以独裁权力，培养、创造了公营独占资本和私人集团企业，为自己打造社会经济的下层建筑，而蜕变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炮制的依附性国家政权。

另一方面，做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被造物，一九五〇年以降的国民党“国家”对世界体系大幅丧失了“相对自主性”。全面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取得存在合法性的国民党国家，成为美国驯服的扈从国家，为实践美国国益——兼以为己延命——对以美帝为核心之世界体系的意志，一般地不敢稍有违拗，几无主权可言。

正是在这一双面性的国家政权相对自主性之下，形成了由跨国资本（世界体系）、国家政权（世界体系之手造物）、本地资本（世界体系和国家政权所豢养）所构成的“三边联盟”（triple alliance），成为新生台湾扈从性国家政权的宰制机制。一个幻想的国家政权，至此成为畸形却具体的依附性国家政权。

而世界体系与其手造的国民党国家政权间之意志的传达，便依赖于帝国主义体系在台湾内部设置的“合作装置”（collaborating apparatus）——国际开发总署、中华开发公司、农复会、生产力中心，等等。这些装置，地位特殊，有巨大的权力，深入介入到国民党国家政权的权力核心，进行广泛干涉、指导、命令、监督，并借此改造国民党国家政权，使之符合美国霸权下的秩序最大的利益。

而这些“合作装置”中，招纳了大量满脑子美国价值和“现代化理论”，受过美国各种不同专业养成训练和在职训练，亲美（日）、反共、反中共的本地后殖民地“合作精英”，由他们具体实践和推动世界体系对于国民党国家政权的各种意思和意志。他们地位特殊，有各种专业上的精英训练，薪给高于其他政府机关，社会地位独特，外（美）国背景显著，在国民党流亡集团由幻想性国家向依附性国家蜕变的长期过程中，自然形成一股独特的集团和阶层。

李登辉的双重生涯

李登辉生于日帝下一个地主·巡查（基层警察）的家庭。一九四五年日帝战败时，他几乎要完成在日本的大学教育。一九四六年春，他参加了北京沈崇事件扩及台北学生运动的波纹。他也参与了一九四七年春“二·二八”事变的学生活动。传说他一度参加地下党，不久以“性不适实践，欲改志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台湾农村”为由，而正式脱党。

青年李登辉的脱党，使他幸免刑死于紧接而来雷厉的白色恐怖中。和他同时代从日本东京帝大、早稻田大、京都帝大、应庆大……回来的殖民地台湾精英，有多少人投入新民主主义的变革

运动，不久纷纷在白色恐怖的暴风雪中仆倒。用日本话中的“转向”（背叛原来的政治思想立场）来说李先生，也许太过于严酷。但李先生比谁都知道，他过去的同志们曾在最凶残的拷问中信守了诺言。没有人能想象年轻的李先生，在那绝对残忍、冷酷的异端扑杀运动中，如何安然通过了侦探和刽子手的扑击。但稍有白色恐怖的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要在“自新”、“自首”后全身而退，又能保存良心与灵魂的完璧，是何等困难，何等摧残。

在那死白、荒漠的日夜，推想李先生经过了令人绝望和恐惧的约谈侦讯，推想他在当时每天的报纸上读到无数他所认识和不认识的同学、同侪、朋友，因“奸匪”罪名伏诛的消息，焦虑惧怕，夜不安枕。

无论如何，他奇迹一般地幸运地，以他九死一生的背景，完成了学业，进入农复会工作，到美国进修，并获得博士学位，又进入国民党国家政权的行政官僚系统，终于在台湾本地官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登场的历史时刻，成为第一位台湾籍的“总统”。

然而，也正是李登辉这漫长、神奇的双重生涯——同时兼有以美帝国主义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在台湾内部“合作装置”官僚、和这世界体系手造的工具性国家政权——国民党政府官僚的双重身份那一种生涯，决定了李登辉的思想不能不反映和体现这世界体系——和它的手造之物即国民党国家的意识形态。

体现了世界体系对台湾的意志

正如巴雷特（R. E. Barret）所指出，一九四五年到七十年代初叶，美国政府支配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财政的、货币的、军事的以及国际贸易上的界域（parameter）。在具体战后的台湾问题上，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政府——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和

军事官僚——的意志，亦即世界体系的意志，可以综合整理如下：

——为了维持和强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发展及安全，必须围堵共产主义的“扩张”。

——为了建立围堵共产主义的太平洋岛屿锁链并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必须“防卫”台湾，免其沦入中共之手。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在朝鲜战争前）：

（一）由美国军事占领台湾；

（二）台湾交联合国托管；

（三）倒蒋——建立一个非蒋、非共、亲美的台湾“国家”。
（朝鲜战争后）

（四）军经援蒋，在深入监督及干涉下扶蒋；

（五）为反共及稳定，在台湾推动美国主导的“改革”，包括农地改革、促生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促进公营企业民营化……

（六）武力干涉海峡、军事进驻台湾。

（七）培植亲美“自由主义”力量，必要时可随时取代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巩固亲美、非（反）共、反中国的台湾。

这世界体系对于台湾的意志，千条万条，只有一条，那就是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使两岸民族分裂局面固定化、长久化，也使台湾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技术、经济、文化和政治、军事的依附固定化和永久化。

其次，看一看这世界体系的意志所手造的国民党国家政权的“意志”：

——恢复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权力。

——“反攻复国”、打倒“共匪”、颠覆中国工农联盟为核心的新生共和国。

——利用世界冷战形势、服从战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上述意志和战略，为阶级复辟，不惜牺牲民族利益，重建高度权威主义的、对美扈从的国家政权。

为达到此目的，国民党有这些措施：

（一）密集、全面推行极端的反共、反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动员。

（二）掩盖美台军事协防条约隔海对峙僵持的内容，宣传“反共统一”、“胜共统一”和“反攻复国”。这实际上就是反共拒和，反共拒统（一）。

（三）一九七〇年，台湾在外交上遭受严重挫折，台湾“国家”的虚幻性被揭破，蒋经国开始以有选择、有控制地吸收台籍精英至权力周围，来另行建立台湾“政治实体”，为自己寻求合法性——逐步走向“一中一台”的框架，即民族分离主义的框架。

由此可见，四十年来，在有关具体的台湾问题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思想和意志，是分裂中国，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使台湾成为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的前哨基地。而做为世界体系工具的蒋氏国民党国家的思想与意志，基本上是为了阶级复辟，完全臣服于世界体系思想和意志。

在与司马辽太郎“特别对谈”中所见的李登辉的思想、意志和意识形态，应该从李氏上述生涯历程上，看到做为世界体系和国民党虚幻国家的思想、意志之辩证法的统一，在李氏脑筋中的表现——即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为内容的“台湾独立论”。“台湾独立论”至此正式成为后蒋时期李氏国民党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有重大意义。但是，这由蒋介石的“反共统一”到一九七〇年蒋经国“企图的台湾政治实体论”，到李登辉的官式“台湾独立”论的历史演变，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官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登场

做为帝国主义体系之炮制物的台湾国家政权之虚幻性格，已见前论。

正是透过了这“幻想的国家政权”，世界体系以强大的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支持，赋予高度的强制，清除岛内工农阶级新民主主义的变革运动，并以“反共围堵”、“表现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为指导原则，一方面巩固和发展“公营企业”，一方面发展私人集团企业，为国民党“幻想国家”打造经济基础。

直如刘进庆所分析，这个战后台湾资本主义中公营和私业的双重构造的对立矛盾，在新生官商资产阶级的兴起，获至辩证的统一。而应该特别指出，相较于殖民地台湾，国民党国家政权在发展资本主义时，一般地、基本地没有“省籍”歧视，没有进行如总督府那样公然以国家权力的法政体制抑制、限制台湾土著产业资本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今日五大集团资本中，只有位居第五的徐氏远东集团是“外省人”资本，便是这历史的结论。

只顾抓住政治支配权力，疏于直接发展自己的独占性资本的国民党流亡集团，正是由于没有它们自己的产业资本为其社会基础，而在蒋经国死后，迅速地瓦解，退出了台湾的政治舞台，把国家政权交给了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本地官商大资产阶级。三十多年来法政上层建筑领域中“外省人”的绝对独占、与经济社会下层建筑中本地官商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所形成的矛盾，至李登辉政权的出台，而获得了统一。一个完全地代表了台湾官商资产阶级的“新的国家政权”，终于在李登辉这样一个“后殖民地精英”的领导下登场。越来越多的台湾本地官商资产阶级接管公营大企业、银行、政府行政体系、军部和情治机关的领导地位，形

势所趋，不可逆转。一九四九年底逃亡来台、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和它的国家政权，在实质上宣告了终结。

是继承与延长

然而，蒋氏国民党国家政权和李氏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不但不是否定和扬弃的关系，而是辩证地统一的、延续的关系；是国民党国家在当代的辩证统一，是公业官僚资产阶级与私业依附资产阶级的矛盾统一在国家政权上的表现。

韩国学者金咏镐所说，没有强有力的资产阶级，依靠国家政权和跨国资本的推动，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进行“依附性经济增长”的“第四代资本主义”——台韩资本主义，当然没有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的历程。台湾资产阶级，不但不反对国民党权威主义政治，反而享受权威主义政治对工业的镇压，取得高额、迅速的资本积累。台湾资产阶级放弃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还因为他们仅仅依靠私下对国家政权官僚体系的“游说”，就可以达成使国家政权为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服务的目的。而这“游说”的具体内容，便是对官僚的贿赂、赠与和回扣等，用以换取在投资、价格与市场的独占、贸易、融资的独占及超额利润。

在“地方自治”的领域，国民党“国家”为了抵抗高度道德诉求的“党外”，把地方民意代表候选人开放给台湾本地地方金牛，鼓励以金钱对抗党外的道德攻势，保住地方政权，并以权钱交易，和加利酬偿来补偿国民党金牛候选人在选举运动中巨大的买票花费。一九八七年以后，中央民代开放普遍选举，权钱交易的构造上升到中央政治，台湾资产阶级更是以赤裸的权钱交易的腐败机制直接参与中央民代的选举，参与“国政”，借以巩固和发展自己

的阶级利益。

于是资本在其循环过程中，借着私人“游说”依托各级官僚（官）和民代（政）获取特权和超额利润以扩大积累；官僚和民代又将来自资本的巨额贿赂、赠与和回扣等转投资而资本化，进行特权的积累，这就形成了在最近“阳光法案”中现身的这一代比“老贼”官政阶层还要富有、财产以亿万计的李氏国家的官僚和民代。一个由本地“商”（资本）、“官”（官僚）、“政”（民代）联合的官商资产阶级，已经迅速地形成，具体地以公营基于大产业的本地董事、总经理等管理阶层、集团大企业、私人银行和土建资本为台湾新官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而且，同过去一样，他们以国家权力，独占了台湾岛内市场，也与过去一样，排除了日落西山的本地中小企业资本。

十分明白：李登辉的台湾本地官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不是通过市民布尔乔亚革命对国民党前此的国家政权的否定所产生。恰恰相反，它是过去冷战结构下以妥协、机会主义、金权主义、特权掠夺、在为世界体系而买办“国际化”中，完全失去民族资本性质的台湾官商资产阶级的产物，李登辉的“新”国民党国家政权，恰恰是过去的、做为世界体系所炮制的国民党国家政权“本地化”的延长与发展，而不是它的否定！

世界体系在台湾的第二次“国家塑造”

朝鲜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依照它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在国民党的“合作”下，炮制了台湾这个“国家”政权。世界体系的策略是两手的策略。一方面以强大军经资源支持“代表全中国”的“中华民国”，不搞形式、名义上的分裂，以防止中共全面倒向苏联。但另一方面，又毫不忌讳地支持“非（反）共”、亲美、

“自由主义”——包括形形色色的“台湾独立派”——势力，以备必要时取代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家政权。

这两手策略，造成国民党与形形色色的“台独”派系间的紧张，形成两者间的绝对性矛盾。一九七〇年，中共突破冷战压力，赢得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外交承认。台湾作为虚拟的、工具性“国家”的性质揭露。蒋经国开始审慎地滑向“本土化”和“政治实体论”。而美国的另一手——扶助反中国、反共、反统一、亲美的台湾“自由派”——开始产生预期的作用。台湾“党外民主运动”支撑过高雄事件的压力，带着越来越明确的民族分裂主义登台。而蒋经国便是在美国另一只手所制造愈形高涨的压力——“党外”“民主运动”的四面楚歌下，孤独地死去。

然而，蒋经国之死，没有引发台湾市民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没有引发任何学生的反乱，没有政变，没有任何否定长期权威主义支配、清算独裁者的动乱。

在世界体系要求台湾“稳定”、“非共”、“亲美”长期原则下，李登辉平安地登上台湾权力的顶峰地位。而世界体系继一九五〇年以后第二次对台湾的“国家政权塑造”(statebuilding)于焉展开。这就要大大地归功于世界体系在台湾内部长期营造的桥头堡——“内部合作装置”。一九八〇年代后半，亲美、反共、反华、“自由主义”、“现代化主义”的知识分子同各界精英，早已占据了台湾朝野各领域的领导部门，成为这第二次“造国运动”的坚强后盾。

“党外”“台独”运动，形成后蒋时代对国民党旧势力接受世界体系对台湾第二次“国家政权塑造”的强大的工具性压力。在这强大压力下，助成美国对台的两手，在此关键时刻，合握为一——在反李焕、反郝柏村、反“老贼”的一波波政治斗争中，又一次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塑建了一个堂堂然吸收和接收一九八〇

年以降“台独”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蔚为己用的、新的台湾官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而仿佛一夜之间，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绝对性矛盾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两党间宣传口号的同一性。一个说“台湾命运共同体”一个说“台湾生命共同体”。两个都说台湾要有“国际活动空间”；都说台湾是“独立政治实体”；都说历来的一切台湾政权都是“外来政权”；都主张对立于中国人的“台湾人”；都主张针对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和“台湾人的台湾”；都主张针对中国历史的“台湾乡土历史”，和针对中国普通话的“台湾话”……“台湾独立”，台湾永世从中国分离出去！这就是目前阶段世界体系手造的李登辉台湾国家政权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李·司马对谈，是这第二次“国家政权塑造”所公开的庸俗版本的“建国宣言”。李便是这样顺势轻易地取得了“台独”“建国运动”的主导权。

乡土台湾真实的和平与解放：代结语

在进入结论之前，还要说一说李登辉的日本影响。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宣传动员逐次升高。迨四十年代初，李登辉、司马辽太郎皆为二十岁前后的热血青年。他们一度沉浸在当时“八纮一字”、“大东亚共荣”、“皇国日本”的法西斯狂热，怕是很难避免的。这是一九二三年生的一辈殖民者日本人精英和殖民地台湾人精英共同的时代体验。这说明了共有日制高等学校和大学教育体验的“内地人”司马和“外地人”台湾“本岛人”李登辉，一旦见面，不禁兴高采烈地用“高校”时代放言高论的日本语言做一番痛快的畅谈的精神史的背景。

以美国帝国主义为中心的战后世界体系在台湾的“内部合作精英”李登辉先生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想感情，以他那一代后殖民地精英独有的日本经验与日本情怀表达出来。这当中的复杂性，可以从李登辉台北（日本）旧制高校毕业、京都帝大肄业、战后台湾大学毕业、取得美国留学博士学位的历史，看出台湾后殖民地知识和精神历史的曲折与忧郁。

现在让我们做这几点结论：

一、从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迄今，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依照它自己的思想、利益，在台湾两度炮制了台湾的国家政权（state）。两次“国家塑造”，都采取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过程，不论是蒋氏国民党或李登辉指导下的本地官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都带有它的缔造者——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任务：亲美（日）、非（反）共、反华、反统一，从而最终从中国分离出去。

二、表现为旧国民党“反共统一”、“一个中国：中华民国”论和表现为反蒋、亲美（日）、反共、反华以至于各式“台独”的“民主”、“自由”运动，其实是一个世界体系在台湾问题处理策略上的两手。一九八七年，世界体系第一次炮制的蒋氏国家政权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舞台。世界体系的两手合握为一。台湾分离主义成为李登辉官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state ideology）。

于是不存在外省人、国民党讲“统一”，台湾人、在野党讲“建国”、讲“独立”的问题。台湾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与旧的国民党权威主义国家政权是相互连续的发展，不是革命的扬弃与重建。

三、因此，李登辉在与司马对谈的“台独宣言”中，依据上文的分析，存在着大量的欺诈性。在“独立”、“台湾人的台湾”论

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世界体系的深度支配，存在着严重的技术、市场……的依附化。在兴高采烈的“建国”论背后，存在着做为世界体系手造物台湾的事实，存在着在旧国民党威权主义政治下以败德、机会主义暴得实利的台湾官商资产阶级的支配问题。在“台湾民族论”背后，存在着混淆阶级与民族的定义，掩盖新的阶级支配事实的问题。

这种欺诈，势将在对台湾社会和历史认真、严谨的、科学的自我认识运动中，被揭发而终至于瓦解。

四、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由国家政权和外资主导，没有现代资产阶级市民民主革命的资本主义化，带来严重的“新兴工业化经济症候群”（NIE'S Syndromes' 涂照彦）：环境生态的破灭，全国性的赌博和投机，劳动及管理伦理的崩坏，社会道德系统瓦解，等等。这是依附性发展的歪曲性、依附性发展一定阶段所带来的政治退化（军事独裁，压抑民主）中资本积累过程的败德与不正义的构造有以致之。

因此，台湾的选择，便是挣脱一九五〇年以降，蒋氏国民党为阶级自保与延命与世界体系进行的交易合同，从世界体系的逻辑求得解放，而探索一条自主的、尊严的发展道德。如果“新兴工业化经济症候群”是依附性发展的宿命的代价，那么重建生态自然平衡，社会伦理的复建、教育、妇女、儿童、社区的民主、解放与发展的乡土台湾，答案就在中国的自立、和平与统一。美国、日本、西欧经济正在无可挽回地颓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面临一次重编的运动。中共也决定加入以 GATT 和 IMF 为骨架的世界体系，但却对这体系保持了高度的相对自主性。过去四十年间一面倒地倾向中心国政治与文化价值的台湾，应该同在一次伟大革命中重建了独立、自尊和对国际资本的相对自主性的中国一道，探索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以人为核心和目的的成长与繁荣的道路，

并在这探索中做出台湾的贡献。

认清一九五〇年以降台湾国家政权的本质，抛弃对李登辉和一切以“台湾”、“独立”、“建国”为言的运动的幻想，以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寻找能为乡土台湾带来真实的幸福、自主和平与解放之路——这是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会谈纪录发表后，台湾人民的新而重大的课题。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日

“台独”批判的 若干理论问题

对陈昭瑛《论台湾的 本土化运动》之回应

十几年来，岛内“台独”运动有巨大的发展。到了今日，它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种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学术界、中研院和高等教育领域，“台独”派学者、教授、研究生和言论人，独占各种讲坛、学术会议、教育宣传和言论阵地。而滔滔士林，缄默退避者、曲学以阿世者、谄笑投机者不乏其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读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心情不免激动。

在另外一方面，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年轻的学者已经开始对“台独”派的论述霸权提出了挑战。就我所知，《岛屿边缘》杂志的陈光兴，在第十七期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上发表了《帝国之眼：次帝国与国族国家的文化想象》（一九九四年七月），针对杨照的《从中国边陲到南洋的中心：一段被忽略的历史》（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四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批判了后者的南进论，并且进一步提出台湾资本主义“南进”的“次帝国主义”性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同季刊社举办了创社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中出現针对性强烈的批判“台独”政治、经济、文学论述的论文多

篇。对于知识、理论和逻辑粗疏，却充满法西斯独断和基本教义热狂的“台独”派诸论述，年轻的、前进的学界正开始批判的、比较科学的质问。敏锐的人们预感到一场论战的风雨欲来，引人关切。

陈昭瑛这篇《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论文的成绩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对我来说，陈昭瑛论文的贡献，可以大分为理论知识和治学论议的风格两个方面。先说理论知识方面比较大的，富于启发的方面。

首先，陈昭瑛从辩证的观点提出“台独”意识是“台湾意识的异化”，是台湾意识所衍生的对立物。因此，陈昭瑛又提出了民族统一的主张“就应该是一种对异化的克服”。韩国社会科学界也有“分断克服”的话。“分断克服”，就是克服民族分裂的意思，指谓这些广泛而深刻的实践内容：研究韩国资本主义的性质；探讨韩国“社会构成体”的实质；从而认识压迫性国家与民族分裂的本质，又进一步探求南北统一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科学地展望民族统一的历史。陈昭瑛虽未深入申论，也令人想到“台独”的克服，便是民族统一这个原则性、与照顾台湾历史过程中具体的特殊性这个灵活性的统一，这就为“台独”批判论和民族团结论留下丰富的思想理论空间去发展，而不机械地把“统”“独”看成毫无关连，彼此对立的東西看待。当然，有关“台独意识”是不是“中国意识”的“异化”，我个人则有完全不同的意见。在下文加以申论。但以辩证的逻辑看待“统一独”，是一个富于启发的视角。

其次，陈昭瑛看出了日据时代台湾左翼抵抗运动，对“本土”和“台湾”的概念有民族与阶级这双重视野。在人类历史进入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不但要看到民族分划成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不同地位的民族，也要看到民族的阶级内容，看到阶级在

民族内和跨民族间的同盟与斗争。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又要能分别因漫长历史和璀璨文明所凝成的古典的民族——例如埃及与中国，和与资本主义生成过程中因商品、市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政权的登场而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民族，以及在帝国主义下，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被强制编入边陲部资本主义过程的抵抗，即对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反帝民族、民主斗争而形成的民族主义。陈昭瑛提示了人们，在台湾自有从民族与阶级关系的视野去实践，保卫种姓，反对同化，反对自己民族中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本土化”运动的珍贵传统，并且为“台独”民族论之批判开展了重要的视界。

第三，陈昭瑛具体分别了“台独”论的本土主义和台湾的左翼在战前战后提起的本土主义有本质上的不同，即前者的亲帝国主义的、反民族解放的、反中国、即反民族的性格与后者之反帝的、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即中国指向的性质。这种不同，显示了在帝国主义体系下现当代世界史中，对于中心部资本主义独占体与边陲部民族解放运动对立构造中，“台独”与台湾左翼传统不同的自我定位，自然也显示了在帝国主义体系下，台湾各阶级与世界体系诸阶级间不同的阶级联盟与斗争中的立场。

陈昭瑛以上的论证，虽然在细部上仍然有不少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理论与逻辑上的问题，但人们也应看见陈昭瑛在反“台独”、民族统一的理论发展上，有一定的成绩，而且也应该把这些成绩看成主要的方面。其次，在陈昭瑛论述的风格上，我们有这两点体会：

首先是陈昭瑛在台湾的历史发展中高度意识地也将焦点放在台湾少数民族人民问题上。一九四六年后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就由当时台湾少数民族的英华组成“台湾蓬莱民族解放同盟”，并且在一九四九年底美蒋联手展开的血腥肃清中溃灭。少数民族领

袖命丧刑场，或长期监禁。这是一九三〇年雾社事件以来，台湾少数民族自求解放的运动以来第二次遭到惨酷彻底的镇压。

在探索对台湾社会 and 历史的自我认识过程中，批判汉族中心的史观，看见汉族移垦过程中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支配和掠夺的历史，看到一九三〇年雾社蜂起中少数民族在实行坚强的武装反日帝斗争的先进性和汉族当时相对落后性，也要看见一九四六年后，先进的汉人与少数民族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蜂起，及以后新民主主义变革运动中相互合作、支援并同遭美蒋反共冷战暴力摧毁的历史，当然也要看到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台湾少数民族在劳动（男性）与身体（女性）惨遭商品化，全民族趋于被“同化”而灭绝的过程。

另外，少数民族问题的提起，在今后“台独”批判和民族统一论的发展中极关重要。没有从这个历史反省中出发，就会在这个问题上造成大汉族主义的错误，从而也就会在反对地方分离主义的斗争中失去道德与理论的正当性。

最后，陈昭瑛论文在凝视台湾本土论的发展进程中，于批判“台独”论之余，也不惮于对左翼统派中一般与个人所犯的错误，提出严厉的批判。在这批判的背后，显现了对于被歪曲的历史中形成的“台湾意识”或台湾中心的思想感情一份深厚的同情。这当然也提出了“台独”批判问题中的团结与斗争的分际问题，但更其重要的，是陈昭瑛在文章中所体现的、阵营内部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的严肃态度。这是令人钦佩的态度。在往后反“台独”的理论斗争中，应该还要加以普及和发扬。

同所有的学术论文一样，陈昭瑛的论文，当然也有不少启发了读者去做进一层探讨的地方。以下提起的几个问题点，是从这几个原则出发的，即：（一）不取学院式讨论那样，流于炫示所学，排比书目的态度，而是回应陈昭瑛在“台独”批判上内部的切磋

与反省的基本态度，进行检点，目的在端正态度，提高理论的水平；（二）因此，不在细微末节的问题上推敲，而在比较大的问题上，试着做比较科学性的、系统性的补充和展开。

一、关于台湾本土运动的“三阶段”论问题

陈昭瑛把“台湾本土化运动”分成“反日时期”、“反西方（美国）时期”和“反中国时期”。在前两个时期，陈昭瑛准确地提出同时期台湾本土化运动的本质，是在于以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反对不同历史时期中日本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表现为第一期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同化，保卫民族语言、文字、文学和文化；反对和日帝勾结的台湾地主、士绅等半封建势力，以及表现为第二期的反对战后以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西方”对台湾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支配，表现为在七十年代新诗论争、乡土文学论争中提出了以中国民族意识为主轴的民族文学（民族的）和民众文学（阶级的）的旗号。

紧接着，陈昭瑛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台湾本土化运动”规定为“反中国”阶段，把“台独”“本土化”论辩证地理解为“中国意识的异化”，并且在分析“台独”的“台湾主体性”论时，揭发了“台独”的亲帝国主义、反中国、从而反“本土”的本质。

但是，把普遍历史中反对帝国主义支配民族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支配民族的同化政策、反对消灭土著民族文化的形形色色的“本土化”运动，和做为其反动的、仇视的和否认自己原有的中华文化，向往中心国家即帝国主义文化的“台独”主张“本土化”论相提并论，并在“文化史”上列为先后分期，等量齐观，在理论上怕就不无瑕疵了。

把握台湾物质的和精神的历史真实,如同把握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新殖民地历史那样,不仅要当地、内部去分析,也要从全球的,即世界体系的、外部角度去理解,才能更好地掌握问题的全面和根柢所在。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中心国家的资本开始逐步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向外扩张,世界迎来了帝国主义的时代。台湾和中国大陆本部同时在羞辱的鸦片战争中被迫开港,同时被中心部资本主义吸纳为它的边陲部社会,而推向现代世界。海峡两岸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阶段。一八九五年,台湾割日,进一步变成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进行了一系列殖民地化改造,以帝国主义国家权力援助日本独占体以糖业资本的形式全面掠夺台湾的剩余,使土著资本附庸化,并局限在土地资本范围;台湾做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边陲部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体成立,形成由日本独占资本和台湾亲日派大资产阶级(辜、林、陈、颜)与广泛农民与工人、中小地主、小资产阶级相对立的社会。其中尤以“农民组合”旗下农民的抵抗,最为壮烈。

台湾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大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差别只在台湾是一个由日本总督府直接进行殖民地统治的社会。从帝国主义做为全球性体系的时代看,当时两岸社会都受到帝国主义独占体及其在当地的、与之合作的精英,即半封建的大地主士绅阶级的压迫,因此两岸社会都以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运动,进行解放斗争。两地社会性质近似,都在帝国主义下被压迫的殖民地范畴,因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也相同相似。

然而,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殖民地化,是做为中国之一个肢体而割让出去的殖民地。在历史上,台湾从来不曾独立建国,与祖国分立过。陈昭瑛所说明郑据台,是明清两个王朝相继的过渡,

郑成功是怀着“复明”回到中原的职志而不是与中原分立的职志据台的。至于唐景崧的台湾共和国，则志在复归中国，这是陈昭瑛也十分明白的。台湾的先住民，一直到荷据、郑据乃至清代，都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部落共同体的晚期（只有排湾族之一小支呈现拟似奴隶社会极早的萌芽现象）阶段，当然还不曾建立现代国家。鸦片战争前，台湾汉族社会具体地是中国大陆封建社会的翻版与延长，历经了荷据重商主义殖民地封建社会，明郑藩镇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之后，台湾与大陆同时被迫开港，也和大陆同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组成部分。迨甲午战后，台湾被迫割让与日本。因此，她不是以一个独立的社会，更不是以独立的国家与民族被殖民地化，像朝鲜、印度和三大洲上无数殖民地那样。也因此，她和其他殖民地另一个不同，也就在于她不曾亡“国”，而隔海遥企着一个残破半殖民地化了的、具体存在的祖国。这是殖民地台湾和世界上当时许多殖民地不同的重要历史特质。

这个特质影响深远，规定了嗣后殖民地台湾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本质，迥异于其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后者要打倒帝国主义，恢复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殖民地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因上述特点而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显示强大的“中国指向性”。台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全称“日共台湾民族支部”）的成立，在第三国际下，受到中国党的无私、热情的协助。它的民族纲领确有过“台湾独立”的口号，但党人苏新指出，“独立”主要指从日帝独立。而没有提复归中国，除了第三国际当时的民族纲领外，还因为中共尚在幼年期，更不能提出复归台湾予当时国府下的中国云云。苏新并且指出，台共党人心系祖国的证据，还表现在一九三一年纲领中，已无台湾独立的口号。一九四七年以后，旧台共著名人物谢雪红、苏

新、王万得等人先后参加中共，不但没有人另组独立的台共或归籍日共，或参与四十年代初以降，美帝扶持的“台独”运动，而且最早地，迭次在香港发表反对台湾托管、台湾独立的严正声明，其中史实和文献俱在，足可稽征。

另外，相对比较右翼的民族运动家蒋渭水的民众党，直接受到中国国民革命的影响，并且与国民党联俄容共的过程相应地左倾化，也是人所共知的事。

因此，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即支配民族与被支配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加上台湾做为从中国割让出去的殖民地化这个历史特征，规定了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帝、反封建和中国复归的特质。在这特质的影响下，台湾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台湾文学的白话文实践，在在反映了台湾反帝民族运动的反殖民、反同化、坚持种性（中国的种性）的性质。陈昭瑛所说“第一阶段”台湾“本土运动”，正是在这世界现代史框架下，以日帝为斗争与解放的针对面，以中华中国为归宿的根源所在。因此，陈昭瑛所说台湾沦为日帝殖民地后，断了祖国的脐带，“台湾人逐渐养成了以台湾为中心去思考”事物，就不是事实了。相反，在日据台湾史上，台湾人寄托自己的解放于祖国中国的解放，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北伐，乃至抗日、乃至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皆如何牵动着台湾民族解放运动思想和行动，史料斑斑，至为明显。而日本总督府所编《台湾警察沿革志》的编者埋怨台湾改隶至一九三一年以前台湾广泛的抵抗运动，莫不根源于台湾人民“根深柢固的汉民族意识”。一九四六年出版萧友山的《台湾解放运动之回顾》一书中也说：“台湾与福建广东一衣带水，交往频繁，风俗、习惯、语言、信仰与大陆无异。且以大陆为父祖坟墓之地，思思慕慕，以中国为祖国……而此民族意识，在抗日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可佐证。

那么，怎样理解陈昭瑛所说台湾本土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反美”、“反西方”的阶段呢？

一九三一年，台湾左翼民族解放运动在日帝全面镇压中溃灭。台共党人或在大检举中入狱；或逃亡大陆，进而参加中国革命；或在台湾沉潜地下。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而正因为台湾是割让自中国的殖民地，光复的形式，不是殖民地的独立建国，而是复归中国。

复归中国的台湾，迅即编入当时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当时四亿中国人民同受代表旧的中国大地主、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国府之统治。全中国范围的阶级斗争，以国共内战的形式在战后迅速扩大。一九四六年，中共省工委来台，经过突发事件“二·二八”惨案的试炼，在台湾工农、市民和知识分子中扩大组织。

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后，以谢雪红为首的一部分从旧台共重编到中共省工委的台籍党人，在二月事件后脱逃香港便迭次发表高举台湾的民主自治、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的宣言和声明，表现了台湾在反蒋变革运动中鲜明的中国认同和反美帝、“反西方”的历史特质。

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新生报》“桥”副刊上展开了“台湾新现实主义文学”的论争，主张台湾文学服从当时大陆的革命形势。

一九四九年末到一九五二年，台湾的国府，在冷战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在美帝国主义的默许下，展开了广泛的恐怖肃清。日据以来，具有中国指向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之组织的、历史的、人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以及文学艺术理论的一切遗产和传统，付诸一炬，毁于一旦。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之后，美帝国主义霸权在全球范围内确

立，并且因两阵营对立的需要，形成帝国主义间、帝国主义与新殖民地精英间，以及各新殖民地精英间的阶级同盟。跨国资本的登场，使大跨国企业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疆界，使国家成为跨国企业的工具。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因一致反共反苏而一时缓和，一种“超帝国主义”的时代来临。

正是在这背景下，在恐怖肃清的血腥中，美帝在台湾炮制了一个反共、军事性波拿巴国家，编入包围中国的大陆军事基地链锁之中，在“独裁下的经济成长”中，台湾战后资本主义依附地、畸形地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共、法西斯、亲美、“自由主义”——乃至反中国的意识形态取得支配地位。台湾在辽阔第三世界中，成了罕见的、白色的荒芜之地。

六十年代末，以美国社会为中心，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以学生、知识分子（没有工农参与的）左的反省运动。反对越战，反对资产阶级独占的教育体制，反对对于黑种人民的歧视，反对美帝国主义，要求重新认识中国、古巴和越南的革命……这些反省运动，影响了来自港澳台在北美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一九七〇年，“保钓”运动勃发，旋即在左右分裂后，其左翼向中国认同运动和统一运动飞跃。

这是两岸冷战分裂以来第一个认同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统一运动，有重要意义。

而这“保钓”运动的左翼，重新在台湾点燃熄灭了二十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灯火，提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以美帝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支配，提出了社会经济上关心工人和农民，在文学上提出民众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口号……这些为一九五〇年以后冷战意识形态所不容的思想，成为七十年代台湾“本土”论的重要内容。

从上述的历史过程看来，陈昭瑛所称台湾本土文化运动的

“第一期”，是以日本殖民地台湾为其背景，而有“反日”内容；而所称第二期，则以岛内的国共内战（即白色恐怖一九四六～一九五二年）和“保钓”运动（一九七〇年到乡土文学论战“结束”的一九七八年）为其背景。那么，以之分别以“第一期”、“第二期”而相提并论，在反对老、新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支配（反同化），坚持自己（中国的）民族文化上，有共通性，是可以言而成理的。这里也要不惮于强调，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以降“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系统最早而意义重大的反美帝、反托管、反“台独”的宣示，受到了包括陈昭瑛这样用心的大多数学者所忽视的现实。

然而，与上两个“时期”在本质上完全对立的，即反中国、反民族解放、亲帝国主义的，以中国、中国民族、中国文化为对立面的“台独”派“本土论”，怎能相提并论而为台湾本土论的“第三期”呢？

二、是“异化”还是“否定的挫折”？

这就联系到陈昭瑛对“异化”的理解了。我对异化的理解，则略有不同。陈昭瑛说，黑格尔认为“一个实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从本身发展出一个异于自己，并与自己对立的实体。这一实体若同时意识到自己独立存在，便是一主体”。由于欠学，我不知道所引典出何处。但光就所引看来，这概念更像是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定律”的第一个否定阶段，即事物内部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经由斗争，使事物向自己的对立方面发展与转化，由肯定走向否定，由“正”向“反”发展。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支配和同化方面、与被殖民人民的抵抗与反同化（本土化）方面，同时以相互矛盾的性质存在，互相斗争，而后者逐步发展为

一个与帝国主义独占体相颀颀的、新生的力量。“台独”意识是在反共肃清、戒严权威体制、美帝干涉下，中国意识挫折条件中，发展壮大，与中国意识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系地相持存在。

但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异化”指人的精神通过其创造物，把自己的一部分“转让”给了外部世界，即客观的世界，而“外化”成为自己相异的东西（《精神现象学》）。而所谓“转让”便是“异化”这个辞多层意义中之一。黑格尔激进的学生费尔巴哈说，人创造了神（宗教）却让这神回头宰制了人，即自己手造之物，成为自己的异己物，受其支配来说明“异化”的概念。马克思则进一步从私有财产的形成与劳动过程的变化，看到了劳动的异化，即人的劳动所产，在私有制和劳动过程的细分化（例如“福特主义”生产带体制）、无意义化而成了支配、宰制劳动者的异己物。

但不论如何，异化论有两个重要关系。一是自动的“创造”或“生产”的过程。黑格尔说“精神透过其创造物……”费尔巴哈、马克思也看到人所“创造”、所“生产”之物的客体化、异物化。其次是这被造物（物质或精神）取得了主动，被造物成了创造（生产）者的异己、相克的存在。

如果以这“异化”论来看“中国意识”与“台独意识”的关系，就得说明中国意识如何“创造”和“生产”了“台独”意识，又使后者成了前者的异己存在，进而受到后者的支配。而陈昭瑛对这个关系问题的说明是颇为笼统而晦涩的。她说道：

“……台湾意识循着原先自我意识形成的道路，发展出一股异己力量，反过来对抗自己。就台湾意识中固有的中国意识而言，台独意识是中国意识的异化。”

这是一段难懂的话。历史地看来，“台湾意识”……的“自我意识形成道路”，难道不是在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殖民体制的

加害下，反帝中国民族意识“形成的道路”吗？民族意识形成之道，大约有三：一是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所形成，如希腊、中国；一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发展的民族主义，如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展的民族主义，最后则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因抵抗先进国殖民压迫而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形成和强化的反帝民族主义，已见前述。日据下的“台湾意识”，是殖民地条件下针对“日本人”、“内地人”、“四脚仔”的“台湾人”、“本岛人”、“咱人”意识，是针对“日本人”的“唐山人”意识，表现在语言、文字、文学、文化斗争上坚持汉语（现代汉语〔白话文〕和中古汉语〔闽南话语〕）、汉文、汉字白话或台湾话文学这些反同化、保种性的斗争上。而远在其背后，则是几千年历史所形成的汉民族意识。

当然，反帝“本土化”运动的对面，除了日本的压迫与同化外，还有与日本权力合作的本地“合作精英”——公益会，奋勇同化、苟且保产的“自治论”以及皇民化。在殖民地台湾的条件下，压迫、同化和庸从的一方，是矛盾的“肯定”侧面，维持殖民体制的相对稳定。而反抗、反帝、“本土化”的一方，则是“否定”的侧面，在文协、农组、台共等广泛战线上力图颠覆前者，与前者形成尖锐的矛盾与斗争。前者与后者则是互为条件的矛盾的两个方面，自始分立、互相斗争，却不是一方所“创造”或“生产”或“循着原先自我意识形成的道路”之“发展”物，而成为异己的客体的异化。因此，说“台独”意识是中国意识的“异化”，恐怕在哲学上不能成立，在历史上也不合事实。

然而，在日据时代，台湾反帝运动在一九三一年以溃灭告终。战后，在台湾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在一九五〇年恐怖肃清中全面崩溃。七十年代“保钓”运动、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运动，也在高压下无法往纵深发展。“否定”的一面，在它自身和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下，不但没有胜利发展为使“肯定”向“否定”转化，

反而中途挫败，表现为两次（日据与战后）质变运动的中挫，即表现为否定的挫败，暂时无法完成“否定之否定”即“肯定—否定—再肯定”或“正—反—合”的正常周期，即反帝的民族与阶级革命的挫折。而这又是受到台湾左翼自身在阶级、理论、历史发展上复杂的缺陷等内因，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冷战结构、美帝干预和肃共屠杀的强大影响这些外因所制约。

三、关于“中心”（core）和边陲（periphery）

其次，说一说“中心”和“边陲”的问题。

沃拉斯坦认为，从十七世纪中叶，自西欧中心国家开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逐步支配全世界，消灭了一切替代的社会组织样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单一的、资本主义分工，把世界边陲地带工农的剩余透过不等价交换机制、集中收夺到中心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分成了先进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形成的地区，和受其剥夺的广阔“边陲”不发达国家地带，以及介乎二者间少数半边陲地区。“中心”和“边陲”，因此有其一定的政治经济学的含意，恐怕不宜望文生义地使用。

依此，台湾和中国大陆同时在鸦片战争后，受不平等条约的强制，被迫开港，成为西欧资本的边陲，纳入边陲资本主义体系。其实台湾在重商主义荷兰的殖民地下，更早一些边陲化了。但无论如何，大陆和台湾同属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边陲，受其“文明化”之惠者少，而受其“野蛮化”之害大。台湾社会从荷兰的西方重商主义封建制而明郑的藩封建社会，而清朝的封建社会和鸦片战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日据下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被帝国主义边陲化的斑斑历史。一九五〇年以后，在冷战体制和美国新殖民主义下，台湾依附型资本主义发展而成为半边陲社

会，已为世界体系论者的公论。

“台独”派以中国为“中心”，自比受这“中心”压迫的“边陲”，并从这不通的前提发展出一大堆不知所云的奇谭怪论。如果两岸当前经济关系不是同民族内的分工，则输出资本、剥夺劳动剩余者，恰恰是台湾对大陆而不是相反。陈昭瑛没有从中心一边陲约定俗成的定义去驳论，反而跟着“台独”不通的前提去申论，不免侷促难伸。问题的提起已经离题，讨论也跟着离题了。

四、“台湾主体性”论的欺罔

陈昭瑛对于“台独”派的“台湾主体性”论，已有很好的驳论。这里只做一些补充。“台独”的“台湾主体性”论，大约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说，台湾史上自荷据以降，历明郑、有清、日帝和国府几个时代，台民莫不在“外来”“殖民”政权下受尽压迫，无法自主。到了今天，台湾人要通过自决和“独立”取得政治、社会……历史书写的“主体性”。这“台湾主体性”论又蔓生为“台湾优先”、“独立国际空间”、“独立政治实体”、“分裂分治”、“台湾文学独自性”等各种各样的把民族分断固定化、永久化的口号和说辞。第二个方面，正如陈昭瑛所指出，这“台湾主体性”论，基本上是与大陆针锋相对的“主体”性主张，却从来不讲历史和现实上台湾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扈从。

随着私有财产的登场，人类的社会便出现阶级制和阶级压迫。在奴隶社会，就有奴隶主对奴隶的苛酷榨取。在封建社会，就有封建地主对农奴、佃农以地租与徭役的形式进行剥削。这是一个社会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因不同的社会结构体之性质，不同的财产关系，即不同的阶级关系必有的阶级压迫。但到了从最早的

重商主义的殖民主义到现代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就产生自外而内,外加的由外国外族资产阶级与本地精英联手,榨取本地工农人民的社会压迫。重商主义的殖民主义是以贸易、租税甚至赤裸裸的武装掠夺,将殖民地财富吸回宗主国。现代资本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不等价交换、政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剩余。在殖民地社会,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帝国主义独占资本—当地大封建地主—中小地主—小农—佃农—工人的阶级关系和复杂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以史明为中心的“台独”派台湾社会史观,把殖民地社会和本地前资本主义时代封建社会,一概称为殖民地社会,把阶级性矛盾和民族矛盾混同起来,完全没有科学性根据。

荷据台湾社会,是代表当时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即现代资本主义萌芽期的荷兰王室的东印度公司为上层,在台湾建筑堡垒,招募贫困中国农民为农奴(“官佃”),沿用从台湾东北部传来的“结首”制,分地(“官田”)佃耕,收取货币地租,并以商品农猎产品,贸易求利。复杂苛重的封建税捐也是重要的掠夺手段。在这个西欧封建制下重商主义殖民地台湾,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顶端,下有少数汉族“合作精英”的“长老”阶级,与先住民土官,再下则汉族“官佃”农奴与先住民。社会矛盾首先体现为荷兰统治民族全体与全体台湾汉族、原住民的根本矛盾,再次为荷兰统治阶级及其外围的汉人“长老”与原住民(“土官”)酋长,与底层的汉人“官佃”农奴与原住民。而官田劳动的剩余、狩猎劳动的剩余,绝大部分经由地租、赋税、贸易等形式为荷兰“联邦议会”所收夺。

郑氏领台,驱逐了荷兰人。封建殖民地性质一变而为郑氏藩镇封建社会。郑氏名义上所奉的母国明王朝已亡,清王朝为郑氏之敌。郑领台湾,是明清王朝交替的过渡,是中国王朝相迭历史

的一部分，不是外国对台湾的支配，郑氏台湾政权背后并没有一个其所代表的宗主国，从而对台施行“殖民地统治”。形式逻辑地把荷兰和郑氏对台湾的统治等量齐观，自然是错误的。

而郑领台湾社会，正如对岸清王朝下之中国封建社会，同为近世封建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封建官僚、地主、豪门对贫困佃农的压迫与剥削。

鸦片战后，中国近代封建社会一变。经过不平等条约，强迫开港，大陆和台湾同时被迫并入中心帝国主义地带的边陲，逐渐形成萨·阿敏所说“边陲部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体”。在社会性质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帝国主义资本深入台湾和中国沿江沿海地区，买办阶级形成，资本对商品农业形成支配，鸦片贸易步步近逼，教案斗争频仍……这都是台湾与大陆沿海共同的经验，阶级关系与阶级压迫也产生了形式和内容的变化。首先是各帝国主义与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深刻矛盾，其次是帝国主义下中国社会内部阶级矛盾之重编和激化。清朝下的台湾社会，和大陆社会一样，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分成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前期是同国内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后期则增加了半殖民地下外来资本的收夺。

一八九五年，台湾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社会矛盾也体现为总督府所代表日本国家独占资本与台湾全体汉族、少数民族各族人民的根本矛盾，再次体现为汉奸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农民、佃农、工人、先住民之间复杂的矛盾。台湾社会呈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质。一九三一年进入战争体制之后，本地资本迅速萎缩，台湾社会形成日本独占资本全面扩张和苛烈榨取的局面。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日本在台殖民体制崩溃于一旦，复归于祖国之台湾，在社会性质上，重编到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由代表地主、官僚资本与买办的国家政权的陈仪当局治

台。一九四六年，中共省工委来台发展，台湾人民于是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一九四九年，新生共和国成立，而地下党在台湾则开始全面覆灭，刑杀监禁，拷刑无数。一九五〇年，旧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冷战结构中经美帝国主义强力介入而巩固，展开恐怖肃清（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后的独裁、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台湾在美国新殖民地间接支配下，已进入“新殖民地半边陲资本主义社会”。两岸在外力干涉下再度分断。在国民党权威主义国家政权和跨国资本的带动下，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取得依附性经济发展。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七年，本地集团资本在戒严压制体制下快速积累。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去世，一九四九年流亡来台的国民党集团萎缩，本地集团大资本和地方官商资产阶级接掌中央政权，李登辉登场。

一九五〇年以后，流亡台湾的国民党背后并没有另一个中国的宗主国，说国府是“中国的殖民政府”，和指明郑为殖民政府同样可笑。国府一家一党，代表中国革命中败亡的阶级，出卖台湾之利益，容许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战，占据台湾，成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但这恰恰是“台独”各派理论所不予闻问的。李登辉政权登场后，台湾大集团资本与官商资本成了统治者。国府为“外来”“殖民政权”之论全面破产。

在具体的台湾社会史的分析下，台湾人民受历次“外来政权”“殖民政府压迫”论的欺罔，暴露无遗。从台湾社会史的角度，恰恰突出地说明，台湾的历史，是帝国主义欺凌下，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斗争中，台湾与祖国时而被迫分断，时而复归统一的历史。荷据台湾是荷兰重商主义的殖民主义迫使台湾与中国分离。明郑以武力收复了台湾，清代继承两岸的统一，迨鸦片战争，又使台湾与大陆同时半殖民地化。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台湾又与中国分离，沦为日本殖民地。一九四五年，台湾复归中

国，两岸统一。一九五〇年，美帝武装干预中国内战，霸占台湾，以“国府”政权为代理人，中国两岸又告分断。

从这历史过程以观，“台湾人”的“主体性”恰恰表现在郭怀一的反荷斗争，表现在鸦片战前无数反封建官僚与地主豪门的农民蜂起，表现在鸦片战争后，各种教案，反对长老教会仗教欺民的斗争、反对教会与士绅联手为日本占领军开城门投降的斗争，表现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〇年前的武装抗日斗争；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一年非武装抗日斗争，也表现在一九四六年沈崇事件反美斗争，一九四七年二月反内战，要求民主自治的市民斗争，也表现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二年地下党之斗争。五十年代血腥镇压后，又表现在一九七〇年“保钓”爱国主义斗争与新诗论战的平行进行，并且延续到一九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争。而陈昭瑛论文引起“台独”派反论，以及近两年学术界逐渐蓄势待发的“统”“独”论争，预料将不可回避地指向一个全面性的争论。历史将说明这必来的论争，是台湾人民真正“主体性”与反民族、非主体性的斗争。而这些民族与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明了台湾人民在帝国主义时代，对外反对新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和汉奸主义，争取广泛的民主主义的真正主体性。而且在具体的台湾历史过程中，台湾人民的主体性，更表现在坚决反对外力干涉下的民族分断，为复归民族统一与团结斗争的这个特点上。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台湾的历史以血泪写成的史实所揭示的，岂容湮灭与歪曲！

五、批判“以台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

对“台独”派“台湾主体性”的批判，就不免谈谈统一派要不要也强调“以台湾为中心”的问题。远的不说，难道不是“保

钩”运动掀起了当年台湾大专学生“百万小时服务”运动，走向人民，为台湾人民服务？“保钩”也发展上山下海，发展调查台湾外商工厂的女工的劳动条件……这是不是“以台湾为中心”？早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前，是“统”派“夏潮”系首先展开了台湾文学的再认识与再评价，展开了抗日历史的探索，首先展开了人民的历史书写。这是不是“以台湾为中心”？在万马齐喑，当“台独”在海内外龟缩保身之时，难道不是“统”派在恐怖下高举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战旗，和国民党文特斗争？那么，这是不是“以台湾为中心”呢？据说凭空“激”出了遍地“台独”的陈映真，他写的小说，坐的牢，有不以台湾为中心的吗？他办的《人间》杂志，相信至今还没有一份台独刊物比《人间》更本质性地、深刻地以“台湾为中心”吧。

因此，问题似乎不在于“统”派有没有，该不该“以台湾为中心”。因为凡是左派，就一定会从具体生活的科学分析开始实践。这也是为什么台共两个纲领莫不以台湾社会的分析展开。问题在于这几年来，朝野上下、学术界、言论界都在极力、全面、不惮强调地侧重两岸民族“分离”、“分立”、“分治”的“现实”；侧重台湾自己“独自”“独特”的“共同体”，同时也在全力、众口铄金地拒绝、排斥、否认民族团结和民族统一的展望；拒绝和否认中国大陆和台湾同为中国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否认、拒绝民族和解与统一的意愿与努力，千方百计延长对大陆的猜忌、鄙视和仇恨；千方百计使两岸分断永久化，丝毫没有弥补、发展和恢复两岸人民与民族同质性的恳愿和志向。

在主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社会的台湾社会史中，有殖民主义，有帝国主义，便历来就有“长老”（荷据时代），有买办阶级和仗教欺民的吃教士绅与官僚（有清一代），就有“公益会”，有“贵族院议员”，有附日地主士绅阶级，有皇民奉公的文

人、壮丁团团长和警察保正（日据）；也有亲美亲日的官僚、学者、知识分子和精英阶级，自然也会有否认自己的中国种性，依附外国、分裂国家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的政客、学人和资产阶级。

因此，从这个历史脉络看来，坚决地与帝国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斗争，就不应受到霸权化了的，阳为“台湾优先”、“台湾中心”，阴为奴事外来势力的口号所拘泥吧。

六、结 语

为了不使文章长过一个杂志的刊载负担，有关台湾原住民的问题，就不能不一时不加论及，而有待于来日，但是对台湾社会史的讨论，不应该缺少台湾原住民社会讨论，也不应该回避汉族对原住民而言一切“外来”民族所加予的惨酷杀戮与掠夺的历史，并从中严肃地自我批判。再次，我要对陈昭瑛文章中的原住民问题的视野，表示钦佩与赞赏之情。

在“台独”批判的理论与知识的发展上，从台湾社会史的研究着手，从而取得科学性的自我认识，至少对我而言，是个重要的途径。这种对台湾社会性质的科学的研究，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台共党人已经展开。后来在陈逢源等人的台湾资本主义论争、李友邦的日据台湾社会论中，皆有所发展。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二年的地下党，从新民主主义变革的全国全局背景出发，自然没有特别研究当时的台湾社会的余裕。白色恐怖（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以及延续到一九八七年）根除和断绝了台湾社会史的唯物论的分析与研究，荒废至今，实有待年轻一代人赓续和发展。这不仅关系到开展科学的台独批判，也关系着统一后的建国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不能不由衷地对陈昭瑛表示感谢。不仅仅感谢她对于我的一些足以自诫的缺点，所做的批评，还要感谢她对于我这一代人没有做好，失职失责，以至“台独论”猖狂，民族团结的展望受挫之时，在台大那样一个民族分离论占统治地位的学园，一个人挺身而出；在理论上和风格上都较好地提出了“台独”批判，很好地承继了台湾历史上光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当然，这感谢之情，也包含着一份对自己的羞惭与自责。

——一九九五年四月《海峡评论》五十二期

星 火

我的第一次关于台湾原住民族的图像(image),是从我的祖母那儿来的。我的祖辈住在莺歌与大溪间的一个小村子,俗称为“中庄”。祖母常常说起一次原住民的反汉蜂起,俗谓“‘番仔’反”。大约当时这原住民的蜂起事件,势头凶猛,汉族人纷纷走避,因此也有“走‘番仔’反”的话。惭愧的是,至今我不止还没有弄清楚这次应该具有民族史重要性的蜂起事件,具体地发生在何年何月,因何因谁而起,而且当时双目已经失明的祖母口中关于蜂起事件的轶闻细节,于今也几乎完全忘却了。

“‘番仔’反”的台湾原住民像,当然是负面的。这是因为汉人以自己本位的立场,来看待那一场民族矛盾引发的蜂起,把蜂起界定为“野蛮人”(“番仔”)对汉人的“反”叛、叛乱。而“反”者,便有被支配者对支配者的冒犯、叛逆的指责的意涵。当然,也表现了“番仔”的“野蛮”、“凶暴”等汉人中心的原住民像。

到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对于家中一本日帝时代留下来的、今已忘乎其名的大本画册产生了兴趣。这画册似乎是旧总督府下警察机关所印行。画册中有一个部分大约是宣传日本“理番政策”的。其中有一些部落和“番人”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凝视了鲸面的台湾原住民族人民的经验;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住

屋和服装，如何与“咱人”（汉族闽南人的民族自称）不一样。画册上也有原住民的神话故事，甚至也有雾社事件的故事，穿插了不少插图。

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台北牯岭街遍走旧书店，寻找激进的社会科学、哲学和思想方面的书。仅仅因为上述少年时代并不完整、也不成熟的原住民图像，我所以为一本旧总督府版英文《台湾统计概览》(Statistical Summary of Taiwan, 一九一二)花了一大笔家教劳动的工资，买了下来，是因为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很多珍贵的、关于台湾原住民人种的、社会的照片。一九八七年左右，我又在台湾摄影家张才、郑双溪的作品中，看到他们在五、六十年代拍下来的、原住人民少女、武士的肖像照片。这些照片给予我这极强烈的印象：尽管自荷兰据台以来，台湾原住民“多少年来，备受侮辱、欺骗、榨取、残杀，血泪斑斑，惨绝人寰，近代史上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能形容于万一……”（周宪文：《台湾经济史》一九八〇），但其民族尊严与不驯的自主气概和形象，远胜于今日！

一九六五年以后，随着我的逆反于冷战意识形态的思想之形成，我逐渐理解到台湾历史中蓄意受到忽视的另一个主轴：台湾原住民族失败、被压迫、被掠夺的历史轴线。汉族开发台湾的历史，日帝对台湾进行殖民地化的历史，一九四五年后，以在汉族人人为中心的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史，在铜板的另一面，就是台湾原住各民族遭到失败，被支配和压迫、掠夺的历史。直言无讳地说，今日台湾少数民族，实已面对着在种族上、文化上、语言上，总的趋向于灭绝的境况。

作为台湾汉族人的一员，对于这样一种历史结果，不论如何，我常有共犯人的罪感。一九八五年创刊、一九八九年休刊的《人间》杂志上，我和杂志社的同人，不惮于花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

以相当大的篇幅比重，报告了山地社会和人以及文化的严重被害。我们也报告了不少原住各民族的仪式和庆典，不是为了对异民族的观光式的诧异，而是要和读者一道，从原住民的文化中，学习去认识、珍视和尊敬台湾原住民族。充满了社会正义的义忿和民族友好的热情的关晓荣，在《人间》发表了许多关于原住人民生活、社会、教育与工艺的动人报告。廖嘉展、官鸿志、李文吉、钟俊升和其他许多《人间》的文字和摄影记者，都在台湾山地现场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也从而教育了读者。

这不是一般讨功簿。恰恰相反，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台湾原住各族人民的危机，是在持续恶化，而不是改善之中。和全世界“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原住民一样，台湾原住民成了台湾资本在台湾“境内的殖民地”。他们成了现代台湾资本主义下最低层的劳动者和劳动预备军，同时也成了台湾资本主义商品大量倾销的对象，让不断贫困化的少数民族，以超前、负债的消费，付出严重的社会代价。当然，山地的资本主义化，也造成了个别、局部的“少数民族贵族”，而徒然造成原住民族内部的经济与认同的分化。而汉族资本主义的腐败部分对山地社会的连动，造成了山地民族因集体性媚妓化而在民族母性上造成严重破坏，威胁了民族的存续。

对我而言，台湾存在着外来势力伙同它在岛上的代理人，对汉族人民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干涉与支配问题，但同时也存在着汉族资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种族上，对台湾原住各民族人民的支配问题。这两种互不相同、又互相联系的矛盾，要求汉族系知识分子首先要有自我反省的视界。在历史上，这样的民族反省和民族歧视一样真实地（虽然为数不多）存在过。郁永河的《稗海纪游》记载荷兰人、郑氏和清代统治权力对台湾原住民残酷苛刻的压迫。清黄逢旭也将汉族人和官僚对台湾原住民欺善怕恶、

歧视压迫的生活事实，入诗以叹责。近人周宪文修台湾经济史，甚至有专章专节沥陈台湾经济发展史中，汉族对台湾原住各民族人民的压服与剥夺，对我个人尤有教育作用，令人敬佩。

如何在今日台湾内外民族压迫中寻找阶级关系的关连性，解决民族解放的逻辑，已是当前急迫的问题之一。台湾原住民的解放，最起码的条件，是政治、社会上的充分而真实的自治，拥有自己民族在地理和行政上明确的疆界，在疆界内享有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语言等等）的自治、自主之权。欲达到此目的，台湾就必须有根本性的构造变革。而汉族和原住民劳动者形成某种阶级的同盟，又是推动这构造变革所不可缺少的动力之一。

从七十年代后半，我也有幸认识了几个原住民族优秀的精英、骨干人物，结成良好的友情。越是这样，也越痛感到台湾当前原住民族解放工作的复杂和艰难。我绝不是一个暴力论者。但一九三〇年雾社蜂起及其壮烈的溃败之后，压迫民族就没有了从被压迫者通过暴力或和平的斗争，让压迫民族震惊于自己在别人的怒目中看到自己的残暴和不义，而醒悟、而反悔的契机。

我以赎罪人、朋友和战友的心情，祝愿《山海》杂志发展成足以燎原的星火。

安溪县石盘头

——祖乡纪行

《清明》

先祖百庙公入台开基，应该是在清代乾、嘉年间，距今已有两百余年。到我一辈，恰是开台后第八个世代。传说开基祖兄弟三人，还背负了年迈的寡母，带着祖宗牌位，渡怒海而来，定居在今日台北县三峡一带。

但是我见到过的族中最大的长辈，是我的祖母。我知道祖母时，她的双眼早已失明。小时候，每次到中庄看到她，她总是用她的双手摸着我的脸。“啊唷，心肝孙，大汉喽。……”她会一边摸索我的小脸，一边这样说，而且常常分不清是悲伤还是喜悦地流泪。从她的失明的双眼干涩地流下来的泪花，在她那特别阴暗的房间里，迎着小小的天窗下的微光而发亮的记忆，至今犹在眼前。

这阿嬷在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过世。这之后，我的大伯父陈琳先生便成了我们家最大的长辈。我的祖父在我的父亲十三岁时就过世了。我的叔祖父在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领军打到大科崙的时候，同中庄的一伙青年去挡日本侵略军。“你叔祖父一上场，就被一枪打死了。你阿公告诉我的。”父亲说，“你阿公听说了噩耗，一个人去把弟弟的尸身掙回来埋葬。”

叔祖父陈火盛先生的墓，仍然在今日桃园县中庄的公墓里。墓石很小，说明我家的困厄。上面写着：“陈公火盛府君之墓”。

关于曾祖父以上的祖祖辈辈，即连父亲的一代，也所知甚微。大伯父过世的时候，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在记忆中，大伯父先是住中庄，继之，便依靠他的几房孩子住到屏东潮州。每次他从中庄或者潮州路过，在我的生家或者养家看见他，印象里，他总是须发皆白。

从父亲一代的回忆和经历看来，到了祖父的一辈，家境已经相当窘困了，在父亲的记忆中，祖父“身材颇长”，是一个“极为慈爱的父亲”。但家里无地可种，也不是佃农。家道是靠着祖母卖一点鸦片土，卖一点据说声闻乡里的她的女红度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伯父因此早早就出了远门，到深山里去当拉木材的工人，以沉重的劳动，帮助寡母维持生计，勉强让他的三弟和四弟读完公学校。

大伯父的勤苦、孝德、友爱和慈爱，赢得了二房以至四房及其子孙们衷心的敬爱。到了晚年，他的耳朵越来越聋，同他说话，就得贴在他耳边去说，伯孙之间“笔谈”的时候就多了。现在还常常记得的一次笔谈，是他写下杜牧的《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那一年，我上高中一不久。我看着他一点、一撇、缓慢地写下这四句诗——中间不免有几个错字，心中充满着惊讶和感动。这辛劳终生，少时失学的大伯父，是怎样又什么时候去亲近了文学，

至今并没有答案。我赶忙从书桌抽屉中找到一本《唐诗三百首》给他。记得大伯父就在莺歌家中客厅里老旧的沙发上，安静、专注地看了一整个下午，当他把书还我的时候，他说，“里面找不到《清明》。”

另外一回难忘的笔谈，是我写给他看的。他说到我们在唐山的祖家。我随即在纸上这样写：

“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石盘头楼仔厝”

须发皆白的大伯父的脸立刻绽开满是皱纹的灿然的笑颜。这是自小他就要他自己的儿女，要我这样的侄儿辈铭记的地址。

一九八六年，父亲为了续好一段家谱，取道美国冒着政治上的麻烦，到大陆去，回到了两百多年前的祖乡。族谱上不明白的部分一下子就续上去了，但祖乡的宗亲，看着幸免于“文化大革命”之火的一卷厚厚的手抄族谱，感慨地对父亲说，“从谱上的记载看来，你们这一房，自从去台开基，两百多年来，你竟是第一个回来的子孙……”

两百多年，也可以说得上代久世迁、脉盛支繁吧。两百多年间竟然没有过一个子孙回到石盘头的祖祠去报知新生的支系，除了将近百年异族的支配和两岸的对峙，恐怕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一支系世代寒微，没有过功名产业，从而也没有出过地主缙绅。在没有财产就没有教育的漫长的世代中，我家一系有几辈人的文盲，也绝不难于想象。

然而，“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这神奇的地址，竟而在世代贫寒、识字不多的我的家族中代代相传，像是引领着在遥远的海口孵化的鱼苗，飞洒腾泳过万水千涧，回到母鱼自来的河湖的、魔咒似的溯本求源的本能，两百年来，那样强烈地召唤着我的大伯父、我的父亲和我自己。

鼎 沸

然而，祖祠早已颓坏无存。那深深镌刻在离乡外徙的子孙们的心版上，那代代口传，以便有朝一日外移的子孙一旦回到祖地时可以立即辨识的“楼仔厝”，以及厝前的一棵老松，都已开成一片青翠的菜园，只有长一辈的人才记得往日座落。父亲两百年后的返乡，在祖乡穷寒的亲人中兴起了重修祖祠的契机。一九九〇年，我第一次履实了大伯父自小栽种在我的记忆中的旧址，发现除了大清国已数易而成新生的共和国，泉州府改成泉州市，其余皆一仍两百年前的旧名。我看到了为重修祖祠核拨下来的一方土地，在来日祠堂庭前种了两棵玉兰花树苗，和族亲们会议了一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建祠方针。一九九一年，我看见祠堂的地基成形，族人用自己的劳动打造的花岗石条所砌成的四墙，已有半个人那么高。

两次回去的我的祖乡，是个宁静却美丽的山園寒村。这没有出乎我的意外。一定是祖乡困窘，才迫使子孙大量移徙于他乡。但今年二月再访祖乡，却发现整个安溪县城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叫人瞠目咋舌。

整个安溪县城，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到处都是盖好的或者正在盖的楼房。建筑的样式粗糙而尴尬。仔细看看，很容易发现建材因过度旺盛的需求而缺货，而品质粗陋。清溪（西溪）两岸，全开辟成大片新兴社区，楼房栉比而起。拼装车、东风牌中古轿车、机车、重型大卡车，中古的日本车穿街过巷，喇叭声此起彼落，整个县城飘着满天黄土，沸沸扬扬，像一只鼎沸的大锅，火光和水湮弥漫……

街上行人比过去多了五倍不止，而且行色匆促。新路旧路上

多出了很多改建、新建的店面。家电产品、成衣、五金、百货、旅社、食堂……规模不大，但做生意的人春笋一般地涌现。县城朝西的地方，结成一个很大的集贸市场，成衣、食品、小吃摊、菜市场……几十个摊子，吸引了鼎盛的人潮。市场附近的戏院，贴着“吉林省青年歌舞团”的剧照。照片上是村姑模样的女孩，穿着一般的胸罩和内裤的“舞姿”。一个电影院正上演着无非暴力色情的港片。戏院外有另外一张电影招贴，预告即将上演的革命电影。在海报的上端，印着这样一行字：“纪念毛泽东同志百岁生日”。

这是一个全新的安溪县城。一个农业的、停滞的、被福建省长期划成“重点贫困县”的安溪，正在进行着蜕变。这蜕变显得紊乱、嘈杂，甚至还有一点仓惶、盲目，但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企图、欲望和力求改变的焦躁。在县人民政府和其他机关工作的朋友，大半仍是旧识，有些人调走了，有些是新上来的领导人。但不论是旧雨新知，这些朋友对于眼下的变革，充满了期待的决心。

一九九一年秋天，安溪县的领导部门决心要投入改革的呼召。他们认为，贫困的安溪在全福建省比较艰困的山区县中，还算是离正在开发的福建沿海较近的山区，因此应该拥有相对优势的机会。要搞开发，首先就要搞好基本建设，搞好供水、电力、道路、交通和通讯电讯体系。这首先就碰到开发资金短缺的第一道墙壁。

和当前大陆上许多地方一样，资本拮据的安溪县也采取了变卖土地的方法，以筹措开发所必要的原始资金。县人民政府开始征用财产上属于社会主义公有性质的清溪两岸土地，把使用权典卖给港、台、新加坡资本，盖成社区、办公室和厂房。县人民政府用这笔资金，投向公共工程的建设。安溪现有发电能力是四万余千瓦。正在兴建、尚未投入的电力还有三万多千瓦。但离开计划中的十八万千瓦目标，还有十一万千瓦的格差。由于厂矿骤增，

当前电力供应吃紧。我住的旅社就采取分段供电的措施，让人切肤地感到能源需求迅速扩大的紧迫感。在交通上，安溪面对着极为开阔的前景。一条贯穿了使安溪与福建沿海地区隔断的东岭山区的大隧道——龙门岭隧道正在赶工开凿，预计可以在今年十月间通车。此外，一条连接了漳平与泉州，横跨安溪县城的漳泉铁路工程也已开始进行。隧道和铁路就会像两条重要的交通动脉，势必为贫困安溪的开发，带来根本性的、戏剧性的经济、社会改变。

做为侨乡的安溪、印尼、南洋的安溪出身华侨，这三年来对原乡的捐献性建设，也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印尼侨商李尚大就效法爱国华侨陈嘉庚在湖头捐了广阔的“慈山学园”，学园内设有从幼稚园到专科的各级学校。大型综合医院“铭远医院”成了安溪县中现代化的医学中心，也是香港富商钟姓兄弟所捐献。几个新加坡华侨联合捐了规模宏大的城隍庙，聘请闽南著名的民间雕塑家黄连成塑造佛像，有令人惊叹的艺术水平，和大陆上不少重修的名刹名庙中新塑神像之粗劣不文，不能同日而语。

安溪经济的发展，从外省引来了不少劳动人口，使安溪人口不减反增。据估计，光是来自湖北、湖南的外省人口在这县城就将近千人。奇特的现象是，一方面安溪自己因土建、新办工厂而扩大劳力需求，另一方面，安溪本地依然过剩的劳力却比以往的任何时期都热烈地外出到厦门、晋江、泉州甚至远到广东深圳去打工。中国大陆在近十年中资本的原始积累运动，和当年的台湾一样，促成了农村过剩劳力涌向工业所在的城市，农民的阶级分解和劳力的商品化过程，正在随着经济开发的进程快速地扩大着。安溪的非农收入增加了。涌向外乡的廉价女工队伍，从外乡的电子工厂、制鞋厂、塑胶工厂和纺织厂，把省吃俭用剩下的钱汇回安溪故乡，成了煮沸安溪经济的主要燃料之一。

兴 衰

然而，仅仅多一点的调查，就使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历史上安溪经济的苏醒，绝不是这“改革开放”才开始的。孤陋不学的我，竟是在这一次祖乡的旅行中，才知道安溪早在南唐建城，迨两宋之时，安溪的经济就曾极其繁盛一时的。

安溪县文物办公室的叶清琳先生说，“安溪自有悠久的历史。她的历史，就直接书写在安溪的大地上”因为在安溪县全境，包括我的祖乡龙门、官桥和蓬莱，以及沿着东溪，西溪的两岸，目前发掘的就有十七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安溪和中原的关系，从出土的一个唐代被贬居安溪的贵族坟墓看来，至少可以上推到唐代。但安溪社会经济的鼎盛期则在两宋时代。南宋的政治中心在杭州，而经济中心则在泉州。当时的泉州，俨然是一个国际贸易的城市。从泉州溯晋江可以直达在安溪的源头西溪和东溪。因此，繁盛一时的世界贸易之都泉州，商贾能够依靠当时畅通的水路，直抵安溪来采买。当时安溪重要的物产是瓷器。由于优质的瓷土“高岭土”几乎遍在于安溪全境，安溪成为两宋时代闻名海内外的瓷器生产基地。安溪的瓷品，通过泉州出海，运往印尼（在当时作为航运中继站的澎湖出土的宋代陶瓷中，便有大量产自安溪各窑的），交换南洋的香料，成为“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盛极一时的陶瓷产业，在今天的安溪全县，犹留下已经发现的窑址一百五十余处。一九七四年，在泉州近海捞起了当时贸易的海船，船中就满载着以陶瓷换回中国的大量南洋香料。

依信史的记载，安溪早在距今一千四百年前的南唐大保年间正式建县。嗣后经五六百年而到两宋极盛的时代，使安溪早已发展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县城。从遗址看来，安溪自有城廓，有

护城之河，城内有文庙也有武庙和城隍庙，街道略为狭窄，但皆有卵石铺路的遗迹，是一个历史久远，结构和建制十分完整，文化、经济发达的古城。

在两宋的颠峰时代过后，安溪逐渐走向了她悲惨的没落。有明一代，倭寇猖乱于中国浙江、福建沿海。当年繁荣了安溪的、畅通了安溪和泉州的水路，引来一两千个凶残的日本海贼队伍，在安溪大肆进行残暴的抢掠和烧杀，可以历时四十余日。每一劫后，安溪就成为鬼城，安溪县城和附近的农村尽成废墟。往日因海路和内外贸易集散而充满银币、酒香、笙歌与货物的安溪，在自明初而明亡的一两百年倭乱中，化为灰烬。

安溪的衰落，还不只由于倭寇的蹂躏。

为了巩固海防，明朝当局在福建沿海和包括安溪在内的沿海山区占地屯田。在贫困的安溪、被官兵劫占屯田的面积就有一万六千多亩。于是农民失所，无以为生，弃地流亡他徙者层出。

其次，是历代封建豪门大族大肆在安溪抢占土地。例如，安溪出身的清代大学士李光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其后李、唐、林三家占有安溪大部分的土地。早在明代，泉州的富商豪右，特别是李、陈二家，成了安溪最大的不在乡地主。土地高度的集中，地租苛酷沉重，几乎使整个安溪全地的农民皆成为泉州不在乡地主的农奴。此外，安溪一带封建寺观强占大量土地，也使安溪农民沦为寺观土地的佃奴。严重的社会矛盾，也是使安溪经济凋敝败落的重要原因。

垦 拓

倭乱、土地关系的严重矛盾和明末大饥等等，使得自明代以后，安溪的人口因在天灾人祸中死亡和大量向外避难求生而锐减。

贫困的安溪农民，北向温州、平阳及江西流徙，东向厦门、同安、龙溪流亡，更有一路出海，远渡大海，奔向台湾垦拓，寻觅另一个生活的天地。安溪人渡海到南洋者，是渡台运动以后的事了。

说到安溪人入台的历史，也是一页辛酸的乱世黎民流亡史。

远者不说，出身于邻近安溪的同安的郑成功，在据金、厦抗清的时候，在安溪征了大批壮丁。待郑成功退据台湾，大批安溪兵丁就随郑军入台，有全村四五百人皆与郑军渡台的记录。为此，清当局不但派兵入安溪进行了报复性的剿戮，施琅攻台时，也大量征用安溪兵丁，攻打台湾。安溪农民便是在这权力的争伐中，带着令人哀伤的矛盾，在同乡相残的过程中，进入台湾。清道光、咸丰年间，附从太平军蜂起的安溪贫困农民，在太平革命覆灭时，为避开残酷报复而逃亡台湾。此外，明郑归顺，台湾收复之后，清廷为加强台湾的开发，安溪出身的总兵林儒招募大批安溪贫困农民入台垦拓，成为佃丁长工，在台湾拓殖社会的底层艰苦地劳动。

正是经历这艰难曲折的历史，使安溪人成为闽南迁台人口中人数最多的一群。依据一九二六年日本治台当局的统计，当时台湾汉族人总计三百七十余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在台湾汉族人口中，有百分之三的人口，即三百一十万人是福建省籍。福建各县人的统计中，安溪人四十四万人，居第二，占百分之十一。待同安县人（占百分之十四）再分为同安、思明（厦门）和金门三县，安溪人一跃成为台湾人口中以县籍计算人口最多的人。以这六十八年前的统计为基数，假设人口以二十年翻一番，安溪人在今天两千万省民中，依旧是人数最多的一群。

毛蟹穴

而龙门乡金狮村石盘头出身的我家一系开台祖百庙公三兄

弟，在这历史性的安溪人大迁移历史中，只不过是一粒微尘吧。石盘头是离开安溪县城约莫四十分钟车程的外山里的小村社，现在总共只有七十户不到的人家。这次路中所见，最大的不同，是那条通往石盘头的山路边，到处摆着百斤上下、形状不同的花岗石材。而且越是接近石盘头，石材的数量越多。在石盘头下了车，一眼就能察觉的变化，是这原本古老、荒薄的山村，多出了许多新起的房子，有平房，有两层楼房，都是当地自产的花岗石材砌起来的，和灰暗的传统老屋，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车子在宗亲陈振瑞先生家门前停住。他惊喜的是我“突然”的来访，我惊喜的是他盖了新房，面路的一边还开了店，卖一点日常用品和糕饼。县城里陪着来的朋友介绍，他这两年搞花岗石材的开采，打成半成品，卖到县城和台安，“一年可以多收那么三五万。”他腆腆地抓着头皮说。这些年来负责新建宗祠的陈振瑞、陈生注，陈永发，多少都做了些石材生意。生注先生不幸因脑溢血而失语，行动也不很方便，所好身体其他方面都算健好。

石盘头也可说是今日安溪的一个缩影。村子里的姑娘外出到厦门、泉州、深圳的劳动密集工厂打工，从每月三百人民币扣除起码的生活，寄回这山村里来。村子里的小伙或外出打工，或到石场打石头，有机会就自己当家也做石材生意。有人去学泥水匠、烧砖、学装潢、学油漆。于是村子里的田地就只有老人家和女人去照顾。村子里非农收入增加了，新盖的石板房也跟着增加。有讲究的人在石板门框和窗台上，打上不俗的藻绘。

石盘头的经济，基本上以农为主。为响应“山区综合开发计划”，出身安溪的印尼侨商李尚大出资金鼓励石盘头的农民种果树，给每户各发了两株柿树苗、一株龙眼树苗。“种活了算送给农民，种死了要赔树苗钱”。县城来的朋友笑着说。从一九九三年起，石盘头年轻的劳力组工外出的多了，非农收入在村子总收入中的

比重增加了。长期在村委会搞会计统计的陈振瑞说，村子每人年平均收入从一九九一年的五百三十元人民币，提高到今年此时的六百九十元。一家以三口计就是二千零七十元。“这不算多，但比起从前，就不能同日而语。”陈振瑞说。

从一九九〇年认识这三位宗亲以来，深深感觉到他们的老实、认真和深情。但是我们这石盘头却流传着一个关于我们先祖不很光彩的传说，和我这三位宗亲的品质很对不上头。

传说入石盘立基的先祖的第几代，鸠工建立祖厝、特地请来一位风水先生勘察地理。风水先生为我们先祖找到了一个“毛蟹穴”，奠基兴工，预言家族世代鼎昌，将来代代“金盏银箸”，永世荣华，并且相约等待发达之日，再来讨礼。风水先生走后，陈家果然腾达，富甲一方，整个独占和操纵了龙门墟一带的米市。阅数年，风水先生来陈家，问起当年许诺是否应验，准备收取丰渥的礼酬。不料传说中的我们的先祖，心存贪吝，不但不承认发家，还埋怨风水不灵。风水先生识破东家的贪诈，佯称再施法术，保证发家富贵。但见风水先生在宅后烧符作法，又在宅前大院破土开地，顿时有赤水如血汁涌流者竟日。“从此我们的风水破败，石盘也一挫不起。”那位宗亲笑着说，坐皆开颜，显然已经没有人相信这一则不知流传多久的传说了。

这是一个“风水师破上穴惩罚贪诈”的典型‘论述’。类似而又稍异的各种版本，在台湾也常听见人说过。引起我油然兴味的是，中国人一向说到祖先，总要以尊敬的口吻，追述“宗功祖德”。而石盘头的我的宗亲，竟能这样诙谐先人，想到这或者就是缙绅阶级和贫困农民的祖先观之不同，不禁莞尔。

源 流

这一回到祖乡来，带来父亲交给我的一个任务。他老人家要知道世元公在入安溪石盘肇基之前的流传与垂统。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在石盘头，由于一位离休教师的宗亲陈友拔先生和县城文史办叶清琳先生的热心协助，先是在石盘头的族谱的序文上找到这样的句子：

“……吾始祖世元公，原银同秦美素轩公之裔，开基清溪依仁里石盘……”

叶清琳说秦美就是今日厦门的集美故名。集美有一个“姓氏源流研究会”，燃起了我的好奇和希望。离开安溪以后，联系到姓氏源流研究会的陈国良先生，居然不可思议地（当然并不是十分准确地）把开基于石盘的世元公接上了上衍于始祖帝舜以降，延绵几乎三千年，计约一二十代的宗族的大树。

关于陈姓源流最早而可征的记载，写在《史记》的“陈杞世家”：“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这胡公妫满便以国为姓，生息衍续，是为天下陈氏家族的由来。而这陈地古名宛丘，就是今天河南淮阳，至今淮阳还保有胡公祠、胡公墓。一般说“天下陈氏出颍川”、“天下陈姓出义门”都不是原祖论，而是指一个来祖衍生的著名衍派。例如公元前六百七十一年，陈亡于楚，有陈完逃奔齐国，改姓田。四百多年后，即齐为秦所灭，齐王建三子轸相楚复陈姓，移居颍川，即颍川陈氏，衍续而成中华望族，今人又推崇胡公四十八代孙，被陈文帝屡次追封、加封的陈实（颍川侯）为颍川派的始祖。

从舜到胡公妫满计三十四世。从妫满到颍川陈实公共四十八

代，合起来就是八十二代。陈实以下传到从河南南下入闽的“南陈”派系，各种族谱的说法不一，有不可避免的矛盾。但总之再传十二世到“南陈”派始祖陈邕，合计就是九十四世。我家族谱中所记“秦美素轩公”，就是从陈邕再传第十代的“光模公”。从这光模（素轩）再传六世，就是到安溪石盘肇基的世元公，合计一百一十一世。

石盘世元公再传十五世至陈百庙，渡台立基，是我家族系的台湾开基之祖，合计是第一百二十六世，百庙公而光候公，而金山公，而清赛公，而宽公，而我的祖父陈芑公，计一百三十一世。父亲一代有四兄弟。大伯父陈琳先生；二伯父陈九先生；三伯父，也是我的养父陈根旺先生和我的生父陈炎兴先生。到了我这一辈，从帝舜算起，是一百三十三世了。以二十年为一世，就有两千六百多年。

不过，以封建宗法财产关系为基础的族谱思想，毕竟是以男性子嗣为中心的谱系。族系的繁衍，每一代、每一房都有他姓的女性参与这血缘网络的扩大和形成，同时也有我姓妇女广泛地参与他姓族系的拓展工程。把“血缘”列为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这个角度上去思考，就会有更为具体深刻的体会。

新 祠

今日保存在安溪石盘头的族谱上，记载着更为详实的祖籍地址：“（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归善乡，依仁里，石盘头，崎沟，福安厝。我的大伯父所记忆，就只少了乡名，里名和地头名“崎沟”。至于“楼仔厝”，大约是当地人民依福安厝的楼房外型起的俗称。从百庙公拜别石盘的祠堂和乡井，渡怒海到今日三峡柑园一带开山肇基以来，依原乡族谱所记，一直到父亲

于一九八六年回到原乡，子孙未尝有一人归省。而这神奇的祖籍地址竟能在台湾口口相传近两百年而不忘，终于由大伯父传给我和其他的子孙。这些移民不仅口传了地址，也口传了原乡祖厝的形像。“那楼仔厝门前，有一丛大松柏。”我曾听大伯父的长媳这样说，“你大伯常跟我们讲的，讲楼仔厝前，一丛大松柏仔。”

问起楼仔厝和松柏树，族亲陈友拔先生说确有其事。在前往新建祠堂的路上，陈友拔带我看楼仔厝的旧址。如今早已经没有任何遗址可寻，开成了菜园。畦上摘余的油菜，纷绿鲜翠，和台湾农村的田畦毫无二致。“老松柏就长在那个角落。”他比划着说。他说着的时候，心中一定还有那一棵儿时熟见的百年老松，但我这来自台湾的子孙，却只见一片空旷的菜圃，心中漾起愁怅和缅怀的微波。

一九八六年父亲归省，和亲族们共定了重修祠堂之议。族乡经济情况不好，惭愧的是我家在台湾也不是富商大贾，父亲回台湾后，寄去微薄，做补贴鸠工之用。今天，祠堂已初见形貌，比我想象中者还要有模样。祠堂是按照祖宗原来的建筑构成盖的。“有上落半座，无有下落”，前有庭，庭有围墙，正墙中放大门，上落左右双边各开小门。族亲们组织了“石盘头建祖厝委员会”，由陈振瑞、陈生注、陈永发和其他族亲组成。如果石盘在外的子孙有几个豪商大贾，这祖祠应该早已落成。但是艰苦勤工建祠，也另具意义。因为数年于兹，祠堂之初具结构，主要是原乡宗亲们在建委会领导之下集腋成裘，加上村中全体族亲用自己的劳动去打石材、运石材、辟地、奠基……上梁、覆瓦，工程因资金之断续而断续。我家在海外几次捐献，实在是杯水车薪，于心不安。但这样用勤劳的劳动一寸寸新修的祖祠，就不像以往的中国各地祖祠，多半是族中豪门宦家，为加添自己一家的荣耀主修土木，而是族内勤劳农民自己亲自擘划，用自己的劳动和血汗集体修建，是

原乡宗亲人民自己的宗祠。因此，我们的新祖祠就不再是长袍马褂的族中豪强族权的中心，而成为石盘头农民宗亲在纪念族史祖德之余，可以议事聚会，交流文娱，接待寻根谒祖的外地族亲的社区公共场所，使祠堂扩大它的社会功能，这就很有意义了。

现在，覆瓦尚未收尾，围墙、正门有待建立。石盘头原乡的乡亲基本上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完成宗祠的建设。但是，在原乡宗亲们已经勤工建祠，完成了主要建筑的此时，散居在台湾和南洋各地的安溪石盘头派下的子孙，若能动员起来，参与宗祠兴建工程的剩余部分，实为美事。凡海外宗亲关心此事，可以写信到福建省安溪县龙门镇金狮村给陈永发、陈振瑞两位宗亲联系。

谦 逊

新祠堂上落有一对花岗石柱，上面刻着这样的对联：

石坚擎日月 开基绵远
盘固托河山 衍派泽长

然而，在绵远的基业，泽长的衍派背后，是二几千年兴衰腾微，迁徙流离、安居发展和凋敝流亡叠相交织的宗族史。而这宗族的历史，又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经历两宋的鼎盛，明清以后，安溪就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中贫困化。今天，尽管内包着绝不可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龙门岭隧道的开凿、漳泉铁路的铺设，都在明朗地预言安溪经济长期停滞时代的终结，就像整个中国大陆，整个亚洲终于要宣告穿出长

期阴暗停滞的隧道,迎向不可预知却又必然的经济发展时代一样。一个高度城市化、资讯化、高教育和科技的亚洲(当然包括中国)正要形成。那时候,从十八世纪以降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中国南方向广泛亚洲、东南亚和南洋地区移徙的华人——其中包括安溪石盘头人和他们的资本,在新世纪经济运动中所起的民族的、宗族的作用,毋宁是自然的结果。如果我们对“东方资本主义”还能抱持起码合理可能的愿望,那就是历数千年而未泯没,在几个古老文明中至今唯一能迎向再生的现代的文明对新世纪亚洲经济开发的更新和领导作用,能取代过去西方主导的、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战争、环境的崩溃、冷战中的霸权与扈从为代价的成长。

耻辱、屈从、贫苦的亚洲就将过去。至今以做为白人扈从的傲慢,恣情轻贱和诅咒自己的宗族和血缘,一面又对外人极尽恭谨、怯懦和谄笑的人,在西方没落,亚洲崛起的地图中,不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是祖乡之行一点谦逊的体会。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五日

台湾史琐论

历史的记忆、解释、理解和书写，向来就没有类如自然科学之“绝对的”客观。不同阶级、不同的民族地位对同一件历史过程，就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解释、理解和书写。从封建地主、贵族、王朝的观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循环不已的农民破产、弃地逃亡乃至啸聚山林的运动，是盗贼匪乱的历史。但如果从农民革命的观点，就是贫困农民揭竿起义，向封建地主豪门要粮食、夺取权的阶级斗争。抗日战争中遍地蜂起的抗日游击武装，在日本侵略军眼中是盗匪，是应受“严惩”的“暴支”（蛮横的支那）。从日本人看，日统期台湾农民的游击武装抗日史是“台湾匪志”，我们自己的看法当然不同。对日据下台湾史，台湾人民内部因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政治内容、不同的理解。从同化会到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到从左回旋后的“新文协”脱出的民众党、再到自左倾后民众党脱出而组成台湾自治同盟，终而至被收编到皇民化运动的这个系谱，从台湾工农阶级运动的立场，不能不视为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路线。而在台湾民族民主运动在理论积累还比较幼稚的时代，带来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的相克，终至带来可以并且应该避免的路线斗争。

鉴于此，对于《马关条约》，对于台湾日统期历史的认识和评价，站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站在反美、反日立场的人和站在

“台湾民族主义”立场、站在反华亲日——亲美立场的人，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从而双方就会有“历史的战争”，这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在历史的解释上，向来有阶级和民族立场的斗争，向来就有不同民族和阶级、不同政治的“战争”。架空、抽象、绝对的历史，恐怕是从来就没有的。

但没有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对客观和真实的历史。一般地说来，把历史看成动态的、立体的、具体的（物质论的）看法，比把历史看成静态的、平面的、抽象的（精神论的）看法，总要来得接近客观、接近真实。

此外，站在推动、改变历史的立场的史论，站在和历史动向相应的立场的史论，比站在阻止历史发展、维持历史现状者的史论，站在违逆历史运动方向与潮流者的史论，总要更接近客观、真实。当然，史论和其他的知识理论系统一般，对相关事实（史实）的掌握是不是正确，立论的逻辑构造是不是完全，是基本的要求。

台湾不曾“独立建国”

台湾史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一个向来独立的社会，或历来独立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

大陆汉族人来到台湾之前，台湾全岛已有很多原始社会存在过，距今约一万五千年到四千多年。这些原始社会阶段的出土物，又与中国沿海一带的原始社会出土物或雷同、或相似。总之，先于汉人在台湾生活过的各原住民族，其社会发展阶段还只在原始社会部落共同体的阶段，自然谈不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的民族国家政权。

即便汉族人来台拓垦之后，也从来不曾建立过独立于中国的

国家政权。明郑与清国家的对立，众所周知，是一国内的内战对峙（光复大明江山）而不是企求永久的分离。一八九五年的“民主国”，基本上是反割台的抗日临时政权，是企图用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冀强权之干涉而保台湾于中国版图、反抗割台的权宜运动。一九二八年台共纲领中有“独立建国”的口号，基本上是从日帝支配中争独立，而且在一九三一年的纲领中只留独立的口号，却已不见建国的口号。一九二六年末到四十年代初，台湾抗日反日运动的战场移转到大陆时，有几个台人抗日团体也提出过“台湾独立”的口号，但都是“先自日帝下独立解放，后回归中华祖国”的主张，彰彰明甚。

一方面，台湾的先住民和拓垦汉族都在历史上不曾在台湾“独立建国”；另一方面，台湾历来是汉族人长期移垦，并且具体地逐渐编入中国政权的建制；至帝国主义向中国南疆不断进攻的一八八五年，正式建省，划入中国的版图。因此，台湾不存在因丧失原有的独立而争取恢复独立的问题，也不存在目前正遭受外族外国“殖民统治”而争取“独立建国”的问题。以故，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朝鲜面临的是恢复因日本并吞而丧失的独立，建立新国家的问题；而台湾则是迎接光复，复归中国的问题。

殖民统治下的反抗运动

台湾，由于她在地缘政治学上的独特性，在世界进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时代；当世界逐渐划分成殖民者、压迫者、侵略者国家和民族，同被殖民、被压迫、被掠夺的国家和民族的时代，古老的中国和辽阔的亚、非、拉各国各民族一样，沦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侵夺的国家。而处于中国南疆要冲的岛屿台湾，屡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夺、统治，荼毒尤烈于中国本部的其他

地方。

因此，历史地看来，殖民主义为了支配、控制和掠夺中国，常常要先占取和控制台澎或其他据点（例如香港和澳门）。而侵占和反侵占，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就往往爆发为军事冲突。当中国国力可以制胜侵略者，已经殖民地化的台湾就得以解放而复归中国——例如明郑驱荷复台，也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复台；而尚未殖民地化的台湾就得以在中国的版图上保住——例如在荷据台湾之前，台湾岛上各族人民抵挡了日本倭寇、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商业资本对外殖民扩张的攻击；例如两岸人民合力成功地驱逐了荷兰对澎湖列岛的侵扰（一六〇四——一六二二年）；又例如在中法战争（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的台海战场中，在刘铭传领导下，台湾民众保家卫国，抗击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基隆、淡水的保卫战和反击法国军事封锁的斗争中，打败了法国侵台的军事行动，予敌人以重创，保住了祖国的南疆台湾。

当然，当反侵略的斗争失败，台湾，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控制和侵略中国的基地——当然也出于对台湾资源的贪欲（十七世纪的鹿皮、鹿角、米、糖，十九世纪的茶、糖、米、樟脑、煤、金矿），将台湾从中国分断开来加以殖民地化，例如荷据和日据的台湾，以及一九五〇年后美帝国主义下台湾的新殖民地化。

台湾的殖民地化，如前所论，并不是一个原本独立的社会、民族或国家的殖民地化，而是从中国被分断窃占出去的领土之殖民地化。因此，殖民地化期间台湾的反殖民地压迫的斗争，就历来不是反帝→独立的斗争，而是反帝复归祖国的斗争。当然，特别在一九二六年后在大陆台人反日战场，更多地揭举了反日→独立→复归祖国的纲领，下文可以申论。而当支配的殖民者败亡时，台湾的斗争也历来不是“恢复独立”的斗争，而是复归祖国的斗争，这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苛酷残暴的殖民地剥削，荷据下的台湾，在短短三十七年的荷兰统治下，台湾的汉人和原住民就发动了至少十二次反荷蜂起，牺牲惨烈。一六六一年，当郑成功以船舰两百余艘带领近三万军队攻台时，台民包括汉族和原住民奔走相告，揭竿而起，不是为了抗荷独立，而是响应以恢复明王朝为号召的攻台郑军，在各地点燃了抗荷起义的烽火，终于摧毁了殖民政权，台湾复归于和清王朝对峙，但志在匡复中原的郑氏汉族地方政权。

日帝支配下的台湾也一样。甲午战败，大陆上固然有王室贵族的颀颀的割地投降派，但也有强大的抗战反割台派与台湾岛内的反割台斗争相呼相应。割台议定，包括抗日临时政权的“台湾民主国”在内，莫不求台湾之光复——而非分离独立为目标。嗣后，从台湾农民的武装游击抗日运动，到二十年代后反日帝之思想、文化、文学、社会和政治运动，除了外部受到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风潮的影响；内则深受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革命、五卅惨案以降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深刻影响，日帝下台湾的民族民主革命，向来不是台湾一岛的反帝民族独立运动，而以抗击日帝，反对同化，保持种姓，依靠中国的革命与解放最终求台湾之解放而复归中国为指导思想。因此，当日帝败亡，殖民地台湾的课题，就不是“恢复”独立，重新建国——如同战后其他解放后的殖民地那样，而是复归祖国中国。究其原因无他，前文所说，台湾自始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和国家。历史上台湾的殖民地化，一向是被强权从中国分离出去，以中国的一个肢体而被殖民地化。

一九五〇年后，在东西冷战和国共内战的“双战构造”下，在美国武装介入台湾海峡的条件下，台湾和中国本部分断分离已四十六年。历史地看来，这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与中国反控制斗争的力学关系的结果。当然，约五十年后，这力学的关系起

了变化，牵动着台湾与中国从分离到再统合的进程。

日据时期“台湾独立”运动的本质

最近以来，有人很喜欢谈日帝下台湾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一九二八年的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过“建立台湾共和国”、“台湾独立”的口号。

事实上，台湾独立问题，在台湾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中，提出过好几回。但是，科学地分析，每次的“独立”运动，因着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阶级属性，有不同的政治内容。

一八九五年的“台湾民主国”，是反割台的抗日临时政权，目的在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许以台湾的各种利权，阻止日本占有台湾，使台湾留在中华的版图内。而它的阶级内容，主要是台湾当时的官僚、地主、士绅为中心，因此也掺杂着严重的逃跑主义和投降主义，致“民主国”不旋踵瓦解。

其实，从台湾沦为日帝殖民地的全历史看来，台湾的反帝解放运动，从“台湾民主国”政权成立起，不论是左翼、右翼，是前现代性的或现代性的反帝民族运动，不论在岛内的或寓居大陆的台人反日团体，就存在着“先求自日帝下独立，后图回归祖国”的共同纲领。这是因为台湾既在国际法上为日帝殖民地（对“民主国”而言，是议和割台之局已定），台湾要从日帝下求解放而复归中国，先就要谋台湾自日帝下获得独立自由。此外，二十年代中后的中国当然无力立即以武力光复台湾，且内有军阀割据混战，外有列强压迫，更无从期待祖国解放台湾于可预见之未来。因此，台湾只能先以自力斗争，先自图打倒日帝，将日帝驱逐出台湾，自谋独立建政，然后徐图复归祖国。“先独立、后统一”的纲领，是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台湾史的两大大特点，即

(一) 台湾在国际法上为日本殖民地，和(二) 祖国中国的积弱所规定的。

一九一三年，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在本人和党人的供状中，主张台湾先反日而建立自己的政权，然后回归中国，而牺牲于日帝的刑场。

在殖民地下公开揭举殖民地独立，是《治安维持法》上可以刑死的重罪。因此，为台湾之解放，主张“先独立、后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多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反日、抗日民族运动团体。

一九二六年，在以联俄容共、扶持工农为革命方针的国民党广州基地，就有许多热血的台湾青年组成“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他们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在台湾问题上，秉持共产国际“殖民地独立”的纲领，主张台湾从日帝下独立，完成自己的民族革命。

一九二七年，“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在北伐革命的热火中，改组为“台湾革命青年团”，在台湾问题上，亦主张台湾自日帝支配下独立。台湾革命青年团的主要人物之一张深切在回忆中指出：一旦台湾的民族革命任务实现（指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台湾独立的议题自然消失。

实际上，联俄容共时代的国民党中央，也主张台湾和朝鲜的独立。这是深受共产国际民族政策、民族问题的纲领所影响的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自然的思想倾向。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中央的戴季陶就对广州的台湾革命青年做了鼓舞以台湾的独立为纲领反对日帝的讲话。

在岛内，一九二八年，台共在政治纲领中提出台湾独立建国的口号。这应该有几方面的分析：

一、台共独立论的针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侧重在从日帝下获得民族与阶级的解放。殖民地的解放，即殖民地恢复独立主权，

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为什么不提台湾复归中国？据苏新之说，可以理解到当时台湾党人认为，如果台共终于成功领导台湾民众解放了自己，在台湾建立了自己的劳农政权，但成立只有七年，自己还在不知何时破晓的中国大陆艰苦斗争的中共，如何在她协助起草的台共纲领中，主张将解放了的工农的台湾，送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由地主、买办、官僚资本统治的祖国？那么，保持台湾工农阶级政权独立的纲领，便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二、日帝下台湾党人主张台湾独立于日帝国理所当然，但对独立台湾与大陆关系，自不免有微妙的违和感。据苏新说，这就是为何在一九三一年由台湾党人起草的台共改革的新纲领中，就没有了台湾“建国”的口号，只留下台湾自日帝下独立，即殖民地解放的口号。

三、日帝失败，台湾光复以后，台共从来没有要求再建一个独立于中共和日共的台湾共产党，为实现一九二八年纲领中独立建国的口号而斗争，更没有要求归建于战后复权的日本共产党。而且当台湾民众因“二·二八”事变对中国幻灭、悲观、徬徨时，旧时台共党人成为唯一坚定主张在新民主主义下改革中国，在民主自治条件下促成两岸统一的政治力量，殆无例外。

四、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之后，旧台共和中共地下党人地区性地指导了这个自发的民众蜂起。在事变被残酷镇压后的广泛绝望、徬徨中，他们又很快地举起了民主自治的旗帜，为实现台湾的民主与高度自治，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而斗争。

五、一九四九年，他们全体奔向新生中国，没有一个到日本参加“台独”。在一九五八年后一连串中共极“左”路线下，他们和绝大多数大陆人民和党员一样备受冲击，却至今还没有见到有人声明转向，加入台湾独立运动的阵营。

再回头看大陆的台人反日民族运动的发展。一九三二年，深受丘念台影响的台湾青年在广州组织了“台湾民主党”，主张打倒日帝，推翻总督府，“建设台湾民主独立国”，其目的也在先自日帝独立后，台湾复归于中华。

早在一九二四年间，台北泸州人李友邦，在国共合作，第三国际有巨大影响的广州成立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因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共遭到波及而偃息。至一九三九年，中国全面抗战展开后，李友邦积极组织了“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把台湾的抗日民族斗争同大陆全面抗日民族战争的大局联系了起来。台湾的反日帝民族解放运动遂进入了一个新阶级。

先此一年，李友邦重组“台湾独立革命党”，自任主席，并在其修订的党纲中正式提出“先独立、后统一”的新纲领，要“团结台湾民族，驱逐日帝在台势力，使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而归返祖国，共建三民主义新中国”。自此，台湾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正式提出了先打倒总督府统治，后“归返祖国”的纲领，有历史重要性。一九三九年，李友邦发表“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中国”，深入发展了他的理念。

一九四〇年，台湾独立革命党与其他在大陆台湾抗日革命组织结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李友邦发表宣言，把推翻日本对台统治，促成殖民地台湾的解放，同“促成祖国抗战胜利”联系起来。一九四二年，李友邦更进一步推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复省”的运动。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李友邦敏锐地发觉了美国帝国主义将台湾国际化，阴谋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乃迭次为文和发表宣言，揭发和驳斥新帝国主义的阴谋，大声疾呼台湾应复归于中国。

至于一九四五年，台湾亲日派精英辜、许、林等人勾结日本

军人阴求台湾独立，其方向就恰恰和一八九五年“民主国”者相反。他们要假借独立造成国际法上的事实，抗拒台湾复归中国而继续留在战败的日本的控制之下。当然，这个图谋在大不得人心情况下，旋即宣告失败。

而今日甚嚣尘上的“台独”运动，其性质、阶级内容、国际背景，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间者有本质上的不同，至此明若灯火，思可过半，在此不赘。

因此，虽说同是“台湾独立”的主张，其政治则因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民族立场而有天壤之别，岂可一概而论，以今度昔？

社会史观解读台湾历史

在台湾，研究台湾史由于五十年代恐怖肃清，一般地缺少社会经济史论的视角，从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道德论、感情论这些历史唯心主义的色彩。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台湾史的各阶段，最概括地说，荷据时代的台湾，是一个殖民地的，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支配下的欧式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所代表的荷兰商业资本和受其利用的代理统治者——汉族和先住民“长老”阶级，榨取台湾本地和招募自中国大陆沿海的贫困佃农。榨取手段是通过实物地租、徭役，以及对鹿角、鹿皮、茶叶、粗糖这些农猎商品的搜刮和贸易。佃农实际上成了荷兰殖民地主的农奴。这一时期（一六二四—一六六一年），在国家关系上，台湾因殖民地化而与中国分离，沦为殖民地。

明郑打败荷帝对台支配后，台湾的殖民地性格消失。明郑在台湾施行豪族部曲的封建制，虽然比对岸封建制之高度成熟期之土地可由民间自由买卖者倒退了，但在耕地基本上辽阔，乏人耕

作开拓条件下，郑王朝分封贵族、豪右、军事将领的封建制，基本上是组织了土地关系和生产，有相对进步与发展生产力的功能。此外，作为中国新兴商业资本势力代表的郑王朝，在对外贸易上，有所发展。惜乎受清廷的掣肘，无从进一步开展，社会阶级上则由郑氏王室、贵族、军头统治着本地和移入的贫困佃农。和本部中国的关系是，台湾统一到暂时分裂对峙的中国。这个豪族封建社会阶段为时一六六一年到一六八三年。

从明郑败亡到鸦片战争（一六八三—一八四〇年）期间台湾社会产生了较大变化，台湾社会进一步成为较为发达的封建社会。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不久，虽然清廷设下重重限制和防范台湾成为“奸宄逋逃之藪”的措施，但土地肥沃，待垦耕地广阔，封建制度还在年轻阶段，各种封建关系尚为疏松脆弱，吏治、控制尚宽，因此，从大陆冒死犯禁渡台者蜂拥而来，人口迅速增加，土地大量开发，台湾封建经济取得了飞跃发展。大米一年双熟，产量又高，余量并可输出大陆。甘蔗的增产，促成了制糖作坊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农作的发展，带动两岸间贸易的快速发展，两岸对口商港也不断地随着海峡贸易的发展而繁荣。商业资本的成长，促成台湾民间商业基尔特的的发展，闽南和台湾间的“行”、“郊”组织若雨后春笋。而经济快速发展，使全岛各地纷纷出现了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地主，以新兴阶级登上了舞台。

大陆沿海的贫困移民大量移入，土地广泛开发，封建的生产关系日趋发达，就逐渐产生阶级分化。腐败、贪婪的官僚和地主士绅，和贫困、犷悍、啸聚成群的佃丁山客之间的矛盾，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封建斗争。朱一贵和林爽文的蜂起，是其中最为有名者。

而这一时期台湾封建社会的国家关系，是和清朝中国统一的关系。

从鸦片战争（一八四〇年）到马关割台（一八九五年）期间，台湾和大陆一道遭到现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强烈冲击。屈辱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成为西方列强的俎上之肉。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透过不平等条约，强迫开港贸易，霸占土地，借其雄厚资本和现代商业组织和管理手段，全面控制大陆和台湾对外贸易。在外国商业资本的高利贷介入下，买办阶级兴起，农产品如茶叶进一步成为国际贸易商品，冲击了传统的地主佃农封建关系。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官民企业的发展。岛内糖茶行郊的兴盛，新的商业资本阶级的兴起，都使这时期的大陆与台湾封建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帝国主义资本、封建地主、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行郊资本居支配地位，而广大佃农、茶农、樟脑和制糖作坊工人居于被统治地位。而这一时期的台湾在国家关系上，台湾统一在一个半殖民地化的中国。

一八九五年马关割台，台湾进一步沦为日帝总督府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在经济上，日帝经由米糖单一种植的经济，对台湾进行殖民地统治。而米糖经济，又以经过日本现代民法改造后的半封建主佃体制为基础。在社会关系上，日本独占资本和台湾本地大地主居统治地位，而广大的贫下中农、为数不很多的现代工资工人、手工业者、中产阶层为被统治阶级。在殖民地矛盾下，前现代性的和现代性的反帝斗争层出不穷。二十年代以后，农工阶级的民族和阶级运动迅速发展，构成了台湾反帝民族民主运动的光荣的传统。这一时期，在国家关系上，台湾与大陆是分断的状态了。一九四五年，日帝崩溃，台湾组织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两岸统一。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上全面介入台湾事务，使台湾沦为新殖民地，而两岸分断分离。

这社会史的台湾论，比较科学地、从发展和社会构造的观点，认识各个历史阶段中台湾社会民族压迫和阶级矛盾的结构和本质。让我们学会从帝国主义时代东西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与斗争的框架中，看台湾与祖国的分断与统一关系的本质。

台湾史理论的建构

前文说过，台湾从来不是一个自来独立的社会或国家。因此，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史中，台湾的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是恢复原未曾存在的独立这样一个问题，而是祖国复归的问题。

前文也说过，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殖民地台湾有多次“台湾独立运动”。每一个独立运动，皆有其不同历史阶段中不同的阶级和民族内容。但除了一九四五年辜、林、许等人阴结日本企图以台湾独立，脱离中国，依附日本者外；日据下台湾独立运动，政治不分左右，性质不分前现代或现代民族运动，场地不分岛内或大陆，皆共有“先自日帝下独立自主，后图复归中国”的政纲。这是因为：一、现实上台湾在国际法上为日本殖民地；二、祖国中国积弱，是以只能自力自求解放（独立），而以独立为复归中国的手段。而战后从廖文毅以下的“台湾独立”运动，在历史和政治上不属于这个“反帝—先独—后统”的传统，而属于一九四五年辜、许、林等人依附帝国主义，从中国分离的传统。两者在阶级、民族的政治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台湾史的社会史的观照，提供科学的、善于从不同的历史和社会阶段去理解不同的民族压迫和阶级矛盾之构造本质，并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压迫与反压迫的框架，去认识台湾与祖国的统一与分析的本质。

台湾的社会史论，不以认识历史为已足，而进一步以掌握变革历史的规律，付诸实践为志。今天，李氏政权的登台，已经使“台湾人—台湾民族—外来政权……”史观陷于混乱。如今，“革命建国”的政党，为分赃现政权而忙乱，而坚持“独立建国”的原教主义者改原教为信仰而不是知识和理论，封闭讨论，留下大量台湾国家论、社会论和民族论的破绽。而从台湾社会构成体论的传统（台共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一年纲领、李友邦《日本在台湾之殖民政策》等）及其发展，分析一九五〇年以降，特别是李氏政权登台后的台湾社会，建构科学性的社会构造论和变革论，诚为当务之急。

——一九九六年十月号《历史》月刊

一本小书的沧桑

我的第一本小说选集，出版于一九七二年的香港。那时我早已因“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十年徒刑，定于一九六八年末，正蹲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绿岛监狱的押房里。

出版的消息是由我四弟写的一封隐晦不明、煞费猜读的信里概略知道的。等到他来接见，他不好说，我不能问。但总之我大体知道我的小说选集在香港出版了。人虽在囹圄，出版了第一本书的喜悦，竟无法平抑。

我之系狱，并不因小说贾祸。然而一旦被判定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罪，在那荒芜的年月，我的文学作品便连带地有了危险性了。于是家人、编者都不能堂堂地把新书寄一本到铁窗后面的我的手上。

小说集的编者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教授。出身贫寒，因苦力学出世的刘教授，在思想上却很稳健，即使一九七〇年热火朝天的“保钓”运动，似乎都没有使他稍移初心，是一个对自己的思想立场有严肃态度的知识分子。他对我的思想和政治之与他不同，明若观火。而在那样的年代，在那个时刻，正是他，在香港找人为我出了收有十八篇小说、三篇评论的《陈映真选集》。现在看来，这本选集使我从一个文学青年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小说家。做为政治犯，小说家的身份给予逮捕、监禁了我和其他十来

名同案青年的国民党形成一定的文化压力。

长期以来，我为此对刘绍铭教授怀有切肤的谢意和敬意。唯其切肤，至今不曾专就此事此情启口言谢。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又被安全机关逮捕。这本《陈映真选集》连同大量书籍文件被搜查而去。人是三十六小时“交保候传”，回了家了。但被搜押的大量书刊，却要待两三年后才发还。现在《陈映真选集》封面上标签“A043”，就是侦警当时为了分类、保存贴上去的。为了“纪念”，至今我都不曾把它撕去。

扉页上有我签的草书“陈”字。那是在侦讯室中，情报人员为了证明这些搜得的书籍文件确实为我所有，非他们任意塞给我栽赃，要我逐步逐件签字所留下的。至于为什么他们把一本小说选集慎重其事地要当做犯罪证据去处理，直到今天，仍不能得其解。

这《陈映真选集》是香港小草出版社以“小丛刊之七”出版的。一九七五年出狱后不久，我在台湾见到了今日已极不应该地忘却其大名的发行人。那是一位诚恳朴素的长辈，坚持送给了我一台全新的照像机，做为“版税”。

在历史成为令人厌烦的唠叨的时代，这些往事，于今人怕连鸡毛蒜皮都不是了。

但对于我，这本小书是超越思想和政治、虽不张扬却难忘而深刻的友情和敬意；是一个无可置信地荒废的时代所残留的化石……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我总不能把文学仅仅当做流行时潮的游戏，总是把文字看成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与呐喊，从这本小书的沧桑，或者就能找到答案的轮廓吧。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马先生来了”？

马克思《资本论》在台湾出版的随想

最近，时报出版社出版了战后第一套公开刊行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成为文化界不大不小的话题。事实上，留着大胡子的马克思的照片，一两年来，早已在乍见似乎“进步”的杂志上，大量地当做效果不错的插图和版面设计使用，甚至到了冗滥的地步，而引起我的一位外国朋友的惊讶：马克思曾几何时在台湾已经这样“受人欢迎”？

以“马先生来了！”、“灵魂的解禁！”为广告辞的《资本论》促销活动，其实并不真实。一九五〇年以后一直到前几年，《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的著作，和其他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更多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Marxist）论著，在台湾一直是可怕的禁忌。在大学里，有自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傲人，吃思想侦探饭的老的和少的教授。有更多以“中国文化道统”、“宇宙至中至正”之类的“学术”和“理论”，“驳斥”和“批判”马克思主义之“邪恶”、“偏颇”、“唯物”和“仇恨”的著作尤其之多。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几千个在台湾的本省和外省优秀的青年，在一场制度性的逮捕、拷问中遭到集体性的杀戮和监禁。他们所保有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被当做不可道假的严重罪证。四十年来，在国外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学者，不惮于以“你们没读过，我读过”的证人身份，在没有和无法读到

马克思的国人面前大做望之若“理性”的马克思“批判”。四十年来，台湾的文化生活和知识生活中，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绝迹，而美国式的、保守主义的、冷战的文化、知识和意识形态，以或者粗暴、或者细致的形式泛滥。甚至许多在台湾的反体制文化英雄，同时是鲜明昭著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崇拜者、超级反共主义者、过去肃共法庭上的冷血法官和超级买办主义者，殆无例外。

一九五〇年以后，由于早在二次大战前世界的共产党人早就不断地预告“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来临，并指导党人做好在这个必然来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打倒法西斯蒂，夺取政权的准备，因此法西斯轴心战败瓦解以后，美苏冷战对峙立即升高，而各地的共产党人便开始遭遇一个国际性波次的残酷反共镇压。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大量真实和被罗织的美国文化人、知识分子和市民进行骇人的政治、社会与精神的压迫。希腊、中近东英国旧殖民地的马克思主义者遭到美国与当地反动派联手残酷杀戮；在中南美洲，对共产党人的“猎巫”（witch hunting）恐怖政治至今不绝、变本加厉，在哥斯达·加代斯的一系列电影（《失踪》、《Z》等）中犹令人战栗。在五十年代的日本，麦克阿瑟把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左倾知识分子制度地从一切日本文教、政府机关中驱逐列管。在战前和战时犹艰难奋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讽刺性地在战后遭到肃清。在韩国，美韩当局联手集体屠杀了七万济州岛革命的农民……但尽管这样，在被肃清后的社会，还艰难地留下在“地下”、地上游走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力量，留下不可忽视——甚至起着重大作用的——思想理论著作和文艺创作。一九八七年访韩，看到一九八〇年光州事件后蓬勃发展的、关于韩国社会史、韩国资本主义、韩国民族、民众文化运动的论争和理论著

作，理解到早自五、六十年代以来，韩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理论家、运动家、文化人和学生，在和台湾相较只有过无不及的反共压迫下，没有死绝，因此也没有停止过思想和创作上的实践。一九八八年到马尼拉，在贫困、内战、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悲惨祸害怵目惊心的菲律宾，我在矮小的、“进步的”书店中，可以随手找到关于分析菲律宾社会、历史、美国新殖民主义、专制政治的、当地马克思主义学者、理论家、神学家写的书。

但是，在台湾，关于台湾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自遥远的二十年代以降，早在三十年代台共被日本当局全面镇压以后，就几乎彻底绝迹。四十年来，台湾的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片美国保守系社会科学和哲学的领地。学界不分朝野，几乎一概反共，一概歌颂美国。台湾是战后世界绝无仅有的、朝野一致极端反共、一致极端亲美的社会。台湾自然也是极少数马克思主义受到最彻底的镇压，受到朝野“学界”最轻率的待遇的地方。这是从马克思《资本论》的出版方式也可以证明的。

在三十年代的日本，即使当日共高举“拥护苏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工人阶级联合韩、台殖民地工人和中国的工人阶级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旗帜的时代，日本当局对马克思主义出版品的处理并不是彻底查禁、逮捕读者和出版者，而是一、御用学者翻译，在“重要的地方”删除或“误译”、“歪译”出版，而禁止其他版本；二、开天窗。六十年代，我就在台北旧书店买过日本岩波版马、列的著作，其中就有每页、甚至连续两页以“×”代字，标点符号和段落则保留原样的奇异的版本。三、马克思主义准许在大学里开课，却严格限制在校园内，不许师生在校外搞政治活动。

六十年代，我为了热衷于找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到台北市

牯岭街的旧书店街找鲁迅、找巴金、找老舍、找沈从文、找曹禺、找张天翼……误闯了禁区，也开始买到像《政治经济学教程》、《大众哲学》、《联共党史》这一类的书。有一回，我在旧书堆中翻到一本破烂的英文书，封面赫然是《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一册，出版者竟是“莫斯科外语出版社”，书的头一篇文章，是我久已知其名但自付永远也读不到的《共产党宣言》。我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怀着又骇怕又兴奋的心情，把书带回穷大学生时代窄小阴暗的、租来的住所。

当然，这些其实还是“外围”的、还是比较“浅”的书，已经足以全面颠覆我在台湾的教育养成过程中所接受的一切“内战—冷战”的价值。对于二十多岁的，读书不求甚解，文学气质远远多于对政治的兴趣的青年，由于纯粹的命运中的偶然，在那严苛而荒芜的时代，因着那一条杂乱旧书店街里的破旧、发霉的书，一个人孤单地、恐惧地、亢奋地，一次又一次进行着思想的脱皮和蜕变。

我于是感觉到，通过这些“社会科学”的书，自己遂更加了解了鲁迅、老舍和巴金们；了解了他们杰出的文学作品中最深层的呐喊。我也才恍然地了解到，在幼小的时代，大人们用耳语传说的，一些青年和老师，在那苍茫冷冽的、白色的五十年代失踪、赴死的时候，燃烧在他们心中的灯火，飘扬在他们的思维的天空里的旗帜，竟是什么样的灯火，和什么样的旗帜。今年春天，在北京大学的微雪的校园里，猛一个转弯，蓦然撞见了埃德加·斯诺的墓，使我大吃一惊，百感交集。我满面泪痕地读完斯诺日文版的《中国之红星》（汉译《西行漫记》）的大学四年那个极为寒冷的夜晚的情景，当下立刻涌上了心头。

因此，当我在这些旧书上看到书的原主人留下的眉批、阅读时强调其重要性而圈下的圈子、画下的线，尤其是他们的签名、购

书日期甚至印章，都使我心魄颤动，不能自己。我无法自抑地想象着这些旧书的主人被捕、被拷问、甚至被杀的命运和情景。他们留在残破的书上的眉批和姓名，像是一个奋力要为强被湮灭的时代与历史做证言和呐喊冤抑，在我当时的睡梦中，徘徊踟躇。

我也想起初中时代，就在学校隔壁的台北市青岛东路上警备总部看守所，常常看见中南部农村来的老妇人，在门口排着队，带着食品和衣物，等候接见囚禁在那神秘的看守所里的，或者是她的儿子，或者是她的丈夫的情景。也许旧书的主人还幸运地站在那门禁森严、围墙高大的看守所里吧。抚摸着旧书，时而也会这样想着。

一九六八年，我被捕入狱。一九七〇年春，被送到当时在台东泰源的政治监狱，第一次见到了五十年代反共肃清时代被逮捕而判决无期徒刑，其时已被幽囚二十年左右的人们。小时候，大人耳语里的传说，旧书页上的笔迹，顿时成了活生生的人，与我生活在一个遥远的监狱中。我会见了那噤声不语的历史。会见了那难以置信的，充满了激烈的青春，对于生死最逼近的抉择的时代。我会见了那残酷、苍凉、荒漠的五十年代。而他们依然活着，对我絮絮地叙说着一场远去的风雷，一个消失中风飘云卷的时代……

出狱以后，我参加了以五十年代大狱幸活刑余人为中心的“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在餐会上，我看见过一百五十人以上，于今满头飞霜，年在六十五以上的老前辈，顽强地活着，凝视着这个对五十年代的黑暗装出无辜的表情的我们的时代。

一九八八年，政府宣布解严。但至今没有一个在解严后不悛于主张“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教授、政客和名人为一九五〇年反共肃清的罪案做过什么清理、调查和研究。没有。没有

一个自称进步、民主、自由的学者，提出过对于那充满了抑压、虐杀、拷问、歪曲的“战后”加以清算、复权，并全面颠倒冷战历史之论述的要求。解严以后，没有一个报纸、言论人、教授和学者，真诚地为他们在充满了非理和荒废的戒严时代，自己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成为戒严的非理和暴力之共犯，表示过忏悔与羞耻，却大模大样地扮演着自来前进、民主、自由、正义的谰戏的角色。长期的反共戒严，已经在台湾的文化、知识和思想中造成了这样一个顽强的病灶，使得即使在形式和法律的表面“解严”，因为极端反共、反民族、亲美的深层的内面化，“解严”其实还是“戒严”——尤其在社会科学、哲学和政治领域上。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的作品，不断地被加以新的订正、注解，经由世界上最著名的出版社重新成套出版。但他们的出版宣传和说明，也从来不曾有人以“马先生来了！”之类的“广告辞”来促销的。马克思很早就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宗教，没有亲情，没有神圣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被转化为商品。当马克思主义长期地在这个岛屿上是邪教的邪经，是恶毒的、危险的思想；当台湾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怀抱着马克思主义奋不顾身地要改变命运和世界的工人和农民，被一切有权、有势、富有、体面而有知识的一切“体制”当做异端传布者异教徒、判国者和恶疾传染者一样被追缉、拷问、枪决、监禁、破身亡家而至“种族灭绝”；当法西斯、极端反中国、反民族，极端反共、大模大样的帝国主义代理人 and 买办的菁英知识分子，四十年来占领和支配着台湾的政治、言论、文化和知识高地，“后现代”式的“马先生来了！”“灵魂的解禁”的谰嬉声中出版的《资本论》的命运，似乎未卜已知。

精神的荒废

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

二月十日的《联合副刊》上刊有张良泽先生（以下敬称略）的文章《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文章虽短，值得严肃商榷的地方却很多。

张良泽说他对于在他的高中时代编过“反共壁报”，参加过“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参加过“反共演讲”，觉得很后悔。他也对于在大学时代写过“反共文学”，以及在七十年代研究台湾文学时，因基于他当时怀抱的中国“民族大义”而批判过“皇民文学”，深觉悔恨。

五十年代的高中生办壁报，可以办得才华横溢，但是一般地绝不可能不反共一番，因为壁报是作为学校党、安全、思想工作的核心训导处所督管的。而五十年代台湾的中学，在白色恐怖政治肃清之后，根本不存在有“反反共”的左倾思想和知识的学生和他们的斗争，学生只能是跟着教官和教师反共，不存在当时中学生必须在左右、在国共、在进步与反动之间做出实践选择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后悔当年的无知与怯懦的问题。

至于救国团，当年凡是高中生，都不能不是救国团的团员。救国团是以高级中学为单位（大队）全员编队的。正如初中（今之国中）生皆须编入“童子军”，凡高中生莫不是救国团的团员。因此，张良泽也似乎没有理由为此扼腕乃尔。

然而参加了反共演讲，写过以反共抗俄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的张良泽，确实就比较突出了。这使我回想起我在高中和大学时代那么几个国民党积极分子学生。在被迫去听讲的比赛会场上，我看到过他们讲得热血沸腾、字正腔圆，尔后看着他们穿着浆烫过的青年服，上台领奖，神采飞扬。我也在大学时代的校刊上读过被排满文艺版的文艺学生的“反共文学”作品，生涩荒芜地写着“残暴共匪”的故事。如若从严肃对待自己的立场出发，对于已经具有行为、思想和选择能力的青年期，争取过“反共演讲”和写“反共文学”的荣誉的自己表示遗憾，则毋宁是一种值得推许的反省态度。但如果张良泽没有以为了苟活（“活下去”）和为了立志“当作家”而有不断发表作品（包括“反共文艺”）之必要为解辩，则在冷战和反共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的台湾六十、七十年代，基本上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张良泽对于他曾以中华“民族大义”批判过“皇民文学”，深感“后悔”当初之“无知”，问题就比较复杂，应当深入探讨。

反共和皇民主义

张良泽认为，在“如今回想起来”时深为“后悔”的少时反共和批评“皇民文学”的“无知”行为，“都是三十年间接受了‘反共爱国’教育的必然结果。”办反共壁报、参加“救国团”、参加“反共演讲”比赛、写“反共文学”发表……当然和五十年代以降国民党的“反共爱国”教育有关。但是以“民族大义”“痛批”“皇民文学”的思想，却未必和这“反共爱国”教育一致。

作为一九三七年侵华战争精神动员手段的皇民化运动，是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形态。而法西斯主义的背景，在于第一次战后西

欧和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化，大资本独占体利润下降，中下层资产阶级破产，农村疲惫，而林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纷扰不休，政局动荡。为了恢复和维持独占体的利润率，恢复经济发展，贫困化的资产阶级市民和农民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投向军事性独裁的国家，让国家去压迫和清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并以极端反共右翼的铁腕统治，维持资本积累所必要的秩序。强烈的反共政策和残暴地肃清、镇压各左翼人士和团体是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政策。而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核心力量，正是各国、各民族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民族战线。因此，做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意识形态，恰恰是极端的反共主义。因此，“反共”教育绝不“必然”带来批判皇民主义的“结果”。恰恰相反，很有一些人主张离开中国人立场，重新评价皇民文学；主张皇民化虽然不曾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却使台湾人变成不是中国人而予以正面评价；主张要以什么“爱与同情”去重新“认真”“解读”皇民文学，恐怕才是以极右反共论为基点的“台独”论的“必然结果”吧。

至于“反共爱国”教育，恐怕也要分别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的爱国论。杨逵被判刑十年，理由据说是“爱国过激”。彭歌指责乡土文学派“爱国过于激切”而必欲置之于死地。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之间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私相授受的保钓爱国运动，受到国府彻底的镇压。日本战犯岗村宁次应蒋介石之邀，组织以日本前二十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为中心的日本右派校佐，组成“白团”，到台湾秘密训练台湾军队准备“反攻大陆”。这个由日本右翼将校组成的“白团”，在战后来台秘密组训台湾军队时，有这样的誓词：

“今赤魔逐日风靡亚洲大陆。崇尚自由与和平，深知

中日合作之切要之中日两国同志，皆以为此乃为亚洲反共而联合、为共同防卫而崛起，相互密切合作，为防共而精进之秋也。”

“兹日方同忧共谋，欣然应欲打倒赤魔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招聘，期为中日恒久合作之础石也。”

此外，日本战犯岸信介、儿玉誉士夫，右派政客藤尾正雄等人，一贯是蒋介石的座上客。今天，有一群日本右派学者，也是出入总统府的上宾。今天的国中新编教科书，充满着对日本在台殖民历史之美化、正当化与合法化的叙述。因此，愤愤不平地说国民党的“反共爱国主义”教育使人不能以“爱与同情”去评价“皇民文学”，恢复皇民文学的名誉，离开事实就不免太远了。真正的事实是，在青春期间狂热地度过“皇国少年”的一代，自台湾光复以后，从来不曾像今天那样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言论上昂扬得意过。

作家形成和机会主义

其次，不妨谈一谈“要做一个作家”，是不是一定要无原则地“活下来”和“发表作品”。

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五十年，在现实上，这是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开始其强权的“皇民化”运动之前，即日本在一八九五年割占台湾的一刻开始，就一直推行将台湾人同化于日本的政策。但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以抵抗同化，保住汉族种姓来回答殖民者的同化压力。一八九五年就开始的台湾农民反占领斗争，以及坚持到一九一五年的抗日武装游击斗争、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是

台湾人民为保卫民族主体性而在高压下一仍坚持抵抗的历史。从文学上说，坚持以白话汉语写作，一生坚持不着和服只穿唐装，在作品中表现出磅礴坚强的、对民族和阶级压迫的抗议，蔚为以赖和为代表的日据下台湾现代文学家光荣的历史传统。看来，“要做一个作家”的“条件”，未必一定要为了苟活而屈从，未必一定要发表违背原则、屈折于权力的作品。从赖和到吕赫若的台湾文学家，即使在压迫最苛酷的时代，都不曾稍露屈服的奴颜媚骨。说到“发表作品”，人们也会想起在压迫者严密控制下犹冒险秘密写出反抗的心声，隐而不发，迨敌人溃败后才将作品公诸于世的吴浊流。台湾文学史上，不为“活下来”而失节，不为“发表作品”而写违背原则、讨好权力的文章的人比比皆是，而他们又个个都是从艺术上、思想上都能过关的，令后世景仰的真正的作家。

皇民化歇斯底里的机制

一九三七年，日本向中国发动野心勃勃的侵略战争。在此之前，日本人没想到有朝一日必须调动台湾的人力和物力供侵华战争驱策。日本当局有鉴于据台四十余年而绝大多数台民一仍怀抱强烈的汉民族意识，而开始强化对台民的强制同化，由国家权力发动全面压服性的同化运动，收夺汉语、中文的使用，强力推行日语；禁止台湾的一切汉族系民间宗教，把日本神道信仰强加于人；禁止台湾人的传统生活习惯，提倡日本式的生活、衣食和习惯；鼓励弃绝汉民族祖先传用的姓名，提倡“创氏（姓）改名”，改用日本式姓名。在另一方面宣传皇国史观，宣传所谓“日本精神”和“大和魂”，但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民族关系上，仍然保持甚至实质上强化向来的殖民地歧视构造。

现代资本帝国主义以其强大而残暴的现代化武装显示出来的

暴力，以其现代化交通、运输、产业、教育、法政和文官制度等向其殖民地呈现种族、政治、社会经济、文明和权力上绝对的优越性，造成对殖民地强大的威慑，以遂行其政治支配和经济收夺。这种暴虐的统治，一方面激发殖民地人民的抵抗，但也更多地造成被殖民人民和知识分子深刻的民族劣等感，对自己民族种性、文化和传统，怀抱深层的厌憎和自卑，丧失民族主体意识，对自己民族的解放、进步和发展，抱持绝望、悲观的态度、并从而对“文明开化”的殖民统治者表现为奴颜媚骨、卑屈驯从。这是从十九世纪末向全球迅猛扩张，统治了全球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迅速瓦解的殖民帝国主义对广大殖民地人民造成的深刻的心灵和精神的创伤，流毒为害至于今日，是殖民主义在政治压服、暴力统治和经济掠夺之外另一个荼毒广泛久远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的“皇民化运动”，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在政治压服、经济掠夺外，对台湾民众的精神加害的著例。日本当局，一方面巧妙地利用了殖民地台湾人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族劣等感、民族自我厌憎感和对于自己民族文明开化的绝望感（而这些都是苛虐的殖民地统治和殖民地意识形态所造成），另一方面则在“皇民化运动”中，突然开启了“内台一如”、“皇民练成”之门，宣传只要人人自我决志“练成”“精进”，可以锻造自己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从而摆脱自己做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这一套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大规模精神洗脑的装置，于是促发了相当一部分台湾人“皇民练成”的歇斯底里，今日回顾，令人辛酸悲忿。

皇民文学的经纬和主题

而“皇民文学”运动的发生，有这经纬：在一九三七年皇民化精神洗脑运动的延长线上，在日本进一步准备向祖国华南和南洋扩大侵略战争的一九四〇年，成立“大政翼赞会”于日本。同年，在殖民地朝鲜、“满洲”分别成立相呼应的“国民总力联盟”和“与亚奉公联盟”。一九四一年台湾成立在总督府领导下的“皇民奉公会”，在全台自中央以至行政末端成立支部、分会等，把报纸、广播、戏剧、电影全面组织和统辖起来，为侵略战争宣传动员。

在文学界则先成立“台湾文艺家协会”于一九四二年，并选荐作家张文环、龙瑛宗参加“第一届大东亚文学会议”。一九四三年，进一步把台湾作家纳入“台湾文学奉公会”，推派周金波、杨云萍参加二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同年十一月，召开“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以“确立本岛文学的决战态势，把文艺杂志摆到战斗位置上”为会议主题。西川满的《文艺台湾》和张文环的《台湾文学》皆废刊而统合为全面支援侵略战争的《台湾文艺》。

现代台湾文学，是在日据下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二十余年的历史中诞生、成长和成熟的。一九三一年的大检举，全面镇压了台湾抗日社会运动，但文学战线一仍在镇压的火线上疏散出来的战士们坚持下，在三十年代艰困条件下，继续擎起抗争的火炬。然而到了一九四〇年以后，一切抗日运动被一扫而光，军部法西斯的“皇民化”运动，以强权和威压向岛屿的四面扩张。

在殖民地台湾，“皇民化”运动欲达到两大目标：

一是彻底剥夺台湾人的汉民族主体性，以在台湾中国人的种族、文化、生活和社会为落后、低贱，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种族、

文化、社会为先进和高贵，提倡经由“皇民练成”——思想、意识形态的“皇国化”改造，语言、姓名、宗教、文化的日本化改造，从而彻底厌憎和弃绝中国民族、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把自己奴隶化，对天皇国家输绝对的效忠。

上述皇民化运动的第一个目标还仅只是一种手段，以达成运动的第二个目标，那就是以奴隶化、经过彻底精神洗脑、彻底破除了台湾人的民族主体之后的台湾人，供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圣战”驱策，鼓动以精纯的日本人，为日本侵略战争“义”无反顾地充当炮灰，为天皇国家和意识形态效死而不稍悔！因此，皇民化运动展开后越四年许，就宣告征召台湾青年为“陆军特别志愿兵”（一九四二），翌年，征“海军特别志愿兵”，一九四四年宣布在台湾实施征兵，一九四五年实施。

而为皇民化运动服务的台湾皇民文学，正是为皇民化运动的这两大目标服务。

周金波的《志愿兵》，写的是一个只有小学毕业，出身平凡、素性质朴的台湾青年高姓六（自改姓名为“高峰进六”），对皇民化思想，比一般的资产阶级台湾知识分子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他深信神秘的“祭政合一”论（即神道信仰与皇国政治的一体性），深信神道的击手之仪足以使人“为（神道）诸神所引领”，从而益发“接近（大和）众神”，甚至借以触摸到“大和心”、“体验到大和之心”。和知识分子张明贵的怀疑论形成对比的高峰进六，决志要依所信而活，终于以血书明志，应征为“特别志愿兵”。

周金波主张抛弃理性，却除知识分子的怀疑论，从神秘的日本神道信仰入手，去“触摸”和“体验”大和民族的心灵和精神，借以使自己从卑污的台湾人种脱蜕而出，成为高贵的日本人，然后以血书志愿应征，充当帝国侵略的鹰犬。

为了背叛自己的民族主体，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陈火泉的

自我斗争就更加披肝沥胆了。他的长篇小说《道》(道路)表现了一个力争在天皇信仰中把自己转变成日本人时,近于哀嚎、呻吟的民族自卑、自我憎厌和对于“天业翼赞”的无限忠心和信仰。小说的主人翁狂热地想要戮力蜕变为日本人,但对于自身体内流动着的台湾人的血液这个自然的限制,感到绝望和怀疑。他对自己呐喊:

“菊花就是菊花。真正的花就数樱花。但牡丹花终于也能算是花吗?做为岛民的我,终究会成为皇民吗?终究也是个人吗?”

因为生而为(低贱的)台湾人,因此力争通过精神的精进修炼,达到“与大和心交流”而成为日本人,但又对于身中流动着的毕竟不是大和民族“高贵”的血液而深为苦闷。在终于向日本当局提出应征为志愿兵时,小说的主人翁如此吟咏明志:

“愿为日本臣民,而此身猥非日本骨血,伤悲宁过于此?

今为圣君之盾牌,吾辈欢欣勇猛以效死。”

他并且为他战死后的墓碑上预写了这样的墓志铭:

“青楠(小说主人翁的雅号)居士生于台湾、长于台湾、而以日本国民死。”

“青楠居士,日本臣民也。居士为冀赞天业而生,为冀赞天业而劬劳,为冀赞天业而死。”

自己践踏和羞辱自己的民族主体意识,以令人震惊的民族自卑感和自我憎恶,不惜以自身为皇国的侵略战争而破碎与毁灭,来求取获得殖民者民族的认同。

以“皇民练成”为魔咒,造成人人蜕化为光荣的日本人的集体幻觉,并在魔咒幻觉的驱使下,向着毁灭性的战争狂奔。这就是“皇民化运动”的真髓。而“皇民文学”正是这邪恶道场的共犯和帮凶。

从全面看,皇民文学是日本对华南、南洋发动全面侵略战争

时，做为战争的精神、思想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机制的组成部分而展开。皇民文学运动，是同时期皇民教育、皇民戏剧、歌谣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集体洗脑，使殖民地人民彻底抛却和粉碎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认同，从而粉碎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在集体性歇斯底里中幻想自己从“卑污”的台湾人蜕化成光荣洁白“天皇之赤子”，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欢欣勇猛以效死”，“以日本国民死”；“为翼赞天业而死”。

愤怒的回顾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在皇民化运动下，总共有二十万七千余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夫”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战争。战死、病歿、失踪者计五万五千余人，伤残两千人。另外因受皇民思想欺骗过头，在南洋、华南战场中误信自己是真皇军而犯下严重屠杀、虐杀罪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者二十六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一百四十七人！

一九四五年，战败的日本拍拍屁股走人，在台湾留下满目心灵和物质的疮痍。驱策台湾青年奔赴华南和南洋，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主凶，当然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权力。但是，对于殖民地台湾出身的少数一些文学家在那极度荒芜的岁月中，认真鼓动鄙视自己民族主体性，鼓动青年“作为日本人而死”，从而对为屠杀中国同胞和亚洲人民而狂奔的行为，后世之我辈，应该怎样看待？

从反省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立场，尾崎秀树在评论陈火泉的小说《道》之余，有这沉痛的感慨：

“……然则，陈火泉那切切的呐喊毕竟是对着什么发出的啊。所谓皇民化、作为一个日本臣民而生、充当圣战的尖兵云云，不

就是把枪口对着中国人民、也不就是对亚洲人民的背叛吗？”

因此，重读陈火泉的皇民小说之余，尾崎有这痛苦的呻吟：

“当我再读这生涩之感犹存的陈火泉的力作时，感觉到从那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作者的苦涩，在我的心中划下了某种空虚而又令人不愉快的刻痕，无从排遣。”

尾崎秀树并且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对于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忿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尾崎的《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正是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在日本右翼至今喧嚷“自由主义史观”，指摘主张反省战争责任的史论为“自虐史论”，从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和殖民地历史的日本右翼思潮氛围中，早早敢以“春秋之笔”、“仗义执言”的力作。而正是像尾崎这样，坚决不肯以“爱与同情”为言，去美化、去正当化日本侵略历史对中国和亚洲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物质、生命和精神的加害的日本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存在，使我们对中日和亚洲人民之间真正的和平、正义与团结的展望怀抱了希望。

冷战和颠倒

怎样对待在“决战文学”旗帜下，在日本法西斯最张狂的时代，台湾文学家的思想和实践？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不是三、五年，而是五十年。长达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是渗透到生活细节的日日夜夜的五十年。五十年间，台湾人民给日本人纳粮缴税，不少的人不能不从事日帝统治体系下的下层公教职务，尤其在台湾成为日帝南侵基地和军

事要塞的四十年代，全岛岛民在严峻的战争动员体制下，更是无所逃于日本战争机器的淫威。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在权力下，写些配合时局的小文章，参加一些战争动员的活动和会议，在所不免。因此，国民政府领台时，宣布了台湾地区不清理汉奸问题的方针。纯就政策而言，不能不说是十分贤明的政策。但照顾到台湾殖民地化历史的特殊条件而抑止历史清算以增进民族团结，到后来成为国府在台湾光复后急剧升高的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态势中，改而残酷肃清台湾的抗日各派，反过来与日据下汉奸豪族（所谓“五大族系”，又皆在战争末期台湾皇民化运动的领导机关中担任要职）相温存，且以日帝下累致的巨富为基础，在战后“内战—冷战”构造中发展为庞大的集团资本，享受不能仰视的权力和财富的结果。而五十年代以降，国府和日本旧军部、反共右翼政、商、学界千丝万缕的网络，被在八十年代末“台湾化”后的国府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甚至也在少数一些台湾战后留日学界中发展成对日占台湾史加以美化 and 正当化，宣传和当年伪满“建国”论如出一辙的各种建台湾为“新而独立”的“民族论”和“国家论”的运动。但这已是余话了。

抵抗者和奴隶的分际

然而，即使在疯狂的“决战”期，台湾人民和作家也绝不只是消极地在战争体制的淫威下屈从而已。以文学界为例，最突出的例子是杨逵。他积极参加日本军政当局组织的皇民剧运，却大刺刺地写《怒吼吧，中国！》。利用日帝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宣传中国农民抗击美英帝国主义的热潮。明里符合当局抗击“英美鬼畜”的国策，暗中宣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之英勇。此外，他也写《驱逐登革热》，按日语“登革热”的“登

革”，与日本传说中的恶灵“鞍马天狗”的“天狗”同音。剧本借描写台湾贫困农民扑灭登革热的运动，从而对台湾农村以高利贷和地租压迫农民的地主“李天狗”加以无情的批判。作品中浸染着鲜明的阶级意识，其在屈折中表现出来的令人会心的坚强的抵抗，今日读之，犹为之动容！

而至于吴浊流之冒险在日本军政的枪尖下秘密从事抵抗的写作，是世所周知的。

因此，对待“日据时代台湾作家”“写过……‘皇民文学’的历史事实”，不能只看一个作家的一时，主要地也要看他的一生。看一时，也要分辨是积极主动地为虎作伥，还是消极的、面从腹背的言动。有人找到杨逵一篇似乎在呼应“时局”的短文，几乎如获至宝，大喜过望，仿佛这就足以“日据下谁不写皇民文学”找到有力佐证。然而，杨逵不惮于斗争和抵抗的一生，岂可因战争末期一篇面从腹背的短文，而与周金波、陈火泉之流相提并论？赖和不惮于在剧作、生活、社会活动上坚拒同化，力保民族尊严，不惮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光辉的一生，岂可因他临终前甫自縊继中重病出狱、心灵一时的凄绝和软弱所写的短文，而硬将他与奴颜媚骨、“忘祖背宗”之辈同日而语！而吕赫若在皇民文学运动沸沸扬扬之际，把“时局”的主题大刺刺地摆到一边，兀自去刻画与战争无关的台湾传统生活的风俗百相。在宣传全面同化于日本的皇民运动主旋律下，刻画台湾生活习俗和风情，就是对皇民主义的批判，有重大意义。

再次，“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的台湾作家，本身对于自己成为问题的、当时的作品与思想的态度，也各有不同。

周金波始终不曾稍悔当年皇民思想。在近年一次台湾文学研讨会上，他在日本学者前，坚持以日语发言，发言内容，基本上与当年皇国青年的周金波无轩輊之分。这是坚持皇民有理的顽固

态度。

陈火泉对自己的《道》，则采取辩解的态度。他说他所表现的，是为当时“时代环境”所逼的言行。小说的主旨，在于促使读者对日据下“被凌虐、被损害”的台湾同胞一掬同情之泪，云云。

不论陈火泉的说辞说不说得通，战后的陈火泉的态度，和周金波者毕竟有所差别。至于为林瑞明教授认为较之陈火泉有“台湾人主体意识”的王昶雄，战后在自己汉译的《奔波》，中，多处修改，声言日文版本受当时日本当局检阅时横遭篡改，以适合“时局”标准而与原作失真。王昶雄改订汉译文本的做法固然引来争议，但在对待皇民主义上，显然他是有一定的羞恶之心，视同自己的耻部。这与周金波的坚持大和主义，与陈火泉的强辞饰辩，在性质上又有不同。至于龙瑛宗、杨云萍、黄得时，他们在战后的许多言论，已足表现对那精神荒废时代的自己的言动的悔意，此处实不忍细说，但其对待自己当年皇民主义言论的懊悔态度，又与周、陈不同了。

而张良泽此次译刊杨云萍、龙瑛宗的“皇民文学”“作品”未审有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虽然二老目前已经相传有衰老到痴瞶的程度）？否则，恣意公刊当事人或其子女未必同意公刊的旧时文章，是对二老的“爱与同情”呢，抑或是残酷的二次伤害？

十六年后的回答

一八九五年，强权割台成为定局的条件下，台湾绅商官僚组织了一个抗日临时政权“台湾民主国”、“阳为独立，阴奉大清”。

经过五十年殖民统治，日本人培育了一批与殖民者同其利益的，协力派精英豪绅。迨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一些亲日派台湾绅商豪族阴谋与驻台日本军部勾结，倡台湾之独立。但这一回是

阳为独立，阴奉日本帝国。

同一年，尾崎秀树有这样一个难忘的体验。一个和青年尾崎同一队的台湾人“学徒兵”向尾崎道出他对光复的想法。这台湾青年说，经过了五十年的日本统治，台湾的生活、文化水平已经高出中国，台湾已经没法儿跟着（落后的）中国走了，只有第三条道路——台湾独立，从而和日本、中国平等交往……

当时，尾崎哑然无以为对。十六年后（一九六一年），尾崎在他的论文《决战下的台湾文学》中，对那位台湾籍同学做了回应。尾崎秀树写道：

……回答这问题，只能说日本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伤痕无乃太过深切。只有把日本对殖民地台湾的这一笔亏欠镂刻在心版上的时候，我才有资格回答那位台湾籍的同学。同时，我也想对我这位同学提这么一个问题：

“对于曾经做为日本军之一员的你自己，你是怎么想的？”

在我重返日本的第二年，发生了“二·二八”事变。

过了几年之后，听说在台湾中南部武装蜂起于“二·二八”事变的民众中，有不少台湾人原日本军人。而且听说特别是曾被征召到海南岛作战的台籍原日本军人。战斗尤为骁勇。

“当这些从战场上回来的台籍旧日本军人或军属，拿起武器在事变中崛起之时，到底受到多少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影响？”

当我听说了有一些台籍原日本兵在“二·二八”事变中蜂起时，我痛切地想到上面这个质问，是我们日本人必须向你们作答，却至今一直不曾解答……

殖民者破坏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剥夺被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对被殖民者强加思想、意识形态的同化，特别有效地使被殖民精英认同、同化于殖民者的史观、世界观、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而当殖民者离去，这些精神的歪扭依然顽强、长时期滞留下来。

五十年的殖民地统治，四十年代的皇民化运动，使一些殖民地精英妄以为自己在殖民地中现代化、蜕变成文明开化的人种，妄以为台湾的文化生活因殖民统治而高于中国，从而必欲抛却自己的祖国，企图独立。

早在六十年代初，尾崎秀树在对日本殖民主义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时，就看到所谓台独运动正是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遗留下来的“心灵的殖民状态”这个严重的创伤。一九五〇年代，弗·范农以“黑皮肤、白面具”之论，早已提出了被殖民者（“黑皮肤”）在心灵上受到殖民者意识形态荼毒（“白面具”）的深刻的分析。

精神的荒废

（一）国民党长年以来的“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主义）教育，是一切基于（中华）“民族大义”“痛批”“皇民文学”的根源。

（二）然而，在现实上，“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

（三）因此，“新一代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应该扬弃中华民族主义，不可“道听途说就对‘皇民作家’痛批他们‘忘祖背宗’”；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以“爱与同情”的“认真态度”去“解读”皇民文学作品。

这就是张良泽的皇民文学论的逻辑吧。否定、鄙视、憎恨被

殖民台湾人（中国人）的主体性，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使自己像一个日本人那样地生活、思考、并且像一个日本人那样地效忠和崇敬日本天皇，终于做为日本人而效死——这就是四十年代台湾皇民文学的主题的真髓。

而主张对这样的文学不要以被殖民者的主体性（“民族大义”）加以批判和反省，企图以“反共爱国教育”论，以“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为言……对皇民文学无分析、无区别地全面免罪和正当化的本身，正是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深层加害的一个表现——长年以来未曾加以清理的、心灵的殖民地化的一个鲜明的表现。

“……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每当在生活中眼见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尾崎的这一段话就带着尖锐的回声，在心中响起。

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已经提到批判和思考的人们的前面。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四《联合报》副刊

汹涌的孤独

认识姚一苇先生，是在一九六〇年。推算起来，那一年先生方值三十八岁的盛年，我则是二十三岁的大学生。

中学时代的学长，也是当时文学同人刊物《笔汇》的主人尉天骢兄带我去永和竹林路先生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前此，在天骢兄的怂恿下，初写了两篇小说，刊在《笔汇》上，据说很引起先生的注意。当时半是闲嬉，半是漠然地写了发表的小说，竟而受到先生亲切而又严肃的对待，觉得十分诧异。先生在竹林路上那一幢如今早已拆建成楼房的日式宿舍里对我说过的话，今日已完全不能记忆。但还记得一个总的印象：“写小说不是闹着好玩，要认真对待！”

三十年前结成忘年交

那时候，没有大报的文学奖；从来也没想过能把稿子投到林海音先生主编的《联合副刊》和以当时的“中国写作协会”为中心的台湾主流文坛拉着不啻天壤的距离；想也不曾想过把作成的小小说拿去什么地方换成稿费，做梦也不曾梦想能成名成家，却开始在天骢兄的催促下，在先生的关怀下，写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在《笔汇》上发表。

大学毕业，当完兵，带着养家的寡母和妹妹，在板桥租了房子，开始教书的日子，已是一九六三年。安顿在板桥市四川路上的家，和先生在板桥台湾银行的办公室，只相距不到十来分钟徒步的距离。应该说是从这时开始，我把每篇作好的小说先送到板桥台银办公室去给先生，恭请评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在先生的允许下，到板桥艺专去旁听先生戏剧理论的课程，风雨无阻，不曾缺课，从此开始了和先生深厚的情谊。

刚刚写好一篇小说，带着难掩的喜悦和得意，把原稿送到办公室给先生。

“这次，写了多少字？”

先生接过原稿，随意翻动着。他的眼睛，因着一种对创作作品的喜悦，睁得更大一些，带着称许的笑意这样问我。

“三万多字吧。”

“写得顺手吗？”

“嗯。”

“顺手就不错。”

“……”

“写得怎么样，自己觉得？”

我摇了摇头。“不知道呢。”我说。先生于是把原稿摆在桌上，说他一定会“仔仔细细地看”。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我离开先生忙碌的办公室。早在六十年代初，先生一再强调他以对待中外文学古典级作品同样的方法和态度，阅读和批评时仅二十多岁的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作品，其鼓励和教育上的影响，十分深远。

然而，通常总是当天晚上，我就开始觉得懊恼。觉得小说没作好，发现小说的这里或那里没有写得更好一些。到了第二天，就觉得已经送到先生手上的小说，简直幼稚可笑，少有是处，觉得很难为情了。

殷切提携后进

下一个约见，多半是约在先生家里。由于总是在彼此下班、或者星期六、星期天的下午，也多半不免叨扰一餐饭。然而随着约见时日的临近，不安和懊恼之情也愈甚。像是一场固定的仪式那样，在用过饭后，我们坐在那一间旧式房屋的客厅里，他开始细细地评说在他手上的我的小说。

“你写了一篇好小说。”

并不多的几次，先生这样开始他的评说。至今我还记得他交织着喜悦和严肃的，睁大着眼睛的、瘦削的脸庞。逐渐地，我觉得那使我数日来懊恼、羞赧不已的作品，逐渐形成了先生和我以外的第三者，由先生点点滴滴地增进我对于这客体化的作品的理性的认识。

在政治上极端苛严、思想上极端僵直、知识上极端封闭的六十年代，成长于狂飙的三十年代，而后东渡台湾的先生，兀自坚定地文学和艺术持守着类若对宗教的不移的信仰，并且像一个尽责的掌灯人那样，用他手中的火苗，一盏盏点亮了他身边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年轻作家手上的创造的烛火。黄春明、白先勇、王禎和和施叔青的个别作品，都曾受到先生仔细的品评。回想起来，在六十年代开始写出比较重要作品的吾辈一代作家，在那苛酷寒冷的永夜，捧着先生为我们点燃的创造的喜悦和烂漫，顽强地留下了不少喜人的作品，并且由这些作品而具体胜过了一个时代的寒冷、恐惧和令人窒息的苦闷。

悒郁时代中的思想交流

一九六五年以后，先生从经由他的手发表于他主持编务的《现代文学》的我的作品，看出了我内心和思想上沉悒的绝望和某种苦痛。也是在竹林路的客厅里，先生平静地谈到了他少年遍读和细读鲁迅的历程。在那即使亲若师生之间鲁迅依然是严峻的政治禁忌的时代，我也第一次向他吐露了我自己所受到的鲁迅深远的影响。先生向我描述了鲁迅葬礼的庄严隆重，告诉我他毕生以鲁迅告诫自己的儿子“不做空头的文学家”自惕。先生谈到鲁迅的晚年不能不搁置创作走向实践的时代的宿命。“但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先生说。

我激动着，却沉默不能言。在那荒芜的岁月，这样的对话，已经是安全的极限。鲁迅把我们更加亲近地拉到一起了。在仍然不能畅所欲言的对话中，我听懂先生不曾明说的语言，而先生也了解我不曾道出的思想和身处的困境。

“我看，写小说，”先生平静地说，“你的一生，最其重要的，莫过于此。”

“……”

“我知道，这些话，你怕很难听得进去了。”先生微笑着说，“但是你要写。你要写，才对。”

回想起来，先生可谓苦口婆心了。而即使在这么体己的谈话中，我也不能把自己当时的思想、行动和处境向先生打开的那一份深沉的孤单，至今记忆犹鲜。然而，当时先生怕也有更多更直接的，可以“抢救”他眼前的我的话，无法向我和盘托出罢。

像一个初学骑单车的小孩在下坡道上让自己眼睁睁连车撞上道旁的电线杆那样，一九六八年夏天，我被捕入狱。

一九六九年，我在图囿中读到先生的剧本《红鼻子》。有谁能比一个突然被捕、被拷讯、被投狱而失去同一切正常生活的自由联系的人，更能理解先生所写的、被不可抗的原因而和外面的生活断绝关系的世界呢？我逐字读着剧本，仿佛感觉到先生竟穿过众神袖手的狱墙，如同往时在先生家的客厅那样，向我传来谆谆然、蔼蔼然的安慰和鼓励，使我不能不面壁屏息，抑制满眶的热泪。

对时局与政治戒慎恐惧

一九七五年被释放回家不久，以许南村的笔名发表自我剖评的《试论陈映真》。先生读后，说“读了文章，才知道老天终究没有让他们把你毁了。”我蓦然想起几个或在狱中被逼发疯、或在出狱后因极度恐惧而惊惶丧志的人，体会到曾经在一九五一年遭错捕入狱，历半年后得脱虎口的先生对我的最深的牵挂，受到很大的感动。

如同一些和政权站得比较远，又亲身经历和目睹过国家暴力的一代怀璧东渡来台的大陆知识分子一样，先生对时局和政治保持着十分敏锐的戒慎和防卫意识。一九八七年以后，时局改观，先生开始对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讲得比较多一些。

在我入狱之后，大陆“文革”正是热火朝天的一九六九年，先生受邀赴美，参加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长达半年的修业。对于自一九四九年起就断绝了对中国大陆的一切认识的渠道，而想对“文革”中的实相一明就里的焦虑，使先生一旦踏上美国，就立刻搜读一切有关大陆的书籍刊物，耽读竟日，不能释卷。在兴隆路上先生的温暖的客厅中，他回忆着那一段激动的时光。

“有一些认识的朋友革命了，他们热情洋溢地弄书刊来让我

读，使我想起四十年代厦门大学的时代。”先生说。

然而疑虑而不是狂信在他天生理性的脑海里扩大。“这个人引一段马列毛的这一部分攻击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也引用马列毛的另外一部分斗争这个人。”先生说，“除了僵直的术语和口号，看不见活生生的道理。”在“四人帮”如日中天的时候，先生独对“四人帮”的文胆姚文元粗暴的文章起了忍不住的反感。早在一九七〇年，先生于是对“文革”中祖国前去的道路，起了深沉的忧虑。而早在初中时代就熟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先生，自然容易拨开辞语的迷障，直接探求真义时，揭破极“左”思想的虚构。

作品隐含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理想

一九九〇年后，先生和一切认真思考的知识分子一样，苏联和东欧骤然的崩颓，对先生的思维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熟读中外文学戏剧经典作品的先生，对于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对资本制生产的野蛮化作用，尤其是对于人的戕害所做的控诉，知之极稔。然而，从三十年代走来的先生，眼见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体制的挫折，不论如何总是很大的寂寞吧。

然而，在先生的戏剧创作和学术理论中，却从来没有丝毫中国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即使最稀薄的影子，而表现出力求严谨、理性的、学院的、正统主义的基调。细心的学生，也许只能在先生的论文和戏剧作品不时流露的、对于理想、爱、崇高、宽容、正义……的不可假借的信念，寻找到先生和三十年代的历史相互联系的线索。

去年十一月，我丧失了一位能理解我、而且长年以他迫切的祈祷为我忧心、和长年支撑了我的精神需要的、可敬的父亲。

现在，我又失去了一位从我的青年时代就不避祸变，以不轻易示人的先生的另一面，安抚了我焦躁的思想，理解我的微不足道的作品的师长和朋友。而蹉跎半生，蓦然惊觉自己竟也是六十初老的人，遗世孤独之感，在送别先生之时，竟汹涌而来……

——原刊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联合报》联合副刊

附录

陈映真写作年表

- 1937年 11月6日，出生于台湾竹南中港。
- 1950年 莺歌小学毕业。
- 1954年 省立成功中学初中部毕业。
- 1957年 省立成功中学高中部毕业，入淡江英专。
- 1959年 9月15日，第一篇小说《面摊》发表于《笔汇》一卷五期。
- 1960年 1月，《我的弟弟康雄》发表于《笔汇》一卷九期。
3月，《家》发表于《笔汇》一卷十一期。
8月，《乡村的教师》发表于《笔汇》二卷一期。
9月，《故乡》发表于《笔汇》二卷二期。
10月，《死者》发表于《笔汇》二卷三期。
12月，《祖父和伞》发表于《笔汇》二卷五期。
- 1961年 1月，《猫它们的祖母》发表于《笔汇》二卷六期。
5月，《那么衰老的眼泪》发表于《笔汇》二卷七期。
6月，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毕业。
7月，《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发表于《笔汇》二卷九期。
11月，《苹果树》发表于《笔汇》二卷十一、十二期合刊本。
- 1963年 9月，《文书》发表于《现代文学》十八期。

- 9月，进入强恕中学担任英文教师两年半。
- 1964年 1月，《将军族》发表于《现代文学》十九期。
6月，《凄惨的无言的嘴》发表于《现代文学》二十一期。
10期，《一绿色之候鸟》发表于《现代文学》二十二期。
- 1965年 2月，《猎人之死》发表于《现代文学》二十三期。
7月，《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发表于《现代文学》二十五期。
进入美商辉瑞药厂。
- 1966年 9月，《哦！苏珊娜》发表于《幼狮文艺》一五三期。
10月，《最后的夏日》发表于《文学季刊》一期。
- 1967年 1月，《唐情的喜剧》发表于《文学季刊》二期。
4月，《第一件差事》发表于《文学季刊》三期。
7月，《六月里的玫瑰花》发表于《文学季刊》四期。
- 1968年 5月，应邀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前，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警总保安总处逮捕。
12月，判刑10年。
- 1970年 2月，《永恒的大地》发表于《文学季刊》十期。
- 1973年 8月，《某一个日午》发表于《文季》一期。
- 1975年 7月，蒋介石去世特赦出狱。
10月，以笔名许南村发表《试论陈映真》一文，自我剖析；并由远景出版《第一件差事》、《将军族》两书，复出文坛。
- 1976年 年初，小说《将军族》遭查禁。
12月，《知识人的偏执》由远行出版社出版。
- 1978年 3月，《贺大哥》发表于《雄狮美术》八十五期。
3月，《夜行货车》发表于《台湾文艺》五十八期。
9月，《上班族的一日》发表于《雄狮美术》九十一期。

- 10月3日,第二次被调查局拘捕,三十六小时后始释放。
- 1979年 11月,《夜行货车》由远景出版社出版。
- 11月,《累累》发表于《现代文学》复刊九期。
- 年内,与宋泽莱得第十届吴浊流文学奖。
- 1980年 8月,《云》发表于《台湾文艺》六十八期。
- 1982年 7月,《云——华盛顿大楼系列(一)》由远景出版社出版。
- 12月,《万商帝君》发表于《现代文学》复刊十九期。
- 1983年 4月,《铃铛花》发表于《文季》一期。
- 8月,《山路》发表于《文季》三期。
- 8月,与七等生赴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
- 10月2日,以《山路》获《中国时报》小说推荐奖。
- 1984年 9月,《山路》、《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由远景出版社出版。
- 1985年 11月,创刊《人间杂志》。
- 12月,自选、插画《陈映真小说选》,作为纪念人间杂志创刊收藏版,计收入《将军族》、《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山路》等五篇。
- 1987年 6月,《赵尔平》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节录自《赵南栋》。
- 6月,《赵南栋》发表于《人间杂志》副刊人间。
- 6月,《赵南栋》由人间出版社印行。
- 7月,与康来新等合著的《曲扭的镜子》,由雅歌出版社印行。
- 9月,赴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成立二十周年志庆。
- 11月,《赵南栋》增订再版。

- 1988年 3月,陈映真作品集十五卷由人间出版社策划印行。
4月,参与筹组“中国统一联盟”,任创盟主席。
6月,赴香港参加《陈映真文学研讨会》。
- 1989年 4月,赴韩国采访访问。
5月,赴美国加州波丽娜斯参加中国研讨会。
9月,《人间杂志》因亏损停刊。
- 1990年 2月,率“中国统一联盟代表团”到北京访问,会见江泽民主席。
- 1991年 8月,筹划由人间出版社出刊《台湾政治经济丛刊》。
- 1992年 6月,《台湾政治经济丛刊》一~四卷《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战后经济分析》、《台湾战后经济》、《国际加工基地的形成》出版。
7月,《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第五卷《台湾的依附型发展》出版。
- 1993年 7月,《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第六卷《台湾之经济》出版。
12月,创作纪年与历程《后街》,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2月19—23日。
- 1994年 1月,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刊《联合文学》第一百一十一期。
3月,报告剧《春祭》于十二日在台北“国立艺术馆”公演,观众爆满。
3月,《春祭》发表于《联合报》联合副刊3月14—15日。
4月,《安溪县石盘头—祖乡纪行》发表于《联合报》联合副刊4月23—25日。
9月,《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第七卷《台湾政治经济学诸论辨析》出版。
- 1996年 5月,《歌唱希望·自由和解放的诗人金明植》,发表于

“中韩文化关系与展望学术会议”。

6月,《张大春的转向论》发表于《联合报·读书人》版
6月10日。

7月,《评〈中国不可以说不〉论》发表于联合副刊。

11月,《论吕赫若的〈冬夜〉》发表于台北吕赫若文学讨
论会。

11月,《一本书的沧桑》发表于《联合文学》。

1997年 7月,《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发表于“乡土文学
论战二十周年 回顾与再思学术研讨会”。

秋,《时代呼唤着新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社科院授予荣
誉高级研究员仪式上的讲话。

1998年 1月,《论吕赫若的〈冬夜〉》发表于北京吕赫若文学研
讨会。

4月,《精神的荒废》发表于《联合报》副刊4月2—4日。

7月,《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发表于《联合报》副刊7
月5—7日。

7月,《左翼文学和文论的复权》发表于《联合文学》七
月号。

8月,《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发表于《联合报》副
刊。

10月,《陈映真文集》(小说卷、文论卷、杂文卷)由中
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陈映真文集

作者=陈映真著

页数=593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8年11月第1版

SS号=11445251

DX号=000005759358

u r l = h t t p : / / b o o k . d u x i u . c o
m / b o o k D e t a i l . j s p ? d x N u m b e
r = 0 0 0 0 0 5 7 5 9 3 5 8 & d = 0 D F 4 2 8 8
E 1 0 8 A A A 2 7 0 E 7 5 2 C E 9 6 6 9 9 A 2 5
A & f e n l e i = 0 9 0 3 0 5 & s w = % B 3 % C
2 % D 3 % B 3 % D 5 % E 6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台湾变革的底流

现代主义的再开发

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

知识人的偏执

关于“十·三事件”

无尽的哀思

台湾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

绿岛的风声和浪声

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

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

“学院理想主义”的忧郁

《人间》杂志发刊辞

两鬓开始布霜

从台湾都市青少年崇日风尚说起

我们做的，还不够

石飞仁的正义感与台湾之冷漠

人文思想杂志的再生

科技教育的盲点

新种族

日本接触：实相与虚相

鸢山

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之演变

肃穆的敬意

你所爱的美国生病了

作为一个作家

历史性的返乡

悼念的方法

我们爱森林的朋友阿标

鞭子和提灯

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
最牢固的磐石
自尊心和人道爱
《侵略》和《侵略原史》
台湾第一部“第三世界电影”
电影思想的开放
从一部日片谈起
台湾内部的日本
 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
 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
 严守抗议者的伦理操守
 追究“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
 “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
 台湾山地少数民族问题和党外
 “炎黄子孙”靠哪边站！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抗议日人藤尾正行来台
 戒严体制和戒严体质
 台湾劳工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
 习以为常的荒谬
 一个罪孽深重的帝国
 美国统治下的台湾
 世界体系下的“台湾自决论”
 共同的探索
 台湾的殖民地体质
 “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
 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何以我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
 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
 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
建设具有主体性的高雄文化
时代呼唤着新的社会科学
黑松树林的回忆
评“中国不可说不”论

为和平团结起来！

十句话

帝国主义者和后殖民地的精英

“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

星火

安溪县石盘头

台湾史琐论

一本小书的沧桑

“马先生来了”？

精神的荒废

汹涌的孤独

附录